

蒂博一家

马丁·杜·加尔著

下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565.45
37
2

〔法〕马丁·杜·加尔著

蒂博一家

下

王晓峰 赵九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Roger Martin du Gard

LES THIBAUT

本书根据 Librairie Gallimard 1953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蒂 博 一 家

(下)

[法] 马丁·杜·加尔 著

王晓峰 赵九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125 插页 5 字数 492,000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7,500 册

书号：10188·516 定价：3.15 元

目 次

- 四四 7月27日,星期一——雅克第二次看望珍妮 (1367)
- 四五 7月27日,星期一——下午的政治新闻 (1371)
- 四六 7月27日,星期一——雅克和珍妮在交易所附近共进晚餐 (1377)
- 四七 7月27日,星期一——雅克参加环城路上的游行 (1390)
- 四八 7月28日,星期二——雅克赴柏林;走访冯劳特 (1397)
- 四九 7月28日,星期二——斯托尔巴赫上校的公文包 (1405)
- 五〇 7月29日,星期三——在布鲁塞尔;雅克找到了支部的成员 (1412)
- 五一 7月29日,星期三——梅奈斯泰勒检查斯托尔巴赫的文件 (1420)
- 五二 7月29日,星期三——王家马戏场的群众大会 (1430)
- 五三 7月29日,星期三——在布鲁塞尔,和平游行的晚上 (1435)
- 五四 7月29日,星期三——帕特逊对雅克说他要与阿尔弗利达一起出走——梅奈斯泰勒

- 自杀未遂 (1441)
- 五五 7月30日,星期四——雅克回到巴黎;第
三次看望珍妮 (1447)
- 五六 7月30日,星期四——安托万拜访吕梅尔;
凯道赛人心惶惶 (1456)
- 五七 7月30日,星期四——安托万接待西蒙·
德·巴丹库尔,决定与安娜断绝关系 (1464)
- 五八 7月30日,星期四——雅克领着珍妮参加
蒙特鲁日的群众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1475)
- 五九 7月31日,星期五——雅克的早晨;战云
笼罩下的巴黎 (1492)
- 六〇 7月31日,星期五——雅克在安托万那里
吃午饭 (1505)
- 六一 7月31日,星期五——在保卫祖国的义务
面前,雅克和安托万的两种对立的态度 (1521)
- 六二 7月31日,星期五——下午,雅克和珍妮
与社会党人在一起 (1535)
- 六三 7月31日,星期五——饶勒斯被刺 (1544)
- 六四 8月1日,星期六——雅克上午在人道报社 (1556)
- 六五 8月1日,星期六——安娜枉然寻找安托万 (1564)
- 六六 8月1日,星期六——雅克在珍妮家吃午
饭 (1568)
- 六七 8月1日,星期六——发布动员令 (1576)
- 六八 8月1日,星期六——雅克和珍妮迎接海
尔曼·缪勒 (1583)
- 六九 8月1日,星期六——雅克把珍妮带到安

- 托万家 (1590)
- 七〇 8月1日, 星期六——巴黎颁布动员令的
晚上 (1606)
- 七一 8月1日, 星期六——雅克和珍妮的晚上
——听到动员令, 社会党人转变态度 (1615)
- 七二 8月2日, 星期日——丰塔南夫人回家 (1630)
- 七三 8月2日, 星期日——安托万应征入伍 (1635)
- 七四 8月2日, 星期日——雅克决定将反战斗
争进行到底 (1646)
- 七五 8月2日, 星期日——雅克和珍妮见到丰
塔南夫人 (1657)
- 七六 8月2日, 星期日——珍妮与母亲激烈争吵 (1665)
- 七七 8月2日, 星期日——珍妮和雅克最后一次
会面 (1675)
- 七八 8月3日, 星期一——雅克回到日内瓦——
访问梅奈斯泰勒 (1683)
- 七九 8月4日, 星期二——雅克在由日内瓦至
巴塞尔的火车上 (1694)
- 八〇 8月4日, 星期二——雅克在巴塞爾车站
的小吃店里写宣言 (1708)
- 八一 8月5日至8日——雅克在巴塞爾 (1715)
- 八二 8月9日, 星期日——最后的准备 (1727)
- 八三 8月9日, 星期日——在高地上的约会 (1733)
- 八四 8月10日, 星期一——最后的行动 (1744)
- 八五 8月10日, 星期一——法军由阿尔萨斯撤
退 (1749)

第八部 尾声

- 一 安托万在穆斯吉埃医院 (1779)
- 二 韦兹小姐在巴黎的葬礼 (1794)
- 三 安托万回到旧居 (1803)
- 四 安托万和吉丝在大学街旧居一起吃午饭 (1810)
- 五 吕梅尔请安托万在马克西姆酒家晚餐 (1823)
- 六 安托万的一个梦 (1836)
- 七 安托万到拉菲特庄——上午，与但以理和
让—保罗在一起 (1845)
- 八 与珍妮第一次谈话 (1857)
- 九 与珍妮第二次谈话 (1868)
- 一〇 到医院拜访丰塔南夫人 (1874)
- 一一 让—保罗和安托万伯伯 (1890)
- 一二 拉菲特庄的晚上——与珍妮最后一次谈话 (1897)
- 一三 请菲利普大夫诊病 (1910)
- 一四 晚上的警报 (1930)
- 一五 几封信 (1935)
- 一六 安托万的日记 (1946)
 - 七月 (1946)
 - 八月 (1976)
 - 九月 (2010)
 - 十月 (2037)
 - 十一月 (2050)

译后记 (2057)

四 四

刚一按铃，珍妮就打开了门，好象从昨天晚上起，她就一直站在他们分手的地方等着似的。

“坏消息，”他低声说着，没有向她问好。“我今天晚上得动身到外国去。”

珍妮结结巴巴地问：

“要走？”

她的脸一下子苍白了，呆呆地看着他。使珍妮这样痛苦，他自己也显得十分难受，于是，珍妮倒想对他掩饰自己的伤心了。但是，再次失去雅克，确实是她忍受不了的一个考验……

“我星期四就回来，最晚不过星期五，”他赶快说明。

她低着头，呼吸沉重，两颊泛起红晕。

“就三天！”雅克强作笑容地说。“不长，只三天……我们有整个的一生，可以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她向他抬起了恐怖的、询问的目光。

“什么也不要问我，”他又说。“我被指定去完成一项任务，一定得走。”

听到“任务”两个字，珍妮脸上显得那样焦虑，雅克虽然自己也不知道到德国去干什么，但觉得应该让她安心：

“只是去跟外国某些政界人物接触……因为我能流利地说他们的语言……”

她注意地观察着他，他打住话头，指着前厅桌上摊开的几份报纸说：

“您看了最近的消息？”

“看了，”她简单地回答，声调却分明表示出她现在跟雅克一样清楚地意识到了局势的严重性。

他走近她，抓住她的两只手，握在一起，吻着。

“到我们的房间去，”雅克指着但以理那房间的方向，提议说。“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不要把它浪费了！”

她终于笑了一下，在雅克前面，走进了过廊。

“您的母亲没有消息？”

“没有，”她说，没有回过头来。“妈妈大概在今天中午以后就到达维也纳，明天以前，我估计不会得到电报。”

在房间里，一切都收拾好，只等接待雅克。遮帘放了下来，光线柔和宜人。家具什物都整理好，新熨过的窗帘挂在窗子上，挂钟也又走了，书桌的角上，放着一束香豌豆花。

珍妮在房子中间停住脚，用专注的眼光，稍许带些焦虑的神色，打量这年轻人。他微微一笑，却未能引得她也微笑起来。

“那么，”她用不太坚定的声音问道，“真的只有几分钟？”

他微笑着，用温柔的眼光定睛看她。这眼光并不显得心神不定，相反，是专注的，确定的，但是，却引起了珍妮微微的不安。她感觉到，自从雅克来到以后，这深沉的目光没有一次真正地直视她的眼睛。

他看到珍妮的嘴唇在抖动，抓住她的手，低声说：

“不要让我丧失勇气……”

她抬起头来，朝他微笑了。

“太好了，”他说着，让珍妮坐下来。

他并没有解释他思想的联贯，轻声说：

“应该有自信。甚至除了相信自己之外，不要相信其他……只有那些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并且为它牺牲的人，才会有坚实的内在生活。”

“对，”她结结巴巴地答应。

“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好象自言自语。“要服从自己的力量。即使别人认为这种力量不对，也由它去！”

“对，”她又说一遍，低下了头。

最近几天，她有好多象现在这样想过：“这是他说过的话，我应当记住……好好考虑……更好地了解……”她待了一会儿，一动也不动，垂着眼睛，俯下的脸上，显出那样深刻的沉思的神情，雅克感到慌乱了，有一会儿没有作声。

接着，他又用含蓄的、颤动的声音说，

“在我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就是我认识到，我身上，别人认为应当谴责的、危险的品质，恰恰相反，正是我自己最美好、最真实的成分。”

她听着，她理解，但是头昏目眩。两天以来，她内心世界的基础——崩塌了，她周围留下一片空白，雅克所有的论点似乎赖以建立的新的价值观念还未能填补。

突然，她看到雅克的脸开朗起来。他又在微笑，笑得跟刚才不一样。他心里有了个主意，他已经以询问的目光看着那位少女。

“听着，珍妮……既然您今晚只有一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跟我一起……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呢？”

她注视着他，没有回答，这个如此简单，但对她来说如此不寻常的提议竟使她手足无措了。

“我在七点半以前不会有工夫，”他解释说。“九点，我得赶到共和国广场。可是，这中间一个多钟头的时间，您愿意跟我在—起吗？”

“好的。”

“她有她独特的方式，”雅克心里想，“无论说‘行’，或者‘不行’，态度都又坚决，又温柔……”

“谢谢！”他叫道，十分高兴。“我来不及回来接您。可是，您能不能七点半在交易所前面等我？……”

她点点头。

他站起来：

“现在，我得走了，一会儿见……”

她没有想留他，默默地把他送到楼梯口。

他开始下楼，又转过身来，温存地微笑着向她道别。她俯在栏杆上，忽然鼓起勇气，轻轻说道：

“我愿意想象着您在您的同志们中间……比方说，在日内瓦……在那里，您一定会完全自在了……”

“您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她斟酌着词句，“直到现在，我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您，您总是显得……怎么说呢？……有一点……不自在的样子……”

他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仰起头，严肃地看着她。

“您不要弄错了，”他赶忙说，“在那里，我也……不自在！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不自在。我永远不自在，生来就是如此……”他笑了笑，又说：“只有在您身旁，珍妮，这种不自在的感觉才离开我……离开我一点儿……”

他的笑容消失了。他犹豫着，好象还想说点什么，终于含含

胡胡地挥挥手，走远了。

“她真完美，”他想。“完美，但是使人捉摸不透！”这并不是责备，珍妮时时刻刻都对他有吸引力，部分原因不就是一种神秘性吗？

珍妮回到房里，倚着关上的房门站了一会儿，听着远去的脚步声。“啊！他是多么复杂！……”她突然这样想。这并不是遗憾；她以整个心灵爱他，甚至珍视他留下来的这种模模糊糊的恐惧感觉，就仿佛是一个足迹，一个印痕一样。

四 五

伏纪拉尔的会议在志愿军街加里波第^①咖啡店的一间秘密大厅里举行。

范希德和米托尔格被雅克介绍给大家，在这里，被当作瑞士党的代表来接待，安排在前几排的座位上。

主持会议的纪布安请克尼伯尔丁克发言。这位老理论家的著作是用瑞典文写的，但他的影响早已越过了北欧各国的国境，主要的著作都已翻译出来，在座的很多人都读过。他法语说得好极了，高高的个子，满头白发，宣教者似的明亮的目光更加强了他思想的权威性。他属于一个和平的、基本上中立的国家，欧洲大陆上各大国之间激化了的民族主义一向在这个国家引起不安和非难。他用一种清醒的严肃态度剖析了欧洲局势。他的演说材料丰富，热情洋溢，不断为喝彩声打断。

① 加里波第(1807—1882)，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此处取作咖啡店的名称。

雅克心不在焉，没有好好听。他在想珍妮。他在想柏林。克尼伯尔丁克激情地号召反战，从而结束了讲演，这时雅克立刻站了起来，不等参加讨论，也放弃了带范希德和米托尔格去《绝对自由报》的打算，他只跟他们约好晚上去参加游行。

在法兰西戏院广场，看了看时间，他又改变了计划。蒙马特尔很远，不如不去《绝对自由报》，还是到《人道报》社去探探下午的气温吧。

走到新月街，在人行道上，看到了老穆尔朗，穿着排字工的罩衫，跟米拉诺夫一起，从报社里走出来。雅克陪他们走了几步。

雅克知道米拉诺夫跟无政府主义的团体有来往，就问他不是打算参加这个周末在伦敦召开的代表大会。

“那里不会有任何有用的结果，”俄国人干脆回答。

“况且，”穆尔朗指出，“代表大会已经有不好的预兆，这种时候，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引人注目。大家都藏起来……警察局、内务部已经撒开了网，他们好象正忙着造出 B 字名单！”

“什么名单？”米拉诺夫问。

“所有嫌疑犯的名单。你只要出一点小毛病，他们的捕鼠器都预备好了……”

“那上面，他们今天下午说什么了？”雅克指着《人道报》社的窗子问。

穆尔朗耸耸肩，最新的电讯令人灰心。

《泰晤士报》在彼得堡有个特派员，很了解内情，他得知沙皇已经批准驻守在奥地利边境的十四个兵团进行动员，作为对德国警告的回答，俄国不仅没有象人们一度希望的那样被吓倒，反而公开变得咄咄逼人了；俄国政府威胁说，只要德国政府胆敢

宣布局部动员，它就下令总动员。从柏林的电讯得知，德皇政府再也不抱审慎态度，而积极准备动员。参谋总长毛奇^①被紧急召回。官方报纸告诉德国民众说战争已迫在眉睫。《柏林路标报》刊登长篇文章，为奥地利的最后通牒辩护，鼓吹消灭塞尔维亚。在柏林，从清早开始，据说受战争恐怖影响的提款人攻击了各银行的窗口。

在法国，银行也遭到围攻。在里昂、波尔多、里尔，人们纷纷提款，给银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巴黎的交易所今天下午简直可以说发生了一次真正的骚乱。一个奥地利场外证券经纪人，被人指控压低股息行市，成为众矢之的，大家叫喊着：“打死间谍！”警方几乎来不及干涉。警察局长下令把过道里的人赶走，警察费了好大力气才阻止住狂热的群众，使这个奥地利人没有被打伤。这个事件很可笑，但证明了在精神上的好战狂。

“在巴尔干呢？”雅克问道：“奥地利军队总还没有越过塞尔维亚边境吧？”

“还没有，”他说。

但是，根据最近接到的电报，一直拖延至今的攻势要在今夜发动。根据一个可靠的来源，加洛甚至肯定说，奥地利事实上已经决定总动员，动员令第二天发布，三天之后执行。

“在我国，”穆尔朗说，“度假的官兵和铁路邮政的职工都刚刚被电报召回……普恩加来以身作则：他中途不休息，一直回国，将在星期三到达敦刻尔克。”

“说到你们那位普恩加来……”米拉诺夫说。他转述了在维也纳流传的一件大有深意的轶事：七月二十一日，在冬宫接见外

^① 毛奇(1848—1916)，德国将军，1906—1914年任参谋总长。

交使团时，共和国总统用他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对奥地利大使说了这么一句引起轰动的话：“塞尔维亚在俄国民众中有一些热诚的朋友，大使先生；而俄国有一个盟友，那就是法国！”

“总是政治恫吓！”雅克嘟哝着，想起了斯图德勒。

米拉诺夫提议到进步咖啡馆去，等开始游行，但是穆尔朗不同意。

“今天下午，闲聊聊够了，”他用高傲的口气说。

米拉诺夫刚走，雅克就对穆尔朗说：“我有点事请您帮个忙，我在白日街的房间里留下了一个捆好的包裹，里面有些个人的证件。如果我最近遇到了什么麻烦，请您把它送到日内瓦给梅奈斯泰勒，好吗？”

他笑一笑，没有多作解释。穆尔朗打量了他片刻，没有提任何问题，就点头答应了。当他们分手的时候，他把雅克的手攥住，握了一会儿。

“祝你好运道……”他说。（这一次，他忍住了，没有叫他“小家伙”。）

雅克又到了报社，离跟珍妮约会的时间只有半小时。

一群社会党人从饶勒斯的办公室走出来。其中，他认出了卡迪约、孔拜尔—莫莱、瓦扬、桑巴。雅克看到他们进了加洛的办公室。他转身去敲斯特发尼的门。屋里只有斯特发尼一个人，站在那里，俯身对着一张堆满了外国报纸的桌子。

斯特发尼又高又瘦，凹陷的胸部，尖削的肩膀。长脸四周披着漆黑的头发，脸上经常抽搐，有时象精神错乱的人一般。他精力过人，是南方人的类型。（他是阿维尼翁人。）他曾经通过历史课中学教师会考，献身社会斗争以前先在外省教过几年书。当

过他的学生的人没有忘记他。儒勒·盖德介绍他进了《人道报》。饶勒斯身体健壮，与体质多病的人合不来，对斯特发尼很赏识，却不喜欢他。不过，他还是让他承担了报社里头等重要职位，把困难的任务都交托给他。

今天下午，饶勒斯特别嘱托他跟社会党议会党团以及党的行政委员会保持联系。饶勒斯竭力促使社会党议员正式反对俄国的武力干涉。他到凯道赛频繁活动，想使巴黎不与彼得堡串通一气，保持行动自由，好在欧洲起仲裁调解的作用。

斯特发尼刚跟主编谈了很长时间，他觉得饶勒斯异乎寻常的神经质，这一点他没有向雅克隐瞒。饶勒斯决定明天《人道报》刊出这样一个吓人的通栏大标题：《战争将在今天上午爆发》。

饶勒斯跟斯特发尼一同草拟了一篇宣言。在宣言中，社会党以法国全体劳动者的名义对外国表明和平的意愿。斯特发尼记得其中几个完整的句子。他用他那唱歌似的声音背诵着，一面在狭窄的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小小的眼睛里，鸟儿似的目光在眼镜后面转来转去，骨头突出的弯鼻子象鸟喙似的突出来。

“为反对暴力政策，社会主义者号召全国人民……”他高举起手臂这样朗诵。今天下午，他需要象复诵祷词似的，重复这鼓舞人心的声明，加强自己的信心，这种需要很明显，也很感人。

今天，收到了德国社会党人发出的一篇类似的声明。饶勒斯由斯特发尼帮着亲自翻译了出来。“战争已经临头！我们不要战争！国际和解万岁！德国觉悟的无产阶级，以人类和文明的名义，表示激烈的抗议！……坚决勒令德国政府运用它对奥地利的影 响，维护和平。如果可怕的战争不能阻止的话，要求德国完全置身于冲突之外！”

饶勒斯想把这两个宣言印成同样的广告单，印几千份，尽早

在巴黎全城和所有大城市张贴。社会党的各处印刷所从今夜开始就专门赶做这个工作。

“意大利也一样，他们干得出色，”斯特发尼说。“社会党议员党团在米兰集会，表决通过了一个议程，要求意大利国会召开特别紧急会议，迫使政府公开宣布意大利决不跟它的盟友三国同盟走。”

他一把抓起桌上的一张纸。

“这是墨索里尼的《前进报》上刚登出的社会党宣言的译文，‘意大利只能采取一个态度：中立！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忍受人们再把他们赶往屠场去吗？我们必须一致高呼：打倒战争！不出一个人！不出一文钱！’”

这篇译文要发表在明天《人道报》第一版上。

“星期三，”他又说，“在布鲁塞尔，社会党国际局不仅要开会，晚上还要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抗议集会，主持人有饶勒斯，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德，德国的哈斯和莫尔康布，英国的凯尔一哈尔迪，俄国的卢巴诺维奇……声势浩大……所有各国都已号召可以动员起来的活动分子到比利时去，使这次群众大会成为规模宏大的全欧示威。必须表现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起来反对政府的政策！”

他走来走去，皱着鼻子，撮着嘴唇，感到无能为力，但还坚持着，不甘心丧失希望。

门打开，马克·勒瓦尔走进来，满脸通红，情绪激动，刚一进门，就坐倒在一张椅子上。

“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都不想干！”

“不想打仗吗？”

他从凯道赛来，带来了一个奇怪的消息，据说，索恩先生宣

布，为了给俄国一个体面的借口，使它放弃不肯妥协的态度，德国答应促使奥地利明确保证尊重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这位大使还建议法国政府在报纸上发表正式声明，说明法国和德国“完全一致，具有热烈愿望，不使和平遭到破坏”，因而，协调行动，一齐加紧敦促彼得堡克制。但是，法国政府，在贝特洛的影响下，拒绝了这项建议，断然拒绝发表任何声明表示同德国一致，唯恐引起俄国盟友的猜疑。

“无论德国提什么建议，”勒瓦尔作结论似的说，“凯道赛总是说：‘这是个圈套！’四十年来，就是这个样子！”

斯特发尼的小眼睛苦恼地盯着勒瓦尔，蜡黄的脸似乎更长了，就象脸颊上胶冻似的肉被下巴骨的重量拉直了似的。

“令人痛心的是，”他嘟囔着：“似乎在欧洲就是这么七八个，也许十来个人，彼此商量着创造历史……我想起《李尔王》里的一句话：‘一小撮疯子带着瞎子走路，本来是这时代的一般病态^①……’来吧！”他突然把手放在勒瓦尔的肩膀上，说道：“得告诉头头一声。”

只剩下雅克一个人，他站起来。已经到了去找珍妮的时候。“明天晚上，我就在柏林了……”他只是间或想起他的任务，但每一想起来，就高兴得直发抖，同时，这感情中还夹着一些焦急：他担心不能出色地完成人家期望他完成的任务。

四 六

交易所的大钟几乎还不到七点半，珍妮就已经在那儿了。雅

① 见莎士比亚《李尔王》第四幕第一场。此处借用朱生豪的译文。

克远远地看见她，就停下了脚。在关着的栅栏门前，在来来往往的报贩和公共汽车雇员中间，显现出她一动不动的、纤秀的侧影。他在人行道边上站了好大一会儿，端详着她。在她这样孤独的时候突然看到她，他又感到了那种很久以前的激动。当初，在拉菲特庄，为了看她一眼，他经常围着丰塔南家的花园徘徊。他想起，有一天傍晚，看到珍妮穿着白色的连衣裙，从枫树的阴影下走出来，穿过一片阳光，正好使她蒙上了一圈灵光，好象突然出现的一个幻影……

今天晚上，她没有戴黑面纱，只穿着一套黑色的衫裙，显得更加苗条。在穿衣服方面，也象她其他的行动一样，她从来不想取悦于人，只求自己觉得合适，因为她一方面高傲，不屑于顾及别人的评论，另一方面又很谦卑，觉得别人不会费神对她有什么评论。她喜欢剪裁朴素十分实用的衣裳。整个人显得很高雅，不过却稍嫌刻板严峻，这主要是因为过于质朴而且天然与众不同。

雅克走到她跟前，她惊得一抖，然后，微笑着向他走来。她现在的微笑不显得勉强了，说得确切一些，只是嘴角犹疑不定地微微颤动几下，而她那明亮的眼睛深处，射出一丝活跃的光，雅克刚刚偶尔能够捕捉得到，而且每次看见，他心里都充满了欢愉。

雅克上前搭话，开了个玩笑：

“您微笑的时候，总有一点好象是施舍似的。”

“真的吗？”

她不禁感到自尊心略略受到伤害，但马上又觉得雅克的话有道理，她差一点加一句：“的确，我的脸很呆板，不容易接近……”不过，她总是不愿意谈自己。

“越来越糟了，”雅克突然叹了口气。“各国政府都很固执，尽在那里恫吓……一同比一国更顽固不化……”

雅克一到，她就发现他面容疲惫，忧心忡忡。她用询问的眼光看着雅克，希望他能说些确实的消息。但是他却固执地摇摇头。

“不，不……不要提这些事了……有什么好处呢？够了！相反，在这间歇的片刻，帮助我把这一切都忘记吧……为了不浪费时间，我提议就在附近吃晚饭……我还没有吃午饭，饿死了……来吧！”他说着，领着珍妮往前走。

珍妮跟着他。“如果妈妈和但以理看见我们……”她心里想着。他们两个人都不在家，这突然向他们还未曾觉察的亲密关系提供了物质上的认可，这使她象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心里发慌。

“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呢？”雅克说着，指着街角一个样子寒酸的饭店。门向人行道大开着，可以看见里面有几张桌子，铺着白桌布。“我们在那里会很安静，您说呢？”

他们穿过马路，一起跨进小小的厅堂。这里很凉爽，一个人也没有。穿过厨房的玻璃门，可以看到两个女人背着身子在亮着的吊灯底下吃饭。她们两个都没有转过身来。

雅克用疲乏的动作把帽子扔在长凳上，走到屋子最里面，好引起那两个女主人的注意。他一动不动地耐心站着等了一会儿，珍妮抬起眼睛来看他。突然，这苍老了的，在厨房的灯光照耀下凸起来，奇怪地变了形的面容仿佛是素不相识了。她觉得自己是在做恶梦，象个小姑娘被拐孩子的人带到阴森可怖的地方那样害怕……晕眩转瞬就过去，雅克已经向她走来，灯影移动，他恢复了本来面目。

“您坐下吧，”他说着，帮着珍妮走到长椅跟前。“不，您坐在那儿，这样灯光照不到眼睛。”

受到这种男性的关怀，在她心里唤醒了一种全新的感觉，她怡然自得地任凭他照顾。

厨房里的两个女人中，年纪小些的那个是一位无精打采的胖姑娘，穿着粉红色衬衫，头发低低地长在小牛犊似的额头上。她终于站起身向他们走来，一脸怒意，就象牲口吃料时被打搅了一样。

“小姐，有晚饭吃吗？”雅克用诙谐的声调问。

那姑娘对他一打量：

“看您要吃什么。”

雅克的眼睛愉快地看看女侍，又看看珍妮。

“总会有鸡蛋吧？对吗？也许还有一点凉肉？”

那姑娘从胸前抽出了铅笔：

“就有这些，”她说，那模样仿佛是说：“要么就吃，要么就算了。”

雅克的好脾气好象绝对不会改变。

他高声地念了菜单，又用眼睛询问地看看珍妮，大声说：“好极了！”

女侍转过身去，一声不出。

“真是好性子，”雅克悄悄说着，然后笑着在珍妮对面坐下来。

他又马上站起来，帮着珍妮脱去外衣。

“我要不要摘下帽子？”珍妮想。“不摘，那样头上就完全没有装饰了……”她立刻又为这爱俏的念头感到羞愧，终于坚决地摘下帽子，而且克制着，没有举手去摸头发。

满脸怨气的姑娘又来了，端着一只热气腾腾的汤钵。

“好哇，小姐，”雅克叫道，从她手里接过大汤匙。“您刚才没有说有汤……真香！”他转脸问珍妮：“我给您盛汤？”

他的愉快有些做作。第一次两人吃饭使他几乎跟那姑娘一样拘束。况且，他还摆脱不开这一天使他心神不宁的那些事。

珍妮身后有一面带着绿色的镜子，照出了她每个动作，雅克越过他面前的真人，可以看到肩膀和后颈那纤巧的影子。

她感到雅克在观察她，突然说：

“雅克……我在想……您是不是真正了解我？这真可怕……您是不是……对我的幻想太多了？”

一想到：“我能不能做到他所希望的那样？我该不会注定使他失望吧？”她就真正感到焦虑，现在她微笑着，把这焦虑掩饰起来。

雅克也微笑了：

“如果我也问您：‘您是不是真的了解我？’您怎样回答呢？”她犹豫了一会儿：

“我想我会回答：‘不了解。’”

“但您同时也会想：‘这无关紧要。’而您这样想是有道理的。”他说着，仍然在微笑。

珍妮点点头，表示同意，心里想：“对，这无关紧要……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过去……我刚才想的无非是亲人之间的一个想法！”

“应该对我们自己有信心，”雅克加重语气说。

她没有回答。他稍稍不安地观察她。但是，这时候，幸福的表情改变了珍妮的容貌，这就是最使人安心的回答了。

热黄油的香气在屋里飘散。

“那个刺儿头又来了，”雅克悄悄说。

穿粉红衬衫的女侍端来一盘炒鸡蛋。

“是猪油的？”雅克叫道。“好极了！……是您做菜吧，小姐？”

“当然！”

“我祝贺您！”

那姑娘终于屈尊地一笑，显出了谦和的样子：

“噢，你们知道，这里晚饭很简单……你们应该上午来。中午，从来没有一张桌子是空的……但是，晚上这里很安静……除非有几对情侣……”

雅克和珍妮觉得很有意思，交换了个眼色。终于使那张死板难看的脸舒展开来，气氛大为轻松了。

“啊！”雅克得体地咂着嘴说，“炒鸡蛋真好！”

那姑娘受了夸奖，这次笑了起来：

“我呀，”她俯过身来，好象要说知心话似的，低声说，“我干我的活儿，不向别人要求什么。就让识货的主顾们评断吧！”

她把拳头揣在围裙的口袋里，扭着屁股走开了。

“能把这话当作暗含着的恭维吗？”雅克笑着问。

珍妮心不在焉地思索着。这段小小的插曲没有什么深意，但她在这中间却发现了使她惊奇的东西：雅克显然有发出一种热量的天赋，能够用一句话，一个微笑，用对别人的关心，创造气氛，使信任和同情开花结果。珍妮比任何人都明白：在雅克身旁，最倔强、最不开朗的天性也终会从禁咒中解脱出来，胸襟舒展，心花怒放。但是，再也没有比这种天赋更使她惊奇了！她却与雅克相反，与但以理相反，对别人差不多全无好奇之心。她封闭在自己的天地里，首先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周围的纯洁，甚至在她和亲人之间也极力保持着距离，她和世界之间的接触面十分

光滑，什么也牵连不上。想到哥哥，她又考虑：“但是，使雅克对无论任何人都感兴趣的好奇心，从另一方面说，会不会使他不可能确定自己的选择呢？”

“您是不是能……”她突然问道。“您是不是能对一个人比其余的人都更喜欢，永远眷恋？”

但是她马上发现这话含混而又笨拙，她脸红了。

雅克瞧着她，莫名其妙，试图猜测她联想的线索。他复述了一遍问题，首先想回答得忠诚老实。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几乎迷信似的感到，彼此略有欺骗，哪怕只是一小点，对他们的爱情就是个亵渎。

“我能眷恋一个人？”他差一点说。“我对但以理的友谊可算得一个？”可是这个例子是骗人的，因为这种感情并没有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一直到现在，也许还不能，”他用稍带生硬的声调承认，并且更尖刻地加上一句：“怎么？难道这是一个怀疑的原因？”

“我并不怀疑，”珍妮赶紧结结巴巴地说。

看到她苦恼的样子，他很感动。他为时很久以后才发现：对于这极端的敏感，需要小心谨慎地对待。他想再说点什么，正在犹豫，女侍接着端来了菜，他就只向珍妮温柔地笑一笑，显然，是请她原谅他的粗鲁。

她看着他，雅克这样迅速地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象一种危险似的使她害怕，但同时不知为什么，也使她心醉，也许她觉得这里面有一种优越和力量的迹象吧？她怀着温柔的自豪想道：“我的野人……”她脸上的阴影消散了，她又感到她整个的心灵渗透了两天来使她昏乱、使她的生活焕然一新的对于幸福的私下里的确信。

女侍刚刚离开餐厅，雅克就说：

“您的信任仍然是多么脆弱啊！”

声调中没有一点责备，只有遗憾和后悔：因为他没有忘记，他过去的态度使珍妮这方面的一切不信任都是合情合理的。

珍妮马上猜到了他的顾虑，试图撇开辛酸的回忆，赶紧说：

“您看，那是因为我习惯于信任……我回忆不起我曾有过……（她寻找着字眼，还是雅克用过的一个词来到她的嘴边）安宁。甚至在小的时候也是一样……我生来就是这样……”她微微一笑：“或者说，至少，我以前是这样的……”接着，她垂下眼睛，又轻声说：“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承认过这个。”向通厨房的门看了一眼之后，她自发地从桌上向雅克伸出两只手，两只颤抖着的，没有戴手套的手，又纤巧，又温热。她感觉自己完全属于他了，只想更多地委身，使自己消失，与他融合在一起。

他低声说：

“我也曾经象您这样……孤独，一直孤独！并且，一直不安！”

“我了解，”她说，轻轻抽回手来。

“有时候，我觉得比别人优越，就骄傲得飘飘然；有时候又觉得自己愚蠢，无知，丑陋，我就卑屈得难受……”

“正跟我一样。”

“……永远与别人格格不入……”

“我也是这样。”

“……由于自己特殊而跟外界隔绝……”

“我也是这样。并不希望摆脱，也不希望变得同别人一样……”

“如果说有些时候我对自己还不完全绝望的话，”他忽然怀

着感激的心情说，“您知道这是因为谁？”

刹那间，她竟狂乱地希望他说出：“是因为您。”然而他却说：

“是因为但以理……我们的友谊首先就是互相的信任。是但以理的友情和信任救了我。”

“跟我一样，”珍妮小声说，“跟我完全一样！除了但以理之外，我没有别的朋友。”

他们不厌倦地向对方剖析自己，以对方为例子来剖析自己，同时，用不满足的、狂喜的眼光彼此直视眼睛的深处。两人都等待着对方以微笑来回答自己的微笑，好象这是一种确认，是他们互相了解的决定性的证据一样。仿佛是美妙的奇迹，他们惊异地感到竟是那样容易为对方的直觉所看透，发觉两人竟完全相似！他们觉得彼此的知心话真是说不尽道不完，这个时刻，世上再没有什么比互相考查探索更重要了。

“对，正是因为但以理，我才没有沉沦下去……”考虑了一会儿，他又说，“还因为安托万。”

他马上发现姑娘的脸上不觉露出冷淡的神色。他很不自在，用目光询问她。

“您了解我的哥哥吗？”他终于问道，完全准备以坚强的信念来赞美安托万。

她差一点承认，“我讨厌他。”但她只是说：

“我不喜欢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

怎么样说清她的思想又不致伤害雅克呢？不过，她什么也不愿对他隐瞒，甚至使他难堪的事也不愿隐瞒。

他惊奇地追问：

“他的眼睛有什么可责备的？”

她考虑了一会儿，

“好象是……他的眼睛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分辨善恶……”

这个判断太奇特，雅克瞠目不知所对。这时，他回忆起但以理对于安托万的评断：“你知道你哥哥什么地方对我有吸引力吗？就是他判断事物的自由态度。”但以理赞赏的是安托万有能力十分自然地观察任何问题本身，就好像他考查的是他所解剖的一个机体一样，没有任何道德方面的挂虑。这种心灵状态对于胡格诺派的一个后代有强大的吸引力。

雅克的眼神好象要求她说得具体些。但是，对着这个眼色，她的面容安详，不动声色，雅克也就不敢深究了。

“真是捉摸不透，”他想道。

穿粉红衬衫的姑娘过来撤去空盘子。她提议说：

“来干酪？还是水果？或者两杯现滤的木哈咖啡^①？”

“我什么都不要了，”珍妮说。

“那么，一杯现滤咖啡，只要一杯。”

他们等着咖啡端上来，再接着随意谈话。雅克偷眼望着珍妮，又一次发现眼睛的神情与脸上的神情多么不协调。眼睛过于成熟，使脸显得越发年轻，象还没有长成似的。

他毫不犹豫地俯过身来：

“让我看看您的眼睛，”他说，微笑着，好象为这样的考查表示歉意。“我了解它们……它们象纯净的水……清爽的、寒冷的蓝色……瞳仁啊！它忽大忽小不停地变化……不要动，真叫人激动。”

她也瞧着他，没有笑容，稍稍有点倦意。

① 产于阿拉伯的上等咖啡。

“您看，”他又说，“当您集中注意力的时候，蓝色的虹膜就收缩起来……瞳仁也缩小，缩小……一直变成一个小点，又圆又亮，好象一个洞眼……您的眼神多么刚毅！”

这时，他忽然想到珍妮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战友。突然，所有那些担心的事又涌上心头。他机械地回头望着墙上的挂钟。

她看到他的脸色阴暗下来，忽而觉得胆战心惊，低声问道：

“您在想什么，雅克？”

他用突然的动作掠上了他那一绺头发。

“唉！”他说着，不由自主握紧了拳头，“我在想，这个时候，欧洲有好几百个人，他们看事清楚，他们四处奔走为了拯救别人，然而却不能使他们愿意拯救的人理解。真是荒谬而又令人痛心！我们能把群众从麻木中唤醒吗？群众是不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能够……”

他继续说下去，珍妮好象在听，其实，并没有听见他的话。她发现雅克看钟之后，她的注意力就不能集中了，她控制不住心跳。三天不跟他在一起！……她心烦意乱，可是她克制住，无论如何也不愿让雅克发现。现在，他就在近旁，活生生的人，离她这么近，再能多几分钟也好。她密切地注视着面部每个表情、颌骨的每次收缩、每一次皱眉、活跃的眼睛里每一次闪光，她感到又痛苦又快乐。她不试图了解他在说什么，只是迷失在思想和字句的模糊声响中，就象迷失在一束束火花里一样。

他忽然停住嘴：

“您没有听……”

她眨眨眼睛，脸红了：

“不……”

好象是请他原谅，她亲切地向雅克伸出手去。雅克攥住，翻

过手心来，把嘴唇贴在她的掌心里。他马上感觉到那条手臂上所有的肌肉都在颤抖，他怀着一种锐敏的慌乱情绪——一种前所未有的惶乱——发觉那只小手并不是被动地任他去吻，而是耐心地紧紧贴在他的嘴上。

但是时间紧迫，他还有一桩心事要告诉她：

“珍妮，有一件事情今天晚上一定要对您说明白……去年，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不愿意听他们说账款的事……那笔钱，我那时一文也不愿意拿……昨天，我改变了主意……”

他停了一会儿。她呆呆地挺起上身，避开了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混乱，脑子里产生了各种杂乱的矛盾想法。

“我想把钱取出来，给国际作经费，让这笔钱立刻用于反战斗争。”

她深深地呼吸，血涌上了她的脸颊。“他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呢？”她思忖着。

“您赞成，是吗？”

珍妮本能地低下头去。他这样强调“赞成”这两个字，心里到底有什么想法呢？他好象是想给她权力来监督他的一切行动……她含糊地点了点头，怯生生地抬起眼睛，故意显出疑问的表情。

“一直到现在，”他接着说，“我靠写文章，能维持生活……最低限度的生活……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生活在没有财产的人中间，我跟他们一样，这就很好。”

他长吁一口气，又很快地说起来，声调显得有些窘困，甚至有点粗暴了：

“如果这种……勉强糊口的生活……您不害怕的话，珍妮……我，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

这是第一次提到他们的前途，提到共同的生活。

她又俯下头去，激动和希望哽得她出不来气。

他等她抬起头来，一看到她的脸洋溢着幸福的光辉，他只是说：

“谢谢。”

女侍拿来账单。他付了款，又抬眼去望挂钟。

“马上就九点差二十了，我甚至来不及送您回家。”

珍妮没有等他打招呼，已经站起来。“他要走了，”她想，感到心情沉重。“明天他在哪儿呢？……三天……致命的三天。”

他正帮她穿上外衣，她忽然转过身来，紧挨着打量他：

“雅克……至少，不危险吧？”她的声音颤抖了。

“什么？”他问道，想抓紧时间。

他想起了里查德利信上的词句。他不愿意对珍妮撒谎，也不愿意使她惊慌，就打起精神，微笑着说：

“危险？……我想不至于。”

姑娘的眼睛里闪过恐怖的光。但是，她赶紧垂下眼睑，几乎是立刻也大胆地微笑了。

“她真是完美无缺，”他想。

他们没有说话，倚偎着走到幽径街地下铁道。

在楼梯边上，雅克停住脚步。珍妮已经下了一级楼梯，向他转过身来。时间到了……他把两手放在姑娘的肩膀上：

“星期四……最晚星期五……”

他异样地看着珍妮，几乎想说出来：“你是我的……我们先不要离开，跟我来吧！”但是，想到游行的人群，可能发生的斗殴，他就压低声音，赶快说：

“走吧！……再见……”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并不真是笑容，也不完全是吻。然后，他猝然抽回手，长时间地望了她一会儿，走掉了。

四 七

天差不多还亮着，空气炎热，浸透了暴风雨前的气息。

环城马路显出非同寻常的模样：所有的店铺都放下了铁皮护窗，大多数的咖啡馆关了门；那些还开着门的，按照警察局的命令把露天座头都撤了，免得桌椅什物被临时充作街垒，也为了给保安警察腾出冲锋的地方。好奇的人们不断涌来。小汽车少了，几辆公共汽车按着喇叭，在街上行驶。

圣马丁大道和马让达大道，还有靠近总工会的地方，人群特别稠密。男男女女从贝尔维尔高地赶来。老老少少的工人，仍穿着工作服，从巴黎的各角落和市郊蜂拥而至，聚集成越来越密集的人群。在街凹里，在建筑工地和大街的拐角处，一队队警察围着警察局的几辆大汽车形成黑压压的一片，准备一有命令就把汽车开到任何地方去。

范希德和米托尔格在神庙关厢大街一家零售店等着雅克。

共和国广场上，车辆的来往已经断绝，一大群忙碌的人被堵塞在原地。雅克和他的朋友们用臂肘开道，试图在人潮中开出一条路，去找《人道报》编辑部的人。雅克知道，他们一定在广场中央的纪念碑底下。但是他已经不可能走到正在组成头排游行队伍的那个平台了。

突然，一阵骚动，就象风似的把一个个脑袋吹得象波浪一样。五十几面旗帜望不到边，在人群上面高高举起。没有叫喊，

没有歌声，沉重的人流，紧贴着地面，象一条爬行动物，舒展起环节，游行队伍开始向圣马丁门方向进发。不到几分钟，就象从山坡上倾泻而下的岩浆，人群挤满了宽阔的大马路，从岔路上还不断加进人来，队伍更扩大了，人群缓缓向西流去。

雅克、范希德和米托尔格被人群推挤着向前走，热得透不出来气，他们紧挽起臂膀，免得被冲散。人流带着他们，把他们淹没在沉闷的嘈杂声中，忽而使他们动弹不得，忽而又把他们推向前去，一会儿挤到右面，一会儿又挤到左面，碰到阴暗的铺面上。各家窗子上挤满看热闹的人。夜已降临。街灯向这移动着的混乱人群发出微弱的、惨淡的光芒。

“嘿！”雅克兴高采烈，十分自豪，心里想，“多么有力的警告！全体人民起来反对战争！群众明白了……群众响应了号召！……如果吕梅尔能够看到的话！……”

队伍又停住了，停得比以往的时间更长。他们靠在吉姆纳斯戏院的柱廊上。前面发生了叫喊声，好象在那边，在布瓦索尼大街的入口处，游行队伍的前列遇到了障碍。

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雅克觉得不耐烦了。

“走！”他拉起小范希德的手说。

米托尔格嘟嘟囔囔跟在后面，他们挤着，穿过人群，绕过太密的地方，曲曲折折，但始终在朝前走。

“反示威！”有个人说。“爱国者联盟占领了十字路口，堵住了道路！”

雅克放开患白化病的人，爬上一家店铺的柱顶盘，去看个究竟。

在布瓦索尼关厢一角的《晨报》的红房子前面，旗帜被拦住了。两支队伍头几排人打了起来，又骂又喊。斗殴限于局部地区，

但是很激烈，脸上恶狠狠的，挥起了拳头。几小股穿黑衣的警察陷在人群里，在原地东奔西突，象是放手不管的样子。一面白旗挥动，好象信号一样，爱国者联盟的人唱起《马赛曲》。于是，唯一的一个越来越洪亮的声音，以它强而有力的节奏，立刻压倒了一切喧嚣。社会党人唱起《国际歌》作为回答。突然，掀起一股浪潮，搅乱了密密麻麻的人群。是几排宪兵在军官的指挥下，从左右两侧邻街上冲了出来，猛冲进人流，想清除十字路口的人群。这一下，混战更为激烈。歌声戛然而止，又响了起来，不断为怒骂声打断：“打到柏林去！”“法兰西万岁！”“打倒战争！”警察向混乱的人群中心冲去，攻击要求和平的群众，遭到反击。警笛鸣响，手臂挥动，棍棒飞舞，“兔崽子！……王八蛋！”雅克看到两名警察向一个示威者扑去。那人挣扎着，但终于被打得半死，扔进停在街角上的一辆警车里。

雅克恨自己离得太远。沿着一栋一栋房子挨过去，他也许能走到十字路口？但是，他及时想起了自己的任务，想起要赶火车……今天，他不是属于自己的，他没有权利听任冲动支配！

前面的大道上，传来沉闷的响声。远处，钢盔在闪光，一队保安警察纵马向示威群众迎面冲来。

“他们冲锋了！”

“快逃呀！”

在雅克周围，惊骇的群众试图从原路折回，但是骑兵不断逼近，游行队伍的尾巴仍在朝相反方向推进，使人后退不得，群众在中间卡住了。雅克高踞在柱顶，就象坐在被暴风雨冲击的岩石上一样。他紧紧抓住铁制的护窗，免得旋风一样在他脚下翻滚的人流把他裹下去。他到处张望，寻找两个同伴，没有看见。“他们知道我在哪儿，”他心里想，“如果可能的话，会来找我

的……”他又恐惧地想道：“幸亏没有把珍妮带来……”

在十字路口，马群在乱踩，步行的群众被撞倒。随着人潮的旋涡，疯狂的脸、暴怒的脸、受伤的额头，一会儿闪现，一会儿消隐。

是怎么回事？不可能弄明白……现在，路口中间的人已经清除，要求和平的群众在骑警与保安警察的联合进攻下退却。马路中间到处都是手杖、帽子和乱七八糟的东西。只有几个身穿银色袖章制服的治安军官和几个便衣人员在走动，肯定这些人员也是属于警察局的。围绕着他，警察们排成警戒线，圈子越圈越大，不一会儿，整个街道都被警察堵住了。

示威的群众象被狗咬着腿的牛羊，先在原地踟躇不前，乱了一阵子，接着掉转方向，朝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塞瓦斯托波尔大道涌去。

“在特鲁奥路口集合！”

“待在这里太冒失，”雅克想。（他刚刚想起，如果被捕，他身上只有日内瓦大学生让—塞巴斯蒂安·埃贝尔雷的身份证。）

从奥特维尔街可以脱身。他犹豫着。范希德和米托尔格怎么样了？怎么办呢？到特鲁奥街去吗？再去打架？如果被捕怎么办？或者是裹在人群中，夹在两边斗殴之间不得脱身，只能误了火车？……几点了？十一点差五分……无论如何，明智的办法，就是离开游行队伍，到北站去。

他很快来到拉菲特广场，圣樊尚·德·保罗教堂前面。小街心花园！珍妮……他真想象朝拜圣地一样，走到他俩那条凳子那里……但是等在那儿的一小队治安警察占住了台阶。

他渴极了，想起附近圣德尼斯关厢有个酒吧间，社会党敦刻尔克分部的人们时常在那儿聚会。上火车之前，他还有时间去

那里逗留半个钟头。

活动分子平素聚会的后厅空着。但是，在柜台旁边，围绕着咖啡店老板——一个社会党的老党员——有五六个客人，正在评论这一带的新闻。这地方发生了好几起严重的斗殴事件。东站附近，一次反战示威被强行冲散了，但在总工会门前又组织起来。接着，简直开始了一场骚乱，警察于是就发起了冲锋，据说受伤的人很多。区里各警察局都关满了被捕的示威者。又据传，在环城大道率领巡逻队的警察局长挨了一刀。一位客人从帕西区来，他说他在协和广场看到斯特拉斯堡的塑像被蒙上了三色纱，由一群年轻的沙文主义分子把守着，他们在治安警察的保护下，还放起了烟火。另一个客人，是位留着灰胡子的老工人，正让老板娘缝补他在战斗中撕坏的上衣。他说大道上有好几股游行队伍，在交易所前面重又聚齐，打着红旗，朝波旁王宫前进，高呼：“不要战争！”

“不要战争！……”老板咕哝着。他经历过一八七〇年，参加过公社的斗争，他愤愤地摇着头说：“正在这个时候喊不要战争！……就好像暴风雨已经来了还在喊：‘不要下雨！’……”

正在吸烟的老头儿眯起眼睛，发起脾气来：

“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夏尔！假如你亲眼看到，八点到九点，在共和国广场上……人挤得紧紧的，简直象一群鳗鱼！”

“我就在那里，”雅克走过来说。

“好哇，假如你去了，小家伙，你可以证实，情形就象我说的那样。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要说游行，我可见过几回。游行示威抗议枪决费莱^①的时候，我参加过，那次有十万人……示

① 费莱(1859—1909)，西班牙著名教育家和共和主义者，1909年被枪决。当时曾引起各国的示威游行。

威反对军事劳役，要求释放卢塞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也足足有十万人……在普瑞·圣热尔维示威反对三年军役法，肯定超过了十万……但是今天晚上！是三十万，五十万，还是一百万？谁也说不清。从贝尔维尔一直到马特莱纳，人山人海，只听得一个喊声：‘和平万岁！’……不，孩子们，这样的示威，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可见过世面啦！幸亏警察没有带武器，要不然，照着这个样子，水沟里都会淌满血……今天晚上，我告诉你们吧：如果有胆量的话，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打倒在地！失掉这次好机会了……在共和国广场，人们行动起来，举起旗帜，好哇，真了不起，夏尔，如果当时有个有本事的人，你知道他会把我们大家象一个人一样领到哪儿去吗？到爱丽舍宫去，掀起一场革命！”

雅克高兴得笑起来：

“推迟了而已，这就是明天的事，老伯！”

他兴高采烈地到了火车站，毫无困难地买到了去柏林的一张三等车票。

在站台上，出乎意料，范希德和米托尔格在那里等他。他们知道他动身的时间，想来送行。范希德把帽子丢了，面色苍白，愁眉不展。米托尔格却相反，满面通红，怒气冲冲，在衣袋里攥紧拳头。他被警察捉住，挨了打，被拖到警车旁边，只是在最后一分钟，趁着一阵混乱才逃了出来。他唾沫四溅，一半用法语一半用德语讲述了他的经历，愤怒的大眼睛在眼镜后面乱转。

“不要待在这里，”雅克对他们说。“不必三个人一起引人注意。”

范希德用两只手握住雅克的手，瞎子似的脸上，长长的、没有颜色的睫毛在神经质地眨动。他用爱抚的、几乎象祈祷似的声调喃喃地说：

“小心点，博蒂……”

雅克笑了，为了掩饰他的慌乱，他说：

“星期三，在布鲁塞尔见！”

这个时候，在斯邦提尼街三楼的小客厅里，安娜穿戴齐整，正准备出门。她站在那里，眼光呆滞，把电话的耳机贴在脸上。

安托万看完所有的报纸，已经熄灯准备睡觉了。每晚，雷昂把电话放在床头柜上。电话铃低沉的声音使他又坐了起来。

“是你吗，东尼？”远处传来温柔的低语声。

“嗯？有什么事？”

“没什么……”

“不，你说吧！”他说着，有些不安。

“没事，真的……什么事也没有……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你睡下了？”

“睡下了！”

“你刚才睡着了，亲爱的？”

“对……不，还没有……差不多快睡着了……那么，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她笑了：

“没有，东尼……你这样关心，真是太好了……我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我对你说……你不明白吗，你？我忽然很想，很想听听你的声音……”

安托万用臂肘支着身子，眼睛被灯光照得难受。他耐着性子，蓬着头发，满脸不高兴。

“东尼……”

“怎么？”

“没什么，没什么……我爱你，我的东尼……我多么想今天晚上，这个时候，你在我身边呀……”

几秒钟漫长的静默。

“你看，安娜，我已经对你说过……”

她一口气打断了他的话：

“对，我知道，你不要介意……晚安，亲爱的！”

“晚安。”

是安托万先挂上了电话。克啦啦的声音一直震动了她的肌肉。她闭上眼睛，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又等了好长一会儿，等着一个奇迹。

“我真可笑，”最后，她几乎是大声地说了出来。

不顾最起码的良知，她一直希望——甚至还非常有把握——安托万会对她说：“你快到咱们家去……我去找你。”

“可笑！……可笑！……可笑！……”她反复说，一面把她的手提包、帽子和手套扔在独脚圆桌上。突然，这隐秘而又残酷的简单事实向她呈现出来：她如饥似渴地需要他，而他，他却一点也不需要她！

四 八

在哈姆站，将近早上八点，一夜没睡的雅克下车去买几份德文报纸。

新闻界一致谴责奥地利正式宣布与塞尔维亚“处于战争状态”。甚至右派泛日耳曼主义的《邮报》或者克虏伯的喉舌《莱茵河日报》也对奥地利的政策中突然的咄咄逼人的态度表示“遗

憾”。德皇和奥匈帝国的王储^①匆忙回国的消息都用醒目的大字标题登载着。相当矛盾的是，大多数报纸先说德皇刚到波茨坦，就与首相以及海陆军参谋长举行了长时间的重要会议，接着却说，在德皇影响下，维持和平大有希望。

当雅克回到车厢隔间的时候，跟他一起坐夜车的同伴也都象他一样买来了当天的报纸，谈论起新闻来。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沉思的眼睛有时看看放在膝盖上的报纸，但更多的时候转向开着的窗子；还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儿，大概是以色列人；再加上一位五十来岁的快活的胖先生，脸和头都剃得溜光。他向雅克微笑着，举起手里拿着的打开的《柏林日报》，用德语问：

“您也对政治感兴趣？您大概是外国人？”

“瑞士人。”

“说法语的瑞士人？”

“日内瓦人。”

“你们比我们离法国人近，看得更清楚。每个法国人都很可爱，对不对？但是，为什么组成一个民族，他们就这样叫人受不了呢？”

雅克模棱两可地微笑着。

这个德国人很健谈，他吸引住了牧师的眼光，接着又吸引住了以色列人的眼光。他继续说：

“我经常到法国去，做生意。我在那里有许多朋友。很久以来我就认为，德国的和平主义终将克服法国的抵制，我们最终会取得谅解。但是，对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毫无办法；归根到底，他

^① 此处指查理第一(1887—1922)。

们只想报仇。他们目前的政策，原因全在这里。”

“如果德国那么爱好和平，”雅克冒昧地说，“今天为什么不用坦率的调解的行动来影响它的盟友奥地利，从而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呢？”

“德国正是这样做的……您看一看报纸吧！但是，法国这方面，如果真不想打仗，它此刻怎么还支持俄国的政策？普恩加来在彼得堡的历次演说，是发人深思的。是和平还是战争，全操在法国人手里。只要明天俄国不再指望法国的军队，它就会不得不抱着和平诚意进行谈判。这样，战争的危險也就消失了。”

牧师表示同意，那老头儿也赞成。他在斯特拉斯堡教了多年法律，他讨厌阿尔萨斯人。

雅克客气地谢绝了人家递来的一枝雪茄，出于慎重，不再争论，装作专心看报的样子。

那位教授说话了。他对一八七〇年以后俾斯麦政策的看法浮浅表面，也不知道，或者是装作不知道那位老宰相想使法国再遭军事失利，彻底打击法国。他好象只愿意记住德意志帝国向法兰西共和国表示亲善的那些行动。在他的带领下，谈话转到历史方面。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很一致。不过，他们表达的是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

在他们看来，十分明显，德国直到最近几年，仍然宽宏大量，不断向法国主动接近。俾斯麦本人就曾一再作出具有和解精神的保证。他可以说是太不慎重，慨然允许战败的法国迅速振兴，而阻止这种振兴本来是很容易的。法国战败后不久，就疯狂掠夺殖民地，俾斯麦只要对法国的这个行为加以限制就可以了。至于三国同盟，它并不威胁任何人，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一个军事性质的联盟，只是由三个对欧洲隐伏的革命热潮同样惴惴不

安的君王所缔结的一个保守的互助公约。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〇九这十五年间,甚至在法俄结盟之后,德国一向谋求与法国合作,解决政治问题,特别是非洲问题。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五年,威廉二世的政府更是诚心诚意屡次提出谋求具体谅解的建议。法国总是拒绝德皇向它伸出来的手!对于最有吸引力的建议,法国的回答也只是令人恼火的不信任的拒绝,或者反而威胁!所以说,即使三国同盟的性质起了变化,过错全在法国,因为法国同沙皇政府结成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军事联盟,法国的部长们,特别是德尔卡塞的行动公开表明法国的对外政策是针对德国的,目的在于包围日耳曼国家。三国同盟因此必须成为防御性的武器,来抵御三国协约的进逼。而三国协约公然向世人表明就是一个征服者的阴谋。征服者!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完全为事实所证实,那就是,由于有了三国协约,法国才能攫取大片摩洛哥领土;由于有了三国协约,俄国才能组织巴尔干联盟,使它可望有朝一日不担风险将势力扩展到君士坦丁堡;由于有了三国协约,英国才能使它在全球海上的霸权不可摧毁!对于这种悍然无忌的帝国主义政策,唯一的障碍就是日耳曼集团。三国协约要想巩固霸权,就必须瓦解这个集团。最近正好有了一个机会。法国和俄国就立即抓住:它们利用巴尔干的纷争,利用维也纳举措欠慎,现在力图使德国非难奥地利,希望柏林与它唯一的盟国反目,以达到他们十年来苦心经营的目的,就是把德国孤立 in 满怀敌意的欧洲中心。

至少,这是牧师和那位以色列教师的看法。那位胖胖的德国先生认为,三国协约的目的更具有侵略性:彼得堡想打垮德国,彼得堡想打仗。他说:

“所有能思考的德国人,不得不和平逐渐失去了信心。我

们看到俄国在波兰修筑了许多战略公路，法国增加了兵员和军备，英国准备同俄国签订海军协定。如果不是三国协约想对三国同盟取得军事胜利以巩固它们的权利，那么这些准备活动又是什么意义呢？……我们躲避不掉他们的这场战争……就是现在不打，也会在一九一六年，最晚不超过一九一七年……”他微笑了：“但是，三国协约打错了算盘！德国的军队早准备好了！……谁敢招惹德国的武装力量，谁就该大吃苦头！”

那位老教授也在笑。牧师严肃地点着头。在最后这一点，他们三个人都满怀骄傲地完全取得了一致。

雅克以前到柏林来过许多次。

“我要在动物园站下车，”他想。“只有在西城，才不会碰到许多熟人。”

到波茨坦梅广场去赴神秘的约会以前，还有大约两个钟头。他决定先到正好住在于朗德街的卡尔·冯劳特家去找个落脚地。冯劳特是李卜克内西的朋友，是个可靠的同志，在善守机密方面是久经考验的。他以牙科医生为业，雅克这个时候去找他，准能在家里找到。

他被请进一间客厅，里面已经有两个人等着，一位是老太太，另一位是个大学生。冯劳特开门叫病人，迅速地瞥了雅克一眼，没有露声色。

二十分钟过去了。冯劳特又出来，叫走了大学生。不多一会儿，他一个人出来。

“是你？”

虽然他还年轻，栗色头发中有一缕几乎全白了。戴着金丝眼镜，眼窝陷得很深，棕色的眼睛深处时时燃着热情的火。

“我有任务，”雅克轻声说。“刚下火车。我要在这里等一个钟头，不能见任何人。”

“我去告诉马尔塔，”冯劳特说着，毫不惊讶。“你来吧。”

他把雅克领到一间房里。那里面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妇人，在窗前背着光缝衣服。房间里很凉爽，有两张并排的床，一张桌子上堆放着书，地上摆着个筐子，里面睡着一对暹罗猫。雅克忽生幻觉，仿佛看见相似的内室，静谧宜人，他和珍妮在里面……

冯劳特太太不慌不忙地把针别在活计上，站了起来。她金黄的辫子盘在头上，平板的脸上显出一种特别的，刚毅而又冷静的神色。雅克以前时常在柏林的社会党的集会上遇到她，她总陪着丈夫去开会。

“你在这里待多久都行，”冯劳特说。“我回去工作。”

“您要喝一杯咖啡吗？”年轻的妇人建议。

她端来一个托盘，放在雅克面前。

“喝吧，不要客气……您从日内瓦来？”

“从巴黎来。”

“哦！”她很感兴趣。“李卜克内西认为今天有许多事情取决于法国。他说，你们绝大多数无产者都明确反对战争，你们很运气，在政府里有一个社会党人当部长。”

“维维亚尼吗？他从前是个社会党人……”

“如果法国愿意的话，它能给欧洲作出多么伟大的榜样！”

雅克向她描述了巴黎环城马路上的游行示威。她说的话，雅克不费力气全能听懂，但用德语表达意思，说得还比较慢。

“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昨天，在大街上打了起来，”她说。“有一百来人受伤，逮捕了五、六百人。今天晚上还要干……已经宣布，今天有五十多个公众集会反对战争……各区都有……”

九点钟在布朗登堡门有一个大规模集会。”

“在法国，”雅克说，“我们得向中产阶级的难以置信的麻木作斗争……”

冯劳特刚进来，微笑着说：

“在德国也一样……到处都是麻木不仁……你相信不，尽管危险迫在眉睫，国会里就是没有人要求召开外交委员会会议？……民族主义者感到受到政府的庇护，他们的新闻攻势强大得出奇。他们每天都要求柏林宣布戒严，要求逮捕所有反对党的领袖，禁止要求和平的群众集会！……这没有关系，他们将来不会是最强的！……在德国所有的城市，无产阶级都在骚动，提出抗议，发出威胁——这是伟大的壮举——我们好象又回到了一九二二年十月的那些日子，当时，跟勒德布和别的人一起，高呼：‘以战争反对战争！’去鼓动工人群众。那个时候，政府明白，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动乱，都会使革命运动立刻蔓延到全欧。政府害怕了，就对他们的政策刹车。这一次也是这样，我们会成功的！”雅克站了起来。“你这就要走？”

雅克点点头，并向那位年轻的妇人告别。

“以战争反对战争！”她对他说，眼睛闪着光。

“这一次也是这样，我们能够拯救和平，”冯劳特一面说，一面陪着雅克向前厅走去。“但是，和平能维持多久呢？我也终于认为，一场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不经过一场大战就不可能有革命……”

雅克离开冯劳特之前，想问一问 he 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他打断了冯劳特的话：

“在你们国家，关于维也纳和柏林相互勾结，你们知道些什么确实消息？它们在欧洲演出了什么滑稽剧？幕后有什么活

动？据你看，是不是已经暗中串通好了？”

冯劳特调皮地笑道：

“你这个法国人！”

“法国人怎么了？”

“因为你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样？’这是你们法国人的癖好，想把一切归结成简单明了的公式，仿佛简单明了的思想天生就是正确的思想似的！……”

雅克窘住了，也微笑起来。“这个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有根据？”他在思忖。“又在多么大的程度上适用于我？”

冯劳特的神情又严肃了起来，说道：

“串通？这要看怎么说……公开的，肆无忌惮的串通，倒不一定。我得说：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我们的国家首脑们听说最后通牒已经递交的那天表示惊讶，的确是有点装腔作势，但是只是有一点点罢了。据说，奥地利首相瞒过了我们的总理，也瞒过了欧洲各国的总理。我们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办事简直不可饶恕地轻率。据说，贝赫托德向威廉街递交的只是那个最后通牒的一份无足轻重的摘要；并且，为了使德国在各国总理府面前预先支持奥地利的政策，他答应通牒词句将会很克制。贝特曼听信了他的话。德国深信不疑，十分冒失地承担了义务……当贝特曼、雅各夫和德皇获悉通牒确实内容的时候，据可靠人士说，他们都惊呆了。”

“他们是哪一天知道内容的？”

“不是二十二日就是二十三日。”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真象我在巴黎听说的，是二十二日的话，威廉街还来得及在最后通牒递出之前，对维也纳施加影响，但是，它竟没有作！”

“没有，确实没有，蒂博，”冯劳特说，“我觉得，柏林是措手不及。要维也纳修改通牒的措词，甚至二十二日晚上就已经太晚了，太晚了；在各国政府面前指责奥地利，也太晚了。这样，德国既然已经不由自主地牵连了进去，要顾全面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显出不妥协的模样，恐吓欧洲，使用恫吓手段，取得这一局冒险的外交赌博的胜利。因为不管它乐意不乐意，反正是卷进去了……至少，传闻的情况就是这样……十分可靠的人士又说，一直到昨天早上，德皇还以为他那一手玩得很漂亮；因为他相信俄国一定严守中立。”

“这倒不见得！柏林不会一点不知道彼得堡的好战意图！”

“有人说只是到了昨天，政府才发现自己已经滑入了这个危险的死胡同……”他露出年轻的笑容，补充说，“所以，今天晚上的示威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政府正在举棋不定，人民的警告就有决定性的作用！……您到菩提树下大街来吗？”

雅克摇摇头，离开了冯劳特，没有再作解释。

“法国人的癖好？”他一边下楼一边想。“简单明了的思想，正确的思想……不，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不对……对于我来说，不管简单明了也好，混乱也好——思想从来只是……唉，只是过渡阶段，……这正是我的弱点……”

四 九

六点半，雅克走进了波茨坦梅广场的阿斯汉吉饭店，这是这个廉价饭店的主要铺面之一，柏林各区都有它的分店。

他看到特劳吞巴赫独自一人坐在一张小桌子前，面前放着一碗菜汤。这个德国人好象在专心看报，报纸折成四折，靠在凉

水瓶上。其实，他明亮的眼睛却窥探着大门。他一点也没有显出惊奇。两个青年随随便便握握手，好象昨天晚上才分手似的。接着，雅克坐下来，要了一份汤。

特劳吞巴赫是个犹太人，头发棕黄色，几乎有些发红，运动员似的体格，微微卷曲的头发，剪得很短，露出健壮的公羊似的额头。他的皮肤很白，长着雀斑，厚嘴唇翻出来，只比皮肤稍红一点。

“我一直担心给我派别人来，”他用德语小声说。“干这种工作，我不太信得过瑞士人……你来得正是时候。明天，就太晚了。”他故作从容地微笑着，玩弄着芥末瓶，好象说的是不相干的事情。“这个任务干起来很困难——至少对于我们来说，”他又神秘莫测地加一句。“你，你没有什么事可干。”

“没有事可干？”雅克感到很失望。

“除了我要叫你做的事之外。”

特劳吞巴赫简要地交待了要干的事情，还是那样压低了声音，表情还是那样轻松，而且面露笑容，他的话不断为客套的笑声打断，这是为了万一被人注意，可以遮人眼目。

由于个人的爱好，他专门秘密领导某种革命的、国际的侦察工作。几天前，他风闻有个奥地利军官斯托尔巴赫上校已经抵达柏林。估计此人负有秘密使命与德国陆军部联系。在这样的時候进行这种访问，有充分理由认为，是为了确定德奥两国参谋部的合作方案。特劳吞巴赫制定了大胆的计划，窃取上校的文件。为此，他找了两位内行同伙帮忙——“两位行家”，他狡黠地笑了笑说，“这两个人跟我自己一样靠得住。”对这个细节，雅克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他知道，特劳吞巴赫长期生活在柏林的贼帮当中，跟这个违法的社会保持联系，已经有好多次利用这种关系为

革命事业服务。

斯托尔巴赫要在将近傍晚时跟部长最后见一次面。他在下榻的旅馆已经宣布，当晚动身回维也纳。事不宜迟，必须在他离开部长之后，上火车之前把文件弄到手。

自然，雅克不用参加这次行窃。（他不得不承认对这一点倒是很满意。）他的任务只限于接受这些文件，立即带出德国，尽速交给梅奈斯泰勒。多年来，特劳吞巴赫跟梅奈斯泰勒保持着特殊关系。飞行家将根据这些文件重要与否，决定是否送交第二天在布鲁塞尔集会的国际领导人。因此，雅克得预先买好到比利时的车票，今天晚上从十点半开始得在费蒂茨街车站三等车的候车室里，躺在凳子上，装作睡熟的样子。一个包在报纸里的包裹，由一个旅客小心地放在他头边，这个人立刻走开，不与雅克说话。最后这个指示对他重复了两次。

然后，特劳吞巴赫说：“我们再喝杯啤酒，就分手吧！”

雅克静静地听着，隐隐约约感到有些不自在。偷文件——即使十分必要，他也不感兴趣。接受任务的时候，他并不是想搅进这种事情里。他首先觉得该为自己庆幸，人家要求他的合作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不过同时，他又觉得有些失望，甚至有些恼火，他只落得当个窝藏转送的被动角色。

离开特劳吞巴赫的时候，雅克向他提出以前问过冯劳特的那个问题：据他看，奥地利政府是不是已经与德国政府串通好了。

“贝赫托德和贝特曼之间是否串通好了，我不知道……但是，奥地利参谋部和我们的参谋部串通一气，是完全可能的。甚至，可能我们的首相已经被奥地利部长和我们的参谋部玩弄于股掌之上……”

“啊！”雅克说，“如果能够拿到证据，说明一开始德国的好战集团就跟奥地利的参谋部狼狈为奸，那就好了！……如果能够证明你们的将军们是维也纳将军的同谋，德国三周以来的政策责任全在于他们三周以来的活动，这使德国目前规避了英国仲裁的建议，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那就太好了！……”（在不自觉当中，他需要让自己认为参加偷窃文件是合理合法的，让自己确信这些文件对于革命事业能起特殊有效的作用。）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这一行动可能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这会使得我们社会党领导中最爱国的分子也不再犹豫，起来反对政府。所以探明上校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你先坐着，”特劳吞巴赫站起来，说道。“我先走。你十点半到车站。从现在到那个时候，你要保持安静，避免跟人会面。外面有警察……”

预定晚上还有游行，然而，这威胁却没有阻止陆军部长与奥地利参谋部半官方的密使，上校斯托尔巴赫·冯·布吕曼菲尔德伯爵继续进行长时间的、最后一次决定性的会谈。

会见于九点一刻左右，在特别融洽的气氛中结束。部长大人甚至十分亲切地把客人一直送到正门楼梯的楼梯口。在那里，当着站岗的接待员和副官的面，部长向上校伸出手，上校欠身握了一下。两个人都穿着便衣，脸色又疲倦又严肃。他们彼此会意地交换一下眼光，然后，上校腋下夹着沉重的黄色公事包，由一位副官为前导，走下铺着红地毯的宽大楼梯。走到下面，他回过身去。部长大人一直殷勤地目送着他，最后一次向他友好地点点头。

院子里，陆军部的一辆小汽车在等着，斯托尔巴赫点上一支

雪茄，坐到后座上，副官俯身吩咐司机走什么路线，避开游行队伍，把上校送回下榻的选帝侯堤饭店，免生意外。

晚上很热，下过雨，不过，一场短暂的急雨并没有使空气凉爽下来，只是在街上留下了蒸汽浴室似的水汽。为防备发生混乱，商店里的灯都熄灭了。虽然还不到十点，柏林的景象却象平常深夜将尽时那么庄严阴森。上校的目光漫不经心地看着这首都的广阔夜景，满意地想着此行的实际成果和第二天在维也纳要向冯·霍岑道夫将军作的汇报。他坐到车里的时候，曾下意识地把他皮包放在身旁，现在发现了，拿起来，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漂亮的新皮包，浅黄褐色的皮子，带着个镀镍的搭扣，是流行的式样，但是豪华漂亮，完全适合出入部长办公室。这是他刚到柏林时，在选帝侯堤饭店的一家皮货店买的，专为这次出差使用。

汽车在旅店门前停下，看门人慌忙出来迎接上校，并且毕恭毕敬地把他迎到入口的大厅。斯托尔巴赫在办公室门前停住脚，叫人给他送一份便餐上去，并且准备好他的帐单，因为他要搭晚上的特快列车。接着，虽然身体肥胖，他还是快步走上电梯，上了二楼。

在灯光明亮，阒无一人的宽敞走廊里，配膳室门口的一条长凳上，坐着一个茶房。斯托尔巴赫不认识他，这大概是替换这层楼的茶房的。那人立即站起来，走在上校前面，替他打开了他的套间的房门。他扭开了电灯，放下木条百叶窗。房间有两个窗子，天花板很高，糊着黑底金花的壁纸，房间跟一间浅蓝瓷砖的盥洗室通着。

“上校先生不需要什么了吗？”

“不需要。我的箱子收拾好了，我只想洗个澡。”

“上校先生今天晚上动身？”

“是的。”

仆人不介意地瞥了皮包一眼，上校进屋的时候顺手把它放在房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斯托尔巴赫把帽子扔到床上，用手绢擦擦沁出汗珠的光秃秃的后脖颈，这当儿，茶房走进盥洗室，拧开水龙头。茶房回到房里来时，奥地利参谋总长的特使只穿着淡紫色的丝衬裤和短袜。仆人捡起在地毯上的尽是尘土的皮鞋。

“一会儿就送回来，”他说着，离开了房间。

配膳室和盥洗室只隔一层薄薄的板壁。仆把耳朵贴在墙上，听着声音，一面用一块绒布擦鞋。听到上校沉重的身体浸入水里，发出哗哗的水声，他笑了笑。接着，他从壁橱里取出一个漂亮的新皮包，浅黄褐色的皮子，带着个镀镍的搭扣，里面装的全是废纸；他把皮包用报纸包上，挟在腋下，手里拎着手，去敲房间的门。

“进来！”斯托尔巴赫喊。

“这下没成功，”那仆人马上想。果然，上校让浴室的门敞开着，从卧房里可以看到澡盆的一头，那里面泡着粉红色的脑壳。

茶房不敢迟疑，放下鞋子，夹着包儿又走了出去。

上校泡在热乎乎的水里，水一直浸到下巴，泡得正舒服，突然，电灯灭了。房间和盥洗室同时一团漆黑。斯托尔巴赫等了一会儿，看到电还不来，他顺着墙壁摸去，摸到了电铃，愤愤地按起铃来。

仆人的声音在黑暗的卧房里响起来：

“是上校先生按铃吗？”

“怎么回事？旅馆的电灯出毛病了？”

“不是，配膳室里灯亮着……大概是房间的保险丝断了。我来修理……一会儿就好。”

过了好一会儿。

“怎么样？”

“请上校先生原谅……我在找保险盒。我以为是在这儿，门旁边……”

上校从水面上抬起头，睁大眼睛朝漆黑的屋子张望，只听得仆人在屋里找来找去。

“找不到，”那声音又说。“请上校先生原谅，我到外头去看看，保险盒大概在走廊里……”

茶房灵巧地走出了屋，跑到配膳室，把上校的皮包放在安全的地方，赶紧把电接通。

三刻钟以后，上校斯托尔巴赫·冯·布吕曼菲尔德伯爵仔细地擦干身子，喷上香水，穿好了衣服，然后喝了茶，吃了火腿和水果，点上一支雪茄，再看看表。虽然时间还早，但他不愿临时着忙，就给办公室打电话叫人来拿他的箱子。

有一个搬行李的工人，已经拿起放在房门旁边椅子上的黄公文包，上校却说：“不用，这个我自己拿。”

他从工人手里把皮包接过来，看了看锁扣是否关好，郑重地把皮包夹在胳膊底下，确信什么都没有忘记之后，走出了房门。他一向做事有条不紊。

离开这层楼以前，他想找那个茶房，给他一点小费。但是，走廊里没有人，推开配膳室的门，里面是空的，那人不见了。

“该这傻瓜倒霉，”上校嘟哝一句，去乘维也纳的特快列车了。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日内瓦大学生埃贝尔雷（让·塞巴斯蒂

安)在费蒂茨街车站,登上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他没有带任何行李,只有一个小包,象捆好的一本厚书。特劳吞巴赫从容不迫地撬开了锁,把文件捆在一张报纸里,把那漂亮的淡黄褐色皮包销毁了。何必留着受牵累。

“如果我胳膊底下夹着这些文件,在德国的领土上被逮住的话……”雅克心里想着。他的“任务”只是这么一点冒险,真是好笑。他觉得很好玩,并不把这看作危险。“当初,没有必要让珍妮着急!”他愤愤地想。

但是,在路上,他还是到厕所去把包裹打开,尽可能把文件分开,装到口袋里和衣服衬里里面,免得在海关被人盘问。为了更谨慎起见,在德国的最后一站,他下车买了一些雪茄,好在国境上有点东西报关税。

不管怎么样,海关检查的那几分钟他还是很不自在。只是当他确知火车已行驶在比利时的铁轨上时,才发现浑身已经被汗湿透了。他坐在角落里,在加意扣好的外衣上盘起手臂,舒舒服服地放心睡觉。

五〇

布鲁塞尔人民宫从上到下的七层楼,象个蜂窝似的,发出嘈杂的声音。从上午开始,社会党国际局在这里举行特别会议。这次反击各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紧急行动,不仅使欧洲各国社会党的领袖聚集在比利时首都,还从世界各地召来了大批的活动分子,他们决心使今天星期三晚上在马戏场召开的群众抗议大会产生国际反响。

由于梅奈斯泰勒拨出钱来给小组用(谁也不知道飞行家和里查德利是怎么能够给支部提供秘密经费的),他们中间有十来个人来到了布鲁塞尔。他们在安斯巴克大道附近的市场街,选了一家叫做“雄狮酒店”的小酒馆,作为聚会场所。

雅克就是在这里找到了朋友们。他把斯托尔巴赫的文件包交给了梅奈斯泰勒。(飞行家马上走开,把自己关在旅店的房间里,对战利品作了初步检查。雅克得过一会儿再去见他。)

雅克一出现,大家热烈欢呼迎接他。基约夫第一个看见他,马上喊了起来:

“蒂博,又见到你,多么高兴!……怎么样,嗯,热吗?”

支部所有的熟人都在这儿:梅奈斯泰勒和阿尔弗利达,里查德利,帕特逊,米托尔格,范希德,佩里内,卖药的萨夫里奥,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兹拉夫斯基,大肚子的布瓦索尼斯老头儿,斯卡达,那个“沉思的亚洲人”,甚至还有玫瑰色脸颊的金发女郎爱弥莉·卡蒂埃。她还戴着她的护士头巾,基约夫从一开始就要她解下来,因为“伏天太热”。

大家都伸出手来,雅克对他们微笑着。在比利时的小酒店里突然见到日内瓦集会上的热烈气氛,他感到高兴——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兴。

“嘿,嘿,”基约夫说,他以为雅克是从法国来的,“你们那个卡约夫人,他们宣告她无罪了,是吗?……你要喝什么?你也要喝他们的啤酒吗?”(他瞧不起北方人的糟啤酒,还是忠实不渝地喝他的不掺水的苦艾酒。)

基约夫愉快的吵吵嚷嚷,反映了日内瓦最近几天几乎普遍的乐观情绪。梅奈斯泰勒更少参加支部的争论了,那些争论总离不开国际的秘密计划。大家怀着极大的热情记下了欧洲和平

运动在各国的示威，连最使人沮丧的消息也不能使这热情动摇。这一小队人来到布鲁塞尔，与欧洲其他的代表团进行了初步接触，官方领袖人物也出面了，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统一反战行动。这些，对于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来说，都证明了能起作用的、保证胜利的国际团结。早晨的电讯告诉他们，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从昨天夜里，甚至开始炮轰贝尔格莱德。但是，他们根据一则奥地利简讯所提供的消息，轻易地认为，只是城堡上中了几颗炮弹而已，这次袭击无关紧要，与其说是敌对行动的前奏，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是象征性的显示力量。

佩里内让雅克坐在他的旁边。他在大西洋酒吧间待了一个上午。那里是法国代表团的驻地，他从那里带来了巴黎的最近消息。他说，昨天晚上，社会党议会党团由饶勒斯和儒勒·盖德率领，到凯道赛同代理部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这次访问后，社会党议员起草了一份公开宣言，坚决声明：“只有法国才能支配法国”，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决不“由于对秘密协定的这样那样任意解释，而被投入可怕的冲突”；还要求，“在最短期间召开议会，尽管议员正在度假”。因此，法国的社会党人准备在议会进行斗争。佩里内对于法国代表团的热情、镇定和坚定的希望印象良好。饶勒斯比任何其他的人更表现出一种持久的信心。人们以自豪的心情引述他最近的言论。据说，他曾对王德威尔德说：“您看吧，这就好象阿加迪尔那次危机一样，局势有涨有落，但是，没有解决不了的。”有人还讲述了一件轶事，作为他乐观精神的一个明显证据，说是头头有一天吃过午饭后有一个钟头的空闲时间，他竟到博物馆里去，安安静静地观看了一小时凡·爱克兄弟①

① 尼德兰画家，兄弟二人，兄名胡伯特（1370—1426），弟名杨（约1390—1441）。

的画。

“我看见了他，”佩里内说，“我向您保证，他一点也没有灰心丧气的样子，他就从我身旁走过去，夹着他那沉重的公文包，肩膀都耸了起来，戴着草帽，穿着黑色的常礼服……他的样子总好象教授去讲课似的……他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挽着手。过后有人告诉我，那是德国的哈斯……您会看到的……他们从我桌子旁边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德国人停住脚，我听见他用法语说话，发音很难听：‘德皇不愿意打仗，他不要战争，他非常害怕战争的后果！’这时候，饶勒斯转过头来，目光闪烁，嘴上泛起微笑，回答他说：‘好啊！你们只要让德皇对奥地利有效地施行影响。我们，在法国，我们就能够迫使政府去影响俄国！’正好在我的桌子前面……我听见他们两人说话就好象您这会儿听见我说话一样清楚。”

“影响俄国人……只要还来得及！”里查德利嘟囔着说。

雅克看了一下他的眼睛，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里查德利显然反映了梅奈斯泰勒的想法，根本不象大家那样乐观。这种印象马上由里查德利证实了，因为他向雅克俯过身来，用疑问的声调低声说：

“简直应该想一想：既然法国、法国的首脑默许俄国动员，默许俄国以新的挑衅来回答奥地利的挑衅，以拒绝来回答德国的最后通牒，这难道不是在实质上已经接受了战争！”

“俄国的动员只是局部的，”雅克说，语调并没有很大的确信。

“局部的动员？这跟暂时伪装的总动员又有什么区别？”

米托尔格坐在里面的长凳上，就在夏尔肖夫斯基和里查德利的旁边，他忽然大叫起来：

“俄国？已经动员了，你们就放心吧！俄国，它已经在沙皇军国主义的掌握之中了！今天，欧洲各国政府都同样是反动势力的奴隶，是本质上就需要战争的体制、战争的制度的奴隶！就是这么一回事，我的同志！解放斯拉夫人吗？只是一个借口！沙皇制度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压迫斯拉夫人的制度！在波兰，它把他们镇压下去了！在保加利亚，装出给他们自由的样子，只是为了变本加厉地压制他们。事实上，是要重新开始沙皇军国主义与中欧帝国的军国主义之间的老冲突！”

在旁边的桌子上，布瓦索尼斯、基约夫、帕特逊和萨夫里奥无谓的争论没完没了，说是柏林政府的意图越来越捉摸不透。德皇一方面一再提出和平抗议，为什么又顽固地拒绝进行斡旋？其实他只要提出稍稍坚决的忠告，就足以使弗朗索瓦-约瑟夫满足于既得的辉煌的外交成就。奥地利军队入侵塞尔维亚，对于德国没有丝毫好处。如果柏林真象社会民主党人所说的那样，不想打仗，那么为什么让德国以致全欧洲冒这样大的危险呢？……帕特逊还指出：英国的态度也不易捉摸。

“欧洲各国的注意力都将转向英国，”布瓦索尼斯象是说什么格言似的。“奥地利宣战，打断了维也纳和彼得堡的双边会谈，因此，谈判只有通过伦敦的调解才能恢复。英国仲裁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

帕特逊一到布鲁塞尔，就跑去探望了他的社会党同胞。他说在英国代表团里，大家都为英国外交部流传的一个谣言大为不安：格雷左右一些有影响的人士担心英国一再表示谨守中立会间接助长中欧帝国的好战方略，据说，他们正促使英国外交大臣下定决心，或者，至少要警告德国，一旦发生奥俄冲突，英国一定严守中立；但是，如果法德之间发生战争，那情况就完全不

样了。英国的社会党人信守中立政策，唯恐格雷屈服于这种压力。尤其是因为，今天如果英国发表这样的声明，英国舆论是不会象上星期那样加以斥责的；因为奥地利在最后通牒中那样闻所未闻的严酷态度以及坚持进攻塞尔维亚已经在海峡彼岸激起了对维也纳普遍的愤慨。

雅克由于旅途劳顿，只是有气无力地听着他们的争论。与朋友们重逢引起的愉快心情现在正在消失，消失得比他预料的还要快。

他站起身来，走到小范希德、兹拉夫斯基和斯卡达的桌子跟前。他们正在低声交谈。

“今天，”患白化病的那人用他那吹笛子般的尖嗓子低声说，“大家生活在一起，各人都只顾自己，一点慈善之心都没有……这种情况要改变，谢尔盖……首先，要在人们心里……博爱，这不是从外面，通过法律能够形成的……”他象在睡梦中微笑一样笑了笑，又继续说：“如果没有博爱，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组织系统，倒可以；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决不可能，甚至用不着试一试！”

他没有看见雅克走到了他们身旁。忽然瞧见了雅克，他脸红了，停住了嘴。

斯卡达在他的啤酒杯子旁边放着几册散了页的书籍。（他口袋里总揣着期刊和书。）雅克漫不经心地看看书名：爱比克泰德①的……《巴枯宁文集》第四卷……埃利塞·雷克吕②的《无政府主义与教会》……

斯卡达向兹拉夫斯基欠过身，在半厘米厚的镜片后面，凸出

① 爱比克泰德(约50—138)，古罗马的哲学家，属斯多噶学派。

② 埃利塞·雷克吕(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及社会学家，参加过巴黎公社，提倡无政府主义。

的眼睛大得出奇，好象荷包蛋似的鼓起来。

“我根本没有不耐烦的意思，”他柔声地辩解，用手指一下下搔着短短的鬓发，显出怪癖似的规律性。“我要革命，并不是为了我自己，二十年，三十年，也许五十年之后总会发生革命的！我知道！这个，就是我生活、斗争的全部需要……”

在里面，里查德利又发言了。雅克竖起了耳朵。通过里查德利预言似的谈论，他试图找到飞行家的思想线索。

“战争将迫使各国政府用货币贬值的办法来消除负债。战争将加速各国政府破产。战争同样将使积蓄不多的人贫困化。战争将迅速引起普遍的贫困。战争将聚集起许许多多新的牺牲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使他们归向我们。战争会自动消除……”

米托尔格打断了他的话。布瓦索尼斯，基约夫，佩里内，大家都抢着说起来。

雅克不再听了。“是我变了吗？”他心里想。“还是他们变了？”他分析不出为什么这样不自在。“战争的威胁震动了我们的小组……使它解体……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气质，作出反应……需要行动，是的，总体的行动，强烈的行动，但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我们的小组处于孤立状态，离心的状态，没有骨干，没有纪律……是谁的过错呢？也许是梅奈斯泰勒的过错……梅奈斯泰勒在等我，”他想着，看了看表。

他走近坐在帕特逊身旁的阿尔弗利达。

“到你住的旅馆去，坐哪路电车？”

“走吧，”帕特逊站起来说。“弗利达和我，我们陪你走一段。”

他正好跟一个英国社会党人有约会。那人是凯尔—哈尔迪的朋友。他挽着雅克的胳膊，把他带到酒店外面，身后跟着阿尔弗利达。他好象很激动。凯尔—哈尔迪的朋友是伦敦的新闻记

者，曾经对他说过要他为社会党办的一家报纸到爱尔兰去作一次调查。如果事情决定下来，帕特就要在第二天大清早上船到英国去。想到这个前景，他心绪纷乱。五年来他一直在欧洲大陆，还从来没有穿越过英吉利海峡！

烈日炎炎，路面上的石板烫人。没有一丝风吹散城上重滞的热气。帕特逊没有穿上衣，叼着烟斗，戴着小鸭舌帽，衬衣领子敞着，露出白脖子，两条长腿穿着一条法兰绒的旧裤子，他的这副派头儿比任何时候都更象一个出门旅行的牛津大学的大学

生。阿尔弗利达走在他们后面。她那褪了色的蓝布衣裙有亚麻花那样的精致色调。黑色的发绺，小小的皱鼻子，玩具娃娃似的大眼睛，温顺的面容，摇晃着的两条手臂，使人会觉得她象个小姑娘。她按照往常的习惯，只听不说。忽然，她用微微颤抖的嗓音问道：

“如果你走了，什么时候回日内瓦？”

英国人的脸色阴暗下来：

“我不知道。”

她犹豫了一下，抬起眼睛看看他，又马上把眼皮低下，睫毛的阴影在脸上迅速地跳动。她低声问：

“你还回来吗，帕特？”

“回来，”他立刻回答，放开了雅克的胳膊，走到那少妇身旁，亲昵地把一只大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回来，亲爱的……毫无疑一问！”

他们又走了一段路，没有作声。

帕特逊把烟斗从嘴上拿下来，一边走，一边微微仰起头，目不转睛地观察着雅克，好象看着一个什么物体一样。

“我想起你的肖像，蒂博……再画两次……短短的两次，就画完了……这幅画被判定了命运不好，亲爱的！”

他发出青春的笑声。接着，他们穿过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向雅克转过身来，顽皮地指着小街角上的一座矮房子说：

“你看，在那儿就住着年轻的威廉·斯坦莱·帕特逊。我的卧室^①很大。如果你愿意的话，亲爱的，拿一包烟草作代价，我让一半给你。”

雅克还没有租房间，他笑笑说：

“我同意。”

“在二楼，窗子开着……二号房间。记住了吗？”

阿尔弗利达一动不动地抬着眼睛，注视着帕特逊的窗子。

“现在，得分手了，”英国人对雅克说。“你看见车站了？飞行家住的那条街就正好在后面。”

“你跟我一起去吗？”雅克问那年轻女人，以为她要跟他同路回家去。

她浑身一抖，看看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好象充满了悲痛的犹豫。

沉默了一会儿。

“不，现在，你自己去吧！”英国人漫不经心地说。“再见，亲爱的。”

五 一

最近两个星期，梅奈斯泰勒不断重复：“以战争反对战争！”

① 原文为英文 bed-room。

热情好象跟支部的同志们一样高，然而，任何事也不能动摇他的信念：他认定国际进行的一切反战活动都不能阻止战争爆发。“需要战争，来创造真正革命的局势，”他对阿尔弗利达说。“当然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革命是从目前的形势中产生呢，还是从接着而来的战争中或者从其他性质的危机中产生。这取决于许许多多问题……在很大的成分上取决于首先胜利的局势……谁先战胜？是日耳曼方面还是法俄方面？无法预料……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目前的策略，便是：就仿佛我们一定能够把帝国主义战争立即转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来行动……千方百计，加剧当前的革命前夕形势。也就是说，把任何方面具有和平诚意的力量联合起来，用一切办法助长骚乱！鼓动起最大的混乱！最大限度地给政府的计划设置障碍！”他心中暗想：“只要一个条件：不要超越目标，避免采取可能推迟战争的任何过于有效的办法……”

他来到布鲁塞尔后，故意住得离“酒店”很远。他住在南站后面，一个小院子顶头的一间小房里。

独自关在房间里，看了两个钟头斯托尔巴赫的文件之后，他不再怀疑日耳曼两国参谋部已经合谋：证据俱在，无可辩驳！……雅克带回来的战利品几乎全是斯托尔巴赫上校在柏林与参谋部领导人以及陆军部长谈话时逐日所作的记录，显然是为了在每次会谈之后给维也纳起草汇报用的。这些记录不但赤裸裸地暴露了两国参谋部谈判的现状，并且由于有大量近期的事实，精确地记述了柏林和维也纳若干星期来谈判的经过。这样揭示既往事实的价值很值得重视。在梅奈斯泰勒看来，这些文件正好证实了维也纳社会党人霍斯梅尔七月十二日嘱托博姆和雅克转达的推测；同时也使梅奈斯泰勒把事实发展的原来顺序又

清理了一下。

萨拉热窝刺杀案过后不多几天，贝赫托德和霍岑道夫就使出全身解数想促使他们的老皇上决心利用这个局势立即宣布动员，用武力打垮塞尔维亚。但是，弗朗索瓦-约瑟夫踌躇不决，推说奥地利采取军事行动也许会遇到德皇的反对。（“啊！啊！”梅奈斯泰勒想道，“这也顺带证明了德皇已经十分明确地估计到俄国势将干涉，势将引起欧洲大战！……”）为了制服君主的反对，贝赫托德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把他的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霍约斯立刻派往柏林，任务是取得德国的同意。果然不出所料，霍约斯首先遭到德皇和首相的拒绝；这两人实际上是害怕俄国的反应，根本不想被奥地利拖进欧洲大战。这时，普鲁士的军人集团就出场了。霍约斯从他们那里获得了早有准备的十分强大的辅助力量。自一九一三年二月以来，德国的参谋部对于斯拉夫的威胁，对于塞尔维亚与俄国共同策划对付奥地利——因而也是对付德国的图谋并非毫不知情，甚至怀疑彼得堡与贝尔格莱德合谋，或多或少间接地参预了萨拉热窝的刺杀案。但是，德国的将领们坚信这样一个自明的公理，即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立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俄国至少在两年之内，在他们的军备完成之前，决不会答应被卷入任何冒险。受到霍约斯的推动，德国军队的首脑们终于说服了威廉二世和贝特曼，使他们相信了，在欧洲目前形势下，俄国不肯让步，因而发动一场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所以目前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可以大大地确立日耳曼民族的威望。这样霍约斯就得到了奥地利可以为所欲为的保证，得以向维也纳报告德国答应坚持不懈地支持它的盟国的一切要求。奥地利最近几个星期的政策暧昧费解，这就真相大白了。另一方面，这也证明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德皇及其

亲信或多或少已经起码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大战可能爆发，即使并没有意识到必然性。

“幸亏只有我一个人窥见了这里面的秘密，”梅奈斯泰勒马上想到。“我居然差一点叫雅克和里查德利来帮我的忙哩！”

他站在那里，对床弯下腰。床上地方不够，他把摊开的文件大约分了类，一叠叠摆起来。他拿起放在右边的记录，这些记录或多或少都涉及过去，涉及七月初的一些事件。他把这些记录装进一个信封，标上号码：一号，然后，封了起来。

接着，他走到椅子跟前，坐下。

“再看看这些，”他想，把堆在左面的文件拉过来。“这些都有关斯托尔巴赫老兄的使命……这一包是奥地利的作战计划：战略，战术细节。不关我的事。装进二号信封里吧……好……我感兴趣的，是其余的东西……记录都标着日期。很容易把会谈的顺序重新排出来……这次使命的目的？大体上说，就是促使德国动员……这是头几份记录……他刚到柏林，会见了毛奇……等等……上校坚决要求德国参谋部加速备战……但是，对方回答说：‘不可能！因为首相反对，并且德皇支持他。’嘿！贝特曼为什么反对呢？……他说：‘太早了！’看看他的道理吧。第一，国内的政治原因：他对群众游行和《前进报》的攻击大为恼火，等等……啊！啊！归根到底，社会民主党人的极力抵制使他很厌烦……第二，国外的政治原因：首先，必须使德国肯定获得中立国家的赞同，主要是英国的赞同……其次，等待俄国的威胁成为彰明较著的事实。因为帝国政府一旦面对着‘公然表明侵略意图的俄国’，就可以一方面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时也使整个的欧洲相信，德国处于合法的防御地位，虽不情愿，也不得不宣布动员，‘以备不测’……当然了！这十分合乎逻辑！……那么，斯托尔巴赫和

德国的将领们要迫使他们的同伙贝特曼采取行动，用什么策略呢？……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巧计是怎样产生的……首先毫不延迟地迫使俄国对德国采取‘可以被看作是敌对的行动……’斯托尔巴赫二十五日晚上暗示说：‘例如，可以迫使俄国宣布动员。’老一套的花招！……对方怎么回答他的？‘其实，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一个好办法，只有一个，全在于奥地利：只要奥地利宣布动员就行了……’这些将领，倒不象人们估计的那么愚蠢！他们完全明白，如果弗朗索瓦-约瑟夫下令动员他的整个军队。——（斯托尔巴赫在这里加注：“这不仅威胁到小小的塞尔维亚，而且公开威胁到俄国这个庞然大物。”）——那么沙皇必然会以总动员来回答。在俄国的总动员面前，德皇也就再也不能拒绝下令动员，那么，首相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德国的动员是由俄国入侵的确实威胁直接引起来的。这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可以强使大家接受，既能为欧洲的舆论所接受，也可以为早已被煽动起来反对俄国的德国舆论所接受，同时也为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这个，这太对了。在历次代表大会上，絮德青^①之流总是大谈俄国的威胁，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倍倍尔本人早在一九〇〇年就说过，在俄国的威胁面前，他也要拿起枪来！……德国社会党人这回被抓住了话柄，中了圈套了！……中了他们自己设下的圈套！既然他们的政府准备反对哥萨克帝国主义而保卫德国的无产阶级，他们就不可能，从社会民主党的原则上讲也决不可能不与政府合作！……好手腕！所以，奥地利立刻就要总动员了……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咱们这位斯托尔巴赫老兄刚到柏林的第三天，就接二连三给霍岑道夫发

^① 是当时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

电报，敦促奥地利断然朝总动员前进……妙哇！这是通过奥地利之手，给俄国设下阴险的圈套！而在这当儿，德皇和他的首相正在安安静静地大吸其雪茄，对于这一手丝毫没有想到！”

梅奈斯泰勒习惯地抬起手，用拇指和食指掐住太阳穴，然后，手指顺着面颊迅速地滑下来，一直摸到细长的胡子尖。

“妙极了，妙极了！……顺理成章，一气呵成！”

他赶紧捡起零散在被褥上的文件，装进了第三个信封，又小声地说一遍：

“幸亏只有我一个人窥见了这里面的秘密！”

他靠着椅背，盘起手臂，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

这些文件显然提供了一个无限重要的“新事实”。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几个人以外，完全没有想到维也纳和柏林已经勾结在一起。这些对帝国制度攻击得最激烈的人，不愿意想到，为了维护奥地利的威望，帝国竟愚蠢到不惜拿世界和平和帝国的前途去冒险。因此，他们同意了官方的说法，以为威廉街对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深感意外，事先既不知道通牒的具体内容，也不知道它的侵略性质；以为德国诚心诚意地试图在奥地利和它的手之间进行斡旋。最了解内情的人，觉察到维也纳和柏林两个参谋本部之间可能有某种谅解。（梅奈斯泰勒今天上午遇到出席布鲁塞尔大会的德国代表哈斯，哈斯告诉他，星期日哈斯曾向德国政府进行过交涉，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郑重提醒政府，德奥联盟纯属防御性质。他得到的回答使他隐约感到不安，这个回答是：“但是，如果俄国首先对我们的盟友采取了敌对行动呢？”然而，直到现在，哈斯本人还远远没有估计到，奥地利的总动员要起的作用就是德国好战集团向俄国投去一个十分诱人的钓饵！）斯托尔巴赫的记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两国合谋，这如果

落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手里，就会成为他们反战斗争中的一个强大的武器，那么，他们就会立刻把至今针对维也纳的猛烈攻击转过来针对德国政府。

“这种爆炸性的武器，”梅奈斯泰勒想道，“说老实话，如果能够很好地利用的话，效力必将超过一切预计……对，一切都可以设想，必要的话，甚至可以使战争打不起来！……”

刹那间，他想象着，德皇和德国首相看到摆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证据，受到威胁，或者受到舆论猛烈攻击，不仅德国人民，连世界舆论也谴责德国政府，就会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或者是逮捕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公开向整个德国无产阶级以及欧洲的“国际”宣战（这种推测几乎不可想象），或者是在社会党人的威胁面前投降，急忙向后转，拒绝给予奥地利已经答应霍约斯的援助。那将如何呢？那时候，奥地利失去德国的支持，显然就不敢再坚持它的好战计划，只好满足于进行外交上的讨价还价……那样，资产阶级的一切战争计划将会破产。

“这要再研究！”他咕哝着。

他站起来，在房里踱了几步，喝了一杯水，又回来坐在文件前面。

“现在，飞行家，不要犯策略错误！……有两个解决办法：或者是使这个武器爆发，或者是把它隐藏起来，留待以后……如果是前一假设，比方说我把这些文件交到李卜克内西派的某个人手里，丑闻就会暴露，这样就要考虑两种情况：或者是这丑闻不能阻止战争；或者是能够阻止战争——假如不能阻止战争（这是很可能的），那么，有什么好处呢？显然，无产阶级肯定自己上了当，但还是要去打仗的……这是引起内战的很好宣传材料……对，但是目前，风是向相反的方向吹，已经到处有‘战争狂’

了。在这里，在布鲁塞尔这是很明显的……今天，要知道，是不是社会民主党所有的首脑都同意引爆这个武器呢？不一定……即使他们在《前进报》上公布了这些文件，报纸也会被查封，政府会恬不知耻地辟谣；目前德国的精神状态已是如此，他们的辟谣显然比我们的指控更有分量……现在，姑且不管一切显然可能的事，假设李卜克内西利用群众的愤慨和众口一词的谴责，迫使德皇退让，从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显然，‘国际’的力量以及群众的革命觉悟会大大增长……但是……但是，阻止战争？我们最好的一张王牌！……”

在要承担的这责任的严重性面前他呆了好一会儿，脸象冻结了似的。

“不能这样！”他轻声说。“不能这样！……即使阻止战争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不能冒险一试！”

他又紧张地思考了一会儿。

“不行，不行……不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问题……目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这个武器偷走……”

他俯下身去，用决断的动作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手提箱：

“把这些东西锁起来，不跟任何人说……等待时机！”

他所预想的时机，就是士气低落必然对动员入伍的群众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就是为了加速士气低落，使斗志涣散越发严重，把两国政府互相勾结这一决定性的证据公之于众，从而给予有力的打击，这一切都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他微微一笑，是中了魔的人那种微笑：

“事态的发展取决于什么呢？战争，革命，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说，都取决于我手里掌握的这三个信封！”

他把三个封套拿在手里，下意识地掂量了一下。

有人敲门。

“是你吗？弗利达？”

“不是，是蒂博。”

“啊！”

他赶紧把文件放到小手提箱里，锁好，然后才去开门。

雅克第一个本能的动作就是向杂乱的房间扫了一眼，寻找文件。

“弗利达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梅奈斯泰勒问道，他感到一阵烦躁，甚至恼火，但马上又压制下去了。“我不请你坐了，”他开玩笑地说，指着堆满乱成一团的女人衣服的两把椅子。“而且，我正准备出去。我要去看看他们在人民宫干些什么……”

“那……那些文件呢？”雅克问。

飞行家一面说话，一面把小手提箱推到床底下。

“我觉得特劳吞巴赫完全白费力气了，”他冷静地说。“你也一样……”

“真的吗？”

雅克感到灰心丧气，更觉得十分惊愕，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文件竟会一点用处也没有。他决定不了是不是该追根问底，终于试探地问道：

“您把这些文件怎么处置了？”

梅奈斯泰勒用脚指了一下小手提箱。

“我原来以为您打算今天晚上把它们送到国际局去……给王德威尔德，给饶勒斯……”

飞行家缓缓一笑，是冷冷的笑容；只是眼睛在笑，嘴唇却没有动。在他死人般苍白的脸上，这眼睛里的笑是那样清醒，几乎不是人所常有的，使雅克垂下了眼睛。

“给饶勒斯？给王德威尔德？”他用他那尖细的嗓子说。“在这里面甚至连再做一次演说的材料都找不到！”看到雅克失望的神色，他不再冷嘲热讽，又说：“当然，我回日内瓦之后再仔细研究研究。现在只是初步看看，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些战略细节，列举了一些兵力……对于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可用的东西。”

他穿起外衣，拿起帽子：

“你跟我一起走吗？我们慢慢走，一面谈谈……多热啊！布鲁塞尔的七月，我将永远记得！……阿尔弗利达会在哪儿呢？她对我说过来找我……走吧，我跟着你。”

一路上，他询问雅克在巴黎的情况，再也没有提到文件的事。

腿比平常痠得更厉害，他生硬地道声歉。夏天，特别是疲劳之后，他腿上的肌肉时常痛得象他航空失事的第二天一样。

“可以当‘残废军人’了，”他微微一笑，说。“在某些时候，有这毛病很好……”

在人民宫门口，雅克正要走开，他突然碰碰雅克的胳膊：

“你怎么了，我的孩子？”

“怎么？”

“我觉得你变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变得很多。”

他用严峻的、目光锐利的黑眼睛打量着雅克。

刹那间，珍妮的影子在雅克眼前闪过。他脸红了。他不愿撒谎，也不愿多作解释，只是神秘地笑一笑，转过脸去。

“一会儿见，”飞行家说，没有追问。“开群众大会以前，我跟弗利达到酒店去吃晚饭，在我们旁边给你留一个位子。”

五 二

刚到八点，王家马戏场里五千个座位就都坐满了，连走道上也挤满了站着的示威者。围绕马戏场的狭窄街道上，聚集起嘈杂的人群，热忱的活动分子甚至估计人数已经达到五、六千人。

雅克和他的朋友们费了好大力气才打开一条通路走进会场。

在人民宫继续举行国际局会议的“官方人士”还没有到场。据说会议开得分歧复杂，说是也许要拖到很晚的时候。凯尔一哈尔迪和瓦扬坚持要参加会议的代表原则上赞成举行预防性总罢工，并且以他们党的名义正式保证在各自国家积极准备这次罢工，使“国际”在战时能够阻碍各国政府实现好战计划。饶勒斯对这个建议予以有力的支持。激烈的争论从早上起一直继续到现在。依然是两种论点针锋相对。一些人赞成在进攻性的战争中举行罢工的原则；但是，在防御性的战争中，一个国家如果因罢工而瘫痪，就注定遭受侵略者入侵，他们主张，遭受进攻的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拿起武器来自卫。大多数德国代表，很多比利时代表和法国代表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只限于给“侵略国”寻求一个明确的、无可争辩的定义。另一些人援引历史，同时从近些日子法国、德国、俄国新闻界带有倾向性的反应中得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戳穿正当自卫战争的神话。他们说：“一国政府决心要把人民拖入战争，总会找到借口说本国受到攻击，或者显得受了攻击；要挫败这个诡计，就必须事先宣布预防性罢工的原则，对一切战争威胁自动作出反应；所有各国社会党领导人现在就必须众口一词地，没有任何遁辞地接受这个原则，使集体的抵制，

唯一有效的、以总罢工来抵制战争的运动，在危险的时刻同时在处处爆发。”这场也许会决定欧洲最近命运的争论会有什么结果还不得而知。

雅克感觉有人推他的臂肘。是萨夫里奥，他看到了雅克，挤到他身边来了。

“我要对你说，帕拉佐罗从墨索里尼那里收到了一封非常好的信，”他一边说，一边掏出几张折着的信纸，是他珍重地放在贴身衬衣里的。“我把最精采的段落抄下来了……里查德利已经用美妙的文笔翻译出来，要给《明灯报》发表，你会看到的……”

喧闹声很厉害，雅克不得不把耳朵贴近萨夫里奥的嘴唇。

“你听着……首先，这一段：‘通过战争，资产阶级迫使无产阶级面对悲剧性的选择：或是造反，或是参加屠杀。造反，立即会被淹没在血泊之中，而屠杀，有冠冕堂皇的词句，例如义务，祖国等等，作为掩护……’你在听吗？……贝托尼还写道：‘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血腥的阶级合作的方式。资产阶级能把无产阶级粉碎在祖国的祭坛上，自会十分满意……’还有：‘英特纳雄耐尔是未来事态发展不可避免的结局……’对，”他用颤抖的嗓音说。“他说得多么好！英特纳雄耐尔，这就是目的！你看吧，国际，已经十分强大，足以拯救人民！你看，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集会，这就是世界和平！”

他挺起身子，目光闪闪，又说下去，不过，嘈杂的人声越来越高，雅克听不清他的话。

群众在窒息的空气里挤在一起，开始不耐烦了。为了稳住群众，比利时的活动分子灵机一动，唱起他们的歌曲，“无产者，联合起来”。大家立即齐声应和。每个人的声音最初还在迟疑，但是得到了旁边的人的支持，就变得坚强有力了。不仅是每个喉

咙在歌唱，而是每颗心在歌唱。这歌声把大家联结在一起，成了洪亮而具体的团结一致的象征。

当大家久已盼望的各国代表终于在马戏场底端出现时，全场起立，响起了欢呼声。这是愉快的、亲切和信任的欢呼。没有人发布命令，《国际歌》自发地从众人胸膛里迸发出来，掩过了欢呼的声音。主持会场的王德威尔德一挥手，歌声好象勉强地止住了。群众逐渐安静下来，所有的头都转过来，向着那一群领导人。各国党的报纸早就把他们的形象在群众中传播开了。大家用手指指点着他们，互相轻声说着他们的名字。点名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缺席。在欧洲大陆生活中这使人焦虑不安的时刻，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都有代表在那小小的讲台上。千万双充满着顽强和庄严的希望的眼睛集中注视着他们。

从王德威尔德口中得知，根据德国党的建议，国际局刚刚作出决定，把本来准备二十三日在维也纳召开的有名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提前于八月九日在巴黎召开。这时，这种有传染性的，集体的信任就更增强了。饶勒斯和盖德以法国党的名义同意负责组织这次大会。由于群众的热情，他们准备使这次名称为“战争和无产阶级”的示威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两个伟大的民族可能彼此厮杀的时刻，”王德威尔德大声说，“看到其中一国的，以四百多万张选票当选的工会代表，工人团体的代表，到另一个所谓敌国的领土去，表示亲善，表达他们维护各国人民之间和平的决心，这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场面！”

德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哈斯，在掌声中站起来。他的勇敢的演说容任何人对社会民主党合作的诚意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奥地利的最后通牒简直是挑衅……奥地利想要战争……它好象是指望德国支持……但是德国的社会党人不同意把无产阶级牵连到秘密协定中去……德国的无产者宣布，德国不应该介入，哪怕是俄国进入了冲突！”

他的每句话都被欢呼声打断。听到这明确的声明，大家都如释重负。

“我们的对手可要当心！”他在结束演说时高呼。“人民，受够了贫困和压迫，很可能会觉醒起来，团结一致，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意大利的莫尔加尼，英国的凯尔—哈尔迪，俄国的卢巴诺维奇相继发言。全欧的无产者众口同声，怒斥各国政府危险的帝国主义政策，呼吁为维护和平而作必要的让步。

轮到饶勒斯走上前来发言的时候，欢呼的声音更加强烈。

他的步子今天比往日更加沉重。忙了一天，他分外疲劳。他紧缩着脖子，低矮的额头上，散乱的头发被汗水粘在一起。他慢慢地登上台阶，厚实的身體稳稳当当地支撑在两条腿上。他面对群众，一动不动地站着，象个敦实的巨人，舒开背，拱起腰，在地上生了根似的，抵挡住那雪崩般的灾难。

他喊道：

“公民们！”

每次他登上讲台都会出现一种自然的神奇力量，使他的声音一下子压过了几千人的欢呼。出现了一片虔诚的寂静：暴风雨前森林里的寂静。

他好象默思了一会儿，握起拳头，突然把两条短短的胳膊缩在胸前。（帕特逊曾经颇为不敬地说过：“他象一只讲道的海豹。”）他开始讲演，起初，不慌不忙，也不激烈，表面上没有力量。

但是，刚开始说了几句话，他的嗓子就象摇动着的铜钟一样，震响了整个空间，大厅突然象钟楼似的，充满了他洪亮的声音。

雅克向前俯着身子，拳头支着下巴，眼睛盯着他那仰起的脸——它好象总是看着远方——一字不漏地静听。

饶勒斯并没有说什么新的东西。他再次说明执行征服别国和树立威信的政策是危险的。他指出，外交活动十分软弱，沙文主义爱国宣传极为猖獗，他指明战争恐怖是徒劳无益的。他思想简朴，词汇也有限，时常只有一般的宣传鼓动的效果。然而，这平凡普通的演说，却象一股强大的电流，穿过这个人群，而今晚，雅克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它指挥着人群动荡起来，发出友爱、愤怒、感慨、希望的共鸣，就象竖琴在随风颤动一样。饶勒斯是从哪里得到了这样强大的鼓动力量呢？是因为他那坚定不移的声音吗？它犹如巨大的旋涡，在成千上万仰望着的脸上起伏回荡；是因为他对人类的明显的热爱，他的信念和他内在的抒情气质吗？是因为他那象交响乐般的灵魂吗？在那里，语言思辨的倾向和行动的准确感，史家的明晰和诗人的梦想，对秩序的爱好和革命的意志，都奇迹般地融合在一起。特别是今天晚上，从他的话里，从他的声音和坚定的态度上，流露出一种确信，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底：确信即将到来的胜利，确信人民对战争的抵制会使政府迟疑，丑恶的战争力量不可能压倒和平力量。

他说完动人的结束语，浑身紧张，满嘴飞沫，心情十分激动。他走下讲台的时候，全场又一次起立，向他欢呼。马戏场里，从这头到那头，鼓掌声，顿足声震耳欲聋，持续了好几分钟，就好像隆隆的雷声在峡谷里回响。人们举起手臂，狂热地挥动着帽子、手帕、报纸和手杖，好象大风掀起了麦浪。在这样情绪昂扬的时刻，饶勒斯只要登高一呼，振臂一挥，这狂热的人群就会跟在他

身后，不顾一切地，向任何巴士底狱冲去。

不知不觉，这嘈杂的声音有了秩序，有了节奏，为了从扣紧的枷锁下解脱出来，从每个人气喘吁吁的胸膛里，又一次迸发出音乐，迸发出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在外面，不能进入会场的成千上万示威者，不顾警察在耀武扬威，仍旧拥在附近的街道上，也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

这是最后的斗争！

五 三

不知不觉之间，大厅的人走空了。雅克被人推来推去，尽力保护着小范希德。范希德就象个落水的人一样，紧紧抓住他。雅克目不转睛地看着几米以外，梅奈斯泰勒、米托尔格、里查德利、萨夫里奥、兹拉夫斯基、帕特逊和阿尔弗利达那一伙人。但是，怎样挤到他们身边去呢？他把范希德推在前面，利用每一阵把他冲向他的朋友那个方向去的小小的激流，终于渐渐越过了把他们隔开的那段短短的距离。这时他才停止战斗，象别人一样，听任人流把他们向出口涌去。

《国际歌》的歌声，一忽儿象铜管乐似的高亢，一忽儿又低沉下去，歌声里夹杂着尖锐的叫喊：“打倒战争！”“社会主义共和国

万岁！”“和平万岁！”

“过来，小姑娘，你要走丢了，”梅奈斯泰勒说。

可是，阿尔弗利达没有听见。她紧紧拉住帕特逊的胳膊，非要看看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不可。

“等一等，亲爱的，”英国人小声说。

他把两手的手指紧紧交叉起来，弯下身子，给这年轻女人做了一个脚镦，她登了上去。

“嗨哟！”

帕特逊一挺腰，把她举过了头。她笑起来。为了保持平衡，她的身子紧紧贴着帕特逊的上身。她那玩具娃娃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今天晚上发射着野性的光。

“我什么也看不见，”她用兴奋的、轻柔的声音说。“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旗帜，象树林似的！”

她并不急着下来。英国人被她的裙子挡住了眼睛，仍然磕磕绊绊地向前走。

他们不知怎的脱离了人群。

大街上，比会场里面还要拥挤。喧哗的声音很大，经久不息，仿佛几乎听不到了。经过了几分钟踏步不前，这股人流好象在找方向，动荡起来，终于淹没了警察设的警戒线，一路过去，又吞没了拥挤在人行道上观热闹的人，缓缓地向黑夜流去。

“他们把我们带到哪儿去？”雅克问道。

“排排队前进，同志们^①！”米托尔格在喊。他那丰润的脸涨得通红，好象从滚烫的水里出来的一样。

“我想大概是要到各个部的门前去示威，”里查德利解释。

① 原文为德文。

“反对战争！和平！和平！”米托尔格在吼叫。

兹拉夫斯基也用喉音喊：

“反对战争！……和平！和平！”

“弗利达在哪儿？”梅奈斯泰勒轻声问。

雅克转过脸去，用眼睛找那年轻女人。在他后面，走着里查德利，头高高扬起，嘴上总挂着微笑，是他那过于大胆的笑容。随后，是范希德，夹在米托尔格和兹拉夫斯基中间，这个患白化病的人紧紧挽住两位同伴的手臂，就好象被他们抬着走似的。他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唱歌，只把半透明的脸朝天仰起，眼睛半闭着，显出痛苦的、沉醉的表情……再后面，跟着阿尔弗利达和帕特逊。雅克只看见他们的脸，两张脸离得那么近，仿佛身子都缠在一起了。

“她在哪儿？”飞行员又焦急地问，他象个瞎子，把狗丢了。

这是个炎热的夏夜，黝暗深沉。铺面都关了灯。有很多窗户透出灯光，所有的窗子上都俯着黑色的人影。在大街的十字路口，一连几辆有轨电车，没有点灯，也没有乘客，停在路轨上。一股股行路的人从各条街道上涌来，流动的人群不断扩大，大部分示威群众是城里和郊区的工人。但是，从安特卫普、根特、列日、那慕尔，从各个矿区，活动分子们都来与布鲁塞尔的社会党人汇合在一起，与外国的代表团汇合在一起。今天晚上，布鲁塞尔真成了欧洲的和平的首都。

“这就好啦！”雅克心里想。“和平得到了拯救！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冲垮这座堤防！只要这群人不要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原文为拉丁文音译的俄文。

警察已经无能为力，只是组成了一道四排人的警戒线，保护着王宫花园和各部办公地。在警察的警戒线前面，示威队伍的前列继续向前走，要走到王宫广场，向市中心涌去。经过死气沉沉的王宫前面，千万张嘴发出一个声音：“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打倒战争！”

在前面，人们聚集成组，傲然簇拥着他们的旗帜，向前行进。没有命令，但其余的人跟着，组成喧闹的滔滔人流，象在主保瞻礼节一样。女人紧挽着丈夫的胳膊，孩子高高骑在父亲的肩头，睁着惊奇入迷的眼睛。人人都意识到自己体现了一份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力量。目光坚定，面容严肃，他们行进着，几乎不相互交谈，停止前进的时候，也有节奏地踏着步。赤裸的额头在电灯底下闪闪发光。每一张陶醉于信念，由于同一的决心而显得坚强的脸上流露出这样的信心，今晚，与政府的斗争打赢了。在这汹涌向前的人潮上面，洪亮的《国际歌》，以强而有力的节奏，激荡不已，就好象所有人的心脏在跳动。

有好几次，雅克感觉到梅奈斯泰勒试图挤过来，好象是要跟他说话，但每次都被推开去，或者被喧哗声打断。

“群众的行动终于来到了！”雅克对他喊道。由于对他还有合乎人情的敬意，他尽力微笑，但是，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这时人人都有的、热情愉快的火花。

飞行家没有回答。他的目光严峻，嘴角上始终显出雅克无法解释的痛苦的纹路。

在他们前面，动荡的涡流忽然使人群摇晃起来，游行队伍的前列大概是遇到了什么障碍。雅克踮起脚，想弄清楚混乱的原因。他耳边听出了飞行家的声音：仅仅几个字，说得很快，还是那种使人局促不安的假嗓子：

“我的孩子，我觉得，今天晚上，弗利达不会……”

下半截话被嘈杂声淹没了，雅克回过头来，莫名其妙，他觉得似乎听到：“不会回旅馆了。”

他们的眼光相遇。飞行员的脸正在阴影里，黑色的眼珠，象猫一样，没有任何表情，发出动物眼里的那种磷光。

这时候，一股强大的人流，涌向他们，卷着他们向前走。

在南方大道的路口，一小群民族主义分子围绕着一面旗帜，仓皇集聚起来，妄图阻挡游行队伍的前进，打了起来。但是，时间不长，也没有阻止住示威者的队伍向前进，但是在这停顿中，队伍一乱，雅克同梅奈斯泰勒和别的朋友失散了。

人群把他挤到右边去，困在房子下面，进退不得。这时，人群中央，后面的人拥挤上来，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流，把梅奈斯泰勒这一小队人冲到前面去。突然，他从暂时落脚的这个地方，在几米开外看到帕特逊。这英国人始终跟阿尔弗利达在一起。他们走过去，没有看见雅克。但是他正好看见了他们。他们的模样都变了……半明半暗的光突出了他骨瘦嶙峋的脸，古怪地雕塑出帕特逊的面容。他那平素活动的、笑盈盈的眼睛，这时，目光凝滞，好象是冷酷的疯狂的最高点。阿尔弗利达的面容也变得不少：热烈、坚决、傲气十足的肉感的神情，使她的脸畸形而且庸俗，仿佛象个妓女，酒足饭饱的妓女。她把额角靠在帕特逊的肩头，张着嘴，唱着《国际歌》，声音哑哑，断断续续。她好象在庆祝自己的胜利，她的解放，本能的胜利……雅克想起梅奈斯泰勒的话：“我觉得，今天晚上，弗利达不会回……”

他害怕了，自己也不知道要对他们说些什么，想从人群中挤到他们身边去。他喊道：“帕特！”但是，人群把他围困住，他象个俘虏似的，挣扎不出去，只好作罢。他目送着他们，不一会儿，就

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了。于是，他完全被动的，任凭人流把他冲向前去。

这时，只剩他一人了。这富有集体的传染性的神奇力量把他控制住，时间感和空间感消散了，个人的意识也消失了，好象在黑暗里，仿佛在睡眠中返回原始本真。他浸沉在、融化在周围这亲如手足的流动的人群中，他感觉到摆脱了自我。在他内心深处，仿佛有一股滚热的喷泉，却没有喷射到水面；毫无疑问，他好象始终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成了整体中的一部分，而这整体就是数量、真实和力量。但是，他并没有去想这些。他不停地走着，脑子里空空的，轻快得飘飘然，象在睡梦中一样舒适。

这种陶醉的感觉持续了一个钟头，也许还不止，直到脚碰到人行道的边沿，他才清醒过来。他忽然感到累了。

纵队夹在左右两边阴暗的房子中间，还在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进。后面的队伍中，歌声差不多已经停止，不时从压抑的胸膛中发出粗犷的呐喊：“和平万岁！”“国际万岁！”这喊声好象报晓的鸡啼，在四面八方引起了更多的喊声。然而，呼喊又沉寂下去，这时，只听得粗重的喘息和象畜群发出的脚步声。

他竭力往边上挤，靠近房屋，顺着关了门的店铺让人群带着他向前走，想找个机会离开游行队伍。正好遇到一条胡同，挤满了本地区看热闹的人，他终于挤了进去，在嵌在墙上的一个水槽旁边找到一个空位置，水流着，凉爽清澈，发出亲切的声响。他喝了水，浸了浸额头和手，站在那儿喘了半天。在他头顶上，夏夜的苍穹在闪烁。他想起前天在巴黎和昨天在柏林的格斗。在欧洲各个城市里，人民都奋起激烈斗争，反对无谓的牺牲。在维也纳的林格大街，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在彼得堡，哥萨克骑兵亮出马刀，冲向示威队伍的涅瓦大街，到处响起同一个声音，“和

平！和平！和平！①”国境线上，所有的劳动者互相伸出了手，一致争取兄弟友爱的理想，从整个的欧洲，发出了同一喊声。怎么能怀疑未来呢？明天，人类将从苦恼中解脱出来，重新能致力于给自己创造更美好的前途。

明天！……珍妮……

少女的情影突然使他镇静下来，驱走了一切，强烈的爱怜温存的欲望代替了今晚的激昂情绪。

他站起来，又在黑夜中走去。

睡觉……这是他现在想做的唯一的事情。不管在哪儿，随便哪一张长凳都行……城市的这一带他不太熟悉，他想找到自己的方位。突然他发觉走到了一个人迹稀少的广场。他想起，今天下午曾同帕特逊和阿尔弗利达一起走过。加把劲……英国人开了房间的那个旅馆大概就不远……

果然，没有费什么事就找到了旅馆。

他刚刚来得及脱掉鞋，脱掉上衣，拿下假领，衣服没有脱完，就倒在床上了。

五 四

等他睁开眼睛，屋里已经很亮。过了一会儿，他才完全清醒过来，看见一个男人的背影，跪在房间最里面：是帕特逊……英国人正慌慌忙忙把几件衣服放进地上的一个敞着口的箱子里。他要走了吗？几点了？

“是你，帕特？”

① 这三个词分别为德文、英文和拉丁文音译的俄文。

帕特逊没有回答，关上了箱子，放在房门旁边，然后走近床边。他脸色苍白，眼睛里有挑衅的神情：

“我把她带走！”他突然说。

在他嗓音里有一种威胁的意味。

雅克呆呆地看着他，满眼倦意。

“嘘，别说话！”帕特逊结结巴巴地说，其实，雅克连嘴都没有动。“我知道！……就是这样了！任何人都没有法子了！……”

雅克突然明白过来。他打量着英国人，脸上的表情象被人从恶梦中惊醒的孩子。

“她就下面，在一辆出租汽车里。她打定了主意，我也一样。她什么也没有对他说，她可怜他，什么也不愿意对他说，甚至不愿去拿她自己的东西。我们要走了，她再也不见他了。坐第一班火车，到奥斯坦德去。明天晚上，就到伦敦……事情就这样完了，任何人都没有法子了！”

雅克坐起来，把头靠在床栏杆上，什么也没有说，心里想：“一副凶手的嘴脸！”

“我，已经好几个月了！”帕特逊继续说，站在吊灯底下，一动不动。“但我总不敢……只是在今天晚上我才知道她也是这样……可怜的宝贝^①！你不知道，她跟这个人的生活……他不是人，分文不值！……哼，他还装出高尚的样子！他警告过弗利达。她什么都忍受下了！她觉得可以这样。她不知道……可是，自从她爱上了我，不，再也不能牺牲了……不要那样评价她！”他忽然这样说，仿佛从雅克痴呆的脸相上，看出了严厉的判断。“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这家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因为绝望，什么

① 原文为英文 *darling*。

都不相信，什么也不能相信——甚至对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因为他分文不值！”

雅克胳膊摊在床上，头微微后仰，阳光刺激着眼睛，一动不动。窗子敞开着，蚊子在他耳旁嗡嗡叫着，他也不想赶开。他只觉得全身无力，恶心，象失去了大量的血似的。

“人人都有权利生活！”英国人恶狠狠地说。“你可以要求一个人跳下水去救人，但是你不能要求他把落水的人的脑袋总是举在水面上，一直到自己淹死！……她要生活，好，有我呢！我把她带走！……嘘，别声张！……”

“我一点也不责怪你，”雅克轻声说，脑袋都没有动。“但是，我想到他……”

“你不了解他！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家伙是个魔鬼……一个真正的魔鬼！①”

“也许他会为这事送命的，帕特。”

帕特逊的嘴动了动，阴沉的脸上象挨了一拳似的，收缩起来。雅克忽然觉得那张脸丑陋可憎，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凶手！”他又想，眼睛扭转过去，过了一会儿，他又用低沉的声音说：

“我想到党，党这个时候比别的时期更需要领袖……你这是背叛，帕特。双重的背叛。全面的背叛。”

英国人退到门边。鸭舌帽歪戴着，面色灰白，眼睛象走投无路的困兽，嘴上挂着怪笑，忽然很象一个流氓。他很快弯下身去，抓起箱子。这时，他不象个凶手，倒象个窃贼了。

“晚安②！”他垂下眼皮说了一声，再也没有抬起眼来，就

① 原文为英文。

② 原文为英文。

溜了。

门刚一关上，雅克就想起了珍妮，思想锐敏得简直无法忍受。为什么想起珍妮呢？……他听见寂静的街道上，有一辆汽车开走了。头靠在床栏杆上，眼睛盯着闭上的门，他一动不动地待了很久，他眼前一会儿闪过帕特那漂亮的面孔、坦率的目光和金发少年特有的微笑；一会儿，又闪过那张伪善的脸，象是被辞退的仆人，被当场抓住的小偷，那厚颜无耻的脸……被欲念改变了相貌，变得丑陋可厌的脸……在地下铁道的走廊里追赶珍妮的时候，他自己大概也是这个样子……那一天，他不是也干得出卑劣的、背叛的事来吗？

雅克没能再睡着，刚到六点半，就跑到梅奈斯泰勒那儿去了。

整个公寓的人都还在睡觉，只有一个老太婆在擦洗前厅的铺地的瓷砖。雅克犹豫了一会儿，是走呢，还是上楼去？如果要赶八点的火车，这次访问不能耽搁太久。经过昨夜那场风波之后，他一定要再看看他的朋友，才能离开布鲁塞尔。

他先敲了一次飞行家的房门。没有回应。是不是弄错了？不，就是这儿，十九号，他昨天来过的。梅奈斯泰勒空等了一夜之后，也许睡着了？……他正要再敲门，忽然听到有人光着脚快步朝门口走来，一只手在摸门锁。雅克忽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疯狂的念头。他本能地抓住门把手，扭开。门打开了，撞上了梅奈斯泰勒：他正要把门锁上。

他们俩互相打量着。飞行家冷冰冰的脸上，表情难以形容，或许有些恼恨之意……他犹豫了一刹那。他也许要把客人赶走，把门重新关上？雅克料想到了。象刚才扭开门把手一样，他用

肩膀一下子顶开门，走了进去。

头一眼他就发现房里全变了，好象变大了。桌子、椅子都靠墙摆着，中央，衣橱的镜子前面，腾出了一块空地方。床上的被子没有叠起，但是蒙着床单。房间好象收拾过了，好象是为了什么事做好了准备。梅奈斯泰勒自己也是这样：他穿着淡蓝色的睡衣，上面还看得出熨过的折痕。衣架上没有挂一件衣服，盥洗盆上也没有放一件洗漱用品。好象因为要出远门，所有的东西都装进了那两只放在窗前、锁好了的小箱子里。然而，飞行家总不能穿着睡衣，光着脚出门吧？……

雅克的眼睛又回到梅奈斯泰勒身上。他还在原来的地方站着，看着雅克。他站着不动，但是两腿似乎支持不住了。他就象才动了手术的人刚从昏迷中醒来，又象刚从虚无之中拉回来的死人。

“您刚才正要干什么？”雅克结结巴巴地问。

“我吗？”梅奈斯泰勒不由自主地垂下两眼，踉踉跄跄地退到墙边，好象没有听清一样，吃吃地说：

“我要干什么？”

然后，他靠着桌子坐下来，轻轻地用两手捂起额头。

甚至桌子上也出奇的整齐。并排放着两封封好的信，正面向下。在一张折着的报纸上，放着几样个人物品：一枝钢笔，一个钱夹，一只表，一串钥匙，一些比利时钱币。

雅克不知所措地待了一会儿，一动也不敢动。然后，他走到梅奈斯泰勒身旁，梅奈斯泰勒立刻抬起头来：

“嘘……”

他挣扎着站起身，瘸着腿走了几步，又回到雅克身边，用完全不同的声音又说了一遍：

“我要干什么？……噢！我要穿衣服，我的孩子……然后，跟你一块从这儿出去。”

他没有看雅克，打开一只小箱子，从里面拿出衣服，摊在床上，又从一个报纸包里拿出沾满灰尘的鞋，开始穿衣服，好象房里只有他一个人。穿好之后，他走到桌子旁边，仍然不理睬坐在一旁不说话的雅克，径自拿起那两封信，撕成碎片，扔在壁炉里。

这时候，一直瞧着他的雅克才看到炉膛里满是灰，是新烧的纸。“他有那么多个人笔记吗？”雅克心里想。忽而想到：“是斯托尔巴赫的文件？”他迷惑地看了一眼打开的小箱子，里面的东西并不满，也没有看到文件包。“放到另一口小箱子里去了？”雅克心里想，他不愿阻止刚涌上心头的那荒谬的猜测。

梅奈斯泰勒又回到桌旁，拿起钱币，钱夹，钥匙，然后一一放回衣袋里。

这个时候，他仿佛才想起还有雅克在这里，他看看雅克，走了过来：

“你来得很好，我的孩子……谁能说得准呢？你也许帮了我一把……”

他面容安详，异样地微笑着。

“用不着费事，你看……永远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期望，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害怕……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

他突然出乎意料地向雅克伸出两只手，雅克激动地紧紧抓住。梅奈斯泰勒仍旧微笑着，低声说：

“现在，拉住我的手，领我向前走^①……走吧！”说罢，他放开了手。

① 原文为德文。这是流行在德国及瑞士德语区的一首儿歌中的两句。

他走到小箱子旁边，提起一只。雅克立刻弯腰去提另一只。

“不要，那一只不是我的……我把它留在这儿。”

在他迷惘的目光里，飞快地闪过一丝悲伤的、温情的微笑，使人看了心痛欲碎。

“他把文件销毁了，”雅克呆呆地想。但是，他什么也不敢问。

他们一起出了房间。梅奈斯泰勒拖着腿，比平时瘸得更厉害。

到了楼下，他从帐房门前走过，没有进去，雅克心想：“他甚至想到先把帐付清。”

“到日内瓦的快车……七点五十分，”梅奈斯泰勒看着张贴在前厅墙上的火车时刻表，低声说。“你呢？坐八点的车到巴黎？你正好来得及把我送到车上……你看，一切安排得多么好！……”

五 五

雅克从比利时来的火车上下来，巴黎刚下过一场为时很短的热雨，中午的骄阳更加炙人。

他面色阴沉。坏征兆越来越多。火车沿途，只见到一些令人惊慌的迹象。他乘的那列火车挤满了人。边境地区的居民惶惶不安。在诺尔省^①，休假的士兵，度假的军官，都用电报通知归队。雅克没有跟从布鲁塞尔同车回来的法国社会党人在一起，却跟诺尔省的人一块，坐在超员的车厢里。这些人互相并不认

^① 法国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省。

识，但是彼此交谈，传递报纸，交换消息。他们惴惴不安地评论时局，好象更多的是惊异，好奇，甚至某种程度的怀疑，而不是恐慌。显然，大多数人对可能打仗这种想法已经习惯。这些人传布消息说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这些消息泄露了些机密。各处的公路、桥梁、水渠、属于军工的工厂都已经派兵驻守。一营现役部队已经占领科贝伊的面粉厂，据《法兰西行动报》揭发，该厂厂主是德军预备役军官。在巴黎，引水工程、供水库已由军队看管。有一位戴勋章的先生，以工程师的那种准确性向大家解释说，埃菲尔铁塔上正在进行紧急工程，改进无电线设备。一个巴黎人，是汽车制造商，抱怨说有几百辆偶然集中到一起参加赛车的汽车，已被扣留待命，虽然还说不上已被征用。

雅克在圣康坦车站买到了《人道报》，从报上，他惊讶而又愤怒地得知，法国政府悍然在最后一分钟，禁止在头天晚上（二十九日，星期三）总工会在瓦格拉姆大厅召集的巴黎市内和近郊各工人组织举行的大规模示威大会。抗命赶到泰尔纳居民区的部分示威群众，已被警察的粗暴冲击驱散。夜里，斗殴持续了很长时间。活动分子的队伍差一点行进到内务部和爱丽舍宫。人们认为，民族主义的气焰如此嚣张，正是由于普恩加来回到国内。这似乎预示着政府不再尊重集会权利，蔑视历史悠久的共和国的自由权利，决心镇压工人的抗议运动。

列车晚点半小时。雅克在车站小吃部吃了一块三明治，出来以后，遇到一个老新闻记者，是他在进步咖啡馆多次遇见过的。这人叫卢韦尔，是《社会战报》的编辑，住在克耶关厢，每天下午到报社去。两人一起走出车站。车站的广场和附近的房子上，还挂着彩旗。共和国总统昨天回国，引起巴黎的爱国主义大发作，卢韦尔亲眼见到了，竟以意料不到的热情讲给雅

克听。

“我知道，”雅克打断他的话：“各家报纸都登满了……真恶心……我想，在《社会战报》上，你们没有随声附和吧！”

“《社会战报》吗？你没有看到最近几天我们主编的文章？”

“没有，我刚从布鲁塞尔来，

“你落后了，老朋友……”

“是居斯塔夫·埃尔韦写的文章？”

“埃尔韦不是愚蠢的梦想家……他的观点很现实……好几天前他就明白了战争不可避免，要是顽固反对，那只是发疯，甚至是犯罪……你找一篇他星期二的文章，你就会明白了……”

“埃尔韦，变成了沙文主义者？”

“你愿意说是沙文主义者也可以……干脆说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正直地认识到，我们不能责备政府有任何挑衅行动。所以结论就是：既然法国是被迫为自己的国土进行战斗的，在最近几个星期的法国政策中，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无产阶级的背叛行为是正确的。”

“埃尔韦这样说？”

“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写道这就是背叛！因为，我们必须保卫的国土，归根到底，是大革命的祖国！”

雅克停住脚，默不作声地注视卢韦尔。他仔细想了一下，也就不那么惊奇了。他想起埃尔韦曾经激烈地反对瓦扬和饶勒斯半个月前提交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讨论的总罢工建议。

卢韦尔继续说：

“你落后了，老朋友，你落后了……你去听听别处的人讲些什么吧……比方说，到《小共和国报》……或者到共和党俱乐部去，我昨天晚上曾经去过……到处众口一词……到处人们都睁

开眼睛了……并不单单是埃尔韦明白了过来……人民之间兄弟友爱，多么好听！但是，事实俱在，应该正视。你打算干什么呢？”

“干什么都行，与其……”

“挑起内战借以避免另一个战争吗？乌托邦！……目前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听信……在外国入侵的威胁面前，任何起义都要失败。即使在工人群众中心，即使在‘国际’的圈子里，大多数人，也会赞同全体人民，愿意保卫国土……举世一致的兄弟友爱，对，原则上不错，但在目前，这个原则退居第二位。今天，大家都怀有有限制的兄弟友爱感情：法兰西民族的兄弟友爱，老朋友！……况且，见鬼！我们老早就对普鲁士佬厌烦了！如果他们要来碰碰我们的话……”

广场上，有五六个报贩一边跑一边喊：

“《巴黎午报》！”

卢韦尔穿过马路去买报。雅克正想跟他去，一辆空的出租汽车开过他面前，他跳了上去。最紧急的，是先到珍妮家去。

“埃尔韦……”他厌恶地想着。“如果这些人都畏缩了，那么别的人，那些小百姓，群众，又怎么能坚持呢？他们每天早上，从所有的报纸上都读到，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反对普鲁士帝国主义的战争会一劳永逸地铲除泛日耳曼主义，因而是正义的战争，神圣的战争，是保卫民主自由的十字军东征！……”

到了天文台大街，他抬眼看看丰塔南家的阳台。所有的窗户都开着。

“她母亲大概回来了？”他心里想。

不对，只有珍妮一人在家。他一看到珍妮面色苍白，高兴得

不知所措，开了门，又退到前厅的暗处，就确定了这一点。她用焦虑而又温柔的目光看着他。他向她走去，本能地张开手臂。她哆嗦一下，闭上眼睛，扑到他的胸前。他们第一次拥抱……彼此都没有预先想到。他们只拥抱了几秒钟。珍妮仿佛突然意识到了严酷的现实，挣脱开去，举手指一指桌上摊开的一张报纸，问道：

“是真的？”

“什么？”

“动……动员令！”

他抓起她指着的那张报纸。这就是在车站广场上叫卖的那份《巴黎午报》。一个钟头，在巴黎各居民区卖出了几千份。吓坏了的看门女人刚给珍妮送上来的。

血涌上雅克的脸颊：

“昨晚，在爱丽舍宫召开军事会议……第三军团已火速调往边境……第八军团已领到被服、弹药、粮秣，待命出发……”

她看着他，满面愁容。突然，她克服了犹豫，低声问道：

“如果打仗的话，雅克……您去吗？”

五天来，他就等着这个问题。他抬起眼睛，坚决地摇摇头。

她想：“我早就知道。”接着，她克制着违反她的心愿并且使她慌乱的窘困，立刻又想道：“拒绝出征，需要很大的勇气！”

是珍妮打破了静默：

“来吧！”

她拉着雅克的手，领着他。珍妮的房门开着。她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让雅克进去了。他跟着她，并没有注意。

“也许现在还不是真的，”他叹了口气说。“但是明天可能就是真正的战争。战争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困，包围圈越来越紧。

俄国态度固执，德国也一样……每个国家，当政者都顽固坚持可笑的要求，都决不妥协，都拒绝和解……”

“不！”她在想，“这不是因为害怕。他很勇敢，他逻辑性强。他不应该跟别人一样，他不应该让步，他不应该出征。”

她不声不响，走到他身边，紧贴在他胸前。

“他会留在我身边！”她忽然想着，心里猛然一跳。

雅克搂着她弯下身去，吻着她那半掩着的额头。她被他紧紧搂住，感到浑身酥软。她要让自己又轻又小，好让他……她也不知道让他怎样——让他把她抱起来，抱走……她急于问他这次出门的情况，却又不敢。他的脸轻轻一压，就使她抬起脸来，他的嘴唇顺着她那长长的、光滑的脸颊，一直吻到她的嘴唇，她紧闭着嘴，并没有扭开去。在这持久的接吻中，她有点喘不出气来了。她用手隔开脸，要呼吸一下，上身也挪开了。她的面容意外地安静、严肃。她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清醒、负责和坚决。雅克又热情地把她紧紧搂住，但并不粗鲁。珍妮不胆怯也不反抗，任凭他拥抱。她不希望其它，只是愿意被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他们俩脸贴着脸，文静地搂抱着，坐在矮床上。这张床对着窗子，象是狭窄的长沙发。几分钟过去了，他们还是静静地不动。

“妈妈一直没有来信，”她小声说。

“真的……您的母亲……”

刹那间，珍妮有些怨他没有跟她一起担忧。

“一点消息都没有？”

“在维也纳车站写了一个明信片，日期是星期一。只一句话：‘平安抵达’。”

珍妮是在昨天星期三早上接到这张明信片的。以后，她焦

急得要死，不断去看信件，毫无结果，没有信，也没有电报……她作出种种猜测，但是没有确实答案。

雅克用漫不经心的眼光看着这间他还不认识的房子。若在几天以前，发现这间房子会使他非常感动。小小的卧室光线充足，收拾得井井有条，糊着蓝白两色条纹的壁纸。壁炉充作梳妆台，放着几把象牙柄的刷子，插别针用的线球，镜框的槽上嵌着几张照片。桌子上，放着合起来的白色皮面的带吸墨纸的垫板，除了匆匆折起的几张报纸之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散乱的。

他贴在她耳边轻轻说：

“您的房间……”珍妮没有回答。他又含含糊糊说：“我真不相信您的母亲还没有回来，……”

“您不了解她！已经决定的事妈妈从来不更改。现在她已经到了当地，她想进行的交涉非办完不可……可是她能办得完吗？您有什么看法？这个时候，在奥地利不危险吗，您说？会发生什么事？万一有些耽搁，人家还让她回来吗？”

“我不知道，”雅克承认。

“怎么办呢？我连她的地址都没有……杳无音信，这是怎么回事？我想，她如果已在归途中，是会给我打电报来的……所以，她大概还在维也纳，她肯定给我写了信，信也许在路上寄丢了……”她焦急地指指桌上的报纸说：“看到这些消息，真不能不发抖……”

珍妮一大早就跑去买来这些报纸，又慌忙赶回家，免得错过雅克回来的时间。整个上午，她把报纸读了又读，脑子里不断想着逼近的危险威胁着她的亲人：雅克、她的母亲和但以理。

“但以理给我来信了，”她说，站了起来。

珍妮从垫板里拿出一封信，递给雅克，然后又象一只忠实的

小动物似的，偎依在他身边。

丰塔南夫人出门，使但以理很是不安，信中没有掩饰。在这混乱的时候，珍妮一人待在巴黎，他也为珍妮的处境担心。他劝珍妮去看望安托万和埃凯夫妇，还叫她不要惊慌，一切自会顺利。可是，他又附笔说，他的那个师已处于警戒状态，估计今夜就会离开吕内维尔，也许以后几天他不容易给她音信。

珍妮把头靠在雅克胸前，抬起眼睛看他读信。他把信折好，还给她，看到珍妮在等待他说些鼓舞的话。

“但以理说得对：一切自会顺利……只要人民都明白过来……只要他们决心行动……就是应该朝着这个目的而努力……一直到最后，最后关头！”

他悬念的这事，这时又使他激动起来，他简要地叙述了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的示威游行，说到整个欧洲，人民毅然决然，众口同声呼吁和平，在这浪潮面前，他是多么感动。忽然，他感到待在这里很羞愧。他想起了同志们的活动，想起了今天各国社会党分部的会议，想起了他个人要办的事情——那笔钱，他要拿出来，尽早地交给党去使用……他抬起头，一面抚摸着姑娘的头发，一面又忧伤又坚决地说：

“我不能跟您在一起了，珍妮……我还有许多事要办……”

她没有挪动，但是他感觉到她猛地抽搐一下，看到她悄悄投来绝望的目光。他把她更紧地搂在胸前，吻着她那悲哀的脸。他可怜珍妮。看到他不知如何安慰的无言的痛苦，他突然感到事变的分量更加严重。

“可是，我不能带您一起去……”他轻声说，仿佛在出声地思索一样。

她一惊，大着胆子说：

“为什么不行呢？”

他还不明白她要干什么，她已经挣脱了雅克的怀抱，开了衣柜，拿出帽子和手套。

“珍妮，我已经说过……不行！您看，我有事情要办，要去看很多人……我得去《人道报》社……去《绝对自由报》社……还有别的地方……晚上，到蒙特鲁日……我在这些地方的时候，您怎么办呢？”

“我在街上等着，”她说，用的是恳求的口吻，使他们两人都感到惊异。任何傲气都丢弃了，这三天的别离改变了她。“要等多久，我就等您多久……我一点也不妨碍您……让我跟您去吧，雅克；让我跟您过一样的生活……不，我不向您要求这个，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要把我丢在这儿……跟这些报纸在一起！”

雅克从来没有感到过她对他这样亲近，这是个新的珍妮——战斗中的姊妹！

“我带您去！”他高兴地说。“我把您介绍给我的朋友们……您看吧，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蒙特鲁日，参加群众大会……来吧！”

“第一件事，就是把遗产的事办完……”一走到外面，雅克就从容地说。“然后，要弄清楚《巴黎午报》刊登的消息有几分真实。”

他的声调里充满了欢悦。姑娘跟他在一起，他觉得恢复了最好日子里那种热情。他挽着珍妮的手臂，带着她快步向卢森堡公园走去。

在代理处（就象在信贷银行各分支机构、储蓄银行和邮局

一样)，一大群人围住窗口，抢着把纸币兑换成金银币。交易所里两天以来就发生了恐慌。证券经纪人和大宗买卖的场外经纪人竭力向政府活动，想取得延期付款许可，必要的时候，把七月份的交割延期到八月底。

“您可以说是消息灵通啦，先生，”代理人满怀敬意，挤挤眼睛，对他说。“再过二十四小时，我们就几乎无法执行您的命令了！”

“我知道，”雅克沉着地说。

几个钟头以后，蒂博先生留下的可敬的家财中的一半——差不多二十五万法郎的南美股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无法结算清楚——通过斯特发尼，交到谨慎持重、有资格的人士手里。他们负责在今天二十四点以前，把这笔匿名的捐赠交给国际局使用。

五 六

差不多在同样的时候，安托万登上凯道赛的楼梯，来给吕梅尔打针。几天来，特别是部长回国以后，这位外交官日夜忙碌，精疲力竭，只好不再去大学街。然而，他过于操劳的身体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每天一针的刺激。他们商定大夫每天到部里来一趟。安托万对这桩麻烦事倒很高兴地同意了：在吕梅尔办公室里待上二十分钟，他就可以逐日了解外交方面的起伏变化。由于这种侥幸，他觉得自己成了巴黎城内消息最灵通的人士之一了。

好几个人在走廊和旁边的小客厅等着接见。可是传达认识大夫，就从一道小门把他领了进去。

“喂！”安托万从口袋里掏出《巴黎午报》说，“事情发展得很迅速？”

“啧……”吕梅尔站起来，皱着眉头说。“赶快把它毁掉吧……我们已经立刻辟谣了！政府要对这份无耻的小报起诉。现在，警察把没有卖出去的这一期报纸没收了。”

“那么，消息是假的了？”安托万问着，已经放下心来。

“嗯……不！”

安托万把诊疗箱放在办公桌的角上，抬起头，默默注视着吕梅尔。吕梅尔满脸倦容，开始慢慢脱衣服。

“昨天夜间，我们紧张得很，这倒确实……”由于疲劳，吕梅尔声音低沉，安托万听起来好象变了。“早晨四点钟，我们还都在加班，人人提心吊胆……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都被紧急召到爱丽舍宫，总理已经在那里。他们在两个钟头之内，确实考虑了……采取极端措施。”

“那么……还是没有采取？”

“最终还是没采取。还没有……从今天早晨开始，命令甚至预示着稍稍缓和。德国还费心正式通知我们说它不准备动员，相反，正在同维也纳和彼得堡进行积极的‘对话’。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很难首先采取行动冒险……”

“德国的行动，是个好迹象！”

吕梅尔看了他一眼，打断他的话。

“假装的，亲爱的！假装而已！做出克制的姿态，以便尽可能争取意大利支持中欧帝国。这种姿态实际上不会有任何结果。德国跟我们一样完全知道，奥地利再也不能后退，俄国再也不愿后退。”

“您说的这些，真令人骇异……”

“无论是奥地利，还是俄国……而且还有其它国家……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亲爱的，局势才糟成一团。几乎在任何国家，各国政府内部都有要求和平的意愿，但是现在，各国政府内部也有要求战争的意愿……受局势所迫，面对令人惶恐的假设，没有哪一国政府不这样想：‘不管怎样，这反正是一局要打下去的牌……说不定，是个可以抓住的好机会！’对！您很清楚，欧洲每个国家一向在暗中都有自己要达到的某种目的，在它们将被卷进的战争中，都有某种利益要捞取……”

“甚至连我们也在内？”

“在我们国家，连最具有和平意愿的领导人也在想：‘不管怎么样，这也许是搞掉德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机会。’德国想打破对它的包围；英国想消灭日耳曼的海军，想从德国人手里攫取他们的市场和殖民地。每个国家，透过他们仍然希望避免的灾难，却已经看见或许能够取得的利益……只要它能够爆发……”

吕梅尔的声音低沉而又单调。他好象说话说厌了，而又过于疲乏，没有力量住嘴。

“那又怎样？”安托万又问，他对等待和不确定一向感到生理上的恐惧，这会儿，简直宁愿知道战争已经宣布，他只要应征出发就是了。

“还有……”吕梅尔没有回答安托万的话，又接着说。但他又住了嘴，把手指插到浓密的鬓发里，两手托住额头。

半个月以来，从早到晚，总是谈论这些问题，听着对问题的阐述，他好象再也意识不到他所预示的形势有多么严重了。他站在那里，眼睑下垂，两手按住太阳穴，在微笑。衬衣的前襟垂在又白又胖、长着黄色汗毛的大腿上。他并不是向安托万微笑，

他的笑容暧昧，象是装出来的傻样儿，因为他想尽量不要显出“狮子似的”样子。在他肥厚的脸上，刻满了皱纹的、被汗水贴上灰白色头发的土灰色的额头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疲劳的痕迹。最近两夜他都是在部里过的。他的情况比疲劳更为严重，这戏剧性的一个星期的动荡，已经用完了，毁坏了，耗干了他的力气，就象一条鱼，被人家在水底下一忽儿东一忽儿西地拖了很久。多亏打针（还有，尽管安托万禁止，他每两个钟头嚼几片可乐果^①），他才能支持每天的工作，但总象昏昏欲睡的样子。上足了劲的身体机构还在运转，但是，他感到有某个最重要的器官早就该断裂；机器现在不再听话了。

他的样子很可怜。然而，安托万还要刨根问底，又问道：

“还有什么？”

吕梅尔一惊，抬起头，两手却没有放下来。他觉得他的脑袋嗡嗡直响，一碰就要碎，只要受一点打击就会裂开了。不，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那里面有个什么东西最终总会爆裂……这时候，他宁愿付出一切代价，牺牲自己的事业，牺牲自己的雄心，来换取半日的孤独，完全休息，无论在哪里都行，哪怕是在监狱里也好……

然而，他把声音压得更低，还是说了起来：

“还有，我们知道：柏林通知过彼得堡，只要俄国稍稍加紧军事动员，德国就立即下令动员……这就是一种最后通牒！”

“但是，有什么阻碍俄国停止它的动员呢？”安托万说。“昨天不是有人宣布，沙皇建议海牙国际法庭仲裁吗？”

^① 产于非洲的一种植物，属锦葵科，果实中含有咖啡因和可可碱，可用来制造强心及强壮肌肉系统的药剂。

“的确如此，只不过，亲爱的，事实是这样：俄国一方面侈谈国际仲裁，另一方面顽固地继续战争动员！”吕梅尔带着点冷漠的样子说。“他们开始动员的时候，不仅没有通知我们，而且瞒着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有些人说是二十四日，就是说在奥地利宣战前四天！奥地利动员前五天！……昨天晚上，萨佐诺夫阁下才明确地告诉我们，俄国正在加紧备战。维维亚尼先生——我认为他比任何人都诚心愿意花一切代价避免战争，现在是不折不扣地傻了眼。如果今天晚上，在彼得堡正式颁布战时动员敕令——总动员敕令的话，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惊奇！……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昨天夜里举行了军事会议……这实际上，比抽象建议海牙国际仲裁或者德皇和他的表兄弟沙皇据说不时交换的‘兄弟友爱’的函件要严重得多！……为什么俄国这样固执地坚持挑衅态度呢？是不是因为普恩加来先生出于谨慎，几次重申，只有德国军事干预的时候，俄国才能从法国得到军事支持？这是大家考虑的一个疑问……有人甚至暗示，彼得堡故意促使德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以便逼迫法国实践对盟国的义务！……”

他不响了，注意地看着膝盖，摸摸大腿。他是不是犹豫着，不愿说得太多？安托万却不这样想。他今天觉得，这位外交官再也无法掂量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普恩加来先生很利害，”他没有抬头，又说起来：“很利害……您就想想吧：我们驻彼得堡的大使就在当天夜里收到电令，要他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断然反对俄国动员。”

“那可太好了！”安托万天真地说。“我从来都不象某些人那样，认为普恩加来是愿意打仗的。”

吕梅尔没有立刻答话。

“普恩加来先生主要是想把我们应负的责任掩盖起来，”他出其不意地冷笑一下，低声说。“现在，您看，不管是不是晚了，不管将来事情会有什么变化，反正有这份电报在，它将留在档案里，证明我们的和平诚意……法国的荣誉不受损害……他干的正是时候……这一手很漂亮。”

电话铃低沉地响了起来，他拿起耳机。

“不行……您告诉他，说我不能接见任何新闻记者……不行，连他也不行！”

安托万考虑着说：

“但是，如果现在法国还想有把握地制止俄国动员，难道就没有比官方反对有效得多的办法？照您从前说过的来看，如果俄国的动员在德国之前，按照我们的条约，我们没有义务去支持俄国。那么，只要把这一点用某种口吻向您那位萨佐诺夫提醒一声，不就足以叫他放慢备战了？”

就象听到小孩子闲扯一样，吕梅尔温和地耸耸肩膀。

“亲爱的，往日的法俄条约还剩下什么呢？历史会证明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感觉到，近两年来，特别是最近几个星期来，由于斯拉夫人一贯口是心非，施展狡猾伎俩，也许也因为我们的领导人太宽宏太轻率，我们和俄国的盟约已经无条件地续订了……因而，法国预先就与它的盟邦的任何军事行动牵连在一起……而这并不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干出来的事……”他又低声加上一句。

“不过，维维亚尼和普恩加来的看法是一致的……”

“哼，”吕梅尔说。“一致，对，显然……有一个区别，就是维维亚尼一向抵制军界的影响……您知道，他就任总理以前，是投票反对三年军役制的一个……就在昨天，他到达的时候，好象还确

信一切都应该，也可以好起来。现在他怎么想呢？昨天夜里军事会议之后，他都变了样，看起来真可怜……如果我们宣布动员令，他提出辞职，我决不会感到惊奇……”

他一面说着，一面拖着步子走到长沙发跟前，侧身躺下，把脸埋在垫子里。

他继续用一本正经的腔调说，“亲爱的，我想，今天该打右腿了，对吗？”

安托万走过去给他打针。

静默了很长一会儿。

因为垫子捂着嘴，吕梅尔用含混不清的声音说：“最初，似乎是奥地利一贯破坏别人维护和平的一切努力，今天，显然是俄国……”他站起来，开始穿衣服。“所以，就是因为俄国这种不让步的态度，英国调解的新努力才没有得到积极成果。昨天，在伦敦，进行了严肃认真的工作，开始有了点眉目：英国提议暂时接受奥地利占领贝尔格莱德作为既成事实，作为奥地利拿到手的一个抵押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奥地利公开明确宣布它的意图。这至少是开始谈判的起点。只是，这尚需列强一致同意。而俄国已经断然拒绝同意，提出了绝对条件：要求奥地利正式停止在塞尔维亚的敌对行动，并且从贝尔格莱德撤出奥地利军队；这在目前，无异于要求奥地利后退，这是它决不能接受的！一切就又糟了……不，不，亲爱的，自己骗自己是没有用的。俄国按照一个不可更改的决定去行动，而这个决定不是昨天才有的……它再也不愿听从任何劝告，再也不愿放弃它期望有利可图的这场战争。它会把我们都拖进纠纷里……我们脱不开身的！”

他穿好了上衣，机械地向壁炉走去，对着镜子看领结系好没有，走到半路，又转过身来说道：

“您还以为我们中间有谁当真知道真实情况吗？谣言比真实消息多得多……怎么分得清呢？您想想，亲爱的，半个月来，外交部长们和参谋长们的各个办公室，到处电话铃响个不停，都要求立刻答复，不容筋疲力尽的负责官员有时间考虑研究！您想想，各国总理、部长和国家元首的桌子上，一小时又一小时，密码电报越堆越多，都是揭发邻国隐秘意图的！一大堆疯狂的消息，声明，互相矛盾，彼此冲突，一个比一个严重，一个比一个紧急！在这可怕的杂乱无章里，又怎么能看清楚呢？我们的秘密情报机构，送来这样一份绝密情报，揭露某种迫在眉睫的意外危险，如果急速采取某种反击，就可以予以挫败。但是，这个情报不可能核实。如果我们决定反击，情报却是假的，我们的主动行动就会使局势更加严重化，或者会引起对方采取决定性步骤，以致破坏即将成功的谈判；但是，如果我们不反击，而危险又确实存在呢？明天再行动就太晚了……整个的欧洲，简直象一个喝醉了的女人，在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的，雪崩似的一大堆消息底下，东倒西歪……”

他在房里踱来踱去，用笨拙的手整理假领。他也象欧洲一样，在混乱的思想底下东倒西歪。

“可怜的各国总理府！”他咕哝道。“大家都向它们扔石头……可是只有它们才能拯救和平。如果它们能把全部力量都用于争执的实质问题，也许可以达到目的，然而它们却用主要力量来顾全人的面子，维护国家的自尊！真可怜，亲爱的……”

他在安托万身边停住脚，安托万正默默地合上诊疗箱。

“还有，”他又说下去，仿佛不能制止住自己说出心里所想的，“今天，已经不只是外交家、政府人士来决定……在这里，在凯道赛，几天来，我们都感觉到，政治和外交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现在，每个国家里，有发言权的是军人……他们是最强的，他们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讲话，所有的军队外的行政权力在他们面前都得让步……对，甚至在最没有战争意图的国家，真正的权力也已经操在参谋部手里……既然事已如此，亲爱的……事已如此……”他胡乱摆摆手，那怪异的、傻呵呵的笑容又浮现在嘴唇上。

电话铃响了。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话机，看了一会儿。

“一组疯狂运转的齿轮，”他嘟囔着，没有把眼睛抬起来。“一组齿轮，它们自行联接在一起……我们向深渊滚去，就象一列制动器失灵的火车，从斜坡上急滚下来，在自身重量的推动下，一分钟比一分钟快，快得叫人头昏目眩……政局好象挣脱了一切羁绊……自己在跑，在跑，谁也驾驭不了，谁也管不了……部长也好，国王也好，都不行……随便是谁都不行……人人都觉得无可奈何，无能为力，解除了武装，受到了愚弄，又不知道是谁，用怎样的方法愚弄了我们。每个人都在干他自己说过决不干的事，昨天，他决不愿干的事……好象所有的负责人士都变成了玩物——我也说不清——好象是一些力量的玩物，一些神秘权力的玩物，这些力量和权力高高在上，在远远的遥控着这局牌……”

他把手放在话机上，迷惘的眼睛仍旧盯着电话机。终于他挺起身来，向安托万友好地点点头，然后拿起了电话。

“明天见，亲爱的……对不起，不送你了。”

五 七

安托万离开外交部，疲乏，激动，混乱。虽然今天要办的事

很多，还是决定先回家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出诊。他并不觉得这事当真可能，心里还是翻来复去地想：“一个月以后，说不定……被动员入伍……前途难卜……”

走进门洞，只见一个青年男子，从前厅出来，这人看着他，停住脚步。

是西蒙·德·巴丹库尔。

“那个丈夫，”安托万马上想，有了戒心。

他没有马上把西蒙认出来，虽然从前曾见过他很多次——去年，安娜的女儿上石膏的时候还见过。

西蒙表示歉意：

“我本来以为今天是您门诊的日子，大夫……我预约了明天，以防万一，但是我非常想今天晚上就回贝尔克去……如果不太打搅您的话，我想……”

“他要找我干什么？”安托万心想，满腹狐疑。他愿意象个老手一样，决不躲闪。

“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他不客气地说。“很对不起，我一整天都要出去看病……请跟我上楼吧。”

跟这个人肩并肩站在狭小的电梯间，呼吸和汗气都融合在一起，安托万强烈地感到憎恶，一种奇怪的腻味感觉使这憎恶更加强了，他反复在想：“安娜的丈夫……丈夫……”

“您看能够避免战争吗？”巴丹库尔突然问道，嘴上浮现出模糊的、孩子似的温顺笑容。

“我已经开始怀疑了，”安托万阴郁地嘀咕着。

那年轻男子的脸色都变了：

“真不可能，您看……真不可能到这种地步……”

安托万默不作声，转动钥匙串。他推开了房门。

“请进。”

“我来向您请教，我的小子盖特……”西蒙开始说。

他说出这跟他毫无关系的孩子的名字，显出的慈爱真令人感动。他早已爱她象爱自己的亲女儿一样，他仿佛要献出自己的一切，来治好孩子的病。他不住嘴地详细说明小病人的生活情况，据他说，孩子象天使一样耐心，忍受着上了石膏长久不能动弹的痛苦。她每天在户外待九到十个钟头。西蒙为她买了一头小白驴，拉她的小车穿过贝尔克街道到沙丘去。晚上，他给她读书，教她一点法语、历史和地理。

安托万领着巴丹库尔进了他的诊疗室，同时静静地听着。由于职业上的注意力，他又振作起来。他从对方夹七夹八的叙述里，尽量把有用的迹象集中起来，好了解小病人的身体情况。他把安娜完全忘了。只是当他看见巴丹库尔坐在他以前常让他的情妇坐的椅子上时，他才怀着异样坚定的感情想道：“在这儿，对我说话、对我微笑，把心里的话对我说的这个人，就是被我骗了、被我偷了的人，而他自己却不知道……”

最初，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身体上的不快，就象接触到不愿接触的东西，甚至有些厌恶。接着，西蒙忽然住口不说了，似乎有点窘困。安托万心中顿时产生了怀疑：“莫非他知道了？”

“我跑这一趟，不是来向您叙述我怎样照看病人的生活，”巴丹库尔这时说。

安托万的眼睛里不由得露出探询的神情，请对方继续说下去。

“是因为，现在，我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恼人的问题……写信，也许会产生误解……我情愿自己来看您，把事情弄清楚……”

“既然如此，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安托万飞速地转着念头。

静默了一会儿，在这个片刻里，他产生了许多极其荒诞的假设。

“是这样的，”西蒙终于说，“我不能确定在贝尔克休养是不是对于盖特完全合适。”他开始详细说明当地的气候。

据他说，复活节以后，痊愈的速度显著缓慢了。本地的医生支持在当地治疗本来是关系他切身利益的，可是连他也觉得滨海地区未必对孩子有好处。也许该到山上去？正好，于盖特的家庭教师玛丽小姐通过一些英国熟人得知东比利牛斯省有位年轻大夫是治这种病的专家，得到了令人惊异的成就……

安托万一动不动，观察着这张线条精致的脸，象山羊似的钩形的侧面，金黄头发，苍白的皮肉，连沙滩上的露天大气也没有晒黑。他好象是在听，在仔细掂量对巴丹库尔的建议是赞成还是反对。但实际上，他差不多没有听见什么。他想的只是安娜在她时间不长的几次知心话里对她丈夫所作的评断：是个毫无价值、背信弃义、自私虚荣、阴险恶毒的人。直到此刻以前，他接受了这种描述，一点也没有怀疑，因为安娜说起西蒙的时候，总是露出一种轻蔑的冷漠，这好象能保证她说的都是老实话。但是自从本人就在他眼前以后，他脑子里，许许多多混乱的想法就纠缠起来了。

“我是不是应该把于盖特送到丰罗默^①去？”巴丹库尔问。

“也许是个好主意……对……”安托万轻声说。

“当然，我也到那里去陪她。只要孩子好起来，我自己离城市远，孤独都没有关系……至于我的妻子……”说起安娜，一丝痛苦的表情掠过他的脸，很快就掩盖下去了，“她不常到贝尔克

^① 是法国东比利牛斯省的一个冬季休养中心。

来看我们，”他勉强作出宽宏的样子笑一笑，这样承认。“巴黎这样近，您明白……她总要接受朋友的邀请，不由自主地受社交生活的约束……但是，如果她也定居在丰罗默，在我们身边，也许她会很快忘掉她的巴黎……”

他的眼神里，仿佛掠过重建起亲密关系的幻影，但是，显然，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太相信。毫无疑问，他仍然痛苦地爱着那个女人，跟最初的日子一样。

“也许一切都会改变……”他说，意思很含糊。

安托万渐渐看清楚了，为什么安娜对西蒙的评价从表面上看还站得住脚，但是，他也越来越明显地确信，坐在他面前这张椅子上的人，从根本上说，同安娜所描绘的形象完全不同。安娜说他虚伪，自私，阴险，这些指责经不起五分钟的观察，只要亲眼一见，直接一接触，任何一个感觉多少有点灵敏的观察者，就会以明辨是非的直感，一眼看穿。恰恰相反，巴丹库尔的一点点的言谈，甚至笨拙的举止，都清楚地表现出他的正直、自然的谦逊和善良。“也许是个弱者，”安托万心里想。“谨小慎微，也许，是焦虑不安的人，是个傻瓜也说不定……要说的不忠不义的恶鬼，肯定不对！”

西蒙继续安详地独白。善良的目光里充满了信赖和感激。他解释说，他当然从来没有想过不征询安托万的意见就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他对安托万完全信任。他知道他有本领，又很热心。为了使安托万了解病情，作出决定，他甚至曾经希望大夫坐火车去一趟贝尔克，看看那个小病人，再坐下班车回来，虽然从目前时局看来，显然……

安托万现在注意听着。他刚刚下了决心，断绝同安娜的姘居关系。

当真是现在几分钟之内作出的决定，还是这个重大决定早已在他的意识里暗中酝酿了？这样作十分紧急必要，不可违抗，他就立即不经争议，顺从了这一必要，难道可以把这个叫作下决心吗？……如果他有时间剖析一下自己，一定会发现最近这些日子，他坚持地躲避安娜的电话，逃避她通过雷昂向他接二连三提出的约会，这里面已经隐藏着一个秘密，一个他没有意识到的要一刀两断的愿望。尽管政治在其中似乎没有起任何作用，他还是不得不承认，使欧洲动荡的悲剧跟他对安娜冷淡并不是完全没有关系；仿佛是他再跟这个女人来往，就跟他某些新的感情，与动荡着整个世界的局势不相调谐了。

归根到底，促使他赶快绝裂，并且在不知不觉中把决裂看作不可更改的既定事实的，还是西蒙来到了他的诊疗室。在他自己家里，面对着这个受愚弄的人，装出一副假冒忠诚的面孔来接待他，而对方却对他敬重、信任；看到这个人对于他一手制造的命运一无所知，还对他象对可靠的朋友一样说话，这真叫他受不了。他局促不安地想着：“这不行……不能这样……生活不应该如此……首先考虑我，对，我的消遣，我的娱乐……但是，隐藏在后面的，还有受牵连的一些人，一些人的命运，以骇人听闻的轻率被牺牲掉，就是因为有我这样的人，我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行为，所以世界上才有混乱、谎言、不义、精神上的痛苦……”

说来奇怪，自从他以某种坚定不移的口气，在内心中宣告：“安娜跟我，从此完结。”从这一刹那起，他就觉得一切都象魔法似的隐退了。对，真的，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可以一点不拘束地直视巴丹库尔了，对他微笑，对他大加鼓励，一再劝告。西蒙象个小学生一般怯生生地站起来嗫嚅着：“我觉得，我已经超过十分钟了。”这时，安托万笑着，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他一面

闲扯着，一面把西蒙送到楼梯口，甚至答应下星期到贝尔克去一趟。（他刚才这一会儿，什么都忘了，连战争也忘了……这时又突然记了起来。他想到，迫在眉睫的灾难势将打乱一切现存的道德标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能够胸怀坦荡地接受了这次不平常的会晤。“一个月后，说不定我们两个人都被打死了，”他心里想。“比起这个来，其它的一切还算得上什么呢？……”）

“您乘八点半的车，将近十一点到达兰格，到贝尔克来吃午饭，”西蒙完全放了心，已经在跟他确定时间了。

“除非有什么意外……”安托万也说定了。

那年轻人的脸变得苍白，抽搐起来。他把拳头在嘴唇上压了一会儿，刺心的绝望使他睁大了眼睛。这时，安托万清楚地看到，上校德·巴丹库尔伯爵，老胡格诺派的儿子，在他当兵的义务面前，害怕得发抖。

“如果我被动员入伍，于盖特怎么办呢？”西蒙说着，并没有看安托万。“她身边只剩下了密斯……”这时候，两个男人同时，并且也几乎是用同样的方式想起了安娜。

巴丹库尔静静地走到门口。在楼梯口上，他转过身来：

“规定您哪天入伍？”

“发布动员令的第一天……贡比涅第五十四步兵营，当军医助理……您呢？”

“第三天……在凡尔登，第四轻骑兵团作中士。”

他们友好地握了手，又最后一次点点头。接着，安托万轻轻地关上门。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茫然看着地毯。眼前不由得出现刺心的幻象，西蒙·德·巴丹库尔穿着骑兵中士的服装，领着他那一排人，在阿尔萨斯的平原上，在枪林弹雨中奔驰……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将他惊起。

“也许是她。”心里想着，他严峻地微笑起来，真想扑到电话机上去，马上结束一切。

在走廊的一头，雷昂摘下了耳机。

“对……八月七日星期五吗？很好……三点钟……是让岱教授介绍的？……好，先生，我马上记下来……”

安托万一面下楼，一面翻记事本，在二楼的楼梯口，一个熟悉的声音使他抬起头来。他推开门，朝放档案的房间走去。

斯图德勒和鲁瓦坐在那里争论。他们没有穿白罩衣，身边的桌子和椅子上散乱放着当天的报纸。

“好呀，孩子们，我们就这样工作吗？”

斯图德勒脸色阴沉地耸耸肩。

鲁瓦微笑着站起身来，疑问地看看安托万：

“您去看吕梅尔了，主任？”

“对，《巴黎午报》的消息是假的。政府已经辟了谣。但是，时局越来越坏……”停了一下，他又简洁地补充一句：“在深渊边上转圈子……”

斯图德勒喃喃说道：

“而德国人在准备！……”

“我们也一样，幸亏如此，”鲁瓦说。

静默了一会儿。

“拯救和平的最后机会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斯图德勒叹了口气。“但是，等到工人阶级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太晚了……在人民中间，关于战争，流行着一种可怕的宿命观点……这很容易解释，从小学开始，孩子们的思想就给歪曲了——由于

对他们谈论古代战争，光荣，旗帜，祖国……由于不断赞颂军队行列、军事检阅……——以后，又是义务兵役制……对于这些丧失理智的做法，亲爱的，我们今天要付出重大的代价！”

鲁瓦以嘲讽的神情听着。

安托万又拿起记事本，仔细翻阅。

“再见，”他突然说，戴上帽子。“出诊还没有完……晚上见！”

只剩下了两个人，鲁瓦站到哈里发面前：

“既然总有一天走到这一步，至少您得承认，现在局势看来并不太坏！”

“喂，不要说了，小家伙！”

“不行……您考虑考虑，这一次，不要有什么偏见！……总的来看，我们的处境相当不错……让战争先在俄国和德国之间爆发，这对法国大有好处，可以使我们肯定得到俄国人的帮助，可以使我们处于有支持的地位，而这向来是最占便宜的……另一方面，我愿意希望，我们也赢得了时间，可以不声不响地准备我们的动员，不致遭受我们参谋部最害怕的那种出名的突然袭击。这一切增加了我们的机会……”

斯图德勒看着他，默然不语。

“嗨！”鲁瓦说，“如果您还有诚意的话，您必定会同意我的看法：要结束过去的争论，重新振奋民族的荣誉，目前的时机选择得不坏！”

“民族荣誉？”斯图德勒控制住愤怒，低声吼道。

门开了，儒斯兰走进来。

“你们还在争论呀？”他疲惫地说。

（他穿着白罩衣。他不象别人一样，抱什么幻想。他十分明白，三个星期以后，他无疑就不在这儿了，看不见接种试验的结

果了。为这个试验，他已经干了整个一个上午。他把工作看作是一种义务，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首先，工作起来就可以不思考。”他对安托万这样说过，灰色的眼睛里带着忧郁的微笑。）

“这种愚蠢的陈词滥调到处都是！”斯图德勒耸着肩膀对他说。“这里是法兰西的荣誉！那里是奥地利的自尊！在俄国，又是要在巴尔干保卫斯拉夫的威信！……可是承认以前作得过头，从而保障人民的和平，不比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屠杀荣誉千万倍吗？”

民族主义者一贯认为只有他们自己高贵，不谋私利，具有英雄情操，看到这个，他很愤慨。他虽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却不是不知道，有多少革命战士，在全欧各国首都奋不顾身为反战而斗争，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具有造就英雄所必需的伟大的感情，牺牲精神，为了崇高理想而超脱自我的意志，热诚以及精神上的力量。

他没有看儒斯兰，也没有看鲁瓦，他那预言家似的炯炯的目光，凝聚而又专注。

“民族的荣誉！”他又嘟哝着说。“为了消除良心上的不安，所有崇高的词儿都用上了！……当然需要把这一切荒谬掩饰起来，制止良知的突然发作！荣誉！祖国！文明！在这些诱鸟的反光镜背后隐藏着什么呢？工业利润，市场竞争，政客和生意人玩弄手法，各国统治阶级贪得无厌！荒谬！维护文明吗？难道用最恶劣最野蛮的手段？放纵最卑下的本能？……保卫权利和正义的事业吗？用匿名的暗杀手段？开枪射击那些对我们毫无恶意的可怜人，而这些人也受同样的谎言的怂恿，来反对我们？荒谬！荒谬！”

“好哇，哈里发！”鲁瓦轻蔑地叫喊。

“算了，算了！”儒斯兰温柔地说着，把手放在鲁瓦的肩膀上。

对于马尼埃尔·鲁瓦，他们的小弟弟，儒斯兰跟安托万的感情一样，喜欢他，又说不太清楚是为什么。是因为他有沉着的勇气、纯真豪爽吧？在这迫不及待，干脆准备去牺牲的战士身上，他发现有一种美，对于这样的品质，恰恰是他这样习惯于实验室生活，喜爱抽象思维的人决不能无动于衷的。他尊重鲁瓦身上那种纯洁的理想，那种通过战争以求再生的纯朴信念——而这些显然是要用血来作代价的。

“荣誉……”他低声说道。“把道德标准引入绝无道德可言的领域，比如说使各国分裂的经济斗争，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就歪曲了一切，把一切都毒化了，也使一切讲求实际的妥协不能实现，而且，这样，只不过是把本不应该存在的东西，即各大商业公司之间的竞争之类，改头换面，变成了感情争执，意识形态纠纷，以至宗教战争！”

“一九一一年，卡约完全知道这一点，”哈里发急切地指出，“要是没有他……”

鲁瓦咄咄逼人地打断他的话：

“您大概更喜欢看到您的卡约到外交部，不喜欢看到他上重罪法庭？……”

“当然，如果他现在还在台上的话，我的小家伙，您知道，我们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要是没有他的话，您和您的朋友们那么盼望的全欧战争这件大好事，三年以前早就爆发，来为人民造福了！……他没有谈论民族的荣誉，他谈的是生意经。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紧紧抓住讲求实效的、能得实利的方面！……唯其如此，他避开了最坏的情况！”

儒斯兰看到鲁瓦眼睛里燃起一股恶意的光，赶紧来调解。

“我也觉得，在这类事情上，即使是固执地坚持各自的立场，也没有任何对立不可以通过外交协商，通过互相让步而得到解决。实际的利益比感情更容易使人妥协！……我也觉得，一个卡约……有些历史学家根据克娄巴特拉的鼻子①来决定一种命运，如果战争爆发，他们也会从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发现，在《费加罗报》报社射出的那一枪，有极大的重要性哩②！……”

鲁瓦很有信心地大笑起来：

“我现在不想答复，”他愉快地说，“让未来操这份心吧！”

五 八

“咱们跟他们一起走吧！”雅克对珍妮说。

他们十来个人在新月咖啡馆碰面，一起到蒙特鲁日去。马克斯·巴斯蒂安要在那里的大会上讲话。

（今天晚上，巴黎各区：克纳尔、沃吉拉尔、巴的诺勒和维莱特，社会党支部都组织了小型群众集会。在贝尔维尔区，瓦扬说过他要讲话；人们预料会发生斗殴。拉丁区的大学生们在布里埃剧院组织了集会。）

他们坐公共汽车到小堡，又换电车到奥尔良门，然后，换另一路电车到教堂广场，在这里，只好下车，步行穿过居民众多的街道，来到改作会场的剧院。

① 克娄巴特拉，公元前一世纪时埃及女王。她非常美丽，恺撒和安东尼先后爱上了她。有的历史家认为这些爱情纠葛对罗马帝国的政局有一定的影响。十七世纪的法国作家巴斯卡尔在《思想集》一书中，曾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如果她的鼻子再短一点，世界就会换一个模样了。”

② 指卡约夫人暗杀《费加罗报》主编。

这天晚上又闷又热，郊区的空气臭烘烘的。居民们吃过晚饭，都出来了，什么事都不干，烦躁不安。沿着各条大街，报贩在叫喊，在郊区兜售报纸的晚上版。

珍妮踉踉跄跄地走在这些古老街道的石子路面上，她觉得很累。丧巾的重量，还有在热气里发散出的染料的臭气，使她头痛起来。她穿着丧服，在这一群大多数穿着工作服的人中间，感觉到不自在，本能地把手套摘了下来。

雅克走在她身旁，发现她跟着走很吃力，可是他犹豫着，没有把手臂伸给她。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他待珍妮象同志一样，不时向她投去鼓励的眼光，一面跟斯特发尼谈论着《人道报》得到的最新消息。

斯特发尼的乐观依据的是工人运动，照他来看，工人运动又处于再次爆发的阶段。群众的抗议活动日益频繁。有社会党的宣言，有社会党议会党团的宣言，总工会的宣言，塞纳省工会联合会的宣言以及自由思想联络处的宣言。

“到处都在骚动，到处都在示威！”他肯定说，他那漆黑发亮的眼睛里发出希望的火花。

一位从威斯特伐利亚^①来的爱尔兰社会党人，在“新月”吃晚饭，告诉他说在德国冶金中心，埃森，克虏伯军火工厂的所在地，预计将爆发声势浩大的和平示威。这个爱尔兰人甚至说在一些私下的聚会上，有很多工人主张怠工，为了阻止帝国政府坚持好战的企图。

但是，在下午，发生了严重的惊慌。从德国传来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马上在编辑部传播开来。据说，德皇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要求萨佐诺夫就俄国动员问题加以澄清，作为答复的是俄国

^① 在现在联邦德国。

的动员只是局部的，但是再也不能中断，于是，就下令准备颁布动员令。足足两个钟头，人们当真以为大势已去。后来，德国大使馆辟了谣，措词很肯定，好象德国进行动员的消息实际上是假的。据悉，这个消息是《路标报》在柏林传布的。在边境这边，《巴黎午报》在附言中加以驳斥。这好象不断淋浴一样，使舆论维持着危险的狂热。饶勒斯特别怕这种恐慌症的恶果。他不断说，每个团体、每个家庭都应该向这种没有来由的恐惧作斗争，因为它使人的精神受到合法自卫的烦扰，为和平的敌人张目。

“自从他回来之后，你见过他吗？”雅克问道。

“见过，我刚跟他一起工作了两小时。”

刚从比利时回来，甚至还没有到社会党议会党团去汇报在布鲁塞尔对话的结果，“头头”就把他的同事召集到一起，着手准备预定八月九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代表大会。法国党有十天的时间来保证这次欧洲社会党代表大会获得成功，一个钟头都不能浪费。

他来到《人道报》激起了大家的热情。他这次回来，由于德国社会党的坚定立场，信心也加强了，对于得到的许诺十分信任，怀着新的热情去推动斗争。政府对于瓦格拉姆大厅事件的态度使他很气愤，马上决定坚决对抗，决定在下星期日，八月二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抗议大会，作为维护和平的人对政府的声势浩大的反击。

“坚持住，”雅克碰碰珍妮的手臂，说。“到了。”

她看到一小队警察，埋伏在一个门廊下面。几个年轻人在卖《工会战斗报》和《绝对自由报》。

他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那里站着一些人，成群结队在大说

大讲，迟迟没有进到剧院里去。可是，会议已经开始了，大厅里挤满了人。

“你来听巴斯蒂安讲演？”一个从会场里出来的活动分子对雅克说。“好象他被耽搁在总工会，不来了。”

雅克很失望，差一点转身就走。但是，照珍妮当时的情况，不能马上走。雅克不再管他的朋友们，领着姑娘向头几排走去，他看到那里有两个空位子。

支部的书记名叫勒福尔，主持会议。他坐在台上，一张铁桌子前面。

演说的人站在成排脚灯前，是蒙特鲁日区选出的市参议员。他反复指出，战争是一种“对历史潮流的反动”。

人们在邻座之间闲谈，好象并没有听演说。

“静一静！”主席不时叫喊，用手掌拍着铁桌子。

“您仔细看看人们的脸，”雅克小声说。“简直可以根据面相来区别不同的革命者，有的人下巴上带着革命的样子，有的人是眼睛里带着……”

“那么他自己呢？”珍妮想。她没有看左右邻座，而是仔细观察雅克的脸，他的下巴突出来，线条坚决，灵活的眼睛有些严峻，又刚强又明亮。

“您要发言吗？”她怯生生地小声问。一路上，她都想着这个问题。她希望雅克发言，好更加佩服他。但由于某种腼腆心理，她也有点怕。

“我不想发言，”他把手伸到少女的胳膊底下，回答道。“我在大庭广众之中说不好。我倒是讲过几回，总感到一些词在妨碍我，使语气不自然，没有表达出我的真实想法……”

珍妮最喜欢听他这样为了她而剖析自己。但是，她一般总

是觉得他关于自己所说的一切，她早就知道了。雅克说话的时候，她透过衣服，感觉到雅克温热的手扶着她的肘弯，她感到非常慌乱，只能想这个，想着这沁入肌肤的温热。

“您知道，”雅克接着说，“我总有一点撒谎的感觉，把我还不完全相信的事说得太肯定了……这种感觉叫人受不了……”

确实如此。但是，同样确实的是，他也从讲话中感到极大的陶醉，并且差不多总能在他的听众和他之间建立一种交流和一致。

讲台上，另一位活动分子，一个脖颈充血的胖子代替了那市参议员的位置。刚说头两句，他那男低音就抓住了听众。他对他的听众说了一大堆不容辩驳的公式，自己也没有办法清理出他思想的脉络。

“政权落到了人民的剥削者手中！……普选制是可怕的把戏！……工人是工业封建制度的农奴！……资本主义军火商的政策在欧洲的地板下面堆积了火药桶，马上就要爆炸了！……百姓们，你们愿意为了保卫克鲁索军火工厂股东们的红利而去卖命吗？……”

每次，他象挥动大棒一般，气喘吁吁说出短促的一句，听众就自动发出热烈的掌声。他是习惯于别人对他欢呼的；每说完一句，他就戛然止住，等着鼓掌，等它个一分钟，张着嘴巴，好象嗓子眼里钻进去了一只金龟子。

雅克向姑娘俯过身去：

“真蠢……应该对他们说的不是这些……应该让他们相信，他们是多数，他们有能力！他们模模糊糊的知道这一点，但是并没有真正感觉到。应该让他们通过直接的、决定性的经验知道这一点。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极其重要的是，这一次无产阶级必

须获得胜利！等到将来有一天，无产阶级根据事实看出，他们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给侵略政策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迫使政府后退，那时候，他们将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认识到他们任何事都可以干！到了那一天……”

这时，听众开始厌倦这第二个演说家毫无联系的公式了。剧院的一角，一小群人在私下讨论，说得越来越热闹，变成了争吵。

“静一静！”勒福尔书记大叫。“中央委员会有指示……党有纪律……肃静，公民们！……”

他显然担心发生混乱会引起警察干涉。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把会开完，别出乱子。

第三个演说者走到脚灯前面。这是今晚报名最后发言的人。暂时恢复了安静。这人名叫雷维·马斯，是拉卡纳尔学院的历史教授，由于写了些社会主义的文章，并且跟教育界论战，而出了名。他演说的主题是叙述七〇年^①以来的法德关系，旁征博引，提出问题，说了二十五分钟之后，才刚刚谈到萨拉热窝的暗杀。他谈到“勇敢的小塞尔维亚”，他发出的喉音，使得架在尖鼻子上的夹鼻眼镜不断抖动。接着，他又对比两个联盟集团，对比奥德之间的条约和法俄之间的条约。

大厅里厌烦的听众骚动起来：

“够了，说事实吧！”

“拿出行动纲领来！”

“怎么办？怎样阻止战争？”

“静一静！”勒福尔叫了一遍又一遍，越来越不安了。

^① 指1870年的普法战争。

“真烦人！”雅克贴着珍妮的耳朵说。“这些人到这里来是为了得到一个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口号，却让他们回家去的时候，脑子里塞满了外交史，感觉到这对他们来说太复杂……无可奈何，只能等着不可避免的命运！”

大家打断了演说：

“目前形势怎么样？他们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我们要知道真相！”

“对，真相！”

“公民们，真相吗？”雷维·马斯对着骚动的人群喊叫。“真相就是，法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两个星期来，面对帝国主义各国的纷争，法国出色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批评我们的政府的国内政策，但是我们的政府有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社会党的责任是不要使政府的任务复杂化！固然，我们决不把资产阶级写在他们纲领上的民族主义叫嚣当作我们的口号，但是，必须坦率说，必须向全世界大声地说：没有一个法国人会拒绝保卫自己的国土，反对外国新的入侵！”

雅克气坏了：

“听到了吗？”他又俯过身在珍妮耳边说。“再也没有比这话更能怂恿人民去打仗了！……只要让他们相信，明天德国马上就要进攻，就可以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

珍妮抬起蓝色的眼睛望着他：

“去发言吧，您！”

雅克注视着演说人，没有回答。他感觉到周围的不满在增长。他特别发现，在群众的犹疑不决中，有一股潜在的、大量的、有利于革命行动的狂热，不予以利用就是犯罪。

“好吧！”他决然说。

他突然举手，要求发言。

主席注意地打量他一会儿，然后，立刻转开了视线。

雅克拿了一张纸，草草写上他的名字，但是没有人递给勒福尔。

在越来越大的喧哗声中，雷维·马斯结束了他的演说：

“诚然，局势是微妙的，公民们，然而并不是绝望的，只要政府有人民的支持，就能有权威地维护受到威胁的和平！你们重新读一读我们伟大的饶勒斯的文章吧！在边界的那一面，蛮横地向我们寻衅的人们应该知道，在我们的政府首脑和外交家后面，整个法国的社会主义力量，一致支持和平，保卫权利！”

他整整夹鼻眼睛，跟会议主席交换了一下眼色，转身就溜到后台去了。他的几个私交，鼓了几下掌，掌声又为嗡嗡响着的抗议和不太大胆的口哨声打断。

勒福尔站着，使劲挥手要大家安静。大家以为他要发言，静了一会儿。他利用这个机会大声说：

“公民们，会议到此结束！”

“不行！”雅克在位子上大吼一声。

但是，参加大会的人已经转过身去，向通向死胡同的三个安全门涌去。弹簧座椅乱响，叫喊声，争论声，乱哄哄吵成一片，根本没有办法控制。

雅克激动得不能自制。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怀着诚意、寻求明确指示的人惶惑不安地离开这个大厅，不知道“国际”对于他们的期望！

他打开一条通路走到乐池边上，但是，舞台和大厅之间隔着这个黑洞洞的大窟窿，到不了台上。

他气得发狂。

“我要发言！”

他沿着乐池走到舞台一侧，一纵身，跑进包厢里，走到走廊，找到一扇通后台的小门，推开人群，终于闯进空无一人的舞台。他一直喊叫着：

“我要发言！”

但是，他的声音淹没在喧闹中，在他面前，灰尘飞扬的戏院空出了一大片，四分之三的人已经走了。他冲向那张铁桌子，用两个拳头疯狂地敲着，好象擂鼓一样。

“同志们，我要发言！”

在大厅里还没有走掉的人大约有五十来个，向讲台转过身来。

有几个人喊道：

“听他说！……静一静！……听他说！……”

雅克继续捶桌子，仿佛敲响了警钟。他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目光横扫大厅。他用整个肺部的力气，高声呼喊：

“战争！战争！”

大厅里突然静了一点。

“战争！已经向我们逼近，二十四小时之内，就可能在欧洲打起来！……你们不是询问真相吗？这就是真相！不出一个月，今天晚上到这里来的人，你们可能全部被屠杀！……”

他猛地一挥手，把遮着眼睛的一绺头发掠上去。

“战争！你们不愿意打仗吗？可是，他们愿意，他们！他们要把战争强加给你们。你们会成为牺牲品！但是你们自己也会有罪责！因为这一场战争，只有你们能够制止……你们觉得奇怪吗？你们大家都在想：怎么办？你们今天晚上就是为了这个才到这儿来的……好吧！让我来说！因为，还有一些事情好作！

要拯救和平，还存在一个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团结起来一致反战！拒绝打仗！”

他沉着了，异常能够控制自己，他提高声音，一字一顿，让大家听得更清楚。停了一下之后，他又说：

“有人告诉你们：‘引起战争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是民族主义的竞争，是金钱的威力，是军火投机商。’这些话都对。但是，你们考虑一下，战争是什么？仅仅是利害冲突吗？不幸的是，不对！战争，是人，是血！战争就是人民被动员起来，自相残杀！如果人民拒绝被动员当兵，人民拒绝互相残杀，那么，各国的部长、银行家、托拉斯大老板、军火商，就都没有能力发动战争！枪炮不会自己发射，要打仗就得有士兵。资本家就是指望使用这些士兵来为他们制造死亡，攫取利润。而这些士兵，就是我们！任何合法的政权，任何动员令，如果没有我们，不得我们的同意，没有我们的消极顺从，都行不通！我们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是我们命运的主人，因为我们是多数，因为我们有力量！”

突然，一切都在摇晃。一阵眩晕……一闪之间，想到自己所负的责任。他应该发言吗？他肯定掌握了真理吗？……就在这一瞬间，他顾虑重重，觉得完全灰心丧气，抵御不住了。

这时，剧场的最里面，一阵骚动，没有走得出去的人不再往外走，他们慢慢回来，走近舞台，就象铁屑被磁铁吸住了似的。一眨眼的工夫，他的焦虑不安平息了，消散了，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他心中的想法，他要对这些人说的话，又变得十分明确，不容置辩，而这些人，正默默地用询问的眼光仰望着他。

他向前迈了一步，在一排脚灯前俯下身子，叫道：

“不要相信报纸！新闻界在撒谎！”

“说得好！”有一个人在喊。

“新闻界是民族主义者豢养的！各国的政府，为了掩饰它们的贪婪，需要一个撒谎的新闻界来诱骗各国人民去自相残杀，说这么做就是为了神圣的事业而英勇牺牲，是为了保卫神圣的领土，为了权利、正义、自由和文明的胜利！……仿佛还有正义的战争！仿佛让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去牺牲、去死亡还能够保持正义！”

“好哇！好哇！”

朝死胡同开的最里面的三个安全门挤满了好奇的听众。他们被外面的人推着，不知不觉地走进来，坐到位子上。

“安静些！听呀！”有几个人轻声说。

“你们还能忍受一小撮罪犯，受他们自己制造的事态的鼓动，把千百万爱好和平的欧洲人扔上战场吗？……人民这方面从来不要战争！想打仗的只有各国政府！人民除了那些剥削他们的人以外，没有别的敌人！人民彼此并不是敌人！没有一个德国劳动者愿意离开自己的老婆孩子，放下工作，扛起枪，来狙击法国劳动者！”

听众中到处发出赞许的低语声。

珍妮转过身来。现在，听众有两三百人了，也许还不止。他们仰着脸听着。

雅克俯身向着这动荡的、一声不响的人群。他们在座位上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象是一个蚂蚁窝。一张张的脸他根本分辨不清，但是，从这所有人的脸上，发出一种呼吁，给予他一种使人慌乱的、担当不起的重要责任，然而同时，他的信心和希望的力量也增强了十倍。他还有时间想道：“珍妮也在听。”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怀着激情讲下去：

“我们难道就这样盘起手臂待着，愚蠢地等着让人把我们送

去献祭吗？我们难道还信任政府维护和平的誓言吗？是谁把欧洲投入目前这样挣扎不出的混乱中的？就是这些政府要人，首相大臣，君主帝王，用他们的密谋把我们带到灾难的边沿，难道我们会象疯子一样，希望他们的外交会谈能获得成功，从而拯救他们无耻破坏了的和平吗？绝不！和平，今天已经不能由政府来挽救！和平，今天掌握在人民手里！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

掌声再次打断他的话。他擦擦额头，停了一会儿，好象奔跑的人喘不过气来。雅克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感觉到了他的每句话都强烈地打动了人心，就好象使火药库爆发的雷管，每一句话都击中了只待这一冲击就会爆炸的暴动思想的军火库。

他向听众激烈地挥手，要大家静下来，问道：

“你们会说：‘怎么办？我们不要听人摆布！’……”

“好哇！”

“单枪匹马的话，我们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但是团结起来，紧紧联合起来，我们就任何事都能做！……必须明白这一点：国家生活，国家的稳定所赖以维持的平衡，全靠劳动者。人民掌握着最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罢工！总罢工！”

大厅最里面，一个强横的声音高喊：

“让普鲁士佬利用罢工来扑向我们吗？”

雅克惊得一跳，用眼睛找寻这个打断他话的人：

“正相反，德国的工人将和我们并肩前进！这一点我清楚！我从柏林来！我亲眼看见过！我看见了菩提树下大街的游行！我听到过他们在德皇的窗户底下高呼和平口号！德国的工人同你们一样已经准备好总罢工！他们之所以还在迟疑，就是因为害怕俄国。这是谁的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领导人的错，是我们与俄国沙皇制度结成荒谬联盟的错，这使德国加重了对俄国带

来的灾祸的恐惧。但是，大家想一想，什么最能保证德国人民的安全呢？也就是说，谁最能够阻止俄国投入战争？就是你们！就是我们，法国人，用拒绝打仗的行动！我们法国人决定罢工，就可以达到双重目的：一方面使沙俄不得进行战争，另一方面也可消除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亲密团结的障碍！在总罢工中亲如兄弟，同时宣布总罢工反对各自的政府！”

大厅中沸腾了，正要鼓掌。但是雅克没有给听众留出鼓掌的时间：

“因为只有罢工，这唯一的行动，还能使我们大家得救！大家想一想，只要我们的领导人一声号令，在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各个地方，国家的生活就会同时停止，全盘冻结！……罢工令一下，那就是说，刹时间，所有的工厂、商店、机关全都变得空无一人！在大路上，罢工工人纠察队截住给城市的食品供应。面包、肉类、牛奶统统由罢工委员会定量分配！停水、停煤气、停电。电车和汽车不开了，出租汽车没有了！不送信，也不送报纸，不接电话，不发电报！社会的一切齿轮一下子都陷于停顿！在街上，忧心忡忡的人群在游荡。没有骚乱，没有殴斗，只有静默和恐惧！……政府有什么办法对付呢？警察和数千名志愿兵怎样抵御得了这样的攻击？怎样临时拼凑起物质储备？又怎样把粮食分配给居民？连宪兵和军队都养不起，甚至支持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的人也恐慌万状，逼迫政府，政府除了投降之外，有什么办法呢？多少天……——不，我不说多少天，我只说多少小时——面对这种封锁，面对公众生活的完全停顿，政府能应付多少小时呢？面对着人民意志的这样的示威，哪个政府人士还敢考虑进行战争的可能性？哪个政府还敢把枪枝弹药分发给起来反对它的人民？”

现在，热烈的掌声时时打断他的每句话。雅克抖擞起精神，想压过这嘈杂声。珍妮看见他的脸涨得通红，下巴在抖动，脖子上的肌肉和血管紧张得凸了出来。

“已经到了危急时刻！但一切仍然取决于我们！我们手中的武器强大无比，甚至我觉得根本无须动用。如果政府确实知道全体劳动者将一致举行罢工，那么只要我们发出罢工的威胁，就足以在旦夕之间扭转把我们推向深渊的这个政策的方向……朋友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非常简单，非常明确！只有一个目标：维护和平！团结起来，丢开一切党派纷争！团结起来，一致反战！团结起来，拒绝打仗！团结在‘国际’领袖的周围！要求他们动员一切力量，组织罢工，准备进行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冲击。国家的命运，欧洲的命运就取决于这个行动！”

他的演说戛然而止。他觉得他演说的主旨忽然说光了。

珍妮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见他的睫毛在跳动，犹豫了一下，举起臂膀，挥动双手，嘴上漾起精疲力竭的微笑。他好象喝醉似的，转过身去，穿过布景片，走掉了。

群众在呼喊：

“说得好！……讲得对！……打倒战争！……罢工！……和平万岁！……”

欢呼声持续了好几分钟，听众还在那里站着，鼓掌叫喊，要把演说的人再叫出来。

演说的人到底没有出来，听众喧哗着，向出口涌去。

演说的人在昏暗的后台，坐在一堆旧布景后面的一个箱子上，大汗淋漓，情绪激动，疲乏不堪。他坐在那里，头发蓬乱，肘弯支着膝盖，拳头撑着眼窝。在这破灭之中，只有一个愿望，就

是尽可能地独自多待一会儿，躲开所有的人。

珍妮由斯特发尼领着，找了很久，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他。

雅克抬起头来，突然恢复了平静，向站在他面前的姑娘微笑一下。珍妮目不转睛地直视着他的脸，一句话也没有说。

“现在，得从这里出去！”斯特发尼在他们身后低声说。

雅克站了起来。

空无一人的大厅，黑洞洞的。已经从外面把门锁上了。但是，在舞台的一角，亮着一盏守夜的灯，照着他们走上一道走廊。走廊通向一个仆役们用的小门，在戏院后面。他们沿着一个放煤的地下室，走到一个堆满木板和支架的小院子。院子通着一条小巷，这时好象渺无人影。

但是，他们刚走出来，就从黑影里钻出来两个人。

“我们是警察！”其中一个人说着，一面象变魔术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文件夹，送到斯特发尼的鼻子底下。“可以把您的证件给我看一下吗？”

斯特发尼把记者证递给了警官：

“记者！”

警察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证件。他感兴趣的是那个讲演的人。

幸好，今天雅克同珍妮到处奔波的时候，到穆尔朗那里取回了他的文件夹。然而，那张用来越过德国边界的、日内瓦大学生的证件他却轻率地留在裤子口袋里了。“万一他们搜我的身……”他想。

警察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致，只是在路灯下，看了看雅克的护照，又用职业的眼光对证一下证件上的照片与本人是否相符，然后，润湿了好几次铅笔，在小本子上涂了几个字。

“定居的住址在哪儿？”

“日内瓦。”

“在巴黎住哪儿？”

雅克犹豫了一下。从穆尔朗那里，他原已知道，去德国以前他在白日街住的那间很安全的房间已经租出了。他还没有去找新住处。今天晚上，他想住到杜奈尔沿河路拐角贝纳丹街的一间带家具的公寓房子里去。他就说出了这个地址，警察记下来了。

然后，这人转向站在雅克身边的珍妮。她只带着名片，凑巧手提包里还留着一封但以理的信。警察没有刁难，甚至连姑娘的名字都没有记在本子上。

“谢谢，”他很有礼貌地说一声，用手触触帽檐，走开了，身后跟着他的那个下手。

“社会在设防了，”斯特发尼讽刺地说。

雅克现在微笑了：

“我的行踪已被注意……”

珍妮拉住他的胳膊，紧紧抓住，脸都变了样，用变了声的嗓音问道：

“他们要对您干什么？”

“没有什么，您瞧！”

斯特发尼笑了起来：

“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的证件全都合格。”

雅克承认：“我唯一有点烦恼的就是说出了里贝尔公寓的地址。”

“你明天把帐算清，住到别的地方去。”

夜里很热，小巷里发出一股臭气。珍妮紧紧挨着雅克，激动

得支持不住了。她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踉跄前行，扭伤了脚髁，要不是雅克扶住她，就要摔倒了。她停了一会儿，肩膀靠着一座仓库的一堵墙。她的脚很痛。

“哎，雅克……”她轻声说。“我觉得很累……”

“靠在我身上！”

因为她疲乏，雅克觉得她更亲近了。

小巷通到一条大街，喧嚷的人群正在散去。

“你们两个在这条凳子上坐下吧，”斯特发尼显出权威的样子吩咐道。“我，我先走了，好不会误了最后一班电车。市政府前面有一个出租汽车站，我给你们叫一辆来。”

三分钟后，来了一辆汽车，停在人行道边上，珍妮为自己的软弱感到很羞愧。

“真蠢，我满可以自己走到电车站的……”因为成了雅克生活中的累赘，她埋怨自己。她一向以为无需别人照顾才是荣誉。

不过，一坐进汽车，她就摘掉了帽子和丧巾，紧紧偎在雅克怀里。她顺着脸颊，感觉到他那温热的、男人的胸膛在怦怦跳动。她的头没有动，只是抬起手来，摸索着，找雅克的脸。雅克微笑了，她摸到他的嘴，感觉到他在笑。仿佛她这样作只是想确定一下他确实还在这里，她把手抽回来，又蜷缩在他的怀里。

汽车减慢速度，“已经到了？”她想，觉得遗憾。但是，她弄错了，他们没有到，她认出了奥尔良门，税收处。

她小声问道：

“您在哪儿过夜呢？”

“在里贝尔公寓。怎么？”

她要说点什么，但没有说。他俯下身去。她闭上了眼睛。雅克的嘴唇久久吻着她垂下的眼皮，在她耳边说着听不清楚的词

句：“小宝贝……亲爱的……小亲亲……”她感到温热的嘴唇顺着她的脸滑下去，擦过鼻翅，找到了嘴唇。她本能地抽缩一下。他不敢坚持，抬起头来，加强了胳膊的力量，更热烈把她搂在怀里。这一次，是她自己把嘴唇送过来。但是，他没有发现，他已经站起来，放开了手，开了车门。她这才发现车已经停了。停了几分钟了？她看到了楼房的正面，她家的门。

他先下去，扶她下车。当他付车钱给司机的时候，她好象梦游似的迈了几步，走到门铃旁边。她心中忽然有了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她母亲可能已经回来了……想起了丰塔南夫人，她感到浑身一震，觉得十分慌张。她用颤抖的手按了门铃。

雅克走到她身边，门刚刚打开，房门前面的灯也亮了。

“明天？”雅克匆匆说道。

她点点头。她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拉住她的手，双手紧紧握着。

“上午我不来……”他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我两点钟来，好吗？”

她又点点头，接着，把她的手从他那里抽回来，推开了门。

他看到她迈着僵硬的步伐走过被灯照亮的地方，头也没有回，消失在黑暗中。这时，他才把门关上。

五 九

雅克在里贝尔的公寓，睡得很不好。

在狭窄的铁床上翻来复去，不下二十次寻思着窗上透进的苍白光线是不是黎明最初的天光。他睡了两个钟头，从屈曲着的睡眠中醒来，浑身酸痛，心情不安。

外面，天终于亮了。

他穿好衣服，把不多的几件东西放在旅行包里，把证件包好，然后，把椅子拖到窗户跟前，坐了很久，臂肘支着扶手，脑子里什么都不能想。珍妮的形象在他眼前闪来闪去。他希望珍妮此刻在这里，在他身边，静静地一动不动，感觉到两人的肩膀相依，脸颊相偎，就象昨天晚上在汽车上那样……一离开珍妮，就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他看着在大街和沿河大道上，清洁工和送牛奶的人来来往往，早晨的生活又渐渐活跃起来。垃圾箱还在阳沟旁边排着。公寓对门，街角的一座房子，百叶窗都关着，除了夹层楼上一家卖瓷器的；玻璃窗后面，堆着无数包着稻草的小摆设：不成套的餐具、彩瓷花瓶、糖罐、小雕像和伟人胸像。楼下，在卖肉的犹太人的紫红护窗板上面，挂着一块希伯来文的金字招牌，雅克看了很久。

一到七点，他想到可以付一夜的宿费了。他出了公寓门，去买了报纸，坐在堤岸的一条长凳上看报。

空气还算凉爽。远处，闪亮的水汽在圣母院周围浮动。

雅克怀着憎恶和难以满足的贪婪把那些电讯和评论读了又读。各家报纸上的这些话，千篇一律，就象用几面镜子照出来的。

这一次，所有的报纸都发出警告，克列孟梭在《自由人报》上登出的文章题目叫做《在悬崖边缘》，《晨报》的头版通栏标题承认：《已到危急时刻》。

大多数共和派的报纸附和右派，指责法国社会党“在目前形势下”，竟然同意在巴黎组织一个维护和平的国际代表大会。

雅克还没有决定离开这条长凳，开始这新的一天……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然而，看了一遍报纸，他也就慢慢从麻木

中苏醒过来，与现实世界恢复了联系。很想一大清早就跑到天文台大街去，他心里斗争着。但是，他意识到这种想法来自他在生活中的松懈，而不是对珍妮的柔情。他感到羞愧。战争还并非必不可免，这一局还没有输掉，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在巴黎各居民区，这个时候，人们都起来去斗争……况且，他不是对珍妮说过，两点钟才到她家去吗？

到《人道报》社去还太早，但是到《旗帜报》去完全可以。不知道该把旅行包放在什么地方，托付给穆尔朗吧！

一想到得去看看这个老排字工，他就立刻站了起来。他要沿河步行到巴士底广场去。走一走会使他恢复镇静。

《旗帜报》社的大门关着。

“过一会儿再来，”他想。为了消磨时间，他决定到维达家去。这人是圣安托万关厢大街的一个书商，有一群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时常在这书店的后房开会。他们出了一个刊物，叫《红色冲击》。雅克在上面发表过德国和瑞士的书刊介绍。

维达一人在家，只穿着衬衫和背心，坐在窗子旁边的桌子前，正在捆小册子。

“还没有人来吗？”雅克问。

“你不是看见了嘛！”

维达恼怒的声调使他感到意外。

“怎么？太早了？”

维达耸耸肩：

“昨天也一样，我也没有看到很多人来。显然，他们都不希望被人注意……你读过这个吗？”他指指一本书问道。桌子上放了好几本。

“读过。”这是克鲁泡特金的《造反精神》。

“妙极了！”维达说。

“搜查过吗？”雅克问。

“好象是……这里，没有。至少目前还没有。可是，都准备好了，他们尽可以来……你坐吧。”

“我不愿意打搅你，我会再来的。”

在外面，他正准备穿过马路，一个治安警察彬彬有礼地走过来问道：

“您有证件吗？”

二十米开外，有三个人在人行道上站着，从外表看，很可能是警察局的便衣，他们在注视着。那个警察翻翻雅克的护照，什么也没有说，还给他，敬了个礼。

雅克点着一支烟，走开了，但是觉得很不安。“十二小时内检查了两次，”他想。“简直象戒严了。”他朝勒德律—罗兰大街走了几步，看看是不是有人盯他的梢。“他们还没有给我这么大的荣幸……”

他忽然想到现代酒吧去转转，因为离这个地方很近。这是特拉范尔塞街的一个咖啡馆，是一个特别活跃的社会党支部的活动中心。管财务的邦菲斯是佩里内幼年的朋友。

“邦菲斯吗？他有两天没露面了，”咖啡馆老板说。“并且，今天早上，我还谁也没有看见哩。”

正在这时候，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背上斜背着一把锯，走进酒吧间来，推着自行车。

“你好，欧内斯特……邦菲斯在吗？”

“不在。”

“别的伙计呢？”

“谁都不在。”

“啊！……没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还是在等着党中央的指示吗？”

“对。”

那个细木器工静静地，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周围。为了吐掉粘在嘴唇上的香烟头，他象鱼那样动了动嘴唇。

“真烦人，”他终于说。“总得知道一下……我被动员到 7-4 团，动员令第一天就得去。如果当真动员了，我不知该怎么办……你说呢，欧内斯特，要去吗？”

“不要去！”雅克嚷道。

“我不能告诉你，”欧内斯特阴郁地说。“这是你自己的事，小伙子。”

“同意去打仗就是跟一心要战争的人同谋！”雅克说。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事，”那人对咖啡馆老板说，表示同意，好象没有听见雅克的话。声调是满不在乎的，虽然很明显他六神无主。他不满意地向雅克看了看，好象心里在想：“我不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我只要知道党中央的命令。”

他一扭身，转过他的自行车，说了声：“回头见。”然后，不慌不忙，扭着屁股走掉了。

“他们最后都向我提同样的问题，真叫我心烦，”咖啡馆老板咕哝道。“我能说什么呢？据说，党中央里面，意见不能一致，不能发布指示。一个党，总该有个指示，对不对？”

回到《旗帜报》之前，雅克思索着，闲逛了一会儿。这时，这一带一刻比一刻热闹起来。沿着阳沟，摆着一排小车，装满了蔬

菜、水果，小贩在叫卖。一群工人和家庭主妇，为了避开阳光，涌到有荫凉的这边人行道上，这几条狭窄的街道变成了一个露天市场。

他发现针织品商店摆的差不多全是男人的用品，几乎没有顾及季节：针织的背心、法兰绒的腰带、粗棉布的衬衫、毛线袜子。有些鞋店用硬纸板或白布做出了临时的招贴，很引人注目。胆小的写着“猎鞋”或“旅行鞋”，有几个胆大的公然标出“军鞋”甚至“行军靴”。很多男人停住脚，显得很关心，虽然并没有买。女人们拎着买东西用的网兜，以备不时之需，偶尔摸摸料子，掂掂带钉子的军鞋。还没有购买，但都很注意，足以证明摆出这些东西是符合一般人所关心的事的。

越来越缺少小票子，开始严重妨碍交易。几个小贩，一变而为兑换钞票的人，胸前挂着个箱子到处走。他们在投机，一百法郎的大票只换给九十五法郎的零钱。警察好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法兰西银行昨天发行了一大批五法郎和二十法郎的票子，人们当作稀罕物互相传看。

“这么说，他们早就准备好了，”有人用不信任和怨恨的口气说，但是，又隐隐约约有赞赏的意思。

雅克终于走到巴士底广场的一家咖啡馆，在桌旁坐下来。从昨天起就没有吃东西，他又渴又饿。

从里昂车站、电车和地铁里涌出大批从郊区来的人。他们在阳光直射的广场上停一会儿，手里拿着报纸，脸上的神情又担心又好奇，四处张望，好象在上班以前要证实一下，战争的威胁在昨夜并没有把巴黎改变模样。

在咖啡馆里，人们忙忙碌碌，心神不定，不断来来往往，高声谈论着。

有个人说，他让他女人到区政府去问过他的预备役军人手册上动员表的详细规定。他好象因此而颇为得意地说，要满足公众的要求，兵役局问事处的人员必须增加两倍才行。

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笑着指指一份画报。那上面，在同一页上，面对面地登着两幅对称的、象征性的照片：德皇回到柏林和普恩加来回到巴黎。从图片上可以看到两国元首都踏在小汽车的踏板上，都行着军礼，来回答民众信赖的欢呼。

一对中年夫妇进来，走到柜台跟前。那个女人满脸惊恐的表情，打量着顾客，希望有人投来友好的目光。他们马上说起话来。

男的说：

“我们是从枫丹白露来的，那边事情要闹大了。”

他停住了嘴。

那女的更饶舌，解释道：

“昨天晚上，有人来通知跟我们住在同一层楼的第七龙骑兵团的一个军官，要他火速收拾行装。后来，半夜里，大家被马蹄声惊醒，骑兵接到了开拔的命令。”

“开到哪儿去？”收款的女人问。

“不知道。我们在阳台上。全城的人都在窗户口看。听不到喊声，也没有人说话，他们就象作贼一样往前走……没有乐队，都穿着作战军服……以后就过兵车，辎重装备，过不完……一直到早上。”

那男人又说：“区政府贴出了命令，征用骡马，车辆，甚至草料！”

“这都不是好兆头!”收款的女人用感兴趣,甚至满意的声调说。

“预备役的本土保卫军都征召了,”有个人肯定说。

“那些老头子?您想想!”

“妙极了!”伙计停住了手头的活儿,说。“好象是预先就需要有人看守桥梁,道口,总而言之,一切有危险的地方……我知道。我哥哥已经四十三岁了,住在夏龙^①附近,人家把他叫到火车站上,好象是在他脑袋上扣上一顶旧军帽,上衣外面给挂上子弹带,手里塞进一杆枪,吓,来吧!去给我到天桥上站岗放哨!您知道,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上桥得有通行证,要是没有,有命令开枪!好象是已经有间谍在眼前转哩。”

“我在动员令的第二天就得走,”一个穿白布衣服的油漆工人说,并没有人问他。他谁也不看,低着眼睛,看他手里转动着的小酒杯。

“我也是,”另外一个人说。

“我是第三天!”一个老老实实的胖胖的白铁匠喊道。“我是到昂古列姆去,你们想想,要赶在普鲁士佬在夏朗德地区的两省^②登陆之前!……”他假充好汉地一耸肩,背起了工具袋,工具袋在他腰间直摇晃。他走到门口,一边冷笑着说:“不过……我才不在乎哩……将来就瞧清楚了……不干这个,就去干毫无用处的事!……”

“该干的就得干!”收款的女人象教训人似的说。

雅克握紧拳头,一声不响,浑身紧张。他呆呆地看着这些

① 指马恩河畔夏龙,距巴黎 150 公里,是一个工业中心。

② 此处指夏朗德省和夏朗德滨海省,这个地区在法国西部,大西洋沿岸。

脸，想在上面找出些激烈的反应，可能造反的痕迹，但是没有找到。所有这些人，好象对于突然的形势发展猝不及防，所以他们首先感到晕头转向、手足失措，也许已经吓傻了，尽管还在吹牛，但是已经甘心忍受，或者差不多甘心忍受了。

他站起身，提起旅行袋，赶忙离去。他比任何时候都希望、都需要见到穆尔朗。

老排字工，两手插在黑色工作服的衣袋里，在他那夹层楼上的三间房里走来走去，房门全都开着。只有他一个人，他没有停步，叫道：“进来！”来客关上了门，他才转过身来。

“是你，小家伙？”

“您好！我可以把这个留在您这儿吗？”雅克说着，把旅行袋举起来。“几件衣服，没有任何标记。没有文件，也没有名字。”

穆尔朗略略点头，他的目光仍然愤怒而又严峻。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呢？”他突然问道。

雅克愣了，看着他。

“你不离开还等什么？你们还没有感觉到要出事了？笨蛋们！”

“您竟然说这种话！您，穆尔朗？”

“对，是我说的！”他用深沉的嗓音回答。

他把胡子里粘着的面包屑抖落下来，手揣进衣袋里，又走来走去。

雅克从来没有见过他脸色这样委顿，眼光这样失神。得等他这一阵脾气发过去。他不等主人邀请，拖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

穆尔朗象笼子里的困兽一样，转了两三圈，然后，在雅克面

前停住脚：

“今天，你还指望谁呢？”他喊着。“指望那些大名鼎鼎的‘工人群众’吗？指望总罢工吗？”

“是的！”雅克坚决地回答。

这位老基督猛地耸耸肩：

“总罢工？呸！今天有谁还提这个？有谁还敢想？”

“我！”

“你？就在不愿意得救而我们还要救他们的那群可怜的人中间，有一大批冒失鬼，爱打架的，生来就要出风头的，你难道还看不出来，他们早就准备接受挑战吗？他们的人数多得让人吃惊！只要有人叫他们相信，有个德国人越过了国界标，他们就会抢先朝他们的步枪扑过去……个别来看，每个人一般都是好人，自称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而且他们也相信这一点。但是，在他身上，还有吃人肉的人、破坏者的本性的残余，他并不以此为荣，还想掩盖起来，但是，这种本能无论如何还是使他心痒难熬，只要有一点机会，就想给以满足……人就是人，没有法子！……那么，如果不能指望任何人，你指望谁呢？领袖吗？哪些领袖？欧洲无产阶级的领袖？我们的领袖？我们那些可爱的当选人，社会党议员？你难道没有看见他们干的事？他们对普恩加来一次又一次地投信任票！他们差一点儿就会为他的宣战预先画押了！”

他转过身去，又在屋里绕起圈子来。

“不对！”雅克轻声说：“在这里，有象饶勒斯那样的人……别处，还有象王德威尔德、哈斯那样的人……”

“唉，你是指望领袖人物？”穆尔朗径直向他走来，又说。“你在布鲁塞尔仔细观察过他们！你说说，如果这些家伙是好汉，是当真决定以革命行动保卫和平的好汉，他们怎么没有同意给欧

洲社会党人一个统一的口号呢？不！他们破口大骂各国政府，让听众给他们喝采！以后呢？以后，他们就跑到邮电局去，给德皇，沙皇，普恩加来，美国总统，还给教皇发出恳求的电报！对，给教皇致电，让他用下地狱来吓唬弗朗索瓦-约瑟夫！……你的饶勒斯，他干了什么？他每天上午，象个懦夫，拉着维维亚尼的袖子，恳求他的这位‘亲爱的部长’提高嗓门去恫吓俄国！……不，工人阶级让他们自己的领袖欺骗了！他们不坚决领导起义去反对战争威胁，反倒让民族主义者有一切行动的自由，他们放弃了革命的机会，把无产阶级交给胜利的资本主义！……”

他走开了两步，但忽然又转过身来：

“另外，谁也不能使我打消这种想法，就是，你的那位饶勒斯在对公众神气十足地装样子！其实，他跟我一样清楚，木已成舟，一切都完了！明天俄国和德国就会登场交手！普恩加来将不动声色地接受战争！……首先，是因为他想履行他在彼得堡许下的罪恶诺言，其次……”他打断话头，走到门旁，轻轻地推开门，放一只灰色的母猫和三只小猫进屋来。“来吧，小乖乖……其次，是因为他迫不及待地想当一个使阿尔萨斯-洛林复归法国的人！”

他走到窗子中间的摆满书籍和小册子的书架旁边，拿下一本书，用手掌轻轻地拍了又拍，就象亲切地拍马脖子一样。

“你看看吧，小家伙，”他用更为温柔的声音说，同时，又把书放回了原处，“我不想自吹自擂，但是我不大会看错。在巴塞尔大会之后，我写了这本小册子，向他们证明他们那个‘国际’的基础是模棱两可的东西。饶勒斯痛骂我一顿，大家也都骂我。今天呢？事实正是如此……想使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国际同仍然到处掌权的民族主义的力量‘调和’起来，那简直是发疯……想要

斗争，希望得到胜利，却不突破合法的框框，只满足于向政府‘施加压力’，把攻击只限于在议会发表漂亮演说，这是愚不可及的蠢事！……你要我对你说清楚吗？我们那些大名鼎鼎的革命领袖，十分之九的人，决不可能下定决心超出国家体制的范围去行动！那么你懂得这个逻辑吗？他们不能、也不愿意及时打翻这个国家体制，让社会主义共和国取而代之——当第一个普鲁士枪骑兵出现在边境的时候，他们只要用他们的刺刀尖来保卫这个政权就是了！他们现在正悄悄作着准备！……想不到将来应该看清这一点！”他愤愤地说着，再一次转过身去，快步走到房间的另一头。“那将是总叛变，我告诉你，是居斯塔夫·埃尔韦式的叛变！所有的领袖，从上到下！……你看报纸了吗？祖国在危险中！大家起来，挥起大刀！咚咚隆隆！敲起战鼓，准备大厮杀！……不出一星期，在法国，也许在全欧洲，头等的社会主义者只剩下不到一打，到处就只剩下社会沙文主义分子了！”

他快步走向雅克，把青筋暴露的手放在他的肩上：

“就是为了这个我要告诉你，小家伙，你该相信穆尔朗的话，快走吧，不要等了！回到瑞士去，在那里，象你这样的小伙子也许还有工作可做。但是在这里，完蛋了——全部完蛋了！”

雅克从穆尔朗家出来，感觉到不可克制的不自在。到哪里去寻找安慰呢？

他跑到《人道报》社去。

但是，斯特发尼和加洛正在跟头头开会。雅克在两道房门之间遇到了卡迪约，这人一边跑着一边赶紧对雅克大声说，饶勒斯刚刚受到两位政府成员——马尔韦和阿贝尔·菲里的接见，他回来的时候，肯定说还不必失望。

雅克刚离开他，就遇到加洛的年轻同事帕热斯。他很悲观。俄国好象是加紧了备战活动。据信，沙皇昨天晚上秘密签署了具有决定性的诏书；总动员令，这传言已从各方面得到证实。

在新月咖啡馆，雅克只进去待了一会儿。除了于莉大妈之外，没有碰见一个熟人。她坐在厅堂的一角，好象在主持一个小型的妇女会议。她坐在一个漆布的长椅上。对于她的小腿来说，椅子显得太高。这位狂热的老太太没有戴帽子，灰色的头发垂在脸周围。她指手划脚地在一群女活动分子中间大说大讲，这些人大概是她召集来向她们灌输革命理论的。雅克装作没有看见她，溜了出去。

在幽径街的进步咖啡馆，已经有几个人，坐在烟雾腾腾的中二楼，评论当天的传闻。有拉贝，朱姆兰，贝尔特，和一个新来的，是个南锡人，默尔特—摩泽尔省工会的书记，他早上刚到巴黎，带来了东部地区的消息。

一个路上跟他一起来的德国社会党人告诉他，昨天晚上在柏林举行了军事会议。会上决定召开联邦内阁会议。在德国，人们预料今天会有“重要的决定”。摩泽尔河上的桥梁已经由德国部队用武力占领。随时会发生不测事件。昨天，在吕内维尔附近，德国的轻骑兵挑衅地越过了边界，深入法国领土几百米。

“在吕内维尔？”雅克问道，忽然想起了但以理，也想起了珍妮。

他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那个南锡人还说，好几个夜晚以来，东部地区所有的铁路线上，川流不息地驶过返回各大站的空车皮，为了集中到巴黎郊区备用。

雅克不说话，心里很难过。他仿佛看到欧洲正在致命的斜坡上滑下去，就象一幅真实的图景。还有什么奇迹能够挽回局

势，唤起舆论，促使各国人民掀起规模巨大的、激烈的反战运动呢？

忽然，他想去找他的哥哥。这一星期还没有见着他。正是吃午饭的时候，能在家里找到安托万。“而且，”他想，“我去找哥哥，可以在那儿等着去珍妮家的时间。”

六〇

“雅克先生知道要打仗了吗？”雷昂问。他是在开玩笑吗？他疑问的声调和他突出的眼睛一样，都傻呵呵的，但在掀起的下唇上，也显着些狡狴。没等雅克回答，他又说：“我在第四天就得出发。不过，我还是勤务兵……”

听到楼梯口电梯的栅栏门在响。

“是先生回来了，”雷昂说着，过去打开了门。

安托万推着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的肩膀。那人头发灰白，穿着细呢的常礼服。雅克认出，这是他父亲从前的秘书。

夏斯勒先生一看见他，惊得一跳。他只要一看见熟识的面孔，就用手捂住嘴，好象要压低吃惊的叫喊：

“啊，是您！”

安托万心不在焉地握了握弟弟的手，对他在这里并不显得奇怪。

“夏斯勒先生在人行道上来回走，等着我……我要他上楼来同我们一起吃饭。”

“只此一遭，下不为例，”夏斯勒先生谦卑地啜囁着。

安托万转身对仆人说：

“可以开饭了。”

他们三个人都走进诊疗室，斯图德勒、儒斯兰和鲁瓦已经聚集在那里。书桌上堆满了摊开的报纸。

“我来晚了，因为从医院回来之后，我到凯道赛去了一趟，”安托万解释道。

寂静了一会儿。大家都看着他，面色阴沉。

“怎么样？”斯图德勒终于说。

“不妙……非常，非常不妙……”安托万干脆地说。他灰心丧气地板着脸，摇摇头。接着，他提高声音说：“吃饭吧！”

他们忧心忡忡地吃完煮鸡蛋，没有人打破沉默。

“照吕梅尔所说的来看，”安托万忽然开口，眼睛并没有从盘子上抬起来。“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英国站在我们一边，至少，不反对我们。”

“那么，”斯图德勒问道，“为什么英国不赶快声明？说不定还能挽回颓局！”

雅克克制不住了：

“为什么？因为完全不能肯定英国希望挽回颓局……显然，英国是唯一有可能在这次大战的赌博中获利的国家……”

“你错了，”安托万激动地说。“看来，在伦敦的上层人物中间，没有一个愿意打仗。”

在安托万的右边，夏斯勒先生坐在椅子边上听着。他无论坐在什么地方，总象坐在戏院的折椅上一样，头还转来转去，用焦虑不安的眼光注视着说话的人，连吃饭也忘了。世上的纷扰超出了他的理解力，也超出了他神经的承受能力。从前天开始，看报纸，听人谈话，更增加了他病态的恐惧。可怜的家伙受不了了。今天上午到这里，是希望听些消息好放下心来。

安托万用听来显得有些虚假的说教口气说：

“目前，英国内阁是由一些真正拥护和平的人组成的，而且，看来是欧洲最优秀的政府班子。格雷是个深思熟虑的人，八年来一直掌管外交。阿斯吉斯和邱吉尔深谋远虑，为人正直，哈尔顿十分活跃，通晓欧洲局势。至于劳合·乔治，他的和平主义是有口皆碑的，他一向反对加强武装。”

“都是些出类拔萃的人，”夏斯勒先生表示同意，仿佛他早有定见了似的。

雅克采取守势，看着哥哥，自己一声不响，继续吃饭。

“英国由这些人领导，一点也不想去冒险，”安托万下了结论。

斯图德勒再次插嘴：

“那么，十天以来，格雷为什么一直竭力玩弄外交手腕对事件粉饰修补呢？既然唯一确定能使中欧帝国让步的办法就是警告他们：一旦发生战争，英国就要跟他们对立。”

“是啊，正是这样，昨天格雷跟德国大使会谈的时候，看来就是这样说的。”

“又有什么结果？”

“没有……还没有……不过，凯道赛人士害怕英国现在宣布已经太晚，不会起什么效果了。”

“自然了，”斯图德勒咕哝道。“为什么等了这么久呢？”

“你放心，这决不是偶然的，”雅克暗中讽刺地说。“在欧洲掌握政权的狡猾的政客当中，格雷似乎是最……”

“吕梅尔完全不是这么说的，”安托万不高兴地打断他的话；“吕梅尔在伦敦当过三年随员，跟格雷时常有往来。他作为了解情况的，常谈起这个人。他谈起这个人，谈得很有见地。”

“就是这件事招人喜欢，”夏斯勒先生咕哝一句，声音低得象

是对自己说的。

安托万不响了。他一点也不想争论，甚至不想把从外交部听来的话告诉大家。他很疲乏。昨天一晚上，他都跟斯图德勒一起整理医学笔记的卷宗。他要把他的档案整理得井然有序，以防万一。哈里发走了之后，他又到书房里去，把私人信件烧掉，把个人的证件分类整理好。到了清晨，他才睡了两个钟头。睡醒后，立刻看报纸，这又使他焦虑不安。整个一上午，跟别人谈话，所有人的悲观和慌乱不安都使他更加焦躁。今天早晨，来看病的人特别多。他从医院出来就精疲力竭了。再加上跟吕梅尔的谈话叫人十分丧气……这一次，他的精神确实受到了严重打击。他的生活正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痛苦惶惑却动摇了这个基础。面对着人类放纵出来的这许多恶劣本性，他忽然觉得精神无能为力，他觉得他勤奋生活一向依据的美德：恰如其分、崇尚良知、发挥智能、阅历和正义感等等，都毫无用处了……他本来愿意一个人待着，好好考虑考虑，向消沉作斗争，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去迎接不可避免的事变，但是，大家都转脸看着他，好象期待他说点什么。他皱皱眉头，抖擞起精神，继续说下去。

“这个格雷，看来是持重的英国人的典型：有些多疑，谨小慎微，不太大方，但在思想和行动上都非常忠诚。跟你的看法完全相反，”他对弟弟说。

“我按照他提出的政策来评价他，”雅克说。

“这个政策，吕梅尔很赞赏地解释过！可是，问题太复杂，他作的阐述，我显然不能都记得……”他叹了口气，用手摸摸额头，又说：“首先，格雷还不能不受约束地公然跟法国结成巩固的联盟。因为在英国内阁中，还有一些倾向于德国的人，例如哈尔

顿。至于英国人民，一直到最近几天，更多关心的是爱尔兰的纠纷，对萨拉热窝刺杀案的后果反倒不太注意。为了保卫塞尔维亚，跑到大陆上去打仗，这样的主张，他们是会断然反对的……所以，格雷即使想在更早些的时候使英国更明确地介入冲突，他的同事、议会和人民势必都不会跟他走。”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在平常吃午饭的时候，是不常见的，他一口喝掉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他又接着说。“问题总还有个心理因素。看来，好象格雷从一开始，就完全意识到了英国掌握着战争或是和平的关键，但他也了解他手中的武器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你们想想，如果英国政府在一个星期前，就公开保证给予法国和俄国以军事支持……”

“那么，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柏林改变口气，”斯图德勒打断他的话。“德国就会打退堂鼓，迫使奥地利缩回爪子，那么，一切就可以通过总理府讨价还价，和睦解决了！”

“有这样的可能，不过也并不一定。格雷好象也很有理由担心出现相反的情况：如果俄国确实明白它不仅可以指望法国的军队和钱，还可以指望英国的舰队和钱的支持，有了这样的一些王牌，俄国冒险的欲望当然会变得不可克制了……”他向雅克那边看了看，又说：“从这方面来看，格雷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这就不难懂得，正是他真正希望维护和平，才促使他采取了这种维持平衡的手法。他对法国说：当心，请你们对俄国进行干涉，俄国要把你们拖到一场纠纷中去，你们要记住，在这样的纠纷中，你们不要指望我们的帮助。同时，他又对德国说：注意！我们不赞成你们这种不退让的态度。不要忘记我们在北海的舰队已经动员起来，我们也没有答应过任何人要保持中立。”

斯图德勒耸了耸肩膀：

“不管他怎样小心谨慎，你那位格雷也许只是个天真的大孩子罢了。因为俄国通过它的情报机构，必定知道伦敦向柏林发出了威胁。这自然会促使俄国指望英国的帮助。而同时，德国的反间谍机构，也会把英国对法国和俄国说的并不怎么令人鼓舞的话向柏林报告……这样，德国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认真对待英国的威胁……维持平衡，归根结底，利用这种办法只不过是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

其实，这差不多就是吕梅尔的结论，但是，安托万没有说出来。他小心翼翼地把一般的消息同外交官在随便谈话中告诉他的个人看法和心腹话区别开来，一般的消息他才觉得可以转告他的同事，不算泄密。雅克在场使他比平素更加慎重。所以，他不想告诉他们，在上层人物中间，正在考虑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直接和紧迫地向英国吁请支持，可以用某种方式，比方说由共和国总统向英王乔治写一封私人函件。同样，安托万也竭力避免提到某一具体事件，据吕梅尔说，这一个事件使格雷昨天跟德国大使的会谈中，终于决定把英国的剑投入天平。看来，德国在前天，二十九日，干了一件大蠢事，他们大体上可能对伦敦明说了：“答应我们，英国持中立态度。在我们胜利之后，我们保证尊重法国领土完整，我们只把它的殖民地夺过来。”再加上他们还拒绝保证一旦发生冲突，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这种傲慢不逊的言词，据吕梅尔说，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的愤慨，使内阁全体成员思想上转而亲法，更加明确地促使英国政府倒向法俄一边。

雅克听着安托万的叙述，没有反驳，但是，他并不让步。

“在这一切之中，”他说，“我觉得吕梅尔好象有点把问题主要的依据忘得太多了。”

“是什么呢？”

“那就是，十年前，英国还是无可争议的海上霸主，如果它没有办法用一切代价阻止德国舰队加速发展的话，英国马上就会沦为第二流的海军强国。事实就是这样，这是人人尽知的。照我看，无论如何这却比格雷的良心考虑和他心理上的犹豫更能说明问题。”

“对！”斯图德勒又添了一句。“巴格达铁路事件^①在英国政策中起了什么作用呢？德国要控制联接君士坦丁堡和波斯湾的线路，也就是说直通印度的线路，这是用生死攸关的竞争威胁苏伊士运河！”

“这些又能证明什么呢？”年轻的鲁瓦漫不经心地问。

“证明什么呢？”夏斯勒先生象回声似的重复一句。

“证明英国有压倒一切的理由，希望打一场战争，削弱德国的力量，”雅克回答说。“依我看，这就使整个问题都明白了。”

“英国一点一点地已经跟拿破仑在一起了，”夏斯勒先生巧妙地指出。他又愉快地微笑着说：“真的，要说打仗，拿破仑一世是个战略家，德国从来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大家都不吭声，每个人的眼神里不引人注目地显露出讽刺意味，但又很快地消失了。

“尽管如此，”儒斯兰问雅克，“您难道不认为我们还可以信任英国首脑人物目前的和平主义吗？”

“我不这样认为。德皇宣布：‘我们的前途是在海上！’这就

^①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奥斯曼帝国在经济上日益依附于欧洲列强，1879年，土耳其宣布财政全部破产，在1881年与各债权国达成的协议中，奥斯曼帝国将各种财政经济权利租让给列强。德国攫取到修筑巴格达铁路的租让权，这样，它可以实现将它的势力从柏林经巴尔干半岛一直伸展到巴格达的所谓“三B计划”，这对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势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是向英国提出了挑战。在我看来，我觉得英国现在正在接受这一挑战。英国的利益在于希望压倒在欧洲唯一能够妨碍它的国家。我觉得格雷虽然非常明了俄国的意图，虽然频繁进行各种调解活动，他其实一点也没有幻想会产生实际效果。我觉得，他是不断故意地改变骗人的手法；我觉得，实际上，英国政府最终还是认为，使这场它所需要的战争必不可免，正是一大幸事。它需要，需要这场战争，但它还不敢，也许永远不敢自己首先发动。”

他瞧瞧哥哥。安托万正在削水果，好象对争论已经不感兴趣。

斯图德勒转过身来对鲁瓦说：“一九一一年，英国就已经在摩洛哥问题上，恶毒地使法德关系更加紧张。如果不是卡约……”

雅克的眼光落在鲁瓦身上。他坐在大桌子的一头，听到卡约的名字，突然抬起头来，人们看到他那年轻人的牙齿闪了一下光。

这时，方才好象心不在焉的儒斯兰说话了。他本来正心不在焉地用叉子尖和刀尖削盘子里的鲜杏子皮，现在不削了，用亲切的目光顾视全桌，说道：

“你们知道吗，我在想象将来的历史学家会怎样叙述我们现在的历史？他们会说：‘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夏季里的一天，欧洲中部突然发生了大火。火源在奥地利。柴堆早已在维也纳精心准备好了……’”

“……但是，”斯图德勒打断了他的话，“火星是从塞尔维亚来的！由一阵直接来自彼得堡的、强劲而奸诈的东北风吹了过来。”

儒斯兰接着说：“紧跟着，俄国人就往火上煽风！”

“……而法国又使人不解地表示赞同……” 雅克指出。“于是，这两家就一起往火堆上扔出大批早已晒得干干的小柴捆！”

“那么德国呢？”儒斯兰问。没有人回答，他就又说：“德国在这个时候，只是冷冷地瞧着火苗升腾，瞧着火焰熊熊飞扬……它这样干是不是两面派呢？”

“正是！”斯图德勒喊。

“不对。也许是因为蠢，”雅克插嘴说。“因为蠢，因为傲慢！它疯狂地自吹自擂，说他能够及时限制住火焰，使烧掉的只好烧掉，抢救留下来的部分！”

“……而且它在火中取栗，”鲁瓦说。

“这些事情，本来是都不该有的，”夏斯勒先生悲哀地低语。

儒斯兰又说：

“还有英国……”

“英国，”雅克叫道。“我看，这很简单。它一开始就准备了大量的水，足以扑灭火灾。但是，使局势更加严重的是，英国明明看见火烧了起来，并且在蔓延，只是大喊：‘救火呀！’它自己却小心地不把水阀打开！……尽管它把自己打扮成爱好和平的样子，这种做法仍然势必使它成为放火者的阴险同谋，受到子孙后代的审判！”

安托万埋头对着盘子，好象没有听见。

哈里发睁大湿润的眼睛，转向雅克：

“有一点我不能同意您的看法，就是德国的态度！”他不能控制心中难言的烦闷，嗓音突然显得十分激动：“我相信德国是有意要打仗的！”

“妙！”鲁瓦喊了起来。“德国也在做查理五世^①和拿破仑^②的美梦：公国之战^③，萨都瓦战役^④，一八七〇年的战争，这都是征服欧洲的必经阶段。在每个阶段之间，它要增加军事力量的强度，以求更快达到它泛日耳曼主义的目的！”

斯图德勒低着头等鲁瓦把这段话说完，又向雅克俯过身来说：

“对，我相信德国有无耻的预谋！就是它从一开始就在幕后操纵着奥地利的行动！”

雅克想说话，但是斯图德勒不让他开口，这位哈里发好象异常激动，几乎喊了起来。

“瞧瞧，再明显不过啦！奥地利，日薄西山的奥地利，如果没有人支持，怎么敢用那种口气，最后通牒的口气？怎么敢对抗联合起来的各国，拒绝塞尔维亚稍稍缓期一点答复通牒？怎么敢甚至不留一点商讨的余地，干脆拒绝塞尔维亚那样妥协的复照？你们看吧，如果不认为德国暗中的打算就是打仗，怎么能解释它一再反对英国所提的一切建议——无论诚恳与否，这些建议从外交方面来说总是可以接受的；又怎么能解释德国拒绝沙皇所建议的，把争执提交海牙国际法庭？”

“这些做法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是可以找得出理由的，”雅克大胆地说。“德国对于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战争意图并不是毫不知

① 查理五世(1500—1558)，西班牙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野心很大，曾妄想统治全世界。

② 拿破仑曾想建立一个象罗马帝国那样，包括法国、德国西部、意大利北部和埃及的大帝国。

③ 指1864年普鲁士与奥地利对丹麦进行的战争。

④ 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发生战争，萨都瓦战役中普鲁士取得了胜利，决定了整个战局。

情，而且它一向认为，列强干涉奥塞争执比不介入更具危险性。”

安托万激烈地反驳弟弟的话：

“在凯道赛，他们从来就不相信德国的和平保证。他们早就坚信……”

“坚信！”雅克喊道。

“……坚信中欧帝国预先早就有决心排除一切可能阻碍、甚至延缓发生冲突的因素。”

为了结束这场使他恼火的室内政治讨论，他把餐巾往桌上一扔，站了起来。

大家也这样做了。

“我们不要忘记，德国多次试图调解，而法国政府和俄国政府丝毫不愿考虑，”当他们慢慢离开餐厅的时候，雅克对斯图德勒这样说。

“这些都是伪装！算了，不管怎么样，它总得顾忌一点欧洲的舆论。”

儒斯兰公正地指出：

“不过，德国的论点是，必须对塞尔维亚进行一次讨伐，但是，把冲突严格地限于局部，这一点也不包含着一定要进行欧洲战争的意思，更不要对我们作战！”

“这还不算，”雅克补充说，“如果德国确实想发动战争来灭亡法国，它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呢？为什么十五年来，它放过了那么多比现在有利得多的机会？为什么不利用一八九八年英法之间法绍达危机^①？为什么不利用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战

① 1898年，英国占领了苏丹的恩图曼及喀土穆，继续向南部的法绍达进逼，与抢先进入法绍达、想在这里巩固力量的法国形成对峙，是谓法绍达危机。由于力量悬殊，法国撤出了法绍达。

争^①？一九〇七年的波斯尼亚危机^②和一九一一年的摩洛哥事件^③？”

“这些，我都不管，”哈里发固执地咕哝着说。他又说了一遍：“我都不管！”他把拳头伸到口袋里。

夏斯勒先生站在门口，啃着一块面包。他闪开身，让别人从他面前一一走过。安托万走在最后。夏斯勒先生举起面包给他看，又挤了挤眼睛：

“先父曾经特别喜欢这个，饭后点心的时候，得吃一小块面包……我也一样，安托万先生。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他的笑容，好象是以极大的宽容原谅自己的弱点，然而也露出一丝得意：他竟有这样不同凡俗的嗜好。夏斯勒先生太直率了，不能故意作出谦虚的样子。

雅克和儒斯兰正迈进诊疗室的门坎。咖啡已经端上，斯图德勒插到他们两人中间，挽住他们的胳膊，俯过身去，用苦恼的、说秘密话的声调说：

“我都不管，因为人们尽可以无休无止地推论下去，对于任何事都找得出理由！我都不管，因为我们需要相信德国是有罪的，相信我们受了捉弄！我不隐瞒，我打开今天的报纸时，首先在报纸上找的，是德国表里不一的证据。”

① 指 1904—1905 年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

② 奥匈帝国很久以来就想吞并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主要的事件却是在 1908 年 9 月及 10 月发生的。1908 年 10 月 7 日奥匈帝国正式宣布吞并塞尔维亚的这两个省，并把军队集结到塞尔维亚边境，迫使列强，主要是俄国承认既成事实。

③ 1911 年摩洛哥首都非斯爆发居民起义，法国军队以维持秩序为名乘机占领非斯，德国派遣炮艇“豹号”抵达摩洛哥的阿加迪港，与法国争夺在摩洛哥的利益，双方僵持不下。由于英国支持法国，德国不得不让步，1911 年 11 月达成协议，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大部分领土的保护权。

“为什么呢？”儒斯兰在门口站住，问道。

哈里发低下了眼睛：

“为了能够忍受我们遭遇到的一切……因为，一旦对德国有罪产生怀疑，就很难去履行他们所谓的‘我们的义务’！”

雅克不禁苦笑一下：

“‘爱国’的义务！”

“对！”斯图德勒说。

“当您看到他们以这个义务的名义为我们准备什么的时候，您还能对这个所谓的义务加以考虑吗？”

哈里发摇动着肩膀，好似在鱼网的网眼里挣扎。

“唉！”他用愤怒的声调恳求道，“不要把我的头脑搅得更昏了！……我们都知道，如果不幸，法国明天进行动员，不管我们心里能怎么想，我们还是不会逃避的。”

雅克张开了嘴正待喊出来：“我就要逃避！”这时瞧见哥哥站在屋子中间，转过脸来注意地看着他。雅克不由地愣住了。从哥哥的眼睛里，看出异样恳求的神情，他只好让步，没有说出来。从安托万走进来的那一刻起，雅克就猜到哥哥心中焦躁不安，他很吃惊，直到心底深处都受到震撼——就象那天晚上，在他们垂死的父亲床头，看到他一直以为不屈不挠的哥哥突然痛哭起来一样。

安托万转过身去。

“马尼埃尔，”他说，“给我们倒咖啡，可以吗，小家伙？”

“还有，”哈里发继续说，越来越激动，“我在想，有谁能说得准呢？一次欧洲大战说不定比和平时期二十年的宣传更能促使社会主义提前到来！”

“这个，”儒斯兰说，“我的确还看不出怎么会可能！我知道，

你们有些理论家宣传这样的学说：需要有一场战争来发动革命。然而，我一向认为，这正是菲利普老头很温和地说的那种‘精神观点’。一个被武装控制的现代民族，一个被动员的人民是什么样子，那一定是一点也想不出！在我们民主制度自由放任情况下，起义还没有获得成功，将来有一天，所有的革命者都受制于军队，都受制于掌握每个个人生死大权的军事专政，反倒希望起义忽然能够成功，这真是奇特的幻想！”

斯图德勒并没有听他说，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雅克。

“战争，”他声调阴沉地接着说，“嗯？怎么？也许要三四个月……但是，如果经过了这场考验，欧洲的无产阶级更加强大起来，更受到了锻炼，更加团结了呢？如果，战争之后，真正结束了帝国主义，结束了军事竞争？如果各国人民终于能建立起巩固的和平，也就是说在‘国际’之中的和平呢？”

雅克固执地摇摇头：

“不！所有这些靠不住的美好前景，如果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的话，我宁愿不要！……不管什么都行，只要不是在暴力和鲜血前面，放弃理性，放弃公理！只要不是这种恐怖和荒谬，不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只要不是战争！”

正在听着的鲁瓦忽然说：

“不管是什么？……甚至宁愿让敌人入侵，占领我们的国土？……那么，为了保持安宁，我们可以马上向德国人建议，把默兹、阿登、诺尔、加来海峡各省让给他们！有何不可？再加上一个非常好的出海口！”

雅克微微耸肩：

“这也许会给北方的某些工业家造成麻烦，但是，坦率地说，您是不是以为，对于大多数的工人和矿工来说，这对他们的贫困

生活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呢？如果我们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多数人难道不是宁愿这样，也不愿到战场上去光荣牺牲吗？……”他的面容始终果敢而庄重。“我很明白，您认为战争与和平无非是人民生活中一种正常的变动……这太可怕了！……这种非人道的变动应该永远加以制止！人类必须摆脱这种血腥的节律，能够自由地引导自己的活动去创造一个较好的社会！战争不能解决人类的任何根本问题！任何问题都不能解决！只能加深劳动者的贫困状况。劳动者在战时是炮灰，战后，是要受更残酷的奴役的奴隶，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他又低沉地说：“很简单：我觉得没有任何东西，——的确是没有任何东西，对人民来说，比战争的祸害更坏！”

“太简单了，”鲁瓦冷冷地说。“甚至，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点……过于简单化了。仿佛打胜了仗，人民什么也得不到似的！”

“得不到！绝对得不到！”

响起了安托万清晰决断的声音：

“这个论点站不住脚！”

雅克一惊，回过头去。直到这时，安托万一直坐在书桌前，垂着两眼，好象在专心拆信。其实，他仔细听着他身旁几米远的谈话，一字也不漏过。他没有离开坐位，也没有看他弟弟，接着又说下去：

“站不住脚！从历史上说站不住脚！从贞德开始的全部历史……”

“吓！”儒斯兰开玩笑似的打断他的话：“有谁知道呢？没有圣女^①的话，也许法国和英国就溶合为一个单一国家了……让查

① 指贞德。在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中，领导法国人民作战的民族女英雄。

理七世^①丢脸去吧，这我同意，但是，对英法两个国家有利，两方面的很多痛苦就都可以避免了……”

安托万耸耸肩：

“严肃一点，儒斯兰……您难道否认，比方说，德国在萨都瓦战役^②和色当^③战役中，什么都没有得到？”

“德国！”雅克反驳。“德意志民族！一个实体……但是，人民呢？但是，一个德国人，一个普通的德国老百姓，他得到了什么？”

鲁瓦挺直身子：

“不对！如果一九一五年的复活节——或者更早！——法国打了胜仗，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把领土一直扩展到莱茵河天然边界，吞并了萨尔州的煤矿宝藏，把德国在非洲的属地拿过来扩大了法国的殖民帝国。如果，按武装力量来看，法国变成了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还能说法国人民从士兵的牺牲中什么也没有得到吗？”

他天真地笑了起来，然后，显然认为事情已谈妥，掏出烟盒，拖过了一把椅子，把椅背转过来，骑着坐了上去。

“不简单，这一切……不简单……”在雅克旁边的儒斯兰思索着低声说。

“唉，”雅克压低了声音，对儒斯兰说道，“我不能接受暴力，甚至连反对暴力的暴力也在内！我不让我的思想里有一点裂缝，可以让丝毫暴力钻进来！……我拒绝一切战争，不管它被称为‘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反对一切战争，不管它来自何方，由

① 查理七世(1403—1461)，贞德与英国入侵者作战时的法国国王。

② 萨都瓦，捷克西部的市镇，1866年德国曾在此打败普鲁士军。

③ 色当，法国城市，1870年的战争中，拿破仑三世在此战败，率十万法军投降普鲁士。

什么原因引起！”

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沉默了，心里在想：“甚至内战我也不赞成！”他想起来同米托尔格这样什么事都可以干的革命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他总对那些人说：“我为博受理想奉献终生，我不愿倚仗放纵仇恨和杀戮去使这种理想得到胜利……”）

六 一

“不那么简单……”儒斯兰一面用沉重的目光环视四周，一面重复。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换了一个声调，好象继续他刚才岔开去的思路似的：

“我们是医生，我们至少有幸不被征去扮演血腥的角色，有幸被动员去不是为了杀人，而是去救死扶伤……”

“对，对……”斯图德勒赶紧接口，他那湿润的眼睛转向儒斯兰，流露出某种感激的神色。

“那么，如果你们不是医生呢？”鲁瓦问，他挨个打量他们，脸上露出咄咄逼人的好奇神情。（大家都知道，他从来不向军事当局显示他的毕业文凭，他当年服兵役的时候，只在医务室实习过不长的时期，就申请编为士兵，现在，他登记的是步兵团的预备役少尉。）

“我的小马尼埃尔，”安托万大声说，“您当真不愿意给我们倒咖啡？”

他好象在寻找任何借口打断争论，把这群喜欢争执不休的人驱散。

“就来，就来，主任！”年轻人说着，大大方方地跳起来，腿一

迈，就从椅子背上跨了过来。

“伊萨克！”安托万又叫。

斯图德勒走过去，安托万递给他一封信。

“给，费城医学院终于给我们回信了……”他又习惯地加上一句：“归档！”斯图德勒惊奇地看着他，没有接那封信。安托万苦笑一下，把信扔进了字纸篓。

在这间宽敞屋子的这个角落里，只有儒斯兰和雅克站着。

“不管是不是医生，”雅克说道，并没有看哥哥那个方向，但是他的声音很大，不是只对近在身旁的人说的，“一旦被动员，应征入伍，那就是支持民族主义的政策，因此，也就是赞成战争。在我看来，对于每一个人，问题都一样：难道只要政府命令你去屠杀，你就同意参加屠杀吗？……即使我不是……不是我现在这样……”他向儒斯兰俯过身去，接着说，“即使我只是一个顺从的公民，对于本国的体制机构感到满意，我也决不同意国家的利益可以逼迫我违反我自己的精神上的责任。一个国家，如果窃取了权力，去逼迫被治理者去违反良心，它就不能指望人民的合作。一个社会，如果不首先考虑每个个人的道德价值，就只配受到蔑视和反抗！”

儒斯兰摇摇头：

“我曾经是个狂热的德雷福斯派，”他这样说，作为回答。

安托万一直好象在书桌前忙着自己的事，这时忽然完全转过身来，用斩钉截铁的声调说道：“这问题的提法不对。”说着，站了起来，瞧着弟弟，独自走到房间中央，又说：“象我们国家这样的民主政府，尽管它的政策受到少数反对派的否定，然而，它仍然掌权，恰恰是因为，它合法地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意志。因此，

被动员入伍的人响应征召令，服从的是民族的集体利益——不管他个人对执政的政府的政策有什么意见！”

斯图德勒说：“你提到最大多数人的意志，但是，即使不是全体公民，至少现在大多数人希望不要打仗！”

雅克说话了：

“以什么名义？”他避免直接对哥哥说话，相当笨拙地盯着儒斯兰，问道，“这大多数人，是以什么名义，必须牺牲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合情合理的原则，必须认为公民的服从精神超过自己最神圣的信念呢？”

“以什么名义？”鲁瓦忽然一挺身，喊了出来，好象挨了一个耳光似的。

“什么名义？”夏斯勒先生象回声似的重复一句。

“以社会契约的名义！”安托万坚决地说。

鲁瓦打量一下雅克，又看一下斯图德勒，好象要故意揶揄他们起来反驳一样，接着，他耸了耸肩膀，转过身去，快步走向远处窗前的一把扶手椅，一屁股坐下，背转了身。

安托万低垂着眼睛，使劲地用小勺搅着杯里的咖啡，好象在沉思。

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儒斯兰彬彬有礼地打破了沉默：

“您的意思我非常了解，主任。我觉得，归根结底，我跟您的看法一样……当前的社会，不管有没有毛病，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一代成年人，总是一个现实。这是我们历代先辈建造的，留给我们的一个相当现成的，相对来说巩固的基础，我们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找到我们的平衡的……对于这一点，我也有非常明确的认识。”

“好极了，”安托万还在用小勺搅咖啡，没有抬起头来。“作

为个人，我们都是弱者，是孤立的，无能为力的。我们的力量，我们最大部分的力量，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有效地发挥这力量的可能性，都来自把我们集合起来，把我们的活动统一起来的社会集团。对于我们来说，在目前的世界局势下，这个集团，不是虚无缥缈的神话，而是确定的、占据着一定空间的实体。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法兰西……”

他说得缓慢，声音忧郁，但是坚决，就好象他早就准备好了。他这时所说的话，只是有意抓住这个机会说了出来。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因此，我们是从属于它的。就是这个民族共同体，使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现在这样的人，生活在几乎完全的安全之中，在它的范围内安排我们的文明人的生活。在我们和这个共同体之间，几千年来，就有一个早经同意的联系，一个契约，使我们大家承当着义务的契约！这不是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既定事实的问题……只要人还在社会里生活着，我认为，个人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认为自己摆脱了对于保护他们的、使他们得益的社会所承担的义务。”

“并不是所有的人！”斯图德勒打断他的话。

安托万赶紧瞥了他一眼。

“是所有的人！也许对每个人来说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是所有的人。您跟我一样！无产者也跟资产者一样；餐厅的伙计也跟领班一样！由于我们生来就是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我们都在社会中占一个位置，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从中获得利益。得到这种利益的交换条件就是履行社会契约。契约的头几条之一就是要遵从共同体的法律，即使在我们个人自由思考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法律并不总是公正的，也得遵从。如果抛开这些义务，就是在体制机构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就是动摇社会结构，而正

是这样的体制机构，使法国这样的民族共同体成为一个均衡的、有活力的机体。”

“对！”雅克轻声说。

“更何况……”安托万用恼怒的声调继续说，“这样就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来，作出的事违反了每个人的真实利益。因为，无政府主义暴乱所引起的混乱，对于每个人来说，比安分守法引起的后果更坏得无法估量，即使法律尚有缺点。”

“您举一个例子！”斯图德勒赶紧说。

安托万又看了哈里发一眼，这一次，向他迈出了半步：

“难道我们作为公民，不是必须不断遵从我们作为个人并不赞成的法律吗？何况，社会共同体也允许我们与它抗争：在法国，思想自由和写作自由还是有的！我们甚至有一个合法的战斗武器：选票！”

“就说说这个吧！”斯图德勒反驳道。“你所谓的全民选举在法国只不过是美丽的骗局！在四千万法国人中，选民还不到一千二百万！只要有六百万零一票，就算超过了半数，就构成他们厚颜无耻所谓的多数了！所以，我们就是三千四百万傻瓜，要服从六百万人的个人意志，而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你知道是怎么投票的吗？是在酒吧间那些流言蜚语的影响下盲目投票的！不，不，法国人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权利。他们有办法改变制度的结构吗？有办法不赞成，甚至稍稍讨论一下人家强加给他的一些新的法律吗？以法国人的名义缔结同盟的时候，甚至不征询法国人的意见，而这些同盟却会把人民卷入要他送命的冲突里去。这就是在法国所谓的全民主权！”

“对不起，”安托万沉着地反驳。“我并不觉得我自己象你想说的那样毫无权利。显然，对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并没有

人征询我个人的意见。但是，如果共同体采取我不喜欢的政策，我有充分自由投票拥护在议会里反对这项政策的人！……在此以前，只要我投的票还未能把那些至此还算代表最大多数人意志的人从政权中驱逐出去，让那些打算按照我的心愿修改国家政策的人取而代之，那么，我的义务很简单，而且无可争议，我受着社会契约的约束。我必须让步。我必须服从。”

“法律无情，毕竟还是法律^①！”在静默中，夏斯勒先生象说什么格言似的，低低说。

哈里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有待弄清楚的是，”他嘟囔着，“在目前情况下，抵制动员所引起的革命混乱，是否并非那么严重的坏事，比起……”

“……比起时间最短的战争！”雅克替他说完。

在房间最里面，鲁瓦动了动，听到他座椅的弹簧轧轧响，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

“对于我来说，主任，”儒斯兰平静地说，“我的看法和您一样，我将服从命令……尽管这么说，我还是明白，有些人看来，在目前非常时期，在威胁着我们的动乱的前夕，这种服从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不人道的义务。”

“正相反，”安托万立刻反驳道。“个人越是意识到局势的严重，他的义务就越不可推卸！”

他停了一下，把咖啡放在托盘上，一点也没有喝。他脸绷得紧紧的，嗓音在颤抖。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好几天了，”他忽然用压抑的声调承认，这使雅克不由自主地抬眼看着他。安托万用拇指和食指按

^① 原文为拉丁文夹法文。

着眼窝呆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用异样的、活跃的目光向雅克那个方向一闪。接着他字斟句酌地说：

“如果今天晚上，由大多数人选举的政府颁布了动员令，即使我并没有投赞成票，那也并不因为我对战争有这样或那样的想法，或者我属于少数反对派，我就有权利撕毁契约，逃避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义务——正是对所有的人都毫无二致的义务！”

雅克听着这专为他说的话，几乎没有打断他。安托万的主张并不使他特别反感，而在他那教条式的阐述下面，微微显露出合乎人情的、推心置腹的声调，却使他不由自主地十分感动。另一方面，尽管哥哥的态度同他相反，他还是不能不觉得，在当前这个问题上，安托万的态度首尾一贯，完全忠实于他自己。

突然，就象有人激烈反驳他似的，安托万盘起胳膊，大声说：

“见鬼，要是能够只在战争之前做公民，只在战争之前，那可就太方便了！……”

接着而来的沉默格外沉重。

儒斯兰生来锐敏，觉察得出任何微妙曲折，觉得仿佛争论已经结束，大家看法得到一致，这是改变话题的好时机。他使用亲切的声调，作为结论，宣布：

“归根结底，主任说的话有道理。社会生活是一种游戏。必须选择：或者接受规则，或者就退出这个游戏……”

“我，我早就选择了，”在他身旁的雅克低声说。

儒斯兰微微转过头来，看了他一会儿，不由自主地显得非常注意，也非常感动，仿佛超越过雅克这个真实的存在，看到了整个的悲怆的命运。

从门缝里伸进雷昂光滑无须的脸：

“有人给先生打电话。”

安托万转过脸去，眨着眼睛看看仆人，好象刚被惊醒了一样。“又是她，”他终于这样想。

“好吧，就去。”

他等了几秒钟，双目低垂，蹙着眉头，然后，不慌不忙离开了房间。

“她要对我说什么呢？”走进小书房，他这样想。“‘你不爱我了！……你不象以前那样爱我了！……’必然会有有一个时候，她们会向你这样说的——所有的女人都如此！……其实，我们不再爱的不是她们，而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在她们面前的那个自己——对她们来说，知道这件事，真会大吃一惊……她们不该说：‘你不再爱我了！’应该说：‘你不再爱我们在一起时的那个你自己了……’”

他已经走到电话机旁，没有考虑，就拿下了耳机：

“是你吗？东尼？”

他吓了一跳，有点反感，就站在那里，听着这熟识的、非常熟识的声音，歌唱般的、郑重而故作温柔的声音。他不能作出决定来回答。有一股冷冷的怒气……这两天，他都觉得已经把她摆脱了，摆脱了她的魔法。还不仅是摆脱，而是清除净尽……对！好象是荡涤了某种污垢……他想起西蒙。不，已经完了，完了：缆绳已经断了，为什么要重新结起来呢？

他轻轻地把耳机放在桌子中央，退后一步。他听见电话机里有噼噼啪啪的声音，象在喘气，打嗝，喉咙里呼呼呼哧响……真叫人难以忍受……活该！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恢复接触了……

但是，他没有回到诊疗室去，反倒把通走廊的门锁上，又回到长沙发旁边来。他燃起了一支烟，最后又看了一眼桌子——

耳机里不响了，只在那里歪歪扭扭地躺着，发着光，象一条死蛇。他沉重地躺倒在垫子中间。

诊疗室的壁炉前面，夏斯勒先生在同斯图德勒密语。夏斯勒很高兴终于有机会也说说，并且还有人听他讲，就用他那不确切的、难以理解的废话向斯图德勒解释他做的大买卖。

“尽是新花样，离奇的想法，小小的发明……一向是崭新的，这就是我们的格言。怎么？我以后再把 A. C. 货单给您寄来，A. C. 就是‘探寻公司’^①的缩写……请您看看。我们已经安排了一些旁系的机构……应该这样，要打仗了……我们要改变经营方向……国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范围……怎么？”（他总不断这么问，样子又很焦急，好象没有听清什么紧急的问题。）“发明家正给我们带来一些了不起的玩意儿，”他马上接着说。“我不愿意泄露机密……但是，比如，这个，我可以说，过滤池沼水和雨水用的手提式过滤器……打仗时很合用……毒害士兵机体的一切腐败的臭气……”他洋洋得意地笑了笑：“还有更惊人的哩！一种自动瞄准器，附带一个发射机……给视力不好的步兵用……甚至可以给炮兵用……”

鲁瓦坐在他的位子上，已经听了一会儿这些不相连贯的话，这时站了起来：

“是自动的吗？怎么回事？”

“正是自动的，”夏斯勒先生得意地说。“就是这个特别招人喜欢。”

“可是，还有呢？怎么瞄准呢？”

^① 探寻公司的法文全名是 l'Association des Chercheurs。

夏斯勒断然一挥手，

“完全自动！”

雅克和儒斯兰还站在放书架的角落，原来那个地方，低声地谈着话：

“最使人激动的，”雅克说着，额上皱起了一道兴奋的皱纹，“是想到必然会有一天，而且，说不定就是不远的将来，那时候，人们将不理解什么兵役，什么全民聚集在军旗下，竟然成为金科玉律，竟然成了不可争辩的神圣的义务的这种神话！到那一天，人们会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因为一个人拒绝拿起武器，社会权力机构就能窃取权利来枪毙他！……正好象从前，在欧洲，怎么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只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就被审判，受酷刑，这对于我们，也是不可思议的……”

“你们听呀！”鲁瓦叫了起来。

他从书桌上拿起一张当天的报纸，不经意地浏览一下，然后用调侃的声调清清楚楚地高声朗读：

“年轻夫妇，有小孩，盼租用一套带花园的安静的小屋，租期三个月，位于有鱼的河边，最好在诺曼第或布尔戈涅。请函告本报服务处，三四一八信箱。”

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真的，今天，只有他一个人还能笑。

“欢天喜地的就象要放假的中学生，”雅克轻声说。

“欢天喜地的象个真正的英雄，”儒斯兰纠正道。“如果没有喜悦，就没有英雄主义，只剩下无畏了……”

夏斯勒先生掏出怀表，他每次看时间都这样，先听听“小东西”走不走，专注的眼光就象一位听诊的大夫。然后，在眼镜上面扬起眉毛，他大声宣布：

“一点三十七分。”

雅克一惊。

“我晚了，”他说着，跟儒斯兰握握手。“我先走，不等哥哥了。”

安托万躺在沙发上，听到走廊里传出雅克说话的声音，雷昂正陪着雅克向楼梯口走去。

他猛地推开门：

“雅克！……你听着……”

雅克吃了一惊，向他走过来。

“你要走？”

“是的。”

“你进来一会儿，”安托万慌忙说，一面拉拉他的胳膊。

雅克到大学街来，本想跟哥哥单独谈一谈。他想把怎么用掉了他的财产的事告诉哥哥，不愿意显得瞒着安托万似的。他甚至想过：“也许，我对他谈谈珍妮……”虽然时间很紧，他还是乐意跟哥哥谈谈心，就走进了小书房。

安托万把门关好。

“你听着，”他没有坐下，就开口说道。“我们严肃地谈谈，小弟。你……打算怎么办？”

雅克装出吃惊的样子，没有回答。

“你是免服兵役的。可是，一旦动员，所有免服兵役的都得重新审查，他们要把所有的人都送上火线……你打算怎么办？”

雅克不能躲闪了。

“我还不知道，”他说。“当前，我能合法地不受他们掌握，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看到哥哥的目光在追寻究竟，他就生硬地

加上一句：“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我宁愿自己剁掉两只手，也不被动员入伍。”

安托万把眼睛转向别处，过了一会儿才说：

“这种态度是最……”

“是最怯懦的吗？”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安托万亲热地说。“不过，也许是最自私的态度……”因为雅克还是不动声色，他就继续说下去：“你不觉得吗？在目前情况下，拒绝服兵役，就是把个人利益置于总的利益之上。”

“是所谓民族的利益！”雅克反驳。“总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显然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安托万茫然地挥挥手，象是要把谈话中那些理论争执赶走。然而，雅克还是坚持说：

“我拒绝参军，这正是为总的利益服务！我觉得，而且毫不怀疑地觉得，今天，使我拒绝服役的，正是那个更为重要的利益！”

安托万克制住不耐烦的动作，说道：

“你考虑一下，再说……这样拒绝，你希望达到什么实际效果呢？什么效果都没有！……整个国家都动员起来——情况通常总会是这样，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保卫国家的义务，还有什么比孤立一人的反抗行动更无意义，更注定要失败的呢？”

他的声调，有意显得那么有分寸，那么温情，雅克感动了。他非常平静地看看哥哥，甚至显出了友好的笑容。

“为什么又来谈这个问题呢，我的老兄？你明知道我的想法……我从来不同意一个政府可以逼迫我去参加一个我认为是罪恶，是背叛真理、正义，背叛人类团结的勾当……在我看来，英

雄主义不在鲁瓦那一边，英雄主义不是拿起枪跑到边境去，而是枪口向下！——宁愿被拉去枪毙，也不充当罪恶的同谋！……空幻的牺牲吗？有谁说得准呢？就是因为群众荒谬绝伦的驯服，过去和现在，才使战争成为可能……孤立一人的牺牲吗？只好如此了……既然有胆量表示不同意的人，现在还只能是少数，我又有什么法子？也许只不过就是因为……”他犹豫了一下：“就是因为某种……精神力量在街头巷尾行不通……”

安托万站在那里听着，很奇怪地一动不动，双眉不可觉察地微微颤动，定睛看着弟弟，轻轻呼吸着，象是睡着了。

“我不否认，单枪匹马，或者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起来反对动员令，必须具备一种并不普通的道义力量，”他终于用温和的声调说道。“不过，这是一种无效的力量，使人愚蠢地向墙上硬碰，以致粉身碎骨！……一个坚决拒绝打仗，宁愿为信念而被枪决的人；我对他寄予满腔的同情，满腔的怜悯……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是无用的幻想家……并且，我认为他是错的。”

雅克只是微微摊开双手，就好象他刚才说“我又有什么法子”时一样。

安托万静静地打量了弟弟一会儿，并没有灰心。

“事实就是这样，事实逼迫着我们，”他又说。“明天，事态会更严重，而事态不再取决于任何人，可能迫使政府不得不动用我们这些人。你难道当真以为，这还是考察我们的国家强加给我们的义务是否符合我们个人意见的时候吗？不行，当政者决定一切，当政者发号施令……我工作的时候，当机立断，命令进行我认为适当的紧急治疗的时候，我决不容许别人争议……”

他笨拙地把一只手搭在额头上，手指按按眼皮，然后，费力地继续说：

“你考虑一下，我的小弟……问题不在于赞成不赞成战争——你以为我赞成打仗吗？——问题是要忍受它。怀着反感，因为我们有这种性格；但是，只在心里反感，责任感不让它流露出来。危险时刻需要我们出力，我们却讨价还价，这就是对集体的背叛……对，这才是真正的背叛……对别人犯罪，缺乏团结精神……我并不认为，对于政府要作出的决定我们没有权力争论，但是，要先服从，以后再争论。”

雅克又微笑起来：

“可是我，你看，我就认为，每个个人都有权同各国借以发动战争的那些民族要求完全断绝联系。我否认国家有权以任何借口横暴践踏人的良心……我憎恶随时随地使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词。然而，的确，我的良心，在我内心比你这样机会主义的推理更有气势，我的良心也比你们的法律更有气势……阻止暴力安排世界命运的唯一方法，首先就是自己拒绝使用任何暴力！我认为，拒绝杀人，就标志着道德高超，就有权得到尊重。假如你们的法典和法官对这个不予尊重，那就该他们倒霉。早晚总有一天，他们总要交代清楚的……”

“算了，算了……”安托万说。他看到谈话再次转到一般观念，不免心烦，就盘起手臂说：“可是，从实际来说，怎么办呢？”

他向弟弟走去，突然，他用一种他们之间不常有的自发动作，温存地用两手扶住他的肩膀：

“告诉我，小弟……明天就要颁布动员令，你怎么办？”

雅克耐心而又坚决地挣脱开去。

“我继续进行反战斗争！进行到底！要用一切办法！一切办法……如果必要的话……包括革命破坏活动！”他不由得压低了嗓门。他停了一会儿，心情沉重，又说：“话虽这样说……我也不

知道，”稍稍歇了一下儿，他接着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安托万，绝对肯定的，要我当兵？永远办不到！”

他最后强笑了一下，点点头告别，走到门口。他哥哥并没有试图留他。

六 二

雅克在珍妮家找到珍妮，她只一个人，正穿好了衣服准备出门。她面容消瘦，心情十分不安。妈妈音信杳然，但以理也没有来信。她有许多猜测，不知如何是好。报纸上的消息把她吓坏了，再加上雅克又来晚了。她时刻惴惴不安地想起蒙特鲁日的警察，以为雅克一定出了什么事。这时，她扑到雅克怀里，话都说不出了。

雅克说：“我去打听了一下在奥地利的外国人情况……抱幻想没有用，那边，已经戒严了。也许德国公民还能回国，意大利人大概也可以，虽然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关系很紧张……可是法国人、英国人或者俄国人！……假如您的母亲没有在前几天离开维也纳——那她也许到家了——一定没有来得及……看来，人家不许她走……”

“不许她走？怎么？要她坐牢吗？”

“不是，只是不让她搭火车……也许要待一两个星期，等到事情得到解决，等到国际上有什么安排……”

珍妮没有说什么。雅克在这里就足以使她摆脱想象中的苦恼。她紧紧地依偎在他胸前，毫无保留地放心地由他深深地吻着，从昨晚回家起，她就等待着这个吻。她终于放开了手，讷讷地说：

“我再也不愿一个人呆着了，雅克……带我走吧……我再也不愿意离开您了。”

他们徒步向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去。

“我们在梅迪西十字路口坐电车，”雅克说。

虽然这正是散步的时候，今天，偌大一个花园里几乎空无一人。阵阵微风吹得树梢头沙沙作响。花坛上升腾起万寿菊的浓郁芳香。在花坛旁边一张椅子上，单独地坐着一对情侣，男的和女的面对面凑在一起，看不清他们的脸，仿佛使整个地方都充满了爱情的颤动。

在栅栏门那一边，他们又走上闹市。整个的城市，在战云的威胁下，焦躁不安，支持不住了。在这美丽的夏日午后，全欧洲从这边到那边，传布着可怕的消息，而谣言就象是这些消息的回声。仅仅两天的时间，正在度假的巴黎突然又挤满了人。报贩穿过十字路口，叫卖着号外。当雅克和珍妮等电车的时候，两匹马拉的一辆公共马车从他们面前走过，里面挤着几家人家：父母，孩子，女仆。马车顶层，一堆堆行李中间，可以看到一辆小孩车、几个捞虾的网、一把大阳伞。

“这些固执的人，在向命运挑战，”雅克喃喃自语。

苏福罗街，圣米歇尔大道，梅迪西街，车辆来往不绝。然而，这不是工作日的勤劳的巴黎，也不是星期日阳光下游乐的巴黎。这是一个搅动了的蚂蚁窝。所有的人走得那么快，好象都很忙，但是神情茫然，犹犹疑疑地，宁愿靠左边走不愿靠右边走，这一切说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并不是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只是不能独自待着面对自己或是面对世界，他们只好离开家，丢下工作，唯一的目的是逃避，能够在刹那之间把沉重的心情交托给

在街上川流不息的、惶惶不安而又亲如手足的人群。

整个一下午，珍妮影子似的，默默的，紧紧地跟着雅克，从拉丁区到巴蒂尼奥尔，从格拉西埃到巴士底，从贝尔西沿河大街到水塔。到处流传着同样的消息，到处有同样的评论、同样的愤慨；到处，人们也都已塌下了肩膀，同样准备着逆来顺受。

有时候，只有他们两个，珍妮就以最自然不过的态度谈她自己，或者谈天气：“我不该戴面纱出来……我们过马路吧，去看看那个花店……最热的时候过去了，你觉得吗？呼吸得……”这些天真的话语把花店的货架、欧洲的问题和天气突然混在一起，真有点叫雅克生气。于是，他就冷淡而又深沉地看那姑娘一眼，眼睛里的阴沉、孤僻的火光忽然使她觉得害怕。有时候，他又温情地转过头去，自忖着：“我把她拖到这些事里来是对的么？……”

在总工会的走廊里，他忽然发现偶然遇到的一个同志用好奇的、严厉的目光看着珍妮。他蓦地觉得珍妮这个样子，站在灰尘满布的楼梯口，在这些工人中间，穿着窄腰身的套装，戴着黑纱，在她的举止、面容中，有一种他难以说清的东西；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痕迹、烙印。他觉得很尴尬，把她领到外面去。

刚打七点钟，他们经过大道，走到交易所街区。

珍妮累了。从雅克身上散发出来的活力征服了她，也使她丧失了自己的力量。她想起从前在拉菲特庄跟雅克在一起，也有过同样的疲乏劳累的感觉。那时，因为雅克用他的声音，他专断的眼光，他思想的突然飞跃，总要求别人保持持续的紧张状态，几乎象强迫别人一样。

他们正走到《人道报》社附近，卡迪约迎面跑来。

“这一回，来了！”他喊道。“德国宣布动员！俄国的目的达

到了！”

雅克惊得一跳，可是卡迪约已经跑远了。

“得弄清楚。您在这里等我。”（他不敢把姑娘带进报社里去。）

珍妮穿过马路，在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从雅克走进的那座房子门口，有一些人，象蜂箱里的蜜蜂一样，不断出出进进。

过了半个钟头，他出来了，脸色都变了。

“是官方的消息，从德国来的消息。我见到了格鲁西埃，桑巴，瓦扬，勒诺代。他们都在楼上，等详细的消息。卡迪约和马克·勒瓦尔在凯道赛和报社之间来回跑……面对俄国加紧战备，德国宣布了动员……是不是真的动员呢？饶勒斯肯定说不是，德文叫做 *Kriegsgefahrzustand*。好象是他们宪法上事先估计到的一种状态。饶勒斯拿着字典，直译出来是‘战争危险状态’……‘战争威胁状态’……头头可真行，他还不灰心！他还记得在布鲁塞尔同哈斯和德国社会党人谈话所获得的信心。他不断地说：‘只要这些人同我们在一起，就有希望！’”

他挽着珍妮的胳膊，带着这个姑娘信步快走。他们围着这片房子转了好几个圈。

“法国怎么办呢？”珍妮问。

“听说，四点钟举行了政府紧急会议。有一份公报说会议考虑了必要的措施，以保卫我们的边境。哈瓦斯通讯社今晚说，我们的掩护部队已进入了前沿阵地；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人说，为了避免给敌人一个挑起冲突的借口，参谋部打算沿着边境留出来若干公里的一个非占领区……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德国大使正在跟维维亚尼磋商……加洛很熟悉德国情况，他很悲观，他说不应该对于用词寄托什么幻想，所谓 *Kriegsgefahrzustand* 是

一种在正式公布动员令之前动员的一种伪装方式……不管怎么样，目前，德国已经宣布戒严，也就是说新闻受到限制，现在，在那儿已经不可能再进行反战示威了……我看，这也许是最严重的。只有人民起义，才能拯救和平……而相反，斯特发尼跟饶勒斯一样，仍然坚持乐观。他们说，德皇并没有发布动员令，只是选择了这个预备性措施，这就证明他仍然试图维护和平。这话倒也站得住脚。德国这样就是给予彼得堡政府一个采取和解行动，也许竟至撤回动员令的最后的最后的机会。好象从昨天开始，德皇和沙皇之间就在不断交换私人电报……我离开斯特发尼的时候，饶勒斯正要去接从布鲁塞尔来的电话，他们都好象是希望有重要消息……我没有再等，我想看看您怎么样了……”

“您不要管我，”珍妮连忙接口。“您快点再上去吧，我等着您。”

“在这儿，站在大街上？那可不行！……至少到进步咖啡馆去坐着。”

他们急忙走到幽径街。

“你好！”一个深沉的声音说。

珍妮回过头去，看到在他们身后一位头发蓬乱的老基督，穿着一件排字工人的黑外衣。这是穆尔朗。

雅克马上说：

“德国动员了！”

“呸！我知道……这是意料之中的！……”他啐了一口。“没有法子……绝对没有法子！……以后很长一个时期也没有法子！……一切一定要毁掉。我们的一切文明一定要整个消灭，才能够建造起干净的东西！”

沉默了一会儿。

“你们到‘进步’去吗？”穆尔朗问，“我也去。”

他们走了几步，没有说一句话。

“今天早晨你考虑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吗？你还没有走？”老排字工人又问。

“还没有。”

“随便你吧……”他犹豫一下：“我，我从省工会来，”他用探究的眼光看了看那姑娘，又专注地盯着雅克。“我有几句话要对你说。”

“您说吧，”雅克说着，把手放在珍妮的前臂上，明确说：“就象在朋友之间那样，尽管说，不碍事。”

“好，”穆尔朗用两个结满老茧的手指按着雅克的肩膀，压低声音说：“严重的内部消息：陆军部长今天签署了命令，要逮捕B字名单上所有嫌疑分子。”

“啊……”雅克说。

老头儿点点头，从牙缝里说：

“你通知那些有关系的人！”

看到珍妮的脸刷的一下白了，恐怖地看着他，穆尔朗对她笑一笑：

“放心吧，漂亮姑娘……并不是说今天晚上就要把我们枪决……只不过，命令已经发出，以防万一。他们哪天高兴，就可以把我们拘留起来，他们好去组织大规模的战争，而不受任何惩罚。就只要叫他们的特别部队执行命令就是了……警察狗子已经在郊区活动。好象是搜查了《红旗报》社，《战斗报》社也搜查了。伊萨科维奇今天早晨在普托一次大逮捕中，差一点被抓去。福泽被关进去了，被指控为《血腥的手》的作者。你知道，这篇传单是反对参谋部的……事情会越来越严重的，必须预料到这一

点，孩子们。”

他们走进咖啡馆。雅克把珍妮安顿在楼下的大厅里。这儿几乎没有人。

“你跟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雅克向排字工人提议。

“不。”穆尔朗抬手向楼上一指：“我要上楼去一会儿，探探风……从早晨起，楼上大概尽在说些傻话！……你们请便！”他握了握雅克的手，最后一次低声说：“相信我的话吧，小家伙，快走！”

他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忽然友好地一笑，然后，走远了。他们听到他沉重的脚步震动了小小的螺旋形楼梯。

“您今天晚上在哪儿睡呢？”珍妮不安地问。“不是在那个旅馆吧？他们昨天把地址都记下来了！”

雅克漫不经心地说：“嗨！我甚至还不肯肯定我是不是有幸上了他们的黑名单……”看到珍妮焦虑的眼光，他又说：“不过，您放心，我不打算再在里贝尔公寓露面。今天早晨，我把旅行包放到穆尔朗那里了。至于能够引起麻烦的证件，都放在我留在你们家的那个小包里。”

“对，”珍妮看着他说。“放在家里，您就什么危险都没有了。”

雅克站着，叫了一杯茶，但是没有耐心等着把茶给珍妮端来。

“您觉得在这里好吗？……我再到《人道报》去……您不要走动。”

珍妮忽然觉得害怕，用透不过气来的声音问道：“您还回来吗？”她低下眼睛，不让雅克看到她的慌乱。她感到雅克的手放到她的手上。这无言的责备使她脸红了：“我是开玩笑的……您走吧！……不用管我……”

只剩下她自己，喝了几口刚端上来的茶，这稍稍发苦的饮料带着点洋甘菊的香味。接着，她推开杯子，把臂肘支在冰凉的桌面上。

穿过大开的窗户，传来街上的喧闹声，同时，也射进眩目的阳光，镜子，玻璃货架，铜栏杆，柜台的桃花心木都反射着光辉。在反光里，汨汨的流水声中，店老板正在柜台后面涮洗大肚玻璃瓶。几份报纸摊在那几张桌子上。珍妮看了看四周，什么也不想。时间过去了，在她疲乏的脑子里，幼稚的悬念，阴暗的思虑，突如其来的恐惧，象幽灵一样在游荡。她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到她身旁凳子上蜷成一团躺着的一只灰猫身上。这只猫睡着了吗？眼睛闭着，但是耳朵在动，蜷缩着的那模样特别象是想睡。难道它也经受着那种到处盘旋的恐怖？它拳起来的爪子柔软自然，却象是装出来的。它是睡着了呢？还是在装睡？它要哄谁呢？也许要骗它自己？天要晚了，不时有工人或其他的人进来，跟店老板交换一下会意的眼色，穿过大厅，登上中二楼。他们一打开楼上的门，就有一股嘈杂声，辩论的声音，跟外面的喧哗声一时融合在一起。

“我回来了！”

珍妮惊得一抖，她没有看见雅克进来。

他坐在珍妮身旁，满头大汗，猛地一扬脑袋，把一绺头发甩到后面去，又擦了擦脸。

“好消息，在这一堆混乱中，算得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他小声说。“那个电话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布鲁塞尔传来的一个信息。他们绝不放弃斗争；正相反！饶勒斯说得对，这些人是我们的兄弟，他们不会退让的！在德国，他们和我们一样，处于恐怖之中，他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保持联系，好协同行动。但是，由

于德国已经戒严，他们同我们联系将十分困难，所以，他们通过比利时，给我们派来一个代表，叫做海尔曼·缪勒，明天到达巴黎，显然，这个人被授以极大的权力。料想他是来同法国社会党取得协议，立即采取大规模行动，反对战争势力。您明白吗？在《人道报》，大家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意料不到的信使以及明天缪勒和饶勒斯的最高级会晤上——他们代表着两国的无产阶级！……他们两人一定会作出决定性的决定！据斯特发尼说，确实需要两国组织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起义，以前有过适当的时机，不过，还不算太晚。通过总罢工，我们还能够成功！”

他说得很快，声调断断续续，他的热情富有感染性。

“头头决定明天登出一篇威力巨大的文章……足以跟左拉的《我控诉》^①媲美！……”

看到珍妮茫然询问的目光，他知道这个比喻并没有给珍妮什么确定的概念。此外，这个比喻并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加洛的秘书帕热斯。刹那间，他痛切地感到在珍妮和他之间还有的一切隔阂。

“您刚才跟饶勒斯说话了？”她天真地问。

“没有，今天没有。我刚才跟帕热斯一起站在楼梯上，饶勒斯这时正要离开报社。象往常一样，有很多朋友围着他。我听见他对那些人说：‘我要把这些都写在明天的文章里，你们看吧！我要揭露所有的当权人士！这一次，我要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说实话，我觉得他在笑。这个奇怪的人！对，他是在笑！他的笑很独特，笑得象个善良的巨人，笑得鼓舞人心……然后，他又

① 1898年，左拉为拯救被诬告的德雷福斯，曾公布了他给法国总统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我控诉”。

说：‘不过，首先，我们去吃饭吧。到最近的地方，嗯？到阿尔贝店里……’”

她没有说话，眼神很专注。

“就近观察他非常有意思，”雅克又说。“我们也到新月咖啡馆去吃点东西吧。我让你看看他……我饿了。我们也有权利吃晚饭。”

六 三

九点半都过了。大多数的常客已经离开饭店。雅克和珍妮坐在右边，那里人不多。

饶勒斯跟几个朋友围着门口左边的一个长桌坐着，这桌子同蒙马尔特街平行，是由好几张桌子拼起来的。

“您看到他了吗？”雅克说。“坐在长椅子上，正中间，背对着窗户。您看，他转过身来，在跟老板阿尔贝说话。”

“他好象并不太着急，”珍妮惊奇地低声说了一句，雅克大为高兴。他拉住珍妮的臂肘，轻轻捏了一下。

“别人也一样，您认识他们吗？”

“认识，坐在饶勒斯右首的，是菲利普·朗蒂约，左首那个胖子是勒诺代；勒诺代对面是迪布勒伊，迪布勒伊旁边是让·龙格。”

“那个女人呢？”

“我想，是布瓦松太太，就是朗蒂约对面那个人的妻子。她旁边的是阿梅代·迪努瓦，她对面是雷诺两兄弟。刚进来的那个人，站在桌子旁边的是米盖尔·阿尔梅莱达的朋友，是《红帽报》的撰稿人……我忘了他的……”

象轮胎爆裂似的，突然间的一声响打断了他的话，紧接着又有一声枪响和玻璃碎裂声。大厅里面的墙上，一面镜子被打碎了，玻璃片飞溅起来。

刹时间，大家惊呆了，紧接着一阵喧哗，震耳欲聋。整个大厅的人都站了起来，转过身看着被打碎的镜子。“有人朝镜子开枪！”“是谁？”“在哪儿？”“从街上！”两个伙计冲到门边，跑了出去，从外面传进来喊叫声。

雅克本能地站起来，伸出手臂去保护珍妮，他用眼睛寻找饶勒斯，只见头头周围的人都站了起来，只有饶勒斯还很安静地在位子上坐了一会儿。雅克看见他慢慢弯下腰去，好象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接着就看不见他了。

这时候，老板娘阿尔贝太太从雅克桌前跑过去，喊道：

“有人向饶勒斯先生开枪啦！”

雅克轻声说一句：“您就在这儿！”他用手压着珍妮的肩膀，强迫她又坐下去。

他向饶勒斯的桌子跑去。从这里响起乱哄哄的人声：“叫医生来！快！”“叫警察！”一群人指手划脚，围住饶勒斯的朋友们，雅克无法靠近。他用臂肘推开众人，绕过桌子，终于走到大厅的这个角落。只见有个人躺在漆布长椅上，一半被弯着腰的勒诺代的脊背挡住。勒诺代直起腰来，把一块被鲜血染红的餐巾扔到桌子上。雅克这才看见饶勒斯的脸、额头、胡子和半张着的嘴。他大概晕过去了，脸色苍白，眼睛闭着。

一个来吃晚饭的顾客，大概是个医生，挤过人群，麻利地解开了领带和假领，抓住垂下的手，检查脉搏。

几个声音压过了喧哗声：“安静！……嘘！……”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这个握着饶勒斯手腕的陌生人。他沉默不语，深深弯着

腰，目光炯炯的脸却向着天花板上的突饰扬起，眼睛眯着。他没有改变姿势，也没有看任何人，只慢慢地摇了摇头。

从街上，好奇的人大量涌进咖啡馆。

阿尔贝先生大声嚷道：

“关门！关窗户！放下百叶窗！”

人群把雅克挤到大厅中间。饶勒斯的朋友们把饶勒斯抬起来，小心翼翼地平放到匆忙拼起的两张桌子上。雅克还想看看，但是受伤者周围的人越集越密，他只看到白色大理石桌面的一角，两只沾满灰尘的翘起的大鞋底。

“让大夫过去！”

安德烈·雷诺到底找来了一位大夫。他们两个人挤过人群。人群在他们身后象有弹性似的又合上了。人们悄悄传语：“大夫……大夫……”过了好一会儿，一片焦虑不安的寂静，接着，人们低垂着的头上起了一阵颤动。雅克看见本来戴着帽子的人把帽子摘下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低沉地传述着三个字：

“他死了……他死了……”

雅克眼里噙满泪水，转身寻找珍妮。珍妮正站着，只等他一个招呼，就立刻跑过去。她挤到雅克身边，抓住他的胳膊，沉默不语。

一队警察闯进饭店，把餐厅的人都赶出去。雅克和珍妮紧靠在一起，被人群向门口推挤过去。

他们正要出门，只见有个个人在跟警察交涉，终于走进咖啡馆。雅克认出，原来是饶勒斯的朋友，社会党人亨利·法布尔。他面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

“他在哪儿？送医院了吗？”

没有一个人敢回答。有人畏畏缩缩地向屋里一指。法布尔

这才转过身来：空荡荡的一块地方中间，强烈的光线照着一堆黑衣服，平躺在大理石桌面上，象是陈尸所的一具尸体。

外面，临时组成的纠察队伍努力驱散站在门前堵住了十字路口的人群。

雅克看到朱姆兰和拉贝正跟警察争论。雅克拉着紧紧抓住他的珍妮，挤到了他们身边。这两个人是从报社赶来的，出事的时候并没有在场，然而雅克正是从他们嘴里才知道了凶手是怎样从街上穿过开着的窗户用枪口对着开了枪，又怎样被过路的人追赶，跑了一段路，才被逮住的。

“这人是谁？现在在哪儿？”

“在马伊街的警察分局。”

“走！”雅克说了一声，领着珍妮就走。

警察局门口聚了一堆人。雅克拿出记者证，但是没有用；不再让任何人进去。

他们正要走开，卡迪约从警察分局里跑了出来，帽子也没有戴。雅克一把抓住他。卡迪约转过身来。虽然刚才在《人道报》社门口他还跟雅克说过话，但这时，他愤怒地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才认出是雅克。他终于低低地说：

“是您，蒂博？……这是第一个流血的……第一个牺牲者……下面轮到谁呢？”

“凶手是谁？”雅克问。

“一个不认识的人，名叫维兰。我看见了，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岁的光景。”

“但是，为什么要刺杀饶勒斯？为什么？”

“凶手显然是个沙文主义分子！一个疯子……”

雅克拉着他的胳膊，他甩脱开去，跑走了。

“我们还回到那里去！”雅克说。

珍妮紧紧抓着雅克的臂膀，一声不响，身体僵直，尽力迈大步跟上。

雅克俯身说道：

“您累了……要不要我把您稳稳当当安置在一个地方？我一会儿来接您……”

她又激动又疲乏，很是难受，但想到在这样的时候怎么能分开！……她没有回答，反倒更紧地偎在他身旁。雅克不再坚持。他身旁这个温热的身体帮助他抗拒失望，他不再为独自一人而担心了。

沉闷的夜。沥青发出臭味。蒙马尔特街附近各条道路上，人来人往，黑压压的一片。交通断绝了，各个窗口都有一群群的人在张望。路人即使素不相识，也互相招呼：“饶勒斯被暗杀了！”

一队警察把新月咖啡馆门前的人差不多都赶走了，目前正在极力挡住从环城大马路涌过来的人群。饶勒斯被暗杀的消息象电流一样传播开去。

雅克和珍妮走到十字路口，一队保安警察从圣马可街冲了出来。他们先清理了从胜利街到交易所广场的一段路面；接着，在广场中间散开，纵马旋绕了一会儿，使看热闹的人退到房屋跟前。趁着这阵子混乱，一些胆小怕事的人从横街上溜走了，雅克和珍妮却挤到了前列。他们一直盯着那阴暗的咖啡馆正门。正面的铁皮护窗板已经放下来，大门由保安警察把守，只有警察出出进进时，门才微微开启，这时可以在刹那之间看到灯火通明的餐厅。

两辆出租汽车，好几辆涂着标志的小轿车，一辆接一辆通过

封锁线，下来几个人，率领巡逻队的警官对他们敬了礼。这些人急急忙忙走进咖啡馆，大门立刻又关上了。熟悉情况的人悄悄指点着：“警察局长……保罗大夫……塞纳省省长……检察官……”

最后，从胜利街驶来一辆救护车，清脆的铃声响个不停，拉车的小马小步跑着。稍稍安静了一点。警察叫救护车停在新月咖啡馆大门口。四名男护士从车上跳下来，走进饭店，让车的后门大开着。

十分钟过去了。

人群焦躁不安地在原地顿足喊叫：“他们在里边干什么？”“得好好调查调查！”

忽然，雅克觉得珍妮使劲抓着他的袖子。“新月”的大门推向两边。大家都静默着，阿尔贝先生走出来，到了人行道上。咖啡馆里面灯光明亮，就象小教堂一般，挤满了身穿黑衣的警察。人们看到警察散开了，站到两厢，给担架让开路。担架上蒙着一块桌布，四个人抬着，都没有戴帽子。雅克认出了熟悉的身影：勒诺代，龙格，孔佩尔-莫勒尔，泰奥·布雷坦。

广场上，所有的人立即摘下帽子。一座房子的窗口上，有人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处死凶手！”这声音在夜空中震荡。

在静寂之中，能够听见抬担架的人的脚步声，白色的担架缓缓地穿过大门，走过人行道，摇晃了几下，一下子消失在救护车里，紧跟着上去了两个人。一个警察爬到车夫座旁边。然后，清楚地听到车门砰地一响，马走动起来，车四周有骑自行车的警察护卫。车铃叮叮当当地响着，车子向交易所方向驶去。这时，四面八方，从几百个压抑的胸膛里，突然发出深沉的、波涛汹涌似的声音，淹过了尖细的车铃声：“饶勒斯不朽！……饶勒斯不

朽！……饶勒斯不朽！……”

“我们想办法到《人道报》社去，”雅克轻轻说。

但是，周围的群众象是生了根，每个人的眼睛仍然盯着那由警察把守的、阴沉而神秘的大门。

“饶勒斯死了……”雅克喃喃自语。过了一会儿，他又重复一句：“饶勒斯死了……我还不能相信……尤其是，我不能想象、不能估量这后果……”

层层密集的人群渐渐散开。他可以挪动了。

“走！”

怎样才能走到新月街呢？休想能够穿过十字路口的封锁线，经蒙马尔特街到环城大马路也走不通。

“绕过障碍，”雅克说，“走费多街，穿过维维埃纳小巷！”

他们好不容易从小巷里走出来，又钻进了蒙马尔特街上聚集的人群。这时，群众正以不可抵挡之势推挤着他们，拥着他们往前走。

他们俩正好被冲进一支示威队伍中间。这是一股青年沙文主义分子，挥舞着旗帜，唱着《马赛曲》。他们在布瓦索尼大街上直走过来，占满了整个路面，席卷着前面的一切。

“打倒德国！……处死德皇！……打到柏林去！……”

珍妮被拥了起来，觉得失去了平衡。她感到要被踩倒，要跟雅克离开了。她恐慌地大叫一声。但是，雅克早把她拦腰搂住，使劲把她拉了过来，终于把她连抱带推，推到一个关着的大门洞里。这支队伍扬起的尘土迷了她的眼睛，刺耳的歌声和喊声震聋了她的耳朵，从她眼前闪过的一张张叫嚣着的面孔和疯狂的眼睛使她不寒而栗。她忽然看见几乎近在手边有一个铜把手，她鼓起全身剩下的力气，猛地使劲伸出手去，抓住了这救星似的把

手。真险哪！因为她觉得力气已经耗尽了。她闭上双眼，手指紧紧抓着铜把手不放松。她听见雅克在她耳边气喘吁吁地不断叮嘱：“使劲抓住……不要害怕……我扶着您……”

几分钟过去了，她终于觉得喧闹声远了，她睁开眼睛，看见雅克在向她微笑。人潮还在他俩身边向前涌去，不过速度减慢了，只是隔一阵时间才有一群，不再喊叫。看热闹的比游行的人还多。她浑身还在颤抖，喘不过气来。

“挺住！”雅克轻轻说。“您看，已经完了……”

她用手摸摸额头，把帽子戴正，这才发现黑面纱撕破了，惶恐地想道：“怎么对妈妈说呢？”

雅克说：“我们想法子从这里出去。您觉得还有力气往前走吗？”

最好是顺着人流向前走，再找一条横街走出去。雅克已经放弃了去《人道报》社的打算，心里不免有些气恼。不过，今天晚上他心灵上担负着责任：一个无比珍贵的、娇弱的人儿依托着他。他看得出，珍妮的神经已经快支持不住了。他再也没有其他考虑，只想赶紧把珍妮送回天文台大街。她由他扶着，领着往前走。她不再硬充好汉，不再说：“不用管我……”相反，以全身的重量靠在雅克手臂上。这从容自然的样子不自觉地说明她已经到了筋疲力尽的程度。

他俩迈着小步，走到交易所广场，一辆出租汽车都没有遇到。人行道上，马路上，都是步行的人，好象全巴黎的人都出来了。电影院里，正片中间，在银幕上放出了这起暗杀罪行的文字新闻。家家的影院放映结束时，观众都焦虑不安。行人大声谈论着，走到他们前面去，谈的都是同样的事。雅克零零碎碎地听到几句：“北站和东站从今晚起由军队把守……”“还在等什么？为

什么还不颁布动员令？”“照目前这个情况，你看吧，要有个奇迹才能……”“我给夏洛特打了电报，要她明天带着孩子回来……”“我对她说：‘太太，如果您也有个二十二岁的儿子，也许您就不会这样说话了！’”

报贩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饶勒斯被暗杀！”

交易所广场上，没有停着一辆车。

雅克让珍妮坐在栏杆的顶盖上。他在她旁边站着，低着头，又轻轻说了一句：

“饶勒斯死了……”

他想：“明天谁接待德国代表呢？现在，谁来保卫我们呢？只有饶勒斯永远不灰心，只有饶勒斯，政府永远堵不住他的嘴……也许，只有他，还能够阻止住动员……”

一些人慌慌张张走进邮电局去。邮电局的窗子里灯火通明，照着人行道。丰塔南自杀的那天晚上，他就是在这里给但以理发电报的，就是那天晚上，他又看见了珍妮……还不到半个月！……

在报亭前面，各报的号外赫然刊登着使人惊慌的通栏标题：

整个欧洲拿起了武器……局势严重，时刻加剧……各部部长在爱丽舍官商谈，准备对德国的挑衅行动作出决定……

一个醉汉趑趄着从他们面前走过，醉醺醺地喊了一声：“打倒战争！”雅克发现，今天晚上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喊声。从这里得出什么结论那就太天真了。然而，这个事实使人惊愕：因为无论是在饶勒斯的遗体前，还是在大街上，面对着大吵大嚷“打到柏林去”的那些沙文主义分子，没有一个声音喊出反战的口

号，而在前天，这反战的喊声还自发地响遍了示威游行的各条街道。

一辆空的出租汽车从广场那一面驶来。几个人在叫车。雅克跑过去，登上了踏板，让汽车开到珍妮面前。

他们俩上了车，紧靠着，沉默无语。两个人都同样又焦急又苦恼，颓丧得好象刚从一场灾祸里脱了身。但是，坐上汽车，他们终于离开了敌意的世界。雅克搂住珍妮，紧紧地拥抱着。尽管他很疲乏，但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一种比任何时候都强烈的生活欲望。

“雅克，”珍妮在他耳边轻声说，“您在哪儿过夜呢？”接着，仿佛早就盘算好了似的，她马上说：“到我家去吧！在我家里您什么危险都没有。您在但以理的长沙发上休息好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他用手指揉搓着姑娘的手。她的手不仅象平常一样温顺、柔软，而且炽热、敏感、充满活力，象是也在抚摸他。

他只说了一句：“很乐意。”

过了一会儿，到了楼梯下面，他跟在珍妮身后，不自觉地放轻脚步，从门房的玻璃窗下走过。只在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同时体会到珍妮对他的爱和信任是多么深刻。她只有一个人在巴黎，丰塔南夫人不知道，但以理也不知道，她就提出要他在她家里过夜……他想，他自己的尴尬珍妮也一定感觉到了，她甚至会苦恼吧？可是他想错了，她是经过考虑以后才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这样做的，其他的她并不在乎。自从遇到警察之后，她就为雅克提心吊胆，一直希望他同意到天文台大街来藏身。一个星期以前，她甚至会觉得这个计划很不体面，现在却

在她脑子里扎下了根，不觉得有什么冒失了。因此，雅克答应得这么爽快，她只觉得感激。

一进屋，她就果断地摘掉帽子，脱掉上衣，忙了起来，好象连疲劳也不觉得了。她要烧茶，要整理哥哥的房间，要在长沙发上铺上床单，收拾成床的样子。

雅克不让她干，最后不得不拉着她的手腕，强迫她住手。

“您什么都不要管，我才高兴，”他微笑着说。“马上就是清晨两点钟了。六点我就走。我不脱衣服在这里躺一会儿就行。何况，我很可能根本睡不着。”

“至少，”珍妮恳求道，“让我给你一条毯子……”

雅克帮她铺好毯子，又在插销上接上一盏床头灯。

“现在，该安排您自己了。忘掉我在这儿，好好睡觉，好好睡觉……您答应了？”

她温柔地点点头。雅克又说：

“明天早晨，我一声不响地出去，不吵醒您。我要您晚点起床，休息好了再起来……谁知道明天我们会遇到什么事！……我午饭以后再来，给您带消息来。”

珍妮又顺从地点点头。

“晚安，”他说。

他站着，在这间激起他那么多清晰的回忆的房子里，他怀着纯洁的感情把珍妮搂在怀里。他俩的胸脯接触了，他把她搂得更紧，她有点失去了镇定。两人的膝盖碰到一起。他们心里都有些慌乱，但只有雅克意识到了。

“抱紧我！”她喃喃地说。“紧紧地抱住我……”

她双臂搂住雅克的脖子，突然激情地、怀着陶醉的感情紧紧拥抱他。在这样无邪的胆量中，她仿佛比雅克更为急切。是她把

雅克推得后退一步，退到床边。他们一起倒了下去，胳膊并没有松开。

“搂紧我，”她又说。“再紧些……再紧些……”为了不让他看到她兴奋的神情，她伸手去把桌上的灯关了。

雅克竭力克制自己，然而他现在明白：珍妮不会回她自己的卧房了，今晚，他们再也不分开了……“我们也是这样……”刹那间，他这样想：“我们也象别人一样……”在他的欲念中，夹杂着一丝苦恼，一种失望和恐惧。他喘着粗气，头晕目眩，再也克制不住，在静寂之中，在那与他们同谋的黑暗里，他把珍妮紧紧搂着。

突然一阵痉挛，使他喘不出气，不再动了……接着，他身体放松，恢复了呼吸。他觉得解脱，也有些羞愧，同时强烈地感到忧伤和孤独，他又恢复了自制。

珍妮昏昏迷迷，满怀柔情，依然蜷缩在他怀里。她几乎什么也不想，只愿这美妙的一刻不要结束。她的脸颊贴着他的上衣，听着离自己的心这么近的那颗心的跳动，仿佛是个奇迹似的。穿过打开的窗子，射进乳白色的光线——是月光呢，还是黎明已临的天光？——整个房间沐浴在模糊的雾气里，墙，家具，所有坚硬而不透光的東西，突然变得半透明了。睡觉……他们在一起度过那激动人心的几个小时之后，在彼此的怀抱里沉沉睡去，真象得到补偿般的甜蜜。

雅克首先沉沉睡去。在最后的亲吻中，珍妮听见他模糊不清地说了几个字。接着，她觉到雅克紧靠着她睡着了，心里说不出地激动。她强自支撑了一会儿，尽可能地延长感到幸福的时间。等到她终于紧紧偎在他怀里，也熟睡过去的时候，她愉快地感觉到，她是委身于雅克，而不是将自己付托给睡眠。

六 四

他比她先醒。好一阵子，当他慢慢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在晨光中出神地端详着这温柔的面庞：激动和疲乏几乎没有改变脸上的青春。那嘴唇松软了，仿佛随时准备微笑。在那滑腻而柔润的、粉红色的脸颊上，仿佛水彩画笔描出似的，显出睫毛的透明的影子。他克制住自己，没有把嘴唇贴上去。他轻轻挪到长沙发边上，终于爬了起来，没有惊动她。

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衣服皱巴巴，面色发灰，头发蓬乱。想到姑娘可能会看到他这副模样，他赶快向门口走去。可是在走之前，他在壁炉上摆的花瓶里，选了几朵香豌豆，放在他刚离开的地方，做为告别的标志。然后，他掂着脚尖走出了房。

七点已经过了。今天是八月一日，星期六。新的一月，夏季的一月，假期中的月份。它将带来什么呢？战争？革命？……还是和平？

看来，今天天气非常好。

他想起，蒙巴那斯大道，靠近丁香圃附近，有一座公共浴室。他先买了报纸，才走进去。

其中有很多家报纸，例如《晨报》，《日报》，都只出一张。已经为战争而节约纸张了？报纸上满载着专门为应征入伍的人提供的具体指导：“如果发生了某种情况……应该如何。”

《人道报》这一期照常出版，框上了宽宽的黑边。整个是这次凶杀的详细报道。雅克大吃一惊：居然读到普恩加来致饶勒斯遗孀的一封激动的唁函：“……在举国团结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

需的时刻，我谨向您表示……”雅克知道，饶勒斯的夫人正在旅行，夫人回来之前，饶勒斯的朋友不对葬礼作任何安排。那么，这封信由普恩加来亲自紧急发给新闻界，目的何在？

维维亚尼以内阁的名义签署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声明，特别提到：“饶勒斯在这困难的日子，以他的声望，支持了政府的爱国行动。”最后一段隐含着审慎的威胁：“值此祖国危难之时，政府期望工人阶级和全体居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安定，不要用骚乱使首都陷入混乱之中，以致使民众更加惶恐。”政府担心发生骚乱吗？一位本市新闻栏编辑说，内政部长马尔维先生，在内阁会议上获悉刺杀饶勒斯消息以后，立即离开爱丽舍宫，回到部里，与警察局保持联系。

此外，所有的报纸都强调团结的必要性，说法一致，这暴露了已经有一个命令，各报还利用这次暗杀，争先恐后地赞扬“这位伟大的共和主义者”在逝世前“给他的党作出了榜样”，赞同“政府采取必要措施，以防最坏的假设成为事实”。读到这些评论，人们还以为，刚刚消逝的那个声音，一向只是为支持法国的民族主义政策而呼吁似的。

手段真是狡猾卑鄙！对手已被打死，最高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尸首抢过来，把它变成效忠政府的象征，当作武器使用——而且恰恰用来对付已被砍去头脑的法国社会党。“他们难道还要表决通过给他举行国葬吗？”雅克思忖着，非常反感。

他把这些已被浴室的水汽浸湿的报纸揉成一团，扔得远远的，自己愤愤地浸到温热的水里。

“必须正视现实，”他想。

“沙文主义分子”的大军增长得异常迅速，现在，进行反战斗争几乎不可能了。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作家，科学家，知识分子，

所有的人争先恐后地纷纷放弃独立批评的权利，鼓吹组织新的十字军，鼓动对宿敌的仇恨，盲目服从，准备去作无谓牺牲。甚至在左派的报纸上，群众领袖的佼佼者，昨天还以他们的崇高声望，谴责说，欧洲各国这一次骇人听闻的冲突只不过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国际范围，是追逐利润、竞争、保卫财产等等本能的最近一次的结果；而今天，他们却好象都准备以他们的影响去为政府效劳了。有些人还羞答答地，含糊不清地表示遗憾：“唉！我们以前的梦过于美妙了……”但是，他们个个都投降，个个都认为保卫祖国是合理合法的，都已经在鼓励他们的工人读者去协助屠杀，良心上不必有丝毫不安。他们这样集体动摇，使爱国主义谎言突然可以自由地扩大影响，而且势必在群众并不十分坚定的时候，使任何反抗的念头最终陷于停顿，而雅克一向以为，只有群众起来反抗才是拯救和平的唯一希望。

他痛切地感到无可奈何，心想：“嗨！这一手可准备得真漂亮……只有群众盲目狂热起来的时候，战争才打得起来。首先进行思想意识上的动员，以后，动员人不过是一蹴而就的事！”他又回想起那次群众大会。是饶勒斯还是王德威尔德，还是其他领袖，群众不是满怀信心仔细倾听他讲话吗？那天晚上，那个人在讲台上曾把革命者个人的行动比做一车车的瓦砾，海边上的，从父到子，世代向海里倾倒的瓦砾。“波涛汹涌，海浪冲散了沙石，”他大声疾呼。“但是，每一车倒下去，都会留下沉重的石头，即使数量甚小，逐渐沉积，海浪也无法冲走，堤岸就一点点建筑起来！终会有一天，石头一块块地叠起，筑成了坚固的长堤，惊涛骇浪也无法冲垮这样的长堤。将出现新的陆地，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在这块陆地上胜利前进！……”这真是崇高的比喻，那一天，激起过示威者的昂扬情绪！“可是今天，”雅克想，“在这

样的海啸之中，那时一切可笑的努力，剩下了什么呢？”

他顿时对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不要象别人所作的那样……不要由于失望而让自己解除武装！只有到了连最优秀的战士也自暴自弃，在事态发展必不可免的神话面前低头，只有到了那时，一切才真正无可救药！事态的发展，要靠我们去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希望！行动！反对令人惊慌的暗示，反对恐怖情绪的恶劣传布，把这种斗争进行到底！事态并没有到不可挽救的地步！”

他感觉到孤独得可怕。孤独，因为他忠实而又纯洁。孤独，但好象也受到这悲怆的孤独感的保护。不管他多么忧伤，他知道自己是正确的，知道自己在卫护着真理。他永远也不背弃！

他没有回珍妮家，跑到《人道报》社去。

整个一座大楼，今天早晨，好象一座死人的房子。

虽然时候还早，楼梯上，走廊上，已经有不少活动分子来来往往。他们慌乱的脸上带着悲伤和沮丧的痕迹。凶手的名字彼此传告：拉乌尔·维兰……谁也不认识这个人。是患了精神病，还是民族主义者的代理人？他的武器是谁给的？在警察分局，他没有对他的行动作任何解释。他的衣袋里找到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两句神秘的话：“祖国在危险中，必须严惩杀人犯。”

斯特发尼也象这家报纸所有的编辑一样，通宵没有睡觉。他面色灰黄，小小的黑眼睛映动着，因为流泪和不眠变得通红。

十来个社会党人挤在他的办公室里，讨论得很热烈。

有人说，德国大使索恩先生，到凯道赛进行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动，想使法国答应保持中立，拒绝给俄国军事协助。如果法国政府同意在德国对俄国作战的整个过程中让德国占领杜

尔和凡尔登的要塞，作为中立的保证，那么，德国保证决不对法作战。

某些人，例如比罗，拉贝——其实人数不多，暗示在最后一刻这样讨价还价毕竟是一个方法，可以使法国避免卷入冲突。但是大多数人，出乎意料，却保卫起法俄联盟来了。年轻的朱姆兰大声反对，他那声调使雅克回想起马尼埃尔·鲁瓦那愤慨的样子。

“这在历史上，是法国第一次不履行自己签字的义务！”

比罗突然站了起来，说：

“对不起，我们不要闲扯淡啦！……你们仔细看看事态发展的顺序，比较一下各国宣布动员的日期！尽管法国作出了种种努力，俄国早已偷偷开始积极地、顽固地进行军事准备，这个我们可以知道，我甚至可以姑且不谈；现在，只说各国正式颁布的命令。沙皇的诏书是前天，星期四下午签署的，尽管德国严厉警告过，预先明确地声明：俄国动员，就意味着战争。前天，星期四！弗朗索瓦-约瑟夫只是到了昨天，星期五，将近中午才签署了敕令。接着，也就是昨天，但是晚了几个钟头，德国宣布了‘战时危险状态’——尽管这还不等于是总动员。以上就是事态发展的精确时间表……这对于任何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又说：“即使按照《晨报》这样政府报纸的说法，俄国的总动员也是先于奥地利的总动员。事实就是这样，这很重要，在将来的历史学家看来，这是基本的。无疑，俄国必定会被看作侵略国家！……嗯，”他停了一会儿，斟酌着词句说，“我跟任何人一样关心法国的荣誉。但是，我认为，确认这些事实就足以在今天使法国有权拒绝向俄国提供援助，丝毫不肯弃法国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如此，我还认为，拒绝同侵略国家合作，将是

我国政府最后的一次机会，来明确地、无可辩驳地证明它从来不想打仗！”

沉默了一会儿，好象希望又突然升高了。

朱姆兰本人也找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但是，又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就把话题一转：

“法国所承担的义务……只是，我们了解是什么义务吗？有谁确实知道，普恩加来，受伊斯沃尔斯基的煽动，这两年以法国的名义承担了一些什么新的义务？”

“外交部长是怎么回答的？”雅克问道。“索恩的提议自然已被外交部看成‘圈套’了吧？这正是法国外交界爱唱的老调子！”

自诩了解情况的卡迪约纠正他说：“即使不看成是圈套，至少是个改头换面的挑衅——类似最后通牒。”

“什么目的呢？”

“当然就是要逼迫法国立即表态！世人皆知，德国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就是：战争一开始，立即在法国边境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他们以后得以转向东线。所以，德国尽早能进攻法国，这是十分要紧的。因此，德国力图迫使法国在德国和俄国的边境上发生战争之前就进入战争！”

斯特发尼方才就已经显得不耐烦了，这时他用颤抖的声音打断争论：

“你们都这样推理，老天爷！就好象战争已经爆发或者马上就要爆发似的！其实，目前，法德社会党人之间的联盟比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缪勒就要到达，他今天晚上就能来到我们中间，这样我们可以指望立即采取决定性的共同行动。”

大家都不响了，刹那间，饶勒斯的影子在屋里回翔。斯特发尼的话就象头头说的一样。的确，在目前情况下，德国社会民主

党正式派遣一名代表到巴黎来，不顾政府的反对，签订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条约，不正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实，值得人们抱有一切希望吗？

“这些德国人真棒！”朱姆兰喊道。他刚才的观点还极端悲观，现在毫无过渡地又充满了青年人的信心，这清楚地表明了普遍的混乱。

勒诺代进来，转移了注意力。

他脸色苍白，面孔浮肿，两眼失神：他一整夜都在他的朋友的遗体前守灵。

他来参加定于今天早晨在《人道报》社紧急召开的塞纳省社会党执行局的会议，研究由于头头的去世在党内造成的形势。他想在会前先跟斯特发尼谈谈工会联盟刚刚发出的号召。他说，在里昂、马赛、图卢兹、波尔多、南特、卢昂、里尔，到处都在组织新的示威游行。——“不，不！”他攥紧拳头反复说：“还不应该灰心丧气。”

大家都走了，只留下斯特发尼和勒诺代。雅克先想去看加洛。加洛不在他的办公室，雅克就走出报社。去找珍妮之前，他想到无政府主义的那些人中间去观察一下形势，就到《绝对自由报》去了。

但是，走到当古广场，遇到了科舒瓦兄弟俩，他们是常去《绝对自由报》社的两个泥瓦工，他们劝雅克赶快离远一些。

“我们刚从报社来。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人都躲开了。警察在附近转来转去，何苦招他们注意？”

雅克陪着他们走了一会儿。三人漫无目的地往前走。这两兄弟今天破例没有去工地，“就是因为这些事。”

哥哥问道：“你对他们这场战争有什么想法？”他是个棕红头发的大个子，长着雀斑，脸上的线条相当粗野，但是，在微蓝色的眼睛里，今天上午却显出不同寻常的温柔。

弟弟打断他的话：“他无所谓，他是瑞士人。”（虽然兄弟两个不是孪生，但他简直是跟他哥哥由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不过，就象已经完成的雕塑品相似于原来的粗坯。）

雅克觉得没有必要说明真相。

“不，我并不无所谓，”他阴郁地说。

弟弟善意地看看他：

“当然了，不过，反正你跟我们这些陷在里面的不一样。”

哥哥大概是喝了点酒，庆贺这料想不到的休假，很是健谈：

“嗨，我们，很简单！人只有一条命，当然重视……我并不是说，必要的时候，不肯为理想去拚命。可是，那些沙文主义分子的想法，佩服，佩服！他们高兴打仗，让他们去打吧！我们的祖国，就是能够安安静静干活的地方。对不对，儒勒？”

弟弟不信任地吹起了口哨。

“那么，”雅克问。“如果人家来动员，你们……怎么办？”（他想起自己的情况。安托万问他：“你怎么办？”他的回答是诚恳的。他还不知道。反正要斗争，拚命地斗争。然而在什么地方斗争呢？跟谁在一起？怎样斗争？……不过，他不愿意多想，因为多想，就是对和平已经怀疑了。）

弟弟向哥哥偷偷看了一眼，好象怕哥哥太多嘴，他赶紧回答：

“动员令的第九天才轮到我們。我们还有的是时间。”

但是，哥哥并没有看到弟弟的眼色，他向雅克俯过身，压低嗓门：

“你认识萨亚瓦尔吗？不认识？是个麻子……萨亚瓦尔……他是波尔布人。你想想，西班牙的边境，他了如指掌，就象我们熟悉梅尼穆什区的街道一样……”他机密地挤挤眼：“即使打仗，西班牙大概也会中立。在那里，很清楚，什么也不会碍着你象人一样挣钱吃饭，……说起干活儿，咱们不含糊。对不对，儒勒？”

弟弟抬头看了雅克一眼，蓝色的眼珠发出金属的光泽，低声说：

“你可别对人说！”

“你们放心好了，”雅克说着，握握他们的手。

他看着他们走远，摇摇头，思忖道：

“不，不能这样，我才不……逃到中立国家去，可以保全自己，但是，如果这只是为了‘安安静静干活’和‘挣钱吃饭’，而别人正在……不行！……”他向前迈了几步，又停下脚：“那么，怎么办呢？”

六 五

安娜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到电话机跟前，正要摘下耳机，转念想道：“我多么愚蠢！十一点二十，他还在医院里……我要不要到医院门口截住他？在那里，他就跑不掉了。”

她想起，上午，她给了司机假。为了不耽误一分钟，更为了不再焦心地等待，她一打扮好就走出家门，跳上一辆出租汽车：

“塞伏勒街！到地方我会叫您停车。”

医院的门房还没有看见蒂博大夫出来。

安娜向沿着人行道停着的几辆汽车看看，没有看到安托万

的那辆车。但他也许把车停在院子里了，并且，他并不是每天早上都坐自己的车来。

她又上了出租汽车，上身靠在车窗上，监视着医院大门进进出出的人。十二点差五分……十二点……大钟打了十二下，附近一座教堂里的钟也马上响应。职工、护士，潮水一般涌到人行道上。

突然，她额上沁出汗珠。她刚刚想起在横街上还有一道侧门。她慌忙下车，吩咐门房看到蒂博大夫出来就拦住别让他走，然后，自己向侧门走去。

人行道很窄，挤满了匆忙的行人。马路上小汽车和卡车络绎不绝，热闹街道上一片可怕的喧闹声。她感到一阵眩晕，赶紧站住。太阳穴嗡嗡响。她闭上眼睛，冷静地想着还不如死了的好。然而，她立刻又振作起来，像个梦游者似的迈开腿，走到了那个门口，进了门房。

蒂博大夫？对！他离开医院已经有一会儿了……

她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道谢，像个撒泼的女人一样出了大门。怎么办？再打一次电话到大学街去？（昨天她打过好几次，今天上午也打了，正好安托万刚走，至少雷昂是这么回答的。她那时问道：“走得这么早？”这是真的吗？才七点一刻……）

她又回到门房。

“我可以打个电话吗？有急事。”

占线，还得等着，终于电话接通了。

“先生不在，先生说了，今天不回来吃午饭……”

雷昂的声音冷漠极了。安娜现在恨他。她再也不能忍受这个彬彬有礼、拖着长声的嗓音了。这个声音总是插在她和安托万中间，使她不能得到她在电话里乞求的直接的、活的、差不多

可以说是肉体的接触。

她一声不响，挂上电话，又来到人行道上。

“算了，我自己去一趟！……我要看看他们是不是撒谎！”

得先到她的出租汽车那里去。她跑了起来，钻到人群里，屈服于这鞭笞着她的情欲，心里很是恼火，但又没有力量克制。

“大学街四号乙！”

远远看到新修的门墙、遮阳和大门，一阵恐惧倒使她动弹不得了。她想象着安托万正在吃饭，被打搅了，从前厅那一头向她走来，手里还拿着餐巾，脸上露出高傲的样子。她对他说什么呢？“东尼，我爱你”？她忽然有些怕他，怕他那皱紧的眉头，他的下巴和她想象得非常清楚的、含着怒意的冷酷的眼神。

也许，给他写封信？

“在街角上停住，那儿，邮局……”

她要了一个快信信封，飞速地写道：

“我要见你，东尼，只一小会儿。什么时间都行，什么地方都行。你给我打电话来。我等着。我要见你，我的东尼。”

这就是她自己也在不断重复的话：“我要见你。”她深信，只要能再见着他，哪怕是一分钟，她也一定能找出话来抓住他，再得到他。

安娜把快信放进邮筒，溜了出来，为她自己害臊。

快信送到大学街的时候，安托万还在吃饭，正对鲁瓦说：

“小家伙，我相信你的话，”鲁瓦两颊通红，刚刚叙述了他昨天晚上参加沙文主义分子示威的事。“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你的

话！我们这个时刻正是爱国精神荒谬的大爆发的时候……只不过，您知道吗？这些走上大街，表示他们主张打仗的善良孩子们，他们让我想起了什么？……”

雷昂递给他小小的蓝信封。他认出了笔迹，眼睛里掠过了阴影。

“……他们使我想起了一个广告，我小的时候，在巴黎的墙上可以看到……”他一边说话，一边拆开信封上的打眼开拆线，眼睛却没有看手上在干什么。他终于瞥了一眼那信，马上把它撕成碎片，继续说完他的话：“广告上画着一群鹅……正在向拿着一把尖刀的厨子欢呼……还写着这样的说明文字：‘斯特拉斯堡肉馅饼万岁！’……”他把蓝信封的碎片撒到盘子里，不说话了。

他和安娜之间，没有作过任何解释。只不过，自从会晤西蒙之后，安托万执拗地躲开她的来访，避开约会，不接她的任何电话。这么一个暧昧的态度，倒不是预先想好的，这不象是他平素的作风。他为此感到痛苦。因为他喜欢明朗的状况。他很想同安娜作一次决定性的谈话。他甚至每天有好几次这样明确地考虑——就是每次雷昂垂着眼睛，用那句预言似的话告诉他：“有人来电话”的时候。但是，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过去了，他总是筋疲力尽，偶尔可以摆脱职业活动，却又忧心忡忡，陷入报纸堆里，或者是以不正常的迎合态度听任遇见的人抓住他谈个没完。而他们跟他也一样，想的只是战争，不谈别的。有时候，他也觉得奇怪，对于这个一点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女人，无论如何，一个星期以前还在他生活中占据极大位置的女人，他只感到一种敌意的冷漠……

他觉得自己是个特例，并没有想到他也是受着一种非常普

遍的现象控制。动乱震撼着欧洲，也动摇了个人生活。到处，在人与人之间，不自然的关系松散了，自行断裂了。掠过世界的这一股预兆性的风，从枝头把虫蛀的果子刮了下来。

六 六

早在中午以前，雅克就回到了天文台大街。

珍妮没有料到他来得这么早。她不好意思地承认一直睡到了九点钟。她在专心看报，寻找一点一滴有关奥地利的消息。一说起她耽搁在维也纳的母亲命运，她的声音就发抖。她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步，两手捂着脸。

雅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既能安慰她，又不对她撒谎。一个如此亲近、如此脆弱的苦恼使他觉得严重事态的份量更重了。除了他已经为维护受到威胁的和平而斗争的那些理由之外，刹那间，又增添了一分为姑娘解除苦恼的天真愿望。

“您坐下吧，不要这么站着，愁眉苦脸的……这真让我受不了，亲爱的……还没有任何损失！……”

珍妮恨不得相信他的话。他无论怎样，总微笑着，好使她安心。他热情地谈到缪勒的任务，斯特发尼的强烈希望。自己竟也被自己的这些话感动了。他甚至怀着几乎是真诚的热情说：

“危险已经这样明显，这样普遍，也许倒是件好事！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舆论的巨大觉醒，我们必须引起这种觉醒！”

她凝住眼神，答应说：“对啦。”

她激动地站起来，拉开窗帘，动作太急促，绳子把手指绕住了。

他走到她身边，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拉到胸前。

“来，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吧，看看我……我觉得在这里这么好！我来这里喘喘气，恢复一下精力。我需要您……我需要您有信心！”

珍妮的面容马上改变了，她鼓足勇气笑了笑。

“太好了！现在，戴上您的帽子，我带您去吃午饭。”

“您愿意在这里吃午饭吗？”珍妮说，神情活泼，却不是装出来的，这使雅克觉得很惊奇。“在这里吃午饭多么好！我有鸡蛋，几个桃子，还有茶……”

他同意了。

珍妮特别高兴，跑去点着了煤气灶。雅克跟着她一直到了厨房。这一会儿，摆脱了始终缠绕在脑子里的想法，他看着她在桌子上铺了一块小桌布，对称地摆好餐具，在盛冷盘的小盘子里整整齐齐地放了几个贝壳状的黄油球，忙忙碌碌，正象做事有条不紊的女人按照规矩来安排最琐碎的家务那么严肃认真。她每个细小的动作都那么灵活，那么自然！爱情终于克服了她的生硬，使她身上显露出了女性的风韵，而一直到当时，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压力把这种风韵闭锁在她身上了似的。

“我们第一次的家常饭，”她把鸡蛋盘子端上桌子时，用几乎是严肃的声调说了一句。

他们面对面地坐下来，就象一对老伴侣。她兴高采烈，他也尽量显得高兴，可是他的额头还是显出忧虑的神情。她偷眼观察他，他觉察到了，微笑起来：

“我们在这儿很好呀！”

“对！”她怀着确信应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在一起！”

他垂下眼睛，忽然想起将来，不禁觉得恐惧。

他们继续吃着饭，未能真正打破沉默。有几次，雅克温柔地

长久注视着姑娘，找不到话来表达他现在的感觉，只是伸出胳膊，把手在珍妮的手上放一会儿。

看到雅克一言不发，她觉得难受。这几天来，她身上发生了变化，一反原来的性情，也违反她长期以来内省的习惯，她第一次很希望谈谈她自己。甚至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是不断在心里对雅克作着独白，在他面前仔细地剖析自己，向他无情地揭示自己性格上的弱点、她可能作到的事和她的局限性。因为她一向担心雅克对她幻想太多，到了进一步了解她的那一天，会觉得非常失望。

他们吃完了果盘里的水果，珍妮要他把餐巾折起来，把但以理的餐巾环给了他，然后，就好象对她哥哥一样，挽着雅克的手臂，把他领到她的房间。

从半掩着门的客厅前走过，他望见了钢琴，这时，阳光正照得它闪闪发光……他站住了，忽然心血来潮。

“珍妮，给我弹一曲……您知道的……那支曲子……就是过去您弹的。”

“什么？”

她完全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只不过她不敢回忆起在拉菲特庄他们那个痛苦的夏天。

“噢，雅克……今天不弹吧……”

“不！”

她推开门，打开钢琴，顺从地弹起肖邦的《第三练习曲》——这使她回忆起她一生中最混乱、最绝望的那一个晚上。

他盘起手臂，站在她身后的阴影里，不让她看见。他激动地闭上眼睛，止住眼泪，心痛欲碎，静听着这沉溺于怀念之中的乐声在静寂中颤动。珍妮弹完了最后几个音符，站起身来，直挺挺

的，退后一步，走过来，偎依在他身上。

他在她耳边说：“对不起。”声音低沉、痛苦，是她从来没有听见过的。

“为什么？”她恐惧地问。

“我们本来早就可以很幸福了！……”

她微微一抖，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

玻璃门开着。她轻轻地把他拉到阳台上。眼底下，大街上的树梢织成郁郁葱葱的青翠绒毯，从那里，不时传来孩子们的喊叫声，象一群麻雀在吱吱喳喳，却看不见孩子。远处，卢森堡公园的茂密树木，已显出铜绿色，预示着秋天的红棕色快要来了。

雅克机械地看着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灿烂的全景，心里想：“缪勒大概离开布鲁塞尔了。”他不能想别的事情。

在他身边，珍妮梦幻似地低语：

“我认识每一棵树……我认识树底下每一条凳子，每一个塑像的底座……我整个的童年是在这个花园里度过的。”停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喜欢回忆……您也喜欢吗？”

“不，”雅克毫不委婉地回答。

她赶紧转过脸来，伤心地看他一眼，又用不赞成的口气说：

“但以理也不喜欢。”

他觉得应该解释一下，他鼓足勇气说：

“在我看来，过去的事就是过去了。已经过去的每一天都已经隐没在一个黑洞里。我的眼睛一向看着未来。”

这些话很伤珍妮的自尊心，她不敢说出来那伤害的强烈程度。因为对于她来说，现实无足轻重，而未来还完全不存在，她的整个内心生活几乎全是由回忆滋养着的。

“这不可能。您这样说，是为了使您显得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不，”她脸红了，说，“我的意思不是说与众不同……”她思索了一会儿。“您难道没有感觉到，有时候，需要……得罪一些人？当然，得罪不是为了获得乐趣……而是……说不定是为了更能避开他们……是不是？”

“怎么？避开他们？”他考虑一下，承认了：“对，也许是这样……感觉到别人对我有一个固定的看法，我就确实受不了。好象是他們要限制我，在我思想上加上桎梏似的。于是，对，也许我有时候就故意躲开他们，只不过是了解脱这种控制……”

他发现，珍妮刚才使他不得不回顾自己的往昔，他自己显然是不会这样作的，所以他对珍妮非常感激。他责备自己不该对缅怀往事愚蠢地表示轻蔑，伤了她的自尊心。他用一只胳膊把珍妮更紧地搂住：

“我刚才让您难过了。真可笑……因为这个，您是那么神经紧张……”他微笑着说：“那么，为了减轻我的错误，让我们说，珍妮是个……过分敏感的小姑娘！”

“对，真的，”她马上接口。“过分敏感！”她考虑了一会儿：“我很敏感，同时，我性子并不好。”

他微笑了。

“不，不……我很了解我自己！每逢我要做得使别人相信我性子好的时候，其实，都是经过考虑的，是凭借意志力，去完成一种义务……我完全没有那种自然的、发自本心、自然而然的好性子……比方说，象妈妈那样好性子……”她差一点再说一句：“象您那样。”不过，她没有说出来。

他诧异地看她一眼。在她身上，好象有某种东西忽然闭锁起来。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她大声说出对于自己的剖析更显得神

秘了。每逢这些时候，她的面容就显得凝滞，眼光也严峻起来，雅克感到跟她失去了接触，在他面前的只是个石头人，顽强抵制，无法交流，谜也似的，而这解不开的神秘使他男性的高傲受到屈辱。

他严肃地低声说：

“珍妮，您象一座岛……一座充满欢笑的岛，一座阳光灿烂的岛……但是，可望不可即！……”

她浑身一抖：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您不公平！”

一股阴郁的寒气从他们中间吹过，珍妮顿时周身冰凉。两人半晌做声不得。他们靠在一起，俯在阳台的栏杆上，各人想着深藏在心底里的事情，都有些惴惴不安。

远远传来参议院大钟的钟声：间隔着打了两下。雅克看看自己的表，挺起身来：

“两点了！”他总丢不开这个心事，又说：“缪勒已在路上了。”

他们回到屋里。雅克并没有请她跟他一起出去，她也没有要求。然而，好象是很自然的事——珍妮向自己的房间跑去，一面说：

“只等一分钟……我就准备好。”

雅克听着，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雅克决定把珍妮带到《人道报》社去。在那里，他首先想要向拉贝打听一下，为德国代表到来，作了些什么安排。正好，他们在楼梯中间遇见了他。缪勒所乘的从比利时来的火车五点多钟抵达巴黎，已经邀集社会党议员六点钟在波旁宫的一个大厅里开会，欢迎缪勒。因为这次会议很重要，估计要开到夜里很晚

的时候。

这位老活动家又说：“我们都到北站去接他。”

雅克向珍妮弯过身来说道：“我们也去。”

北站！刹那间，她回忆起她和雅克第一次相会的全部情景，他在地铁的走廊里追她，圣樊尚·德·保罗街心花园的长凳……她抬眼望望他，天真地以为他也在想这个。然而他转身向着拉贝，问他上午社会党省执行局会议上表决通过了什么决议。

“什么决议也没有，”老头儿咕哝着。“执行局委员们什么都没有决定，就分手了。党已经没有了首领！”

《人道报》的各个编辑室，气氛很是压抑。在加洛的办公室，帕热斯、卡迪约，还有其他几个人在争论。

据传，自从德国宣布战时危险状态，法国参谋部就围攻政府，要求立即宣布动员令，不再拖延。据说，这只是个按小时计算的问题了。帕热斯甚至说，他从霞飞将军秘书处的一个文书那里知道，普恩加来在中午已经签署了动员令。但是，从凯道赛回来的卡迪约坚持说这消息不确实。

“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会知道的，”他充分肯定说。

据他说，外交部今天最关心的是英国政府的态度。某些象卡约那样的政客，曾想敦促法国社会党首领去跟凯尔—哈尔迪疏通一番，让英国社会党不要再主张英国中立。另一方面，普恩加来已经主动向乔治五世写了一封私人函件，敦促英国宣布站在法国一边，既然英国的干预是拯救和平的最后机会。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雅克问。

“昨天。”

“就是了！正是普恩加来知道俄国已经公开宣布动员，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之后！”

没有人再说话。

早晨有一则电讯，显然是官方的，说法国参谋部和英国参谋部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且“一同商定了一个行动计划”。是一个军事行动吗？从半官方人士获悉，英国已向舰队下达命令，要它们监视拉芒什和加来海峡，已经禁止商船进入各军港；英国炮兵已经进驻控制这些军港的各要塞；海岸各灯塔奉命今天晚上都不点灯。

马克·勒瓦尔进来了。

他叙述了维维亚尼和索恩先生最近的一次会谈的大概的情况。法国总理说：“我们知道，德国动员了。”德国大使一声不出，维维亚尼就又说：“由于德国的态度，我们也将采取我们的态度……不过，为了把我们维护和平的愿望表示到底，让各方面都看清楚，霞飞将军已经下令我国一切部队从边界至少撤退十公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有事件发生，那就是你们挑起来的！”

帕热斯常到陆军部走动，马上把事情说得更加明确。照他看，法国这一主动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一点也不妨害法国参谋部原定的作战计划，只不过是表面上作出为和平牺牲的姿态。据他说，梅西米部长左右的人士并不讳言：这种临时撤退无非是一个外交手腕，是故意地打动欧洲舆论，尤其是英国舆论的一种手段。

“我愿意相信，”雅克说，“他们的目的也是争取英国的支持，但我觉得，他们的主要目的还在于击中我们！我们，这些和平主义者，使我们出其不意，获取我们的同情，在我们面前开脱他们自己的罪责！是向我们提供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好叫我们无所顾忌，去跟军事当局合作，既然这个军事当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具有的侵略性如此之少。我已经预见到明天在反对派的报

纸上会看到什么样的文章！”

虽然谈话的声音很响，加洛仍然一直整理稿件，这时突然从他那一堆纸张后面抬起他刺猬似的脑袋：

“证据，就是政府甚至在采取这个措施之前，就迫不及待，通过半官方途径把它特别强调地告诉了我们党的领导。”

愤怒的声音跟他的相貌很是相配，再加上细长的四肢，瑟缩的小职员的样子，即使他说的对，也往往象是错的。但今天，雅克发现他的愤怒并没有扫清他那眼睛里深不可测的悲哀表情，这样，他虽然长得难看，也显得非常感人。

一群年轻的活动分子冲进办公室，刚才，传闻说有一队爱国联盟的人正向协和广场走去，准备在斯特拉斯堡塑像前示威。

“我们也去？”帕热斯建议。

大家都站了起来。（其实，他们并不是急于挑起一场报复性的斗殴，而是想借这个机会总算采取了“一点行动”。）

珍妮猜测雅克本来很想跟他们一起去，但是因为有了她，所以还在犹豫。

“我们也去吧！”她坚决地说。

六 七

太阳雾蒙蒙的，但是灼热炙人，直晒在头顶上，巴黎市中心的空气令人窒息。老百姓的心里越来越忐忑不安，就象苍蝇一样，在这暴风雨前的炎热中更加烦躁，始终在大街上游荡。在信贷处、警察局、市政机关的门前，聚集着一堆堆骚动的人群，警察力求驱散他们，不要发生什么事故。报贩的叫卖声压过群众低沉的嗡嗡声，刺激得神经愈发紧张。

在金字塔广场，贞德纪念碑脚下撒满了鲜花，就象灵柩台一样。黎伏里街的拱廊下，一队队的行人朝相反的方向匆匆走过。大多数商店关了店门。马路上车辆很多，跟平时冬天最热闹的日子一样。相反，土伊勒利公园里，要是没有聚集待命的保安警察，那就算得渺无一人了，树荫下，这时只见一群群马活动的臀部和闪着光的钢盔。

要举行示威游行的消息大概不确，协和广场毫无异常迹象。甚至交通都没有中断。只有一小队警察，守卫着通往斯特拉斯堡塑像的入口，以防万一。塑像的底座也被系着三色饰带的花环埋住了。

从《人道报》来的这一小队人感到失望，就走散了。

雅克和珍妮走到罗亚尔街嘈杂的人群里。

“四点半了，”雅克说。“我们去接缪勒。您不累吗？我们可以一直走到北站。”

他们取道环城马路，走过郭马丹街，到达圣撒拉路街。正当他们从圣路易当坦教堂门前走过的时候，忽然听见一片震耳欲聋的声响：教堂里的大钟一下接一下，以一个音调庄严地回响起来，嗡嗡的声音充塞了天地。

行人顿时站住，面面相觑，愣住了，接着，就向四面八方瞎跑起来。

“怎么？出了什么事？”珍妮结结巴巴地问，雅克抓住了她的胳膊。

“来了！”在他们身后，有个人小声说。

远处，另外几座钟也响起来。刹时间，整个巴黎上空仿佛是一个青铜的穹顶，四面八方，以同样执拗的节律都响了起来，凄惨得就象丧钟。

珍妮不明白，又问一句：

“怎么了？人们往哪儿跑？”

雅克一言不发，拽着她穿过马路。只见路面上行人成百上千，不顾来往的车辆，到处乱窜。

一所邮电局前面转眼之间聚集了一大群人。

邮电局玻璃窗里面，刚刚贴出了一张白纸告示。可是雅克和珍妮离得太远，看不见上面的字。又有人低声说：“来了……来了……”最前几排的人，站在那里目瞪口呆，仰头看着告示，象是很费力气地辨识上面的文字，然后转过身来，目光悲戚，面容委顿，满脸汗水；有一些人不声不响，谁也不看，挤开一条通路，垂着头走掉了；又有一些人却相反，眼里噙着泪水，点着头，很不情愿地走开，到处寻找同情的目光，嘴里念念有词，却没有一个人管理他们。

两个年轻人终于挤到了告示跟前。小小的长方形纸片，四角用暗红色的封漆贴在玻璃上，没有性格但很工整的女人写的笔迹写着这样三行字，在下面用尺规规矩矩划了横线：

总 动 员

动员的第一天

为八月二日星期日

珍妮把雅克刚才扶着她胳膊的那只手紧紧地按在胸前。雅克一动也不动，他也象别人一样在想：“来了。”在他脑子里，飞快地闪过各种想法。无论如何，他很感奇怪：竟不觉得什么痛苦。要不是那一下又一下锤击着他脑子的钟声，也许甚至可以说他感到神经上的某种松弛。这种机体上的轻松感，在这暴

雨欲来的一天最后时刻，过一会儿，第一滴雨点也一定会给他带来的……这反常的轻松只持续了一刹那，就象个受伤的人，最初并没有感到打击，但伤口马上裂开，流着血，这才觉到刺心的痛楚。珍妮咬着牙，发出嘶哑的叹息：

“雅克……”

雅克不想说话，任凭珍妮带着他挤出人群。人行道上堆满了咖啡馆里的桌椅，他们默然无语地坐下。布告前的人走了一群又来一群。在攒动的人头上，他们看着玻璃窗上贴着的白色告示，无法转过眼睛。

几个星期来，他没有一天怀疑过，正义，人类的真理，爱，必定战胜；并不是一个有宗教幻象的人等待着奇迹，而是象一个物理学家，期待着决无差错的试验结果——然而，这一切就这样崩溃了……可耻啊！一种冷然的蔑视一切的义愤充塞着他的胸膛。他从来没有感到过受了这么大的侮辱。不完全是愤慨和灰心，更多的还是惶惑和屈辱。他觉得屈辱，因为人民的意志竟是这样柔弱，人竟是这样不可救药的平庸，理性竟是这样软弱无能！……“我呢？”他想。“现在，怎么办？”在这意识清醒的刹那间，他深入到自己的内心，在最隐秘的孤寂之中探索，试图在那里找出一个答案、一个口号、一个方向。但是，找不到。面对着自己的犹豫，他不禁感到一阵恐慌。

珍妮没有打破他的沉默。她怀着好奇和恐惧看着周围。她很难把动员、战争看作是什么现实的东西。她马上想到了母亲，想到了但以理，特别想到雅克。但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这些亲爱的人面临什么危险她并不十分清楚。

好象是雅克焦虑的回声，她低声问道：

“您怎么办？”

她的声音沉着而坚强。雅克立刻想道：

“在这样的情况，她是多么好……”

可是，他没有勇气回答。他转过眼去，擦擦额头上的汗，站起身来说：

“我们还是去车站吧！”

整个一下午，安娜蜷缩在电话机旁的安乐椅上，等着安托万的信息，始终没有等到。几乎有二十多次，她差一点拿起耳机，她已经快忍受不住了，却仍然决心等待，自己不先去叫他。一张打开的报纸扔在她脚下，她曾悻悻然看了一遍，可是，什么奥地利，俄国，德国，这些事情，跟她有什么相干？……就象个躁狂症的病人一般，只想着自己，不断地想象着跟安托万一起在瓦格拉姆街他们那间房里幽会的情景，不断增添新的细节，新的答话，越来越尖刻的责备，这样，她的怨恨一时减轻了。接着，她又忽然忘了发怒，向他请求饶恕，双臂搂着他，拉他到床上去……

忽然她听到底楼的门在响，有人在跑。她下意识地抬眼看了看座钟，五点差二十。门砰地一下打开了，女仆闯进来：

“太太，约瑟看见动员令了，刚刚在邮电局门口贴出来，要打仗了！”

“怎么？”她冷冷地问。

她在心里又重复一遍：“打仗……”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头一个想法是恼火：“西蒙要回来了。”接着又想：“让他去打仗吧，这个笨蛋！”可是，一个刺心的念头马上闪进脑中：“我的上帝，打起仗来，东尼岂不是要走……他们会把他给我杀死的！……”她一下子跳了起来：

“拿我的帽子和手套……快……叫司机准备车子。”

她在壁炉上的镜子里照了照，显得苍老了，鼻孔紧抽着。
“不，我今天太丑了，”她灰心丧气地想。

当女仆再进来的时候，安娜又坐到安乐椅上去了，上身向前俯着，两只手合着夹在两个膝盖之间……她没有抬起身，只用温和的声音说：

“我不走了，于丝第娜，谢谢你……告诉约瑟，不要准备车了，给我预备洗澡水，好吗？水要热……给我铺床。我想睡一睡……”

片刻之后，她在卧室里，在微暗的光线里躺着。窗帘拉上了。电话机就在近旁，如果他来电话，她只要一伸手就是了……还是躺在这新换洗的被子里，觉得难受得轻一些。自然，不能马上觉得很舒服。要耐心等到半个钟头以后，才能不再心悸，血不再往上涌，脑子麻木一些。但是，这样的等待，确实需要超人的努力。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连睫毛都不跳动一下……东尼……战争……东尼……啊！只要能再见着他，再把他抓住！

她一下子跳起来，两手捂着脸，赤着脚，踉踉跄跄跑到小客厅，连椅子都不想搬过来，就跪在书桌前的地毯上，抓起一张纸和一支铅笔，草草地写道：

“我太痛苦了，东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受不了啦，我受不了啦。也许你要走了？什么时候？你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了。我对你作什么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东尼，今天晚上，在我们家里，我要见你，我等着你。现在是五点钟。我要去，我在那里等你，等一晚上，等一夜。你一有时间就来吧！一定要来，我要见你。答应我一定来。我的东

尼，快来。”

她打铃。

“告诉约瑟，叫他把这个马上送去，叫他一直送到楼上去。”

想到西蒙也许会乘上午的火车，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到了……她慌忙穿上衣服，溜了出去。

为了使自己镇静一下，她虽然急不可待，还是强迫自己徒步走到瓦格拉姆街。

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她拿得准，很准，觉得安托万一定会来。

从死胡同的后门，她走进“他们的家”。当她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她感觉到他在里面。她那么确定，甚至迷信地微笑起来。她悄悄地关上门，蹑着脚，穿过几间门都大开着的房间，轻声叫着：“东尼……东尼……”卧室里没有人。他一定听见了，一定是藏起来了。她跑到洗澡间，甚至跑到厨房去。她累了，回到卧室，坐在床上。

安托万不在，但他就会来的……

她慢慢地脱衣服。她先脱鞋，再脱袜子，就象剥水果的皮一样，动作迟缓，然而决断，肉体一下子裸露出来，觉得好象听到有人在走动，转过头去。不是，他还没有来……她的目光在房间里巡视，盯在他们的床上。她喜欢第一个醒来，端详着她熟睡的情人，尽情地观察着他那没有皱纹的前额，松弛的、没有意志的嘴——那么与平素不同，还有他那半张开的、孩子似的放松的嘴唇！只有在这样的时刻她才感觉到安托万是属于她的。“我的东尼……”他就要来了，她十分确信。他今晚一定来。

她不是在骗自己。

六 八

北站已由军队进驻。院子里、候车厅里，到处是红色的军裤、枪架、短促的命令和枪托的声音。不过，还让老百姓自由出入，雅克和珍妮没有费什么周折就进了站台。

有六十多个活动分子在等着火车。“来了！”他们走拢来互相打招呼，这样重复着说。他们愤怒地摇头，握紧拳头，怒冲冲地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然而，在如此容易克制的激动下面，已经显露出消极和顺从。好象所有的人都在想：“这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老拉贝静静地跟雅克握过手以后，说道：

“如果头头还在，他会怎么说，怎么做呢？”

“希望只在跟缪勒的这次会谈了，”雅克低声说，声调是执拗的。他始终保持着信心，就象恪守誓言一样。

前面，人行道的尽头，社会党议员代表团组成了一支很显眼的队伍。

雅克在一群群的人中间穿过，没有跟任何一堆人混到一起，身后跟着珍妮和拉贝。他的眼睛看着远方，象在梦中似的说：

“这个人在最悲惨的时刻从德国来到我们这里，也许肩负着最为沉重的责任……这个人前天从柏林动身，取道比利时到这里来，还什么事都不知道……他大概已经逐渐地、一步接一步地知道了俄国已经动员，奥地利已经动员，德国已经宣布战争危险状态，还有，今天上午，他知道饶勒斯遭到暗杀……当他下火车的时候，人家会告诉他，法国已经宣布动员……到最后，今天晚上，他一定会得知，他的国家也下令总动员……多么可悲！……”

当火车头终于从水汽中显露出来，把云雾一般的蒸汽喷到

前面的时候，站台上微微一阵骚动。大家都一齐往前挤，不过车站的职员维持着秩序。乱了一阵，临时组织了个路障，只有议员代表团获准走近列车。

雅克看到他们围住一节车厢。踏板上站着两个旅客。雅克马上认出了海尔曼·缪勒。另外一个他不认识，还很年轻，长得魁伟，坚毅的脸上露出正直有力的神情。

“陪着缪勒的是谁？”他问拉贝。

“亨利·德·曼，比利时人，是个真正纯洁的同志，深思熟虑，不断探索……你星期三在布鲁塞尔一定看见过他？……他说德语说得跟法语一样流利，来这里大概是当翻译的。”

珍妮碰碰雅克的胳膊：

“看……现在放行了。”

他们赶紧往那一队官方人士那边挤，但是一队旅客堵住了出口。

等到他们穿过几道边门，要把德国代表直接领到波旁宫举行秘密会议的议员代表团已经不见了。

在候车大厅，一群人站在新贴出来的一张布告前面。珍妮和雅克也挤了上去。布告的标题是用大字写的，

有关外国人的规定

他们身后，有一个人讥讽地说：

“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这些混蛋！真叫人觉得他们在事先都印好了！”

珍妮回过头去。说话的那个人是个青年工人，穿着蓝色的

工装裤，嘴上叼着个烟头。两只崭新的厚皮子大皮鞋，一前一后地搭在肩头。

“你也没有浪费时间嘛！”他的同伴指着带钉子的大皮鞋对他说。

“这是用来踢威廉^①的屁股的！”那工人说了这一句，就走远了。大家笑起来。

雅克没有动弹，眼睛一直盯着那布告。痉挛的手紧抓着珍妮的臂肘，另一只手指着用粗体字写的一段：

“外国人，不分国籍，可于公布动员令的第一天之内离开已经设防的巴黎。动身时必须向火车站警察局交验身份证明。”

雅克的脑子里闪过许多想法。“外国人……”放在珍妮家的那个小包里，还有去柏林执行任务用的假身份证。法国人雅克·蒂博即使出示他免服兵役的证明，要去瑞士显然也会有某些困难，但是，有谁能阻止日内瓦的大学生埃贝尔雷在法定的期限之内回国呢？……公布动员令的第一天之内……星期日……明天……

“明天晚上以前动身，”他忽然这样想。“可是她呢？”

雅克搂住姑娘的肩膀，把她拉到人群外面。

“听我说，”他用激动的声音说。“我一定得到哥哥家去一趟。”

珍妮刚才仔仔细细看了粗体字的那一段：“外国人……”等

① 德皇的名字。

等。雅克为什么忽然这样慌张呢？为什么这么快把她拉出来？为什么要到安托万家去？

雅克自己也说不清楚。在郭马丹街钟声响起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安托万。现在，在这张布告引起的不安中，他又没有来由地觉得特别需要见一见哥哥。

珍妮不敢问他。东站和北站这一带她很少来，这个地方总使她想起但以理走的那天晚上，她在雅克前面逃走的情景。这十分鲜明的回忆使她觉得心里沉甸甸的。

一个小时之内，巴黎全城完全变了样。如果说街上的行人不比刚才多，至少也跟刚才一样，但是闲逛的人却没有了。人人都很匆忙，只想着自己的事情。每个行人都好象发现自己还有一些困难需要赶快解决，有些事要安排，有些事只得放弃，有些亲戚朋友要看望，跟某些人要赶快和解，跟某些人要把关系彻底断绝。他们眼睛看着地面，紧抿着嘴，脸上带着忧虑的表情。他们奔跑着，直跑到马路上，好跑得更快些。马路上车辆很少了。没有几辆出租汽车，汽车司机为了不干活儿，把车子差不多都交还车场了。也没有公共汽车，公共交通工具今天下午就已经被征用了。

珍妮吃力地跟着雅克往前走，极力不显露出来。雅克走着，象别人一样，面容紧张，下巴向前突出。他好象被人追赶着。珍妮猜不出来他在想什么，只觉得他的内心在激烈地斗争。

的确，直到那时，那些不自觉的、然而却不断发展的想法，看了布告之后，在他身上突然固定成形了。梅奈斯泰勒的形象出现在他眼前。他仿佛又看到了飞行家站在布鲁塞尔那个房间里，穿着蓝色的睡衣，眼光茫然失神……炉膛里满是纸灰……星期四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雅克猜测过很多次：“他在那里作什

么呢？”肯定，他在进行着紧张的革命活动……“外国人可以离开巴黎……”在日内瓦，在飞行家身旁，他会再找到一个活跃的环境，保持纯洁和独立！他想到里查德利，米托尔格，想到在武装的欧洲中心，与外世隔绝，保持着完整的那一群人。到瑞士去？……这个诱惑是太强烈了。然而，他又有些犹豫。是因为珍妮吗？对……但珍妮还不是他迟疑不决的真正原因。莫非是他逃避兵役还觉得有些顾忌？一点也没有！相反，他的第一个义务就是拒绝当兵，决不去保卫他一直不断谴责并且抗击的一切……是因为他想到要把自己安置在一个安全地带，这使他觉得受不了。自己避开风险，而别人呢？……不行，只有拒绝当兵构成一种危险，一种个人的危险，跟那些被动员入伍的兄弟们注定要遭受的危险一样，只有这时，他自己的内心才能平静……那么怎么办？不到中立国家去避难，留在法国？在这个处于戒严状态的国家，任何和平主义的宣传一定会遭到无情镇压的国家，他将成为嫌疑分子，受到监视，说不定会遭到预防性拘留的国家，要进行反战，反对军队的斗争？这太荒谬了……那么，怎么办呢？到瑞士去！……但是到那里去干什么呢？

“活着，什么意义也没有，”雅克激动地大声说。珍妮望着他，莫名其妙。“生命，思想，信念，什么意义也没有。如果不把生命、思想、信念化为行动，那么，这一切就什么意义都没有！”

“行动？”

珍妮以为没有听清楚。不过，即使听清楚了，她又怎么能明白他的意思呢？

“您看，”他的口气跟刚才一样，显出孤僻的粗鲁，“我想，这次战争会在很长的时间内压倒国际主义理想！很长的时间……甚至也许是好几代……嗯，如果采取一个行动，就能从这暂时的

失败中拯救国际主义理想，我就一定去干！哪怕是绝望的行动……但是，是什么样的行动呢？”他又低声问一句。

珍妮蓦地站住：

“雅克，您想走？”

雅克看着她，她说得更明确：

“到日内瓦去？”

他微微点头，仿佛是承认。

两种对立的感情：一是高兴，一是悲伤，在她心中交战：“如果他到了瑞士，他就得救了！……但是，没有他，我怎么办呢？”

雅克解释道：“是的，要是我决心要走，就到日内瓦去。首先，因为在那个地方还可以试图干点什么……而且，我有假身份证，可以很方便地回瑞士去，您不是看到布告了……”

她激动地打断他的话：

“走吧！明天就走吧！”

珍妮那坚决的语气倒使他愣住了：

“明天？”

她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了一些希望，因为雅克的声调仿佛是说：“不，也许马上就走，不用等明天。”

他又往前走去，她紧紧地拉住他，觉得两腿有些发软。

他终于轻声说：“如果……如果您跟我一起走，我明天就动身。”

珍妮幸福得哆嗦起来。她的一切担心奇迹似的烟消云散了。他要走了，他已经得救！而且他要跟她一起走，他们再也不分离了。

雅克以为她在犹豫。

“您不是自由的吗？”他说，“既然您的母亲还耽搁在维也

纳……”

她只是更紧地偎依在他身上，作为回答，她的心跳得连太阳穴都直响，使她觉得慌乱。她的灵魂和肉体都属于雅克了。他们永远不再分开了。她要保护雅克，她要阻止危险触及他。

现在，他们谈着出走的事，好像是早已决定了的计划。雅克忘记了到瑞士去的夜车的准确时间，不过，他可以在安托万家里找到火车时刻表。还要弄清楚，珍妮没有护照是不是可以出国。对于妇女来说，手续也许不那么严格。买车票的钱吗？把他们的积蓄凑在一起，他们已经有大大超过必要数额的钱。到了日内瓦，雅克会有办法应付的……不过，一切仍然取决于同德国代表会谈的结果。有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会突然决定在两国试行起义？……

他们没有发现是怎么走来的，就到了土伊勒利宫周围的花园。珍妮满身大汗，突然觉得筋疲力尽。她怯生生地指着远处花丛中的一条凳子。他们坐了下来。这里只有他们一对。从午间起，雷雨就重压着全城，连花坛上的香气似乎都压得贴在地面上。

珍妮在想：“到了瑞士，我可以给妈妈写信……她会来找我们，中立国嘛！……”她已经想象着在瑞士的生活，跟母亲和雅克在一起，母亲又找到了，雅克也躲避了危险。

雅克心里有事，又自言自语地重复道：“走，对……但是，去干什么呢？”虽然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梅奈斯泰勒身上，并且相信日内瓦是最后一个未受损害的革命中心，但是，他还是回想起来那些“闲扯淡”，而且无法消除对于在那里留给他去作的革命工作是否有效所抱的怀疑。

他坐不住了，站起身来。

“现在，走吧！您到大学街去休息。”

珍妮一挺身，他微笑了，

“是呀，来吧！”

“我？跟您一起到您哥哥家里去？”

“现在，这对我们有什么要紧呢？不如让安托万知道。”

他显得那么有信心，那么坚决，珍妮放弃了自己的意志，顺从地跟他走了。

六 九

在前厅，有一个军官用的手提箱，簇新的，还拴着商店的标签。

“先生在家，”雷昂说着，给两个年轻人打开通往诊疗室的门。

珍妮没有犹豫，走了进去。

室内静悄悄的，雅克看见哥哥站在写字台前。他以为这里只有哥哥一人，看到斯图德勒和鲁瓦从沙发里面露出头来，很是失望。他们俩离得很远，鲁瓦坐在窗户旁边，斯图德勒在放书架的角落里。安托万在整理信件，写字台下面的字纸篓里已经满了，撕碎的纸片撒满了地毯。

安托万向珍妮走过来，父亲般地拉着她的手。他并不显得怎样惊奇。在今天，人们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惊奇的。况且，他想起丰塔南夫人在葬礼以后曾给他来过一封短信，感谢他到诊疗所去探望，还告诉他，她要出门旅行。他模模糊糊地觉得珍妮一个人在巴黎，是来向他讨主意的，大概是在楼梯上遇见了雅

克。

兄弟二人的目光相遇了，手足之情使他们咧开嘴，好像是亲切地微笑了一下，但各自都有暗地的想法，那微笑也更显得沉重。虽然有许多东西使他们各自不同，但是从来没有感到过彼此这样亲近，即使在他们父亲逝世的床前，他们也没有象这样感觉到有一种神秘的血缘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握了手，没有说一句话。

安托万请姑娘坐下，开始询问她母亲出门的事。这时，门开了，出现了泰里韦大夫，是由儒斯兰领进来的。

他径直向安托万走过来。

“来了……而我们却无可奈何……”

安托万没有马上回答。他的眼神很严肃，甚至很镇静。

“对了，我们无可奈何，”他终于说了一句，然后微笑起来，因为他就是这样想的，而这种思想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力量。

（当小马尼埃尔·鲁瓦来告诉他已经颁布动员令的时候，安托万正在儒斯兰的实验室里，他不动声色，拿起一支烟，用下意识的动作慢慢点起来。三天以来，他感到手脚被束缚住，注定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受世界局势的左右，因为他与他的祖国和阶级休戚相关，利害一致。他就象一块小石子，在一大堆滑动的石子中被人从车上卸下来，他完全无能为力。他的前途，他的计划，经过长时间思考的有关生活的安排，全都土崩瓦解了。在他面前，是未知。未知，但仍然是行动。这个想法，充满了动力，使他马上恢复了精神。他有一个天生的禀赋，就是在既成事实和不可避免的事面前，决不长久抵制。一个障碍，就是一个新的已知条件，任何障碍都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只要有意愿，任何一个障碍都能成为一个跳板，一个反跳的机会……）

“你什么时候出发？”泰里韦问。

“明天早上，到贡比涅……你呢？”

“后天，星期一。到夏龙……”他又问向他们走过来的斯图德勒：“您呢？”

泰里韦惯于保持好脾气，甚至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他的声调仍是愉快的；胡须满面、红扑扑的胖脸上，仍然带着欢喜的神情。但是，脸上的欢笑和眼神里的焦虑很不协调，使他的脸相很难看。

“我吗？”哈里发眨着眼睛，就好象那位医生的问题把他从梦中惊醒了一样。他转身向着雅克，象是对他解释似的：“我也一样，我也要走，”他用暗哑的声音说。“不过是在一个星期以后，到埃伏娄去。”

雅克避免去看他。他并不责备这个人。他知道，哈里发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忠实于别人，牺牲自己。这个正直的人，虽然有自己的信念，还是同意为这“防御性的”战争服务。他认为这是一种义务，这个忠诚的人又一次屈从于这样的义务。

雅克用眼睛寻找珍妮。她站在壁炉旁边，离别人稍远。她好象并不拘束，但有些心不在焉。他看到她微微挺身，用眼睛寻找座位，然后，走了几步，坐下来。“她是多么轻盈婀娜！”他想。他仿佛觉得仍然把她揽在怀里，他回忆起，在他们第一次亲吻的时候，她是怎样剧烈而又克制地颤抖。他感到无法抵御的、快意的惶惑。他们的眼光相遇了，他微微一笑，觉得自己脸红了。

安托万走到珍妮身旁，打听但以理的消息，这时，泰里韦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那么，你们医院的工作呢？有什么打算？”

“让老人再回来。在我们医院，有阿德里安，多玛，甚至还有

德雷里老头，都答应了……”他忽然指着泰里韦说：“啊，说起来，你还没有把儒斯兰那天借给你的文件送回来！增殖组织和舌下垂症……”

泰里韦似乎要姑娘来作证似的，微笑着对她说：

“他的脾气总改不了！……好吧，我把你的文件还给斯图德勒……你放心走吧，军医官先生！”

从大街上，穿过大开的窗户，传进一阵杂乱的歌声和马蹄声。大家都拥上前去观看。雅克乘机走到独自站在房间中央的哥哥身旁。可是这时候，安托万又走到那些人一起，雅克也就跟着他到窗前来。

一队从残废军人院那边来的炮兵，正遇上从圣神父街往上走的一支意大利人游行队伍，队伍前列是四个鼓手和一面旗帜。意大利人站定，唱起《马赛曲》，向炮兵队伍欢呼。鼓声咚咚，喧嚣声震耳欲聋。

安托万关上窗户，额头靠在窗户上，沉思了一会儿。雅克站在他身旁。别人都回到屋子中间去了。

“今天早晨，我接到一封从英国来的信，”安托万说着，姿势没有改变。

“从英国？”

“吉丝来的。”

“哦？”雅克喊出声，眼睛往珍妮那边溜了一下。

“信是星期三发的。她问我如果打仗的话，她该怎么办。我要给她回信，叫她留在英国，就在女子学校。她最好这样，你觉得呢？”

雅克含糊地点点头表示同意。他确实知道，在这儿，只有他俩。他很想谈谈珍妮，但是，怎样开口呢？

正在这时，安托万忽然向他转过身来，脸上非常焦虑，用很低很低的声音问道：

“你，还是……决……决定……要……”

“对！”

声调坚定，没有傲慢的意味。

安托万仍然欠着身子，避开了弟弟的眼睛。他的手指机械地在玻璃上敲着远处鼓声的节拍。他发现刚才有些口吃，这种不常有的情况一向是他内心深处受到扰乱征兆。

雷昂从前厅通报：

“菲利普大夫到。”

安托万赶紧挺起身子，异样的兴奋照亮了他的脸。

门框里出现了菲利普那笨拙的身影。他的眈眈的眼睛满屋子扫了一下，停在安托万身上。他悲哀地点点头，从常礼服飘动的大襟里掏出手帕，擦擦额头。

安托万走上前去。

“好呀！来了，教授……”

菲利普静静地触一下他的手；接着，象松了线的木偶一样，没有走很远，他就一下子瘫在身旁蒙着白套布的长椅上。

“您什么时候出发？”他用短促的、带嘘音的声音问。

“明天早晨，教授。”

菲利普象含着糖球似的，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

“我刚从医院回来，”安托万故意找点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的工作已经交给布律埃尔。”

他们都沉默着。

菲利普眼睛看着地，头异样地摇着。

“您知道，我的孩子，”他终于说，“……可能持续很久……非

常长的时间……”

安托万并没有很大信心，却贸然说：

“很多专家的看法却相反。”

“喂！”菲利普打断他的话，好象他早就知道应该如何看待那些专家和他们的预测。“他们都是根据物资供应和金融信贷的正常基本原则来推理。但是，如果各国政府发了疯，宁愿不顾一切，宁愿造成全部的毁灭也不愿让步，那将如何呢？……我们从一个星期以来的事实看，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我相信仗要打很久，所有的国家都打得精疲力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或者能够在半坡上停住不滑下去。”

停了一小会儿，他又说：

“这一切，我将不停地考虑下去……战争……以前，有谁相信可能发生呢？……但是，新闻界只要顽固地把牌搅混，不到几天的工夫，侵略者的概念对于大家来说就逐渐模糊不清了，每个国家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了威胁……经过一个星期的恐怖狂、夸大、吹牛之后，欧洲各国人民都仇恨地叫喊着，厮打成了一团，好象着了魔似的……我不停地考虑……完全就象俄狄浦斯^①的悲剧一样……俄狄浦斯也完全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在命中注定的那一天，在事件的变化当中，他分辨不清早就向他预言过的可怕的事……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先知们一切都预言过，人们早已窥见危险，而且明白危险来自何处，来自巴尔干、奥地利、沙皇的统治、泛日耳曼主义……人们已经得到警告，早就警惕着……许多明智之士尽了一切力量防止灾祸发生……然

① 希腊神话中著名的故事。俄狄浦斯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作了许多努力来避开这命运，但仍然犯了杀父娶母的重罪，追悔莫及，刺瞎了自己的双眼。

而，灾祸还是发生了，并没有能够避免！为什么呢？……我反过来复去地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也许就是因为，在人们所畏惧的、意料之中的这种种事态发展中，渗入了一点点意外的因素，一点无足轻重的东西，恰恰足以略微改变事态的面貌，接着使它突然面目全非……恰恰足以使得命运的陷阱发挥作用，哪怕人们早已提高了警惕！……于是，我们就都陷进去了……”

屋子的那一头，儒斯兰，泰里韦，雅克和珍妮围住马尼埃尔·鲁瓦，发出青春的笑声：

“怎么？”鲁瓦对泰里韦说。“您不愿意让我叫苦？叫苦可以让我们透一透气，让我们摆脱实验室的气氛！我们即将有一段激动人心的生活经历！”

“是生活吗？”儒斯兰低低地说。

正看着鲁瓦的珍妮突然转过了眼睛，那个年轻人狂热的面容使她看了难受。

非利浦远远地听到了这话，转身对安托万说：

“年轻人想象不出战争是什么样子……这一点可以解释很多现象……我经历过七〇年^①，可是年轻人不知道！”

他又掏出手帕，擦擦脸、嘴唇、胡子，又长时间地揩着手心。

“你们这些人，你们都要走，”他又忧郁地轻声说。“你们一定以为老头子们留在后方很是幸运。其实不对。我们的命运比你们更坏，因为，我们的生命早已结束了。”

“结束了？”

“对，我的孩子，确确实实结束了……一九一四年七月，有些事情结束了，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又有些事情开始了，其中就没

① 指 1870 年的普法战争。

有我们老头子的份了。”

安托万满怀深情地端详着他，找不出话来对答。

菲利普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好象想起了什么滑稽的事，用鼻音发出冷笑。

“我这一生中，有三个阴暗的日子，”他用在公共场合讲课时的声音说。（关于这个，他的学生们常说：“菲菲在听着自己说话。”）“第一个日子使我的少年时代发生了革命式的剧变；第二个日子搅乱了我的成年时代；而第三个无疑将毒化我的晚年……”

安托万打量着他，好象是请他继续讲下去。

“第一个日子，当时我还是个虔诚的外省少年，有一天夜里，我从头到尾阅读《四福音书》，发现那里面矛盾百出……第二个日子，就是了解到一个名叫埃斯泰尔哈吉的恶棍，制造了一个叫做‘清单’的肮脏东西，人们不判他有罪，却拚命折磨一位什么事都没有干的先生，只不过因为他是个犹太人^①……”

安托万伤心地笑笑，打断了他的话：“第三个日子，就是今天……”

“不是……第三个日子，就是一个星期以前，报纸上刊登最后通牒那一天，我见到一局台球形成了……我就明白，人民要为这一球两碰付出代价……”

“一球两碰？”

在乱蓬蓬的眉毛底下，菲利普的眼光闪着嘲弄的、几乎是残酷的光。

“对，而且是一次悲惨的一球两碰，蒂博！一个红球——塞

^① 这里指的就是德雷福斯事件。

尔维亚被一个白球——奥地利撞击，而这个白球又是被另外一个白球——德国撞过来的……但是，拿球杆的人是谁呢？是谁？俄国？还是英国？”他愤愤地大笑起来，就跟马嘶一样。“不弄清楚这一点，我死不瞑目。”

雅克走到安托万和菲利普坐着的那个屋角。

“教授，”安托万说，“我向您介绍过我的弟弟，对吗？”

老大夫用锋利的目光看着雅克。

年轻人鞠了躬，然后对哥哥说：

“你不是有火车时刻表吗？”

“有……”他们的眼光相遇了。安托万差一点问道：“要时刻表干什么？”可是他只说：“在那边……电话簿下面。”

“您呢？先生，您什么时候出发？”菲利普问。

雅克一愣，犹豫了一下，看看安托万，安托万赶紧含糊不清地说：

“我弟弟……他……是另外一回事……”

沉默了一会儿。

菲利普明白了吗？他是不是回忆起了他以前跟雅克的那次谈话？他极其注意地注视着那个年轻人，雅克走开时，他仍目送着。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安托万向菲利普俯过身去说：

“他有自己的原则，他拒绝当兵……”

菲利普沉默了片刻。

“任何信仰的狂热都是合法的，”他用疲惫的口吻让步说。

“不，”安托万反驳。“在目前这个时刻，义务非常简单明确，我们没有权利规避。”

菲利普好象没有听见。

“……合法的，也许是必要的……”他用鼻音继续说。“如果没有信仰的狂热，人类能进步吗？您再读读历史，蒂博……在任何重大的社会变化的基础之中，从来都必须有对于荒谬学说的宗教式的向往。精明只能导致无所作为，只有信仰才赋予人行动所需的冲动和坚持所需的固执。”

安托万不说话。在他的老师面前，他又自动落到受监护的地位了。

他瞧见珍妮站在雅克身旁，在壁炉前面，低头看火车时刻表，感到诧异。也许这位姑娘是要知道她母亲从奥地利回来可能坐哪次车？

菲利普继续说出他的思想：

“谁能说得准呢，蒂博？说不定象令弟这样想的人是先知先觉？说不定，这个命中注定的战争彻底破坏我们古老大陆的平衡，同时也准备了一种我们现在还无法想见的、新的、伪真理的兴盛？……如果可以这样想的话，也就算不错了……为什么不可以呢？欧洲一切国家即将把他们精神和物质的全部力量投入这场大火中去。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后果不可预料……谁能说得准呢？文明的一切成分也许都要在这场大火中重新铸造！人在有智慧的那一天以前，还要经受那么多痛苦的考验！……到了那一天，为了组织这个星球上的生活，也许他们会满足于谦虚地利用科学提供给他们知识……”

雷昂从门缝里把笨头笨脑的脸伸进来：

“有人找先生。”

安托万皱起眉头，但是站了起来。

“对不起，教授。”

雷昂在前厅里等着，脸上毫无表情，向他递上一个托盘，盘子里放着一个蓝色的信封。

安托万拿了起来，塞进衣袋，没有拆开。

“人家问有没有回信，”仆人垂着眼睛，低声说。

“人家是谁？”

“司机。”

“没有！”安托万说了一句，转过身去，因为他听见身后的门开了。

珍妮，后面跟着雅克，出现在前厅。

“你们要走了？”

“对！”雅克的声调跟刚才安托万对仆人说“没有”时一样干脆生硬。他直盯着哥哥，这谜一样的眼光充满了责难，实际上，意思是说：“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日子来了，为了单独见见你，但是你连一分钟都没有给我们！”

安托万结结巴巴地说：

“这就要走？……您也走，小姐？”

他心里很快地转念：“如果她要我给她出主意或者帮忙的话，为什么还没有说就要走呢？而且跟雅克一起走？”

他贸然问道：

“我在出发之前，能够帮您一点什么忙吗？”

她模棱两可地向他笑笑，又微微点点头，表示感谢，安托万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你呢？”他又问雅克，雅克这时正毫不犹豫地向楼梯走去。

“我走以前，再也看不到你了吗？”

他的声音里突然有那么感人的手足之情，珍妮不禁抬起眼睛，雅克也转过身来。安托万脸上显得那样激动，雅克的怨气立

刻消散了。他问：

“你明天走吗？”

“对！”

“几点钟？”

“很早，我七点钟离开家。”

雅克看了珍妮一眼，终于用有点沙哑的声音对安托万说：

“你愿意我来找你吗？”

安托万的脸上发出喜悦的光：

“好，你来吧，来……你送我上车站去？”

“说定了。”

“谢谢，我的老弟。”他温情地看着弟弟，又说了声：“谢谢。”

他们三个人快走到套间的大门了。

雅克去开了门，让珍妮先走，然后，他也迈过了门坎，没有看哥哥的眼睛。在楼梯口，他轻声说：

“那么，明天见。”

接着，他拉上了门。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对珍妮说：

“您先下楼，不要等我，我一会儿到楼下找您。”接着，他急忙用拳头敲门。

安托万还在前厅，走过来开了门，雅克一个人进来，又在身后把门推上。

“我来对你说一件事，”他垂着眼睛说。

安托万直觉到事情严重。

“来吧！”

雅克默默跟在后面，两人一直走到小书房。他在屋里站住，

靠着关上的门，看着哥哥。

“应该让你知道，安托万……我们两个人都来了，是要对你说……珍妮和我……”

“珍妮和你？”安托万惊奇地重复说。

“对！”雅克回答得很干脆。他异样地微笑着。

“珍妮和你？”安托万真是目瞪口呆了，又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说起来话长，”雅克的口气很生硬，但又住了口，不由自主地脸红起来。“现在，事情全决定了。一个星期之内。”

“决定了。什么决定了？……”

安托万退到长沙发旁，坐了下去，又结结巴巴地说：“瞧，这不严重吗？……珍妮？……你和珍妮？”

“就是这样！”

“你们互相还不太了解……况且，在这样的時候？打仗的前夕，要订婚？……怎么，你不再打算离开法国了？”

“不是，我明天晚上就走。到瑞士去。”停了一会儿，他又添一句：“跟她一起去。”

“跟她一起？嘿！雅克，你疯了吗？你完全疯了！”

雅克始终微笑着：

“我没有疯，我的老兄……事情很简单，我们相爱。”

“嗨，别说蠢话！”安托万粗暴地说。

雅克恶意地笑起来，哥哥的态度使他受到很大的伤害。

“也许这种感情你觉得奇怪？你不赞成……那就算了……算了……我是想来告诉你的，现在既然说了，那就再见吧！”

“等一等！”安托万喊道。“真可笑！我不能让你带着这样的愚蠢想法走！”

“再见！”

“不行！我有话要对你说！”

“有什么用处呢？我开始觉得我们之间不能互相了解……”

他象是要走的样子，但是，并没有走。两个人都沉默着。

安托万竭力克制自己：

“你听我说，雅克……让我们讲讲道理……”雅克讽刺地笑着。“有两件事情必须考虑……一方面是你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你所选择的时间……好，首先说你的性格，象你这样的人……让我对你说实话，你根本不能使另一个人幸福，根本不能！即使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你也不能使珍妮幸福。那么，无论如何，你都不该……”

雅克耸耸肩。

“你让我说下去。无论如何都不行！尤其在这个时候，更不行！……要打仗了……你这样的思想！……你将来要干什么？会成为什么样子？未知。完全未知！……你自己要去冒险，随你的便。但是，在这样的时候，把另外一个人跟你的命运联系起来？这简直不可思议。唉！你完全丧失理智了！你顺从了一时的孩子脾气，而这种孩子脾气经不住一分钟的考查！”

雅克大笑起来，笑声充满自信，傲慢无礼，几乎有仇恨的意味。是一种有一点疯狂的笑，然而又戛然止住。他猛地把头发甩到后面，盘起胳膊，愤怒地说：

“好哇！我来找你，我把我们的幸福全盘告诉你，你要说的竟是这些话！”他又耸一下肩，抓住门把手，回过头来从肩膀上面说：“我本来以为了解你，可是，只是在这五分钟之内我才把你认清了！我现在才知道你的真正价值！你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你从来没有爱过！你也永远不会爱！铁石心肠！不可救药的铁石

心肠！”他从他那不可侵犯的爱情的高处，骄傲地打量着哥哥，他怪笑一下，轻蔑地说：“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尽管你有那么多文凭，尽管你那么自傲。你是个可怜虫！安托万，不是别的，就是个可怜虫！”

他又在喉咙里冷笑一声，把门弄得咔拉拉响，走掉了。

安托万愣了一会儿，头低着，眼睛看着地毯。

“铁石心肠！”他轻声说道。

他呼吸急促，血向上涌，就象登上高山一样全身感到不适。他把胳膊平伸出去，手掌也伸开，直抖动，控制不住。“我的脉搏大概能到一百二十次……”他心里想。

他慢慢直起身子，站了起来，走到窗口，推开了百叶窗。

院子里静悄悄：对面，两段墙之间，一棵栗树病弱的树叶，显出一片焦黄。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只看到雅克自负的面容，得意洋洋的微笑，热狂而又固执的目光。

“你从来没有爱过！”他喃喃自语，紧握着拳头，放在窗户铁框上。“如果是这样，爱情，竟是蠢事了。好吧，我就从来没有爱过，并且我以此自豪。”

隔壁楼上的一扇窗子里出现了个小姑娘，抬起眼来看着他。莫非他把话说出声了？他离开窗户，又回到房子中间。

“爱情！在战场上，至少，事情是什么样就可以怎么说，不必顾忌。他们可以说一头畜生发了疯……可是我们，这么说就太简单，太屈辱人！必须美化一下！必须翻着白眼儿说：‘我们相爱！……我爱她！……爱……爱情!!!’心灵，谁都知道，是你们情人的专利品！我呢？我就是‘铁石心肠！’好哇！……自然了！‘你不能了解！’总是这句口头禅。总要说别人不了解自己，借以满

足自己的虚荣心。在他们看来，这样就提高他们的价值了！就象发了神经病一样，完全象发了神经病：每个疯子都自命不凡，说别人不了解他！”

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指手划脚，满眼怒火。他把手插到衣袋里，给他的愤怒找一个最高尚的借口：

“让我生气的，是这件事荒谬！对，是我的良知被激怒，给我造成了这许多痛苦……然而，我并不是第一次发现这一点：良知受了伤也象癰疽的伤或牙痛一样，会引起很大的痛楚！”

想到菲利普还在诊疗室里等他，他竭力镇定，耸耸肩膀说：

“算了……”

手指在衣袋里下意识地揉着一张纸。那是安娜的信……他把那封信拿出来，撕成两半，扔到纸篓里。眼光又落到桌上准备好的军籍簿上。突然，他觉得浑身失去了气力。明天，战争，危险——断胳膊断腿，说不定会死亡。“你从来没有爱过！”明天，青春的时代就要一下中断，也许爱情的时刻一去不复返了……

他突然向纸篓弯下腰去，检出了一半信封，从里面抽出半片信笺，打开来。这是温存而又强烈的呼喊，就象爱抚一样：

“……今天晚上，在我们家里，我等着你……我要见你。

答应我一定来。我的东尼，快来。”

他倒在安乐椅上。再最后跟她过一夜。再受一次爱抚……再一次在她的怀抱里沉沉睡去，忘掉一切……一种刹那间的眷恋，一种苦恼的浪，象强大的波涛，淹没了他的心。他把臂肘撑在桌子上，好一阵子两手抱住头，孩子似的，哭泣起来。

七〇

巴黎安静而又凄惨。从午间就涌起的黑云遮黑了天穹，全城浸沉在朦胧昏黄的光线里。咖啡馆，商店都早早开了灯，向黑暗的街道投射出苍白的光线。街上，交通工具没有了，行人们匆忙而又苦恼地徒步奔走。地铁的入口拥着一大群乘客，一直站到人行道上。尽管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但还耐着性子，在楼梯等半小时，才能进到里面去。

雅克和珍妮不愿再等，徒步走到塞纳河右岸。

每个角落里都站着报贩，大家争着买号外，脚步停一会儿，贪婪地读着。每个人都只想在报上找出好消息来：希望一切都解决了，欧洲各国领导突然都克制起来，通过共同的协议，找到了一个融洽的解决办法，荒唐的恶梦终于消散。由于恐惧，大家把旧帐勾销了……

在《人道报》社，自从颁布动员令之后，也象别的地方一样，人都走空了。每个人都好象忙于个人生活。大门口，楼梯上，都空无一人。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的那唯一的杂役告诉雅克，斯特发尼不在他的办公室，值班的是加洛，不过他在忙着第二天的报纸，不许别人进他的门。珍妮已筋疲力尽，影子似的跟着雅克，他就没有试图去违反这个禁令。

“我们到进步咖啡馆去吧，”他说。

咖啡馆底楼的厅堂里，空无一人。老板也不在，只有老板娘一人坐在柜台后面。她好象哭过，有人进来，她也不起身。

他们走上中二楼。

只有一张桌子上有人，雅克不认识的几个活动分子，都是年轻人。看见新来两个人，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很快又继续争论起来。

雅克渴了。他让珍妮挨近门口坐下，下楼去拿了一小瓶啤酒。

“不这样你又能怎么办呢？糊涂虫！等着宪兵来，让他们把你象个傻瓜似的枪毙吗？”

说话的是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深色皮肤，鸭舌帽扣在后脑勺上，嗓子很尖。他那黑色的、严峻的眼睛逐一打量着他的同伴。

“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们！”他又神经质地接着说。“对于我们，对于我们这些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人来说，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比一切都重要，那就是，我们属于一个不要战争的国家，我们的国家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

“别人也都是这么说，”年龄最大的一个，打断了他的话。这人有四十来岁，穿着地铁的制服。

“德国人就不会这么说，和平取决于他们。半个月以来，他们起码有十次机会可以阻止战争爆发！”

“我们也一样！我们本来可以干脆对俄国人说：‘去你妈的！’”

“即使这样也没有用！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德国人早就卑鄙地策划好了！那么，就让他们倒霉吧！只要求和平没有用，无论如何我们也并不软得象面条儿！法国受到了攻击，法国就应该自卫！而法国，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大家！”

除了地铁的那个职员之外，别的人似乎都赞同。

雅克苦恼地转眼去看珍妮。他回忆起斯图德勒那哀求似的话：“我需要，需要相信德国人在犯罪！”

他早倒出来了啤酒，却没有喝，跟姑娘打了个招呼，站了起来。可是在出去之前，他走到那堆人旁边。

“自卫的战争！……合法的战争！……正义的战争！……你们难道看不出来，这始终是个骗局吗？你们难道愿意上当受骗？颁布动员令还不到三个钟头，你们就已经这样了？你们对一个星期以来新闻界极力鼓动的种种疯狂情绪毫不抵抗？军事首领只会充分利用这种情绪！……如果你们，这些社会党人不来抵抗，谁来抵抗这种疯狂行动呢？”

他并没有单对某一个人说话，而是一一打量着他们，嘴唇颤抖着。

最年轻的那个人是个粉刷工，头发上和脸上还带着白粉，他向雅克抬起了他那张小丑似的脸：

“我的想法跟沙代尼埃一样，”他说，语调镇静而又坦率。“我第一天就要被动员应征，就是明天！……我憎恨战争。可是，我是法国人，国家遭到攻击，需要我。我去！我去！明知道去是送死，但是我去！”

“我跟他们一样，”他的邻座说。“我星期二出发，是第三天……我是巴尔勒杜人，我的两个老人住在那里……我决不愿意我的故乡成为德国的领土！”

“十分之九的法国人都成了这样，”雅克想，“急于开脱自己国家的罪责，力图能够得出结论说对方进行了卑鄙的策划，以此来证明他们自卫本能的反应是有理的。”他又想：“况且，这些年轻人，突然成了一个受侮辱的集体的成员，呼吸着令人迷醉的集体仇恨的空气，在怎样的范围之内能不感到又惶惑又快意的心情

呢？雷兹红衣主教^①曾经大胆地写道：‘在各国人民之间，再也没有比这个结论更伟大的了，即使自己攻打别人，也要使人民表现出来这是从防卫来考虑的。’从那个时期以来，情况一点都没有变。”

“你们想一想！”雅克用低沉的声调又说。“如果你们放弃了抵制，明天就太晚了！……你们再想想，在边境的那一边，他们也怒火千丈，同样错误地指责我们，抱着顽固的对抗态度，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变成了寻衅闹事的野孩子，鼓起小牲畜一般的眼睛，厮打成一团，大喊着：‘是他先动手的！……’这岂不荒唐？”

“那，怎么办？”粉刷工问道。“我们这些被动员入伍的人，你要我们怎么办？”

“只要你们想一想，暴力决不可能是公理，只要你们想一想，人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你们不能有两种道德标准：和平的时期，认为杀人有罪；战争的时候，却规定必须杀人。你们抵制动员吧！拒绝战争！忠实于你们自己，忠实于国际！”

一直站在厅堂门口的珍妮，这时突然走过来，紧紧靠着他。

那粉刷工站了起来，交叉起手臂，怒冲冲地说道：

“是让我们去挨枪毙吗？不行！你说得倒好听！……至少，在那里，每个人去碰运气！只要稍稍有一点运气，还是能对付过去的！”

“但是，”雅克说，“你们知道他是强者，在他的掌握之中，放弃自己的意志，放弃个人的责任，就是耍种！你们心里想：‘我并不赞成，但是我没有办法……’这要你们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你们却想廉价地用这种方法来安慰你们的良心，认为屈从是困难的，

① 雷兹主教(1613—1679)，法国政界人物，作家。

也是值得的……你们难道看不出你们是被一种罪恶的手腕欺骗了？你们难道已经忘了，政府之所以被安置在掌权的地位，并不是为了要它们奴役人民，使人民去屠杀，而是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使人民幸福。”

一个三十来岁，黑头发，棕色脸膛的人，一直还没有说话，这时用拳头敲着桌子说：

“不对，不对！你说的不对。今天，你这样说不对！……上帝知道，我从来没有跟政府一起走。我跟你一样，也是社会党人！五年前我就拿到党证了！好，我，作为一个社会党人，我准备为政府去放枪，跟大家一样。”雅克想打断他的话，但是，他更提高了嗓门：“这跟我的信念毫不相干！什么民族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所有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以后再说，到时候再跟他们算帐！你就看我的好了！可是，眼下，不是谈理论的时候！第一笔帐，要跟普鲁士佬算！那些王八蛋，他们要打仗，就让他们打吧！我告诉你吧！要是我说了管用，我要叫他们大吃苦头！”

雅克慢慢地耸耸肩。他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他拉住珍妮的手臂，向楼梯口走去。

“不管怎么样，社会共和国还是万岁！”有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叫道。

到了外面，他们沉默着走了几分钟，低沉的雷声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天空一片漆黑。

“您看，”雅克说，“我从前是这样想的，也这样说过很多次：战争不是一个感情的问题，战争只是经济竞争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但是，今天，看到社会的各个阶级这样自发，这样毫无区别地掀起一股民族主义狂热，我简直要寻思……莫非战争更

是激烈情绪的不可抑制的、荒谬的冲突结果？而利益引起的大动乱只是提供机会、借口……”沉默了一会儿，他又顺着思想的脉络，一路说下去：“最可笑的是，他们关心的不仅是竭力为自己辩解，并且还公然标榜，他们的同意是经过思考推理，是自由选择的……对，自由的！……这些可怜的家伙，昨天还一步步地反对这场战争，现在不由自主地被卷了进去，却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行为是毫不犹豫的！”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最悲惨的是，这么许多人，本来有见识，有疑虑，可是，一旦有人向他们拨动爱国狂这根弦，他们竟能一下子变得那么轻信了……悲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也许只是因为，一般人往往天真地把自己同祖国、民族、国家合为一体……总是习惯说：‘我们法国人……’‘我们德国人……’既然每个人都诚心诚意地希望和平，就不可能承认他的那个国家是要打仗的。那么，就几乎可以这样说：个人越是热爱和平，就越以为他的国家，他那个小集团的人们清白无辜，就越容易相信威胁是来自外国，而他的政府没有任何责任，自己是蒙受牺牲的集体中的一个成员，他应该通过保卫这个集体来保卫自己……”

大滴的雨点落下，打断了他的话，这时候，他们正穿过交易所广场。

雅克说：“我们跑吧，不然，您就要淋湿了……”

他们刚来得及跑到柱廊街的拱廊底下，找到避雨的地方。一整天重压在城市上空的暴风雨终于急促而猛烈地爆发了。闪电接连不断，鞭笞着神经；雷声隆隆，在建筑物之间回响不绝，轰轰的巨响有如高山里骤然而至的狂风暴雨。在九四街，一队治安警察驰马而过，在风雨底下，骑马的人弯腰弓背，伏在冒着汗气的马颈上。马蹄子溅起一束束的水花，就象在一幅生动的战争图画

上一样，钢盔在铅灰色的天空下闪闪发光。

雅克指着拱廊尽头的一家小饭铺提议：“我们到那里去吧！”饭铺里光线暗淡，已经有不少人涌进去了。“我们一边等，一边吃点东西。”

好不容易在一张大理石桌子上找到了两个挨在一起的座位，这桌子上已经挤着几个顾客了。

刚一坐下，珍妮就感到累得很。她的膝盖在发抖，两肩、脖子都很痛，脑袋沉重得受不了。她觉得快要病倒了。要是能闭一会儿眼睛，躺下，睡觉……睡在他身旁，那有多么好……她马上又回忆起昨夜，这象一下鞭子似的，使她又恢复了气力。雅克坐在她身旁，什么都没有看出来。珍妮从侧面看着他：汗津津的太阳穴，暗色的发绀，反射出棕红色的光……她差一点拉住他的胳膊，对他说：“回家吧，别的事有什么要紧？……抱住我……紧紧地把我搂住！”

在他们周围，大家都在谈话。眼睛发着光，彼此传递着盐瓶，芥末罐，交换着友爱的目光。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心相互传告最荒诞不经、最矛盾的新闻，而且立刻就有人相信。“雨这么大，但愿不要推迟了进攻的时刻，”一位中年妇女哼哼唧唧地说，她那长着个酒糟鼻子的脸上，显出柏拉图式的英雄主义，但也威势逼人。在雅克对面的一位戴着玫瑰章的胖先生说：“一八七〇年，敌对行动是在宣战之后很久才开始的，至少有半个月。”“看来，白糖要缺货了，”有个人说。“还有盐，”那位英雄气概的太太又加一句。她机密地向珍妮弯过身来：“我可没有等，早作了准备。”

那位戴勋章的先生对大家伙儿讲述东线驻防部队某位上校的故事。他赞叹不已，激动得嗓音直抖，而他这份激动还仿佛当

真有感染力似的。这位上校接到命令，要他的部队从边界后撤十公里，上校以为法国已经在敌人面前退让了，就拔出了手枪，在全团人面前打碎了自己的脑袋。宁死也不苟且偷生。

桌子的一头，坐着一个工人，沉默不语地吃饭，他那不相信这种话的目光遇到了雅克，他马上说起话来：

“你们这些人，都在瞎扯淡！”他怒冲冲地说。“可是我们，今天晚上在车间没有领到这星期的工钱！”

“为什么呢？”那位先生好心地问。

“老板说他的钱都存在银行里，而银行关门了……这引起了一场大吵大闹，你们想想，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说：‘星期一再来吧！’……”

“对呀，到星期一，就把工钱付给你们每个人了，”那个英雄气概的太太肯定说。

“星期一？首先，很多人明天就动员走了，你们明白了吗？走了，留下老婆一个子儿也没有，还有一群孩子！”

“别着急嘛！”戴勋章的先生很有权威地说。“对于这种事，就象别的事一样，政府都预料到了。区政府会发放补助金的。你们就放心地上前线吧！你们的家政府会照顾，什么都会缺！”

“您是这么想的？”那人低声说着，心里有些动了。“那为什么别人不这样说呢？”

雅克的邻座很运气，买到了晚报的号外，他暗示号外上有普恩加来的《告全国同胞书》。

好几只手伸过来：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但是那个人不愿意放开他的那份报纸。

“您念一下吧！”戴勋章的先生说。

那人是个小老头儿，长着一张狡黠的脸，他戴好了夹鼻眼镜：

“这是全体部长都副署了的，”他夸张地说着，然后逼紧了喉咙念起来：“本政府深感责任重大，意识到如若任凭事态发展，则将有失神圣职守，故在时局逼迫下，发布动员令。”他停了一会儿，又念：“动员并非战争……”

“您听见了吗，雅克？”珍妮小声说，她的声调充满了希望。

雅克耸了耸肩膀：

“这是要让耗子钻到笼子里去……一逮住，就跑不了啦！”

“处于目前形势，相反，动员乃确保荣誉的和平之途径……”戴夹鼻眼镜的人继续念。

大家都静下来，甚至邻近几桌也不说话了。

“大声点！”大厅另一头有人喊道。

念报的人站了起来，又读下去。他的嗓子有时接不上气，这可怜的家伙大概以为此刻是他自己在跟民众说话哩。他庄严地重复道：

“荣誉的和平……政府望我高贵民族，冷静沉着，切勿激动过甚。”

“好哇！”酒糟鼻子的太太喊。

“过甚！”雅克小声说。

“凡我同胞，务期发扬爱国精神，政府确知，无人不准备履行其义务。此际，已无党派之分，唯有一永恒之法兰西，爱好和平然极坚定之法兰西，唯有正义与公理之法兰西，全体团结一致，并保持镇定、警惕及尊严之法兰西。”

读完宣言之后，又静默了很长一会儿，然后，谈话围绕着这激动人心的话题，又活跃了起来。那位太太的英雄气概并不是

个别现象。戴勋章的先生激动得满脸通红，跟他的玫瑰章一个颜色。桌子另一头，没有领到工资的那个工人两眼噙满泪水。每个人都兴奋地经受着集体的热狂；每个人都觉得毫不费力就升腾起来，超越了自己，陶醉在高尚的情操中，准备着以殉道的精神去献身。

雅克不作声。他想着，别国的首脑，德皇，沙皇，在同样的时刻，一定也在签署同样的宣言，他们都使用了这具有魔力的、包含着同样威力的措词，所以，到处都放纵着同样荒谬的狂热……

他看到珍妮把简直没有动过的汤盘子往前一推，于是，就向她打个招呼，站起身来。

外面，雨已经停了。各处的阳台往下滴水。水沟涨宽了，夹着泥浆，向下水道流去，发出哗哗的声音。在闪着水光的人行道上，人群又在慌慌乱乱地奔走。

“现在，到议会去，”雅克说着，拉着珍妮迈开急促的步子。“去打听一下，在那里，跟缪勒搞出了些什么。”

他还不能肯定自己已经绝望了，尽管这看来极其荒谬。

七 一

出于慎重，保安警察把守着波旁宫。但是，在院子的栅栏门后面，聚了好几堆人。雅克就向这些人走去，珍妮始终跟在身后。

在电灯的光线底下，他认出了一个人。那是拉贝的高大身影。

“会谈还没有结束，”这位老战士向他解释。“他们刚刚出去。他们去吃晚饭了。过一会儿要继续讨论。不过不在这儿，到《人道报》编辑部去谈。”

“那么，初步的印象怎么样？”

“不太好……而且，很难得到消息。他们每个人都满脸通红，渴得半死——但是都守口如瓶……只有一个人我能探出来点口风，就是西布洛……他并不对我们掩饰他的失望。对不对？”他向走过来的朱姆兰问一句。

珍妮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她不太喜欢朱姆兰。这人的脸又窄又长，面色苍白，直流汗。光滑无须的下巴太突出。说话生硬，常把一句话切成几截儿，嘴巴也张得不够开。方方的肩膀，太小太黑的眼睛，这些都使珍妮觉得不舒服。老拉贝却相反，凹凸不平的脑门，明亮而忧郁的眼睛，每逢瞧雅克的时候都带着父亲般的慈祥，使珍妮对他产生了信任和好感。

“这个缪勒看来并没有什么具体的使命，”朱姆兰说。“他没有带来任何确实的建议。”

“那他来干什么？”

“只是为了了解情况。”

“了解情况？”雅克说。“这个时候大概连行动都来不及了！”

朱姆兰耸耸肩膀：

“行动？……你真可笑！……局势每一分钟都在变化，你以为还能够作出什么决定吗？你知道吗，德国也颁布了总动员令？是在五点钟宣布的，比我们稍晚了一点儿……据说，今天晚上德国要正式向俄国宣战。”

“可是，”雅克不耐烦地又说，“这个缪勒是不是来联合法德两国的无产者，为了最终在两国举行总罢工的？”

“罢工？肯定不是，”朱姆兰说。“我觉得，他来，只是为了弄清楚法国党是不是要投票赞成政府星期一提交议会的军费案。仅此而已。”

“在这个确定的问题上，”拉贝说，“如果法德两国社会党议员们能够采取相似的政策，那也算是已经不错了。”

“不一定吧！”朱姆兰打哑谜似的说。

雅克在原地走来走去。

“我们能说的，”朱姆兰用确信不疑的口气又说，“看来也是党的首脑们一定会用各个不同口气反复告诉缪勒的，就是法国已经竭尽全力避免战争爆发……直至最后一分钟！直至同意法国掩护部队后撤！……我们法国的社会党人，我们至少还有自己的良心！我们有权利认为德国是侵略国！”

雅克大惊失色，看着他。

“换句话说，”他断然说，“法国社会党议员准备投票赞成军费案？”

“反正，他们不能投反对票。”

“怎么？他们不能反对？”

“十分可能，他们在投票的时候弃权，”拉贝说。

“啊！”雅克叫了起来，“饶勒斯如果还在就好了！”

“呸！……我觉得，在目前的局势下，就是头头，他也不敢投反对票。”

“可是，”雅克不能自持了，“饶勒斯说过上百次，区别侵略国家和被侵略国家完全是荒谬的！这只不过是乱七八糟的诡辩的一个借口！你们好象都忘了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绝境的真正根源：那就是各国政府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不管敌对行动开始的时候表面上如何，国际社会主义者都必须起来反对战争，反对任何战争！不然的话……”

拉贝含含糊糊地表示赞同。

“原则上，是这样……缪勒发表的意见中好象也有这个意

思……”

“那么后来呢？”

拉贝疲乏地两手一摊：

“后来，他们就谈到这儿，然后，去吃饭了，手臂挽着手臂。”

“不对，”朱姆兰插嘴说。“你忘了说，缪勒表示想给柏林打个电话，要同他们党的领导商量商量。”

雅克“啊”了一声，巴不得恢复一点希望。

他愤愤地转过身去，漫无目的地踱了几步，又回转身来，站在那两个人的面前：

“你们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这个缪勒是傻呵呵地跑来打听法国党国际主义与和平主张的真正火候。如果他发现，我们这里的人确实在逃避兵役，决心采取一切手段，决心举行总罢工，使政府的民族主义政策失败，那么，我说，和平还有可能得到拯救！对，即使在今天，甚至颁布了动员令之后！只要法国的无产者和德国的无产者坚强团结起来，和平还可以得到拯救！可是，缪勒却没有找到这个，他找到了什么呢？说空话，吹毛求疵，温和派；口头上随时谴责战争，谴责民族主义，其实，已经想去投票赞成军费案了，想给参谋部以全权行动了！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可能是同样荒谬和罪恶的自相矛盾，还是同样的含糊不清的争议：一方面在理论上忠实于国际主义理想，另一方面，甚至在那些社会党领袖们中间，实际上也没有一个人同意牺牲民族利益！”

雅克说话的当儿，疲乏不堪的珍妮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雅克的声音在她周围荡漾，就象一支熟识的、柔和的乐曲。她好象是在用心听，但太疲倦了，什么也没有听见。她看着雅克的脸，在那张脸上，她看着那嘴，她的眼睛盯着他屈曲的嘴唇上伸延开去

又收缩起来的线条，仿佛是一种令人惊奇的、活鲜鲜的东西，使她有一种奇异的、肉体相触的感觉。回忆起在他怀中度过的那一夜，她不能再等了。“走吧！”她心里说。“还等什么？管它发生什么事……走吧，回家……别的事还有什么要紧？”

卡迪约在各群人之间来回跑，传布着消息，这时走到他们身边来了。

“刚才他们到内务部长那里去疏通，想让缪勒给柏林打个电话，但是没有办成。通讯已经切断。太晚了！两边都戒严了……”

“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雅克俯身向珍妮轻声说。

卡迪约听见了，冷笑着问：

“什么机会？”

“采取无产阶级行动的机会！国际主义行动的机会！”

卡迪约异样地笑了笑。

“国际主义行动？”他说。“亲爱的，现实点吧！从今天开始，所谓国际主义，不再是为和平而斗争，而是打仗！”

这莫非是灰心已极的俏皮话，他耸耸肩，消失在夜色之中。

“他说的有道理！”朱姆兰咕哝着。“有一种不祥的道理。战争已经到来。今晚，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接受，我们社会党人，跟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已经处在战争之中……我们国际主义的行动，我们以后再说，以后接着干，对，但是要过些时候。今天晚上，和平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你，朱姆兰，竟能说这种话！”雅克说。

“对！有了新的情况：战争，已经存在。对于我来说，由于这个事实，一切都变了；我觉得我们社会党人的作用也就非常明确，我们不应当阻碍政府行动！”

雅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那么，你同意被动员入伍？”

“那当然，下星期二。我向你声明，公民朱姆兰那时候就是卢昂三三九后备团的普通二等兵了！”

雅克低下眼睛，说不出话。

拉贝把手放在他肩头：

“不要这么板着脸了……如果你今天晚上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你明天也会这样想的……显然，法兰西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我们，社会党人，我们应当奋勇争先，维护民主，反对帝国主义邻国的侵略！”

“那么，你也这样了？”

“我？如果我岁数不是这么大，我也会去应征的……不过，我也要试一试。我这把老骨头也许还能有点用处……你这样瞧着我！我并没有改变主张。我十分希望活到那一天：重新开展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这玩意儿仍然是我最仇恨的……但是目前，不要干傻事，军国主义跟昨天不一样了。今天，军国主义就是拯救法国，甚至不止于此，还要在危险中拯救民主。那么，我就要把拳头缩回来。我随时准备象别人一样，拿起枪，保卫祖国。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他高傲地经受住了雅克的目光。一种模糊的，惶惑而又骄傲的微笑迟迟疑疑地浮现在嘴唇上，使他眼睛里的悲哀神情显得更使人痛心。

“连拉贝也变了！”雅克喃喃自语，把眼睛掉转过去。

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一把拉住珍妮的胳膊，跟她一起走开，没有道别。

在栅栏前，一群人闹嚷嚷地堵住了出口。

人群的中心，加洛的秘书帕热斯正在指手划脚地争论。一群青年活动分子围着他。雅克认出了几个熟人：布维埃，埃拉尔，福热洛尔，一个工会工作者拉杜，《人道报》的两名编辑奥代尔和夏尔当。

帕热斯看到雅克，跟他打招呼。

“你知道消息了吗？从彼得堡来的一则电讯：德国今天晚上向俄国宣战了。”

布维埃是个善于在群众大会上演说的人，四十来岁，身体虚弱，脸色灰白。他向雅克回过头来。

“有某些事情，坏事倒是好事！在边境上，有我们这些人的事干了！只要发给我们枪枝弹药……”

雅克一声不响，他对布维埃一向不信任，不喜欢他那不可捉摸的眼光。（有天晚上，布维埃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十分激烈的演说，散会之后，穆尔朗对雅克说：“这小子，我一直盯着他哩！有点太狂热了，不合我的口味……每次逮捕人的时候，他总是第一批被捕，可是好象是偶然的，他总是能够获得免诉……”）

“最好笑的是，他们以为我们卷进了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布维埃忍住笑说。“他们哪里想得到，不出一个月，就会变成内战！”

“不出两个月就会发生革命！”拉杜大声嚷。

雅克冷冷地问道：

“那么，你们也都愿意应征了？”

“老天，这机会是太好了。”

“你呢？”雅克又问帕热斯。

“那当然！”

他脸上的表情不同于往常。他神经质地提高了嗓门，简直有点陶醉了。他又接着说：

“没有阻止住这次战争，不是我们的过错！确实是阻止不住。事实就是这样……至少，让这次战争结束这个垂死的社会吧！这个社会没有发现它正在自杀。资本主义再也不能在它引起的混乱之中生存下去，这就全看我们了！这次战争，至少，让它促进社会变革！让它为人类造福！让它成为最后的战争，解放的战争！”

“以战争反对战争！”有个声音在呼喊。

“我们要去打仗了，”奥代尔说。“可是，我们是革命的战士，是为了最终销毁武器，为了各国人民的解放而去打仗的。”

埃拉尔是个邮政工人。他总是引人注目，因为他跟白里安^①出奇地相象。（甚至他那热情、颤动而又洪亮的声音也相象。）他慢吞吞地说：

“对……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将要牺牲！真可怕！但是，唯一能使我们接受这种恐怖的，那就是想到我们是为将来而付出代价！从这场血的洗礼中回来的，将是得到再生的人们……在他们面前，没有别的，只有一片废墟。他们终于能够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珍妮站在雅克身后，看到他的肩膀一抖，以为他要参加辩论了。可是雅克向她转过脸来，什么也没有说。他脸上的变化使她大吃一惊。雅克抓住她的手，紧紧搂住她，带她离开了这群人。他很高兴珍妮陪他来了，孤独感觉就不那么凄惨了。“不！”他想，“不！……宁死也不接受我以整个的心灵所反对的东西！宁死也不背叛！”

① 白里安(1862—1932)，法国政客，早年为社会党书记，后被开除。多次任法国总理。

“您听见了吗？”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简直都不认识他们了。”

这时，在栅栏门旁辩论的时候一直没有开口的福热洛尔从后面赶了上来，劈头就说：

“你说得有理，”两个年轻人只好站住，听他说话。“我甚至想过开小差，好保持我自己的一贯逻辑。你看吧……如果我这样干，我不敢说我是出于信仰，而不是由于恐惧。因为，事实是，我非常害怕……太荒谬了！不过，我象他们一样，也会去打仗的……”

他不等雅克回答，就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开了。

“也许还有许多人也象他一样……”雅克思索着小声说。

穿过布尔戈涅街，他们沿着波旁宫前行，想到塞纳河边去。

“您知道什么事让我吃惊吗？”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是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声调，动作中不知不觉流露出的轻松愉快的情绪……人们简直要想：如果他们今晚知道，一切都顺利解决了，动员令也解除了，他们第一个感觉会不会是失望呢？”他马上又说：“最让人灰心的是，他们为战争效劳的那股子劲头！……那股子勇气，对于死亡的蔑视！在这样被浪费了的精神当中，只要拿出百分之一，就足以制止战争，只要他们一起及时地把这精神力量投入和平事业！……”

在协和桥上，他们遇到了斯特发尼。他低着脑袋一个人走路，骨瘦嶙峋的鼻子上架着他那副大眼镜。他也是来打听谈判结果的。

雅克告诉他，会谈暂停了，过一会儿再继续，地点改在《人道报》社。

“这样的话，我回报社去，”斯特发尼说着，扭头就走。

雅克一直很阴郁，沉默着走了几步，忽然想起穆尔朗的预言，就拍拍斯特发尼的手臂说：

“完了，没有社会主义者了，只有社会爱国分子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看他们都同意应征入伍……他们觉得这样为了所谓祖国受了威胁的新神话而牺牲革命理想是凭良心办事！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一变而为最热中于打仗！……朱姆兰……帕热斯……所有的人！甚至老拉贝也准备入伍，如果人家要他的话！”

“拉贝？”斯特发尼用疑问的口气重复一句。不过他又说：“我倒不觉得奇怪……卡迪约也要去从军。还有贝尔特和儒尔丹。他们从昨天起都把军籍簿揣到衣袋里了……加洛尽管是个近视眼，还请求盖德到部长那里去疏通，把他从中下级军需官的岗位上调出来。”

“党失去首领了，”雅克阴郁地下了结论。

“党？不对，也许并非如此。但是，失去首领的，肯定是反战运动。”

雅克怀着突然而来的手足情谊走上前来：

“你也这样想，是不是？如果饶勒斯还在的话……”

“自然了，他会和我们在一起的！或者说，全党会和他在一起的！……迪努瓦有句话说得很对：‘社会主义的良心就不会分裂了。’”

他们沉默着穿过协和广场。广场上没有车辆，显得更加宽阔，比平时也更亮堂。斯特发尼不安的面孔突然一抖，阵阵抽动起来。

他忽然停住脚，街灯的光芒在他那拉长的脸上清清楚楚地

勾勒出一幅奇异的浮雕，使镜片在满是阴影的眼眶上一闪一闪地发亮。

“饶勒斯！”他说。（说出这个名字，他那南方人歌唱似的嗓音是那样温情而又绝望，雅克不禁觉得喉头哽塞了。）“你知道上星期四离开布鲁塞尔的时候，他在我面前说什么了吗？于斯曼要回阿姆斯特丹，向他告别。头头粗暴地直视着他的眼睛，对他说：‘你听我说，于斯曼。如果战争爆发，您要坚持国际！如果有些朋友，要求您也参加冲突，您绝对不要干。要坚持国际！如果我，饶勒斯，要求您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您不要听我的话，于斯曼！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国际！’”

雅克受到震动，叫道：

“对，即使我们只剩下十个人！即使我们只剩下两个人！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国际！”他的嗓音发颤。珍妮感动得直哆嗦，走过来靠在他身上，他却好象没有发觉。他又重复一句，好象发誓一样：“坚持国际！”

“但是怎样坚持呢？”他想。他觉得仿佛独自深深地陷入了黑暗中。

雅克和珍妮离开《人道报》编辑部的时候，午夜已经过了。今晚有很多活动分子到报社去打听消息。雅克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他还是不愿意不问清跟德国代表会谈的结果就离开。他发现姑娘委顿的脸，心里很焦虑，就多次恳求她回家休息，等他去找她。但每次她都拒绝了。他们跟二十几个社会党人待在斯特发尼的办公室，加洛终于来了，说会谈已经结束。缪勒和德曼时间很紧，如果他们还想赶上最后一班开往比利时的民用列车的话，刚来得及赶到北站。雅克和珍妮看见他们由莫利兹领着，

从走廊过去。加香带着议员的肩带，建议由他送他们上火车，上车时好方便一些。尽管这样，还是不能肯定缪勒是不是能通过比利时边境。

问题很多，加洛简直无法招架，他怒气冲冲地摇着他那乱蓬蓬的脑袋。大家终于把详情问清楚了。总而言之，法德两国社会党之间的这一次最后接触，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六小时之后，只不过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愿望：法国议会和德国国会里的社会党议员们，既然不能阻止通过军费案，至少要弃权，以免有利于该案通过。分手的时候，双方作出这样一个可笑的结论：“目前时局不稳，不允许作出什么更为具体的保证。”

就这样彻底失败了。国际团结的教义只不过是一场骗局。

雅克转眼看着珍妮，好象在绝望之中，要从她那里找到最后一点援助。她坐在稍远一点的一张小凳子上，双手放在膝头，背靠着书架。吊灯的光线斜照着她，在眼睑和颧骨下面投下阴影。她挣扎着睁大眼睛，瞳孔都胀得很大了。该把这柔弱的人儿抱在怀里，轻轻摇着，让她睡去……今晚，雅克对整个世界的悲悯突然使他对这娇嫩而又疲乏的人儿的同情增强了十倍。现在，对于他来说，大概只有她是唯一重要的了。

他走过去，扶她站起来，静静地将她拉到外面去。

终于要回家了，她在雅克面前快步向楼梯走去，一点也不感到疲倦了。他们走到人行道上，珍妮感到雅克火烫的手搂住她的腰，这时，她在欣喜之中，在那不可抵御的要依附于他的感情之外，突然感到一种使人害怕又迷乱的，完全新的情绪，这股猛烈的力量使血涌向太阳穴，使她摇晃起来，用手捂住了额头。

“您支持不住了，”雅克惊慌地低声说道。“怎么办呢？今天

晚上，叫不到车……”

他们紧紧靠在一起，精疲力竭，激动不安，在黑夜里漫步前行。

街上人还不少。一小队一小队的警察和保安警察把守着每个十字路口。

在维克多亚尔圣母院前面，他们看见教堂的两扇大门都开着，很是惊奇。他们走了过去。大殿象个窟窿，仿佛是奇迹中的岩洞，黑洞洞的，可是，数不清的枝架蜡烛照耀着，把半圆形的后殿变成了一片火光闪闪的丛林。时间这么晚了，一排排的椅子上还坐满了黑压压的人，静静地在祈祷。一座座神工架周围，一些年轻人跪着，等着自己的轮次。雅克好生奇怪，这样的時候，民众还如此虔诚，表明他们是多么六神无主，他不由得十分感动，很想进去看一会儿。珍妮却不想进去，把他拦住了。在她心里，三百多年来新教教义下意识地在起作用，反对繁文缛礼，反对偶像崇拜——反对天主教。

他们又继续赶路，没有交换各自的看法。

珍妮越来越困倦，雅克扶着她往前走。有一个时候，她无缘无故地抓住雅克的手，把自己的脸贴上去。他停下脚来，很慌乱。他向周围看看，把姑娘推到一个门洞里，紧紧抱住她。“终于来了！”珍妮想。她的嘴唇松弛下来，不再避开他的嘴。几个钟头以来，她就在等着这个吻，她闭上眼睛，颤抖着任凭他亲。

他们穿过菜市场，走到圣米歇尔大道。王宫的大钟指着一点一刻。行人已经减少了。但是，在通往各个城门的大街上，走着一队队的车辆，有征用的大车，用缰绳拴牢的一队一队的马匹，军人开的汽车，一个团一个团的部队，他们静悄悄地开拔到

秘密的阵地去。这天夜里，整个欧洲都没有休息。

他们慢慢地朝前走，珍妮一瘸一拐。她只得承认有只鞋子磨伤了脚。雅克要她更紧地靠在他身上，扶着她，几乎把她抱起来了。她觉得有伤自尊心，但是很感动。两人越是走近家，就越感到在他们的急切中还夹杂了一种沉重的苦恼。他们两个人都感到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的力量已到了最后限度。然而，透过疲劳和焦虑，一股持久不熄的、欢快的火焰始终在燃烧着。

珍妮打开前厅的电灯，就象每次她回家一样，第一眼就看一看门房女人是不是从门底下塞进来一封从维也纳来的电报。可是什么也没有。她的心猛地抽紧了。他们走之前，她不会有任何希望得到母亲的消息了。

“但愿瑞士和奥地利之间还能正常通信，”她喃喃地说。现在，这是她唯一的希望。

“我们一到日内瓦，就到领事馆去，”雅克答应她。

他们逗留在门厅里，站着，两个人都想起昨夜的事。这时在明亮的光线下，又只有他俩在一起了，突然觉得十分尴尬。他们的面容疲倦，由于同样的回忆在侵扰，彼此的目光闪避着。

“好啦！”雅克说了一句。

他并没有动，只是下意识地弯下身去，捡起一张报纸，不慌不忙地折起来，放在独脚小圆桌上。

“我渴死了，”他装出从容不迫的样子说。“您呢？”

“我也是。”

厨房里，他们昨天吃剩的晚饭还摆在桌上。

“我们的家常饭，”雅克说。

他把水龙头打开，直到放出的水冰凉了，才把杯子递给珍妮。珍妮坐到最近的一张椅子上，喝了几口，把杯子递给雅克。

她转过了眼睛，肯定雅克一定是把嘴唇放在她刚才喝的那个地方了……雅克一口气喝了两杯水，满意地哼了一声，走到珍妮身旁，两手捧起她的脸，俯下身去……然而，他只是长久地注视着她，仔仔细细地看着。然后，他极温柔地说：

“我可怜的，可怜的宝贝……天晚了……您支持不住了……明天夜里，还要长途旅行……得好好睡一觉……在您的床上，”他又加上一句。

珍妮垂下肩膀，没有出声。雅克把她拉起来，珍妮两腿直抖，雅克把她领到她的卧房门口。

屋里很暗，从开着的窗口，勉强照进来夏夜的天光。

“现在，得睡觉，睡觉，”他又在她耳边重复。

她却一挺身，仍旧待在门坎上，紧紧贴着他的身子，喘着气低声说：

“到那边去……”

“那边”，就是但以理卧房里的长沙发……他深深吸了口气，没有说什么。当珍妮答应陪他到瑞士去的时候，他曾经想过：“到了日内瓦，她将是我的妻子。”但是，在这激动人心的一天震动之后……普遍的平衡破坏了，意外的事占了优势，出轨的事成了规律，任何许诺都不能算数了……

又有几秒钟，他仍然十分清醒，跟自己斗争着。他退开一步，定睛看着她。

她向他抬起晶莹的眸子。两个人都深切地感到同样的慌乱，同样郑重而又纯洁的欢欣。

“好，”他终于说。

七 二

通过辛普龙隧道^①开来的快车，按照时刻表，应该在十七点左右到达巴黎，但是，过了二十三点，才抵达拉罗什车站，马上给引到岔道上，把主线让给军队的给养车。这列快车几乎全由三等旧车厢组成，挤满了乘客。在十个坐位的隔间里就挤了十二、三个人。到了清晨一点，经过无尽的周折，列车才艰难地向首都驶去。三点钟，它慢慢地驶过默伦车站，又几乎立刻在塞纳河桥上停住了。乳白色的晨曦照亮了弯曲的河身，薄雾中闪耀着几列灯光，城市依稀可见。渐渐地，在山丘后面出现了黎明。下边一条沿河的公路上，可以看到一个团在行军，后面跟着一大串部队的车辆。

经过无数次停车，走走停停，在隧道里等候，遇到每次信号都鸣笛停驶，到了四点半，列车终于慢吞吞地穿过巴黎郊区，停在一段没有车站的车道上，离巴黎—里昂—马赛快车车站还有三百米远。

丰塔南夫人和旅客们一起，被车站上的职员赶下车，走到道砟上，又跨过了铁轨，斜着向车站入口大厅走去。她沉重的手提箱绊着膝弯，每走一步都打个趔趄。

她在兵荒马乱当中离开维也纳，乘上最后一列发往意大利专门遣送外国人的火车。她已经走了三天，换过七次车，有三夜没有睡觉。但是，她总算把对她丈夫的起诉撤消了。德·丰塔

① 穿过阿尔卑斯山的一条有名的隧道。是由意大利经瑞士到法国的火车必经之路。

南的名字不再出现在传讯单上。

候车室里满是红色军裤，象个宿营地似的。她在枪架之间挤过去，好几次碰上卫兵把守着不准通行的地段，转了好几次弯，才走出了车站。她一直想着儿子，在这些大兵中间，思念就更强烈。她好久没有儿子的消息，到家就可以看到他的信了。但以理！他正在走向什么命运呢？她仿佛看见他，穿着漂亮的军服，戴着闪亮的钢盔，骑着马站在一个国界标旁边，正象一个受到威胁的祖国的保卫者……上帝会保护他！为他害怕就是丢弃信仰了。

车站外面，没有出租汽车，也没有公共汽车。徒步回家不是做不到的。达到目的的喜悦使她感觉不到疲劳的分量了。但是，行李怎么办？行李寄存处那里，有一百多人在排队。好歹拖着箱子走过广场，看到有一家小酒店还开着门。桌子乱七八糟，跑堂的睡眠惺忪，还有几盏灯亮着，虽然天已大亮了，表示尽管有规定，这家铺子一夜都没有关门。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柜台里，看到女客人和蔼的笑容，产生了同情心，答应让她把箱子寄存在这里。丰塔南夫人卸掉了包袱，就向天文台大街走去。她的苦难终于快熬到头了，半个钟头以后，她就会在珍妮身边，在自己家里，坐在茶盘子跟前。她几乎不觉得疲乏了。

八月二日的巴黎早晨，街上已经非常热闹，所以到了家，看见大门仍关着，她倒觉得奇怪。她的表停了。走过门房，看到窗帘仍旧拉着，她估计现在最多不过五点半。

“珍妮在睡觉，她一定把门上的链子拴上了，”上楼时，她心里想。“她能听见前厅里的铃声吗？”

她没有按铃，试着用钥匙开门，看是不是能打开。门上并没有把保险锁锁好，居然打开了。

她第一眼就看见前厅里有一顶男人的帽子，一顶黑色的呢帽……是但以理的？不是……她害怕起来。所有的门都开着。她走了两步，到了走廊口。走廊的最里面，厨房里还开着灯……她是在做梦吗？她觉得不怎么清醒。肩膀靠在墙上站了一会儿。一点声音都没有。整套房子象是空的。然而，为什么会有这顶帽子？灯又为什么亮着？……她忽然转念，莫不是小偷进来了……她机械地顺着走廊往厨房走，突然，在敞着门的但以理的卧室前站住脚，眼光凝滞了：在长沙发上，在散乱的垫子中间，两个搂抱在一起的身体……

刹那间，她想到是一次谋杀案，而不是有人偷东西。但这连一秒钟也不到，因为她立刻认出了两个向后仰起的面孔：珍妮睡在熟睡的雅克怀里！

她猛地退到走廊的暗处，用手按住胸膛，就好象她心跳的声音会使人发现她在这里似的。她唯一的想法就是逃走，逃走，免得被看见！逃走，免得受到残酷的羞辱：羞辱他们，羞辱自己……

轻手轻脚快步退到前厅，她几乎要晕过去，不得不停了一下。也许她正要想想是不是受了幻觉的欺骗，然而，这时又看见了雅克的呢帽，傲慢地放在桌子正当中。于是她挺起身来，小心翼翼地打开楼梯口的门，又悄悄地关上，抓住扶手，沉重地一步步走下楼去。

现在怎么办？是不是应该去敲门房的门，要门房把大门打开，让门房认出自己是谁，向门房说明自己回家来了，说明为什么慌忙出门？……幸好，她进来的时候，一定是把门房女人惊醒了，她现在已经起床，正在穿衣服，窗帘后面有灯光，通街的大门已经打开。可怜的女人这才能够溜到外面去，没有被人发现。

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找个藏身之地？

她穿过马路，走到街头花园里，里面没有人。她走到最近的一张凳子旁，坐了下去。

周围一片寂静、清新。远处，传来持续的沉重声响；汽车和卡车接连不断地驶过圣米歇尔大道。

丰塔南夫人不想理解是怎么回事，甚至也不考虑在她不在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她已经无法思考，然而她好象还能看见。那个情景继续留在眼前，显出事实的无可辩驳的鲜明景象：长沙发上乱糟糟，珍妮的赤脚伸在窗外射进来的天光里。雅克双臂搂着她女儿的上身，他们的姿态从容自然，睡梦中还凑在一起的嘴唇上，显出松弛、痛苦而又痴迷的表情……丰塔南夫人虽然又羞愧又恐惧，仍不由得想道：“他们是多么美……”在她的愤慨和本能的反感中，已经掺入了另一种在她心中深深扎下根的感情：尊重别人，尊重别人的命运和责任。

雅克莫非在睡梦中直觉地感到有个什么在房里走动？眼皮跳动几下，他睁开了眼。刹那间，他完全恢复了意识。他的眼睛先看到一只赤裸的脚，浑圆的胸部，弧形的肩膀，然后，才看着那熟睡的脸。在那嘴角的纹路里，有多么悲凉的表情！在这松弛的面容上，还凝着痛苦的印痕！是痛苦，然而，也在休憩……象经过很大的痛苦才死去的孩子的脸相……

他屏住呼吸，无法从那皱紧的嘴上移开视线。怜悯，悔恨，恐惧的感情压倒了他内心的柔情。命运沉重地压在他们头上。是命运吗？不，已经发生的事，正是他的意愿，是他自己曾经企望的。无论任何时候，他总是扑向珍妮，就象扑向一个猎获物似

的。在拉菲特庄，就是他逼着她爱他，设法使她爱他的——然后他又逃走了，把她抛弃在绝望之中。而今年夏天，正当她开始振作起来，把往事忘却的时候，他却又向她扑过去……不可挽回的事已经铸成了。一个星期以前，她还可以没有他而生活，而今天，不行了，珍妮是他的人了。他把珍妮拖入了他的航道。走向什么可怕的未知？……现在，没有他的话，珍妮在生活中就没有趣味。然而同他在一起，珍妮能幸福吗？不能。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安托万说得太对了！他不是那种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

安托万……他本能地用眼睛去找挂钟。他答应过今天早晨送哥哥到车站去。六点差二十。五分钟以后就得起床。

从开着的窗户，传进来车辆驶过断断续续的、低沉的声音。他仰起头。是过军队。车辆和炮车从城里开过。战争，就在这里，窥伺着他们醒来。动员的第一天为八月二日，星期日……今天早晨，对于所有的人，战争开始了！

他待在那里，手肘支着身子，竖起耳朵，眼神定住，额上沁出汗珠。有时，外面的声音好象消逝了。钢铁的撞击声之后，紧接着是一片动人心弦的寂静，寂静之中，时而传来几声鸟鸣，或者轻风徐徐从街上的树梢拂过，有如一声叹息。然后，那不祥的隆隆声又在远处响起来，又有一批军队走上大街。他们那有节奏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声音越大，破坏了寂静，淹没了麻雀的叫声，好象要把一切统统踏碎。

顾不得惊醒珍妮，他轻轻地把她抱起，拥在怀里。他们的肌肤紧贴在一起，使珍妮在睡梦中拘挛起来，喃喃地说：“不……不……”然后，眼皮睁开来，她向他微笑，那是温柔的、怯生生的微笑。这时，在水汪汪的眸子深处，恐惧的光慢慢熄灭。他们紧紧地拥抱着，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在这静止的、火热的接触

中，他们的身体由于昨夜的回忆而颤抖着。他们的回忆却是不一样的……这时，雅克把她搂紧。珍妮在柔情之中，也害怕还会疼痛，所以不能动弹，本能地想挣脱。终于由于她的娇弱，由于爱情，由于献身的冲动，也同样由于她自己的欲望，她让步了……她决心听任摆布，在这里，有足够的热情，甚至欢乐，使雅克不会误解，不会想到在这样的同意之中，还隐藏着恐惧，克制和意志。

丰塔南夫人靠着椅背，双手握在一起放在裙子上，两眼直视着前面，没有力气想任何事。

时光流逝，朝阳照耀着花园，照耀着树木花草，鸟儿在歌唱，白色的塑像把修长的影子投在草地上。她感到孤寂。男女行人，迈着匆忙的步伐，斜穿过大街，从离她很远的地方走过，看也不看这个身穿丧服，坐在板凳上的女人。树木遮住了她家的窗户，但是，从花坛上面望过去，可以望见房子的大门。

突然，她低下头，拉下了面纱。雅克，后面还有珍妮，出现在门坎上……离得这么远，他们看不见她，也不会认出她来，除非他们朝她这边走。等到她决心抬起眼睛，他们两人已经向卢森堡公园那边匆匆走去。

她吸了一口气，血液在血管里跳动，眼睛神志不清地瞧着这一对走远，一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踪影。她心灰意懒，又坐了一会儿，才站起身来。等了这么久，毕竟稍稍得到了休息，她就迈着可以说是坚定的步伐，向家里走去。

七 三

雅克对珍妮说：“你休息吧！我去送安托万上车，然后，去向

穆尔朗告别，再到总工会和《人道报》社去一趟。将近中午，我再来找你。”

可是这一回，珍妮不听他的话了。她决心今天上午不一个人待在家里。

“你还要收拾行李呢？昨天你说要整理屋子。你要来不及准备今天晚上动身了，”雅克这样逗她。

珍妮笑了，这是一种完全新的微笑，又羞怯又肉感，连眼光也显得雾蒙蒙的了。

“我有我的主意……我要再去看看拉菲特街上那个小花园。您……你，如果愿意的话，从北站出来，到那里去找我……再晚一点也行。”

终于说妥，珍妮陪他步行穿过卢森堡公园，一直走到大学街，然后，她到圣樊尚·德·保罗教堂前面去耐心地等雅克。这样，她才跑去穿衣服了。

安托万早晨三点钟才离开安娜。

昨天晚上，他未能抵御住念旧之心，又去看望她。他让自己享受这最后的和凄苦的欢乐，并没有什么幻想，就象临刑的死囚获得一次恩典一样。然而，他临走时安娜悲痛欲绝，他又悔恨自己屈从于诱惑，这使他浑身打战，垂头丧气。回到家里，在这夜里剩下的时间，他一直没有上床，忙着整理抽屉，把信件烧掉，还把一小笔一小笔的现款装进信封，准备分别赠给几个人：给夏斯勒先生，给两个女仆，给韦兹小姐，甚至给韦尔诺耶街的那两个孤儿，机灵的小见习生，罗贝尔·罗那尔和他的弟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照顾他们一下，不愿意让他们在这个普遍混乱的头几个星期没有生活费用。）然后，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吉丝，叮嘱她不

要离开英国，又写了一封信给雅克，寄到日内瓦去，因为他相信昨天吵过一架之后，弟弟不会来向他告别了。信上只说了几句友爱的话，为昨天说话伤了他的心道歉，并且请求他以后常通信。

此后，他就到盥洗室，穿上预备役军服。装束完毕，他顿时觉得心情十分平静，好象决定性的一步已经迈出了。

他一边裹绑腿，一边把临走前要办的事逐一想了一遍。什么都没有忘记。确定了这一点，终于使他完全平静下来。忽然，他又想到，要有效地做好军医工作，还缺少很多东西。于是，他毫不犹豫，把已经细心整理好的木头箱子很快地腾出来，取出大部分的衣服，私人用品，甚至他喜欢的、要带走的书籍，换上他在柜子里能找到的全部绷带、敷布、镊子、注射器、麻醉药、消毒剂。

两个女佣人早就起床了，在走廊里转来转去。（雷昂已经离开了巴黎，入部队之前，他要回老家去看看他的“二老”。）

阿德里安娜来告诉他，早饭已经摆在饭厅里。她两眼红红的，要求安托万把她拿来的一只包好的烤鸡塞到行李里去。

有人按铃，安托万从桌子旁站了起来。

他的脸微微发白，显出温情的微笑。是雅克吗？……

果然，是他。雅克站在门口。安托万笨拙地走上前去，两个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们静静地握握手，好象昨天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还怕来晚了哩！”雅克终于结结巴巴地说。“都准备好了？要出发了？”

“对……七点钟……时间快到了。”

他竭力让声音显得坚定些，从容地拿起军帽，戴在头上。从上次当兵的时期以来，莫非他的头长大了？或者是他的头发比以前长？军帽高高地扣在头顶，可笑极了。他瞧瞧前厅里的镜

子，皱起了眉头。他笨拙地扣上武装带，眼睛向周围看了一遭，好象向他的住宅、他的老百姓生活和他自己告别，然而，眼睛还不住地转过去，瞧瞧镜子里他那不招人喜欢的形象。

这时候，两个女仆并排站着，垂着手臂，哭了起来。安托万心里很烦，不过还是对她们微笑，走过去跟她们握手。

“好啦……好啦……”

然而，他这威武的声调显得并不自然。他自己也听出来了。为了快点动身，他转过身来对雅克说：

“帮我把这个搬下楼去，可以吗？”

兄弟俩一人抓着一个把手，走到楼梯口。走过房门的时候，箱子角碰到了门扇，在新上的油漆上划了一长道口子。安托万看看那损坏的地方，下意识地作了个鬼脸，但马上又无所谓地摆摆手。也许就是在这一刹那，他才最强烈地感觉到，他的过去和将来之间，一下子被划开了。

他们走下了两层楼，没有说一句话。安托万穿着带钉子的高帮皮鞋，沉重地走着。紧紧扣着的军服，硬邦邦的领子，憋得他难受。到了楼下，他气喘吁吁地咕哝道：

“真蠢。我没有想到有电梯。”

他早就预料到找不到出租汽车。他的司机维克多今天早上就被征入伍，到普托去征用载重卡车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定坐自己的车去车站，带上附近修车场的一个老修车工，好给他把车开回来。

在大门口，门洞的阴影里，门房女人穿着白衬衫，瞧着他走，她哭哭啼啼地叫道：

“安托万先生！”

安托万愉快地跟她打招呼：

“回头见！”

他让修车工坐在后座，他自己开车，雅克坐在他身旁。

街上的人开始多起来。因为清洁管理站都解散了，还没有倒的垃圾箱都堆在各家门口。

在沿河大街，汽车不得不停了许久，让一大队卡车和除去车篷的汽车先过去，都是当兵的开着车。在罗亚桥上，车又停了一次，一大群步行的人站在马路中间，仰着脖子，兴高采烈地挥动帽子。雅克探出身去：在晴朗无云的天空，低飞着六架飞机，排成三角队形，向东北飞去。可以清楚地看到下层机翼的下面漆着三色标志。

在黎伏里大街，身穿作战军服的一团步兵，迈着有节奏的步伐走过，没有军乐队，一片激动人心的寂静。两旁站着看热闹的人。各营营长骑马经过时，群众摘下帽子。

歌剧院大街所有的阳台都插上了旗子。他们的汽车从一长列有红十字标记的车辆旁边驶过；接着又遇到了一队士兵，穿着值勤的服装，拿着铁锹和铁镐。

在歌剧院广场，车又停了下来。一列炮车，后面跟着十几辆装甲车，向巴士底方向开去。歌剧院房顶上，几组工人在安装探照灯，防备德国的鸽式轰炸机夜袭巴黎。

尽管有警察维持秩序，各条环城马路上还是有一群群看热闹的人聚集在德国人或者奥地利人开设的商店门口。这些商店昨天夜里就遭人抢了。波希米亚玻璃器皿店周围的地面上，尽是玻璃破片和打碎的玻璃杯。维也纳酒店好象遭过一次围攻，从砸碎的门面望去，可以看到打碎的镜子，拆毁的桌椅板凳。

雅克沉默不语，看着这爱国狂热的初步迹象。他激动地观察着街道和行人的脸色。他本来倒是愿意打破寂静，却没有什

话好对哥哥讲。再说，车子里头还坐着那个修车工，这也可以说是个借口……他心里焦躁，飞快地想着各式各样的事：珍妮，昨夜，马上要去日内瓦……以后呢？总是想到这里就想不下去了……梅奈斯泰勒，“支部”……不行，不管任何借口，他也不肯再过那种等待、进行幻想中的密谋和说空话的日子了……那么，怎么办呢？斗争，行动，去冒险？——在那里办得到吗？

突然，他浑身一抖。安托万把车开得很慢，不得不总按喇叭，因为在马路上走的人跟在人行道上一样多，趁着短短的停车时间，他的一只手离开了方向盘，他什么也没有说，甚至头都没有转过来，轻轻地把手按在雅克的膝盖上。但是，还没有等雅克对这深情的动作作出反应，安托万又握住了方向盘，车子又开动了。

莫贝日街上，黑压压一片应征入伍的人，妻子爷娘来相送。他们排着密集的队伍向车站拥去。

“他们多么着急呀，”雅克很惊奇，低声说。

安托万强笑着，讽刺道：“非常可能，这些可怜的家伙要被圈在站台上，等个半天，甚至还不止，才能上得了火车……”

“他们巴望着按时赶到，”雅克想。“恨不得以遵守纪律的行动来开始打仗！难道他们当真不明白自己是多数！只要他们愿意，就能够作主人！……”

夜里仓促搭起了木栅栏，围住车站，不许随便通过，由军队把守着。人挤得厉害，汽车根本开不过去。安托万只好停车，由雅克帮着，把箱子抬过马路去。狭窄的路口有一排步兵在把守，上了刺刀。只有应征入伍的人才许进入。

有个军士，在检查军籍簿，抬眼看了看安托万的饰缘，赶忙

敬礼，马上指派一个士兵给“军医官”扛行李。

安托万向弟弟转过身来。两个人都在对方的眼神里看出同样的疑问：“我还能见到你吗？”泪水同时涌上了他们的眼睛。突然之间，他们的过去，世上唯有他们两人才共同拥有的，那不值一提却又独一无二的家庭的故事，他们通过形象回忆了起来。他们同时张开双臂，笨拙地搂在一起。雅克的呢帽碰着安托万的帽檐。已经有许多年，许多年，就从刹那间他们两人一同回想起来的那童年时代起，他们就没有拥抱过。

但是，那个勤务兵已经拎过了箱子，扛在肩上。安托万急忙松开手，心里只想着一件事：跟上这个人，不要把行李丢了。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只有这件东西还是属于他的了。他不再看弟弟，只是摸索着伸出手去，拉着雅克的手使劲握了一下，然后，脚步踉跄地，也钻进了人群。

雅克泪眼模糊，被新来的人挤得东倒西歪。他走开几步，靠在栅栏上。

入伍的人一个接一个，连续不断地走进去。这些人，彼此很相象，都是年轻人，都穿着廉价出售的旧衣服，粗笨的鞋，戴着鸭舌帽。他们都斜背着同样鼓鼓囊囊的挎包，从同样的新布袋里，露出一块面包，一个水瓶的细颈。大多数人的脸上都有同样专心、被动的神情，这是一种压抑着的绝望和恐惧。雅克看到他们斜穿过马路，手里举着军籍簿，已经离开了亲友。半途，有的人还回过头去，望望刚刚离开的人行道，向那个他们还感觉到一直茫然看着他们的男人或女人挥一下手，或者硬充好汉地笑一下，接着，咬紧牙关，也钻进那耗子笼里去了。

“不许在这里停留，往前走！”

肩上扛着枪，沿着木栅栏站岗的那个现役士兵是个壮实的

小伙子，穿着作战军服，挺着胸脯，短短的手紧握住枪托，有一抹隐隐约约的小胡子，两只孩子气的眼睛总躲着人，脸却绷得很紧，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职责的重要性。

雅克顺从地走到马路上去。

一辆豪华的小轿车从他前面驶过，挡风玻璃上有一个白布横幅，写着：“免费运送应征入伍”。司机穿着富家号衣，车里面挤着六、七个青年，都带着挎包，也象新兵一样，扯破嗓子叫嚷，

“阿尔萨斯，洛林，我们要阿尔萨斯！”

雅克走上了人行道，一对夫妇正在那里告别。夫妻再最后互相看一眼。有个四岁的孩子在女人身旁玩耍，揪着妈妈的裙子，用一只脚跳来跳去，还低声唱着。那男人弯下腰去，抱住孩子，举起来亲亲，吻得那么重，小家伙生了气，使劲挣脱。那人赶紧把孩子放在地上。女的一动不动，什么也不说，就那样站着，穿着干家务活的围裙，头发蓬乱，脸上泪痕斑斑，失神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的男人。这时，那男人仿佛害怕她扑到怀里来，难以脱身，他不去拥抱女人，反倒向后退去，眼睛仍然看着她，突然一转身，快步向车站走去。那女人没有叫住他，也没有目送他走远，她也猛地向后一转身，走开了。身后拽着的小男孩跌跌撞撞地走着，险些跌倒。她终于伸手把他抱了起来，举到肩头，一步也没有停，她是要快点逃走，是要早一点回到那空荡荡的家里，关上门，独自一人，哭个痛快。

雅克心里痛苦不堪，转过身去。他漫无目的地胡乱走着，离开这个广场，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回来，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到这个使人悲痛的地方。今天上午，这么多受苦受难的人来到这里，好象奔赴一个命中注定的约会，来斩断他们生命的缆绳。在他们充满痛苦，也充满勇气的眼睛里，他寻觅着，想找到一个能够

与他应答的目光；一个目光，只要一个，在那里，在悲伤的下面，他能看到深沉的愤怒在闪耀，使他在衣袋里握紧拳头，使他为无可奈何的愤怒而发抖！可是，没有！无论在什么地方，在这各式各样的紧张的面孔上，只能看到同样的灰心丧气，同样的徒然的痛苦！有时候，可以看到盲目的英雄主义在闪光，但普遍的是屈从于牺牲，同样的无意识的或是怯懦的背叛，同样的自暴自弃！仿佛这时候，世上仍旧残存的自由，除了他身上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藏身之地了。

这样一想，使他浑身充满了力量和自豪。他的信心始终如一，这使他高出众人之上。尽管不为人理解，被众人所弃，他还是觉得只要坚持叛逆精神，哪怕只有一个人，他也比甘心为谎言蒙蔽，甘心受罪的民众强大！他掌握着正义和真理，理性在他这方面，对于未来的隐隐约约的力量在他这方面。和平理想虽然暂时失败，并不能损害它的伟大，也不能影响它最终的胜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今天的错误不成其为错误，荒谬绝伦的错误，即使千百万被牺牲的人以高贵的气概，以坚苦卓绝的精神接受了这一错误！“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正确的思想不成其为正确！”他反复自语。绝望和信心使他陶醉。“尽管压制舆论，尽管还有挫折，真理大放光芒的日子一定要到来！”

但是，在这痛苦之中，怎样为这真理服务呢？他要自由，要出走。但是，用他的自由去干什么呢？

最近几天，他的革命热诚有些减退，在他看来是软弱的表现。他不由得想把责任推给他的爱情。这才突然想起了珍妮。这一个钟头竟然这么容易就把她忘得干干净净，他觉得惊讶。他几乎要责怪她不该存在，不该期待他，不该把他从令人陶醉的孤独中拉出来。他想，“如果她突然死去……”刹那间，想象使他

失去了理智，他觉得，一方面辛酸悲痛，但另一方面他又获得了独立。

然而，他还向圣樊尚·德·保罗街心花园匆匆赶去。他已经在为爱情的焦躁而微笑，一点也没有把刚才对爱情的疯狂否定放在心上，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后悔。

安托万的汽车从大学街开走还不到十分钟，一辆灰暗无光、满是尘土、象博物馆里的轿子似的老式带行李架的出租马车，停在大门口。

下来一位姑娘。她迟迟疑疑地看看木栅栏，新粉刷的房子正面，然后，把车钱付给年老的车夫，提起车座上的两个手提箱，快步走进门洞。

穿着衬衫的看门女人出现在门房门口。

“啊！我的上帝！吉丝小姐！”

这女人惊惶地睁大了眼睛，吉丝马上明白有不幸在等着她。

“我可怜的小姐，家里没有人了！安托万先生刚走！”

“走？”

“当兵去了！”

吉丝没有说什么，她那温存的眼光，忠实的动物似的眼光暗淡了。一松手，箱子落在脚边。她那混血儿的小脸上，顿时变成了灰色，惊愕仿佛是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好象总能找到现成的纹路似的。（她跟女校同学们一起在英国海滨度假，对欧洲大陆发生的事情只有肤浅的了解。只是到了昨天晚上，报纸上说法国快要宣布动员，她才害怕起来，任何人的劝告都不听，甚至没有回伦敦去，直接赶到多佛尔，上了第一班渡船。）

“先生们都按规定应征了，”看门的女人解释。“雷昂是昨天

走的，维克多也走了。楼上只有阿德里安娜和克洛蒂尔德。”

吉丝脸色开朗了。阿德里安娜和克洛蒂尔德！……赞美上帝！还没有丧失一切。这两个把她养大的女仆，可以说就是她的家，总之，是她家的残余部分……她鼓起勇气，挺起身，跟在提起箱子的门房女人后面，朝电梯走去。

“一切都改了样子？”她喃喃自语。

那白色的楼梯，扶手……在她那一夜未眠而昏昏沉沉的脑子里，接连闪过无数的画面和回忆。在这完全改变了装饰的房子里，她徒然寻找熟悉的标志，比置身于完全陌生的房子里更有流落异乡的感觉。

半个钟头以后，穿着印花布睡衣，踏着拖鞋，她跟两个女仆坐在安托万的宽敞的饭厅里，面前摆着儿时爱吃的热气腾腾的巧克力和抹了黄油的烤面包片。臂肘支在桌子上，她用调羹搅着杯子，孩子气地享受着这个舒服的时刻。她的思想从来没有特别活跃过，她在英国的生活，在修道院附属女校里，那儿所有的活动都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使她的创造性的精神得不到发展。

当她这样弓着背，弯着腰，面孔松弛，懒洋洋地待着的时候，她突然失去了全部青春的魅力。这时，她不再是那个小野姑娘“黑丫头”了，只是一个普通的有色人种女奴，身体沉重，嘴唇肥厚，大眼睛没有表情，在奴隶种族的宿命的顺从底下佝偻着。

吉丝的到来使惶恐不安的两姊妹得到了天赐的一个分心的机会。她们分坐在姑娘的两侧，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两人抢着没完没了的说话。她们说了许多关于她姑姑韦兹小姐的情况。她们每半个月，星期日，都带着香蕉和水果糖，到养老院去，表表心意。克洛蒂尔德不隐瞒，老小姐说话已经颠三倒四了，除了对

养老院里一些琐碎小事之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时，接待这姊妹俩来访也很不客气，就象对待动机可疑的，不知趣的陌生人似的，还总是不到会客时间结束，就打发她们俩走，免得耽误她打牌。

吉丝听着，眼睛里满是泪水，叹息着说，

“我走之前要去看她。”

“还要走？”

姊妹两个喊了起来。她们已经决定劝阻吉丝回英国去。安托万留给她们的钱够花好几个月。阿德里安娜已经非常得意地想象和描述三个人一起生活的情形。她把她的计划向吉丝说了又说，那姑娘都烦了。她从一份晨报上剪下一篇文章：《吁请法兰西妇女为保卫祖国服务》，献身服务的机会有的！给出征的人看孩子的托儿所，给婴儿送牛奶的管理站，准备包扎用品，给军服厂送料等等。每个人都义不容辞，要保卫祖国！困难的只是不知选哪样好。

吉丝不由得动了心，微笑了。并没有任何事逼着她非走不可。的确，在法国，她也能有用处……

无论是看门女人还是两个女仆，都没有想到提起雅克。吉丝以为雅克还在瑞士，也没有想到问一问。只是到了第三天，从克洛蒂尔德的东拉西扯中，她才偶然得知，她到巴黎的那天，雅克也在巴黎。但是，即使她早知道，怎么能找得到他呢？谁也不知道雅克的地址。况且，难道吉丝还会设法再见到他？

七 四

在《旗帜报》社的楼梯上，甚至还没有走到楼梯口，就看到一

个牛奶罐放在穆尔朗门口的擦鞋垫上，雅克气恼地说：

“他不在家！”

果然，按了铃，没有人答应。雅克又顺手敲了三下门。

“谁？”

“蒂博。”

门开了。穆尔朗光着上半身子，胡子和头发上尽是肥皂沫。

“对不起！”看到了珍妮，他马上说。“你这小家伙，该先说一声带来了一位女客。”他用脚一踹，把门关上了。

“进来吧！……请坐。”

房门跟前有一把草垫椅子，珍妮立刻坐了下去。

窗子紧关着，房里有股硬纸板、浆糊、硝石和灰尘的气味。桌子上、长板凳上、散了箍的一个小木桶里，到处都堆着一捆捆的报纸。在地上的一个角落，一盘子锯末附近，有一个破旧的煤气表，管道脱落压扁了，翘起来，象残废的肢体一样。

穆尔朗到厨房里去了。

“我刚回来，就象个小偷似的，”他在远处大声嚷，一面在水龙头底下冲洗。不一会儿，他回到房里，穿了件干净衬衣，用毛巾大把大把地把脑袋擦净。“我象个傻瓜似的，象个胆小鬼似的，在外面过的夜……你知道，动员，对于我来说，就是搜查、逮捕……搜查嘛，要来可以来，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我早就提防了。逮捕吗？说老实话，我还愿意等一等……嗨，倒不是我怕坐班房……”他揶揄地瞥了珍妮一眼，又这样解释：“我从来没有象坐牢的那几个月那么平静过……如果没有监狱的话，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有时间考虑我的小册子，也没有时间去写了……不过，说到底，我还是不愿意第一批被捕！……昨天，警察狗子到处去搜人，到了布尔代家，吉尔帕家……甚至还到野蔷薇咖啡馆去

了。他们的警察干得倒怪起劲，可惜什么都没有找到，除了彼埃尔·马丹的那篇声明，《向良知呼吁》。你知道吗？同志们正从印刷所起货的时候，被他们没收了。至于克莱斯，就是罗贝尔·克莱斯，《工人生活报》的那个年轻人，是免服兵役的，从来没有当过兵，听说他被人告发了，说他写了一个反对军国主义的传单，给关起来了，只等着开个免服兵役人员问题的会议，就把他送到第一线去……我是昨天晚上知道的，给稍有关系的人一个忠告！……总而言之，我觉得，要是让自己被逮住，那才真是大笨蛋。我就溜了……”

“后来呢？”

“我以为我能在同志们家里躲躲。唉！到西隆家去，并不比这儿好。我去吉约家，没有人。到高迪埃家，也没有人。拉塞尼家，莫里尼家，瓦隆家，都没有人。他们都换地方了！这些哥儿们——都跟我一样！于是，我就游荡了一夜，一个人，碰运气。今天早上，到了文森，买了报纸，我才知道我是个老傻瓜。我这才回家来。”他转过隐在乱蓬蓬的眉毛里的眼睛，看着雅克：“你看报纸了吗？小家伙？”

“没有。”

“没有？”

穆尔朗看了珍妮一眼，眼光又回到年轻人身上。在颁布动员令的第二天早晨十点钟，雅克还没有打听到什么消息，他似乎认为这跟珍妮有点什么关系。他从挂在钉子上的黑工作服口袋里取出一卷报纸，用两根指头象掏垃圾一样拽出一张，让其余的都掉到方砖贴面的地上。

“给你，我的小家伙，如果你还有心思笑的话，那就开开心吧！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什么事都受得了，可是，看到这些，还直

恶心。《红帽报》，梅尔勒和阿尔梅莱达的报纸，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普恩加来政府的代言人！真是有什么事儿都有哇！你看看吧！”

穆尔朗把工作服从钉子上摘下来，气鼓鼓地穿上。雅克这时小声念道：

“我们正式受权声明，政府将不使用 B 字名单……政府信任法国人民，尤其信任工人阶级。众所周知，政府以往及目前一再作出各种尝试，千方百计拯救和平。最坚决的革命者明确的声明……”

“最坚决的革命者……这些混蛋！”穆尔朗低声骂道。

“……就是理所当然地充分支持政府……全体法国人一定会克尽职责……政府声明放弃使用 B 字名单，正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嗯？你的看法怎样，小家伙？我念了两遍，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得承认事实……这意思就是：法国的无产阶级欣然接受他们的战争，工人阶级反对派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政府就用不着进行预防性逮捕了……你明白了吗？这就象好心好意地揪着全体革命者的耳朵，对他们说：‘来吧，坏蛋，你们的那些牢骚人家都原谅了，去履行你们当兵的义务吧！’政府闹着玩似的，豪爽大度地撕毁了黑名单，让嫌疑分子跑掉……因为，今天，嫌疑分子已经无所谓了。你明白吗？”

他大笑起来。这异样响亮刺耳的笑，使这老基督的脸怪模怪样，显得有点可怕。

“嫌疑分子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你明白了吗？你想一想，革命政党的首领要向部长作出什么样的正式保证，政府才能对他这样放心！才肯在战争的第一天，不冒任何风险就敢于作出这样宽宏大量的姿态！他们把我们干脆奉送给政府了，你相信

吗？这些王八蛋！……嘿，这一回可倒好，一切都完了！参谋部达到了目的，真去打仗的人说话不顶用，叫别人去打仗的人才有发言权！”

他走开几步，两手背在身后，放在飘开的工作服下面。

“但是，见鬼！”他转过身，又突然说，“我还是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就真的完了！”

雅克一阵哆嗦。

“我也是，”他阴沉地低声说。“我也不能相信已经无能为力了，即使是在现在！”

“即使是在现在！”穆尔朗象回声似的重复一句。“尤其是因为，几天之后，几个星期之后，这些可怜的牲口就会尝到打仗的滋味了！……唉！如果克鲁泡特金还在的话，那就好了……或者一个别的什么人，能够说出该说的话，能够让别人听他！同志们都接受了这场战争，因为人们对他们撒了谎，因为人们再一次利用了他们的轻信……但是，也许只要给他们一点什么东西，只要他们重新觉悟过来，一切就会一下子全然改观！”

雅克好象挨了一皮鞭，跳起来。

“什么？……一点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呢？”他向穆尔朗走过去：“您觉得我们能够做点什么呢？”

他的声音十分异样，珍妮回过头来望着他，屏住气，嘴唇微微张着，心里有些害怕。

穆尔朗被问住了，瞧着雅克。雅克又结结巴巴地问道，

“您在想什么？快说吧！”

穆尔朗耸耸肩，有点发窘：

“我想什么，小家伙？也许都是些蠢事……我说……我脑子里想什么就说什么……都十分荒谬！我不能让我不抱希望，我

还抱着希望，不顾一切地抱着希望！……两国人民——我国人民，对方的人民，显然都受了欺骗！有谁知道呢？也许只要……”

雅克定睛看着那老人，

“只要？”

“只要……我说不准，我……如果，突然在两军之间，觉悟的光芒拆穿了这深重的谎言！如果那些可怜的人突然清醒过来，看清了是别人以同样的方法把他们赶到火线两边去的，你难道不相信，他们都会同样义愤填膺，起来造反？他们难道不会一起掉转身去，反对那些逼迫他们到那里去的人？……”

雅克眯着眼睛，仿佛被一道强烈的光芒照花了似的。接着，他低下眼睛，回到珍妮身边，可是好象没有看见她。他坐了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显得有些尴尬。好象发生了什么事，三个人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却不太明白。

“还有，全国都一样，”过了一会儿，穆尔朗又说。“在外省，市议会所有社会党议员都投票赞成这样的议案：颂扬受了威胁的祖国，主张保卫祖国，指责德国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公敌！”他捡起刚才扔在地上的那卷报纸，说道：“你看，这就是总工会的声明：《告法兰西无产者书》，你知道总工会想出了些什么话来说吗？‘形势逼人……并不是全体无产阶级都懂得应该如何继续努力以防止人类对于战争的恐惧……’换句话说就是：‘用不着再试探了，孩儿们，甘心情愿去当炮灰吧！’……还有铁路工会的声明……——铁路工人，小家伙，咱们的铁路工人！你能相信吗？他们在全巴黎所有的墙壁上都贴出来了：‘同志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捐弃旧怨吧！社会党人，工会会员，革命者，你们要挫败威廉二世的卑劣图谋！共和国发出号召的时候，你们要率先响应！……’等一等，等一等……还没有完哩！最精彩的你还没有看

到！你再来尝尝这个的味道：《给陆军部长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是谁签的名？猜猜看！居斯塔夫·埃尔韦……听听他怎么说吧：‘在我看来，法国为了避免灾祸，已经作了超乎常情的努力，因此，我请求您特予批准，将我编入步兵第一团，开赴前线！’对了，小家伙，他们就这样统统变脸了，咱们那位居斯塔夫·埃尔韦，《社会战线报》的社长！我们的居斯塔夫·埃尔韦，他曾经宣称，任何祖国，从来都不值得工人去流一滴血！……这样一来，你就知道：政府可以放心大胆地把B字名单锁在抽屉里了！我们的那些革命的伟大领袖们，政府反正会把他们一个个都收罗去的！”

有人在门上敲了几下。穆尔朗不忙开门，先问了一声：

“是谁？”

“西隆。”

来人有五十多岁，扁平脸，正中间有一撮灰白的小胡子，脑门宽宽的，有些秃顶，鼻孔很扁，两眼相距很宽，眼光带着讥刺。脸相冷静而又坚毅，稍许有点傲气。

雅克跟他见过面。他是唯一常跟穆尔朗在一起的。

西隆是个工会工作者，老活动分子，曾多次因为革命活动被判刑，近几年，有点置身于运动之外。他常写小册子，而且，在他当专门技工的工余之暇，就给《旗帜报》写稿。他象穆尔朗一样，都是那种革命运动中的独立派，机灵清醒，始终如一，傲然自得，相当现实，对蠢事很严厉，宁可得罪同志，也要对事业忠心耿耿，受到大家的尊敬，可是谨慎持重，也遭到非难，还有人有点嫉妒他们的个人的声望。

虽然唯一的那把椅子珍妮已经坐着，穆尔朗还是说：“坐下去吧。他们的报纸你都看了？”

西隆耸耸肩膀，表示他一方面根本瞧不起任何报纸，同时也不是来评论时局的。

“今天晚上在让巴酒店有一个会，”他看着那排字工说。“我说过我要来通知你，你一定得去。”

穆尔朗咕哝道：“我不爱去，这种玩意儿，我不去就知道……”

“问题不在这儿，”西隆打断他的话。“我是要去的，我有话要对他们说，我愿意我们俩一起去。”

“那就是两码事了，”穆尔朗同意了。“你要说什么事？”

西隆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看雅克，又看看珍妮，走到窗前，稍稍推开了窗子，又回到穆尔朗身旁。

“有些事，有些事非办不可，可是好象还没有人想到。确实，我们现在的处境狼狈，然而这并不能让我们抄起手来什么也不干，任凭他们去为所欲为！”

“你详细说说。”

“嗯，如果说社会党和工会的领袖认为应该支持政府，同政府合作，那么，作为这种合作的交换条件，他们至少应该为他们所代表的人要求得到一些保证。你不这样看吗？战争实际上创造了革命形势，我们要好好利用！饶勒斯如果还在，一定是不会放过的！他一定能够迫使政府向无产阶级作出让步……这一点总可以得到！战争将迫使所有的人不得不接受种种限制，还要作出牺牲，至少应当要求劳动者对于政府要采取的措施参预监督！现在，还来得及提出条件。目前，政府有求于我们，那么，彼此有来有往……你不这样想吗？”

“条件？什么条件？”

“什么条件？例如，必须迫使他们征用所有的军火工厂，不让厂主在被送去当炮灰的人民身上榨取巨额利润；还有，这些工

厂的管理权必须交给工会……”

“有点意思，”穆尔朗轻轻说。

“还得阻止物价高涨。现在，到处都开始涨价了。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迫使政府控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建立国家的库存，排除中间商和投机商，统一组织分配……”

“这可是规模宏大的行动，必须建立……”

“干部、人员随时找得到，只要利用一下已经开业的消费合作社就行了……你觉得怎么样？这些都要研究。不过，既然法国全境甚至阿尔及利亚都宣布了戒严，那就必须利用它至少去保护弱小者，免得被贪婪的人鲸吞。”

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满屋响着他那从容的声音。他的话只是对穆尔朗说的，只不时漫不经心地瞄那两个青年一眼。漂亮的平滑的额头上沁出了汗珠。

雅克默不作声。虽然他的神情极其专注，眼睛象燃烧着火，其实，他并没有听。他浸沉在他自己那曲折迂回的心事中，跟什么西隆、征用工厂、戒严、国家库存等等相去十万八千里……“如果，突然在两军之间，觉悟的光芒拆穿了这深重的谎言！……”穆尔朗刚才这样说过……

他趁着老排字工人说话的间歇，向珍妮打个招呼，站了起来。

“你们要走了？”穆尔朗说。“你今天晚上到让巴酒店去吗？”

雅克象刚从梦里惊醒一样，说：

“我？我不去。今天晚上是外国人出境的最后期限。我们两个都要到瑞士去……我是来向您告别的。”

穆尔朗看看珍妮，又看看雅克，忽然显得很激动，虽然他确信别人看不出来，

“啊？你已经决定了？……到瑞士去？好……你做得对……”接着，他又怒气冲冲地说：“好，走吧！在那边好好给我们干！祝你们顺利，孩子们！”

雅克觉得鲜血沸腾，情绪不定，急需独自待一会儿。

“珍妮，现在要理智些，听我的话，”他们一走到街上，他就拉住珍妮的胳膊，弯过身子，温柔而又很权威地对她说：“今天晚上以前，你还有许多吃力的活儿要干。你累了，你得回家去。不要不同意。你得休息一下……十点一刻，我来找你……我一人到《人道报》社去。我还要打听一下你走要办什么手续。两个钟头就都办完了……你说好吗？”

“好，”她说。

她的样子的确很可怜，精疲力竭，浑身火热，肌肉痠痛。她已经坐在那个街头小花园里等了很久，凳子很硬，硌得腰生疼，就在那个地方，雅克曾对她说：“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象爱您这样爱过！”她怀着痛苦而又麻木的心情，回想起不久以前然而又十分遥远的那个晚上所发生的一切细节以及以后的日子——一直到昨夜突然发生的奇迹……她等了两个钟头之后，终于看到雅克出现在台阶上，满脸痛苦的神色，又带着好斗的表情，眼光恍惚，她那时就已知道，他们的心情并不协调。她为此深感痛苦。她听着雅克告诉她安托万出发了，根本没有敢向雅克提她那漫长的梦幻；她只能让雅克带着，徒步走到穆尔朗家。然而，她再也支持不住了，要陪他到别处去，她再也没有这个勇气了……她渴望回家，躺在沙发垫子上，让痠痛的身体得到休息。

幸亏还有电车，虽然要隔很长时间才来一辆。从巴士底广场，他们坐车一直到圣米歇尔大道，不需要步行。雅克一直把她

扶到天文台大街，他们在门口才分手。

“我走了……我在一点到两点的时候再来。”他微笑着又说：“我们一起吃在巴黎最后的一顿晚饭……”

但是，他还没有走出二十米，就听见珍妮在身后透不过气来的叫声，连嗓音都变了：

“雅克！”

他三步两步就跑到珍妮身边。

“妈妈在家！”

珍妮十分惊慌地瞧着他。

“是看门的女人拦住告诉我的……妈妈今天早晨回来了……”

他们面面相觑，脑子一下子空了，什么主意也没有了。珍妮第一个念头就是楼上的房间被他们弄得乱七八糟，但以理的床还没有整理，雅克的盥洗用具还在浴室里放着……

转眼之间，她打定了主意。她拉住雅克的手说：

“走！”

她脸上不露声色，难以捉摸。她又说了一句：

“走，跟我一起上楼。”仿佛这再简单不过了。

“珍妮！”

“走哇！”她几乎是严厉地又重复一遍。

她态度坚决，而他却神志模糊，就不再反抗，跟着她走去。

珍妮在雅克前面，很快登上两层楼，她忘记了疲倦，好象急于结束这件事似的。

然而到了楼梯口，她站住了，没有伸进钥匙去打开房门。她犹豫着。在静寂之中，他们听到了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她一句话没有说，鼓起勇气，开了门，抓住雅克的手腕，紧紧攥住，拖着

他走进房间里去。

七 五

丰塔南夫人一上午都在家里，心里惶惶不安，甚至在她夫妻生活最不幸的时刻，她也从来没有这样过。

幸好，但以理的房门关着。要不是想煮杯茶喝，进了厨房，这可怜的妇人尽可以叫自己相信，她只不过做了一个恶梦。可是一进厨房，就看到了两副餐具，她本能地闭上眼睛，赶紧转身，逃回自己的卧房。

垂头丧气地坐了几分钟之后，她又梦游似的兴奋起来。可是，等到她把旅行的衣服脱掉，换上家常旧衣服，整理完房间，全神贯注地干完了各式各样的无用的活之后，她又想强迫自己待着不动了。她坐到安乐椅上，就在阳光照耀的百叶窗旁边。不管怎样，都必须恢复内心的平静。为了得到支持，迫切需要她的小本《圣经》，而那本《圣经》还在她的旅行箱里。她就去书架上取来父亲的那本旧的，那是一本又大又厚的书，黑面子。丰塔南牧师在书页的空白地方做了种种记号，写着附注。她随便翻开它，勉强自己用心阅读。可是，她的注意力不听支配，总是从书上溜开，心里不由自主地出现许许多多互不连贯的景象和念头。想到但以理，也夹杂着其他，回忆起维也纳的那些生意人，想到旅途的颠沛困顿，挤满了军队的各个车站。这些杂乱的联想总是归结为一个突出的幻景：在那张床上珍妮和雅克紧紧搂抱着睡在一起。附近的大道上，车队辚辚驶过，震得墙壁直晃，震得她脑袋嗡嗡直响，好象以不祥的声音为她的冥想伴奏。她平生第一次感到有一种疑惧、一种恐慌压迫着她，使她摆脱不得。她

感到被一个旋涡控制住，卷走了，一阵阵使人心惊胆寒的大动乱洗劫了欧洲和她自己的家，整个世界都被撒旦控制了。

忽然听到前厅那边有些响动，接着，马上可以分辨得出走廊里有脚步声，她大惊失色，没有力气站起来，只能挺直上身。门开了，是珍妮走进来。她丧巾底下的脸色异常苍白，两眼直瞪瞪的，连容貌都变了。

看到母亲安安静静地坐在往常的座位上，穿着那件花叶图案的棉布衣裙，膝头上放着《圣经》，姑娘吃了一惊，不知所措了，好象她整个的过去，在阔别多年之后，一下子又回到她的面前。她不再考虑，不再顾及迟迟疑疑跟在身后的雅克，向母亲跑去，一把搂住她，扑在地毯上，额头抵住母亲的衣裙，她要紧紧地挨着妈妈。

“妈妈……”

慈爱，怜悯，刹那间使丰塔南夫人摆脱了苦恼。她的心充满了宽容，同时，她完全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她无意撞上的这桩秘密，不是个丑闻，只不过是弱点。她正要向这失而复得的孩子俯下身去，正要把女儿搂在怀里，同意让她说明原委，跟她一起估量这祸害的程度，了解她，帮助她，引导她——忽然，她的呼吸止住了：一个人影在走廊的墙上晃动一下……珍妮不是一个人回来的！雅克在那里！他就要进来了！……她放在珍妮后脖颈上的手握紧了。她的视线再也不能离开那开着的门。几秒钟过去了。丧纱发散出强烈的苦味……终于，雅克的身影在房门口出现。那张床，那两张痴迷的脸又在丰塔南夫人的眼前晃动起来。

她用哽咽的、充满责备和恐惧的声音讷讷地说，

“我的孩子们……我可怜的孩子……”

雅克已经进了门，站在她面前，看着她，又胆怯，又紧张。这时，丰塔南夫人清清楚楚地说：

“你好，雅克。”

珍妮赶紧抬起头。当然，她没有笑，然而，一种使她改变了模样的、异样的笑容却布满了她的脸，象是强烈的欣喜的光辉；一种绝对未曾有过的、不顾羞耻的光辉，在她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使人想到这是她暴露无遗的本性。她向雅克伸出手，抓住他的手腕，使劲拉他过来，转过脸来对她母亲说：

“我把他找回来了，妈妈！永远也不会丢掉了。”

她本想让语气显得温情，其实只流露出胜利的得意，还带着点挑战，甚至威胁的意味。

丰塔南夫人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想笑一下，可是没有笑出来，嘴唇间只透出一声微弱的叹息。

珍妮看着她。在这声叹息里，在这充满母爱的脸上，闪动着惊恐，也闪动着慈祥。她本来在那里可以看出认可的证据，然而，她又乖张又敏感，只看出了伤心和谴责。她觉得自尊心受到损伤，连子女的亲密之情也受了伤害。她一挺身站起来，避开了母亲，靠在雅克身旁站着。她那倔强的态度，眼睛里冒出的火，都表现出一种过分的、盲目而又咄咄逼人的傲气。

雅克却相反，他带着始终不懈的深情，注视着丰塔南夫人。他要是能说出来，他一定会这样说：“我了解您……但是，我们也一样，也应该了解我们……”

丰塔南夫人为难地看着这一对。她低下了眼睛，那张床的影像又出现在她眼前……

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由于习惯，她向雅克作了个客气的手势，说：

“不要站着，孩子们……都坐下吧！”

雅克给珍妮搬过一把椅子，看见丰塔南夫人招呼，就走过去，坐在丰塔南夫人的左面。

这三言两语似乎使气氛稍稍缓和。他们好象主人和客人似的，团团坐定，这时，气温象降了下去，接近正常了。雅克这才能够打破沉默，用几乎是自然的声调，请她说说从维也纳回来的情况。

“你没有接到我最后一封信吗？”丰塔南夫人问珍妮。

“没有，一封信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收到，只有一张明信片，就是头一张，在维也纳车站写的，星期一发的。”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牙齿紧咬着。

“星期一？”丰塔南夫人重复说了一遍。她眨着眼睛，努力回忆起每天都作了些什么事。“可是，我每天晚上都给你们写两封信，一封给你，一封给但以理。”

想起了儿子，她心里又难过起来。

“我一封都没有收到，”珍妮断然回答。

“那么，但以理呢？他没有给你写过信？”

“写了，写了一封。”

“他在哪儿？”

“他离开了吕内维尔，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静默了一会儿，雅克感到尴尬，又打破沉默：

“那么……您是什么时候从维也纳动身的，夫人？”

丰塔南夫人记不太清了，想了一会儿，才说：

“星期四，对了，星期四早晨……夜里才到达乌迪内^①，中午

^① 意大利北部一城市。

才又往米兰走。”

“星期四早晨在奥地利是不是宣布了炮击和占领了贝尔格莱德？”

丰塔南夫人不好意思地看着这年轻人，承认说：

“我不知道。”

她在维也纳的那几天，想的只是维护丈夫的名誉，不怎么了解时局的发展。

“珍妮甚至没有问问我：我们的事情是不是安排好了，”丰塔南夫人心里想。看着她的女儿，她忽然向自己提出了这个刺心的问题：“我回来了，她是不是有些不高兴？”

雅克为了找些话来搭讪，继续问维也纳人们的精神状态，有些什么表现。丰塔南夫人尽可能一一回答。因为她也象雅克一样，抓住这个跟谁都没有关系的话题不放，这样就能够推迟把事情说清楚的那可怕的时刻；因为，三个人这个时候都在想“解释清楚”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须马上就说。

雅克时刻向珍妮转过身来，好象要拉她参加谈话，但是没有用。姑娘甚至好象连听都没有听。她扬着头，瘦削的脸儿绷得紧紧的，目光在躲闪，而又严峻。今天上午，她扬起下巴，紧闭着嘴唇，这些都说明她不但根本不愿参加谈话，并且还暗藏着什么奇怪的、敌对的企图。椅子背没有托住她的腰，她挺着身子坐着，浑身酸痛，神经紧张。她用淡漠的眼光巡视着这屋子，这种眼光不时落在她母亲身上，就好象瞧着由不太真实的布景衬托出来的戏剧中的哑角：丰塔南夫人拿着《圣经》，坐在这把古老的，绿色天鹅绒的扶手椅里，它总斜放在那里，更便于接受窗户里进来的天光。珍妮觉得仿佛从开天辟地起，母亲就在那儿坐着了。这是往昔的回忆，已经消逝的过去的象征，过去也许能使人留

恋，其实更招人生气。而这过去一分钟比一分钟渐渐离她更远，都仿佛消失在迷雾之中，就象旅人业已启程，送别的亲友们离他越来越远一样。她已经向远方的海岸驶去。她的心剧烈跳动，就好象是扬帆启碇的航船，她感觉到新生活的脉搏在她身上跳动着。这个时候，如果雅克拉住她的手，对她说：“走吧，永远离开这一切！”她一定会马上就走，头也不回。

静寂之中，放在床头柜上的、但以理和热罗姆像片旁边的一个小钟响了很长时间。

雅克看了看钟，忽然很想脱身走掉，他向珍妮欠过身说：

“十一点了……我得走了。”

他们对视了一下，珍妮点点头，不等他起身，马上就站了起来。

丰塔南夫人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很难过。她的珍妮，那么正直，那么坦白……现在变得她都认不出来了。她觉得珍妮好象躲躲闪闪，似乎“问心有愧”……对，尽管两个人表面上都很镇定，但是，这个时候，她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样子都有些虚伪。他们作出保住面子的庄严模样对视着，滑稽可笑，就象两个占卜者和神秘教徒。丰塔南夫人想道：“这两个共犯……”正是这样，他们是沉溺在他们的爱情中的共犯，希望他们的爱情是绝对的、神秘的、空前绝后的、绝无仅有的，特别是绝无仅有的，以致除了他们两人之外，任何人也不能理解这个爱情的独特之处。

在珍妮的示意下，雅克壮起胆子走到丰塔南夫人身旁向她告别。

他们这么快就要走，她完全手足无措了。他们难道真要把她一个人撇下，什么都不告诉她吗？她难道不值得他们更多的信任？她试图用理智克制自己，把这个承受下来，把这个使她伤

心的对她的不尊重也承受下来。也许，她应该逼着他们说出真情？可是现在已经太晚了，她也没有这份勇气。另外，她觉得疲乏不堪，精神上受的打击太大，只能任凭别人对她发脾气，对她不公平。也许第一次见面一切不要说破反倒更好……然而，她还是不由得埋怨珍妮。不过，在目前，倒不是埋怨她那有罪的欲念，而是她那忤逆的态度，这真不可解，不正当，不可接受！对于雅克，她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相反，他在这里作客的整个时间，很招人喜欢，在他那怯生生的尊重底下，丰塔南夫人隐约感到一种无言的谅解；她估计他心地纯洁，内心生活中没有卑下的成份。况且，他是但以理的朋友。如果天意就是如此，她准备象爱儿子似的爱他。

她一点也不埋怨他，甚至在跟他握手的时候，差一点象对但以理一样，把他拉到身边说：“来，我的孩子，让我拥抱你吧！”不巧的是这时候，她抬眼看了一下珍妮。那姑娘正向他们转过身来站着，那锐利的目光，带着潜在的敌意盯着她的母亲，仿佛在说：“对了，我在看着你，我观察着你要干什么，我要看看，我把雅克带进家以后，你是不是终于对他有些我所期待的慈爱表示！”这时，丰塔南心中酝酿着的愤慨达到了极点，她的傲气猛然爆发。她本来准备自动作的事，决不能在无言的威胁的命令下作出来。

她打消了本来准备拥抱他的打算，只是向年轻人伸出手去。只有雅克才看出这手在抖动，看出了这可怜的妇人在这平凡的握手中隐藏着的激动、默许和慈祥。

这一切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雅克由珍妮陪着走开的时候，丰塔南夫人出于强烈的本能，意识到她和珍妮紧密相连的未来的幸福在这一刹那受到了牵累，遭到了损害，母女之间不可

弥补的联系已经断裂。她害怕了：

“珍妮，你也要出去吗？”

姑娘只说了一声：“不。”并没有掉过脸来。

在走廊里，珍妮挽着雅克的胳膊，一言不发，快步把他带到前厅。

这时，他们才撒开手，对视着，目光里都流露出不自在的神色。

“你还跟我走吗？”雅克轻声问。

珍妮把身子猛地一挺。

“你看你！”好象只要雅克对她稍有怀疑，就对她是个侮辱。

停了一会儿，雅克又问：“你怎么对她说呢……”

珍妮在他面前站着，举起一只手，抓住橡木衣柜的支柱，急躁地摇着头说：

“喂，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

雅克惊奇地看着她，又转过眼去，看着那扶在深色木器上的痉挛着的手，抖动的肌肤那么白净。他把嘴唇贴上去。

她突然问：

“你带她走吗？”

“谁？你的母亲吗？”他犹豫了一下。“可以，如果你以为……当然了……怎么？你以为她能同意跟我们走吗？”

“我不知道，”她连忙说。“不，我觉得不会……但是，无论如何，要事先有个考虑……”她停住口，微微一笑，接着说：“谢谢！我一会儿到哪儿找你？”

“你不要我到这里来接你？”

“不要。”

“那么，你的行李呢？”

“行李不会很重。”

“你能自己拿到电车站吗？”

“可以。”

“那我的证件呢？那天我放在你房里的那个包……”

“我会把它跟我的东西放在一起。”

“那好，你到里昂车站来找我……几点钟呢？”

珍妮考虑了一下：

“两点吧，最晚不超过两点半。”

“我在车站小吃部等你。好吗？上车以前可以把你的箱子寄放在那里。”

珍妮走过来，两手捧住他的脸，心里说：“我的爱！”慢慢的，她热情的目光直视着雅克的眼睛，终于，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

这次，又是珍妮先摆脱开。她说道：

“你去吧，我回到妈妈身边去。我要跟她说，把一切都讲清楚。”她的声音正如她的面容一样，在疲惫之中还有极度的紧张。

七 六

雅克刚从这所宅子逃出来，就跟从《旗帜报》社出来一样，心绪很乱，真想自己一人待一会儿。他首先考虑了一下，他要干的那件最紧迫的事是什么。突然，穆尔朗的话又在他脑子里回荡：“只要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就行……如果，突然在两军之间，觉悟的光芒……”

正好象眩目的光芒，“在两军之间……”这个思想一下子抓住了他，那样强烈，那样明晰和具体，使他在楼梯中间站住了，手

抓住栏杆，头有些晕眩，激情和希望使他的心在跳动……下意识中，多少小时以来就在酝酿的计划终于显出眉目，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这不是模糊不清的梦幻，也不是兴之所至的试探；他突然酝酿成熟的，是一个确定的计划，具有确定行动的、有关他个人的计划，是那样一种固定的想法，就象无政府主义者的头脑在暗中分泌出来的一样。现在，他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瑞士去，在那里准备干什么。他知道了，要用什么样的具体行动，用什么样具有决定性的单独行动，在这么长久的无所作为、枉自焦虑之后，终于能够为自己的信念而斗争，阻止战争的发生！这样的行动肯定要彻底的自我牺牲。这，他一开始就已明白，他完全同意自我牺牲，一点也不夸张，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是那么英勇，推动他的只是这种神秘的确信：他准备献出整个生命的那个行动，如今是唯一的、最后的手段，能够唤醒民众，突然改变事态的发展，挫败那些勾结起来反对人民、反对博爱、反对公理的势力。

他完全忘了丰塔南夫人的归来和他刚才的这次奇特的拜访，甚至把珍妮也忘了。

珍妮却完全相反……她没有回母亲的卧室，倒先走到阳台上，想目送雅克离去。雅克迟迟不出来她已经不安了。她终于看到他从大门口走出来，一点也没有注意拥塞在马路上的行人车辆，象中了魔似的，急急忙忙向圣米歇尔大道走去。她一直看着他，直到看不见了。可是他却并没有回过头来。

只剩下丰塔南夫人一个人。她把头依在安乐椅的靠背上，僵了似的，一动不动地呆坐了一会儿。她不能形成明确的思想，但她的印象形成这样一种含义模糊的话，她心情沮丧地不断重复：“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她仍然看见雅克和珍妮肩

并肩地站在她面前，好象一个根上长出的两株树干。然后，她又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她父亲那朴素的客厅，少年英俊的热罗姆已经订婚，穿着滚着黑边的淡色礼服，腰杆挺得笔直，站在窗口，向她微笑。他们当时也是怀着多么充足的信心走向未来啊！他们两个也是多么无畏地对抗家庭呀！只要在热罗姆身边，她就觉得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她仿佛立刻又看到昔日的激情，她的幻想，她对幸福的确信，而且确信他们是先于任何人尝到这种激情的第一对。这些可笑的回忆丝毫没有使她产生怨恨，她甚至也不觉得悲伤，她只是觉得仿佛被喜洋洋的光辉照耀着，就跟这幸福的许诺在生活中实现了一样。

听到女儿回来了，她不禁打了个寒噤。珍妮坚定的脚步，关门的样子，板着的面孔，狂热恍惚的眼神，仿佛在燃烧而又能烧毁别人似的。丰塔南夫人害怕了。

她觉得只有慈爱才能有效地驱除邪恶，就怯生生地说：

“拥抱我吧，亲爱的……”

珍妮的脸微微红了，她的嘴上还留着雅克嘴唇的气味。她装作没有听见，只是忙着摘下帽子、丧巾，把这些东西放到床上。接着，她觉得累得很，看见屋子里面的躺椅，就躺了下来。

她就从这么远的地方，有点笨拙地急忙喊道：

“我多么幸福，妈妈！”

丰塔南夫人立刻把眼睛转到女儿这一边。从这句流露着一点挑战意味的话里，她那母亲的心早就觉察出苦恼的意味，这就足以使她意识到她还有个义务、最后的义务要完成——不管有多么危险。她觉得这是上天给她的命令，她必须服从，于是，她威严地振作起来说：

“珍妮，你祷告过吗？真诚祈祷过吗？……你能够说‘上帝与

我同在’吗?”

刚听个开头，珍妮就恼了。在她和母亲之间，信仰的问题是个痛苦的深渊，只有她知道它是多么深不可测。

丰塔南夫人继续说：

“珍妮……珍妮，我的孩子……丢掉你的傲气……我们一起祈祷吧！祈求无所不知的上帝援救，跟他一起来观察你灵魂的秘密……珍妮，你难道不觉得，在你内心深处，有个什么东西……在抗拒？”她的声音颤抖了：“……有个什么东西……有个人……在警告你，说也许你错了，说也许你在自欺？”

珍妮沉默不语，她母亲以为她是在集中心思，默默祈祷。可是静默了很久之后，姑娘却叹息着说：

“你不可能懂得！”

语调既尖酸刻薄又灰心丧气，还含着敌意。

“我懂得，亲爱的……我懂。”

“你不懂！”珍妮说。在她那狭隘的眼光里，显露着固执和不耐烦。她用一种病态的快意品尝着觉得自己不被人理解，认为自己受到迫害的那种陶醉感觉。她差一点喊出来：“我们这样的爱情，你哪里能想象得出！”但是，“爱情”这个字，她不能大声喊出来。她只是皱起脸，笑了一下说：“我刚才就看出来了，你不懂……完全不懂！”

“你这是什么意思，珍妮？你觉得我没有好好接待你们？”

“是的。”

“是吗？”

“是的！”珍妮说得很干脆，两眼望着天花板，阴郁的声音里满含着抱怨，她挺起身来，说得更清楚：“如果你了解我们，你就会找得出话来证明！你就会找出话来表明你为我们的幸福也感

到高兴！”

丰塔南夫人转过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才说：

“你不公平，珍妮……你怎么能这样责备我呢？我今天早晨回到家，什么都不知道……你把我甩在一边，什么都瞒着我……”

珍妮一耸肩膀，打断了她的话。这不是她平常的姿势，她的母亲也许从来没有看见过她这样，这完全是雅克的动作。她又摆出执拗的、高深莫测而又洋洋自得的神色，清清楚楚地说：

“我什么都没有瞒你！……你看，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已经在责备我了。两个星期以前，我自己也根本没有想到……”

“可是，我离开你还没有两个星期：到今天才一个星期……我走的时候，你难道也没有想到？……”

“没有！”

（她在撒谎，因为她在北站遇见雅克的那天晚上，她母亲还在巴黎。她转过头，藏过了脸，但是，她的声音明显地泄露了真情，母女两个脸都红了。）

珍妮强笑一下，显得她心里发慌，接着又说：“两个星期前，如果你对我谈到雅克，我会对你说，我讨厌他，宁愿永远不要见他！”

丰塔南夫人两手放在安乐椅的扶手上，赶紧俯过身来：

“那么，这是几天之内发生的？……甚至来不及考虑一下……”（她差一点说出：“问我一下……”）她只是又添了一句：“问一问但以理？……”

“但以理？”珍妮重复一句，装出惊讶的模样。“为什么要问但以理呢？”她自己莫名其妙地恼火了（也许她这是不自觉地发泄她多年来在温柔中的拘束和在沉默中的恼意），她又高傲地

笑出声来。不知道为什么，禁不住想刺一下母亲心上最疼之处：“好象但以理能够明白，能够了解似的！但以理能对我说什么呢？还不是人人都会说的那些蠢话！‘合乎常情’的话！”

“珍妮……”丰塔南夫人呻吟似的叫了一声。

珍妮却控制不住了，

“你，想必，也有你的想法？你可以说嘛！……什么？什么要打仗啦！还有，什么？……什么雅克和我还不够了解啦？……什么我将来不会幸福啦？”

“珍妮！”丰塔南夫人又叫一声。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女儿。这个皱着眉头，绷着脸儿，声音恶狠狠的珍妮，一点也不象二十年来在她身边看到的那个珍妮。这个珍妮完全为新近放纵出来的本性所控制……“不负责任，”她想着，有一种绝望的感觉，同时也还有些宽厚，甚至有些纵容。

母亲的责难甚至痛苦，一点也没有使珍妮感动，反倒刺激了她。

“我跟着他受苦，我根本不在乎，你又能怎么样呢？这不关但以理的事，这只跟我有关系！我用不着请教任何人！别人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现在，我有了他，我谁也不用请教，谁也不用请教！”

丰塔南夫人又受到一次打击，脸都白了。她最痛苦的是，她感觉到女儿是完全自觉地、故意地出言不逊。撒旦这个魔鬼钻进了女儿的心。她惊骇地向上天呼吁。她再也不能抵御这恶毒气氛的感染，再也不能压制心头逐渐升起的怒火。然而，这一会儿她又用坚定而又慎重的口吻说：

“你一向有完全的思想独立的权利，珍妮。你很清楚，自从你长大成人，能够按照你的良心办事之后，我从来不把任何意志

强加给你，也从来不逼迫你听从任何劝告。今天也是这样。你完全可以自由行动，用不着听我的意见。可是，我，我有责任……”

“你就说吧，妈妈！”

“我有责任告诉你，尽管这并没有用……有责任要你提防你自己……珍妮……我的孩子，我要唤醒你自己的良知……难道在你心中连善和恶的区别都泯灭了吗？睁开眼睛吧！清醒清醒吧！你简直是不可思议地精神失常……以至于放纵你的热情，不仅不后悔，反而把这种放纵看作是有能耐，有勇气……甚至是高贵的表现……”她上气不接下气，痛切地感到要完成这个任务，她力所不及，感到她太疲劳了，觉得她走错了路，没有说该说的话，也没有用该用的口气……如果这时候，不是看到珍妮在那儿躺着，使她又突然仿佛看到紧抱着睡在但以理沙发床上的那一对，她说不定就停嘴了。

“你应该觉得羞耻！”她又结结巴巴地说。

“你说吧，妈妈！”珍妮又说一句，生硬的语调带着威胁。

可怜的妇人这一次再也控制不住了，说道：“可耻！珍妮，我的小女儿，我的孩子！……你利用自己一人在家的机会向各种诱惑让步了！……”她突然后悔不该在一怒之下说出这样的话来，立刻停住，转了话锋：“这样严重、后果如此深远的决定，怎么可以在几天之内就作出呢？这个决定关系到整个的一生，不仅是你的一生，还有我们的……你哥哥的，我的，归根结底，我们全家的共同前途都有关系！你想过吗？你没有想过！你当时和现在都是……”

“够了，妈妈！够了，够了！”

“你是昏了头！你做出的事简直像个孩子！”丰塔南夫人已经声嘶力竭了，但是，在她心里不断重复的那句话还是脱口而

出：“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珍妮觉得一股强大的凉气，象海浪一样，把她猛然举起，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啊，今天，她是怎样看待她的母亲啊！她觉得母亲不通情理，冷酷无情，自私自利！

她向丰塔南夫人走下一步，说道：“你要听我说吗？如果我们中间有个人没有自知之明的话，那就是你！对，你只想你的前途，并没有想到我的！现在，我才发现了一件事，就是你爱我从来是为了你，只为了你自己！你就是因为嫉妒，才反对我们！你嫉妒！嫉妒！你只想到一件事：自私自利地把我留在你身边！……好，你别这样想！太晚了，我很遗憾不能让你称心如意。但愿你及早明白：雅克今天晚上要到瑞士去。我……我跟他一起走！”

“今天晚上？到瑞士去？”丰塔南夫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这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你回来之前我们就决定了，坐最后一班车走……”

“你？今天晚上？”

“对，马上就走！”

“不行，你休想！珍妮，不行！”

珍妮用咄咄逼人的声音反驳：“没有什么可说的，怎么样也不行了，妈妈！现在，谁都不能叫我们改变主意！”

“我不同意！你听见了吗？”

那姑娘不回答，只是耸耸肩膀。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珍妮？我不许你走！”

“坚持没有用，妈妈……我再跟你说一遍……只要你还有一点人心的话，你就不该反对我，你应该……”

“如果我还有一点人心？……”丰塔南夫人结结巴巴地重复

一句。她只记得这句可怕的话，把其他都忘了。

珍妮也失去了自制，大声嚷着：“对！如果你真的关心我的幸福，如果你爱我是为了我，那今天你……”

这一回，丰塔南夫人没有力量再忍受了。她两手捧住头，手指堵住耳朵，不要听见这刺心的声音。她闭上眼睛想道：“人不能决定，作决定的是上帝。我的上帝，愿你的意志实现！”

她听见嘭的一声响，恐惧地抬起头来。是珍妮摔门离开了房间，她放在床上的帽子和围巾也不见了。

“要祷告……祷告，”丰塔南夫人心里说。

珍妮的形象在她眼前不断出现，摆脱不开，就象她刚才看到的那个样子：怒不可遏，高傲地挺着身子……

“我的上帝，”她祈求道，“帮助我，给我力量！……一切都可以弥补……对于你所创造的人，我们永远不该失望……”她慢慢地接连两次背诵那神圣的话：

“不应该重视可以看见的，应该重视不可看见的。因为可看见的只是暂时的，而不可看见的是永恒的。”

起初，她觉得麻木迟钝，但过了一会儿，思想反倒突然活跃起来。她精疲力竭，肩膀搭拉着，两手握在一起，一动不动地瘫在安乐椅上，但脑子却清醒地活动着。她竭力耐心地第一次检查自己的良心，就象她每次经受考验时所作的一样。她努力分析自己的痛苦，给它划定轮廓，然后，可以说，把它看作是件具体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割舍，可以奉献给上帝。那些未被奉献的都失去了……

珍妮要去瑞士并不是对她最大的打击。况且，她始终不能完全相信这是真的。不管是对还是错，她最痛苦的是自己一直

受了欺骗。伤口，真正的、最深的伤口是在这里。她以前一直天真地认为，她善知人意的慈爱，甚至在珍妮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给予珍妮的自由，已在母女之间建立起互相信任的习惯。珍妮采取任何重要的决定，一定会先告诉她一声，先征求她的同意。可是，珍妮在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倒瞒起她来了；甚至趁着她不在家，瞒着她作出的事，正象一个在最刻板的顺从教养大的姑娘，忽而反叛起来，把那严格的、不可理解的、她已不愿再忍受的管束丢开了。自然，尽管刚才痛苦地吵了一架，丰塔南夫人决不怀疑女儿对她的感情，也决不觉得自己的母爱因而稍减。不，而是她的信任受到损害。既然她受到这样粗暴的背叛，她以前对于珍妮的那种信任就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摧残。她还象以前那样慈爱，当然。还象以前那样信任吗？没有了，永远不会有了。

想起了这些，她很灰心。她又拿起《圣经》，随手翻开，不太困难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文上。她逐渐恢复了平静，这是一种异样的，未曾料到，甚至令人不安的平静。忽然，她更加注意地剖析自己，忽然发现这平静中包藏着可怕的秘密：在她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感情，并且肯定地悄悄发展了起来……这种感情在她生活最严酷的时刻就已经体验过，她十分熟悉。当时，她没有力量徒然受苦，决定跟热罗姆分开。这是一种感情吗？不，倒不如说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或者是说机体的自卫本能。她想：“这是本性以它的聪慧从我们自身提取的一种药物，使我们能够受得住某些痛苦……”她把书放下，想看看自己这时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性质，给它一个名目……是甘心顺从，还是撒手脱身？……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名称可以表示两种那么矛盾的感情混合物；又慈祥又淡漠？淡漠？这个粗鲁的词把她吓了一

跳。这么多年以来，充满了她心房的母爱，竟会有一天，为事所迫，由于淡漠而减弱了。尽管此时，想到这个仍有几分温情，但是将来，回忆起来则更为痛苦。她闭上眼睛，不愿意再考虑下去。她只又一次喃喃地说：“愿你的意志得以实现。”

她悲不自胜，又用手捧住头，哭了起来。

七 七

珍妮早已不顾一切，决心溜走，她本能地觉得，要迈出这关系到整个前途的一步而不动摇，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见到她母亲……也不能再偷空考虑！

她一口气跑回自己的房间，狂乱地把内衣和她所有的不多几件黑衣服装在一个小皮箱里，然后，戴上帽子和黑纱，咬紧牙关，脸色通红，甚至连镜子都没有照一下，就离开了屋子，好象后面有人追赶她似的。

她飞快地跑下楼梯，感到又高兴又害怕，想道：“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我自由了！现在，我真的只有他了！”

到了外面，她最初有点晕头转向。到哪儿去呢？雅克两点以前不会在车站小吃部等她的。而现在还不到十二点。没关系，因为她拿着行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现在就到里昂车站去，先坐圣米歇尔大道的电车，再转圣日耳曼街的车。

她很幸运，不用等车，还在车后平台上找到了一个位置。

她在心里说：“不要考虑，不要考虑。”

没有太大的困难她就做到了。因为车厢里坐满了乘客，大家一齐讲话，声音嘈杂，就好象刚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多人结婚，太太！今天早晨在一些区政府民政处的窗口，他们真不知怎

么办才好。那么多动员入伍的人，都想在出发之前先结婚……”——“可是，还得办手续……”——“全都简化了。这时候真可以说，打仗就得按打仗办。只要有两张出生证和一张兵役证，你就可以顺顺当当地跟任何一个原来的相好把关系合法化……”——“你知道，我呀，我觉得这挺好，提高士气，然后，一切就好办了……”——“嘿，士气，那倒不缺！在法国，只要是需要，总是有办法的。”——“我住在老城墙附近，天刚亮，环城路上的征兵处就挤满了人，人们成群打伙来入伍！”有一个穿制服的军医官反驳这话：“不对，这样还不能办妥入伍手续，他们是先来打听打听，或者先登个记……”

巴士底广场的电车上也挤满了人。不少乘客站着，挤在车座中间。幸亏有个女人好心，看到珍妮拖着行李不方便，就把自己女孩的座位让给她，珍妮才坐下了。

电车摇来摇去，轰轰响着，人声喧闹。珍妮想摆脱自己的思绪，倒很乐意听听头顶上在说什么。

在圣雅克街，电车不得不停下来，让一个团的轻炮兵向巴黎大学那个方向先走过去。

“好象是所有的卫戍部队都悄悄地离开了巴黎……”——“也许有命令吧。一切都……按军事行动……”——“对，看一开始的这劲头儿，不会拖很久的！”——“我正在孚日山度假，在里博维尔……看见我们东线的那些英勇的战士，尤其是那些轻步兵，我们就放心了！”——“不过，还是干了蠢事，后撤了十公里……”——“这算什么！他们背后有两千万俄国刺刀，前边又有我们！……”——“旅店的老板告诉我，有个旅客从卢森堡来，他看到一架法国飞机直向齐伯林飞艇冲去，把它象个肥皂泡一样炸碎了！”一个售票员说：“别信谣言，刚才还有个乘客说，昨天夜里在阿尔萨斯取

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不会吧！显然夸大了！……可是有人说，在南锡周围已经看到了德国鬼子的巡逻队……”——“南锡！你想想！”——“你们没有听说苏瓦松的桥都炸掉了？”——“是我们炸的，还是他们炸的？”——“当然是我们了，在苏瓦松！”——“也许是个间谍……”——“得提防间谍！好象到处都有，光警察不够，得人人看好自己的那条街，自己的房子。”——“我哥哥在奥尔良火车站当差，他老婆对我们说，她看见同一层楼的邻居把一面德国旗藏在床底下。”一个戴夹鼻眼镜的先生一本正经地宣布：“我就主张德国人可以喊德国万岁，当然了，必须不具有挑衅的性质……有什么法子呢？他们就是那边的，这不能怪他们……”

在莫贝尔广场，电车又停了一次。一大群人堵住了马路。珍妮看到在蒙日街口有一股狂热分子，抱着一块厚木板，砰砰叭叭地砸一座商店的门，商店招牌上写的是马吉奶品店。

电车上的人们兴奋起来：

“加油！弟兄们！”——“马吉，是普鲁士佬……”戴夹鼻眼镜的先生说。“还是个枪骑兵上校哩！……《法兰西行动报》早就揭发了他！他专等发布动员令来动手哩！”——“听说，今天早上，只在伯尔维尔一个地方，他就毒死了一百多个孩子，就是用的他的牛奶！”

珍妮看着那羊头撞锤一来一往，听着打在铁皮上的沉重声音，铁皮终于给砸开了。商店里面，玻璃都给打碎，碎片满处飞。聚在店门口的群众喊起来：“打倒德国！”“打死卖国贼！”广场的一角，一队骑自行车的警察下车来，远远地注视着这场面，不来干涉。反正，法国是遭到了进攻，人民自己起来报仇，让他们干去吧！

电车终于到了里昂车站。

广场上满是人。珍妮拖着行李，穿过人群，走到小吃店，坐了下来。

从大开的窗口，强烈的阳光直射进大厅。她缩到顶里面的角落里，湿漉漉的两只手紧握在一起。虽然时间太早，根本不能希望看到雅克来，她的眼睛还是一直盯着大门。天气闷热。刚才在电车上颠簸得厉害，现在，这皮椅子又不舒服，她浑身酸痛。强烈的阳光照花了她的眼。背光的那一面，顾客不停地出去进来；也有人在人行道上很快走过，自己推着行李车。她停下来，抓住放在身旁的箱子，塞到桌子底下，然后又搬到椅子上，接着又开始张望着等待。她那互不连贯的动作显出她心烦意乱。刚才在路上，她还能让自己麻木，现在只有她自己，她就没有办法了；又非在这里等着，也许要等一个钟头，一个人，忍受着内心的激动不安，她苦恼不堪。她竭力勉强自己去想些小事儿，翻来覆去地想些没有什么妨碍的琐碎事。可是她还觉得，直到现在被她撇在一边的那个可怕的思想，好似猛兽一样，围着她的脑子转个不停，而且圈子越转越小……她要自卫，这时，就强迫自己去查看面前摆着的一件件东西，又去数数篮子里的羊角面包，碟子里的糖块。接着，她的视线又回到门上，随着那进进出出的人群转。一个斑白头发的老太太，跨过门坎，瞧着门旁边最近的一张空桌子，走过去坐下来，手臂沉重地拄在桌子上，两只手捧住了头。这马上钩起了珍妮已经摆脱掉却只等着一个机会重新扑上来的回忆……母亲出现在她眼前，就象珍妮丢下她时的那个样子，坐在安乐椅上，两只手捂住额角。这时候她在干什么呢？她能想到吃午饭吗？珍妮好象看见她在乱七八糟的厨房里，瞧着肮脏的

盘子，两份餐具……这一次，是她闭上了眼睛，低下头来，用两只手捧着。

几分钟过去了，她一动不动……“你嫉妒！……如果你还有一点人心……”她在心里重复着自己的话，不明白当初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来，说了这种话之后，还怎么能走掉！

她终于抬起头来，面容平静而又严峻，脸颊上清晰地留下指头压出的印痕。她心里想：“还考虑什么呢？我就该这样做，不能是别的。”她又过了一会儿，眼睛盯住了望，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她的决心简直要把她压垮了。她现在犹豫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行动，这压倒一切的义务是不是要等雅克回来之后再去完成？为什么等他呢？是为了向他讨个主意？难道她还存在着怯懦的希望，要雅克来拦住她不要这样做？不行，她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现在最急迫的，不就是减少母亲的痛苦吗？

她直起身，叫那茶房：

“什么地方可以寄快信？”

“邮局吗？象这样的日子，邮局该是开着门的。您看，从这里就能看到，那个蓝灯……”

“请看着我的行李。我马上回来。”

她跑了出去。

的确，邮局还开着门，军人和老百姓挤在窗口前面。她要了一张蓝色的邮筒，一口气写道：

“亲爱的妈妈，

“我刚才发了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给你带来痛苦。我请求你谅解，把这些都忘掉。我留下来，今晚不陪雅克到瑞士去了。我不愿把你一个人丢下。他非走不可，这是他

最后的期限了。我以后再去找他，我希望跟你一起去，好不好？为了我再和他在一起，你不会拒绝跟我一起去吧？

“我本来应该马上回家，跑去拥抱你。但是，他走前的这最后几个钟头，如果不跟他一起度过，那我就太无情了。今天晚上我就回到你身边，向你说明一切，亲爱的妈妈，使你能够原谅我。

珍”

她没有再读一遍，就折好封上。她的两手和整个的身体都在抖动，一身冷汗把衣服都贴在肉上。她先问清楚了，一个钟头就能送到，就把信投到邮筒。接着，她慢步穿过广场，又回到小吃店那个角落里坐下。

做完了这件事，心里是不是平静了些呢？她这样自问，却不能回答。作出了这样的牺牲，她觉得浑身无力，就象大量失血一样。她沮丧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时甚至害怕雅克来到，不在他身边，她还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实践诺言。她试图给自己解释：“几天之后……一个星期……最多不过两个星期……”两个星期看不到他！她是多么畏惧这次生离，真是只能跟死别相比了。

雅克的身影终于在门口出现的时候，她跳了起来，直挺挺地站着，面色苍白，浑身无力，两眼看着他。雅克看见她了，第一眼他就看出发生了严重的事。

她丧气地摆摆手，什么都不让雅克问。

“不要在这里说……我们出去。”

雅克从她手里接过箱子，跟着她到了外面。

她迈出几步，走到人行道上人群中间，忽然站住，向雅克抬

起悲痛的眼睛，很轻、很快地说：

“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雅克的嘴唇张了张，但什么也没有说。他弯下腰把箱子放到地上，等到他直起身来，已经趁机，也许是不知不觉地，控制住了脸上的表情。他那惊愕和将信将疑的神气一点也没有泄露出不由自主闪到他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我的使命……我现在自由了！……”

旅客和士兵推挤着他们，雅克让珍妮退到两根柱子之间的墙凹里。

珍妮又断断续续地说：

“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妈妈……今天不行……要是你知道……我刚才对她太坏了……”

她看着地面，不敢碰到雅克的视线，而雅克观察着她，嘴唇颤抖着，眼睛里满是阴郁的神情。他俯下身，好象是要帮助她把话说清楚似的。

“你明白吗？”珍妮又轻声说。“这样之后，我就不再能走了……”

“我明白，我明白……”雅克在牙缝里说。

“我得留在她身边……至少几天……我以后到那边去找你……不久就去……尽可能早。”

“好，”雅克勉强说道。“尽可能早！”可是他心里却在想，“不，永远见不到了……完了。”

他们呆呆地静默着站了一会儿，谁也没有看谁。她本想把她和母亲之间发生的争执告诉他，但是，她甚至连一个又一个细节是怎么连系起来的都想不起来了。再说，对他说又有什么用呢？在这场难与人言的个人悲剧中间，她感到无可救药的孤独，

雅克并没有参与这事，在这件事里，雅克将永远是个局外人。

雅克也一样，这个时候，他觉得跟珍妮之间有了距离，而且这个距离不可弥合。他跟所有的人都有了距离。正是两个钟头以来使他陶醉的英雄主义把他孤立起来，使他对任何正常的情感无动于衷。就好象表受到振动就停摆不走了似的，珍妮刚说出头一句使他获得解放的话：“我不能跟你一起走，”他的思想就凝住不动了。他表现出的痛苦和失望当然不是装出来的，但那只是表面的。最后的羁绊断裂了。他马上就走，一个人走！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珍妮端详着他，心里想着明天就看不到他了。看到这脸上焕发出来的力量，她很惊异，但是她心里太乱，看不出在他心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看不出她自己的决心给他塑造出一个摆脱了束缚的、全新的面貌。她含情脉脉地看着那张富于表情的大嘴，那个下巴，那对肩膀……那怦怦作响的、坚实的胸膛，她曾在那上面睡过……想到今夜不能偕着他，在他身体的温暖里度过，她觉得刺心的痛苦，把别的事都忘了，

“我的爱……”

看到雅克眼睛里发出了光芒，她顿时明白，她是多么不小心，竟撩起了他的温情……他那目光在她心中唤起的回忆使她害怕得发抖。她只想睡在他的怀抱中——不要别的……

雅克迷离的目光直视着珍妮的眼睛，几乎没动嘴唇，噤着说，

“我动身以前……一起过我们最后一个下午……你愿意吗？”

珍妮不敢拒绝给他这最后的欢乐。她羞红了脸，她温柔地、可怜巴巴地微笑一下，扭过头去。

雅克的眼睛离开珍妮，向阳光灿烂的广场那边扫视了一会儿。几家店铺的门面上，闪着金字招牌：旅人饭店……中央大饭店……启程饭店……

“来，”雅克挽着她的胳膊说。

七 八

萨夫里奥显出猜疑的模样：

“谁告诉你的？”

雅克答道：“卡鲁日街的门房。我刚下火车，谁还都没有见到。”

那意大利人承认了：“是啦，是啦……他从布鲁塞尔回来之后，是住在我家。他在躲着……我看得很清楚，没有了阿尔弗利达，他自己回家会很难过。我就说：‘到我家来吧，飞行家。’他就来了，住在楼上。他象坐牢一样。整天躺在床上看报。他抱怨犯了风湿病①……其实，这只不过是借口②，”他挤挤眼又说。“就是为了不出门，不谈话……他任何人都不愿意见，甚至里查德利也不见！啊，他变了样儿，你知道，仿佛那个婊子把他的膝盖骨敲断了！我怎么能想到……”他绝望地摆摆手：“这个人算完蛋了。”

雅克没有作声。萨夫里奥的话象透过重雾传到他耳朵里来。从巴黎到日内瓦十八小时漫长的旅程中，他一直昏昏沉沉，现在还没有从梦游状态清醒过来。而且，他的牙床发炎，最近几个星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reumatizmes。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oune pretesto。

期，有好几次痛得睡不着觉，昨夜在车厢的过堂风里，炎症越发厉害了。

萨夫里奥继续问：

“你吃过了吗？喝过了吗？你还要点什么？来支烟吧，这烟不错，是奥斯塔^①生产的！”

“我要见他。”

“稍等一会儿……我上楼去，告诉他说你回来了。他也许见，也许不见……”他用温和的眼光盯着雅克，又说：“你呀，你也变了！对啦，对啦！你好象听不见别人说话，你心里想着战争……大家都变了……你在那边看见什么了，说说吧。他们让你来？……你知道，最可怕的是，大家都发了疯，你瞧，都去当兵！唱着歌，怒气冲冲^②……一列列的火车装着新兵，人们都眼里冒火，大喊：‘打到柏林去！’而那边也喊：‘打到巴黎去！’^③”

“我，我看到那些去打仗的并没有唱歌，”雅克阴郁地说。接着，他好象突然清醒过来了，用激动的声音说：“萨夫里奥，最可怕的不在这里……而是‘国际’……‘国际’毫无作为，叛变了。饶勒斯死了，大家都泄了气！大家，甚至连最优秀的人物在内！饶勒斯的朋友勒诺代！盖德！桑巴！瓦扬！对，瓦扬还算得一条汉子！只有他敢对议会说：‘宁愿起义，也不要战争！’所有的人，甚至总工会的领导人！……这才是最令人不解的！不过，这些人还没有受到议会制的传染！各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倒很明确：‘宣战之日，就是总罢工之时！……’动员令的头一天，无产阶级还在犹豫。本来是能够办到的，可是他们连试都没有试一

① 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城市，离瑞士不远。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furia。

③ 原文为德文 Nach Paris。

下！什么‘神圣的领土’啦，‘祖国’啦，‘举国一致’啦，‘保卫社会主义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啦，他们能够说的就是这些话！有人问他们：‘我们怎么办？’他们只会回答：‘按动员表办事！’”

萨夫里奥两眼噙满泪水。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甚至在这里，一切也都颠倒过来了。现在同志们说话都放低了声音……你看吧，大家都变了……都害怕……联邦政府今天保持中立，不管我们。可是明天呢？到那时候如果要去，走到哪里去呢？……大家都害怕。警察到处都在监视着……支部里都没有人了……晚上，里查德利在家里召开会议，或者是到布瓦索尼斯家里去……有人带去些报纸，懂外文的就给别人翻译，然后，讨论，为了一点小事就发火！……还能干什么呢？……只有里查德利在工作。他有信心。他说：‘国际’死不了，它还会更生，更加强大！他说目前意大利应该说话，他想把瑞士的社会主义者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重振声誉……”他骄傲地抬起头来，接着说：“因为，你知道，意大利的全体无产者都是忠实的！意大利才是革命的真正祖国！象马拉代斯达，波尔吉，墨索里尼，所有的群众领袖都比以往更加有力地进行斗争！不仅为了阻止政府参加战争，还要同全欧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立即实现和平：跟德国社会主义者联合，跟俄国的社会主义者联合！”

“对……”雅克心里想。“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有更快的方法可以实现和平！……”

不过，他用完全淡漠的语调低声说，仿佛这些问题跟他完全不相干了：

“在法国也一样，可以找到彼此孤立的几群人，还在坚持。比方说，你们应该跟冶金工会联合会保持联系。那里还有一些人。

你听说过梅尔海姆吗？……还有莫纳特和《工人生活报》的那群人。他们还没有动摇。你们还可以找到一些人，象马尔托夫……穆尔朗，和《旗帜报》的一些人……”

“在德国，有李卜克内西……里查德利已经跟他一起工作了……”

“还有，在维也纳……有霍斯梅尔……通过米托尔格你们可以……”

“米托尔格？”意大利人打断了他的话，站起来，嘴唇颤抖着。
“米托尔格？你还不知道吗？……他走了！”

“走了？”

“回奥地利了！”

“米托尔格？”

萨夫里奥垂下眼睛，在他那美丽的罗马人的脸上，显出赤裸裸的、激烈的痛苦。

“米托尔格从布鲁塞尔回来的那天，他说：‘我要回国去。’我们大家都说：‘你疯了！你看，你已经被判决为逃兵了。’可是他说：‘正是因为这个。逃兵，并不是胆小鬼。逃兵，打仗的时候反倒回来了。我必须回去！’我对他说：‘你回去干什么，米托尔格？不是回去当兵吧？’我当时一点也不明白！……他就说：‘不是，不是去当兵，而是去作个榜样。为了让他们在大家面前把我枪毙！……’就这样，晚上，他就走了……”

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啜泣起来。

“米托尔格？”雅克眼睛失神，结结巴巴地说。过了一会儿，他转身对意大利人说：“现在，你去对他说我来了，可以吗？”

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又轻声重复一句：“米托尔格？……”米托尔格做了一点事，米托尔格做了他所能做的，尽了最大的努力

来证明他忠实于自己的一贯信念！……他选择了堪为表率的行为，他为此献出他的生命……

萨夫里奥下楼来，看到雅克脸上一抹笑影尚未消散，很是惊讶。

“算你走运，蒂博！他愿意……上楼去吧！”

雅克跟在意大利人后面，登上从药店通往上面的螺旋形楼梯。到了最后一层，萨夫里奥闪开身，指着阁楼里面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单间说：

“他就在那里……你自己去吧，这样更好些。”

门一开，梅奈斯泰勒扭过头来。他在床上躺着，脸上亮晶晶，黑色的头发被汗水贴住，脑壳显得越发小，额头越发突出。一只手垂下来，拿着一张报纸。在他头顶上面，从一个开着的天窗，可以看到一角明亮的天空。房里闷热，地上乱扔着打开的报纸，到处都是吸了一半的烟头。

雅克微笑着招呼，梅奈斯泰勒却没有答理。雅克向床头走了一半，热情一下子低落了。但是，梅奈斯泰勒猛地一挺身，站了起来，动作快得不象个生风湿病的人。（雅克心里想：确实只是个“借口^①。”）他穿着一套飞行员的褪色蓝布连衣裤，里面什么也没有穿，领子敞着，露出汗毛很密的瘦胸脯。他衣冠不整，甚至有些邋遢。头发太长，梢上翘起来，在脖梗上形成一个毛蓬蓬的尖儿，鸭子尾巴似的。

“你回来干什么？”

“我在那里能作什么呢？”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梅奈斯泰勒靠着柜子，两只胳膊盘起来，一边捻胡子，一边看着雅克，左眼不停地神经质地眨动，这是个新的怪癖。

这样的接待使雅克完全不知所措。他随口接着说：

“您真想象不到那里的情况，飞行家。一切集会都被禁止了，再也不能举行群众大会……新闻都要经过检查。没有一家报纸愿意或者能够发表反对派的文章……我看见有一个人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被砍伤了，因为他没有立即向军旗行礼……有什么办法呢？到兵营去散传单，第一天就给关起来吗？怎么？搞破坏？您清楚，这种事我干不来……况且，就是炸毁弹药库、军火军车，还有几百座仓库，几百列火车呢！……不行。目前，在那儿什么事情都干不成！都干不成！”

梅奈斯泰勒耸耸肩，一个毫无生气的微笑掠过他的嘴唇。

“在这里也干不成！”

“那可说不定！”雅克转过眼睛来反驳。

梅奈斯泰勒好象没有听见。他向柜子转过身去，把手伸进水盆里，把额头打湿。这时他才发现没有空的座位，雅克还站着。他把板凳上乱七八糟的纸拿开。无神的眼睛到处乱转，好象一个着了魔的人。他又回到床边，在褥子边上坐下来，搭拉着手臂，叹了口气，忽然说：

“我太想念她了，你知道……”

口气很干脆，几乎有些冷漠，只是说明事实而已。

“他们本来不应该这样做，”雅克犹豫了一会儿，轻轻说。

这一次，梅奈斯泰勒又好象没有听见。不过，他站了起来，用脚踢开一张报纸，走到门口。他拖着腿，象只受了伤的甲虫，他从屋子的这边走到那边，神情又激动又淡漠。

“变到了这个地步？”雅克心里想。他还是将信将疑，特别是因为梅奈斯泰勒好象忘了雅克在这儿，雅克观察他的时候就更加从容。他清瘦的脸上，失去了集中的力量和始终警觉的清醒。眼睛还很活动，但是没有神采，眼神异样地温柔，甚至有时候反映出一种宁静安详。雅克马上想到：“不，不是宁静，而是疲乏……是从疲乏中产生的消极的安静。”

梅奈斯泰勒终于用模糊的反问口气重复一句：“他们本来不应该？”他耸耸肩，仍旧走来走去，接着，突然在雅克面前停住：“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如果说我现在丧失了一个概念，那就是责任！”

“这一切……”雅克觉得，梅奈斯泰勒想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不仅是阿尔弗利达和帕特逊，他还想到了欧洲，想到欧洲各国首脑、外交家，想到党的官员，也许，还想到了他自己，想到了他抛弃的职守。

飞行家又一次从房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又躺了下去，轻轻说道：

“归根到底，该谁负责？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为自己负责？你认识有谁是负责任的？我可从来没有遇见过。”

接着，是长时间的静默，沉闷的静默，与炎热和逼人的阳光合成一体，压得人喘不出气。

梅奈斯泰勒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闭上了眼。他躺着倒显得身材高大了。他翻过手掌放在褥子边上，指甲被烟草熏黄了，手指微微合起，好象握着一个看不见的球。袖口捋上去，露出了手腕。雅克盯着他那爪子一样的手，盯着那从来没有显得这样脆弱，这样女人气的手腕。“那个婊子把他的膝盖骨敲断了……”不，萨夫里奥并没有夸大！……但是，只看到这一点完全不能解

释一切。雅克又一次碰上了飞行家的秘密。当一切都使人期望着决定时刻终于将要到来的时候，怎么能放弃呢？一个这样的气质的人……

“这样的气质吗？”雅克又想。

梅奈斯泰勒一动不动，却突然清清楚楚地说：

“米托尔格去迎接他的死亡了。”

雅克浑身一抖，心里想：

“人都有一死。”

过了几分钟，他低声说：

“人一旦把死当作一种……一种自觉的行动，最后的行动，有用的行动，那么，死大概就不那么困难了。”

梅奈斯泰勒的手微微抖动一下，骨瘦嶙峋的脸上，眼皮低垂着，象是僵了一样。

雅克挺起上身，不耐烦地用手将搭在额头的一绺头发掠上去，他说：

“我要这样做。”

他的嗓音忽然颤动得厉害，梅奈斯泰勒睁开眼睛，扭过头来。雅克的眼睛盯着天窗，他那男性的面容被照得通亮，反映出坚定的决心。

“在后方，不可能进行斗争！至少目前是这样。反对政府，反对戒严和新闻检查，反对新闻界，反对爱国狂热，做不到，完全做不到！……可是在前线，就是另一码事了！对，对于那些被拉到火线上的人，是的，是可以施加影响的！就是应该打动他们！”梅奈斯泰勒动了一下，雅克以为他表示怀疑，其实只是神经性的抽搐。“您听我说下去！……唉，我知道。今天，把鲜花插在枪上，唱着《马赛曲》，唱着《莱茵河战歌》……对，但是明天呢？……

明天，这些唱着歌出征的人，就只是面对真实、面对战争的可怜的家伙！饥肠辘辘，两脚血污，筋疲力尽，被头几次轰炸、冲锋，头一批伤员、死人吓得要死……我们正可以对这些人宣传，对他们叫喊：‘蠢货，你们又一次被利用了，利用了你们的爱国主义，你们的慷慨，你们的勇气！所有的人都在欺骗你们！甚至你们所信任的那些人，你们选来保卫你们的人！但是现在，你们该明白，人家要你们干什么！起来反抗吧！不要为他们卖命！不要去杀人！把你们的手面对面的兄弟伸出去，他们也象你们一样，被人骗了，被人利用了！扔掉你们的枪，起来造反吧！’”他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喘着气，过了一会儿，才接着说：“问题在于，要能够打动他们！……您会问我：‘怎样才能做到呢？’”

梅奈斯泰勒用臂肘支起身子。他看着雅克，尽管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讽刺意味，但仍然没有掩饰他的注意。他的模样也的确象是在说：“对了，怎样才能做到呢？”

“坐飞机！”雅克没有等他问，就喊了出来，然后，放低声音，慢慢地说：“坐飞机就可以接触到他们！……要飞越前线，飞过法国部队和德国部队的上空……要向他们撒出千百万张印着宣言的传单……宣言，用两国文字写！……法国的司令部、德国的司令部，可以禁止把传单带进营地。可是，在好几公里的前线上，薄纸形成的云从天上飘下来，飘洒在村子里、营地上，在兵士集聚的地方……他们就没有办法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了！这一片云，哪儿都钻得进去！这些传单在法国和德国，将到处宣读，被人理解！……它们被互相传递，一直传到后备队，传到老百姓手里去！……这些传单将向每个法国的、德国的工人、农民说明他们的处境，他们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说明对面那些应征入伍的士兵是什么人！告诉他们，要使他们互相扼杀就是一桩荒谬的

滔天的罪行！”

梅奈斯泰勒张了张嘴，想说话，但又没有说，重新躺下去，眼睛看着天花板。

“啊！飞行家，您想象一下这些宣言会有多么大的效果！反抗的号召多么有力！……效果吗？可能就象雷霆霹雳一样！哪怕只在前线的一个点上，敌对的军队变成了兄弟，就会象导火线一样迅速蔓延开！拒绝服从命令……瓦解军官们的意志……我飞行的当天，法国和德国的司令部就会瘫痪……在我飞过的地区，军事行动就不可能进行！……这个榜样多么有力，宣传的力量多么强大！这架有魔力的飞机……这个和平的使者……在发布动员令前‘国际’未能赢得的胜利，我们今天仍能夺过来！我们没有做到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我们没有组织起总罢工，但是，我们能够做到让双方战士亲如兄弟！”

飞行家咧开嘴，很快笑了一下。雅克向他迈进一步，怀着不可动摇的确信，也笑了笑。他保持着镇静，连声音也没有提高，又继续说：

“这个计划没有一点不能实现的。但是，我需要有人帮助。我需要您，飞行家。只有您能通过您以往的关系，给我弄到一架飞机，您也能在几天之内教会我开飞机，只要在一个固定方向上能飞几个钟头就行。战场都在飞机的行程之内。从瑞士北部起飞，毫不费劲就可以到达阿尔萨斯德法军队集结的地方……不，不，我都掂量过。困难和危险……困难，如果你愿意，如果你帮我的忙，就能够克服。至于危险——反正只有一个人，这只跟我自己有关系！”他突然脸红了，不说话了。

梅奈斯泰勒看他一眼，知道雅克要说的话都说完了。他慢慢抬起身来，坐在床沿上，竭力不看雅克，低着头待了一会儿，双

脚垂着，用手掌轻轻揉着膝盖。接着，他没有改变姿势，开口说道：

“那么，你这个法国逃兵，你以为你可以在瑞士这样学开飞机，不引起人怀疑？你以为你在几天之内就可以起飞，辨识航空图，定出地形方位，自己连续飞行几个钟头吗？”他的声音平板，几乎没有什么讽刺意味，神情使人捉摸不透。他把一只手抬到齐下巴那么高，茫然而又专心地察看了一会儿他一只只肮脏的手指。他干巴巴地说：“现在，你要走吗？请吧……”

雅克狼狈不堪地站在顶楼中间，在走开之前，他还想再抓住飞行家的目光，他寻思着他是不是听明白了，是不是连一句赞同的话，一句劝告，一个鼓励的微笑都得不到就非走不可。

梅奈斯泰勒没有抬起眼睛，只清清楚楚地说一句：“再见。”

“再见，”雅克轻声说着，向门口走去。

他正要迈过门坎的时候，忽然一阵愤慨，猛地转过身来。飞行家的眼睛正盯在他身上，那眼睛里又燃起了往常的火光，眼神呆呆的，仿佛受了惊，但仍旧不可捉摸。

这时，梅奈斯泰勒赶快说：“明天再来看我吧。明天，将近中午，十一点……你要藏起来，听见了吗？不要露面，谁也不要见。让这儿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你又回来了。”他的声音也恢复了原来那种调子，那种坚决，和说话很快的习惯。突然，他十分温柔又十分不知所措地微笑了，所以脸色开朗起来：“明天见，小家伙。”

雅克刚在身后把门关上，梅奈斯泰勒就想：“对！有何不可？既然事已至此！……”

他并不是觉得这个奇特的计划会有什么实效，让敌对的军

队变成兄弟！以后也许办得到，要在经历几个月的痛苦和屠杀之后！……不过，一切能够瓦解军心，散布反叛种子的事都值得——干……

“我非常了解这个小家伙，他渴望着在英雄主义中有他的一份，以结束……”

他站起来，推上插销，又在屋里走了几步。

回到床上，他心里想：“是个机会……也许是自己送上来的好运道……一切都解决了！……”

七 九

雅克把头靠在木头隔板上。列车的嘈杂声传遍他全身，散布开来，使他极为兴奋。三等车车厢的这整个隔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窗户虽然都开着，还热得象火炉子一样。他汗流浹背，又坐到椅子上，靠着有阴影的那一边……他听见的不是火车的隆隆声，仿佛已经是推进器的轰响……飞机升上了天空……成千上万的白纸片在空中飘荡……

连拂过额头的风也是热的，只是窗帘在拍打，给人一些凉爽的幻觉。在他对面，他的旅行袋随着列车的颠簸在摆动。这是个黄帆布的旅行包，已经褪了色，装得鼓鼓囊囊，好象是香客的褡裢。这是他的老伙伴，直到最后一次旅行还忠实地跟着他……雅克匆匆地在里面装上些纸张，几件衣服，他没有选择，完全漠不关心。刚刚来得及赶上快车。他完全按梅奈斯泰勒的指示办理：在一个钟头之内离开日内瓦，没有留下地址，没有见任何人。从早上起，他就没有吃过东西，甚至在车站上买几支烟的功夫都没有。这没关系。他上了路。这一次可真是走了，独自走了，不

留姓名，永不复返。要不是炎热，惹他发火的苍蝇，象铁锤一样直敲他脑子的噪音，他会觉得很安详，安详而有力。最近几天的焦急和失望都已成为过去。

他闭上眼睛，刹那间，又马上睁开了。他无需静思默想，就可以生活在他的梦境中……

他掠过山峦，向着蓝色的山谷低飞，飞过草原、森林和城市。他在机舱里，坐在梅奈斯泰勒的后面，脚下堆着传单。梅奈斯泰勒打个招呼：飞机已经接近地面，有一大群人，穿着蓝色大衣，红色军裤，草绿色^①的上衣……雅克弯下腰去，抱起一大堆传单，扔了出去。马达在轰鸣，飞机在阳光中翱翔。雅克弯下腰，又直起来，不停地把一批批白蝴蝶似的传单撒下去。梅奈斯泰勒回头看着他，笑了！

梅奈斯泰勒……梅奈斯泰勒，雅克关于执行任务的想象就是围绕着这个坚实的中心在转动的。

雅克刚刚离开他。今天早上，梅奈斯泰勒跟昨天完全不同了，他又成了往日的首领！胸脯挺得笔直，动作又准确又迅速。他穿好了衣服，穿好了鞋，刚出去过，一见到雅克，马上显出胜利的微笑！“好哇！我们可真走运。一切比我想的顺利。我们三天以后就可以起飞。”我们？雅克还迟疑着不敢相信，结结巴巴地说了些含义不清的话：“……有一些人的生命非常宝贵……是一个集体的灵魂……拿这样的生命冒险就是犯罪……”但是，飞行家看他一眼，打断了他的话，随着这严厉的目光，还耸了耸肩膀，显得可以为人理解了，仿佛是说：“我对于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用了……”他随即又挺了挺身，赶紧吩咐：“不要闲扯了，小家

① 原文为德文 feldgrau。

伙……你得马上到巴塞尔去，理由有很多。我们的飞机从边境起飞，马上就会到达阿尔萨斯上空……咱们两个都有任务：我去准备那只鸟儿，你准备传单。首先写宣言。很困难哪！不过，你大概早已考虑过了。然后，印出来，印刷的事，你去找布拉特纳。你不认识他？他的情况是这样：他在格莱芬加塞区开书店，有一个印刷所，有一些可靠的人。那里的人，法语和德语都很好，他们会把你的宣言翻译成德文。印一百万份，用两种文字，加几个夜班就行……为了防备意外，星期六就得把一切都准备好。三整天，不是不可能的……不要给我，也不要给任何别人写信，我们的邮件受到监视了。如果出了什么事，我叫我了解的人去通知你，地址在这个信封里，里面还有其他一些明确的指示。还有几张地图……不，不要动，你在路上再看吧……那么，我们在边境附近会面，地点我以后选择，日期和钟点我以后确定……同意吗？”只在这个时候，他的表情才温和下来，嗓音也微微低了些：“好吧，你乘十二点三十分的火车到巴塞尔。”他走上前来，两只手放在雅克肩上：“我谢谢你……你帮了我的大忙……”他的眼睛模糊了。刹那间，雅克以为梅奈斯泰勒要拥抱他。不料，飞行家突然缩回了他的手：“我本来必定会愚蠢地了此一生。而这样，至少，还能有点用。”他一瘸一拐地把雅克推向门口：“你要误车了。回头见！”

雅克站起身来，走到窗子跟前，想呼吸点新鲜空气。他向外眺望。在八月的阳光下，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那熟悉的景致最后一次在他眼前闪烁着光辉，他却视而不见。

珍妮……就在前天，他乘坐另一辆从巴黎开来的火车，坐在座椅上，一想起珍妮，他就痛苦难忍，几乎不能呼吸了。多么想再一次两手捧住她那小脸，看着她那蓝色的眼睛，把手指插到她

的头发里，仔细看着她那眼光在激烈地变化，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再一次，只要一次，感觉到她那年轻的身体紧偎在他身上，那么柔软，那么温热！……他一下子站了起来，走到过廊，两手紧紧抓住窗上的铁条，闭上眼睛。他站在那里，浑身紧张，心在跳动，脸迎着刺人的风、烟气和煤屑……现在，他可以想着她而不那么痛苦了。她留在他的记忆中，象一个被热恋过的、死去的女友。不可挽回的事本身就有一种使人平静的力量。现在，距离目标这样近了，他昨日的的生活，巴黎，最近几个星期的动荡，一切的一切，也就突然成为遥远遥远的事！他想起了他的爱情，就象回忆起童年时代，就象是再也不能复生的，已经消逝的过去。他的全部未来，只是一个一闪即逝的明天……

他把刚才下意识撩起的窗帘放下来，两手插在衣袋里，又马上抽出来，却已经汗津津了。炎热使他烦躁，还有这些尘土、噪音和苍蝇！他又坐下去，扯下假领，蜷缩在座椅的角落里，一只手搭在窗外，集中精力思考起来。

第一件重要的事是写出那篇宣言。整个事情的成败全系于此。必须象闪电一般，划破黑暗，直接射进那些准备相互残杀的人们心灵中去，使他们顿时领悟最明显的事实，让他们一齐挺身而出。

一些不连贯的词，已经在脑子里拥挤碰撞，甚至一些句子也酝酿成熟，带着群众大会上的演说那样响亮的回声。

“敌对的双方军队……为什么敌对呢？法国人，德国人……偶然出生在某国……都一样是人！绝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是劳动者！劳动者！为什么是敌人呢？国籍不同？但是，利益一致！一切因素都在把他们联结起来，使他们成为天然的盟友……”

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和一段铅笔：“我把想到的都记下来，以备万一！”

“法国人，德国人，大家都是兄弟！你们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受害者！你们受了强加给你们谎言的欺骗！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心甘情愿离开妻子儿女，离开家园、工厂、田地、商店，来给另外一些同你们一样的劳动者当射杀的靶子！你们同样恐惧死亡，同样厌恶杀人，你们同样相信一切生存之物都是神圣的，同样认识到打仗是荒谬绝伦的，同样希望摆脱这场恶梦，尽早与妻子儿女团聚，重新去劳动，再去安享自由和平！然而，你们现在却互相对抗，荷枪实弹，愚蠢地准备着一有命令就互相杀戮，而你们彼此之间并不认识，没有任何仇恨的原因，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别人要逼着你们杀人！”

列车减慢了速度，停了下来。

“洛桑！”

无数的回忆纷至沓来……卡麦尔辛公寓里，他那黄松木的房间……索菲亚……

他克制住没有下车，免得被人认出来。他把窗帘拉开一点。车站，月台，售报亭……一个冬天的晚上，他跟安托万回巴黎奔丧，就是在那边三号站台上走来走去的……他觉得跟哥哥的那次旅行仿佛是十年前的事了！

人们在过道里走来走去，提着箱子，拖着孩子。两个乘警过来，巡视列车。一对老夫妇走进隔间，坐了下来。男的是个老工人，有一双干活磨粗了的手，为这次出门，他特意穿上最漂亮的

衣服。他脱下上衣，解下领带，擦擦额头上的汗，点上一支雪茄。女人拿过上衣，仔细叠好，放在膝盖上。

雅克缩在角落里，又拿起记事本，激动地写道：

“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大家都着了魔，发起疯来。整个欧洲！报刊，造谣！各国人民都受同样谎言的蛊惑。昨天还是可憎可恶、不可想象的事，到了今天竟成为不可避免，十分必要，合情合理的了！……到处，同样的那些群众，却被别人有意蛊惑得发了疯，狂热到了白热化的地步，准备打成一团，却不知道为了什么！杀人和被杀竟然成了英雄主义的同义词，最高尚的同义词！……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为了谁？该谁负责，他们在哪里？”

该谁负责……他从钱夹里拿出一张折好的纸。这是范希德从有关威廉二世的一部书里给他摘录的一句话，是德皇在讲演里说的：

“我认为，民族之间的冲突，大部分是某些部长的阴谋和野心引起的，他们玩弄这种罪恶的伎俩，来达到保住权力、增加声望这唯一的目的。”

他想：“应该找到德文的原文，好对他们说：‘你们看，你们的德皇自己就……’找到原文。哪儿去找？怎么找呢？……范希德？不能写信，梅奈斯泰勒不许写信……找到原文！……到巴塞尔的图书馆？可是，书名是什么？哪有时间去找……不行……可是，得找原文！”血涌到头上，使他头昏脑胀。“该谁负责……该

谁负责……”他挪动一下，改变一点姿势。这些人真讨厌。那老太太不住地盯着他，露出惊奇的神色。她坐在雅克对面，座椅对她来说太高。她穿着黑色的高帮皮鞋，白袜子。随着车子的颠簸，小小的腿也在摇晃……“该谁负责……找原文……”如果这老妇人还看他的话，他就……她从提包里掏出一片面包、几个李子，慢慢嚼着，把核吐在手心里，手上有个结婚戒指在闪光。她额头上有只苍蝇，她好象一点也不觉得，那苍蝇象在死人身上似的爬来爬去……真受不了！

他站起来。

怎么找原文呢？……到巴塞尔找？不行，不行，白费劲……太晚了……他知道，他找不到的！

想凉快一下，他又走到过廊里，两手抓住窗子。这时，阿尔卑斯山脉的峰顶，阴云密布。“就要有暴风雨了，所以才这样闷热……”

从高处望下去，湖水象是一片凝聚的水银，泛出静止的光。洒过硫酸铜的葡萄园，一直伸展到湖岸，反射着有毒的蓝色。

“该谁负责……要找出纵火犯，首先得看一看火灾对谁有好处……”他擦擦脸上的汗，又拿起铅笔，靠着窗框站着，竭力不理睬周围的一切：无论是那老太婆，暴风雨前的闷热，苍蝇，噪声，颠簸，窗外的景色，以及整个敌意的世界。他奋笔疾书：

“一种神秘的力量，就是国家，它驾御着你们，就好象农夫役使着牛马！……国家，国家是什么？法兰西，德意志，难道是人民的有权威的真正代表吗？难道能保卫大多数人的利益吗？不能！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国家只是少数人的代表，是金钱使之无所不能的投机家联合组织的代办机

构。他们在今天，就是那些银行家、大公司老板、运输公司老板、报界巨头和军火商——一切的主宰！这个以绝大多数人的血汗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等级社会制度的绝对主宰！最近几个星期，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制度开始活动，我们见到了它那错综复杂的齿轮，把和平运动的抵抗一一碾碎。今天，就是这个制度使你们装上刺刀，把你们抛到前线，去保卫那些对于你们中的差不多每个人几乎完全无关、甚至有害的利益！……即将互相残杀的人们有权想一想他们的牺牲对谁有利！在他们送命之前，有权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为谁送掉性命的！……

“因此，对战争首先应负责的人，就是一小撮民众的剥削者、金融巨头、工业大亨，他们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掀起你死我活的竞争，他们今天毫无顾惜，悍然杀戮成批的人，去巩固他们的特权，进一步增加他们的荣华富贵！这种荣华富贵绝对不会使劳动者富有，绝对不会改善群众的命运，而只能便于更加残酷地奴役你们中间能逃脱屠杀的人！……

“但是，这些剥削者还不是唯一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他们在每个国家都有政府官员保证给予支持，作为他们的助手……在该负责任的人中间，处于第二位的，就是一小撮自大狂的政治家，德皇本人就曾揭露过他们……”

“要找到原文，”他想。“要找到原文……”

“……这一小撮江湖骗子、部长、大使、野心勃勃的将军，以外交活动和参谋本部作为掩护，玩阴谋，耍政治花招，冷酷地拿你们的生命作赌注，不问一问你们的意见，甚至不

告诉你们一声。你们，法国人民，德国人民，只是他们阴谋中的赌注……就是这样，在这个二十世纪民主化的欧洲，没有一国人民能够自己掌握外交政策的方向，在你们选出的应该代表你们的议会中间，没有一个了解政府承担的秘密义务，而这些义务却会在旦夕之间逼迫你们全体去进行杀戮！

“在上述主要的负责人后面，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还有那些不同程度地故意为战争开路的人，不是为了助长大银行的投机，就是用他们的热烈赞助去鼓励政客的野心。这就是那些保守政党，业主团体，民族主义报刊！还有教会，实际上，各地的教士都成了一种精神警察，为有产阶级服务；教会几乎已经背叛了他们的神圣职责，到处都已成为金钱势力的盟军和人质！”

他停下笔来，想再看一遍，但是看不下去。他的手指紧紧抓住铅笔，十分激动，站得很不舒服，列车又直晃，他的字迹几乎认不清了。

他心里想：“得好好删节一下，写得不好……重复太多……太长……要说服人，应该简洁、紧凑……但是，为了让他们能好好考虑、改变看法，需要提出基本的论据！……难啊！”

他站不住了，坐下吧，一个人……他穿过走廊，想找一个没有人的隔间，但是都有人，又吵闹得很。他不得不回到原来的座位去。

西下的夕阳使车厢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金红色光辉。那个老头在打呼噜。太热，他昏睡过去，头倚着肘弯，嘴上叼的雪茄早已熄灭。那老太婆一直把男人的那件上衣放在并拢的双膝

上，用报纸当扇子扇着，扇得花白的鬓发飘起来。她避开雅克的眼光，可是雅克随时发现她那躲躲闪闪的、迟钝而又严肃的目光在盯着他。

这时，他盘起手臂，闭上眼睛，数到一百，让自己安静下来，突然觉得疲乏不堪，他睡着了。

他一下子惊醒过来，竟然睡了过去，他惊奇地呆住了。几点？列车放慢了速度。到什么地方了？他的旅伴们站起来，那个男人又穿上外衣，点上了烟头。那女人锁上她的提包……雅克的脑子麻木了，想看看是什么站。已经到伯尔尼了吗？

“上帝保佑你^①，”那个男人从他面前走过时，说了一句。

站台上有许多人，冲锋似的挤到车上来。这个隔间里进来了爱说话的一家人，说的是德语，有母亲，祖母，两个小女孩和一个女仆。在一堆装着食品和儿童玩具的篮子底下折着几张渔网。女人们脸上又疲倦又惊异。小女孩热得难受，争着要占那空着的角落。他们大概正在度假，忽然遇到战争，赶紧回国去。那作父亲的大概在头几天就要入伍。

列车又开动了。

雅克逃到走廊。这里也挤满了旅客，都站着，大多数是男人。

在左边，有三个年轻的瑞士人，高声地用法语交谈：

“维维亚尼继续当总理，但是不兼任部长……”“那个继任外交部长的杜梅尔格^②是什么人？”

① 原文为德文 Grützi。

② 杜梅尔格(1863—1937)，1914年先任法国总理，后任外交部长。

右边有两个旅客，一个是年轻的大学生，书包夹在胳膊底下；另一个上了年纪，戴着夹鼻眼镜，也许是个教授，两人都在看报纸。

那大学生把《日内瓦报》递给他的旅伴，嘲笑地说：“您看到了吗？教皇真是开玩笑！他刚发表了一个《告全世界天主教徒书》！”

另外那个人回答：“是吗？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地球上还存在着千百万天主教徒。教皇想把人开除出教？只不过，要想正式有效，要想发生影响，就得赶在战争爆发之前宣布！……”

“您读一下吧，”大学生回答。“您也许以为他要庄严地谴责战争吗？您以为他要谴责各国政权，不加区别地把一切交战国国家大吵大嚷地开除出教？放心吧！那样的话，教廷的慎重何在？他不会，不会……对于千百万明天就要武装起来进行厮杀，显然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命令，让良心得到平安的天主教徒，他要说的，决不是：‘你们不要去杀人！要拒绝！’——这本来也许还会阻止战争爆发哩……不！他只会和蔼可亲地说：‘去吧！我的孩子们！……去吧，但是不要忘记把你们的灵魂交付给基督！’”

雅克漫不经心地听着。他忽然想起在某个地方见过一个应征入伍的教士。在哪儿呢？是在北站，送安托万的时候……一个有运动员体格的年轻教士，眼睛很亮（就是“庇护教士”、“青年的导师”那类的人），在撩起的教士袍上，斜背着两个布口袋，底下穿着崭新的登山鞋，一个中士的橄榄帽很俏皮地扣在耳朵上……北站，安托万……安托万，但以理，珍妮……所有那些他无心之中回想起来的人，还有现在围绕着他的男男女女，组成了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却不在其内了。这个有前途的、活人的世界，在没有他的时候，将仍然继续它的行程……

在左边，三个年轻的瑞士人怒冲冲地议论着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

雅克向他们走下一步，竖起了耳朵。

“早就公布了，德国一个军团昨天晚上越过比利时边境，向列日推进。”

一个还年轻的人从隔壁车座里出来，加入到这群人里。这是个比利时人，要赶回那慕尔去参军的。他马上说明：

“我是个社会党员，但是，正因为如此，我决不能同意强权摧毁公理！”

他说得从容，提高了声音，痛斥条顿人^①的野蛮行径，赞美西方文明。

另外几个旅客也走拢来，大家都对德国政府的厚颜无耻表示愤慨。

“比利时议院今天早晨开会，”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说，他的法语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你们觉得社会党人会投票赞成国防拨款案吗？”

“他们会一致赞成的，先生！”那个比利时人喊着，用火辣辣的充满挑战的眼光狠狠盯着对手。

雅克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知道那个比利时人说的对。但是，他愤怒地想起了比利时社会党人在布鲁塞尔的态度，他们宣称维护和平的主张不变……王德威尔德……就在上星期四，还不到六天的时间！……

“巴黎也一样，”一个瑞士人说，“今天议会举行会议，通过军费案。”

^① 古日耳曼民族称条顿人，这里即指德国人。

“巴黎也会一样的！”那个比利时人怒冲冲地说。“在所有的协约国里，社会党人都会投票赞成军费案，这毫无疑问！公道在我们这一边！……这场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在反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斗争中，所有真正的社会党人都应该站在第一线！”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打量那个带日耳曼口音的人，而那人却一声不响。

援救受威胁的祖国！打倒德国帝国主义！这是大家的口头禅。雅克昨天读到的最近几天法国左派报纸上，也都有同样的口号：各地的社会主义者放弃反对立场。昨天，各处还有零星消息说，在郊区，召开了些支部会议，只是为了“商量如何帮助军属问题”！战争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一个毫无抵制就接受下来的事实。《社会战线报》特别能说明问题。在头版，居斯塔夫·埃尔韦竟然恬不知耻地写道：“饶勒斯，您有幸没有亲眼见到我们那美梦的幻灭……但我为您遗憾，因为你去世太早，没有见到我们这个精神奋发、热情高涨而又充满理想的民族是怎样甘心去完成痛苦的义务！如果你在世，你会为我们的社会党的工人而自豪！”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铁路工会发表的《告铁路员工书》。这个工会不久以前还激烈宣称它反对民族主义，现在却说：“在这共同危险面前，捐弃旧怨吧！社会党人，工会干部和革命者，你们要挫败威廉的卑劣打算。当共和国发出号召的时候，你们应当首先站出来响应！”雅克想：“多么大的讽刺呀！各个政党之间的协调一致，以前似乎不可能，而现在，每个国家里居然都实现了，恰恰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当初如果各政党协调一致来反对战争呢？……多么大的讽刺呀！参加‘国际’的各国战士今天在各地都统一了步调，一致从民族立场出发，接受武装冲突！但是，在半个月之前，只要一致决定举行

预防性罢工就足以制止战争！”只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反应，是在雅克买的一份英国《每日新闻》报上登的一篇文章，文章的调子有点象宣言，是在德国致比利时最后通牒以前写的。文章揭发英国的舆论开始掀起好战倾向，文章坚决主张英国必须制止这股思潮的蔓延，保持英国作为仲裁的自由和中立地位，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一部分敌军有可能进犯比利时边境时，也不要介入冲突。对……但是今天，英国官方已经宣布它也慷慨地加入了这场死神的舞蹈！

那个比利时社会党员的颤音又在走廊里响起来：

“饶勒斯若在，他会第一个作出榜样的！先生，对不对？饶勒斯会跑去参军的。”

雅克想：“饶勒斯……他能阻止背叛吗？能坚持到底吗？”他仿佛猛地又看到他和珍妮在蒙马特尔街的咖啡馆门前……黑夜里聚集着一群静默的人……救护车……他又想：“他们今天给他下葬，放上鲜花，发表演说，举着三色旗，奏起军乐！他们霸占了这伟大的遗体，以祖国的名义到处张扬……如果饶勒斯的棺材真的穿过发布了动员令的巴黎却没有引起骚乱，那就是一切都完了。‘工人国际’也死了，并且跟他一起被埋葬了……”

是的，目前，一切都完了，在那边，在那些吸引人的城市里，在后方，对，所有的发条都断了；但是在火线上，他敢肯定，那些真正接触战争的不幸的人，只等一声号令，就会打破这恶毒的蛊惑……一粒火星就会引起解放的暴动！

脑子里又形成了一些不连贯的句子：

“你们是活生生的年轻人……他们却打发你们去送死……用强力攫去你们的生命！为了干什么呢？为了变成新

的资本，放在大银行家的保险柜里！……”

他在口袋里摸着笔记本。但是，在这人来人往、喧闹不堪的环境里怎么写笔记呢？况且，不到二十分钟，就到巴塞尔了。他得去找布拉特纳，找个住处，一个栖身之地，好工作……

忽然，他打定了主意。他睡过了觉，这很好，现在觉得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布拉特纳可能等着他。让满怀的激情低落下去那就太蠢了。不能满城乱跑，要在候车室里找个角落躲起来，趁着那些文句在脑海中汹涌澎湃的当儿，把它们趁热写在纸上……到候车室，或者到车站小吃店，因为他饿极了。

八〇

意想不到的幽静地方。“大众饭店”非常宽敞，顾客虽然多，也只占了大厅中间，顶里面的桌子完全没有人。

在那些空着的大桌子，雅克选了靠墙的一张。

他脱下外衣，解开领子，吃了一顿很有滋味的夹着肥膘的烩小牛肉，还配着胡萝卜。他又喝了一瓶子冰水。

天花板上，电扇呼呼地响。女侍在他面前的一杯冒着香气的咖啡旁边，放上了文具。

一个小厮在柜台前面走动，手里拿着托盘：雪茄！香烟！啊，对！来支烟！……十二个钟头没有吸烟了，吸上第一口真是惬意。一阵醉人的舒适和增长的活力在他血管里奔流，手都抖动起来了。他俯在桌子上，额头皱起，眼睛在烟雾里眨动着，不再等待，不再试图整理纷至沓来的思绪，以后，等头脑冷静了，再作删节吧……

他怀着急不可待的心情，已经用笔在纸上写起来：

“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都受骗了！”

“在两个营垒之内，人们都对你们说，这场战争不仅是防御性的战争，还是争取人民的权利、公理和自由的斗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很清楚，没有一个德国的工人、农民，没有一个法国的工人、农民愿意为了进攻性的战争，为了掠夺领土和市场去流血。

“人们要你们大家相信，你们是为了粉碎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而去战斗的，似乎各国的军国主义并不都是一丘之貉！似乎近几年来好战的民族主义在法国和德国并没有同样多的党徒！似乎近几年来，你们两国政府内的帝国主义分子并没有酝酿同样的战争冒险！……你们上当了！他们让你们大家相信，你们是去保卫自己的祖国，抵御侵略者的罪恶的侵犯，然而，你们每一个参谋部，无论是法国的或德国的，多年来都在恬不知耻地研究如何首先发动速决的进攻战！而在你们双方的军队当中，那些首脑，力图保证从这种‘侵略’当中获得利益，今天，他们装出揭露对手的样子，为了使你们看来，他们所准备的战争是正确合理的！”

“你们都上当了！你们中间最优秀的人物都真心实意地相信你们是在为各国人民的权利而牺牲。其实，无论是人民，还是权利，除了在官方的演说中以外，从来没有被考虑过！每一个被拖入战争的民族都没有用全民表决的方式表达过自己的意见！你们全被多年以来制定的专断横暴的秘密联盟愚弄了，你们被派去送死，对阴谋的内容却毫无所知，你们中间任何人也不会同意！……你们都上当了！你

们法国人上当了！你们以为必须挡住日耳曼人入侵，保卫文明，免受野蛮人的威胁。你们，德国人上当了，你们以为你们的德国受到包围，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在外国的覬覦面前拯救你们民族的繁荣。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都在各自一方同样上当了，你们真心实意地以为，仅仅对于你们一方来说，这次战争是一场圣战，必须发扬爱国精神，不计代价地为国争光，为了使公理战胜，牺牲你们的幸福、自由、甚至生命！……你们上当了！你们受到无耻宣传的蛊惑，这些宣传终于在几天之内使你们发了狂，成了牺牲品。你们的祖国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可是，在这祖国的号令之下，你们英勇地出征，去彼此扑杀！你们不知道，你们两方面都是统治阶级的玩物！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他们阴谋的赌注，你们是他们为了满足统治和贪利的欲望而肆意挥霍的小钱！

“因为，法国和德国的现政权正是用同样的谎言在阴险地欺骗你们。欧洲各国政府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厚颜无耻，施展出这样狡狴的伎俩，多方诽谤，歪曲事实，散布谎言，千方百计传播他们所需要的恐慌和仇恨，使你们成为他们的同谋！……几天之内，甚至还来不及估量一下他们要你们作出的牺牲有多么大，你们就被拉进军营，配齐装备，被打发去杀人或送死了。一切自由权利一下子都被取消。在双方阵营中，同一天，都宣布了戒严令！双方都实行无情的军事独裁！谁来说理，要求解释清楚，改变观点，就该谁倒霉！何况，你们中间有谁能这样做呢？你们全然不了解真实情况，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官方新闻，而那只是全国规模的谎言！在封闭的国境线之内，这个有无限权力的新闻机构

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指挥你们的那些人的声音，对于这些人，你们的无知轻信，你们的驯服，是实现他们的罪恶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你们的错误在于未能在尚有可为的时候防止火灾！你们本来能够阻止战争，爱好和平的人民占压倒的多数，你们却未能把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用一贯的、决定性的方法进行干预，进而引起一切阶层的行动、全国人民的行动，来反对纵火犯，强使欧洲各国政府接受你们的和平意志。

“现在，到处都有无情的纪律钳制个人的良心。你们不得不象蒙住了眼睛的牛马一样消极服从……人类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这样盲目地失掉理智！政权的力量也从来没有象这样强迫人民完全放弃思想的权利，这样野蛮地堵塞了群众表达愿望的途径！”

烟头已经烧嘴了，雅克在碟子上把烟掐灭，愤愤地掠一下头发，擦擦流在脸颊上的汗“……这样野蛮地堵塞了群众表达愿望的途径！”这字句的声音还在他耳边回荡，就象他自己对在幻觉中出现在他面前的两军大声呼喊一样。这时，他感到心情激动，热血沸腾，难以自制。正象前不久，由于信念、愤怒或爱情的冲动，他需要说服别人，引导别人，因而，他跳上群众大会的讲坛。在灵感的陶醉之中，他觉得自己升腾起来，高出群众之上，也超脱了自我。

他从口袋里掏出香烟，但没有点着，又飞快地写起来：

“现在，你们尝到他们战争的滋味了！……你们听到了子弹在呼啸，受伤和垂死的人在呻吟！现在，你们可以预感

到他们为你们准备的尸体堆的恐怖了！……你们中间大多数人已经清醒过来，在良心的深处，为这样驯服地上当而感到羞愧！回忆起你们那样匆忙地抛弃的亲人。你们心神不安。在现实的压力下，你们的觉悟开始苏醒了，眼睛终于睁大了。一旦你们明白过来，是由于不可告人的原因，为了掠夺和称霸的欲望，为了与你们毫不相干、你们任何人也得不到好处的物质利益，那金钱垄断势力，这次战争的真正主人才强迫你们作出这样巨大牺牲的，那将会出现什么事！

“你们的自由被摧残到何等地步？你们的良心，人的尊严，家庭的幸福被摧残到何等地步？他们是怎样摧残一个老百姓要保卫的唯一财富：生命的？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难道有权把你们从家里拉出来，强令你们离开工作，违反你们最明显的个人利益，违反你们的意志、信念，违反你们最合乎人情、最纯洁、最合理的本能而随意处置你们的生命？是谁给了他们掌握你们生死的可怕权力？是你们的无知！是你们的消极！

“只要稍稍考虑一下，只要奋起反抗，你们还能摆脱你们的厄运！

“你们难道没有这个能力吗？你们难道要在炮弹之下，在精神和肉体的极度痛苦之中等待着那遥远的和平，你们这些战争的第一批牺牲者永远见不着的和平吗？你们的兄弟接替你们，成批被送上火线，也象你们一样，在所谓光荣的献祭中牺牲生命，他们也象你们一样，看不到这个和平。

“不要说为时已晚，不要说你们只能甘心忍受奴役和死亡，这是怯懦的行为！

“而且是错误的行为！

“正相反，摆脱桎梏的时刻已经到来。自由，安全，生的乐趣，你们享有过的幸福，全靠你们自己去争取！

“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镇定下来吧！

“你们有一个办法、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使两国的参谋部一天也不能继续这兄弟相残的屠杀，这就是拒绝战争，集体暴动，突然推翻他们的权威。

“你们做得到！

“明天你们就能做到！

“你们做得到，而且没有一点遭到报复的危险！

“但是有三个条件，三个必备的条件：第一，暴动必须突然进行；第二，必须在全线举行；第三，必须各地同时举行。

“必须突然，因为不能让你们的长官有时间采取预防措施；必须在全线同时进行，因为暴动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战线两方面同时采取群众性行动。假如只有五十个人拒绝牺牲，一定会被无情枪决；假如你们有五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假如在两个阵营当中，同时举行大规模暴动，假如你们反抗的呼声在双方军队中，从一个团扩展到一个团，假如你们使数量庞大而坚不可摧的人群起来反抗，那么任何镇压都是不可能的！指挥你们的首脑，任命这些首脑的政府，在几个钟头之内就会在他们的罪恶权力的中心永远瘫痪！

“你们想一想这个决定的时刻有多么庄严！为了一下子恢复独立，只需三个条件，而这三个条件全都靠你们自己，要突然举行暴动，并且在全线，同时举行！”

他的面孔抽紧，呼吸急促有声。他停了一会儿。他抬起茫然的眼睛看着玻璃窗。真实的世界消失了，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什么也没有听见。在他眼前，只有无数的受苦人，他们把痛苦的脸向他转过来。

“法国人和德国人，你们都是人，你们都是兄弟！以你们母亲的名义，以你们妻子儿女的名义，以你们心中最高贵的感情的名义，以亘古以来试图使人成为公正而有理性的生物的圣灵的名义，你们要抓紧这最后的机会！你们的得救就在眼前！起来！一起起来！趁着时间还不太晚！”

“这个号召书，今天在整个战线上，在法德两边同时散发千万份。在这一特定时刻，在双方阵营中，有千万颗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心激起了和你一样的希望，千万个拳头举起来，千万个人的良心选择了反抗，为了打倒死亡和谎言，使生命获得胜利！”

“拿出勇气来！不要再犹豫，片刻迟疑都会葬送你们！你们必须明天就发起暴动！”

“明天，日出之时，法国人和德国人联合一致，在同一个时刻，以同样的英雄气概，以亲如手足之爱，枪口朝下，扔掉武器，一起发出解放的呼声！”

“大家起来，反对战争！强迫各国政府立即恢复和平！”

“在明天曙光初照之际，大家一起起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笔放在墨水瓶上。

他上身慢慢抬起，稍稍离开了桌子。他垂着眼睛，动作轻柔无声，仿佛怕惊动了鸟儿。脸上的紧张都消失了。他仿佛在等待着什么：等待着略有几分痛苦的内心活动过去，心灵平静下来，太阳穴不再强烈地跳动，让这缓缓回到现实的过程不至于太

痛苦……

他下意识地将纸张收拢在一起。纸上全部写满了，激动中写出的字迹很潦草，没有涂抹修改。他把这些纸折起来，抚摸一下，突然紧紧贴在胸前。他把头低下，过了一会儿，象祈祷似的，闭着嘴唇低语道：“……让世界恢复和平……”

八 一

布拉特纳把雅克安置在一个老太太家里。她是一位名叫斯坦夫的社会党活动分子的母亲，斯坦夫刚被党派出去执行任务。大家认为雅克住到巴塞尔来是为了到书店工作的，布拉特纳给他弄了一份符合手续的合同。如果宣战以来特别活跃的警察局对雅克的出现表示不安，他就可以拿出职业和住址作为证明。

斯坦夫老太太的房子座落在小巴塞尔，就在埃尔朗斯路那个贫困的地区，离布拉特纳开店的格莱芬街不远。这是一座风雨飘摇的破房子，早就该拆掉的。雅克租的那间房象个狭窄的走廊，一头一个矮窗户。其中一个窗没有安玻璃，对着院子，从那里，冒上来免窝的臭味和果皮菜屑的酸气。另一个窗子朝街开，隔着马路，朝向巴登车站黑黝黝的码头仓库，也就是说朝着或者是几乎是朝着德国领土。天花板离头顶很近，用手都能够着，就在天花板上，排列着屋顶的瓦，被太阳晒得滚烫，白天晚上都热得象炉壁。

雅克就把自己关在这个烘箱里写他的宣言。每天早晨老斯坦夫太太把咖啡和抹着鹅油的面包片放在门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食物。有时候，正午前后，热得实在受不了，他直想逃出去。但刚刚跑到外面，他就又想念他的小破屋了，急忙赶回来。他又

躺到床上，汗流浹背，闭着眼睛，焦急地重新结起他那梦的线索……飞机，飞上了天空……坐在梅奈斯泰勒后面，他弯下腰去，抓起一把传单，撒在空中……推进器的轰鸣与他血液的跳动声混在一起。他自己变成了那只长着巨大翅膀的鸟。那些传单就是从他的心里掏出来向世界散布的……“在明天曙光初照之际，大家一起起来！”宣言的不同部分都已安排妥帖，句子逐渐轮廓分明。他都记得烂熟。躺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他毫不停顿地独自背诵。有时候，他一下子跳起来，跑到桌旁，修改一个段落，更换一个词。然后他又倒到床上。他几乎看不见周围那些拙劣的装饰，只生活在自己的幻象之中……他仿佛看到起义逐渐蔓延……指挥所里，军官们都在商议，文书们乱成一团，跟总司令部的联系被切断了。任何镇压都不可能。如果要保全面子，各国政府只有一条出路：立即签署停战协定……

纠缠在他脑子里的种种想法使他憔悴，也给他支持——正象咖啡一样。思想和咖啡两样他都缺不了。有什么急事，比如说去书店一小会儿，或者在楼梯口遇见了斯坦夫太太，使他暂时离开了梦境，他就感觉到真正的不舒服，赶紧回到孤独之中，就好像吸毒的人离不了毒品一样。这样，他立刻就平静了，不仅是平静，而且是一种幸福的、生气勃勃的狂热……有时候，手抖得厉害，不得不停笔，或者在钉在墙上的一面破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两颊深陷，眼睛象着了魔，他平生第一次想到自己是病了。这样一想，他倒微笑起来。现在，病不病又有什么关系呢？……夜里热得他没有办法合眼，每十分钟就得起来一次，在水罐里浸湿毛巾，擦擦发烫的身体，去到天窗前站一会儿。窗子外面是个地狱，喧哗的货栈上，一大群铁路工人在弧光灯底下忙来忙去，远处，在车库的黑影里，卡车在颠

簸着行驶，翻斗车互相碰撞，灯光向四面八方射去。更远处，在发亮的铁路上，有过不完的列车在开动，鸣笛，然后一列接一列地消失到战争中的德国的黑夜中去。这时，他微笑了。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只他一个人知道，这一切忙乱毫无用处……解脱的时刻临近了……传单已经写好了。卡贝尔要把它译成德文，布拉特纳要印出一百二十万份……在苏黎士，梅奈斯泰勒正在准备飞机……只要再过几天！“在明天曙光初照之际，大家一起来！”

经过四十八小时的紧张工作，他终于决定把手稿拿去排印。梅奈斯泰勒说过：“星期六要准备好。”

布拉特纳在书店的后房，在仿漆皮布的双层门后面，站在一捆捆的纸中间。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虽然现在已经是早上。这人有四十来岁，个子很矮，模样丑陋，身体不好，害着胃病，有口臭，长着个鸡胸，秃脑袋，精瘦的脖子，高高的鹰钩鼻子，使人想起坐山雕。他那大得不相称的鼻子好象把身子往前拉，拉得重心挪动了位置，使他总象失去了平衡似的，让跟他说话的人都觉得不自在。一旦对这丑陋的外貌习惯了之后，就会发现他目光天真坦率，笑容很真挚，有点儿拖长的嗓音充满温柔，也容易激动，随时都颤动着，仿佛准备向人表示友谊。但是，雅克要个新朋友没有用了，他现在谁也不需要。

布拉特纳非常沮丧。他刚刚得到消息，证实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已在国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案。他用愤慨的声音说：

“法国社会党人在议会投票，就已经是个可怕的打击了，但不管怎样，饶勒斯被暗杀以后，人们就有点预料到了……可是，德国人！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是欧洲无产阶级一支强大的力量！……

这是我参加党以来受到最大的打击！……我本来不相信官方的报纸。我估计社会民主党人会一致谴责帝国主义政府，否则剁掉我的手好了。当我看到那则消息的时候，我笑了！一股谎话和阴谋诡计的臭味！我心里想：明天就会辟谣的！可是今天，只能相信确凿的事实了。那消息是确实的，可悲地确实！……幕后是怎么进行的，我还不清楚，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了……据拉耶说，贝特曼—霍尔维格^①二十九日召见了苏德库，要他同意社会民主党不再持反对立场……”

“二十九日？”雅克说。“可是，二十九日，在布鲁塞尔，哈斯还发表了演说呢！……我当时在那儿，我都听见了！”

“那很可能。拉耶说德国代表团回到柏林之后，中央委员会开了会，决定屈服，于是，德皇就知道，他可以颁布动员令，不会有起义，不会有总罢工了！……在国会投票以前，党大概开过秘密会议。事情当然不是孤立发生的！不过，我还是不能怀疑象李卜克内西、莱特堡、梅林、克拉拉·蔡特金^②和罗莎·卢森堡那样的人。不过，他们大概是少数，他们不得不向叛徒让步……事实俱在，他们投了赞成票！三十年的努力，三十年的斗争，好不容易慢慢取得的成就，统统毁于一次投票！一天之内，社会民主党永远失去了无产阶级世界的尊重……俄国的社会党人在国家杜马至少还反对沙皇统治呢！他们一致投票反对战争！在塞尔维亚也是这样，我读到过一份杜尚·波波维奇一封信的抄件：塞尔维亚社会党反对派永不动摇。而恰恰只是在塞尔维亚这一个国家，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也许还有点借口！……甚至在英国，抵

① 贝特曼—霍尔维格(1856—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德国总理。

② 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制仍很顽强。凯尔—哈尔迪没有放下武器。我读了最近一期《独立劳动党报》，言论还是令人鼓舞的，对吗？不应该绝望。我们要逐渐传播我们的呼声，我们每个人的嘴不可能被堵住……坚持下去，不畏一切！‘国际’还会复生！到了那一天，将向那些受到信任、却被帝国主义专制政权轻易降服了的人算账！”

雅克听着他讲，礼貌地表示赞同。见过了在巴黎发生的事情之后，任何背叛都不能使他惊异了。

他拿起几份零乱放在桌上的报纸，随意看了看大标题：“十万德军向列日挺进”……“英国动员舰队和陆军”……“尼古拉大公被任命为俄国三军大元帅”……“意大利正式宣布中立”……“法军在阿尔萨斯胜利进攻……”

阿尔萨斯……他推开报纸。在阿尔萨斯的进攻……“现在，你们尝到他们战争的滋味了！你们听到了子弹在呼啸……”只要把他从独自一人的兴奋状态中引开，他就受不了。他匆匆离开书店，走到外面。

布拉特纳刚刚拿起他的手稿，决定版面尺寸，他就赶紧逃走，不肯留下来。

在他漫步的时候，巴塞尔呈现在他眼前。巴塞尔，它那雄伟美丽的莱茵河，那些街头花园和公园；巴塞尔，既有浓荫又有阳光，又炎热，又清凉；巴塞尔，清凉的水池，他在水里把汗津津的手浸湿……八月的太阳燃着了天空，从柏油马路升起一股刺鼻的气味。他从小胡同向主教座堂顺坡走上去。明斯德尔广场空无一人，没有车，也没有行人……一九一二年巴塞尔工人国际代表大会！……教堂好象关门了。红石头的色调很象古陶器，好象是个陶土的古旧的圣骨盒，是个毫无用处的纪念性建筑物，

被抛弃在阳光底下。

在俯瞰莱茵河的教堂高台上，在栗树底下，后殿的阴影和河水使那里始终清爽宜人。只有雅克一个人。从下面，掩在树丛中的一个游泳学校里，不时传过来欢乐的喊声。他只有独自一个人，跟他作伴的只有野鸽子。他看了一会儿它们扇动翅膀。唉！在他到达巴塞尔以前，他这个孤僻的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自己确实是孤独了。他惬意地享受着这完全与世隔绝的庄严和力量。现在他再也不愿摆脱这个状态，一直到一切都消耗净尽……突然，他无端地想到：“我这样行动只是由于绝望。我这样行动只是为了自我逃脱……我不能打垮战争……我谁也救不了，除了我自己……但是我，我将在自我完成之中，得到自救！”他站起来，要驱走这种可怕的想法。他握紧了拳头：“保持理性，反对一切！在死亡中求得解脱……”

在淡红色的护墙上面，在两座桥梁之间弯曲的河道对岸，越过一座座钟楼和小巴塞尔区工厂的烟囱，那一片肥沃的、树木繁茂的、沐浴在热气之中的土地，那就是德国，今日的德国，发布了动员令的德国，战争的纷扰已经震撼到它的心脏。他想走过去，一直向西，走到国境线与莱茵河合在一起的地方，在那里，从瑞士的河岸上，他看到前面不过投一石块之遥，那边的河岸，那边的原野，就是德国的土地。

经过圣阿尔班区，他走到城郊。太阳在灼热的天空缓缓升起。一座座豪华的别墅，四周有修剪整齐的树篱，搭着凉棚，有秋千，还有一个个花坛，由旋转喷射的水浇灌着。几张白色的桌子上铺着花桌布。这一切都证明，在燃着战火的欧洲中部这一小小的未遭兵燹的地区，还没有什么来破坏它的安宁。然而，在比尔斯费尔登，他遇到了一营瑞士士兵，穿着演习的服装，唱着

歌从树林里走出来。

哈尔德森林在右边的山坡上。一条长长的小路，跟河水平行，穿过一大片幼树林。一块牌子上写着：“林管所”。左面，树木之间，可以望见一片绿色的原野，阳光灿烂，莱茵河弯弯曲曲地从中间流过；右边却相反，是浓密的森林，有一座峻峭的大山，上面林木蓊郁。雅克慢慢往前走，心里什么都没有想。隐居了这么几天，刚才在房子与房子中间的阳光里走了一段，他觉得树木的荫影使人平安恬静。岗峦起伏的高处，傍着树林，一座白色的建筑从树丛中显露出来。他想：“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林管所吧。”一条小路斜穿过去，伸展到河岸。水旁的树荫底下，空气更加凉爽。突然，他发现已经来到莱茵河畔了。

德国就在那边，只隔着一道流水，一道波光闪闪的流水。

德国的领土上，阒无人迹。对面河滩，连一个渔夫都没有。从河岸一直到那个红色房顶的小村庄之间，种着苹果树的田野上，也看不见有人耕作。在遮蔽着地平线的山峦脚下，在一个钟楼四周一簇簇地长着苹果树。但在河旁，雅克却发现了一个小棚屋的房顶，隐藏在斜坡的灌木丛后面，房子上画着三种颜色。是哨所？边防站？还是海关？……

他一直看着这满是神秘迹象的景致，手插在衣袋里，脚站在湿泥上，他从容不迫地看着德国和欧洲。他从来没有象此时此刻，独自一人站在这条历史性河流的岸旁这样安静，这样明智，这样清醒。他睁大了眼睛，看着世界，看着世界的命运。那一天终会到来，那一天终会到来！……那一天，各国人民的心将一齐跳动，人类的平等将在尊严和公正之中实现……在到达博爱的时代之前，人类也许必须经历这仇恨和暴力的阶段吧……但是他，他不再等待了。他已经到了他这一生中完全献身、不许迟疑

的一刻。他难道曾把自己奉献，完全奉献给一种思想、一个朋友、一个女人了吗？……没有！……甚至，也许并没有为革命理想完全献身，甚至没有为珍妮完全献身！每当献身的时候，他都给自己保留了很大一部分。他走过了一生，就象是个惴惴不安的业余革命者，吝啬地从自己身上挑选那舍弃的部分。只是到了现在，他才体验了将整个身心都完全销毁的献身……牺牲的感觉象火一样燃烧着他。结束了，不断为悲观失望所侵扰的日子，每天与自暴自弃的一闪之念顽强斗争的时代永远结束了。甘愿死亡并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命运在大放光明！

灌木丛中传来脚步声，他转过头来。这是一对打柴的夫妇，都穿着黑衣服。男的腰带上插着砍柴刀，女的每只手提着一只篮子。他们的脸是瑞士农民那种严肃的脸，带着深深皱纹的嘴，心事重重的眼神，都好象在诉说生活不是轻松的散步。两个人满怀疑虑地打量这个偶然撞见的陌生人，他正半掩在灌木丛后面，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对岸。

他不该冒险走到边境旁边来。也许在岸旁就有海关的巡逻队和边防军的岗哨……他赶紧从原路折回，从矮林之间穿过，回到大路上。

当天傍晚，雅克去赴卡贝尔的约会。

这位医学生对他说：“你在外面等我吧。现在正是复诊的时间，教授不在，我十分钟以后来找你。”

儿童医院在小巴塞尔区，沿河大街上。围着四层楼的主楼，有一个窄小的花园，周围是长春藤的树篱。房子的每层都有平台，就象疗养院一样。平台上一张张儿童病床晒着太阳。树荫下面放着几张白凳子，雅克坐了下来。很安静，没有一点声

音……只有鸟儿的叫声打破静寂，还有在远处，透过树枝雅克可以看到几个小病人，护士走过来的时候，时而有瘦弱的上身从枕头上抬起来。

砂砾地上有跳动的脚步声，卡贝尔来了。他没有穿白罩衣，也没有戴眼镜，穿着鼓蓬蓬的衬衫和粗布裤子，显得单薄柔软，模样象个孩子，头发很黄，两颊有些下陷，皮肤光滑细嫩，可是，额头却叫人吃惊：布满了皱纹，是个老头子的额头。眼睛也一样，发着金属的蓝光，缀着金黄色的睫毛，那成熟的眼神使人惊奇。

卡贝尔是德国公民，到巴塞尔来继续学医。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再回德国去。白天，他在儿童医院^①跟韦伯教授一起工作，晚上就进行革命活动。他是书店的熟客，布拉特纳就是托他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宣言译成德文的。他一点也不知道雅克的计划，也没有提任何问题。

他从口袋里掏出四页纸，上面用纤细带尖儿的哥特字体写满了德文。雅克拿过那几张纸，看了看，摸了摸，他的手指在抖动。要不要说点什么，要不要把让他喘不出气的希望告诉这个德国人？……不，现在已经不是倾吐感情、交流思想的时候了。只剩下几天了，他必须强迫自己做个强者，保持孤独。他把那几张纸折叠起来，只说了一声：

“谢谢。”

卡贝尔出于谨慎，谈到了别的事。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

“你听：在道德科学学院，本届主席亨利·柏格森^②先生发

① 原文为德文 Kinderspital。

②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

言，向该院比利时通讯院士致敬。他说，对德国人的斗争，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斗争……”

他忽然不说了，好象侧起耳朵听着远处的声响。

“我真傻……你不象我这样吧。一天足有二十次，晚上，夜里尤其厉害……总是好象听见隆隆的声音……大概是在阿尔萨斯炮击的声音……”

雅克转过眼睛去。在阿尔萨斯……对，在那里，大屠杀已经开始了……他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在这个时候，那么多无辜的人注定要去作最悲惨最消极的牺牲，而他却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他为此感到自豪。他选择了死亡，这死亡是表示信仰的行动，是他对荒谬的世界的最后一次抗议，最后一次反叛——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带着他的印记，有着他坚决要赋予它的明确的意义。

停了一会儿，卡贝尔又说起话来：

“我小的时候，在莱比锡，住在监狱附近。一个冬天的晚上，下着雪，有消息传到居民区，说刽子手到城里来了，明天天亮的时候要处决一个犯人。我还记得，我什么也没有说，就走出去了。天已经很晚，雪很厚，外面什么人也没有。广场上一片恐怖的寂静。我一个人，绕着监狱走了好几圈。我不能回到家里去，脑子里总有这样的想法：有一个人在那儿，在墙的那边，人们把他判了死刑。他自己知道，他在等待着死……”

几个钟头之后，雅克坐在咖啡馆里，在劣质的烟草气味中，背靠着壁炉凉爽的瓷砖，把面包泡在一杯牛奶咖啡里吃，一面还在遐想。赤裸的灯泡吊在天花板上，好象蛛丝一端吊着个蜘蛛。灯光使他盲目，恍惚，孤立。

布拉特纳刚才一定要留他吃晚饭，可是雅克借口说急急忙忙地改了半天宣言的校样，累了，溜了出来。他很喜欢这书店，很后悔没有把这感情向他表露得更多一些。但是，布拉特纳那些罗嗦的革命言词，尽是人云亦云的老生常谈，他那独断专权的眼光，他那带着长指甲的手总放在别人的手臂上，还总是把钩鼻子低到畸形的胸脯上，低声把话说完，好象密谋者吐露机密似的，这些都使雅克不快，引起他神经质的反感。

在这里，他觉得自在。咖啡馆里光线昏暗，设备简陋，只有几张没有桌布的大桌子，木头磨旧了，褪了色，疙疙瘩瘩的，连颜色都很象黑麦面包。在这些桌子上，端上来极便宜的白菜炖腊肠，用盘子盛着的汤，切好了又摆成圆形的面包片。虽然不是一个人，雅克却在这里发现自己是孤独的，在许多不知其名的人的杂乱的人群里是孤独的。

这个咖啡馆总是坐满了顾客。这是个古怪的集体，在这里，摩肩接踵地进出着形形色色的孤独者、单身男女、流浪汉。这里有大学生，随便而吵闹，他们连女侍的名字都知道，正在评论晚上的电讯。他们从康德争论到战争，从细菌学、动物机械论又争论到卖淫。这里还有商店的店员，职员，衣著还算体面，沉静不语，由于半资产者的谨慎而彼此保持着距离，这使他们感到拘束，但又不能克服。这里还有难以分类的虚弱的人，失业的工人，刚从医院出来的养病的人，他们周围还飘着一股碘仿的气味；还有些残废，例如坐在大门附近的那个瞎子，并拢的膝盖上放着调音师的工具箱。柜台前面的一个圆桌子上，有三个救世军的妇女在吃晚饭。她们只吃蔬菜，在她们那宽檐系带的大帽子底下嘁嘁喳喳地说着悄悄话。还有一群穷途潦倒的顾客，不知是因为受了穷还是犯了罪，流落到这儿来的。有个坐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很高兴，

不大敢抬眼，弯腰曲背，好象背着沉重的过去。他们先把面包在汤里泡好大一会儿，然后再把汤勺伸进去。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坐到雅克对面。他们对视了一会儿。雅克无意间发现那人眼睛里有一丝躲躲闪闪的光，似乎是一切非法之徒彼此之间的密码，在视觉触角的尖端做着一种诡秘而又亲切的交谈；是一句问话，一闪即逝，内容却一向如此：“你也是不为社会所容、逃避兵役、受着追捕的人吗？”

门口出现了一个年轻女人，向大厅里走了几步。她体态苗条，步履轻盈，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衣裙。她的眼睛仿佛在找什么人，但没有找到。

雅克低下头去，心突然痛起来。他猛地站起身，赶快逃走。

珍妮……这时她在什么地方呢？没有了他，除了在法国边境寄出的一张简短的明信片之外，没有任何消息，她会怎样了呢？他时常这样，在突如其来，刹那间的冲动中想起她来，满怀激情，无限惆怅。每天，在不眠之夜，他仿佛紧紧地把她抱在怀中……一想起珍妮需要他，而他却把她丢弃不顾，任凭她前途渺茫，他就感到难以忍受。不过，他并不常想这个。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为她而保全生命。他并不认为这样牺牲爱情是一种背叛，他觉得，越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珍妮所爱的那个雅克，相反地，就越是忠于他的爱情。

外面是黑夜，是街道，是孤寂。他几乎跑了起来，但是，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一阵低沉的、雄壮的歌声伴随着他的脚步。他摆脱了珍妮，谁也抓不住他了。在他身上只有激情，只有净化一切的英雄气概。

八 二

每天，他首先要办的就是执行梅奈斯泰勒的指示：“每天早晨，在八点到九点之间到容克街三号门口去。如果看见窗户上有块红布，你就去找休茨太太，对她说：‘我是来看出租房间的。’”

八月九日星期日，快到八点半，他走过阿尔萨斯街和容克街的交叉路口，心忽然停住不跳了。三号的晒台上晾着衣服，在桌布和餐巾中间，很显眼的地方有一块罩家具用的红棉布！

这里，街道两旁都是小房子，房子和马路中间是些小花园。他刚走上三号的台阶，门就打开了。在昏暗的门洞中，他看到一个金发女人的身影，穿着浅色的女衫，赤裸着两条胳膊。

“您是休茨太太？”

她没有回答，只把雅克身后的大门关上。走廊就是一个狭窄的前厅，相当黑，门窗都关着。

“我是来看出租房间的……”

她赶快把两个手指伸到衬衣里面，掏出一个东西递给雅克。那是很小很小的一小卷薄纸，就象信鸽携带的那种。雅克把它装到衣袋的时候，还感觉到纸卷上仍带着体温。

“对不起，您弄错了，”那年轻女人高声说了一句。

同时，她重新打开通往台阶的门。雅克想看一下她的眼神，可是她把眼睛低着。他略一欠身，走了出来。门马上又关上了。

几分钟之后，雅克和布拉特纳弯腰看着显影盆，雅克辨识出信上的文字：

“命令阿尔萨斯作战立即进行，勿再等待。决定十日星期一飞行。早晨四点出发。星期日夜间将传单送到狄丁根东北高地。参看法国参谋部绘制的边境地图。在布尔格的G点与狄丁根的D点之间划一直线，在与G点及D点等距的中点会面，即俯临铁路的突出的高地。天将亮时等着飞机。如有可能，在地上铺白布，以利降落。带五十公升汽油。”

“今天夜里……”雅克小声说着，一面转过身去看着那个书商，他脸上只有激动的神情。

布拉特纳是天生的密谋家。这个在书籍交易中过早变老的残疾人，有丰富的想象力，象个强盗头子似的能当机立断。在对革命党的忠诚中，他倾向于危险和新奇的本性和他的信念起着同样的作用。

“这件事我们仔仔细细考虑了两天，”他立刻说。“必须按我们的决定办，现在只待执行了。让我来安排吧。你最好尽可能少露面。”

“可是小型卡车怎么办？你今天晚上能够弄到吗？还有司机呢？……谁去通知卡贝尔？你知道，得有好几个人，才能把传单迅速搬上飞机……”

“让我来安排吧！”布拉特纳还是说。“一切都会按照说定的准备好。”

如果雅克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本事，肯定，他本来也会象布拉特纳一样，发挥必要的主动性。但是他这几天无所事事，与大家也隔绝了，目前身体虚弱，向独断专行的书商让步，对他来说是个宽慰。

这位书商已经把一切细节都预先考虑到了。在他那个支部

的活动分子中间，他认识一个汽车库的工人，原籍是波兰人，很可靠。他骑上自行车去找这个人，把雅克一个人丢在书店的后房里，对着那个水盆，盆子里还飘着梅奈斯泰勒的来信。

雅克在那里等了一个钟头，一点没有动。他向书商要了一份参谋部地图，在膝盖上打开来，找到了布尔格和狄丁根。忽然，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来。近来，他心事重重，几乎都没有办法思考了。这一星期，他一直在梦幻中生活，朝思暮想的只有那一个目的，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时候才想到自己，想到自己注定的命运。现在突然面临着行动，几个钟头以后就要完成的，对于他来说是最后一次使命。他象个机器人似的不断在心里重复想着：“今天夜里……明天……明天……拂晓……飞机。”但他实际的想法是：“明天，一切都完了。”他知道他不会再回来。他知道梅奈斯泰勒会飞得很远，一直到汽油用完。以后？以后他会怎样？飞机在火线被打下来？……飞机被截获？……法国或是德国军事法庭？……无论如何，当场被抓住，一定是不经审判，就地枪决……恐怖使他挺起身来，感到万分清醒。两手捧住头，过了一会儿：“生命是唯一的财富。牺牲生命是发疯。牺牲生命是罪恶，违反自然的罪恶！一切英雄主义的行动都是荒谬和罪恶的！……”

突然，他异样地镇定起来，恐怖的浪潮已经过去了，就好像绕过了一个岬角似的，他到了另一边海岸，他凝视着另一个地平线……战争也许能够制止……造反，敌对双方成为兄弟，停战！……“即使不能成功，也树立了榜样！无论发生什么事，我的死也是一种行动……发扬荣誉……保持忠实……忠实，并且有用……终于是有用的！赎回了我这一生，我这无用的一生……得到了永恒的安宁……”

这时候，他的肢体松弛下来，感觉到平静甚至舒适，仿佛是一种悲哀的满足……他终于要卸下重担了……他就要跟这个难以相处的、使人失望的世界决裂，跟他自己这个难以相处的、令人失望的人决裂了……他毫不惋惜地想到生，想到生和死……毫不惋惜，不过有些兽性的和茫然的惊愕，这感觉是这样的强烈，甚至不能集中思想去想任何其他的事……生，死……

布拉特纳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还坐在原来的地方，臂肘拄着膝盖，两手捧着头。他机械地站起来，小声说：

“唉！如果社会党没有叛变……”

布拉特纳把那个汽车库的工人带来了。这人头发灰白，面容沉静而坚决。

“这是安德烈耶夫……他的小卡车已经准备好了。他给我们开车，会有人把传单和汽油装到车上……已经通知了卡贝尔，他就来……我们天黑时出发……”

这两个人到来，使雅克从麻木状态中惊醒过来。为了更稳妥一些，他要趁着天还亮的时候去认认路。安德烈耶夫同意了。他向雅克建议道：

“来吧，我带你去，开着我的小敞篷汽车。这样，我们两人就象去兜风一样……”

“传单捆好了？”雅克问书商。

“差不多完了……只要再干一个钟头……你回来的时候就完了。”

雅克拿起地图，跟安德烈耶夫走了出去。

布拉特纳在地下室等着他们，一面和卡贝尔一起继续作完

打包的工作。

传单每份四页，两页是法文，两页是德文。是用一种特殊的纸印的，又轻又结实。雅克让他们把这一百二十万份传单分成两千份一捆的小捆，每一捆用一条薄纸带扎起来，纸带一掐就断。总重量刚刚超过二百公斤。按照雅克的要求，布拉特纳由卡贝尔帮着，又把每十小捆打成一包，一共有六十包，每包都用细绳绑起，结头很容易用一只手解开。为了更便于搬运这六十包传单，雅克找了几个邮差用的那种大帆布口袋。全部东西分装成六袋，每袋有四十来公斤重。

五点钟，波兰人的小汽车回来了。

雅克又不安又紧张，说道：

“糟糕……去梅茨兰的公路有人监视……不能走，有关卡，还有小岗哨……从洛芬走的另一条路一直到罗斯森还好走。但是，到了那儿之后，必须走泥土路，根本没法走……小卡车过不去……不能用汽车……得找一辆大车，农民用的马拉的大车……马车什么路都能走，还不招人注意。”

布拉特纳说：“马车？那容易……”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个小本本，查起名单来，然后，对安德烈耶夫说：“你跟我来。你们两个留在这里，继续装袋子。”

他显得那么自信，雅克就同意留下，不陪他去了。

只剩了他们两个人，那德国人对雅克说：

“只剩最后几袋要系绳子，我不需要任何人帮忙了。你去休息吧！尽量睡一会儿……好吗？”他走到雅克身旁，拿起他的手腕，过了一会儿说：“你有些发烧，吃点奎宁？”雅克耸耸肩，表示拒绝，他又说：“不要待在这个没有空气的地洞里了，这里有一股

浆糊味……去散散步吧！”

格莱芬街挤满了穿着节日服装、全家出来闲逛的人。雅克混在人群里，一直走到桥上。他在这里犹豫了一下，向左转弯，顺着沿河大街走了下去。“我的运气不坏……美丽的黄昏……”他挺起身，终于笑了一笑。不要再想，坚强起来……“但愿他们能够找到一辆大车……但愿一切都顺利。”

沿着河岸的人行道几乎没有人，他俯视着白练似的流动的河水，被夕阳照得象融化了的金银。在河堤的斜坡下面，拉纤的小路上，还有一些洗澡的人，利用着最后的一点阳光。雅克停下脚步，待了一会儿。空气暖和得使人难受。草丛中显露出几个人赤裸的上身，发出那样柔和的闪光……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他又走了起来。拉菲特庄，塞纳河岸，洗澡，跟但以理在一起过的夏天……

命运是通过什么道路，经过了什么曲折，把往昔的那个孩子引导到最后这个傍晚的呢？是一系列偶然的因素吗？不是，肯定不是！……他所有的行动都是互相关联的。这些，他感觉得到，他一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过。他整个的一生，只不过是长时间地，痉挛似地顺从着一个神秘的方向，屈从于某个命中注定的连锁。而现在，到了头，到了神圣的终点。他的死在他面前发出光辉，就象这光芒四射的落日一样。他超脱了恐惧。他听从了召唤，没有毫无益处的虚张声势，只有果断的，令人陶醉、使人振奋的悲伤。这自觉的死亡是他这一生完满的结束，是他这忠于自己的最后行动所必需的条件……忠实于他叛逆的本能……从他儿童时代起，他就时常说：不要！他从来没有别的说话的方式。并不是不要生活……而是不要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他最后

一次拒绝，最后一次说：不要，不要世人所安排的那种生活……

他信步走着，不觉来到惠茨坦桥底下。上面驶过汽车和电车——还有活着的人们。在下面有个街心花园，是个绿树成荫的，清凉的安歇之处。他坐在一张凳子上。几条小径围绕着草地和黄杨树丛。一棵雪松低垂的树枝上，几只鸽子咕咕地叫。小径的另一边坐着一个女人，穿着淡紫色的围裙，还很年轻，身体还象个小姑娘，面孔却显得憔悴了。在她面前有一辆童车，里面睡着一个新生儿，是个不足月的孩子，头发很稀，皮肤蜡黄。那个女人大口咬着一块面包。她看着远处，看着河水的那个方向，另一只手象小孩子那么瘦弱，漫不经心地摇着那破旧的童车，车子的每一个接头的地方都吱吱作响。淡紫色的围裙褪了颜色，但还干净，面包是抹了黄油的。那女人神态平和，几乎可以说是心满意足的样子。并没有任何东西显示着过分的贫困，然而，整个这个时代的穷苦都展现在这里了，这景象使人不能忍受，雅克站起身来，赶紧逃开。

布拉特纳刚刚回到书店。

他眼睛发光，挺着胸脯。

“要用的东西都全了。一辆带篷的马车，货装在里面不显眼。一匹壮实的牝马拉车，安德烈耶夫赶车，他在波兰农庄上当过长工……这样费的时间多一些，但保险什么路都能通过。”

八 三

爱丽盖斯蒂教堂的钟楼敲响了半夜十二点，一辆送菜的大车穿过南郊空无一人的街道，驶上了通往阿斯克的大路。

厚厚的车篷四面盖得很严，里面黑洞洞的。布拉特纳和卡贝尔坐在后面，用手捂着嘴低声说话。卡贝尔在吸烟，不时可以看到他香烟头上的火星在跳动。

雅克钻到车子的最里面，坐在两大包传单中间，缩着肩膀，双手拢着膝盖，在黑暗中缩成一团，为了克制他的兴奋，尽量一动不动，闭着双眼。

布拉特纳压低的声音传到他耳边：

“卡贝尔，我的老兄，现在想想咱们吧！这个时候……一架飞机……我们三个人能不能安安稳稳地坐着咱们的马车回去，不遇到什么麻烦，没有人盘问我们到那里去干什么？”他又向里面探身问道：“你是怎么想的？”

雅克没有回答。他正在想飞机着陆……幸存者在地面上会遭遇到什么……

布拉特纳又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特别是，即使我们能把马车藏在灌木丛里……一卸完东西，飞机来之前，就得把安德烈耶夫和车子先打发走，让他在天亮前赶到大路上。”

雅克觉得他已经坐在飞机里……从座舱里伸出头去……白色的纸片在空中盘旋翻飞。草原，树林，集结的军队……成千上万的传单撒向田野……子弹在乒乒乓乓地响。梅奈斯泰勒回过头来。雅克看见他的脸上淌着血。他那微笑仿佛在说：“你看，我们给他们带来了和平，他们反倒打我们！……”机翼被打中，飞机下降了，在滑翔……报纸会登吗？不会的，新闻都受到限制。安托万不会知道，安托万永远也不会知道。

“那么，我们怎么办？”卡贝尔问。

“我们吗？东西一上飞机，我们就尽可能各自跑开，分道扬镳。”

“好①！”卡贝尔答应一声。

大车也许是走在平路上，牝马小跑起来。高高的车厢载货很轻，在弹簧上摇晃。黑夜里这样单调的晃动使人觉得安静，催人入睡。卡贝尔把烟掐灭，在包上伸开两腿。

“晚安。”

过了一会儿，布拉特纳又嘟哝着说：

“安德烈耶夫真可笑。这样跑起来，我们就要到得太早了。你看是不是？”

卡贝尔不回答。布拉特纳又转身对雅克说：

“我们到得越早，越容易引人注目，你说是不是？……你睡着了？”

雅克没有听见。他仿佛站在一个大厅的中间，穿着教养院穿过的粗麻布工作服。在他面前，军事法庭的军官坐成一个半圆形。他昂着头，一字一句地说：“我知道等待着我的的是什么，但是，我要利用我最后的权利。你们在处死我之前，必须听我讲话！”这是法院里中世纪风格的大厅，屋顶上绘着金碧辉煌、错综复杂的藻井。主持开庭的将军端坐在大厅中间高高的椅子上。这是费斯姆先生，克鲁伊教养院的院长。大概是志愿参军的，怎么成了将军了？……他还是那个模样，还是那样年轻，金黄头发，圆圆的脸，胡子剃得溜光，下巴上扑了粉，眼睛藏在闪闪发光的眼镜后面。他很神气地穿着带有肋状胸饰的黑军服，缀着卷毛羔皮。在他下面，在一张小桌子旁并排坐着两个年老的残废军人，胸前挂满了勋章。他们写个不停，他们木头的假腿在桌子底下伸到前面来。“我不想为我自己辩护。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行动

① 原文为英文 all right。

的人，用不着为自己辩护。不过，在这里坐着的人，应该从一个即将去死的人嘴里，听到真理……”他的手紧紧抓住从地上支起竖在他面前的半圆形栏杆。坐在这儿的人……他感觉到身后的阶梯无边无际，那是赛车场的阶梯看台，坐满了观众。珍妮也来了，独自坐在凳子的边上，面色苍白，心神不定，穿着淡紫色的围裙，带着一辆小孩车。但是，雅克故意不把头转过去。他不是向她说话，甚至不是向那保持着异样静默的无数观众说话，他们的注视重压在他肩上，好象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也不是向那一排用眼睛盯着他的军官说话。他只是说给从前时常羞辱他的费斯姆先生听的。他激动地盯住那张声色不动的脸，片刻也不能抓住他的目光。费斯姆的眼睛是睁着的吗？眼镜在闪光，军帽底下又有一片阴影，所以他说不准。雅克清清楚楚地记得他那灰色的小眼睛里发出的恶意的目光！不！从他那毫无表情的凝滞的脸相来看，他好象是顽固地低垂着眼皮。在院长面前，雅克觉得多么孤独！世界上只有他的狗跟他在一起，那是在汉堡码头上找到的一只跛脚的卷毛猎犬……如果安托万来的话，他一定会逼着费斯姆先生睁开眼睛来。他觉得多么孤独啊！独自一人，跟一切人对立！将军，军官，残废军人，还有那些没有姓名的群众，连珍妮也在内，都把他看成被告，必须交代清楚。多么大的讽刺啊！因为他比任何一个窃取权利审判他的人都伟大，都纯洁！他抗击的是整个社会……“有一种法律比你们的法律更高，那就是良心的法律。我良心的声音比你们一切法典更为响亮……我必须选择：或者是在你们的战场上无谓地牺牲，或者是为了解放被你们欺骗的人们，在反叛之中牺牲。我作了选择！我接受了死亡，但不是为你们去死。我去死，因为这是你们留给我的斗争到底的唯一的办法，为了实现纵然你们煽动仇恨，而我仍

然认为是最重要的目标，那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博爱！”他每说完一句话，结结实实埋在地里的小栏杆就在他紧握的拳头底下颤抖。“我作了选择！我知道什么在等着我！”忽然，仿佛看到一队士兵向他瞄准，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他认出了在第一排士兵中有帕热斯和朱姆兰。他抬起头来，发觉自己还是站在法庭里。行刑队的形象那么清楚，他的脸仍然在抽搐，他马上把难看的脸相变成高傲的冷笑。他一一注视前面的军官，注视着费斯姆先生，凝视着他，就好象以前，他又焦虑又挑衅地猜测着这位院长在静默中隐藏着什么意图一样。他用挖苦的语调说：“我知道什么在等着我。可是，你们知道你们的命运吗？你们自以为是强者，今天，只要一挥手，射出几粒子弹，你们就可以吹嘘说让我从此闭嘴了。但是，即使把我消灭，你们还是什么也阻拦不住。我即使死了，我的使命仍然长存！日后将结出你们意想不到的果实。即使我的呼吁现在得不到响应，但是，被你们淹没在血泊里的各国人民不久即将清醒，会镇静下来！我死了以后，你们将看到千百万同我一样的人站起来，反对你们。他们由于自觉，由于感觉到自己的团结，而无比坚强。在你们和你们的罪恶制度面前，将出现真正的人类，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此，你们使尽最拙劣的镇压手段也是无用的！进步的趋向，世界的前途都必定使你们灭亡！国际社会主义正在不断发展！这一次，遭到挫折是可能的，你们就野蛮地利用了这次失误。是的，你们的动员令发布了，但是，你们不要对这可怜的胜利抱有幻想！你们不能按照你们的利益扭转事物的必然进程！国际的理想必然战胜你们，必然在全球取得胜利！你们用我的尸体堵不住历史前进的道路！”他的眼睛盯着费斯姆先生的脸，那张盲目的脸，蜡作的脸，象泥菩萨脸上那种含义不清的微笑，露出不可捉摸的冷漠……

雅克气得直抖。无论如何，要接触到这个敌人，逼迫他至少抬起眼睛。他猛然大喝一声：“院长先生，你看看我！”

“什么？你说什么？是叫我吗？”布拉特纳问。

将军抬起了眼皮，露出一道没有灵魂的目光，那是医院里垂死的病人在护士那职业的眼睛里看到的目光，对于护士来说，一个濒死的人只不过是一具只待埋葬的尸体而已……忽然，雅克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他还会叫人把我的狗也杀死的，派看守阿瑟去杀，既然他把阿瑟当作他的勤务兵……”

“你在说什么？”布拉特纳又问一句。

雅克没有回答，他就在黑暗中伸过手来，碰碰雅克的腿。雅克睁开了眼睛，但他最先看到的不是车篷，而是法院的有金色藻井的天花板。终于，他清醒了过来：布拉特纳，一捆捆的传单，大车……

“你在叫我吗？”布拉特纳又问。

“没有。”

“离洛芬大概不远了，”沉默了一会儿，书商说。接着，他不再试图打破雅克的沉默，也就不响了。

卡贝尔在车底板上躺着，象个小孩似的熟睡着。

布拉特纳不时抬起身来，从车篷的缝里向外张望。过了一会儿，他小声通知说：

“洛芬！”

马慢步走着，大车穿过阒无人迹的城镇，这时是两点钟。

又过了二十来分钟，牝马停住脚。

卡贝尔惊醒了。

“怎么？发生了什么事？”

“嘘！”

大车刚走过罗斯根茨。现在得离开山谷。一出村口，就是一段坎坷的土路，到处是干涸的水洼。安德烈耶夫从车夫座上跳下来，把车灯熄灭，抓着缰绳，拉住马。大车又走动了。

车子颠簸着，木拱架和弹簧吱吱作响。雅克、布拉特纳和卡贝尔使劲顶着车上装的东西，不让它在狭窄的车厢里滑到一边去。这磕磕碰碰的声音使雅克想起了一段旋律，一个温柔忧伤的乐句。最初，他还没有听出来这是什么，忽然，想起来了……肖邦的练习曲！珍妮……拉菲特庄的花园……天文台大街的客厅……那天晚上，这样近，又是这样遥远，珍妮应雅克的请求，坐到钢琴前……

走了半个多钟头，车又停了。安德烈耶夫解开车篷的皮带：“到了。”

三个人一声不响，跳下车来。

才三点钟，虽然有星星，仍然一片漆黑。然而，在东方，天空已经开始泛白了。

安德烈耶夫把马拴在一棵小树上。这时，布拉特纳不说话，好象不如在书店那么有信心了。他在黑暗里四处张望，小声说：

“你说的那个高地在哪儿呢？”

“跟我来，”安德烈耶夫说。

四个人爬上一个长满灌木的小坡，坡的顶上就是那块高地的边缘，走在前面的安德烈耶夫站住，喘了一会儿气，一手拍拍布拉特纳的肩膀，另一只手指着黑暗说：

“你过一会儿就看清楚了，从这里开始，没有树了。这就是那个高地。选择这个地方的人是内行，你知道吗？”

卡贝尔出主意说：“现在，得赶快卸车，让安德烈耶夫赶紧走。”

雅克大声说：“干吧！”坚定的声调让他自己也吃了一惊。

四个人又走下土坡。虽然从大路上来，坡很陡峭，他们搬袋子，油桶，也只用了几分钟。

雅克把一个白色的帆布口袋放到地上，说道：

“等天再亮一点，我们就在高地上把白布铺开，拉开三个或四个角，好指示飞机降落。”

布拉特纳对波兰人低声说：“你现在赶着你的大车走吧！”

安德烈耶夫转身向着他们三个，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向雅克迈了一步。他们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雅克本能地把手伸了出去，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对于这个他以后再也见不着的人，他突然感到一阵柔情，可是，安德烈耶夫却永远不会猜到 he 这时的心情。波兰人抓住他伸出的两手，俯下身来，吻了吻雅克的肩膀，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脚步很响地冲下山坡，车轴吱吱扭扭响起来。大车打了一个转身。接着，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安德烈耶夫大概是先把车篷盖好，或者检查了马具，然后再登上车座……终于，大车又走动起来，车轮轧轧响着，弹簧也吱吱作响，马蹄踏在沙地上，发出低沉的声响，起初还清晰可辨，接着，在黑夜中消失了。布拉特纳，卡贝尔和雅克都没有说话，并排儿站在斜坡边上等着，眼睛直瞪瞪地向黑暗中张望，看着那声音消失的方向。当什么也听不到，只有一片静寂的时候，卡贝尔才第一个转过身来，随随便便地在地地上躺下，布拉特纳走过去，坐在他的身旁。

雅克依然站着。现在无事可干了，只等着天亮，飞机……这样被迫的无所事事又使他烦恼起来。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多么希望独自一人待一会儿……他向前走了几步，好离开同伴们。“一直到现在，一切都顺利……现在，只等梅奈斯泰勒……远远

地就可以听见他……天一亮，一铺开白布……”黑夜里充满了虫儿的颤音。雅克浑身发烧，脚步踉跄，很是疲倦，抬起汗津津的脸，迎着清凉的夜气。他漫无目的地在高地上走来走去，时时绊在土块上。为了不离同伴们太远，他围着布拉特纳和卡贝尔转圈子，时而透过黑暗听到他们在低声谈话。这样瞎走一通两腿终于发软了，他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透过厚厚的墙壁，他听到石板地上悄悄的脚步声。他知道，珍妮想出办法钻进了监狱，又一次找到了一条路来到他的身边。他等着她，盼着她，然而，他又不愿意……他心里在斗争……把门关上吧！让他一个人待着吧！……太晚了！她已经来了。他透过铁窗看到了她……她从医院白色走廊的那一端向他走过来。她轻轻朝他走来，黑纱半遮着脸，她没有权利把黑纱揭开，他们不许她这么作……雅克看着她，没有一点迎接的表示……他不想接近她，再也不想跟任何人接触。他在栅栏的另一边……这时候，不知怎地，他双手捧着那披黑纱的、圆圆的脸，那张脸在发抖。他看见她的脸在黑纱底下紧蹙着。她低声问道：“你怕吗？”“是的……”雅克的牙直打战，话都说不清了。“我怕，但是除了你，谁也不会知道我怕。”珍妮又低声说：“这就完了……忘记一切，安息……”她的声音歌唱一般，惊奇而又安宁，仿佛不是她本来的声音。“对，但是，你不明白这……你不懂……”在他身后，有个人走进了囚房。他不敢回过头去看，他缩紧了肩膀……什么都看不见了，有人绑住了他的眼睛，用拳头推他。他朝前走。清风吹凉了他脖子上的汗。他的脚踩在草地上。虽然蒙着眼，他却仿佛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穿过了布兰宫前的广场，广场四周站着军队。有兵算不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谁也不想。他只注意周围的这股轻风，黑夜将尽、白昼临近的这一股温暖。

泪水在他脸上流，眼睛蒙着，他却高昂着头，向前走。他坚决地迈开步，但是步伐不稳，象脱了卯的木头人，因为他控制不住他的膝弯，地面上又好象到处是坑，他总陷到坑里。不要紧。他还是向前走。他周围有响声，有连续不断的轻微的呼号，仿佛风在歌唱。每迈出一步就更接近目的地。他两手向前举起，象捧着一件祭品，一件娇贵的东西，他得一直捧着，不要失脚，一直捧到底……身后有人冷笑……是梅奈斯泰勒吗？……

慢慢地，他睁开了眼。头上的苍穹里，星星隐没了。黑夜已尽，在东方，清新的，抹着一片金光的天空上，划出一列山峰的线条，而在那后面，天已破晓，就在那儿泛出了色彩。

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刚刚醒来的。噩梦已经完全忘了。血液在剧烈地跳动，头脑十分清醒，好象雨后的晴空。要行动了：梅奈斯泰勒就要到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在他嗡嗡作响的头脑里，清清楚楚的思绪接连不断，肖邦的乐句又响了起来，好象轻轻地给他伴奏，柔和得使人心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撕下了一页，飞快地写道：

“珍妮，我一生中唯一的爱。我最后思念的就是你。我本来能给你若干年的温存，然而我却只给你带来了痛苦。我多么愿意你永远记住我的形象……”

他并没有看他写的是什麼。过一会儿，他要把这张纸交给布拉特纳。

一下隐约的撞击声，紧接着，又是一下，震得身子底下的大地直晃动。他停下笔，踌躇着。接着，他听见远处接连几声

爆炸，贴在地面上的四肢也感觉到了震动。他突然明白了：炮声！……他把本子塞进口袋，一下子跳了起来。布拉特纳和卡贝尔已经站在高地的边上，靠近斜坡的地方。雅克跑到他们身边说：

“炮声！阿尔萨斯的炮声！”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一起，伸长脖子，睁大眼睛，聚精会神地看。对，战争就在那边，正等着拂晓时刻又要开始了……在巴塞尔，他们还没有听到过……

正当他们屏息静听的时候，突然，从另一面的地平线上，另外一种声音使他们三个人同时转过身去。他们互相询问地望一望，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肯定这仅可辨识的嗡嗡声是什么声音。然而，这声音却越来越响。远处的炮声每隔一定的时间也在隆隆地响，但是，他们已经听不见了。他们转脸向着南方，搜索着苍白色的天空，这时，在那里，好象充满看不见的虫儿发出的嗡嗡声……

突然，他们三个一齐举起手来，霍格瓦尔德山顶上空出现了一个黑点：梅奈斯泰勒来了！

雅克大喊：

“铺好标志！”

每个人抓住一块白布，朝高地的三个不同方向跑去。

雅克要跑的路最长。他跑着，紧紧搂着折起的白布，土块绊着他的脚。他心里只想着及时跑到高地的尽头。轰轰的声音震得他什么也听不见，他却连一忽儿的时间也不敢抬头看看。飞机已经象猛禽一样在盘旋，好象要扑到他身上，把他叼起来飞走似的。

八 四

寒风鞭打着他的脸，直往他的鼻孔和嘴里灌，使他象淹在水里一样透不过气来，然而，他却感觉不出在前进。他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好象是在两节车厢之间折箱的过道上颠簸不停的转盘上一样。尽管飞行帽上有护耳，雷鸣一样的轰轰声还是震得耳鼓直响。飞机在高地上连着颠动一阵之后，离开了地面，他竟然没有觉察到。

在他周围，只有一团发着汽油味的烟雾。他睁大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他的思想，都沉没在这棉絮似的云朵中。他很快恢复了呼吸，然而，噪音敲打着脑子，脑浆都振得麻木了，又象不断地放电一样，传到四肢，他好久以后才能适应。渐渐地，脑子又活动起来，又收集起形象和思想。不，这一次，不再是做梦！……他上身系在座椅背上，膝盖被周围的纸拥挤着，动弹不得。他挺起身，在前面，在周围白茫茫的雾气中，有一个人影，只见两个肩膀，一顶飞行帽，在机翼宽大的黑色平面上，象皮影戏上的人物：那是飞行家。他感到一阵狂喜。飞机起飞了！飞机正在飞行！他狂喊起来，这是胜利的欢呼，但是，在暴风雨般的机声中淹没了，梅奈斯泰勒连肩膀都没有动一动。

雅克向前探出头去。劲风抽打着他，吹过他的耳朵，呼啸声就象刀刃刮过磨刀石一样尖锐。极目远望，是一幅灰蒙蒙的、不定形的壁画，是一幅平展开来，从很高很远的地方望下去的壁画，是一幅褪了色的，龟裂的，含有石膏的壁画，上面还点缀着几个淡色的斑。不，不是壁画，是一张某个天体的地形图，一张未知土地的无声地图，画着一片未经开发的广漠领域。这时，他想到

一件让人惊异的事：布拉特纳、卡贝尔还在下面过着没有翅膀的虫儿似的爬行生活……他感到一阵目眩，慌忙回到座位上，闭起了眼睛……突然，他仿佛觉得他还是个孩子，好象又看到了他的父亲……安托万和吉丝……但以理……接着，一个模糊的身影，珍妮，在拉菲特庄的花园里，穿着网球衫……这些形象又全消失了。他又睁开了眼。梅奈斯泰勒一直在他前面，弓着背，戴着圆球似的飞行帽。不，这不是幻觉。梦想终于实现了！是怎么实现的他已经记不清。当时，他极力把白布摊开，铺在高地上，象反射似的，平伏在地面，感觉到有一只大鸟，在头顶上盘旋，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奇异的时刻，他对自己的动作竟完全没有注意，只是机械地记住了几个不连贯的片段，在熹微的晨光中闪动着几个幽灵……他竭力回忆，突然想了起来：在这由天而降的流星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灵魂，一个人的声音。梅奈斯泰勒幽灵似的出现了，脸上戴着皮套子，他把上身伸到座舱外面喊道：“快装传单！”雅克又仿佛看到人们在高地的黑夜里奔跑，传递帆布袋。他又回忆起，他抱着一桶汽油，爬上飞机，到了梅奈斯泰勒身边。这时，飞行家正跪在被照亮的飞机里，用一把扳手拧紧一个螺栓，他回过头来对雅克说：“接触不良，叫机械师！”

“他赶着大车早走了。”于是，梅奈斯泰勒一声不响，坐进了驾驶舱……可是，雅克是怎么坐进来的？这个飞行帽是怎么戴上的？谁给他扣上安全带的呢？

飞机是在向前飞吗？它迷失在这一片执拗地嗡嗡作响的空间，象是一个不动的东西，悬在阳光里。

雅克回过头来。太阳在他背后，刚升起的朝阳。那么，是朝着西北方向？显然，从阿尔特希基到坦纳……他又抬起身来看外面。真是使人惊异不止！雾已经散了。飞机下面，现在正好

是参谋部那幅地图，四日来，他对着这幅地图，简直把眼睛都看坏了！这地图一直延展到天际，阳光灿烂，五彩缤纷，生气勃勃！

雅克把下巴靠在金属框上，怀着极大的兴趣，主宰着这个陌生的世界。一条微微发白的宽宽的水流，仿佛曲折回旋地划出了一条路，把景物分成两半。这是一条河谷？莫非是伊尔河谷？在这条时而被银色的烟雾遮蔽的委蛇蜿蜒的银河中间，是一条河。河右岸那条白线是什么？公路？阿尔特希基的公路？那象大大小小的血管一样交织起来的网，大概是其他的，纠结盘错的大路吧，它们在原野上雾气腾腾的绿色中，显得清清楚楚。还有一条黑线，几乎是笔直的，最初却没有看出来。是什么呢？是铁路吧？他仿佛把整个的生命集中在向远处望去的视线里，现在，他看清了山谷两旁突起的山峰。四处可见片片的沉睡着的云雾，在风中延伸，又扭结起来，不时露出新的大片视野。那暗绿色的点是树木葱茏的山峰，而那边，在右面，刚从云缝里露出来的那是什么？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层层叠叠，依山而建，一座微型城市，被太阳照得红彤彤的，那里有看不见的、拥挤杂沓的生活……

飞机微微向后倾斜。雅克感到它在升高，它一个劲地，轻快地不断向上飞升。这时候，他对马达的轰隆声已经习惯了，简直成为他的一种需要，离不开了。他沉溺在马达的轰响声中，陶醉了。它仿佛成了表达他激动的心情的乐声，是一首交响乐，那强而有力的音波以嘹亮的语言描绘着此时此刻的奇迹，歌唱着把他送往目的地的神奇的飞行。他无须再斗争，也不用再选择，而且连意愿也不需要了。解放了！由于飞行而产生的风，高空的气流和对成功的顽强信心，使他的血液跳动得更快，更有力。他感到心脏在胸膛深处迅速而有节奏地跳动，这跳动，是人的伴

奏，仿佛是他的身体与震响了他周围空间的神奇的凯歌在最后一次合作……

梅奈斯泰勒动了一下。

他刚才就向前探了探身子，也许是要看飞行图吧？或者只是为了驾驶得更好？……雅克愉快地看着他的同伴操作。他叫了一声：“喂！”可是，离着一段距离，又有噪音，两个人无法交谈。

梅奈斯泰勒又挺起了上身，然后再俯下身去，弯着腰待了好几分钟。雅克好奇地看着他，看不见飞行家在干什么，可是，从他的肩膀一下下的摇动，雅克看得出来他在使劲，是在用手干什么，也许他在使用雅克在高地上看到的梅奈斯泰勒手上的那把大扳手。

用不着担心，飞行家是个内行……

突然，飞机在空中摇晃一下，好象撞上了什么。怎么了？雅克诧异地向周围看看，过了几秒钟他才明白：这样摇晃，这样突然出现的间隙，只不过是因为出乎意料地寂静了，完全的寂静，星际的寂静，宗教式的寂静，它突然代替了隆隆的马达声……为什么把瓦斯关掉了呢？

梅奈斯泰勒又抬起身来，他甚至站了起来，他的上身遮住了飞机的前部。

雅克警觉起来，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不动的背影。真气人，不能交谈……

飞机好象也为这寂静感到吃惊，非常轻地颠簸几下，然后笔直地向前飞去，在空中发出飞矢般的咝咝声。是要滑翔，还是要俯冲？为什么要这样驾驶呢？梅奈斯泰勒是害怕发出声音，被别人发现吗？也许要降落？莫非他们已经到前线附近了？是不是马上就该撤出第一批传单？对，肯定是这样，因为梅奈斯泰

勒很快地动了动左臂，但没有转过身来……雅克激动得直抖，伸手抓住一捆传单。可是，他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跌出来，失去了平衡。安全带勒住了他的肋骨。怎么回事？飞机失去了平衡位置，一直向下冲去。为什么？难道是故意的？……雅克忽然起了疑心。纵然他对梅奈斯泰勒完全信赖，还是不免本能地感到可能发生危险……他一只手抓着机舱的边缘，想抬起身来看看外面。真可怕！天旋地转，田地、牧场和树林刚才还平铺在地上象一张地毯，现在却摇晃着，凹凸不平，在抽缩，象是一张水彩画着了火，上升，令人目眩地向他升上来，发出狂风似的呼啸，快得象是突如其来的灾祸！

雅克一扭腰，把皮带挣断，朝后倒去。

飞机在坠落，完了……

不，象奇迹一样，飞机居然又仰了过来，似乎又保持了飞行的姿势……梅奈斯泰勒还在驾驶……有希望！

失灵的飞机又飘浮了一分钟，接着，好象强大的波涛把它抓住，把它抬起来，摇晃着，把它摇散了。机身在格格地响，向左倾斜下去。是“在翼尖上盘旋”^①？还是要着陆？雅克缩作一团，伸出两只手想抓住顶盖，却无处可抓。一个清晰的景象印在他的视网膜上：阳光照着一丛冷杉，一片草场……出于本能，他闭上了眼。一秒钟，长得没完没了。脑子里只剩下一片空白，心被紧紧揪住……凄厉的号角声，刺破了他的耳膜。一朵朵蔷薇花似的焰火把他卷裹住，使他翻滚起来，把他抛进了明亮的旋涡。钟声，钟声，一起轰响起来……他想喊：“梅奈斯……”无比猛烈的一下震动，他的下巴被撞碎了……他的身体被抛在空中，他觉得

① 在翼尖上盘旋又叫最小半径大坡度盘旋，是一种有相当难度的飞行特技。

他好象一铲子泥灰浆被拍在墙上，摔扁了……

灼热……火焰，劈啪的爆响，烧焦的臭味……许多针尖，许多刀刃，戳着他的腿。他透不出气，他拼命挣扎。他使出超人的力气想逃避，想爬出这个火盆。但是不行，他的脚已经牢牢钉在火焰里了。

有两只钢爪，从他身后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了出去。他被折断了，肢解了，他吼起来……人们把他放在钉子上拖，他的身体碎裂成一片片……

突然，这一切可怕的感觉都沉入了平静。一片黑暗。虚无……

八 五

说话的声音……有人在远处说话，好象隔着一层厚厚的毡幕。然而，这声音十分顽强，一直钻到他心里……有个人在对他说。是梅奈斯泰勒？……是梅奈斯泰勒在叫他……他挣扎着，他竭尽全力要从麻木的睡眠中醒过来。

“您是谁？法国人？瑞士人？”

他的腰、大腿和膝盖痛得利害，难以忍受。他好象被大铁钉钉在地上。嘴成了一道血口子，舌头肿着，堵得他出不来气。他闭着眼睛，仰起脖子，把头左右摇了摇。他耸起肩膀想抬起身来，但抬不起来，又倒了下去，碰着穿透他脊背的那些铁钉，喉咙里发出一声呻吟。汽油味，混合着烧焦的布的臭味，灌满了他的鼻孔，他的喉咙。他觉得在流口水，从只能张开一道细缝的嘴角，吐出来一团血块，浓得就象果肉。

“您是哪国人？是在执行任务吗？”

这声音在他耳边嗡嗡响，强烈地震动了他的麻木。他摇曳的目光从昏暗的深渊里升起，刹那间，在眼睑之间显露出来。他看到一个树梢，一角青天。绑腿，被灰尘盖得发了白……红色的军裤……是军队……一群法国步兵围着他。他们打死了他，他现在就要死了……

可是传单呢？飞机呢？

他把头稍稍抬起来，从士兵的腿之间望过去。飞机……三十米开外，有一堆不成形的废物，在阳光下冒烟，象是一堆熄灭的木柴堆，那是一堆废铁，上面还吊着几块烧焦了的衣服碎片。再远一点，一只折断了的机翼深深插进土里，在草地上翘起来，孤零零地竖着，象个稻草人……传单！一张还没有撒，他就要死了！一捆捆都在那儿，烧掉了，永远埋在灰烬里了！谁也没有看过，永远，永远看不到了……他的头又倒了下去，茫然的目光看着明亮的天空。对这些纸，他痛心惋惜……但他身上痛得太厉害，别的都无关紧要了……那烧伤折磨着他的腿，一直痛到骨髓……对，死吧！越快越好，越快越好……

“怎么啦？回答！您是不是法国人？您坐这架飞机干什么？”

声音很近，气喘吁吁的，强而有力，但不粗暴。

他又睁开眼睛，看到一张还算年轻的脸，满面倦容，两只蓝眼睛，军帽上罩着蓝布套，帽檐底下一副夹鼻眼镜。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我告诉你，他醒过来了！”“你通知上尉了吗？”“我的中尉，他身上也许有证件哩！得搜一搜他……”“他可以吹牛说捡来了一条命！”“军医马上就来，帕斯坎跑去找他了……”

戴夹鼻眼镜的人一条腿跪在地上，脖子和胡子没有刮净的下巴从敞开领子的军装里伸出来，胸前交叉地系着几根皮带和宽布带子。

“你不懂法国话？……你是德国人吗？你懂吗？①”

那个人用粗硬的手指摸摸雅克受伤的肩膀，雅克低沉地哼了一声，中尉立刻把手抽回去。

“您痛？您要喝水吗？”

雅克眨眨眼，表示要喝。

军官站起身来，一面小声说：“不管怎样，他还是懂法国话。”

“中尉，他一定是个间谍……”

雅克试图向这刺耳的声音转过头去。这时，一队士兵挪动了位置，露出三米以外的地上有一堆黑黝黝的难以名状的东西，只有一条胳膊蜷曲在草地上，象是人的。胳膊头上有一个黑色的鸟儿爪子。雅克的目目光无法离开它，那是一只纤细的、灵巧的手，手指朝天蜷着……雅克觉得周围的人声好象都模糊了……

“嘿，中尉，帕斯坎带着军医来了……帕斯坎什么都看到了，当时，他正往岗哨上送咖啡……他说飞机……”

人声远了，远了，好象隔着一层厚厚的毡幕。在天空，树梢模糊了，连疼痛也越来越远，变成了麻木的恶心……传单……梅奈斯泰勒……也死了……

为了什么神秘的、专横的理由，他要留在这只小船的舱底？是什么碾碎了，颠簸着，却又无可奈何？梅奈斯泰勒早被抛到水里去了，因为湖上的风暴把他们的小船摇晃得太厉害……灼热的太阳象熔化的铅。雅克拼命想躲开这烫人的阳光，但是毫无办法。他使劲挪动肩膀，眼睛微微睁开了，立刻又合上，好象阳光的金箭把他的眼珠都射伤了。他感到剧痛，船底上尖利的石头撕裂了他的身体。他想叫梅奈斯泰勒，但嘴里好象有火热的

① 原文为德文 Bist du Deutsch? Verstehest du?

煤块，烙着他的舌头……一下震动，他每一根神经的末梢都痛苦地感到了。大概是一股浪头把船往前一推，碰着码头了。他睁开眼睛……“哎，易碎物品，你要喝水吗？”一顶军帽……跟他说话的是个宪兵……一张陌生的脸，象个胡子刮得马虎的乡下神父。周围，是人声，粗暴地，含混地，七嘴八舌地说话。他痛，受了伤。他的飞机大概是失事了。要喝水！……他感觉到火烫的嘴唇碰到了一个白铁杯的边缘。“老弟，他们的步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他们的机枪真够劲！到处都有，那些混蛋！”“我们也会照样会有机枪，只等造出来就是了！”

喝水……虽然太阳晒着，浑身流汗，他还是打寒战，牙齿抖得磕在铁杯子上。他的嘴只是一道血口子……他贪婪地咽下一口水，噎住了。水流在下巴上。他想抬起胳膊，腕子上扣了手铐，捆在担架带子上。他还想喝，可是，拿杯子的那只手移开了……猛然间，他什么都想起来了！传单……梅奈斯泰勒那被烧焦的手，飞机，火炉……他的眼睛，被阳光、泪水、尘土和汗水刺得生疼，他把眼睛闭上……喝水……他难受，除了疼痛之外，什么都不关心……但是，周围的喧闹又使他睁开了眼。

周围都是步兵，衣衫不整，敞着领口，汗水粘住头发。他们走来走去，说话，互相呼喊。他就贴地躺着，在一个放在路边草地上的担架上。大路上挤满了兵，骡子拉着大车，沿着他的身子不停地走过去，刺耳地响着，扬起大片的尘土。两米远以外，路边上，有几个宪兵站着，一个接一个地喝水，在阳光里举起一把军用水壶往嘴里倒。枪架子，一堆堆的背包，沿着大路放着，望不到头。士兵们，一群群的，躺在路旁的斜坡上吸烟，指手划脚地争论。累坏了的人展开肢体，仰天躺着，用手臂遮着脸，在太阳地里睡大觉。旁边沟里有个小兵，很年轻，盘着胳膊躺着，睁大眼睛

望着天，嘴里嚼着一茎草。喝水，喝水……他浑身都痛：嘴，腿，脊背……阵阵寒热传遍全身，抖个不停，不时低沉地呻吟。然而，这时已不象飞机刚失事，被火烧伤以后那样闪电般痛得刺心了。大概是给他料理了一下，给他包扎了伤口。他那昏沉沉的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他的两条腿都被切除了……到了这个时候，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已经截肢这个念头仍然不断纠缠着他。他的腿……他感觉不到腿了……他想知道……他被布带子绑在担架上。他终于抬了抬脖子，看了一眼鲜血淋漓的两只手，裤腿已经截去大半截，两条腿露了出来。腿还在，完整的……有知觉？两腿包了绷带，从膝盖到踝骨上着夹板，夹板一定是从装东西的旧木箱上拆下来的，因为一块板子上还清清楚楚地带着黑字：易碎物品……他筋疲力尽，头又倒了下去。

人声，周围都是人声……男人，当兵的……战争……士兵们在聊天：“一个龙骑兵告诉我，我们团在那边集合……”“就跟着队伍走吧，到了宿营地，你们就看见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谁知道这些地名呢？反正是那边……你们呢？”“我们也一样。你知道吗，我们从星期五就见过不少了！”“唉，我们啊！”“我的老兄，干脆一句话，从七号星期五开始攻击——已经有三天了，是吧？我们统共还没有睡上六个钟头，对不对，马亚？一点填肚子的东西都没有，直到星期六晚上，才分配了一点东西。自从开拔以来，乱七八糟，什么给养，屁！要不是到小村子里去，想了点办法……”远处，传来怒冲冲的声音：“我告诉你，还不算完！”“可是，我对你说，咱们都累坏了，对不对，夏博？累垮了！再发动进攻的话，非完蛋不可！……”

最痛的大概就是嘴上的伤口了，不能咽唾沫，不能说话，不能喝水，连呼吸都困难。他小心翼翼地动动舌头。喉咙里面留

着一股汽油和烧焦了的油漆味……

“再说，你们是每天夜里都在外面睡，保持警戒……我们营到达卡尔巴什的时候……”

对，正是舌头受了伤，肿起来，撕裂了，露出来了。大概是一块金属碎片打中了他的脸，或者就是坠落时，把下巴压碎了。然而，痛的地方在嘴里头。他的脑子在活动，他又想：“是牙齿把舌头咬断了。”但是，这样集中精力使他累坏了，他又合上眼皮，昏昏沉沉。在闭着的眼睛前面，好象有火苗在跳舞。腿上一阵阵的疼痛。他轻轻地呻吟着，又一下子昏迷了过去……一切都忘记了……

“到处都是烧伤……腿成了肉酱……是个间谍……”

他又睁开眼，看见的还是军靴，绑腿。

几个宪兵走到担架旁边，他们周围又围上一群人。“那飞机好像是……”“德国的单翼机吗？布里加看见了……”“布里卡？”“布，我说的是布里加，五连的士官长！”“他们那德国飞机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剩下！”“至少还有一个人！”“这个‘易碎物品’还算有运气……虽然腿这样，说不定还能活下去……”这个声音雅克并不陌生。他转过头去。那个一面仔细看他一面说话的那个人，就是象乡村神父的那个年老的宪兵，淡灰色的眼睛，光秃的额头，就是刚才喂他水喝的。另一个宪兵说：“算了！队长，您听见了吗？马尔汝拉说这‘易碎物品’还能活，活不了多长的时间！”这是个面色棕黑的矮个子，长得很壮实，一张科西嘉人的脸，眼睛红得象火炭。宪兵队长冷笑一声：“活不了多长的时间！哼！保里说得对，活不了多久了！”宪兵队长是个大个子，袖子上缝着新袖章，长着一部很浓的黑胡子，只露出来两块肉红色的颧颊。一个兵问道：“那么，为什么不把他当场报销掉呢？”宪兵队长没有

回答。“你们就这样抬着他走远路？”“我们得把他送到军部去。”那个科西嘉人解释。宪兵队长不高兴地把头转过去，用教训的口气喃喃地说：“我们等命令！”一个步兵中士，是加伏罗什^①式的人物，哈哈大笑起来：“跟我们一样，我们等命令等了两天了！”“我们还等饭吃！”“真是一塌糊涂！”“连个联络员都没有，我觉得……上校……”一声吹哨子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拆散枪架！纵队前进！”“背起背包！站起来，到那边去，背起背包！”

雅克周围嚷成一片，乱成一团，纵队又继续前进。他好象掉进了漆黑的大窟窿，水在小船四周拍击，一个大浪把小船冲起来，摇荡着它，任意冲击着它……“向右靠！”“怎么了？”“向右！”他被摇晃得睁开了眼睛，只能看见抬着担架的前面那个宪兵的脊背。

纵队波动起来，人流绕过一匹死骡子，骡子的肚子胀得很大，蹄子朝上跷着，被扔在道边，臭味熏得人直呸口水，还要轰走扑过来往脸上直粘的苍蝇。接着，人们踉踉跄跄，重新整起队伍。带钉子的鞋底踏着石子路，又发出擦鞋的声音。

几点钟了？太阳直射下来，烧着他的脸。他难受。也许有十点或十一点吧？要把他抬到哪里去呢？尘土使他连几米以外都看不见。左面，在呛人的烟雾里面，这个团的军车一辆接一辆地缓缓驶去。大路在冒烟，发出马粪、湿羊毛、皮革和人的汗臭味。他难受。特别难受的是没有力气。没有力气思考，没有力气从麻木中挣扎出来。尘土呛着嗓子，发烧口渴，牙床都烧干了，舌头上冒着血。他被淹没在无穷无尽的脚步声中，军队前进的喧闹声中，他独自一个，被淹没了，跟生，跟死，跟一切都割断了联

^① 加伏罗什，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人物，是巴黎街头的流浪儿。

系……他长久地失去知觉，或是作着恶梦，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在不多的清醒的时刻，他就不断地重复着：“要振作……要振作……”有时候，担架旁边走的人非常挤，他就只能看到士兵们的上身在摆动，看见枪口，看见他头顶之上天空之下的大气在抖动。他好象在一个波涛翻滚的向前拥去的森林中央，迟钝的目光固执地凝视着一个晃来晃去、鼓鼓囊囊的背包，盯着一个挂在包着蓝布套军用水壶上的发亮的水杯。有很多士兵放松了背包上的皮带，让这沉重的负担牵拉到腰上。他们拱着肩膀，满脸是尘土和汗水。有时，他发现有人向他看一眼，目光里有一种失去了中心的又专注又漠然的表情，模糊暧昧，使人看了心慌意乱，头晕目眩……他们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摩肩接踵，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说。他们步履蹒跚，但紧紧跟着撤退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顾全他们的性命。他们的力气在大路上耗尽，就象被磨子磨碎了一样。右面，有个精瘦的大个子士兵，瘦得好象纪念章的侧面像，戴着护士的臂章，昂着头，步伐庄重地向前走，沉默着，象是在祈祷。担架左面，有个小个子，一瘸一拐，小心翼翼地迈起步子。雅克凝滞的目光盯着这条瘸腿，它总拖在后面，每走一步，膝盖就软一下。有时候，队伍乱起来，距离拉开了，雅克就可以看到树木、篱笆、草场和整个沐浴在阳光里的乡村……怎么可能呢？忽然，在大路边上，出现了一个农家的院落，柴泥的谷仓，灰房子上的百叶窗都关着，粪堆上，几只母鸡在啄食，热烘烘的粪臭味一直传过来……他浑身麻木，任凭别人把担架摇晃着，几乎总闭着眼睛。腿……嘴巴……但愿有人想到给他喝水……队伍不时突然停下来，停过之后，气喘吁吁的士兵就不得不跑步赶上，不让大车趁这个空档插到队伍里来。“瞧这样子，真糟糕！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挤到一条路上！”“我的老兄，到处都一样！每

条路上都有车队。你想想，整师人都在撤退！”“师？好象是整个第七兵团！”

“喂，你上哪儿去？”“你疯了吗？”“喂！本土保卫兵！”一个步兵逆着纵队的方向，斜着穿过大路，向东走，向敌人那面走……别人叫他，他不理，他钻到大车和士兵们的人群中间去了。这人已经不年轻，胡须灰白，并不完全是尘土的缘故。他没有拿武器，也没有带背包。农家的棕色天鹅绒长裤上套了一件褪了色的军大衣。腰里吊着一大串碰来碰去的东西：子弹带，水壶，干粮袋。“哎，老爷子，你到哪儿去？”那人却躲开伸出来的手臂。他脸上露着惊慌，目光固执，粗犷，嘴唇一动一动的，好象在跟一个妖魔鬼怪低声争论。“你回家去吗，老头儿？”“祝你好运气！”“你给我写几张明信片吧！”那人不回头，也不答话，一直往前走，爬上石头堆，跨过壕沟，拨开灌木丛，顺着牧场的边，不见了。

“快看，船！”“在大路上吗？”“什么事？”“一个架桥兵连队在撤退哩！”“他们把纵队切断了。”“什么地方？”“真的，快看，带轮子的船，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嘿，约瑟，现在得相信，这一次，我们不过莱茵河了！”“往前走！”“走哇！”纵队乱了一会儿，又走起来。

走了一百来米，又停住了。“又怎么啦？”这一次，停了很久。公路穿过一条铁道，铁路上见不到尾的空车皮由一辆烧足了火，喷着汽的火车头拉着，喷着气慢慢向前走。宪兵们把担架放在土路上。“咱们得说事情不好，队长，他们把物资往后方运哩！”马尔汝拉说着，微微一笑。宪兵队长看着火车，擦擦脸，没有作声。小个子科西嘉人嘲笑他说：“啧，队长，自从撤退以来，马尔汝拉特别高兴！”还有一个宪兵是一个脖子象公牛的壮汉，坐在一堆石头上，啃着一小块面包。他说：“马尔汝拉打仗不太内行。前

天，见到德国枪骑兵的时候……”马尔汝拉的脸红了。他的鼻子肥厚，灰色的眼睛很大，灵活的眼光有些忧郁，但还坚定，前额显得固执，长着一张会算计的农民的脸。他对默默看着他的队长说：“我说这话并不害臊，队长。打仗一点也不对我的劲，我不是科西嘉人，从来不爱打架。”

队长根本没有听他说话，他已经把头转到右边去了。在火车的声音里又出现了咚咚声，象在打鼓。原来是一队骑兵沿着公路跑过来。“巡逻队？”“不是，是参谋部的人。”“也许有命令了？”“站开一点，老天爷！”这队骑兵里有一个骑兵上尉，后面跟着两个士官和几个兵。马在车辆和步兵中间穿过去，绕过担架，越过公路，在路的另一边又聚在一起，直向西边的田野跑去。“这些人真运气！”“你想想，骑兵师好象是奉命在我们后面破坏交通线，防止他们向我们袭击！”

在担架周围，士兵们争论着，他们在敞开扣子的外衣里面，流着汗的胸脯上，都有一块证明身份的牌子，挂在一根黑带子上，这是留着给每个尸体写登记号的。他们有多大岁数呢？一个个面容憔悴，肮脏，一律显得苍老。“你还有一点水吗？”“没有，一滴都没有了！”“我告诉你，我们七号晚上看见了一条齐柏林飞船，在树林上面飞……”“我们并不是撤退？不是？那么，你要干什么呢？”“不是撤退，旅部的联络员听参谋部的一个军官对老头子说的，我们不是撤退！”“你们听听，他说我们不是撤退！”“不是撤退，这是人们所说的战略转移，为了更好地准备反攻……要来一手漂亮的……给他们一个钳形攻势。”“什么攻势？”“钳形攻势！你问问军士，你知道什么叫钳形攻势吗？我们让他们打到腹地，你懂吗？然后，咔一下，把钳子合上，他们一个也跑不了！”“一架德国飞机！”“在哪儿？”“那边！”“哪儿？”

“就在磨房上空。”“德国飞机!”“向前走!”“军士,德国飞机!”“向前进!现在,过货车了……这是列车的尾巴。”“你怎么看出来这是德国的飞机?”“怎么看不出,有人在朝它开枪,你看!”在天空的小亮点周围,出现了几个小小的絮片,变成球儿,过了一会儿,才被风吹散。“整队,向前进!”最后几节车厢慢慢从铁轨上滑过,道口又通了。

人们挤着往前涌……啊,摇晃得厉害……挺住!……挺住!……清醒了一忽儿,雅克听到前面抬担架的宪兵在他头顶上喘气。接着,觉得天旋地转,头晕目眩,恶心得要命。挺住!……五颜六色的士兵的队伍打着旋儿走过,就象公园里的木马一般,红红绿绿的搅成一团。他发出一声呻吟。梅奈斯泰勒那筋脉突起的手,纤细的手烧黑了,眼看着蜷缩起来,变成了一个烧焦的鸡爪子……那些传单!都烧毁了,完蛋了……死吧……死吧……

一辆汽车在按喇叭。扬起一阵尘土。纵队停在一个市镇的镇口。那汽车响着喇叭,从后面开过来。人们挤到路边,给汽车让路。宪兵队长立正敬礼。这是一辆敞篷汽车,插着一面小旗,里面坐满了军官。最里面,可以看见一顶金边的将军帽。雅克又闭上眼睛,脑子里又出现了军事法庭的幻象。他在大厅中间站着,就面对着这个戴金边军帽的将军……是费斯姆先生……喇叭响个不停。一切都混乱了……当他又睁开眼的时候,他看到一段修剪整齐的树篱,几片草地,天竺葵,一座条子布窗帘的别墅……拉菲特庄……在栅栏上面插着一面白底红十字旗。台阶前停着一辆空的救护车,车身上全是枪眼,玻璃都打碎了。纵队向前走,走了几分钟,又停了下来。担架重重地放在地上。这时候,只要停一小会儿,大多数的士兵就不再站着等,干脆在大

路上就地倒下来，荷着枪，挂着背包，就好像愿意死在那儿似的。

离村子还有二百米。宪兵队长说：“好象要在村子里休息。”

一阵忙乱。“开步走！”队伍又走动起来，走了五十米又停下了。

一下撞击。怎么回事？太阳还很高，热得烤人。走了几个钟头？走了几天了？他痛得难受。在他嘴里，流出来的血使唾液也发出腥味，落在骡子身上的那些牛虻和苍蝇也飞过来叮他的下巴和两只手。

村里的一个小男孩，两眼发亮，一边笑一边向围着他的士兵们讲：“就在镇长家的地窖里，他们正对着透气窗……三个……三个给逮住的德国枪骑兵……他们在里面提心吊胆，就跟石貂似的！……听说他们见小孩儿就抓，把手剁掉……有一个人出来撒尿，两个哨兵押着……我们想把他的肠子都掏出来！”宪兵队长把小孩叫过去：“这里有酒吗？”“有。”“好，给你二十个苏，拿一公升酒来！”马尔汝拉不以为然，预言说：“队长，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向前走，上路！”又走了五十来米，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有一小队骑兵下了马休息。右边，有一片低地，围着白色的栅栏——大概是赶集的地方。军士们把步兵连里剩下的人都集合在一起。人群中间，有一个上尉对人们训话，接着，队伍解散了。一座磨房旁边，流动的炊事车正在分菜汤。饭盒子叮当乱响，又争又吵，象一窝蜂似的一片嗡嗡声……那个小男孩又来了，气喘吁吁的，挥动着一个瓶子，笑着说：“来了，给您酒，他们说十四个苏。简直象抢似的。”

雅克又睁开眼睛。酒瓶子，散发着水汽，象是冰镇过的。雅克看着这酒瓶，眨动着眼睛，直盯着这酒瓶……喝……喝……宪兵们都围住队长，队长两手捧住那瓶子，好象要先用手掌品尝品尝

那凉气。他不慌不忙，叉开两腿，稳住腰，举起瓶子在太阳光里照一照，先把嘴清理干净，清了清嗓子，吐了一口痰，然后才把瓶口凑上嘴唇。他喝过了，笑一笑，把瓶子递给资格最老的马尔汝拉。马尔汝拉会想到雅克吗？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喝了，把瓶子递给身边的保里。保里的鼻孔扇动着，就象牲口一样。雅克慢慢低下眼睛，不想再看……

周围又有人声，他把眼睛睁开又合上。几个龙骑兵的士官——就是在近道等着的那一小队里的，趁着纵队停歇的时候来跟步兵们聊天，“我们是轻骑兵旅的，七号那天，跟第七兵团的人一起打过仗……我们本来应该打到坦纳，然后再这样转换方向，顺着莱茵河直插下去，把桥梁都切断。可是，太匆促了，仗没有打好，你明白吗？我们本来想快点跑，可是这些蠢马不卖力气，步兵也太累了……只好撤退。”“真是一塌糊涂！”“那里！这儿，简直不算一回事！我们是从北面来的……唉！公路上不但有军队，还有村子里的老百姓，他们害怕，一齐撤。”一个步兵中士说话了，声调又郑重又热切：“我们是先头部队，我们在天黑之前赶到了阿尔特基希。”“是八号吗？”“是八号，星期六，前天。”“我们也在那儿……步兵干得漂亮，没说的！阿尔特基希驻扎着很多德国佬，单是步兵，上着刺刀，一下子就把他们赶出去了……我们就在夜里追击，一直追到瓦莱姆。”“我们还一直到了塔戈斯海姆哩！”“第二天，我们前面就没有障碍了……一个敌人都没有了，一直到穆尔豪塞……我们还以为要直捣柏林哩！可是，那些德国鬼子，早盘算好了，故意让我们跑到前边。从昨天起，他们就反攻了。上边好象还在睡大觉哩！”“幸亏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要不然，这个时候我们全都躺下啦！”纵队的一个步兵军士和几个中士也都过来听。军士眼睛冒火，颧骨通红，声音很激动：“我们

打了十三个钟头，一连十三个钟头！对不对，罗歇？十三个钟头……德国的枪骑兵就在我们面前，在枞树林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没有办法把他们赶出来，就派我们连从左边去包抄树林。我是普托城里吉梅尔的会计，您想想！……我们匍匐爬行了一公里多，爬了两个钟头或三个钟头，我们以为永远爬不到那个农庄，可是居然到了。农庄的人都在地窖里。女人孩子哭哭啼啼，很可怜……我们把他们锁起来了。他们都是阿尔萨斯人，对，谁也保不准……我们在墙上凿了好多枪眼，爬到三楼，用褥子堵住窗户。我们只有一挺机关枪，子弹却有的是。嘿，我们坚持了一整天，上校以为我们都牺牲了，可是我们居然都回来了。我们干的事简直叫人不相信！……只不过，一听到回营的命令，我跟你打赌，没有等再说第二遍！从树林出发的时候有二百人，离开农庄时只剩下六十，在六十个里头，还足足有二十个受了伤……嘿！说来说去，你信不信？也不那么可怕……不那么吓人，因为你干什么你都稀里糊涂，什么都不知道。不管是当兵的，当官的，谁都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明白。大家躲起来，甚至同伙倒下了，也看不见。有一个人就在我旁边，他的血溅了我一身。他对我说：‘我不行了。’他的声音我好像现在还听得见。我听见他的声音，可是我还没有弄明白那是谁。我那个时候没有功夫去看他。我们跑呀，跑呀，一边嚷，一边开枪，谁也不知道跑到哪儿了。我说的对不对，罗歇？”罗歇气冲冲地，一个个地瞧着跟他说话的人，答道：“首先，我得说清楚，跟我们比起来，德国人根本不算一回事！”一个宪兵喊道：“队长，队伍又出发了！”“是吗？那么，向前进！”骑兵军士们跑回了自己的位置。“靠紧，到那边去，靠紧！”“向前进！”“再见，祝你们运气好！”宪兵队长一面喊一面从龙骑兵面前走过去。

纵队又上路了，没有再停下。他们走进了市镇，密集的人群和踏着步的牲畜挤满了大路，速度减慢了，担架摇得轻了些，震得不那么痛了。雅克看着。房子……他的罪受到头了吗？……

一群群老百姓站在门口。有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女人，有拉着母亲裙子的孩子。大概从天亮起，他们就在那里一连站了好几个钟头，脊背靠在墙上，伸着脖子，面带焦虑，阳光和尘土使他们的目光模糊了。他们在那儿站着，看着满街里走过无尽无休的军车、辎重队、卫生营、炮车和整团整团筋疲力尽的步兵。前几天，他们曾信心十足地看着这支英气勃勃的“掩护部队”开到边境去，现在却溃不成军，败退下来，把他们留给侵略者去蹂躏……城里满是尘土，太阳底下烟气腾腾，好象拆房子的工地。大街小巷，院子里，一片嗡嗡声，象打翻了的蜂箱一样。兵士们涌进店铺，把剩下的面包、熟肉和酒抢夺一空。教堂前的广场上也挤满了人，停满了车。几个龙骑兵拉着马缰绳，站在广场右边，那里有一点阴凉。一个指挥官，满面通红，怒气冲冲地从马脖子上弯下腰，正在责骂一个穿着轻歌剧服装的年老的村镇警察。教堂的两扇正门大开。半明半暗的正殿里铺着草垫子，上面躺着很多伤兵，周围有女人、护士和穿白罩衣的医官们忙来忙去。外面，大太阳晒着的一辆大车上，一个司务长在乱糟糟的声音中喊：“五连，分饭！……”队伍走得越来越慢。教堂后面，大街变窄了，成了一条小巷。队伍拥挤在一起，人们一面咒骂，一面原地踏步。一个老头儿，坐在家门口一张垫着几个枕头的靠椅上，两手扶着膝盖，好象在看戏。他顺便叫住了宪兵队长：“你们还要这样撤很远吗？”“不知道，我们等命令。”那老头儿用明净得象水似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担架和那些宪兵，不赞成似的摇摇头说：“这些事，我在一八七〇年全都亲眼见过，不过，那时候，我们支

持的时间还更长些……”

雅克遇到那老头儿怜悯的目光，觉得很舒服……

部队又往前走，穿过市镇中心。宪兵队长刚才去问了一下宪兵中尉，回来说：“大概是要在最后一排房子那里休息。”马尔汝拉说：“这样更好，下次出发我们最先走。”石子路走完了，街道又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公路，两旁没有人行道，只有几座矮房子和小花园。“立定！让车辆过去！”军用车还继续前进。宪兵队长说：“你们几个去看看炊事车也许没有跟上来……大家都饿了……我跟保里留下，因为有这个‘易碎物品’……”

担架放在路旁，靠近一个水槽，各兵种的士兵都来这儿灌水壶。水被搅动了，从边栏沿上漫出来，流成小沟……雅克一直盯着这流出的清水。他嘴里有一股难闻的铁味，唾沫变得象一团湿棉花……“你要喝点东西吗，孩子？”真是奇迹！一位农家老太太，两手捧着一个发亮的大白碗，围上来一群人，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皮色棕黑的老人，孩子，女人。碗凑近雅克的嘴唇。他哆嗦起来，象狗似的用眼睛表示感谢。牛奶……他一口一口地喝，很痛，那老太太用围裙角给他轻轻擦下巴。

一个戴着三条饰带的军医走过来，问道：“伤员吗？”“对，医官先生。没意思……是个间谍……德国人……”农家的老妇象弹簧似的一挺身，一下子把碗里剩的奶都泼到地上。“间谍……德国鬼子……”人群中传着这样的话。在雅克周围，敌意的、满含威胁的圈子越来越紧了。他孤零零的，被捆着，不能自卫。他转过眼去。脸上的烧伤痛得他直抖。有人在冷笑。他看到头顶上有个小学徒的上身，穿着蓝色工装。那孩子不怀好意地笑着，两个指头捏着一个烧着的烟屁股。“不要动他！”宪兵队长喝了一声。“反正他是个间谍！”那孩子反驳说。“一个间谍！快来看！

一个间谍……”人们从附近的房子里跑出来，仇恨的人群越挤越紧，宪兵很难把他们赶开。“他干什么了？”“什么地方逮住的？”“为什么不把他干掉？”一个孩子捡起一把小石子，扔了过来，别的孩子也学这个样。宪兵队长恼了，喊道：“行了，不要胡闹，他妈的！”他对保里说：“把他抬到院子里去，把院门关上！”

雅克觉得被人抬起来，抬走了。他闭上眼睛。辱骂和冷笑都远去了。

寂静……这是在什么地方？他壮起胆看一看。他们把他抬到一个农庄的院子里，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在一个棚子的阴影底下，那儿发出热烘烘的饲草气味。在他身旁，有一辆破旧的马车，两条断肢似的车辕高高地翘起，上面栖着几只母鸡在打盹。静悄悄的阴凉……一个人都没有……死在这里吧……

宪兵们闯进来，突然惊醒了他，母鸡吓得咯咯叫，扑着翅膀逃开了。

发生了什么事？四面八方都在喊叫，马在奔跑，乱成一团。宪兵队长慌忙穿上上衣，他那套笨重的装备。“喂，把‘易碎物品’抬过来……快点！……”院子另一边的小巷里，开过去一串救护车。“队长，他们连救护站都撤了。”“我知道。马尔汝拉在哪儿？快点，保里……现在又是什么队伍，是工兵吗？”两辆小卡车开进院子，后面跟着一小股兵。人们慌慌忙忙从车上卸下木桩和成卷的铁丝。“铁蒺藜装在这个角落里……别的装在那边……快！”宪兵队长心慌意乱，去问那监督干活的中士：“已经这么糟了吗？”“可不是！……我们来修工事……听说他们已经占领了孚日地区……直扑贝尔福……听说有人议论要投降，避免被占领……”“不是开玩笑吧？这么说，我们完蛋了？”“完蛋以前，你

们这些人还是逃命吧……我们来疏散居民，一个钟头以后，全村人就得撤光……”宪兵队长转身对宪兵们喊道：“‘易碎物品’呢？该谁抬了？马尔汝拉，没有时间磨蹭了，快点！”院子里又响起马达声。小卡车卸完了货，调转了车头。上尉高声喊着，压过了众人的嘈杂声：“把所有能找到的犁杖，钉耙，还有割草机，都集中到这里来。去告诉中尉，不许老百姓把大车带走，我们设路障的时候要用……”宪兵队长叫道：“喂，马尔汝拉！”“好啦，队长……”

四条胳膊提起了担架。雅克呻吟起来。宪兵们很快回到大路上，队伍已经集合好，出发了。队列密集，抬着担架插进去很不容易。“挤呀！无论如何得挤出咱们的地方来！”保里低声嘟囔：“算了！我们总不能抬着这个小子走它好几天吧！”

摇晃……摇晃……全身又痛起来了……

村子已乱成一团。农家的院子里，只听见喊声叫声，呼天抢地。农民们慌忙套车，女人们把箱笼包袱、摇篮、干粮筐子往车上乱堆。很多家的人夹在军队中间，徒步逃难，推着小车或小孩车，上面装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大路左边，由佩尔什马拉着的一辆辆弹药车和辎重车，快步跑过，发出轰隆隆的可怕的响声。每条小巷里都走着马拉的、驴拉的车，上面堆着家具、箱子和被褥，老太太和小孩坐在上面。老百姓的车溜进了军车的行列，占据了整个路面，步兵都被挤到马路右边去了，有的在路边，有的在沟里，能在哪儿走就在哪儿走。骄阳似火，人们弯腰曲背，军帽掀在后脑勺，脖子上放着块手帕，象牲口一样驮着东西，有的人肩膀上还扛着一捆干柴。他们走着，步伐急促而沉重，一声不响。有人掉了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到哪儿去。这又有什么关系！打仗打了八天了，他们早就不想再清醒了！他们

只知道“撤退”，跟着走……疲劳、恐怖、羞辱和能够逃出来的满足心情，使他们一个个的脸上都露出野性。他们彼此不认识，也不互相说话，撞到一起的时候，就对骂一声，或者说句发脾气的话。

随着担架的摇晃，雅克睁开眼睛又闭上，在棚子的阴影底下休息了一会儿之后，腿上痛得轻一点，但是，又肿又烫的嘴却继续阵阵作痛。在他周围，人的身体和枪支在摇晃，尘土飞扬，再加上人的汗臭，使他透不过气来。这人体的波涛冲得他摇来摇去，空空的胃就象晕船一样恶心起来。他不愿想什么。他是人所共弃的东西，自己也唾弃自己了……

队伍还在走。在两个斜坡之间，路面窄了。人们时而堵塞住，停下来。每一次担架放下来，都重重地碰着地，每一次雅克都睁开眼，呻吟一声。小个子科西嘉人说：“该死！队长，照这个速度走，德国人不用费劲就……”宪兵队长恼火地喊：“走吧！你们看别人又向前走了。”队伍又动起来，好好歹歹走了五十来米，又停下了。公路横穿过一条土路，宪兵们停在交叉路口上，有一连步兵，扛着枪，聚在一起。军官们站在土坡上，围着一个上尉，一边看地图，一边商议。一个军士好奇地走到担架旁边，宪兵队长问他：“你们到哪里去？”“我也不知道，上尉在等命令。”“情况不妙，是吗？”“对，据说在北面已经发现了德国的枪骑兵……”一个军官走到土坡边上，喊道：“持枪，成四路纵队，跟我走！”他从右边绕过拥挤的公路，领着他的那队人从路旁的草地上穿过去。“队长，这个人不错，他一定比我们先到宿营地。”队长咬着胡髭，没有说话。

大家都停着，好象整个的部队都挤得动弹不得，连左面的炮队也动不了。一群骑自行车的士兵，推着车，想从车辆中间穿过去，也陷在中间走不出去了。

过了二十分钟，队伍前进了不到十米。右面，一队步兵离开大路走进田野向西走去。宪兵队长灵机一动，向他的人打了一个招呼。几个脑袋凑在担架上面，悄悄地商议起来。“他妈的，我们总不能整天待在这里，浪费时间……如果非让我们走大路的话，就让队伍赶快走嘛！……我有特殊任务，对不对？今晚得把这个小子交给军团的宪兵大队……一切责任由我来负好了，跟我走！”宪兵们毫不迟疑，立刻执行命令，他们挤开周围的士兵，抬起担架，越过濠沟，爬上土坡，从田野里走过去，把大路和挤不动的车辆丢在身后。

跳濠沟、爬土坡的时候，雅克发出嘶哑的、长久的呻吟。他转过脖子，想张开肿胀的嘴……一下摇晃……又一下……天空，树木都晃起来……飞机在燃烧，他的两只脚象火把一样冒着火苗……死亡，痛苦的死亡，抓住他的脚、腿，一直爬到心口上……他昏了过去。

突然撞击了一下，他又恢复了意识。到哪儿了？担架放在草地上。走了多久了？他觉得好象已经撤退了好几天……光线变了，太阳低了，白日将尽……死吧……象吃了麻醉药似的，痛得麻木了。他好象被深深埋在地下。撞击，声音，人语，都似乎来自远方，减弱了。他睡着了吗？是在做梦吗？他仿佛看到了一丛洋槐树，底下有只白色的山羊在吃草，又看到一片泥泞的草场，宪兵们的靴子踩下去，泥水四溅……他睁大了眼睛想看个清楚。马尔汝拉，保里和宪兵队长一条腿跪着，前面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大块东西在动：原来是一连步兵躺在地上。背包一个挨一个摆了一大层，在草地上发着抖。

一个上尉站在士兵后面，用望远镜看着地平线。左面，有一个土坎，一面草坡，草坡上有一营人躺成一个扇面形，露出军装

上红的蓝的颜色，好象在绿桌布上玩的纸牌……

“我们等什么呢，队长？”“等命令。”马尔汝拉说：“要跑的话，我们抬着这个‘易碎物品’，可怎么跟得上？”

上尉走到宪兵队长身旁，把望远镜借给他用。忽然，从右面，传来马蹄的声音，这是一个骑兵排，领头的是一个龙骑兵士官。他直挺挺地立在马镫上，头发在风中飘动。那士官在上尉身旁停下。他的脸象个孩子，又激动又愉快，戴着手套的手向右一指，叫道：“他们就在那边……小山后面……三公里……现在，增援部队大概已经打响了！”

他的声音很大。雅克瞧见了，麻木的脑子里忽然想起戴着帽子的但以理……

金属的撞击声在空中振荡。最后一列士兵听到这话，不等命令，就上了刺刀，其他的士兵也纷纷学样，刹时间，好象土地里突然冒出一片寒光闪闪的草。大家都扬起头，所有的眼睛都看着那不祥的“小山”，而在那边，天空金光灿灿，十分平静，十分纯净……军马正踏着肥美的青草，骑兵士官一声口令，骑兵们都集合起来，驱马跑走了。上尉喊道：“告诉他们，给我们送来命令！”又转身对宪兵队长说：“您看到了！我们左边没有联系！右边也没有！这样乱七八糟，他们想叫我们干什么呢？”他跑去找他自己的人去了。马尔汝拉结结巴巴地说：“不能留在这里，队长，您看……”保里说：“嘿，他们那边动起来了！”果然，散在草地上的那一营人，一列接着一列地爬上山顶，又一列接一列地消失在山坡那一面了。“前进！”上尉大喊。宪兵队长说：“我们也往前走！”

担架又抬起来，摇晃着。雅克呻吟，谁也没有听，谁也没有听见。唉！但愿他们把他放在这儿……由他死在这里……他闭

上眼睛。哎，担架又撞在地上……每走五十米，担架就重重地落在草地上，宪兵们跪下来，喘着气休息一分钟，然后再走。士兵们在他们两旁跑，一个个爬上山坡。宪兵们终于到了离山顶几米远的地方。上尉正在这里。他对大家解释：“在那面，山谷底下，大概有一个树林，还有一条路……我们可以在树林底下向西南走。要快……过山顶时太显眼！……”该最后一批步兵过山了。“前进！”“跟上！”宪兵队长也喊。担架又一次从地上抬起来，到了山顶。一块草地，间或有些灌木，一直伸展到林木茂密的山口，山口那一面就是树林，一直绵延到天边。“只要一直冲下去就是了，走最近的路，前进！”突然，一声呼啸撕裂了空气，刺耳的声音打着旋儿，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担架又一次重重地摔在草地上。宪兵们夹在步兵中间，卧倒在地，每个人都只考虑，紧贴在地球上，钻到土里去，就象落潮的时候簍鱼钻到沙子去似的。前面，壕沟另一面的树林里，发出一声低沉而猛烈的爆炸声。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恐怖的表情。“我们被钉上了！”“往前走哇！”“进了他们的树林，我们会被打死的！”“到沟里去！到沟里去！”人们跃身跳起，在山坡上跑起来，利用每一个小灌木丛和地上的坡坡坎坎作掩护，卧倒在地上，立刻跳起来又跑。宪兵们跟着大家，把担架摇得几乎要散了。他们终于跑到了树林边上。雅克已经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下山的时候，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两条断腿上，带子勒进了他的胳膊、他的大腿。他失去了知觉。当担架象个炮弹似的钻进了枞树林的边沿时，树枝打着他，扎着他，磨掉他脸上、手上的皮肉，他才睁了睁眼睛。接着，一切突然沉静下来，他觉得生命逐渐流失，就象血逐渐流尽一样，一股温热，发着腥味……昏迷……仿佛落入了空洞的深渊……飞机，传单……

火箭的呼啸声越来越高，越来越近，过去了……雅克睁开眼睛，又合上……嗡嗡的人声，……树荫，动弹不得……

担架放在林子里，铺满枞树针叶的地上。周围一片骚乱，分辨不清……人的身子紧紧靠在一起，好象粘成了密密实实的一大块。步兵们站着，各种装备压得他们耸肩缩颈，枪支和钩住树枝的背包使他们无法动弹，他们在原地踏着脚，进退不得。“不要推！”“还等什么？”“已经派出巡逻队了。”“得看看树林里是不是安全！”军官们和士官们费尽力气也不能把人集合起来。“安静！”“六连跟我来！”“二连！……”担架旁边有一个士兵，靠在一棵枞树上，一下子就睡着了，就好象死了一样。这人还很年轻，两颊下陷，面色灰白，僵硬的手下意识地把枪紧紧靠在腰上，好象要举枪致敬似的。“听说第三营到侧卫去掩护了……”“从这儿走……孩子们！从这儿走！”到树林里来的是个下士，是个又矮又胖的农民。身后带着他的那一班人，好象母鸡带着一群鸡雏似的。

一个中尉从担架上迈过去，模样又骄横又怯懦，俨若一位无法应付局面的首长，准备不顾一切维持他的尊严。“士官们，叫他们安静，你们他娘的要不要服从命令？第一排！集合！”士兵们满脸不乐意，但是还挪动了一下。他们就是想找到他们的官长，找到他们的同伴，好让自己重新感到还有人管他们，统率他们。有人笑了起来，看到这一片四周都有灌木林的地方，傻呵呵地以为有了保障，以为战争留在林界以外的开阔地了。时而有个联络官，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怒容满面，要找的人永远找不到，一面咒骂着，一面挤过去，恶狠狠地叫着第几团的番号或上校的名字，然后从树丛和人群之间消失了……又有炮弹的呼啸声，更响亮，更尖利，从树梢上掠过。突然一阵安静，肩膀都缩起

来，脖子压到背包上。这次，炮弹在右面爆炸了……“这是七五炮！”“不，是七七的！……”宪兵们围住担架，好象围住他们生存的支柱一样。他们组成了一个固定的孤岛，被周围的人潮拍击着。

树林边上，忽然有人大声喊：“高度一千八百米！……目标山顶……黑色的小树丛……听我的命令！开火！……”一阵连射振动了空气。树林里大家都安静下来。又有一阵连射，接着，接二连三响起了枪声，越来越密。所有在树林边上的人都转过身来向着草地，不等命令，胡乱举起枪来向树林外面射击，只要有事干就好。那个刚才靠着树睡觉的年轻士兵，现在跪在担架脚下，把枪架在树杈上，专心致志地不断放枪。每放一枪，雅克都好象挨了一鞭子，但是，他已经没有力气睁开眼睛了。

忽然，从右边传来一阵马蹄声……几个骑兵军官，其中有两个少校一个上校，冲进树林里来，把树枝踩得乒乓直响。一个人高声大嚷，压过了枪声：“谁发的命令？你们疯了？你们向什么开枪？你们要我们整个旅都暴露目标？”军士们也在四面八方喊起来：“停止射击，集合！”混乱忽然停止。这些挤在一起，永远乱成一团不能自拔的人们，这时居然顺从着集体的力量，恢复了秩序，朝着一个方向转过身去。他们慌慌忙忙，磕磕碰碰，你推我挤，却不说一句话。不多功夫，这群人就象飞翔的候鸟一样，跟在那些军官身后，慢慢向南走去。行军锅，水杯，饭盒叮当乱响，伴随着军靴踩在松软土地上的脚步声，树林里象走过一群牲口。含着松脂的尘土飞起来，在枞树间凝成一团红褐色的烟雾。

“我们怎么办，队长？”宪兵队长早打定了主意：“我们，跟着走！”“抬着‘易碎物品’？”“那当然！来呀！跟着我，前进！”他没有再等，好象打冲锋一样，马上走到人流里去，后面紧跟着两个

空手的宪兵。另外两个赶快去抬雅克。“你好了吗，马尔汝拉？”保里喘着气问。他想插到队伍里去，但是，人挤得太密，他每次尝试，担架都被无情地推了回来。马尔汝拉说：“得等人稀一点。”那科西嘉人猛的一下放下了担架腿，说：“妈的，那么，我去赶队长，叫他等我们一下……”老宪兵赶紧喊道：“哎，保里，不要把我丢在这里呀！”他也把担架松开，但保里早走远听不见了，他象一条鳗鱼一样灵活地钻进人群，蓝色的军帽和晒黑的短脖子立刻就看不见了。“他妈的！”马尔汝拉说着，他就好象刚才给雅克喝水那样，俯下身来，眼里冒出怒火：“你可让我们吃苦头了，混蛋！”可是雅克没有听见，他早已失去了知觉。

这个宪兵离开担架，抓住一个步兵的肩章：“帮我抬一下！”“我不是抬担架的。”那人一下子甩开了。宪兵又对一个面貌和善的金黄头发的大个子说：“来帮我一把，老兄！”“你想得倒美！”马尔汝拉拿出手帕，下意识地擦擦脸，自言自语地说：“把这小子怎么办呢？”

一会儿，人群不那么挤了，如果保里回来的话，他们俩肯定能往前走。“上尉先生！”马尔汝拉啜囁着叫了一声。一个军官走过，牵着一匹马，他连头都没有转过来，一直看着前面……现在走过的人都是掉队的，他们慌慌忙忙，不成队形，低着头，筋疲力尽，拖着沉重的腿，直怕赶不上队伍。用不着去问，没有一个人愿意再拖上担架这么个累赘……

突然，草地的那边传来人声，好象有人急急忙忙往这面跑……马尔汝拉转过身去，脸都吓白了，他本能地打开手枪皮套，捏住枪柄。不，是法国人讲话：“从这边走，从这边走……”一个伤兵从枞树林里钻出来，象梦游者似的，跑着，额头上扎着绷带，脸上流着血，身后跟着十来个步兵，一齐跑进了这个矮树林。

他们都没有背包，没有武器，都是些轻伤号，有的吊着一只胳膊，有的手上或是膝盖上裹着纱布。“喂，老兄，是从这里走吗？从这里能出去吗？……你知道，德国人不远了。”“不……不远了？”马尔汝拉结结巴巴地问。

树枝又分开了，一个医官倒退着走进来，给两个护士开路，两个护士手拉着手，抬着一个大胖子。胖子头上没有军帽，脸白得象死尸，眼睛紧闭，军官制服敞开着，袖章上四道杠，肚子在沾满血迹的衬衫底下凸着。“轻轻的……轻轻的……”那医官瞥见了宪兵和脚下躺着的雅克，猛地转过身来说：“一个担架！怎么回事？是老百姓还是伤兵？”马尔汝拉立正，含糊地说：“一个间谍，医官先生……”“一个间谍？就缺这号人啦！……要用担架抬少校……赶快！”

那宪兵很驯服地开始解绳子和带子，雅克哆嗦一下，一只手动了动，睁开眼睛……医官的军帽，是安托万吗？……他作出超人的努力，想把这一切弄明白，想回忆……他们要把他放开，给他水喝……可是，他们要干什么？担架抬起来了！哎哟！……不要这么重！腿痛！……痛得厉害：虽然绑着夹板，折断的胫骨还是插进肉里去，火一样烫的骨尖直搅进他的骨髓……没有一个人看到他的嘴痛得咧开来，眼睛也恐惧地睁大了……他嘶哑地呻吟着，软绵绵地被人扔在担架外面，就象把独轮车上的货倒空似的。突然觉得一阵冰凉，从腿上开始，爬上来，一直爬到心头，慢得使人难以忍受……

那宪兵一点也没有反抗，只是恐怖地看着周围。医官看着地图，两个护士慌忙把双眼紧闭的少校安置在担架上，少校的衬衫全都染红了。马尔汝拉结结巴巴地问一句：“他们不远的吗，医官先生？”突然，一声尖锐的呼啸，划破了空气，紧接着附近一

声爆炸，把脑浆都振得在颅腔里跳起来。几乎同时，从草场上传来劈啪不断的射击声。

军医大叫：“前进，我们要被夹在两边射击中间了……待在这儿就完了！”

爆炸的时候，马尔汝拉也象别人一样伏在地上，费了很大的劲才爬起来。他眼看着别人把担架抬走了，那队伤兵也钻进了树林。他怒冲冲地叫一声：“我怎么办？还有这个‘易碎物品’哩！……”那个臂上绑着绷带的老士官走在最后，转了一下身，连脚步都没有停。马尔汝拉又恳求地说：“我怎么办？你不要走哇……我把这个小子怎么办呢？”那士官是二次服役的，是个面色黝黑的殖民军退伍兵，他用那只没有带伤的手拢住嘴，喊道：“窝囊废！你那个间谍，给他报销得了。傻瓜！要是你不愿意象耗子一样被抓住，你就赶快跑吧！”

宪兵骂道：“真见鬼！”

现在，只剩他一人了，还有那个侧身躺着，双眼紧闭，死尸一样的活人。周围一片静穆，有些反常……“不远了……”“报销了吧……”他眼里满是恐惧，把手插进手枪套子里……眼睛眨巴几下。害怕被敌人俘虏，又害怕亲手杀人。他从来没有杀过人，连只牲口都没有宰过……这个时候，只要病人的眼睛再睁一下，只要马尔汝拉再瞧见一下活人的目光，也许……可是，在这从侧面看去的苍白脸上，生命仿佛早已飞逝。太阳穴就在那儿摆着，平平的……马尔汝拉不再看了。他紧闭住眼，咬住牙，把手臂伸出去。枪口触到了一件东西。是头发还是耳朵？……为了给自己壮胆——也为了证明自己干得对，他咬住牙，喊道：

“混蛋！”

喊声和枪声同时发出。

自由了！那宪兵直起腰来，头也不回，一下子窜进树林里。树枝打着他的脸，靴子踩响了枯枝。在矮树丛之间，撤退的队伍踩出了一条路。伙伴们不远了……得救了！他跑着，离开了危险，离开了孤独，离开了他杀死的那个人……他屏住气，好跑得更快。每次朝前猛冲，为了发泄他的怨气，镇住他的恐惧，他都咬着牙，不断地说：

“混蛋！……混蛋！……混蛋！……”

第 八 部

尾 声

“彼埃雷，你没有听到电话铃？”

上午的这个时候，大夫和病人都忙着看病，一楼没有人。秘书处的传令兵利用这个功夫靠在阳台的栏杆上，嗅着茉莉花的香味。他赶快扔掉香烟，跑去摘下耳机。

“喂！”

“喂，这里是格拉斯电话局，有一份给穆斯吉埃病院的电报。”

“等一会儿……”传令兵说着，把便条本和铅笔拉到跟前。
“我听着！”

办事员已经开始念电报了：

“巴黎，一九一八年五月三日，七时十五分，阿尔卑斯滨海省，格拉斯区穆斯吉埃镇，加泽医院，蒂博大夫。您听清了吗？”

“加泽医院……”传令兵重复着。

“我继续念：‘韦兹姑妈，韦兹，W, a, i, z, e, 韦兹姑妈去世，星期日十点在养老院举行葬礼——祝好——签名：吉丝’完了。我再念一遍……”

传令兵出了大厅，向楼梯走去。正在这时候，一个老护士，穿着白罩衣，拿着个托盘，出现在食具间门口。

“你上楼吗，吕多维克？把这份电报替我交给五十三号。”

五十三号空着，床已整理过了，房间也收拾整齐了。吕多维

克走到打开的窗子跟前，看看花园。蒂博医官不在。几个没有残疾的病人穿着蓝色睡衣和软底鞋，戴着士兵或军官的小帽，一面在太阳地里踱来踱去，一面闲谈。还有一些人，躺在一排柏树底下的几张帆布躺椅上看报。

护士又端起托盘，那上面有一杯汤药要凉了，走进了五十七号。半个月来，五十七号已经不能起床了。他靠在几个枕头上，满脸是汗，面容憔悴，没有刮胡子，呼吸很困难，连走廊上都能听到他那粗重的喘息声。吕多维克往杯子里倒了两匙汤药，扶着病人的脖子，帮他喝下去，把痰盂倒进厕所，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就去找蒂博大夫。为了尽到责任，他在离开这层楼之前，把四十九号门也推开看了看。上校躺在一个长藤椅上，身旁放着痰盂，正在跟另外三个军官打桥牌。蒂博医官不在这里。

吕多维克在楼梯下面遇见了巴尔多大夫，巴尔多大夫对他说：“他大概在作吸入治疗吧。把电报给我，我去。”

好几个病人坐着，头上扎着毛巾，俯身对着吸入治疗器，蒸汽发出一股薄荷脑和桉叶的气味，充满了热烘烘而又静悄悄的小房子，人都在这里，彼此都看不清楚。

“蒂博，电报！”

安托万把涨得血红流着汗珠的脸从毛巾底下露出来，擦了擦眼睛，惊奇地从巴尔多手里接过电报，拆开来。

“严重吗？”

安托万摇摇头，用空洞、低沉而平淡的声音说：

“一个年老的亲戚……刚死了。”

他把电报往睡衣口袋里一塞，又钻到毛巾里去了。

巴尔多拍一下他的肩膀：

“化验结果有了，你完了来找我一下。”

巴尔多大夫和安托万是同辈人。从前，他们俩在巴黎开始学医的时候就认识。后来，巴尔多生病，中途辍学，到山区去休养了两年。病好之后，不得不小心谨慎，不敢到巴黎去过冬，他就转学到蒙彼利埃医学院，一直到毕业，成为肺部疾病的专家。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在朗德省一所疗养院当院长。一九一六年，他在蒙彼利埃的老师塞格尔教授受命在南方创办一所医院，专治中了毒气的病人，邀他来当助手。于是，师生两人在格拉斯附近的穆斯吉埃建立了这个病院。目前，有六十来个士兵和十五、六个军官在这儿接受治疗。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末安托万在香巴尼省前线视察的时候，中了芥子气，在后方几家医院治疗过，都未见效，入冬以后，就住到这里来了。

在穆斯吉埃军官专用的那栋病房里，安托万是唯一中了毒气的军医。虽然他与巴尔多两人的气质很不同，但青少年时期的共同回忆使两位医生自然而然地接近起来。巴尔多爱思考，很用功，不太有魄力，意志不强，不过，也跟安托万一样，热爱医学事业，在职业上，有要求严格的自觉性。他们很快发现彼此之间有共同语言，结成了友谊。塞格尔教授把全部具体工作都交给了巴尔多，巴尔多却跟自己的助手马泽大夫相处不太融洽。马泽曾在殖民军中当过医官，受了重伤，以后才调到病院来的。巴尔多心里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犹疑不决的事，宁愿告诉安托万，向他讨主意。在这个新兴的治疗学中，很多地方尚未明确，他愿意把他的研究探索告诉安托万。当然，谈不上要安托万当他的副手帮他完成任务，因为安托万中的毒太重，得照顾自己，经常犯病，不能工作，他的病情要求他接受精心的护理治疗。不过，

这并不妨碍他经常关心别的病人的情况。只要他的病情暂时好转，体力略有恢复，有点精神和闲暇时间，他就跟巴尔多一起看病，一起作实验，有时候甚至参加每天晚上在塞格尔的办公室举行的有巴尔多和马泽参加的业务会议。就这样，他在这里不单是过病人的生活，有时候，还过大夫的生活，医院的气氛也就不难受了。在这里，他并没有完全脱离十五年来无论在平时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他生活唯一的真正的依据。

一做完吸气，安托万就在脖子上围上一条薄绸围巾，免得气温突然变化，受不了，然后，他去找大夫。巴尔多每天早上要到旁边的房子去半小时，亲自照看几个中毒气的病人作呼吸体操，那是他特别嘱咐的。

巴尔多站在他的病人们中间，满面笑容，注意集中，指挥着这一片气喘吁吁声音嘶哑的粗重呼吸声。他比最高的病人还高出半个脑袋。年龄不到，头发却秃了，额头露了出来，人就显得更高。他身体的体积与体长很是相称。这位以前的结核病患者是个巨人。从肩膀到腰，背后看去，整个的上身在白大褂那撑开的布料底下形成一个面积很大的正方形。

他马上把安托万拉到小更衣间去，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他说：“我很高兴，原来我还害怕呢……可是不对，蛋白反应是阴性的，这是好征兆。”

他从袖子的翻边里抽出一张纸。安托万拿过来，看了看。

“我抄下来，晚上还给你。”（自从他中毒气以后，就用一个专门的本子，对自己的情况作详细的治疗日志。）

巴尔多低声埋怨：“你在吸气室待那么久，不太累吗？”

“不，不，”安托万说。“我很重视这样的吸气疗法。”他的声音

很弱，气短，但是说话还清楚。“刚起床，声门上的分泌物很厚，完全说不出话。你看，喉头被蒸汽冲一下之后，失音就大大减轻了。”

巴尔多还是不放弃他的意见：

“相信我的话吧，不要把这种方法用过了头。尽管说不出话让人恼火，也只是个小毛病。吸入时间太长，有可能会过于猛烈地遏制住咳嗽。”他那拖长声的口音说明他是勃艮第地方的人，这样的口音更加重了眼睛里温柔而又严肃的表情。

他让安托万坐下，自己也坐下来，他一向极力使病人觉得他不忙，有的是时间听他们讲话，他最关心的事莫过于他们的苦衷。

他首先问了问安托万昨天的情况，晚上睡得怎么样，接着又说：“我建议你这几天再吃一点祛痰药，蒺藜或是茅膏菜，随你挑，跟泡琉璃苣茶一起喝……对，对，是一种民间土方……睡觉以前多出点汗，就是不要着凉——再好没有了！”他把元音和二合元音发得很重，又象唱歌似的把尾音拖长，（祛痰药啦……琉璃苣啦……多出点汗啦……）象是用弓子使劲压着大提琴的低音弦似的。

他喜欢对病人千叮咛万嘱咐，非常认真地相信他那些疗法一定有效，即使遇到失败也从不气馁。他最高兴不过的就是说服别人，尤其是说服安托万，他感到安托万比他优越，但是他并没有丝毫卑下的忌妒心。

他一直看着他的病人，继续说：“再说，如果你想控制一下晚上的分泌物，为什么不用几天硫化砷药物呢？”又对刚刚走进来的马泽大夫说：“您说对不对？”

马泽没有回答。他打开房间最里面的一个柜子，脱掉黄卡

其军服，换上一件白大褂。军服已经松散，洗得发白了，但还缀着勋章，一股汗臭味飘满一屋子。

巴尔多又继续说：“如果失音现象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再次使用马钱子碱。去年冬天我在夏普伊身上得到很好的成效。”

马泽转过身来，讽刺地说：

“你好象举不出更为令人鼓舞的例子……”

这人的脑袋是方的，额头很短，中间有一道很深的伤疤。一头灰白色的浓密头发，低低地压在额头上，剪得象刷子，眼白很容易充血。在这前殖民军军人晒黑的脸上，黑色的小胡子很是显眼。

安托万探询地看了看巴尔多。

“蒂博的情况好得多，跟夏普伊不能相比，”巴尔多赶紧说。他很不高兴，也没有掩饰。他转脸又对安托万说：“可怜的夏普伊情况不妙，晚上很不好，他们来叫醒了我两次。心脏中毒发展很快，整个期外收缩心律不齐……今天上午，我等着院长，好和他一起到五十七号去。”

马泽扣着白大褂，走了过来，他们讨论了一会儿中芥子毒气的人心血管的混乱现象。巴尔多肯定说：“病人年龄不同，症状就很不一样！”（夏普伊是一位炮兵上校，已经治疗了八个月。这人五十出头了。）

“……也要看过去的病史，”安托万补充了一句。

夏普伊跟他住在同一层楼，安托万给他听诊过好几次。他估计这位上校在中毒气之前，大概就得了潜伏性的二尖瓣狭窄。这一点，无论是塞格尔，还是巴尔多和马泽好象都没有料到。他差一点说出来。（能够抓住别人的错，并且给别人指出来，哪怕是对一个朋友，他现在比以往更感到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恶意的满

足，这样即使因为有病而低人一等，也得到了小小的补偿。)但是，他说话很费劲，他不说了。

“你们看报了吗？”马泽问道。

安托万摇摇头。

“德国鬼子对弗朗德勒地区^①的进攻好象是被阻挡住了，”巴尔多说。

“好象是这样，”马泽说。“伊普尔守住了，英国人正式宣布伊塞河一线都守住了。”

“想必花了重大的代价，”安托万说。

马泽耸耸肩膀，把“代价很大”和“不算什么”的意思表示得很清楚。他向衣柜转过身去，在军装口袋里翻一阵，又走到安托万身边说：

“给您，正好，古瓦朗给了我一张瑞士报纸，您看看。据中欧帝国^②的战报说，只是四月份，单单在伊塞河上，英国就损失了二十万人！”

“如果这个数字被协约国的舆论知道的话……”巴尔多说。

安托万摇摇头。马泽大声冷笑一下，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

“舆论永远得不到正确的情报！如今在打仗！”

他好象总是把别人当作傻瓜。

马泽出去之后，巴尔多又说：“你知道今天上午我在考虑什么吗？我在想，如今，任何一国的政府都不再代表那个国家的全民情绪了。不管是这一方还是那一方，任何人都不知道群众

① 古地区名，包括现今比法共有的埃斯科河流域，北海沿岸地带，法国的阿图瓦省，比利时的埃诺省，以及比荷共有的布拉邦特地区。

② 中欧帝国，包括奥匈帝国，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

真正想什么：领导者的声音压过了被领导者的声音……看看法国吧！你以为在二十个法国战士里有一个人，那么重视阿尔萨斯—洛林，为了收复这两个地方，甘愿把战争再延长一个月？”

“五十个人里连一个也没有！”

“可是全世界还是认为克列孟梭^①和普恩加来是法国普遍舆论的真正代言人……战争制造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官方撒谎的气氛！到处都这样！我不知道人民是不是还能够发出真正的声音，欧洲的报刊是不是还能够报道……”

教授进来，打断了他的话。

塞格尔向两位医生还了军礼。他握了握巴尔多的手，没有跟安托万握手。他的下巴突向前方，鹰钩鼻子，架着金丝眼镜，矮小的身材，头上长着一绺又轻又薄的白头发，活象梯也尔^②的漫画肖像。他的衣著十分整洁，胡子总是刮得溜光。他说话简单明了，待人彬彬有礼，保持着距离，甚至跟同事助手也是如此。他一般都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不跟大家在一起，连饭也叫人送到办公室里去。他勤劳能干，根据巴尔多和马泽在病院观察论述中毒气患者的治疗方法，整天都在为医学杂志写文章。他跟病人的联系很少，病人刚到，或者病情突然严重的时候他才亲自看一看。

巴尔多想把五十七号的情况告诉他。可是刚一开口，教授就打断了他的话，向门口走去，说道：

“上楼去吧！”

① 克列孟梭(1841—1929)，当时任法国总理。

② 梯也尔(1797—1877)，法国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政治家，是镇压巴黎公社革命的刽子手。

安托万看着他们走远，心里想，“这个巴尔多是个好样儿的！我幸亏有了他……”

他习惯在这个时候回到自己的房间去，继续作完治疗，然后，就在房间里休息到中午。上午治疗完了之后，他时常疲乏不堪，坐在安乐椅上打盹，吃午饭的锣声才把他惊醒。

他保持着一段距离，跟在两位医生的后面走去，忽然想到：“不管怎么样，如果我一定得死在这儿，巴尔多的友谊也帮不了我什么忙……”

他慢慢走，免得喘气。爬两层楼上去，稍一不慎，就觉得胸痛，虽然并不太痛，但要好几个钟头才能平息下去。

约瑟又忘了把窗帘放下。几只苍蝇在放药的架子上飞，苍蝇拍就挂在一个钉子上，可是安托万太疲乏，不想打苍蝇。他对窗外的美景看也不看，放下窗帘，坐到安乐椅上，闭上眼睛待了一会儿。然后，他从衣袋里拿出那份电报，下意识地又看了一遍。

可怜的老小姐，她过完了她的一生……除了死之外，她还有什么可作的呢？然而，她还不算太老……“六十多了，你明白，安托万，我不愿意成为累赘。”当她决定要到养老院终其天年之后，就总摇着头，这样说。那是蒂博先生死后不多几天的事。是十二月十三日或者是一月十四日……现在是五月十八日，已经四年多了！她活到了七十没有？……他仿佛又看到，在吊灯底下，她那黄色的小额头两旁系着灰色的发带，象牙色的小手哆哆嗦嗦地放在桌布上，小小的眼睛象受了惊的羊驼一样……她什么都害怕，壁橱里一只耗子，远处传来的雷声，都象马赛流行了鼠疫，西西里发生了地震似的。门声一响，突然的一下铃声，都会

把她吓一大跳：“上帝！”她慌忙在黑绸子短披肩下面，交叉起她小小的手臂。她把这披肩叫做她的“风帽”。还有她那笑声……她时常笑，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就笑，笑声象个小姑娘，清脆，天真……她年轻的时候，大概很动人。可以很清楚地想象出她在某个寄宿学校的院子里玩小铁环，脖子上系一条黑色天鹅绒的带子，发辫盘着，戴着发网……她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呢？她从来不提，人们也从来没有问过。有谁知道她的名字呢？世上从来没有人叫过她的名字，甚至连她的姓都不叫，就称她的职务，叫她“小姐”，就好象叫“看门的”、“开电梯的”一样……一连二十年，她在蒂博先生的专横底下，怀着虔诚的畏惧生活。一连二十年，她谦逊退让，默默无言，不知疲倦。她是全家的支轴，但是从来没有人因为她一丝不苟，殷勤体贴，而想到感激过她。她整个一生毫无她个人的地位，只是忠心耿耿，自我牺牲，献身于人，谦逊克己，温存体贴，知识有限，平庸谨慎，然而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得到报答。

“吉丝一定很伤心，”安托万想道。

不过，他并不太肯定，只是愿意这么想。他需要用吉丝的惋惜，来弥补长时间的不公正。

他不耐烦地想道：“得写一封信去。”（自从应征以来，他只写那些非写不可的信，生病以后，索性几乎完全不写信了，只是间或写个简短的明信片，给吉丝，菲利普，斯图德勒，或儒斯兰……）他决定了：“我要打个长电报去，表示吊唁，这样就可以晚几天再写信了……她为什么把葬礼的时间告诉我呢？她总不至于估计我还会回去一趟吧！……”

战争爆发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巴黎。回去干什么呢？愿意的人大都象他一样入伍了，回自己的家吧，房间也都空着，实

验室的那层楼都另派了用场。回去有什么用？轮到他休假的时候他总是让给别人。在前线，他至少一定得屈从于忙碌的、有规律的生活，这可以帮他不动脑子。只有一次，在阿布维尔，索姆河攻势之前，他同意休假，那是个冬末，他独自一人动身躲到第厄普去。可是两天之后，他又搭火车回到部队，因为，在那个城市里闲得无聊，到处是海水的咸味，日日夜夜刮着潮湿的风，到处乱糟糟的都是英国伤兵……入伍以来，他从来没有见过吉丝（也没有见过菲利普和珍妮，谁都没有见过）。他第一次受伤以后，在圣迪兹耶养伤的时候，甚至没有同意吉丝去看望他。他们之间每隔两三个月写一封热情的短信，他觉得这样就足以跟后方、跟过去保持最低限度的联系了。

就是从信中他才知道珍妮怀了孕；通过写信，他才终于确实知道雅克已死。他跟珍妮通过几次信，措词相当亲密。一九一五年冬天，珍妮写信告诉他说她决定到日内瓦去一趟。她作这次旅行有两个目的：一则想远离家人，自己到那儿去生孩子；另外，也想利用在瑞士的时间设法追查一下雅克是怎样死的。雅克的死一直到那时还是个谜。跟珍妮保持着联系的那些革命者中间流传说雅克去执行一项“危险任务”，在八月上旬失踪了。安托万那时想到介绍珍妮去找吕梅尔，这位外交家已在巴黎被动员，岗位就在凯道赛。他没有费什么事，就给这位年轻妇人弄到了必需的通行证。珍妮在日内瓦找到了范希德，这个白化病患者帮她奔走调查，还陪她到巴塞尔去，找到了布拉特纳。通过这位书商，她终于知道了雅克最后几天的确实详情：知道他写了宣言，等到了梅奈斯泰勒的飞机，然后，八月十日早晨，向阿尔萨斯前线飞去。以后的事布拉特纳就不知道了。但是，安托万从珍妮那里得知以后，就托吕梅尔沿着这条线索继续追查。在德国

战俘营的俘虏名单中找过，没有结果。后来，吕梅尔终于在巴黎陆军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步兵师师部给参谋部的报告，日期正好是八月十日。这份报告谈的是阿尔萨斯部队的撤退，其中说到有一架飞机起火，坠落在法军阵地上。机上人员都烧焦了，不可辨认。可是，从飞机的残骸来看，可以断定是一架非武装飞机，瑞士制造的。报告中还说，从烧毁了的一捆纸中，终于认出了传单的一些残片，传单是激烈反军国主义的。毫无疑问了，尸体就是雅克和飞机驾驶员……死得太荒唐！安托万从来不能赞成这么荒谬的死法，即使四年之后的今天，他一想起来，感情中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悲伤。

他站起来，摘下苍蝇拍，愤愤地打死了十几只苍蝇，想用毛巾把其余的轰走，可是一阵咳嗽使他弯下腰，手扶着椅背，动弹不得了。他直得起腰的时候，就把一块敷布用松节油沾湿，在胸前按了一会儿。暂时有些松快，他从床上取来两个枕头，又重新坐下，把上身挺直，免得肺部充血。他开始小心地作呼吸操，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喉头，用力呼气，一次比一次长，一个个地发出几个音：

A...E...I...O...U...

他的眼睛在屋里巡视。房间很小，平庸得使人生厌。今天早上，海风吹动了窗帘，反光在漆过的墙上闪动。墙壁是砖头似的粉红色，一直到深褐色旋花图案的檐壁，没有任何装饰。梳洗用的镜子上面，贴着一排六个美国舞女，敞着水手领，脚弯成弓形，翘着大腿，是从哪个画报上剪下来的，这就是在安托万以前住在这里的人在死之前对五十三号病房所作的艺术装饰的最后残迹，其余的都已被安托万去掉。这几个狂浪的舞女挂得太高，不冒失地使把力气就够不着。他一直想叫这层楼的听差约瑟完成

这项最后的工作。可是约瑟个子太矮，梯子又放在底楼，安托万只好不再想它了。在一张很窄的松木桌子上，赫然摆着一个瓷痰盂，在药瓶、药盒之间，堆着旧报纸、旧杂志、前线地图和唱片。每天晚上，勉强腾出一点地方，他打开记事本，记下他这一天从医学的角度观察到的现象。另外，还有些药瓶，堆在洗脸池的小玻璃搁架上。有一个白木衣柜，放着他的衣服杂物。在衣柜和桌子之间，竖着个空的旅行箱，上面还规规矩矩地写着：二营医官，蒂博大夫，字迹已经斑驳脱落了。现在，这个旅行箱变成了一个台座，上面放着一架坏了的留声机。

安托万关在这个粉红色的斗室里，已经将近五个月了，他观察着自己的病情的起伏变化，盼望着治愈的明显迹象，可是一点也看不到。快五个月了……在这里忍受着痛苦，计算着每一分钟，吃、喝、咳嗽，开始看书，但从来没有看完过，回忆过去，梦想将来，接受别人的探望，开开玩笑，争论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一直争论到喘不过气来……他一见到这张床、这张安乐椅和这只痰盂就恶心，这些都证明他在发烧、气闷和失眠。幸亏他的病况还允许他时常下楼，舒散一下。于是，他带着一本书躲开，虽然从来不看，但是这可以使他的孤独稍稍有些保障，他躲到柏树夹荫的小径上，或者橄榄树底下，有时甚至到菜园子顶里面去，跑到水车附近，那里有一道小溪，给人清凉的感觉。如果他觉得体力还够，能多站一会儿的话，他就跟巴尔多和马泽一起关在实验室里。在那里，他马上呼吸到一种亲切的气氛。巴尔多借给他一件白大褂，让他参加操作。他从实验室出来时精疲力竭，但是，这是他最美好的日子。

他多么希望能够为了将来好好利用这强迫的休息时间，一星期又一星期，一月又一月等着痊愈的时刻！他多次试图从事

一些个人的工作，但是，他的病总是马上又犯了，还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就不得不把工作搁置起来。他心里总有一个计划：把战前他积累的关于幼儿呼吸紊乱同儿童智力发展和注意力的关系总结成一篇长篇论文。现在，他的材料已经相当丰富，足够写成一小本书，至少能在杂志上发表一篇内容丰富文章。他急于动手，好确定日期，因为这个题目正是热门，安托万怕别的儿科专家抢了先。但是，即使他的健康情况允许他工作，他也无法动手，因为手头没有资料和实验纪录，这些东西都在巴黎，而且没有法子叫人寄来。他的秘书，年轻的马尼埃尔·鲁瓦在进攻阿拉斯的时候跟全排人一起失踪了，那还是开战以后第二个月的事。儒斯兰在西里西亚的德国战俘营里当战俘已经两年了。至于哈里发，一九一六年在凡尔登负了伤，身体复元后耳朵却聋了。他现在是放射科的专家，最近分配在东部军区的卫生部门工作。

敲了第一遍锣，快吃午饭了。安托万站起来，打开洗脸池上的小灯，看一看咽喉。每次去吃饭以前，他总要先滴几滴药，减少吞咽困难。他有时候吃东西很困难，不得不找巴尔多用一下直流电烙器。

等着第二遍锣声的时候，他把安乐椅推到窗前，拉起了窗帘。一片宽阔的山坡展现在他面前，山坡上修着梯田，山坡上面是多石的山顶。右面，一系列熟悉的丘陵在飞着微尘的阳光下连绵起伏，一直伸展到连接大海的蔚蓝色的天际。窗下是花园，花园里传来花香人语。他俯下身去，眺望着病人们在一行柏树蔽荫的小径上作着例行的散步。这些人他全认识：古瓦朗和他的老搭档瓦斯纳（这是仅有的两个声带没有受损伤的病人，他们就一天到晚，说个不休）；达罗，胳膊底下总夹着一本书；埃克曼，外号人称大袋鼠；还有雷蒙少校，身旁总有一群青年军官，象每天

早晨一样，摊开一张地图，评论战报。只要看见他们走动，指手划脚，就仿佛能够听到他们在说什么，就好象在他们中间一样，感到厌倦。

铃声又响了，整个花园骚动起来，象个受惊的蚂蚁窝。

安托万叹息着直起身来，心里想道：“再也没有比这凄惨的铃声更能扰乱人心了，为什么不象别处一样，也打钟呢？”

他一点也不饿，觉得没有勇气再走两层楼下去，再闻一次饭菜味，听叮叮当当上菜的声音，各式各样没完没了的汤，还得殷勤地微笑着，听那班人每天照例评论德国作战计划，计算仗还能打多久，解释公报里暗含的意义……这一切，再加上照例的捉弄逗趣，回忆前线的轶事，讲下流故事，更糟糕的是有人毫不隐讳地描述吐出的痰是什么模样，晚上吐的痰如何多……

他脱掉睡衣，换上一件三条饰带的白帆布旧军装，从口袋里掏出吉丝的电报，突然停住了：

“我去一趟如何？”

他不禁微笑起来。他知道他不会去。既然已经打定主意不去，他反倒可以围绕这个虚幻的计划自由驰骋想象了。这个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可实现的成分。只要小心在意，不中断治疗，记住带上气体吸入器，还有一大批药品，安托万决不会有病情恶化的危险。星期日十点举行葬礼……只要乘明天，星期六下午的特快列车，星期日早上就能到达巴黎……塞格尔当然不会不准他假。多斯的病那么重，他不是也给他假了吗？……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机会真有诱惑力……由于来得出乎意料，更舍不得放过了……

突然，他觉得好象是在战前——生活优裕、身体健康的那个年代——独自在静悄悄的餐车里，坐在菜肴丰盛的桌子旁……

到了巴黎，关于他的病情，可以请教一下他的老师菲利普……特别是，能找到他的资料和实验纪录，他要带回来满满一箱子笔记书籍，工作用品，这无尽无休的养病期间所必需的一切……

巴黎！可以有三四天的时间散散心！三四天的时间不喝汤！
总之，为什么不走一趟呢？

二

在静寂中砰的一响，看门修女的小窗口微微开了。安托万看到一段蓝布袖子，一只干瘪多皱的手，上面一只戒指在闪光。

一张看不见的嘴低声说：“一直走，在走廊尽头的院子里。”

前厅连着一道铺方砖的走廊，空无一人，闪闪发亮，一直通到静悄悄的养老院里面。左面，一个楼梯的头几阶上，蹲着两个老太婆，仿佛凑在一起演哑角戏似的，肩膀缩在钩针编织的黑色披巾里，头靠在一起，压低声音嘁嘁喳喳地说话。

院子四分之三全是阳光，没有人，院子深处有一个小教堂，有一扇门开着，使教堂正面显出一个长方形的黑洞，里面传出风琴的声音。仪式已经开始了。安托万走过去。他的视线探入黑黝黝的小教堂，看到耙子似的一列小火苗，里面的石板地比院子的地面低，得下两级台阶。安托万从堵住通路的殡仪馆职员们中间挤过去。小小的厅堂里挤满了人，弥漫着地穴的凉气。安托万一只手使劲扶着圣水缸，踮起脚尖。祭台前面放着棺材，上面马马虎虎地盖着一块黑布，四角上各点着一支大蜡烛。在这简陋的灵柩台后面，站着一个满头白发、戴着眼镜的矮子，交叉着手臂。这人身旁跪着一个女护士，蓝色的纱巾把脸遮住。她一回

头，安托万认出了吉丝的侧影。他心里想：“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除了傻瓜夏斯勒，什么人也没有……我来对了……珍妮没有来……丰塔南夫人和但以理也没有来……这样更好。我要告诉吉丝，不要通知他们我到巴黎来了，这样就免得再到拉菲特庄去。”他最后一次核实一下，在那不多的几排凳子上，确实没有熟人的面孔，只坐着几个带披巾的老妇人和几个戴着宽大角形巾的修女。“我决不可能站到仪式结束，何况这里边真有点冷……”他正准备出去，凳子响了，人们站起来，跪到地上。主持仪式的神父转过身来，面向信众，把两只手高高举起。安托万认出了那高高的身材、光秃的前额，那是韦卡尔神父。

他走上台阶，回到院子里，看到太阳地里有一个凳子，就去坐了下来。只觉得肩胛骨之间隐隐作痛。不过，坐火车坐了这么长时间，并没有使他过度劳累，昨夜有段时间，他甚至可以躺下来休息。倒是从里昂车站到潘杜汝，坐着一辆破旧出租汽车，在沿河大街的石子路上颠簸，把他累坏了。

“象个小孩子的棺材，”他想。“那么小！”他仿佛又看见韦兹小姐在大学街那套房间里跑着碎步，或者在她的房间里，对着光坐在一张椅子边上，象钉住了一样，面对着她那张细工镶嵌的写字台。按她的说法，这是她“家传的家具”，她到蒂博先生这里来管家，带来的唯一纪念品。就在这写字台的一个“秘密”抽屉里，藏着每月开支的款项。她在那里放着她的全部纪念品，她在那里放着她的积蓄。也在那里，她放着她的止咳红枣露，发票，信纸，香草精匣子，蒂博先生扔掉的铅笔头，广告单，菜谱，她的针头线脑，扣子，耗子药，上了胶的塔夫绸，鸢尾香粉小口袋，山金车制剂^①，

① 山金车是一种植物，专治扭伤挫伤。

家里所有的旧钥匙，祈祷书，相片，黄瓜汁香膏，这是滋润手上的皮肤用的，它那清淡的香味跟香草精和鸢尾的气味混在一起，一开抽屉就传到前厅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儿童时期的安托万和雅克看来，这张写字台好象藏着秘密的财宝，很有吸引力。后来，雅克和吉丝把它叫做“乡下的文具杂货摊”，因为它就象乡下的市集似的，乱七八糟，什么都有……

一阵脚步声使他抬起了头，几个穿黑衣服的男人把另一边门扇推开，把几个花圈拿来放在院子里地面上。安托万站了起来。

祭礼结束了。两个穿斜纹布衣服的修女，拉着一只带小轮的大筐，上面装着蔬菜，垂着眼睛走过去，匆忙走进院子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二楼的窗户上，窗帘都撩了起来，几个行动不便的老妇人穿着短衫，站在玻璃窗里面。能走动的住院老人从小教堂出来，一瘸一拐地挤在门道两旁。风琴声停止了。阴影里显出一个银质十字架，一件白法衣。棺材出现了，两个人扛着，唱诗班的孩子跟在后面，接着是个老神父，后面是韦卡尔神父。

吉丝也走上了台阶，出现在太阳地里，夏斯勒先生跟在她身后。扛棺材的人停住脚等着，让殡仪馆的职员们把花圈放到棺材上。吉丝眼泪汪汪地回过头看着棺材。安托万发现在她沉思的脸上，有一种成熟的表情，吃了一惊。他只要想起她来，总觉得她是个十五岁的小姑娘。他心想：“她没有看到我……完全没有料到我会来。”他可以随意观察吉丝，吉丝却完全没有觉察，他有些局促不安。他已经忘了吉丝的皮肤本来就是茶褐色的。“因为额头上系着白发带，所以把脸皮衬得更黑了……”

夏斯勒先生戴着黑手套，手里拿着一顶老式的帽子。他伸着脖子，鸟儿似的小脑袋左右乱转。突然他看到了安托万，赶紧用

手捂住嘴，好象压住喊叫似的。吉丝转过眼来，目光落到安托万身上，打量了他一会儿，好象一下子认不出来，接着，跑到他身边，哭泣起来。安托万笨拙地搂住她。看到扛棺材的又走了，他才把她轻轻放开。

“挨着我，”吉丝轻声说。“不要离开。”

她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安托万跟着她过去。夏斯勒先生满脸惊惶地看着她们。

安托万向他伸出手来，他象作梦似的低声说道：“啊，是您？”

“墓地远吗？”安托万问吉丝。

“我们家的坟墓在勒瓦鲁亚……有车，”吉丝低声回答。

送葬的行列缓缓穿出院子。

一辆两匹马拉的带篷车在街上等着。附近的居民，还有孩子们站在两边人行道上。三个位子的车座高高地装在这个旧车架上，好象象背上的轿子，要蹬着好几级脚蹬才能爬上去。三个座位是给吉丝、夏斯勒和葬礼司仪准备的，但是司仪把这个特权让给安托万，自己跟戴两角帽的车夫坐到了一起。车摇晃一下，走动起来，在郊区的石子路上颠簸。两位神父坐一辆挂着黑纱的四轮马车跟在后面。

安托万费了很大力气才爬上车座，刺激了支气管，刚一坐下，就咳个不停，好大一会儿，只能低着头，用手帕捂着嘴。

吉丝坐在他们两个中间，她等安托万这阵咳嗽过去后，碰碰他的手臂说：

“你来是太好了。我一点都没有想到……”

“啊！这个年头，什么事都得想到，”夏斯勒先生说教式地叹着气说。他把身子弯过来，看着安托万咳嗽，从眼镜上面不断打量他，摇摇头说：“对不起，我刚才没有认出来您，变得很容易认

人认错了，对不对，吉丝小姐？”

安托万不禁感到很不快，然而还保持着从容态度，说：

“喂，是呀……我瘦多了……中了毒气！……”

吉丝转过身来，突然被这嘶哑的嗓音吓呆了。刚才在院子里见面的时候，看到安托万整个的神情，她是吃了一惊，但是没有仔细观察。不过，五年不见，他又穿着军装，觉得他变了样子并不奇怪，现在她却想到，安托万中毒的程度也许比她想象的更严重。安托万中毒的详细情况她从来不知道，只知道他正在南方治疗。他在信里总说：“正在痊愈中……”

夏斯勒先生显出得意洋洋的内行神情，重复了一句：“毒气？当然了。伊普雷毒气^①，也叫做芥子气……一种新式发明……”他一直好奇地打量安托万。“这毒气，剥了您一层皮……可是，也让您得了十字勋章，还有两枚棕榈章，更多的情况还不知道呢……多么光彩。”

吉丝朝安托万的军装看了一眼。他的来信里，从来没有提过受勋的事。

“给你看病的大夫，他们怎么说的？”她试探地问。“他们认为你还要在医院里住很久吗？”

“进展得很慢，”安托万承认。他尽力装出笑容，想再说点什么，深深吸了口气，可是马跑了起来，颠得他呼吸不得，只好不说了。

“本店的新发明专柜，各类物品一应俱全，也卖防毒面具，”夏斯勒先生露出和气动人的笑脸，一口气说了出来。

吉丝想客气一下：

^① 伊普雷是比利时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第一次在这里投下芥子毒气弹。

“您的生意怎么样？夏斯勒先生？还满意吧？”

“还不错，嗯，还不错……吉丝小姐，这年头，跟别的事情一样，得适应。我们的发明家都被动员走了，您知道。在前线，老天！他们什么有用的事也做不了啦……有时候，也会有一位出个主意。比方说我们新出的盟军跳鹅棋^①……袖珍式的……棋盘上的花式都采用有名的战役：马恩，埃帕尔热，杜欧蒙……在战壕里很受欢迎……得适应呀，吉丝小姐……”

“你呀，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没有变，”安托万想。

马车从潘杜汝到勒瓦鲁亚走的是外环城路，这天是星期日，天气看来晴朗宜人。太阳已经很热了，工事上，兵士们在闲逛。在杜芬纳门，巴黎妇女们穿着鲜艳的衣裙，带着孩子牵着狗到森林^②去。卖鲜菜鲜果的车子沿着人行道停着，装满了鲜花。全跟战前一样。

马车颤得厉害。安托万用更为嘶哑的嗓子问道：“小姐……是什么病死的？”

吉丝赶忙转过身来，

“什么病？可怜的姑母……正象俗话说的，她耗干了。胃，肾，心脏都不行了。几个星期以来，她什么都不消化。最后一个晚上心脏突然发病。”她停了一会儿，又说：“你想象不到，她到养老院以后，性格的变化有多大……她只关心她自己。只关心自己的饮食、舒适、存款……对女仆和修女非常专横……是呀，她对什么都抱怨，觉得别人都在欺侮她。甚至说隔壁的老太太偷了她的东西，这全是无中生有……她有时好几天不喝水，硬说

① 是一种以掷骰子决定走多少步的游戏。

② 指巴黎西边的布罗涅森林，游玩场所。

修女想毒死她！……”

她又停住嘴，静默了一会儿。她不知道安托万为什么默然无语，她以为这是在责备她。因为近些日子她一直惴惴不安，总在扪心自问是不是为姑母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她想：“我是她一手抚养大的，可是我呢？一旦能离开她，就马上离开了，难得到养老院去看她……”

“在拉菲特庄，”她稍稍提高了声音，好象为自己辩解似的，“我们医院的事忙极了！……你知道，我来就很不容易。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我很长时间没有去看她。后来，上个月，养老院的院长给我写了信，我就立刻来了。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怜的姑妈……她正在她放衣服的小房间里面，坐在一口箱子上，只穿了衬衣和衬裙，神情恍惚，束着发带，上面戴着一顶白布睡帽，只穿着一只袜子，另一条腿光着。她瘦得只剩了一把骨头，前额鼓起，脸颊下陷，脖子上的肉都瘦干了……奇怪的是她的腿仍然象年轻人，甚至又鲜又嫩，跟小姑娘的腿似的……她不询问我的情况，也不打听任何人，只是抱怨她的邻居和修女。接着，她就打开写字台的抽屉，你知道，她要给我看她的抽屉里的积蓄，说：‘这是准备办后事的。’这时候，她就说到她的丧事。‘你再也看不见我了，我要死了。’她又对我说：‘不过，你别怕，无论如何，我会托院长把留给你的东西寄给你的。’我想说说笑话：‘姑妈，你说你快死了都说了好几年了！’她可发了脾气：‘我愿意死，我活够了！’她又看着她的腿说：‘你看，我的脚多么秀气！你那脚丫子总象男孩子似的！’走的时候，我想拥抱她，她却挣脱开了：‘不要拥抱我，我的气味难闻，我发出一股衰老的气味……’就在这个时候她谈到了你。我那时已经走到了门口，她又把我叫回去：‘你知道，我掉了六颗牙！一拔就掉，就象红萝卜

一样!’她笑了起来，很高兴，就是她笑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六颗牙！你告诉安托万……还有，如果他还想再见我一面，叫他快点！’”

安托万听着她讲，心里很是感动。现在，听到有关疾病、死亡的叙述，他感到了某种好奇。况且，她这样絮絮叨叨，他就免得说话了。

“这是你最后一次去看她吗？”

“不是。十多天以前，我又去了。养老院给我写信，说她已经领了临终圣事。她的房间很黑，有一点光她都受不了……马尔特修女把我领到床边，姑妈蜷缩在鸭绒被底下，非常小。她昏迷不醒，修女叫她：‘您的小吉丝来了！’鸭绒被终于动了一下，我不知道她听明白了没有，是不是认出了我。她很清楚地说：‘太长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打仗的事，有什么消息？’我对她说话，她不回答，好象没有听懂。她又问我几次：‘有什么消息？’我要亲亲她的额角，她把我推开了：‘我不愿意把我的头发弄乱！’可怜的姑妈。‘我不愿意把我的头发弄乱！’这是我听见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夏斯勒先生用手帕擦擦眼睛，然后，把手帕仔仔细细照原样折起来，用非难的口气，嘴也不张地嘟哝道：

“对，不应该……不应该把她的头发弄乱！”

吉丝赶紧把头低下，脸上不由自主地闪过年轻的、顽皮的笑容。安托万看见了，觉得吉丝突然一下子跟他又亲近了，他想照往常一样叫她“黑丫头”，逗弄她一下。

车子穿过香贝莱门的栅栏，停下来办手续。广场上停着防空部队的汽车炮架高射炮，装甲车，哨兵看守着蒙上伪装苦布的探照灯。

送葬的行列继续前进，走到勒瓦鲁亚人群拥挤的街道。这时，夏斯勒先生叹了一口气说：

“喂！……不管怎么说，这位好小姐住在养老院还是幸福的！我求之不得哩！安托万先生，我就是要找一个专收男人的养老院，条件要好一些……那样，就安心了……别的事也不用管了……”他摘下眼镜来擦拭。摘下眼镜之后，他的眼睛眨巴着，显得又温柔又悲伤。他又接着说：“我把您父亲给我的年金都给他们。一直到死，我就有了栖身之地……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大清早，我就可以考虑我的问题……我已经去看了一个，在拉尼。可是，从现在的局势来看，这个地方太靠东边。跟德国鬼子打交道，有谁敢保险不发生点什么事呢？而且，他们的地下室，那简直不是地下室。这年头，要有真正的地下室……”他用发抖的声音说着：“这年头！”还把戴着黑手套的手举到胸前，就象要推开什么不祥的预兆似的。他的手套是瑞典货，已经磨破了，太长，发硬的皮子在手指尖的地方皱缩打卷，象滨螺似的，看上去叫人恶心。

安托万和吉丝默默无言。他们连微笑一下的心情都没有了。

“什么都说不准，任何地方都不得安生，”小老头儿又继续哀叹。“晚上有警报，只有在真正的地下室里，才能放心……才能保险……到一九一九年，我家对面，就会有一个，一个真正的地下室……”因为安托万咳嗽起来，他不得不住住了嘴，紧接着他又下结论说：“安托万先生，这年头，您看，晚上到地下室去，还是最好的主意。”

马车沿着一堵高墙缓缓前行。吉丝说：

“大概就是这里了。”

“葬礼以后你要哪儿去？”安托万问。马车摇晃得肋帮直痛。

为了减轻颠簸，他用肩膀用力抵住车座的靠背。

“我回大学街你的家……从前天起我就住在那儿……马车拉我回去，讲价钱时说定了的。”

“我们还是找一辆好一点的出租汽车吧！”安托万微笑着说。他爬上这个象轿似的马车以后，坐得非常难受，一想到还得爬下去，更是难受。回去时，他决定要找另外的交通工具了。

吉丝惊奇地看看他，可是，并没有要他解释，况且，马车已经进了墓地的大门。

三

“都拔上了，你能这样待十分钟？”

“你愿意的话，二十分钟都行。”

安托万在大学街住宅的小书房里，骑在一张椅子上，光脊梁上拔着八个火罐。

吉丝说：“等一等，别着凉。”

她从安乐椅的靠背上拿起她的护士罩衣，给他裹住肩膀。

“她是多么温柔可爱呀！”安托万想着，发现自己对她的温情仍如往昔，这温暖了他的心，使他觉得有些惶惑。“这几年，我为什么要跟她保持距离？为什么不给她写信呢？”忽然想到穆斯吉埃病院那粉红色的病房，镜子上面那六个翘起大腿的舞女，各色各样人一起吃饭，小厮约瑟忠心然而生硬的照料。“留在这里，由吉丝来看护该多么好哇！”

“我让门开着，”她说。“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就叫我。我去烧菜汤。”

“不，不要菜汤！”安托万赶紧说。“不，不！你看，四年以来，

我喝的菜汤太多了。”

吉丝微笑一下，走开了，留下他一个人。

他独自一人在屋里，感觉到又有了自己的家，实现了在病床旁边又有女性温柔照料梦想。

他独自一人，闻着自己家的气味。他一进门，穿过前厅，不假思索地把军帽挂在左面从前他挂帽子的衣架上，从这时候起，这股气味就扑面而来。他始终怀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张开鼻孔，闻着这久已忘却但很快又回忆起来的，自己家的气味。这是一种飘浮在四处，隐隐约约，难以分析的混合气息，从绘画、地毯、窗帘、椅子、书籍上同时发出来，无孔不入地弥漫在整个这层楼。也是羊毛、地板蜡、烟草、皮毛和药品十来种味道合在一起的气味……

从墓地回来，又绕道到里昂车站去取手提箱，他觉得路途长得没有完，肋下的疼痛加剧了，窒息也更厉害。在门口走下出租汽车时，确实很不舒服，他后悔不该来这一趟。幸亏他随身带着医疗器械，刚一到家，就吸了氧气，解除了呼吸困难。接着，吉丝又按他的指点，给他拔上了火罐。拔罐子开始起作用了，支气管松快，呼吸也通畅了一些。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低着头，弓着背，瘦弱的手臂盘起来搭在椅背上，温存的目光四周巡视。又回到家了，又回到这小工作室，他没有料到会这样心慌意乱。一切都没有改变。吉丝一下子就揭掉了家具上的套子，把椅子放回原处，打开了百叶窗，把遮阳放下来一半。一切都没有改变，不过，一切又都出乎意料。他以前待惯的这间房对他来说又亲切又陌生，好象经过多少年完全遗忘之后，突然出现了儿时的回忆，精确得使人吃惊。他亲切地看着那美丽的、淡棕色的地毯、皮面安乐椅、长沙发、椅垫、

壁炉和座钟、墙上的灯、书柜。他想：“难道我以前当真那样重视这套房子的陈设？”四年来，这些书他的确一次都没有想到过，而现在，一册册的书名他都能准确说出，就象昨天还抚弄过似的。每件家具，每件物品——无论是独脚圆桌，玳瑁把的裁纸刀，铸着一条龙的青铜烟灰盘，香烟盒，都能勾起他的某个回忆，使他记起生活中的某个时期，他能想起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买的，或者是哪位病人痊愈之后送给他表示感激的，而对那人病情的每个阶段他也记得清清楚楚。他记得安娜是怎样动作，哈里发是怎样考虑，他还记得他父亲的某个形象。因为这间工作室本来是老蒂博的盥洗间。只要一闭眼，仿佛就能看见桃花心木的大洗脸架，带镜子的大衣柜，紫铜的洗脚盆，墙角里竖着的靴拔子……要是发现这间房依然是儿时的旧模样，不是现在他翻修过的样子，他也许就不会那么惊奇了。

他想到：“真奇怪，刚才走进大门，我不觉得是回到了自己的家，而是觉得回到了父亲的家……”

他睁开眼睛，看见长沙发旁边矮桌子上的电话。他面前突然出现一个年轻人，在这儿打过多少次电话！那时正当盛年，以他的力量自豪，独断专行，永远忙碌，以不知疲倦的生活和行动为幸福。这年轻人和他之间，横亘着四年的战争、反抗和沉思。有时，一连几个月痛苦不堪，体质暂时衰弱，接着是时刻不能忘却的未老先衰。他忽然觉得很颓丧，把头靠在手臂上。他看到了过去，现实隐没了。父亲，雅克，老小姐都已物故，只能透过青春和健康的三棱镜看见往昔的家庭生活。如果能再回到往昔，花多少代价他也愿意！追思往日，也混合着今日的悲伤。他真想把吉丝叫来，好逃出这孤寂。但是，他还能够控制自己，能够正视现实。一切取决于健康。首先，必须恢复健康。他决定

尽早跟老师菲利普大夫认真地谈一谈，跟他一起找一个更积极、更迅速的治疗方法。穆斯吉埃采用的办法持续下去总有一天会使人衰弱的。他的体力这样弱不是正常现象。菲利普可以帮助他恢复体力。菲利普……吉丝……他的思想混乱了。把吉丝带到穆斯吉埃去……痊愈……他突然昏昏睡了过去。

几分钟后，他醒过来，吉丝正坐在一张安乐椅的扶手上，看着他。神情关切，又有点焦虑，她蹙起了眉头。从她那光滑细润的、永远不知掩饰的脸上，安托万看出了她的想法。

“你觉得我完全垮了，是不是？”

“不是，只是瘦了。”

“秋天以来，我掉了九公斤。”

“你觉得好些了吗？”

“好多了。”

“你的声音还有点……不清楚。”（她发现安托万有许多变化，最使她吃惊的就是嗓音这样弱，这样嘶哑。）

“这时候还没有什么，早上有几个钟头，完全说不出话来。”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吉丝跳起来，打破了沉默：

“把罐子取下来？”

“好吧。”

她挪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身旁。为了不让安托万凉着，她把两手伸到白罩衣底下，轻轻地取下了罐子，一个个地放在两膝中间，然后提起围裙，兜着那几个玻璃罐去冲洗。

安托万站起来，发觉呼吸畅快多了，在镜子里照着骨瘦嶙峋的脊背，上面印了几个紫红的圆圈。他穿上衣服。

安托万走进餐厅，吉丝已快把餐具摆好了。

他看着这宽敞的餐厅，二十把椅子整齐地排开，雷昂从前曾在这大理石的餐具桌上郑重其事的干活儿。安托万突然宣布：

“告诉你，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把房子卖掉。”

吉丝惊奇地转过身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手里还拿着一个盘子。

“房子？”

“这些东西我一件都不留，一点也不留。我要租一套小宅子，俭朴，实用的……我……”

他笑一笑，自己也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跟他今天早上以前所想的一定不一样，他再也不愿按照往日那种方式生活下去了。

“肉片，黄油面条，还有草莓……行吗？”她问。安托万既然安排了自己中意的环境，为什么忽然不满意了，吉丝并不想了解。她不太有想象力，对于将来要干什么，从来不很关心。

“你太麻烦了，小天使，”安托万看着桌上摆的菜肴说。

“还得等十分钟，我还没有找到餐巾呢！”

“我去找！”

内衣都堆在一张折叠床上，床已经摊开睡过，乱七八糟的。他看见在褥子的凹处有十几个念珠。几件衣裳堆在椅子上。

“为什么她不住在最边上那一间房呢？”他心里想。

他打开一个柜子，又打开一个，再打开第三个。三个柜子里都装满未曾用过的床单、枕头套、毛巾浴衣、抹布、围裙之类，一打一打的，都还系着供应商的红细绳。他耸耸肩：“准备这么多，真荒唐……只留最必需的，其余的都送进拍卖大厦！”他这时拿起一叠餐巾，从里面抽出两条。“老天，我知道为什么了！她住

在这里，是因为不愿睡雅克以前那间房……”

他象闲步似的，又回到走廊，摸摸那里，摸摸这里，摸摸墙上上了漆的图画，经过什么房门，就稍稍推开，好奇地向里面张望，好象是参观别人的住宅。

他又走回前厅，在他的门诊室有两个门扉的门前站住。他先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扭动了把手。里面窗户关着，家具都蒙着套布，堆放在书架前面。屋子显得更大了，从百叶窗片里透进来的光线散射在屋里，好象外省人家的大客厅，只是在接待客人的时候才有人进去。

突然想起一九一四年七月的最后几天，斯图德勒带来的报纸，争论，焦虑……还有他弟弟几次到来……雅克和珍妮一起来的不就是这儿吗？就是发布动员令的那一天？……

他靠着门，俯下身子，抽了几下鼻子，那气味就在这儿，比别处更浓，更沁人肺腑，跟别处不一样，更加香……屋子中间有一张大写字台，蒙着一大块布，象是小孩的棺材台。

“那里面堆着些什么呢？”

他决定走进去，把盖布掀开。写字台上堆满了包裹和书籍，桌面都看不见了。战争开始以来，看门的女人就把印刷品、广告册、报纸、杂志以及一些各实验室寄来的各色各样的样品都乱堆在这儿。安托万想：“这是什么味儿呢？”在他熟悉的气味里，又混进了一种特别的香气，很浓厚，有点象香脂的气味。

他下意识地撕开几份医学杂志的包装纸，翻了一下。突然他想起拉歇尔。为什么？为什么没有想到安娜，而偏偏想到了那位从来没有进过这座房子，并且几个月来他从来没有想起过的女人？“她现在怎样了呢？她可能在哪儿？她跟她的希尔茨一起，在热带的某个地方，远离欧洲，远离战争……”他把几本打

算带到穆斯吉埃去的小册子扔到壁炉上面。“如今垄断这些杂志的医生们都是些老家伙，没有参军的人……真是运气！他们可以利用机会，把箱子底的存货都倒出来了……”他匆匆看了看目录。间或有一位年轻大夫挤出时间，从战地医院给杂志寄来一篇简短的报告，叙述某个特殊的病例。大多是外科大夫……“战争至少对这个还有点用处，推进外科学向前发展……”他站在那儿，在这堆书里搜寻，有时从这里有时从那里抽出一本，送到壁炉上。“只要我把儿童呼吸道疾病的文章写出来，塞比雍一定能给我登在他的杂志上……”

有个包裹跟别的不一样，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上面贴着五颜六色的邮票。他拿过来，闻一闻，又嗅到他刚才已经发现的那种香味。他很惊异，吸着鼻子辨识寄件人的姓名：法属几内亚科纳克里医院博内小姐。邮票上打着日戳：一九一五年三月。已经三年了。他惊奇地在手里转动着这个小包，掂量了一下。是药，还是香水？他弄断绳子，从纸包里拿出一个长方形的微微发红的木头匣子，每一面都钉着钉。“嗯……不容易打开……”他用眼睛寻找工具。他正要放弃尝试，不再满足好奇心，忽然想起口袋里有一把军用小刀。刀刃在木槽里响了一阵，轻轻一撬，盖子开了。浓烈的香气扑鼻而来，是一种东方的香料，象安息香，乳香，是一种熟悉的香味，但一时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他用手指小心翼翼地吧木屑拨开，几粒黄色的珠子露出来，亮晶晶的，又象蒙着些尘土。突然，往事出现在面前：这黄色的珠子……这龙涎香和麝香的项链！拉歇尔项链！

他拿起来，小心翼翼地擦拭着。他的眼睛湿润了。拉歇尔！她雪白的脖子，她那后脖颈……勒阿弗尔，罗马尼亚号在清晨启航……可是，为什么寄来这个项链呢？这位科纳克里的博内小

姐是谁？一九一五年三月……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他赶快把项链装进衣袋里。

吉丝来叫他吃午饭。她站在门口，闻着气味，

“有一种特别的味儿……”

安托万把盖布又蒙在那一堆书籍药品上。

“他们把所有的成药都堆在这儿了……”

“你来吗？饭准备好了。”

安托万跟着她走过去。在衣袋里，他感到握在手心里的凉珠子逐渐暖和起来，他想到拉歇尔那白皙的身体和棕红的头发。

四

他们刚在大餐桌的一端肩并肩地坐好，吉丝就神情坚定地说：

“现在，你对我认真地说说你的健康情况。”

安托万撅了撅嘴。他并不十分乐意谈他自己、他的病和怎样治疗。但是，既然是请求他说，他倒也不厌烦，于是，不慌不忙地回答了那姑娘的头几个问题。他很快地发现问得不笨。这个小吉丝，他一向愿意当作孩子看待，在医院干了三年之后，取得了精确的本领。可以跟她谈医学了。在他们之间又多了一层联系……吉丝注意听着，更增加了他的兴致。他说了总的情况，又逐一叙述近几个月来病情的变化。如果她显得对他的叙述毫不在意，或者故意说好多鼓励他的话，那他倒会不安了。但是，她听着他说，面容紧张，专注的目光直盯着他，显出探询的模样，于是，安托万反而用确定的口气下了结论：

“总而言之，我的病能治好。”（这的确是他思想的实质。）他

信心十足地微笑着，接下去说：“时间也许会稍长一些，但是，我要好起来，我就一定会好……只不过，问题在于，我能完全复原吗？你想想，要是我喉部残废，或者声带十分脆弱，我还能象以前那样行医吗？……你完全知道，只是肯定能活下去，对我来说完全不够。我一点也不担心将来还能过一个残废人的生活。我要的是肯定恢复往日的健壮体魄，而这一点，就不太肯定了……”

她不再吃了，好把安托万的话听清楚，了解透彻，她用圆圆的、惊异的、一动不动的眼睛看着他，象孩子似的，忠诚得象原始动物。这种多年来失却的温存关切，对他说来真是太甜美了。他又信心十足地笑一下：

“还不太肯定，但是，并非完全不可能。只要坚持不懈，很少有不可能做到的事……直到现在，凡是我竭力争取的，我都做到了。这一次为什么就不能成功呢？……我要治好病，病就能治好。”

最后这句话，他说得特别重，因为咳嗽起来，只好停住嘴。他咳得很厉害，足足咳了一分多钟。这时，吉丝对着盘子低下头去，偷偷地观察他。她尽量让自己放心：“他要作什么，就一定能作到。他会照顾自己，他会把病治好。”

这一阵发作过去后，吉丝转过身来。他表示他情愿歇一会儿，不说话。

“喝点水吧！”她说，倒了一满杯水。她控制不住，还是提出了那个急于提出的问题：

“你能跟我们一起待几天？”

安托万没有回答，这正是他想回避的问题。获准的假期确实有四天，但是，他想把假期缩短，不想在巴黎过整整四天，免得遇到种种事情受到劳累，不得不仓促治疗。

吉丝用疑问的眼睛看着他，又问一句：

“几天呢？八天？六天？五天？”

安托万一直摇头，深深吸一口气，笑了一下，说道：

“我明天就走。”

“明天？”吉丝失望得嗓音都发抖了：“那么，你不到拉菲特庄去看我们？”

“不能去了，我的小吉丝……这次不能去……以后吧……夏天，也许……”

“那我就很难再见到你啦！这么多年不见了！……明天就走？我甚至不能留在巴黎跟你在一起，今天晚上我必须回拉菲特庄睡！明天早上我值班。你想想，我已经走了三天，我走的前一天，医院里来了六个新伤兵！”

“至少，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在一起，”安托万随和地说。

“可是，连这也不可能！”她懊丧地喊道。“我已经约好，过一会儿就到养老院去，要把那里我姑妈的东西、家具都料理清楚，他们需要房间用……”

她的眼睛里涌上了眼泪，安托万立刻想起她小的时候失望的样子。他又想道：“让她来照顾我养病，享受周围这亲切的气氛，的确是不错……”

安托万不知说什么好。他自己也觉得这次见面时间太短，令人失望。他忽然说了句假话：

“也许，我可以获准延长假期……说不定……可以试一试……”

吉丝的眼睛一下子就发了亮，变得笑盈盈了。她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真是美丽……（这又使安托万想起过去的岁月。）

“就该这么办，”她拍着手决断地说。“你到拉菲特庄去，跟我们一起过几天！”

“她还是个孩子，”他想。“这种难以形容的稚气跟她那女性的成熟恰成强烈的对比，充满了魅力……”

为了换个话题，他俯过身去，用疑问的口气说：

“现在，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人陪你到巴黎来？拉菲特庄并不远，他们让你一个人来办丧事！”

她马上解释：

“你想象不到我们的工作多么忙！又能怎样呢？我一走，别人的工作就更多了！”

看到吉丝这样激动，他不禁笑了。这时，为了说服安托万，她就滔滔不绝地讲他们医院的工作，在拉菲特庄的生活……

（一九一四年九月中旬，马恩战役之后，丰塔南夫人急于做一些有用的事情，计划在拉菲特庄设立一个医院。她仍然保留着她父亲在日耳曼森林边缘的产业。她的房客是英国人，宣战以后都离开法国了，那乡间的旧住宅空了出来。但是，房子不仅太狭小，离火车站和市场也太远。于是，丰塔南夫人想到问问安托万是不是可以把蒂博先生的别墅借给她用。这座房子比她的大得多，而且就在“本地”附近。安托万当然同意，马上给留在巴黎的吉丝写信，叫她连同两个女仆，都听丰塔南夫人的吩咐，把别墅改成医院。丰塔南夫人这边，她的外甥女，外科大夫的太太尼科尔·埃凯也答应一定帮忙，她有护士资格的正式文凭。在伤员福利协会的主持下，很快组织了一个领导委员会。六个星期以后，蒂博先生的别墅匆匆装修一番，挂上了牌子：“医疗处附属第七医院”，准备接待第一批病人了。从此，丰塔南夫人和尼科尔领导的第七医院一天也没有闲过。）

安托万从信里知道了这些，父亲的产业终于有了点用处，他很高兴，吉丝本来在巴黎无所事事，他很为她不安，现在终于在丰塔南夫人家里得到极为热情的接待，这尤其使他高兴。不过，说真的，对于第七医院的业务活动，就跟对丰塔南家那座乡间小屋里的家务事一样，他并没有特别关心。丰塔南夫人那里现在成了一个奇怪的集合体，家务全由蒂博先生以前的厨娘，壮健的克洛蒂尔德操持，尼科尔和吉丝住在那里，但以理在截肢以后，也待在那里，珍妮带着孩子从瑞士回来之后也住在那里。安托万怀着好奇听吉丝这样絮絮叨叨，他以前并不经常想到的这一小群人的生活突然在他眼前有了实在的内容。

“在我们所有的女人中间，还是珍妮给自己找的麻烦最多，”吉丝只注意她的话题，解释说。“她不但要照看让—保罗，还要领导医院的洗衣部门，你想想，医院三十八张病床，有时是四十张甚至四十五张病床需要的东西，要洗，要熨，要缝补，要计数，整理，每天分送！晚上回到家来，她总是筋疲力尽。她每天下午都在医院，上午在家，照拂小家伙……丰塔南夫人就住在病人旁边，她在马房上面布置了一间卧室，你还记得吗？”

严守礼法的老小姐的侄女吉丝说到珍妮，谈到珍妮作妈妈，仿佛那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安托万听了，觉得相当惊奇。“是呀，”他想，“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再说，往日一定会认为很丑的事，在这所有的道德标准都被打乱的时代，也容易被别人接受了……”

吉丝叹了一口气，用责备的声调说：“再说，你回巴黎一趟，连我们的小家伙都没有看一眼！珍妮会非常难过的。”

“你只要不提就是了，小傻瓜！”

“不行，”她的声调异常严肃，突然把头一低。“对珍妮，我什

么都不隐瞒，永远不隐瞒。”

安托万惊异地看着她，但没有追问。

“你延长假期一定能批准吗？”她又问。

“我去试试。”

“怎么试呢？”

他继续撒谎：

“我请吕梅尔给主管这类事情的军事部门打个电话……”

“吕梅尔……”她思索着重复一句。

“反正，我本来就想今天去看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自从……我想谢谢他帮了我们的忙。”

这是这一天里他第一次提到雅克的死。吉丝的脸突然抽搐起来，皮肤上的茶褐色也就一片片地更深了。

（一九一四年秋天，她一直不肯相信雅克确实死了。雅克一直没有音信，在日内瓦的朋友都说雅克已经去世，连珍妮和安托万都深信不疑，可是这些对她都没有用。她固执地认为：“他是利用打仗的机会又一次逃跑了，这次，他又会回来的。”她作着九日祈祷，焦虑地等待雅克回来。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对珍妮有了亲密的感情。她对珍妮的眷恋起初是出于一种相当自私的盘算：“等雅克回来的时候，他会发现我们俩已做了好朋友，我就可以作为一个第三者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也许，看到他不在的时候我守护着珍妮，雅克会感激我的……”他们通过吕梅尔，知道飞机着火坠落了，她又看到官方纪录的复制本，本来应该恍然大悟，但是在她的心底，仍然有一种模糊的本能，认为这不是真的。即使到了现在，她有时还会出现一闪之念：“有谁说得准呢？……”）

她又把头低下去，避开安托万的眼光。好象她的心忽然全

乱了，她发着愣，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极力忍住眼泪。终于，为了不哭出来，她急忙站起身，向配膳室走去。

无心扰乱了吉丝的感情，安托万自己也觉得不痛快。这时，他看着她走远，心里想道：“她发胖了。臀部！……上身，整个的身体，好象比实际年龄大了十岁，显得三十出头了！”

他从衣袋里掏出那串项链。樱桃那么大的铅灰色麝香珠跟古老的龙涎香珠交错着穿在一起，龙涎香珠形状象黄香李，颜色也象熟透的黄香李：依稀透明的深黄色。他无意识地用手指盘弄着那串珠子，珠子暖和起来，安托万觉得这项链好象是他刚从拉歇尔的脖子上摘下来似的……

当吉丝端着一盘草莓又回来的时候，脸上仍可看出十分悲痛的模样，安托万不由得很感动。她把草莓放在桌子上，安托万默默地抚摸着那戴着一只银镯子的金褐色的手腕。吉丝打了个寒噤，睫毛抖动着……她故意不看安托万，坐到自己的位子上，眼皮上又涌出两滴眼泪。这时，她不再掩饰她的悲伤，转过身来，窘困地笑一笑，停了一会儿，说不出话。

终于，她叹了口气说：“我真傻！”她开始冷静地往草莓上撒糖。可是，她几乎又立刻放下了糖罐，猛然挺起身来：“安托万，你知道让我最痛苦的是什么吗？那就是，我周围没有一个人再提他的名字……珍妮不断地想他，这我知道，我感觉得出。她那么爱那个小家伙，就是因为他是雅克的儿子……而雅克也好象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我现在对珍妮感情这样浓厚，就是因为我怀念着雅克。而她，不是因为这个，她为什么那么热情地接待我，把我当她的亲姊妹看待呢？但是，她从来，从来不提他！这好象一个秘密，总是缠绕在我们两人的心头，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这个谁也没有吐露过一个字！安托万，我真气

闷！……”她断断续续地接着说：“我告诉你，珍妮……她很骄傲，难以相处！她……我现在很了解她！……我爱她，我可以为了她和那个孩子献出生命！但是，我痛苦。我痛苦，是因为她是那个样子，那么不开朗，那么……——我说不清楚……你看，我知道，她以为除了她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得了解雅克，所以她痛苦。她以为她是唯一了解他的人，她就不讲道理地保持了这个独特的身份，跟任何人都决不谈他，特别是跟我！……可是，可是……”

沉重的泪珠从她脸上流下，虽然这时候在她突然变老的脸上已经没有悲哀的表情，只有激动、愤怒和安托万也说不太清楚的一种孤僻。他思索着，心里很惊奇。他从来没有料到珍妮和吉丝会这样亲密起来。

“我从来不敢肯定她是不是知道……我对雅克的感情，”吉丝压低了声音，还是那样激动。“我很想跟她敞开胸怀谈谈这件事！我没有什么要瞒她的……我愿意她什么都知道！甚至让她知道我从前多么恨她——啊，对！恨得厉害！——而现在却相反，雅克死后，我对他的感情……”（她的眼睛里发出动人的光辉。）……“我把它全部都放到珍妮身上，放到他们的孩子身上了！”

这一会儿，安托万几乎忘了听她讲，只是注意看着她那棕色的眼皮在颤动，修长的睫毛慢慢抬起来又垂下去，一忽儿露出明亮的眸子，一忽儿又将它遮住，就好象灯塔间歇射出的光柱。他把臂肘拄在桌上，手掌托着腮，满怀柔情地嗅着指尖上残留的麝香气味。

“现在，这就是我整个的家！”吉丝极力显得镇静，接着又说。“珍妮已经答应永远让我在她身边……”

“如果我向她求婚，她愿意跟我生活在一起吗？”安托万想。

“……对，她答应了。这是我生活的支柱，使我能够面对未来，你明白吗？除了她——和我们的家伙之外，世上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

“她不会接受的，”安托万想。不过，在吉丝的声音里，他却发觉某些不和谐的成分，他觉得很能揭示出一些隐秘。“显然，有多少错综复杂的情感，”他心里想，“在这两颗女人的心——两个寡妇的心里！有亲密，我不怀疑，但肯定还有嫉妒，甚至还很可能有夹着欺哄成分的憎恨……这一切强烈地混合在一起，与爱情就极其相似了……”

吉丝继续说，现在，这已经是抱怨性的独白，说出来能让她松快，她已经克制不住了：

“这个珍妮真是个特别的人……高尚，刚强……令人佩服！可是，她对别人那么严厉！就是这样，她对但以理也很严厉，甚至不公平……对我也一样。我感觉得很清楚，她……噢，她当然有这种权利。跟她一比，我实在不算什么！不过，她也并不是总对。她盲目自信，只信任自己，她不容许别人还可能有另外的想法……当然，我不要求办不到的事！既然她不愿意按照让一保罗的父亲的宗教来教育孩子，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服不了她……可是，她起码应该请一位牧师给孩子施洗！”她的眼光严峻起来，就好象当年的老小姐一样，固执地摇着前额突出的脑袋，紧闭起嘴唇，好象任何让步都不可能了。她突然向安托万转过身来，说道：“你想是不是？她愿意的话，尽管把孩子培养成个小新教徒就是了，可是，抚育雅克的儿子，她总不该象养一条狗一样！”

安托万胡乱点了点头。

“你真不了解他，这小家伙，”吉丝又说。“他天性热情，将来

需要别人疼爱！……”她叹了一口气，忽然改变了口气，用痛苦的声调说：“跟雅克一模一样！如果雅克不失掉宗教信仰，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这时，她的面容又一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柔和了，眼睛里渐渐露出了愉快的笑意，“他那么象雅克，这小家伙！棕红色的头发，跟他一样！也是他那样的眼睛，他那样的手！……刚三岁，就那么固执，有时候，那么倔强，有时，又那样撒娇……”在她的嗓音里，一点怨恨的痕迹都没有了，她开朗地笑起来：“他叫我吉阿姨！”

“你说他那么固执吗？”

“就跟雅克一样。也象他那样发脾气，你还记得吗？不声不响地生闷气……这时，他就一个人跑到花园的尽头去，不知道在反复思考什么。”

“聪明？”

“非常聪明！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猜得着，而且非常敏感！跟他来软的他什么都答应，但如果拗着他，他要干什么不让他干，他就会皱起眉毛，握紧拳头，控制不住自己了……完全跟雅克一样。”她思索了一会儿。“但以理刚给他照了一张像，珍妮大概给你寄去了？”

“没有。珍妮从来没有给我寄过她儿子的任何照片。”

她很惊讶，向安托万抬起眼睛，仿佛在询问，好象要说什么，终于没有开口。最后，她才说：

“我的手提包里有一张……你要看吗？”

“要看。”

她跑去找手提包，从里面拿出两张家里自己拍的照片。

其中一张大概是去年拍的，让—保罗跟他母亲在一起。珍妮胖了些，脸比往日丰满，面容沉静，甚至有些严肃。安托万想：

“她很象丰塔南夫人。”珍妮穿着一件黑衣裙，坐在台阶上，把孩子抱在怀里。

另一张显然是新近照的，只有让一保罗一个人，穿着一件条子毛线衫，衬出使人惊异的肌肉厚实的小身体。他站着，低着下巴，身子板直，象在赌气。

安托万把两张像片看了很久。第二张特别使他想起来雅克：一样的头发，一样深凹的眼眶，锐利的眼神，一样的嘴，一样的下巴——蒂博家强有力的下巴。

吉丝站在安托万身后，俯身对他说：“你看，他正在玩沙子。那边是他的铲子，他一生气，把铲子扔了，因为别人打断了他的游戏，他自己退到墙角里……”

安托万抬起脸，笑着问她：

“你那么喜欢这孩子？”

她没有回答，只笑了笑，再也没有比这心花怒放、充满感情的笑容更能表明她的心意了。

然而，安托万没有看出来，她有些慌乱。每逢想到她那年干的这件荒唐事她都感到慌乱……（两年以前，甚至更早一些，让一保罗还是个没有断奶的婴儿。吉丝最喜欢抱他，摇他，贴着自己的胸脯哄他睡觉。她看到珍妮给孩子喂奶，感到又艳羡又丧气。夏季里的一天，珍妮把孩子交给她看管——那天要下雨，闷热得使人烦躁，她克制不住荒谬的欲望，抱着孩子到自己的房间去，关好门，把自己的奶头塞给他。啊！那贪婪的小嘴直扑过来，吮她，咬她，弄得她好痛……奶头出了瘀斑，痛了好几天，同时，她又感到羞愧……这是一件罪过吗？只是在忏悔时含糊其辞地承认过之后，她才平静一些，以后，又进行了长时期的悔过，从此，再也没有作过……）

“他时常摆出这种姿态，这种不肯让步的样子吗？”安托万问。

“啊！对，时常这样！时常是但以理招惹了他，可是，他对但以理的话还肯听一点，我想，因为但以理是男人。对，他喜欢他妈妈，我，我也一样，他很爱我。但是，我们两个都是女人。怎么说呢？他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作为男人的优越性了。你在笑吗？我说的是真话！从许许多多的小事上可以看出来……”

“我倒是更以为，时间长了，你们的权威就不灵了，因为你们总在他身边，而他看到舅舅的时间很少……”

“很少？他正是跟舅舅的时间比跟我们多，因为我们要到医院上班，但以理差不多整天看着他。”

“但以理？”

她把放在安托万肩膀上的手挪开，走过去一点，坐下来：

“对，怎么？你奇怪？”

“我很难想象但以理会当保姆……”

吉丝不明白他的话，她只是在但以理·德·丰塔南截肢以后才跟他认识的。

“正相反，他整天陪着孩子。在拉菲特庄，一天的时间很长……”

“可是，他现在退役了，大概可以重新工作了吧？”

“到医院工作？”

“不，画画！”

“画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画过画……”

“他不常到巴黎来吗？”

“从来不。他甚至不离开家，不离开院子。”

“他真的行动那么困难？”

“哎，倒不是因为这个，特别是他装了新的假腿以后，得注意观察才能发现他有点跛……不过，他不愿意出门。他读读报纸，照看让—保罗，领他玩玩，领他在屋子周围散步。有时候，他帮克洛蒂尔德剥豆子，削果皮作果酱。有时候，他耙一耙平台上的沙地。但不常干……我觉得他天性就是这样，沉静，冷漠，有点迷迷糊糊……”

“但以理？”

“对呀！”

“他从前完全不是你说的这样……他大概非常不幸。”

“你怎么会这样想！他一点都没有厌倦的样子。无论怎样，他从来不抱怨。即使他有时显得有些阴郁——对别人，从来不对我，——那是因为别人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他。尼科尔总逗弄他，毫无意义地把她惹恼。珍妮也很笨，一言不发，态度生硬，伤他的心……珍妮很善良，非常善良，但她不知道怎样表现出来，她从来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是招人喜欢的……”

安托万不再争论，可是他呆呆的样子把吉丝逗笑了：

“我觉得你不很了解但以理的性格。他大概有点被惯坏了……懒散极了！”

饭早就吃完了。她看看表，赶忙站起来：

“我要收拾收拾桌子，然后，得走了。”

她站在安托万面前，温情地望着他。要把一个病人独自丢在一个没有人住的房子里，她很难过。她犹豫着要说点什么。一丝殷勤而又胆怯的笑意从眼睛里漫出来，一直传到嘴唇。

“我傍晚来接你怎么样？你不要一个人留在这里，晚上到拉菲特庄去，跟我们一起，好吗？”

他摇摇头：

“无论如何，今天晚上不行。今天，我要去看吕梅尔，明天去看菲利普。另外，还要到楼下整理些东西，找一些资料……”

他考虑了一下，星期五晚上回到穆斯吉埃就行，完全可以到拉菲特庄去过两天。

“可是，我在那儿住在什么地方呢？”

吉丝很快地弯下腰来，兴高采烈地亲了他一下，才回答说：

“住在哪儿？当然是丰塔南家里，还有两间房，没有人住。”

他手里拿着让一保罗的照片，不时看一眼。

“好吧，我想办法要求延长假期……明天，傍晚……”他把指间捏着的照片一扬：“你把这个给我？”

五

吉丝走后，家里只剩了安托万，他给吕梅尔打了电话。虽然这天是星期日，吕梅尔还在凯道赛的办公室里。这位外交官抱歉说整个下午连一个钟头也抽不出来。他请安托万来找他一起去吃晚饭。

八点，安托万到了外交部，吕梅尔正在楼梯下面等他，在这里，只点着一盏小支光的灯。在这合乎规定的半明半暗里，下班的职员和迟到的来客静悄悄地走来走去，看上去有些奇怪，仿佛有些诡秘似的。

“我领您到马克西姆酒家去，让你改换一下医院的生活，”吕梅尔象个保护人似的和善地笑着，这样建议，领着安托万向院子里停着的一辆插小旗的汽车走去。

“我是个倒霉的客人，”安托万说，“晚上我只喝牛奶。”

“他们的牛奶好极了，大瓶冰镇的，”吕梅尔肯定地说。他已

经决定到马克西姆酒家去吃晚饭。

安托万点头表示同意。他这天在家里已经累坏了，把文件资料和藏书都翻了一通，晚上，还要跟吕梅尔谈话，他真有点害怕。他赶忙告诉吕梅尔，说他说话费力，不能让声带太劳累。

“对于我这样爱罗嗦的人真是好运气，”外交官喊道。他装出开玩笑的口气，掩饰他朋友那瘦削的面容和低沉费力的嗓音给他引起的不舒服的感觉。

走进饭店灯火辉煌的大厅，他觉得安托万瘦弱的身体和难看的气色更加触目，但是他避免过分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寒暄几句之后，连忙谈别的。

“不要肉汤，来几个牡蛎吧，现在是牡蛎旺季的最后几天了，不过，味道还很不错……我时常在这里吃晚饭。”

“我以前也时常到这里来，”安托万低声说。他的目光慢慢扫过大厅，停在年老的领班身上。领班正站着，听候点菜。“您不认得我了吧，让？”

“哦，不，完全认得，先生，”领班一边说一边应酬地微笑着鞠躬。

“他撒谎，”安托万想，“他以前总叫我‘大夫先生’……”

“这里离我们办公室那么近，”吕梅尔接着说。“尤其在有警报的晚上，很是方便，只要穿过大街，就能在海军部找到很好的掩蔽所。”

他点菜的时候，安托万观察着他。他也变了。他狮子似的大脸发胖了，浓密的头发已经花白，眼睛周围，颇显老相的金发人的白皮肤上，有无数细小的皱纹伸向四处。蓝色的眼睛仍然很灵活，但是，在下眼皮底下，淡紫色的肿肉垂在长着酒糟鼻子的人的那种布满红丝的颧骨上。

“最后的甜食，等一等再说，”他满面倦怠地点完菜，把菜谱还给领班，一仰头，两手捂住脸，用手指揉揉发烫的眼皮，然后，深深叹口气说：“我就象您看到的，亲爱的朋友，自从动员以来，我从来没有休过一天假。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这很明显。在这个神经质的人身上，劳累日积月累，表现为一种极度的兴奋。安托万一九一四年离开吕梅尔的时候，他还信心十足，能够自持，有一点踌躇满志，对任何事都爱发一通议论，但讲话却含蓄，有分寸。四年的过度劳累把他变成了现在的模样：痉挛似的突然大笑，眼光闪烁不定，说话指手划脚，从一个话题突然跳到另一个话题，充血的脸忽而病态地激动，忽而极度阴郁颓唐。尽管这样，他还是象往日一样，保持着衣冠楚楚的外表。每当他说他太累，每当他稍稍消沉，紧接着，就会暂时振作起来，稍微仰着头，抬起手大把地梳理头发，有意显出重新提起兴致的笑容。

关于雅克的死，他曾作过长时间的调查，珍妮要去瑞士那次，他也帮了忙，安托万想表示感谢，吕梅尔急忙拦住了他的话：

“那是应当的，算了，不要再提了，亲爱的……”接着，他忽然冒冒失失地说：“我觉得那位少妇很可爱，非常可爱……”

“他社交场的习气太重，不免总显出蠢相，”安托万想。

吕梅尔打断了安托万的话，自己却说起来没有完。他详细叙述了他奔走的经过，好象安托万完全不知情似的。在他脑子里，一切都记得准确得使人吃惊，他能毫不思索地说出中间请托过什么人，哪天干了什么。

“悲惨的结局！”他最后叹息着说。“您怎么不喝牛奶，快要凉了……”他用犹豫的眼神望了望安托万，把嘴唇浸到杯子里，擦擦散乱的猫胡子，又叹了一口气说：“是的，悲惨的结局……考虑

到您……我敢说……而且，鉴于目前的情况……您的思想……你们家庭的荣誉……我就不免要想——至少对于家庭来说——这样的结局……总的来看，不也是件……幸事？……”

安托万皱起眉头，没有回答。吕梅尔的话很伤他的心。不过，他必须承认，知道雅克临终前几天的情况之后，这种想法，他自己也曾有过。对，他也曾这样想过，然而，今天他不这样想了，并且，一想起他曾有过这样的想法，甚至感到刺心的惶恐。这几年的战争，在病院漫长的不眠之夜所作的思考，都把他战前所作的大部分判断严重地扰乱了。

他一点也不想去跟吕梅尔谈这些私事，尤其不愿在这个地方谈。他以前经常和安娜一起到这里来吃饭，这次又来，刚一进门，就觉得越来越不舒服。战争进行到第四十四个月，这家豪华的饭店里竟然还有这么多人，他天真地觉得惊异。每张桌子都坐满了，就象往日里顾客云集的晚上一样。妇女也许没有从前那么多，也没有从前那样衣着华丽；很多女人还保留着护士的模样。大多数男人都是军队里的，系着打过油的武装带，趾高气扬，军装上有五颜六色的绶带。有些是从前线回来休假的部队军官，但大多数是巴黎卫戍部队或是总司令部的军官。有一群飞行员在吵吵嚷嚷地大吃大喝，悲哀的眼光露出些傻气，好象酒未入唇就先醉倒了。在这里可以看到意大利的、比利时的、罗马尼亚的、日本的形形色色的军装。有几个海军军官。不过大多还是英国人，穿着卡其布的散领军服，内衣十分考究，他们到这里来吃饭是专为喝香槟酒的。

“您康复的时候不要忘记告诉我，”吕梅尔友好地说。“不应该把您送回前线，您贡献得已经够多了……”

安托万想更正一下。一九一七年冬天，他第一次受伤痊愈之

后,就已经被调到后方的医院了。可是吕梅尔说个不停:

“我现在差不多可以肯定,一直到战争结束,我都不会离开外交部。克列孟梭先生刚就职的时候,我差一点被派到伦敦去。我跟普恩加来总统一直相处很好,特别是贝特罗先生,我了解他的一切癖好,他也需要我。要是没有他们两位,特别是没有贝特罗先生帮忙,我早就被送上船了。显然,这年头,在海峡那边过日子不是没有好处。可是到了那里就不能象我现在这样,知道一切内情了,而这是很有趣的!”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您,您至少总算个特殊人物,相当了解时局发展的内幕……而且,说不定能够预卜未来!”

“唉,”吕梅尔打断他的话,“说不上什么了解,更不能预卜未来……知道底牌也没有用,亲爱的。正在进行的事谁也搞不清楚,只不过事过之后,回溯起来,才勉强知道个大概……您不要以为今天的政治家,哪怕是克列孟梭那样固执专横的人,能够控制时局,他也得跟着情况发展跑……战时管理国家,就象驾驶四面漏水的船,得不断临时施展妙计,堵住最危险的水路。我们现在好比在遭了海难的船上,简直没有功夫弄清自己在什么地方,看看海图,定出来一个大概的方向……克列孟梭先生跟别人一样,得忍受这些事件,只要有可能,就利用一下事态的发展。由于我所处的地位,可以对他就近观察。这是个有趣的怪人……”他显出思索的样子,刻意作出犹豫的口气接着说:“您知道,克列孟梭先生是天然的怀疑主义……深思熟虑的悲观……以及坚决的乐观主义的奇特混合物;不过,也必须承认,混合的比例十分精妙!”他微妙地一笑,一直笑到眼角上,好象很欣赏自己的机敏,品尝着他刚才说的俏皮话。显然,这几个月,这句口头禅他对每一个交谈的人都要说一遍。他接着又说:“并且,有一

种诚朴人的朴实信仰在推动着这位伟大的怀疑论者：他坚决相信，克列孟梭先生的祖国绝不可能被打垮！这个，亲爱的，这是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即使在现在——咱们私下说说，现在，我看到最乐观的人信心都发生了动摇——可是，即使现在，这个老爱国主义者还是认为，胜利是肯定无疑的，肯定无疑。仿佛是按照天意，法国的事业绝不可能得不到光荣的胜利！”

安托万咳嗽起来，——邻座有个英国少校点着了一支雪茄——他想说话，可是声音太弱，又把餐巾堵在嘴上，结果只听得清几个字：

“……美国的援助……威尔逊……”

吕梅尔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装作听懂了他的话。他甚至摆出特别感兴趣的样子。

“呸！”他说，又沉思着用手摸摸脸，“您知道，对于我们来说，威尔逊总统！……在法国和英国，我们不得不对这位美国教授异想天开的玩意儿表示最大的敬意；可是，我们对他可不要看错了。这个人思想迟钝，毫无相对观念。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由他的神秘想象凭空制造的非真实的世界里……上帝保佑我们，不要让这个清教徒的过于简单的道德主义搅乱了我们古老欧洲的事务中那些精巧的齿轮！”

安托万很想插嘴，他的喉咙却不允许。他觉得，在现今国家的首脑中，威尔逊是唯一能够预见战后，唯一能够想到世界未来的人。他只好连连摇手，表示不同意。

吕梅尔觉得有趣，微笑着说：

“亲爱的，不对，不是开玩笑吧？您总不至于赞成威尔逊总统的奇谈怪论吧！在大西洋彼岸，在那个半开化的儿童国度里，那侧可能被人认真看待哩！可是，在我们古老而明智的欧洲，去

它的吧！让这种乌托邦适应我们这里的风土，简直就是制造大混乱！您看，对于权利啦，公理啦，自由啦，诸如此类堂皇的字眼，能够造成多大的危害，人们怎么估计都是不足的。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人们大概已经知道，所谓宽大政策能够造成多么大的灾害！”

他伸出胳膊，把又粗又胖长满黑斑的手放在桌子上，弯过身来，推心置腹地说：

“再说，知情人士认为，威尔逊总统完全不象表面那么天真，对于他的那些咨文他自己也不会上当，据说，这位‘没有胜利的和平’的保卫者只不过具有十分现实的野心，妄图利用局势，把旧大陆置于美国的监护之下，阻止协约国在将来的国际事务中占据由于胜利而必定获得的优势地位。这一点，顺便说一句，正暴露了人所所知的那天真的程度，因为，以为法国和英国费尽力气，打了这么多年耗尽资财的仗，竟会同意不从中认真地取得一些确实的利益，那真是太天真了！”

“不过，”安托万在内心里辩驳，“建立起真正的和平，终于能够持久的和平，对于欧洲各国人民来说，不就是从战争中取得最确实的利益吗？”不过，他保持着沉默。热气，噪音，食物加着烟草的气味，使他越来越不舒服，心情也越来越沉重了。“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呢？”他想，很生自己的气。“这个晚上可过得妙极了！”

吕梅尔却什么都没有觉察。贬低威尔逊他好象能得到个人的乐趣似的。在凯道赛的走廊里，几个月以来，威尔逊就是那些先生们奋力攻击的目标。他有时停住嘴，报复似的用喉音笑起来，在椅子上扭来扭去，就象有针在扎他似的。

“幸亏，普恩加来总统和克列孟梭先生作为现实主义者，作为真正的拉丁人子孙，不但了解威尔逊的幻想毫无用处，还知道

他的隐秘的狂妄意图……可是，这种狂妄倒也可以利用于……可获实利的目的！目前最要紧的，是尽量从美国多骗取些石油、物资、飞机和人力。为了这个目的，就千万不要得罪这位强大的供给者，必要的时候甚至要说他这癖好是出于好意，就象哄那些疯子一样。说老实话，一直到现在，这种策略所得到的效果还是相当可观……”他弯下身，对安托万咬着耳朵说：“您知道吗？幸亏他在几星期之内就给我们运来了两千吨石油，每个月给我们派来三十万兵力，今年英国在庇卡底遭到惨败之后，我们才能支持得住……所以，就应该这么干下去。对这位戴夹鼻眼镜的罗恩格林^①的各类想入非非的怪癖大加恭维……等到在我们法国国土上有了一股强大的美国军队，能跟我们换换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多少喘口气了，就可以坐山观虎斗，等着美国给我们火中取栗！”

安托万思索着，看着吕梅尔啃牛排——他吩咐过：“略烤一下就行，要嫩！”安托万举起手，象要求发言一样：

“那么，您以为……仗还要打好多年？”

吕梅尔推开盘子，微微向后仰着说：

“好多年，倒未必，实际上，我并不这样想。我甚至认为说不定我们会有意外的好运气……”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手指头，又放低了声音，不让邻座听见，接着说：“您听着，蒂博。我记得一九一五年二月，德夏内尔^②先生一天晚上对我说：‘这次战争的期限和变化都很难逆料。照我看，这是大革命时期和帝国时代^③战争

① 威尔逊是戴夹鼻眼镜的，罗恩格林是日耳曼民族古老传说中的英雄。

② 德夏内尔（1855—1922），1912年至1920年任法国总理，1920年2月至7月任法国总统。

③ 指法国第一帝国时代。

的重演。也许会有暂时的休战，但最终的和平还遥远得很！’那时候，我以为他只是心血来潮，随口说说。可是今天……今天，我几乎认为这话好象很有预见。”他停顿了一会儿，玩弄着盐瓶，又接着说：“因为，如果明天协约国得到压倒的胜利，中欧帝国方面建议放下武器，我就会跟德夏内尔先生一样，认为这只是休战，而最终的和平还遥远得很！”

他叹了一口气，又用使安托万厌烦不堪的那种背书似的声调，从德军入侵比利时开始，极其生动地逐段讲述战争的各个进程。这样撮其大要，简化成为清清楚楚的提纲，事件的前后发展以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逻辑性联系起来，就好象在叙述一局棋是怎么下的。这次战争，是安托万逐日亲身经历过来的，在事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又以历史的面貌重新呈现出来。一直到这时，马恩、索姆、凡尔登这些地名只能引起安托万具体的、个人的、悲剧性的回忆，经这位外交官口若悬河一般的讲述，却忽然丧失了真实性，变成了技术性说明的各个明确的标志，给子孙后代阅读的教科书里一个个章节的标题了。

“现在是一九一八年，”吕梅尔总括地说。“美国参战，这就意味着加紧封锁，日耳曼各国士气瓦解。从逻辑上推论，这就是他们不可避免的失败。在这个新的事实面前，他们有两种态度可以选择：或者，趁着还来得及，举行谈判，争取一个不稳定的和平；或者是孤注一掷，发动攻势，争取在美国大批军队到达之前一举获胜。他们选择了进攻，由此产生了三月间在底卡底那次声势浩大的冲击。他们又一次差一点获得胜利。这样，他们现在转入进攻了。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这一着会成功吗？有可能。不能说我们在今年夏天以前不会被迫要求停战。不过，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的最后一张牌也就打掉了。那时，他们就

输掉了这次战争。我们或者是消极等待美国人大批涌进来；或者是投入我们最后的力量在各条战线上发动进攻，赶在美国人投入战斗之前，抓住大宗的抵押品——这好象正是福熙将军的计划。所以我倒情愿说：真正的和平，最终的和平，也许还遥远得很，但是，休战很可能相当近了。”

他不得不停住嘴，因为安托万很厉害地咳嗽起来，这次，他很难装作没有看见了。

“对不起，亲爱的……我的话太多，让您听累了……走吧！”

他向领班打了个招呼，就象美国兵那种派头儿，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揉皱的票子，漫不经心地付了帐。

王宫大街很黑。汽车灭了灯，挨着人行道等着。

吕梅尔仰起脸说：

“天光很亮，他们今天晚上很可能会来……我回部里去，看看有没有新闻。可是，首先把您送回家去。”

安托万已经坐上汽车，吕梅尔在上车前，向一个女报贩买了几份晚报。

“欺骗性宣传，”安托万轻轻说。

吕梅尔没有立刻回答，他先小心地把跟司机座位隔开的玻璃板关上，然后转过身，对着安托万有点咄咄逼人地说：

“当然了，欺骗性宣传！对于国家来说，定期供应令人安心的新闻，跟配给食品或弹药同样重要，这您怎么不明白呢？”

“对了，您是管灵魂的，”安托万讽刺地顶他一句。

吕梅尔亲昵地拍拍他的膝头：

“算了，算了，蒂博，说正经的。您考虑考虑，打仗的时候，一个政府又能作什么呢？引导事态发展吗？您知道这是做不到的。

引导舆论？这才对了，这甚至是政府唯一能做的事！……好吧，我们就干这个。我们的主要工作，怎么说呢？就是经过修整地传播事实……必须不断地鼓动国民保持信心，坚信最后的胜利……不管是对还是错，必须每天不断地维持着国民对于军事或政治首脑的信任……”

“不管什么手段都可以？”

“当然！”

“有组织地撒谎也在内？”

“坦率地说吧，我可不知道，我，我们对斯图加特和卡尔斯鲁赫^①的空袭造成的平民无辜牺牲者比贝尔塔大炮^②在巴黎打死的人要多得多。我们在宣传中认为德国的潜艇战是一种违反人道的罪恶，但对于中欧帝国来说，这是个必要的措施，是他们在1916年进攻失败之后唯一能够摧毁我们抵抗的办法。‘露西塔尼亚号’^③被鱼雷击沉，归根到底，是对无情封锁的完全有道理的报复行动，是一种极为宽容的回答，而由于封锁，在德国和奥地利饿死的妇女儿童比‘露西塔尼亚号’上的旅客要多一两万倍！您以为能让大家说这个吗？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适合于讲出来的真实情况是太少了！必须说敌人永远是错的，协约国家的事业是唯一正确的事业！必须……”

“必须撒谎……”

“对！哪怕只是为了对那些正在战斗的人们隐瞒在后方策划的阴谋，哪怕只是为了向后方的人们隐瞒在前线发生的可怕

① 这两个地方都是当时德国的城市，工业中心。

②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使用的远射程大炮。

③ 英国轮船名，1915年被德国击沉，一千二百名乘客死亡。

事件！……在各国大使馆幕后，在对方国家，在中立国家发生的一切，对前方和后方都绝对不能讲！对了，亲爱的，正是这样，我们绝大部分的行动——我指的是行政领导的行动，不仅是您所说的极力撒谎，而且还撒谎撒得妙！这并不总是容易的，请您相信我的话吧！这需要有永不枯竭的长期经验、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需要有一种天才！……我可以肯定，将来会证明我们是对的！在这个有用的谎话的领域之内，这四年来，我们在法国已经创造了奇迹！”

汽车缓缓驶过灯光暗淡的圣日耳曼大道和大学街，停在安托万家门口。两人都下了车。

“喂，”吕梅尔继续说，“我想起一九一七年四月尼维尔^①攻势的那一星期……”他的声音忽然又激动起来，抓住安托万的胳膊，把他拉到离司机远一点的地方：“真实情况你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却对每个钟头发生的事全都一清二楚，错上加错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可以计算出损失的总数！四五天内，就有三万四千人阵亡，八万多人受伤！……还有几个团哗变遭到无情屠杀……可是，既谈不到诚实，也谈不到公正。必须在叛军得到武器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无情地把哗变镇压下去！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司令部，掩盖它的错误，维护它的威信……更糟的是，必须蓄意坚持错误，再次发动进攻，把其他的师也扔进这个火坑，在达姆大道上、拉弗前面又牺牲了两万到两万五千士兵……”

“可是，为什么呢？”

“为了得到一个小小的胜利，不管多么小，有了它，我们就可

^① 尼维尔，比利时的一个城市。

以撰写有益的谎言！重新鼓舞到处都已衰退的信心！……终于，我们在克拉奥纳出击顺利，能够把它吹嘘成辉煌的胜利。我们得救了！……十天以后，政府擢换了军事首脑，任命了贝当将军……”

安托万精疲力竭，再也站不住了，只得靠在墙上。吕梅尔把他扶到大门口，还继续往下说：

“对，我们得救了。但是我可以赌咒，我宁愿减少一年的寿命，不愿再过那四五个星期！”他的样子很真诚。“我走了。又看见了您，我非常高兴……”安托万迈进门坎，他还在说：“认真治疗，亲爱的！医生们都一样，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健康时，连最认真的人也非常马虎！……”

吉丝早把房间收拾好。百叶窗已关好，窗帘也拉下来了，椅子套都已摘掉，床也铺好了。一个玻璃杯和一杯清水放在床头柜就手的地方。照顾得这样细致周到，安托万心里反倒乱了，想道：“我大概比我自己想象的显得更疲乏……”

先给自己吸了些氧气，然后，他坐倒在一张安乐椅上，一动不动地过了十分钟，挺着身子，脖子靠在椅背上。

他忽然怀着强烈的敌意想起吕梅尔。当然，这不公平，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有的人打仗……有的人自己不打仗……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永远不可能有和解！”

呼吸逐渐畅快了些。他站起来试试体温：三十八度一……这样劳累了一天以后，还不算高……

上床之前，他还用了点时间作吸气治疗。

他恼怒地把头埋在枕头里，心里想道：“不，跟他们不可能取得谅解！将来，到了复员的那天，没有打过仗的人应该躲开，销

声匿迹。将来的法国以至欧洲，理所当然掌握在退伍军人手里。无论在什么地方，打过仗的人绝不会同意跟没有打过仗的人合作！”

黑暗重压着他，他忍着没有开灯。他的卧房就是从前蒂博先生的房间，就是老人在死前挣扎、受苦的地方。每个细节安托万都记得起来：最后一次洗澡，雅克，那解脱的一针，临终时刻的每一次波折。这是他父亲的房间，他在黑暗中睁大眼睛，仿佛看到在周围的桃花心木的大床，蒙着绒毡的祈祷凳，装着药品的橱柜。

六

因为吸过氧气，一夜过得不坏，但是，安托万几乎没有睡着。最后到了清晨，他才打了个盹，只一会儿的功夫，就在这时候，他在一个荒唐的恶梦中挣扎，这使他出了一身大汗，不得不换内衣。他躺下去，肯定再也睡不着了，就试图回忆回忆那个怪梦的片段：

“嗯……有各不相连的三段，三个场面……可是背景却是一个，都在我家的前厅里……

“开始，我和雷昂在一起，我又急又恼，因为父亲随时都会进来。情况可怕。我趁着父亲不在，要把他的财产都抢过来，把家里翻个乱七八糟。父亲就要回来了，我就要当场被抓住了。真可怕。我在前厅里走来走去，不知道怎么办才能躲过这场灾祸。逃跑是完全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吉丝，她马上就要回来……雷昂跟我一样着急，把脸贴在大门上，向外窥探。我还看到他那呆呆的眼睛，因为害怕睁得老大。刹那间，他扭过头来对我说，

‘要不要我赶快去通知太太?’

“这就是第一场。接着，父亲忽然来了，站在前厅中间，就在我的面前。他穿着大礼服，帽子上缠着黑纱(就象夏斯勒先生那样)，因为他要参加葬礼。谁的葬礼呢？他身旁的地上放着一只新手提箱(就是前天我旅行时携带的那一种)。雷昂不见了。父亲的神色又尊严又忙碌，翻着他的衣袋。他看到了我，对我说：‘啊，是你？……韦兹小姐不在吗？’接着，又说：‘亲爱的，我要对你说，我参观了一些非常美丽的地方……’（他的口吻就象在这种情况下常有的那样，又慈祥又庄严。）我呢，我的嘴发干，一句话都说不出。我觉得好象变成了个小孩子，在应得的处罚面前发着抖……同时，我呆呆地想：‘他上楼时，怎么没有发现楼梯变了样，彩绘大玻璃窗不见了，地毯也换成了新的呢？’过了一会儿，我又恐慌地想：‘怎样才能拦住他，不让他进我们的房，看到那张床呢？……’然后，我就知道了，大概梦被打断了……”

“无论如何，——第三场是这样的，——我又看到了父亲，他还站在那个地方，但是，穿着软底鞋和旧的家常上衣。他样子很不高兴。胡子一撇一撇的，伸着他那被假领的领尖夹住的脖子。这时，他冷笑着对我说：‘告诉我，亲爱的，你把我的夹鼻眼镜弄到哪儿去了？’他要的这夹鼻眼镜是玳瑁边的，我记得在他的写字台上看见过。我把这眼镜跟他的全部的衣服和东西一起，都送给穷人姊妹团^①了……于是，他发火了，向我冲过来，喊道：‘还有我的证券，你把我的证券弄到哪儿去了？’我结结巴巴地问：‘什么证券，父亲？’我汗流浹背，擦着汗，一面擦，一面侧耳听着，我时刻等着电梯响，希望看到吉丝走过来（她穿着护士

^① 穷人姊妹团是一个宗教慈善团体。

服，因为这正是她从医院回家的时候)……正在这时候，我醒了，果然满身大汗……”

想到自己那样害怕，他笑了，但还是心有余悸。“我大概有点发烧，”他心想。的确，三十七度八。比昨天晚上低一点，但比早上的正常体温要高。

两个钟头以后，一面忙着梳洗和治疗，一面又回忆起他的梦。

“真奇怪，”他想。“总的来看，这梦很短，统共只有三个迅速闪过的画面，跟雷昂一起焦急地等待，然后，父亲拿着箱子闯了进来，最后，是夹鼻眼镜和证券的事……是的，但是，围绕着这个梦的一切！这个梦就是在整个的过去，非常独特而完整的过去扎下了根！”

在盥洗室时间太长，他觉得有些气闷，就坐在澡盆边上，又思索起来：

“可以说，梦浸沉在过去之中，这显然是常见的现象，大概有人已经研究过……但是我却从来没有考虑……昨天夜里我做的梦，情况特别清楚……所以如果我有勇气，真值得记下来……不然的话，两天以后，我就全忘了……”

他看了看时间。用不着忙。他拿出时刻不忘带在身上的笔记本，每天晚上他就在这本子上记下自己的病情。他撕下几张白纸，披上吉丝挂在盥洗室里衣钩上的一件浴衣。(他微笑着想：“她什么都想到了，这小姑娘。”)然后，倒在床上。

他激动地写了三刻钟，忽然一阵门铃声打断了他。

是教授来的一封快信。菲利普教授用热情的措辞表示歉意，说在后天晚上以前不能接待他。他要离开巴黎两天，率领一个

代表团去诺尔省视察若干医院。

安托万很失望。为了自我安慰，他想菲利普也许能在他走之前回来，那么星期三还有机会跟他一起吃晚饭，星期四他再坐火车回格拉斯。

几张纸散在床上。一共五张，上面写满了他那种奇特的字体，每个字母都分开，象是象形文字似的。这是他作由法文译成希腊文的练习时养成的习惯。安托万把纸收拢来，又读了一遍。头两张对他的梦加以概略的叙述，写出他能回忆出的每个有特点的细节。后面三张写着零乱的评论。“尽力而为……”他气恼地低声说。以前，他非常善于写这类内容充实的笔记，只用几行，他那明晰的思想就能够概括出他长期思考的要点。他又想：“如果我要使自己适应重新给杂志写稿的话，还要进行反复的训练……”

他是这样写的：

“在一个梦里，有两点很清楚：

“第一，梦的本身，事件（做梦的人或多或少总是参预其事的）。情节，一般来说都很简短，零散，有起伏，很象演员演出的戏中的一个场面。

“第二，在这短暂的戏剧性时刻的周围，有一个特定的局势，就是这个局势规定着这个时刻，使梦还算合情合理。而这局势虽然在情节以外，做梦的人自己确实地意识到，按照作梦的人对情节的安排，做梦的人早已处于这个局势之中，就好象我们每个人清醒的时候，都有一个过去的景况。

“在我刚做的这个梦中，我发现，围绕着构成情节的这三个

细节，有整整一系列的环境，它们并不是我这个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只是暗含在这个梦之中。甚至，仔细看来，这些环境有两种，好像是构成两个不同的区域：一种是直接环境，梦就好像是被包括在这里面，还有第二个区域，时间较远，那是一组久远得多的环境，形成想象中的过去。如果没有这个过去，做梦也就不可能了。我作为做梦的人能够始终意识到的这个过去，在梦的过程中却不起什么作用，它只是存在于梦境以前的，正如每个人物的过去，是在偶然聚集在舞台上的情节之前而存在的一样。

“说得更清楚些，我所说的第一个区域的环境，指的是，比如说，我知道梦中的时间，虽然做梦的时候，根本谈不上时间问题。我知道，那是十二点差几分的事，象每天一样，我正等着吉丝来吃午饭。我知道，当天早晨，吉丝不在家的时候，我接到父亲的一个电报，说他要回来参加葬礼。我来不及通知吉丝。（这里不太清楚，谁的葬礼呢？不是韦兹小姐的葬礼，但是个近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悲痛。）我知道，父亲在口袋里掏钱，要付车费。因为我知道，有一辆出租汽车，装着行李，把他送了来，已停在家门口。（我甚至觉得，在我看见父亲到前厅的同时，也看见那辆出租汽车停在街上。）等等。

“第二个区域的环境，指的是相当久远以前的那一系列事件，而做梦的安托万是知道的。这些事件，在做梦的过程中，我不能说我确实地想到了它们，但是，关于它们的记忆，却始终存在于我的心中，正如对于我们真实生活的回忆一样。因此，我知道（其实，我应该写我本已知道）父亲早已离开法国，不知是哪个慈善团体把他派到世界的另一端，去进行与他的慈善事业有关的考察。（视察外国的教养机构，或者诸如此类的事。）行程遥

远，仿佛永远不会回来了……我知道父亲离家时我们的反应，我们都觉得这是意料之外的好事。我知道，摆脱他的监督之后，我马上就娶了吉丝。我们把房子占过来，把一切都搬走，把家具统统卖掉，把父亲自己的财物都分给修女会，把隔墙拆掉，彻底翻修了房子。（奇怪的是，梦里的翻修跟现实生活中我所作的翻修不一样。比方说，在梦里，前厅漆成鲜赭石色，地毯是大红的而不是浅棕的，没有靠墙的桌子，却有父亲前厅里那个橡木的老式座钟。）还不止于此，要把我知道的都写下来是写不完的。比方说，这件事：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吉丝和我——的房间，就是父亲从前的房间（不过在这间房里，梦中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它好象变成了安娜在瓦格拉姆大街的那间房。还有，我知道，那天早上雷昂没有来得及收拾屋子，我们的大床还乱着，我想到父亲马上就要打开这间房的门，很是害怕……我还知道我们生活中和周围的许许多多细节。特别要指出我觉得奇怪的是：我的弟弟在梦里完全没有出现，我知道，雅克在我们结婚之后，嫉妒得要命，侨居到瑞士去了，并且他……”

写到这里中断了，安托万再也不想继续写下去。他拿起铅笔，在空白处注道：

“查一查那些探讨过梦的人，在这方面说了些什么。”

于是，他把纸折起，站起身，把水放到炉子上去烧，准备做吸气治疗。

过了一会儿，他用毛巾把脑袋包起来，汗流满面，闭上眼睛，深深地吸着有益的水汽，同时反复思考他昨夜的梦。他忽然发现，这个梦的主题本身就证明他的良心有些不安，表明他感觉到

自己承担着某些责任，甚至犯了罪，而在清醒的时候，他的傲气在暗中支持了他。“的确，”他承认，“我没有理由为父亲死后所发生的一切而自豪。”（这里，他指的不仅是他豪华的布置，也指的他跟安娜的来往，他的夜间冶游，一切不可阻止地滑向放纵生活的倾向。）他又想：“把父亲留下来的一大部分财产白白丢掉，这就不用提了……”（在翻修房子的花销中，耗费了一大半动产，由于看不起蒂博先生谨慎投资收利微薄，他把剩下的部分换成俄国证券，现在都化成了零。）“去它的吧！”他想，“不必徒然后悔……”他一向惯于用这个方法来自平良心上的不安。不过，实质上——他的梦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还保留着中产阶级关于家庭财产，关于攒钱留给后代的那种观念。所以，虽然他无须向任何人解释交待，不到一年，就把好几代人惨淡经营积下的遗产挥霍一光，他仍然感到羞愧。

把头上的毛巾解下来一会儿，他吸了一点新鲜空气，揉揉充血的眼睛，然后，又钻到又湿又热的被单里。

今天早晨，这样思考着一九一四年的冬天，这思绪又与他感到的那令人愤怒的印象合在一起。昨天晚上，吉丝走后，他走进空无一人，豪华漂亮的几间实验室，走进夸大其辞、号称“档案室”的那间小房，在所谓档案室里，有一套实验记录，几排编上号的新卡片，上面还没有写字。他还走进设备精良却一次也没有用过的“包扎室”。就在这里，回忆起从前，在底楼的简朴设备，回忆起作为青年医生的奋发有为的生活，他明白了：父亲死后，他的路走错了。

气体吸入器逐渐冷却，冒出来的蒸汽不多。他把浸湿的毛巾扔开，擦擦脸，走向卧房去。

“A...E...A...O...”他站在镜子前试试嗓子，声音还是嘶

哑的，但发得出来了，感到喉头暂时松快了一点。

“作二十分钟呼吸操……然后休息十分钟。以后，我穿上衣服，收拾箱子。既然今天不能去看菲利普，我就坐头班火车，到拉菲特庄去。”

坐着汽车去火车站，穿过土伊勒利宫的花坛。在五月的阳光下，他看到白色的塑像耸立在草坪上，淡紫色的雾霭隐约遮掩着卡鲁塞拱门。他蓦然想起那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和安娜约好在卢浮宫的花园里会面。他忽然心里一动，对司机叫道：

“开到布罗涅森林入口去，从斯朋蒂尼街走。”

到巴丹库尔公馆附近，他让汽车放慢速度，探头到车窗外张望。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栅栏门也关着。在门旁的小屋上，挂着一个牌子：

公馆出售

有内院、车库和花园

总面积 625 平方米

在“出售”二字上面，还有添写的“或出租”字样。

汽车慢慢沿着花园的围墙驶过。安托万什么感觉也没有。确实没有：既不感慨，也不遗憾。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特意来看这一趟。

“绕个弯……到圣拉撒路车站，”他对司机叫道。

“对，”他几乎立刻想道，仿佛早晨的思路一点也没有打断过，“我认为好好安排我的职业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是在自欺……所有这些方便的物质条件没有促进工作，反而使工作停

滞不前！那些漂亮的机械设备毫无用处。一切都已准备好来进行大规模的实验，而实际上，我却什么也没有做……”他忽然想起弟弟对待父亲遗产的态度，安托万那时认为雅克对金钱的厌恶是傻气十足。“是他做得对。今天，我们之间是多么互相了解啊！……金钱，尤其是靠遗产得来的，不是挣来的钱，毒化了一切……如果没有战争，我就毁了。我就不能消除这个毒素。我就会以为一切都可以用金钱买到。我那时已经象一个有钱人，自认为天然就有特权，有权利少干工作，支配别人去干。我就会肆无忌惮地把儒斯兰或者斯图德勒在我的实验室里的第一批发明据为自己的功劳……我就是准备把自己变成一个榨取利润的人……我已经尝到了借助于金钱统治别人的乐趣……尝到了因为我有钱而受到敬重的乐趣……几乎已经认为这种敬重是天然合理的，几乎已经认为金钱给了我优越的地位……真不光彩！……金钱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建立了种种歪曲的、不明朗的关系！这就是金钱最恶劣的后果之一！我已经开始对任何人、任何事都不相信了。对我最好的朋友，我已经开始想道：‘他为什么对我说这话呢？他是因为我有支票簿才这样的吗？……’真不光彩呀！真不光彩呀！……”

反复思索这种污垢，他觉得十分痛苦，到达圣拉撒路车站仿佛是个解脱。不顾自己呼吸本来就困难，他冲进挤在候车室的人群，这样分一下心，逃脱开自己，他觉得十分高兴。

“一张……不，一张三等军人票，到拉菲特庄……火车几点开？”

他不常乘三等车，今天乘一次，觉得高兴极了。

七

克洛蒂尔德敲敲门，手里端着托盘，等了一会儿，又敲一次，还是没有人答应。想到安托万没有吃早饭就出去了，有些不高兴。她推开房门。

房里漆黑，安托万还在床上躺着。他早听见了，但是早上，做吸气治疗以前，他完全说不出话，所以事先就不企图发出任何声音。他只是作手势，让克洛蒂尔德明白他的意思。

虽然他一边作手势，一边微笑着让她放心，但那老实的女人却站在门坎上，惊讶而又难过地扬起眉毛。看到安托万现在一句话也说不出，而昨天晚上到庄子来的时候，他还到厨房里跟她聊过天呢！忽然想到他也许是中了风，半身瘫痪了。安托万模模糊糊猜到了她的想法，笑容更深，招手叫她把托盘送到床边来，随即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铅笔和拍纸簿写道：

“晚上很好，早晨总是说不出话。”

她慢慢地辨认那纸上的字，惊愕地把安托万端详一会儿，接着毫不隐讳地说：

“没什么，没有想到先生变成了这个模样……他们把您整苦了！”

她去推开了百叶窗，早晨的太阳照进屋里。天空是蔚蓝的。穿过盘绕在木头阳台上的爬山虎枝蔓望去，近处有几棵冷杉，远处，浓绿的树梢和圣日耳曼森林被轻风吹得微微颤动。

“先生还能吃饭吧？”她回到床边，倒了一杯热牛奶。安托万把面包弄碎浸在里面。她退后一步，两手揣在围裙口袋里，注意看着。安托万咽东西非常困难，她忍不住又说起来：

“真没想到是这样。真的，我们知道先生中了毒气，我们还说：‘毒气总比枪伤要好一点……’敢情不是这样！……对于病呀什么的，我真是一点不懂！那功夫，先生给我和我妹妹写信，叫我们跟吉丝小姐一起，到丰塔南夫人家来，阿德里安娜马上就说：‘我要看护伤兵。’我呢？我说：‘我干啥都行，做饭，收拾屋子，我从来不挑活儿，就是照顾伤兵不行，这活儿不对我的脾性。’这么着，太太和小姐就把阿德里安娜放到医院里去了。我留在家里。我不抱怨，虽然一点儿闲逛的时间都没有。先生知道，要把这儿的活儿都干利落，一个女人，一天得有二十五个钟头才行。可是我觉得总比包疮挤脓强。”

安托万微笑着听她讲。（没有吉丝的时候，由这个忠心耿耿的姑娘来照顾也不错……只可惜她天生不太有看护病人的天分……）

为了表示很重视她每天负担的这份沉重的工作，安托万敬重地抿住嘴，把头点了好几下。

她又顾忌起来，立刻接着说：“喂！说真个的，也不象想象的那么忙乱。太太和小姐们差不多总在医院，我只要侍候她们晚饭就行。午间，只有但以理先生和珍妮太太，还有小不点儿。”

她比以前亲密得多，好象战争的年月把往日的距离都消除了，她喋喋不休地对安托万讲，毫不拘束地议论对每个人的看法：“……吉丝小姐对我们总是那样肯帮忙……”“丰塔南夫人其实并不高傲，可是，叫人望而生畏，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尼科尔太太做事没有条理……可是她，很会让人伺候！”“……珍妮太太不爱说话，可是干活儿在行，什么都懂……”她的话头随时转到“小不点儿”身上，用又赞叹又慈爱的口气说：“这孩子有出息，就象已故的老爷一样，会支使人！……”（安托万想，

“他的确是父亲的孙子。”“要是由着他，他简直要叫所有的人围着他团团转……先生您想象不到，那是个小机灵鬼儿，什么都要动，谁的话都不听……幸亏有但以理先生整天看着他。我的事儿忙，管不了他。可是，得紧紧地看着他……有了他，但以理先生就有活儿干啦。他整天一个人待着，什么事也没有，只是嚼橡皮糖。要是没有这孩子，时间就难熬了……”她摇了一会儿头，用含着深意的样子说：“我总这么想，日久天长，以后任何人也不会为跛腿生气了……”

安托万拿起拍纸簿，写道：“雷昂？”

“啊，可怜的雷昂……”关于这个仆人，她没有什么消息好告诉安托万。（他到达前线的第二天，作战才十四个小时，就在查理鲁瓦附近当了俘虏。安托万一知道战俘营的号数，就委托克洛蒂尔德每个月给他寄一包食物。雷昂按时寄一张明信片来，只写几个字，表示感谢，关于他的生活情况却只字不提。）“先生知道他向我们要了个笛子吗？吉丝小姐在巴黎买了一个。”

安托万早就喝完了牛奶。

克洛蒂尔德把盘子撤走，说道：“我得下去帮珍妮夫人干活了。星期三是她洗衣服的日子，洗衣盆搬起来费劲，小不点儿脏衣服多！……”

她已经走到门口，又回过身来向安托万看最后一眼。她那平板的脸上忽然显出思索的神气：

“安托万先生，什么事都会有呀，这几年，您说对吗？什么事都会有！……我时常对阿德里安娜说：‘如果已故的老爷复生。如果他能看到从他去世以后发生的这些事，他该多么奇怪呀！’”

剩下安托万自己，他开始懒懒散散地梳头洗脸。不用着急，

他还想认真做一次治疗。

“如果已故的老爷复生……”克洛蒂尔德的话使他想起昨夜
的梦，他想：“父亲至今对我们的影响多大呀！”

为了做呼吸练声不被人听见，他把窗子关上。等他打开窗
户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

花园里传上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让—保罗，下来，到我这儿
来！”一个平静、清脆的女人声音，好象回声一样，从远处传来：
“让—保罗！听但舅舅的话！”

他走上阳台，没有拨开爬山虎的帘幕，只向外看了一眼。底
下是一狭条平地，临着一条界沟，界沟以外就是森林。在两棵
法国梧桐的树荫下，但以理躺在一张藤椅上，膝头放着一本
书。（从前，丰塔南夫人也总在这儿。）几步以外，一个小男
孩穿着淡蓝色的毛线衣，依靠故意翻倒在墙角下的一个小桶，
正想使劲往平台的短墙上爬。土台的另一面是原来园丁住的小
屋，太阳照着的门大大开着，珍妮正在里面，卷起袖子，蹲在
一个木桶前面，往衣服上打肥皂。

“过来，让—保罗！”但以理又说了一遍。

这时候，太阳照得他棕红色的头发象燃烧的火焰。这孩子
转过身来，但是为了显出不让步的样子，索性坐在地上，拿过小
铲，往桶里装沙子。

过了一会儿，安托万走下台阶，让—保罗还在那个地方坐
着。

“过来，向安托万伯伯问好，”但以理说。

那孩子蹲在墙角下，忙着用铲子铲土，好象没有听见。他看
见安托万走过来，就放下铲子，头更低了。安托万把他拦腰抱

起，他两腿扑腾几下，然后愿意让他抱了，就大笑起来。安托万吻吻他的头发，在耳边问他：

“你觉得安托万伯伯坏，是吗？”

“是的！”孩子大声说。

安托万累得直喘。他把孩子放到地上，走到但以理身边来。他刚一坐下，让一保罗就向他跑过来，爬到他膝头上，缩在他的军衣前，假装睡觉。

但以理躺在藤椅上没有动。他没有打领带，穿着一条深色的旧裤子，一条带条纹的法兰绒旧网球衫，假腿上穿着一只黑靴子，另一只脚没有穿袜子，趿着一只旧拖鞋。他有点发胖，仍保持着高贵、匀称的面容，可是微微有些浮肿。头发很长，下巴剃得发青。他今天上午的模样很象外省的悲剧演员，在城里不修边幅，晚上一登台，扮起罗马皇帝，还能取得好效果。

安托万起床以后，就忙着护理支气管和喉咙，这时，发觉但以理伸手给他握过之后，根本没有想到问问他的健康，不过，他倒没有特别在意。（其实，昨天晚上，他们本来有机会可以谈谈彼此的情况，互相倾吐他们的苦恼。）为了掩饰他的窘困，他弯下腰，询问地看看但以理刚刚合上、放到沙地上的一本四开杂志。

“这个？”但以理说。“这是《周游世界》……一本旧的旅游杂志……一八七七年的。”他拿起杂志来，懒洋洋地翻着：“插图很多……我们在楼上有一全套。”

安托万漫不经心地抚摸着孩子的头发，孩子好象在深深地思索，头靠着他伯伯的胸口，眼睛睁得大大的。

“今天早上有什么新闻？您有报纸吗？”

“没有，”但以理回答。

“协约国委员会最近好象已经决定把福熙的权限扩大到意

大利前线。”

“哦？”

“现在，这大概已经是官方消息了。”

让—保罗好象忽然觉得无聊，溜下地来。

“你到哪儿去？”但舅舅和安托万伯伯同时问。

“去找妈妈。”

小男孩每只脚跳两下，高高兴兴地向园丁的小屋跑去。两个男人觉得怪有意思，互相看了一眼。

但以理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口香糖，递给安托万。

“我不要，谢谢。”

“这可以消磨时间，”但以理解释。“我不抽烟了。”

他挑了一块，整个儿放进嘴里，嚼了起来。

安托万微笑着看着他。

“您使我想起有一次打仗……在维里埃-勃勒托纳……我们的战地医院按规定设在一个农庄里，这个农庄被几个美国卫生队占用过很长时间。我们的护士花了整个一天用锤子敲掉那些讨厌鬼粘得到处都是的嚼剩的渣子，柱脚上，门上，桌子底下，凳子底下，到处都是……硬得好象水泥，这种脏东西！……要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占领再持续几年，阿图瓦和庇卡底所有的家具都会改变原来的模样，变成一堆堆不成形状的口香糖集块岩了……”一阵轻微的咳嗽打断了他的话。“就象……太平洋中的某些岩礁变成了……海鸟粪的大山！”

但以理笑了起来。安托万一向也跟雅克一样，对这笑容的魅力非常敏感，他高兴地发现，但以理的笑容一点也没有失去它的魅力，虽然脸上浮肿，上嘴唇还是那样慢慢地斜着向左翘起，带着些风趣，眯着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觉察不到的顽皮的光。

他不停地咳嗽，又丧气又烦躁地摆摆手，费力地说：

“您看……我变成……老痨病鬼了……”喘过一口气，又接着说：“正象克洛蒂尔德说的，‘他们把我们整苦了。’可是，我们大概还是运气好的哩！……”

“您也许是，”但以理立刻轻声说。

沉默了一会儿。这次是但以理打破了沉寂：

“您刚才问我是不是看了报？没有，我尽量少看报。这些事情我想得太多了！我都不能想别的了……象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了解什么叫做……‘在某战线小有接触’……或者，‘在某地顺利出击’……要我们看战报，不看！”他把头仰到长椅的靠背上，闭上眼睛，继续低声说：“必须亲自打过冲锋，步兵冲锋，才能真正懂得……以前我当骑兵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战争……可是我也冲锋过，对，三次……即使那样，也不行。冲锋，说不清楚……可是，比起步兵端着刺刀，在预定的时刻出击，那根本不算什么……”

他打了一个寒噤，睁开眼睛，直瞪着前面，愤慨地嚼着糖，过了一会儿又说：

“在后方，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真相？从前方活着回来的能有几个？……他们又何必说这些呢？他们不能说，也不愿意说。他们知道人们不会了解。”

他闭嘴不说了。过了几分钟，两个男人没有交谈一句，甚至没有互相看一眼。接着，安托万又开始说话，他的声调犹犹豫豫，常常被咳嗽打断：

“有时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这一次打完，再不打了！再也不能想象还有下一次，下下次！……有时候，我很确信……可是有时候，我又怀疑起来……说不准了……”

但以理嚼着糖，一声不吭，眼睛茫然望着远处。他在想什么呢？

安托万也不说话。的确，一连说几分钟，他太吃力。但是，他还在考虑这些，他已经考虑了一百次，一千次了。他在想：“只要冷静地估量一下，有多少妨碍人与人之间和平的因素，我们简直就会不寒而栗……如果有道德进化的话，那么要经过多少世纪，它才能使人类摆脱发自本性的苛刻，对暴力的天生崇拜；人这个生物以暴力取胜，以暴力把自己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强加给那些跟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一样的比他弱小的人，经过多少世纪，道德的进化才能使人摆脱人这个生物这时所感到的兽性的快乐？再说，还有政治，政府……而对于那些发动战争的当局，那些决定战争、驱使别人打仗的当权人物，在他們要倒台的时候，战争总是一个最有吸引力、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我们难道能够希望各国政府从此以后不再乞灵于战争？……所以，必须使他们打不成仗，必须使和平思想在舆论中间深深扎根，广泛传播，成为阻碍各国政府好战政策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这种希望只是幻想……况且，和平思想取得了胜利，难道和平就有了确实的保障吗？即使有一天，在我国，和平主义政党取得了政权，有谁能够向我们保证他们不会为了享受以暴力手段把和平思想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而情不自禁地发动战争呢？……”

“让—保罗！”克洛蒂尔德愉快地叫了一声。

她向他们这边走过来，托盘里端着一碗麦片粥，几个煮李子干，一杯牛奶，她都放在花园里的桌子上。

“让—保罗！”但以理叫一声。

小家伙穿过平台，在太阳地里撒开小腿飞快奔跑，那洗褪色的蓝毛衣正好跟他的眼睛一个颜色。当健壮的克洛蒂尔德把让—保罗抱起来放在椅子上的时候，安托万又惊异地发现，小家伙跟雅克小时候完全相象。他想：“同样的额头，头上翘起一绺同样的乱发……同样不太白皙的肤色……皱起的鼻子周围有同样的雀斑……”安托万向他笑笑，但是孩子以为是嘲笑他，扭过脸去，皱起眉毛，怨恨地向他偷偷瞥了一眼。他的眼睛也象雅克，表情善变，不可捉摸：有时候，笑盈盈的，很温顺；有时候，焦躁不安；有时候，比如现在，显得狂野、严峻，闪出钢似的光芒。然而，无论怎样变化，他的目光总是异常锐利，善于观察。

珍妮也穿过全是阳光的土台。她卷着袖子，手被水泡胀了，围裙也溅湿了。她对安托万亲切地笑一笑。

“夜里怎么样？……不握手了，我的手湿……睡着了吗？”

“比平常睡得好，谢谢您。”

在这胸部丰满、干家务活很麻利的年轻母亲面前，安托万忽然想起动员的那天，雅克带到大学街去的那个拘谨、冷淡、刻板的姑娘，穿着暗色的衣裙、戴着手套的姑娘。

她转身对但以理说：

“请你喂他吃麦片粥吧，我的衣服还没有晾起来呢！”她走到儿子身旁，把餐巾给他系在脖子上，摸着 he 鸟儿似的小后脖颈说：“让—保罗，乖乖地让但舅舅喂粥……我一会儿就来。”说完，她走了。

“好，妈妈。”（他说妈——妈，把音节分开，就象珍妮和但以理从前一样。）

但以理从躺椅上站起来，坐到孩子身旁。他还继续着他的思路，妹妹一走，于是他就又说起来，好象没有被打断过。

“还有件事，也不能说，在后方，没有一个人能够想象得到，一上火线就会发生的一种奇迹，首先，每个人完全受偶然性的支配，不许有选择，消除了任何人的意志，于是，人就感觉到经过了一次最后的解脱。”他的嗓音里流露出他的激动，接着又说：“其次，在前线，在危险的威胁下，所有的人之间，有了一种同志情谊，兄弟关系……这种感觉是这样的真实，必须成为支援部队，往后方撤四公里，才能恢复成为普通的人……”

安托万以沉默表示同意。关于战争，他更为重要的回忆是泥泞和血污。但是，他理解但以理的意思。他也经过这种“奇迹”，懂得火线上部队的奇妙的集体感，那种个人被消除的感觉，在同一命运的重压下，突然形成了集体的、亲如手足的同一个灵魂的感觉。

让-保罗因为有安托万在场有些胆怯，乖乖地让但以理喂粥。但以理一边说话，一边把盛满粥的小勺送到孩子的嘴里，这样的灵巧，说明他充当养父并不是个生手。

安托万忽然想到：“这里，在我面前发生的事，是从前绝对料想不到的……但以理残废了，衣着不再考究，变成了个看孩子的保姆……这孩子竟是珍妮和雅克的儿子！……然而，这些都是事实。我都不太觉得惊奇了……因为这事实太明显……这样明显的事实使人非接受不可！……一旦事情已经发生，我们甚至不再去想这些事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或者这些事本来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刹那间他深深地陷在混乱的思绪中，想道：“如果古瓦朗想听，我就逃不掉要作一个有关自由意志四点方案的演说了……”

“嘿，小心点！”但舅舅低声说。麦片粥吃完，该吃李子干，就比较难喂了。孩子已经心不在焉，眼睛总是看着在平台另一边

走来走去的母亲，她正把衣服晾到鸡舍的栅栏上。但以理常常得举着汤勺等很久，孩子才肯把嘴巴张开。可是，他一点也不着急。

珍妮作完了事，就赶紧过来替换哥哥。安托万看到她又走过太阳晒着的院子。她已经解下了围裙，一边走一边把袖子放下。她想让但以理休息，但以理却不同意：

“就让我来吧，要吃完了。”

珍妮用愉快的声调说：“还有牛奶哩！快喝吧，要是让一保罗不把牛奶喝完，安托万伯伯会说什么呢？”

孩子抬起胳膊，正要把杯子推开，又停住手，执拗地盯着安托万伯伯，眼光里充满挑战意味。他本来以为安托万会威胁他，安托万却象鼓励他似的笑一笑，又对他挤挤眼，他反而手足无措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小脸上忽然浮出调皮的笑容，眼睛仍然盯着安托万，好象要伯伯来证明他是多么乖似的。他喝光了一杯牛奶，一口气也没有歇。

“现在，让一保罗要去睡一大觉，让妈妈跟安托万伯伯和舅舅舅安安稳稳吃中饭，”珍妮又说。她解下孩子的餐巾，把他从椅子上抱下来。

只剩了两个男人。

但以理在原地踱了几步，从一棵梧桐的树干上揭下一片树皮，漫不经心地端详了一会儿，才用手指捏碎。接着，他从衣袋里又掏出一块橡皮糖，嚼了起来。最后，他回到躺椅旁躺下。

安托万没有说话，他在想着但以理，想着战争和冲锋；他想着在火线上人们结成的神秘的兄弟情谊。穆斯吉耶有个小吕班，时常使他想起原来的助手，年轻的马尼埃尔·鲁瓦。这个小吕班

有一天在饭桌上说：“不管人们怎么说，战争也自有它的美丽！”说这话时，他的声音激动得直抖，眼睛里充满着怀念。老天！这才是个二十岁的娃娃，一下子就从巴黎大学的板凳上进入了军营，从足球队进入了战壕；在平民生活中，他还什么都没有开始，就到了前线，他什么都没有留下。他怀着愉快的心情醉心于战争这危险的游戏。“战争的美丽，”安托万想。“比起我见过的那么多的丑恶，战争的美丽算得了什么呢？”

突然，他又回忆起一件事。一九一四年九月初，就在安托万一向称作“普罗万攻势”的漫长战役中（但是，大家都把这次战役叫做马恩战役），有一天夜里，他的急救站要在猛烈的轰炸下迅速转移。把伤兵疏散之后，他带着几个护士，在掩蔽沟里爬着，终于离弹着点远了些，到达一个房顶被掀掉的破房子里。房子的墙很厚，还有拱形的地下室，可以当作临时的掩蔽所。这时候，敌人的大炮又向纵深射击。炮弹一个接一个打来。他马上叫护士都进地下室，自己给他们关上地窖的活门。他独自一人留在底楼，待了二十来分钟，靠着大门，窥探炮击完了没有。事情就是在这当儿发生的。三四十米开外轰然一声巨响，腾起一阵灰土，把他也掀到屋子顶里面去，撞到了那些护士身上。他们在黑暗里站成一排。这些人怎么会到这儿来的？看到医官不屑于跟他们一起躲起来，他们一个个掀开地窖活门，彼此也不说话，静静地爬出来排列在他们站长后面。

“虽然那是很丑恶的时刻，”安托万想着。“这样的团结，这样的忠诚，却使我获得了片刻的欣慰，永远也不会忘记……如果那天夜里，有个吕班这样的人对我说：‘战争也自有它的美丽，’也许我会说：‘是的’……”

他马上又镇静下来；

“不！”

但以理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安托万自己没有发觉，低声把话说出来了。

他微微一笑了一下，说：

“我是想说……”

他象表示歉意似的笑一笑，不愿意再解释，闭住了嘴。

听到让—保罗在二楼哭，他不愿意上床。

八

珍妮把孩子放到小床上，象每天上午一样，一边等他睡着，一边换衣服，吃完午饭好立刻到医院洗衣室去值班。她从窗前走过，透过窗纱，看到两个男人在梧桐树下闲谈。安托万沙哑的声音她听不到，但以理疲倦的声音有时突然扬起来，不过，珍妮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

她忧伤地回忆起两个年轻人从前的样子，身体健康，无忧无虑，都有雄心勃勃的计划。战争把他们变成如今的模样……但他们至少还在，还继续活着！他们的景况会改善。安托万的嗓音会复元，但以理也会逐渐习惯跛行，他们不久就会重新开始生活！……而雅克却不能了！在这个晴朗的五月上午，他本来可以活在某个地方……她就会丢开一切去找他……两人一起抚育他们的儿子……可是这一切都永远结束了！

但以理的声音沉寂下来。珍妮走近窗户，看见安托万朝房子走来。从昨晚起她就找机会跟他单独见面。她看了一下，知道让—保罗确实不再动了，她把裙子扣好，匆匆地略略收拾了房间，然后打开楼梯口的门。

安托万用手抓住扶手，慢慢地上楼梯。他抬头一望，珍妮微笑着，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迎向前来。

“过来看他睡觉吧！”

安托万喘得说不出话来，踮着脚跟她走过去。

房间很大，长度超过宽度，铺着一张朱伊^①出品的蓝花地毯。顶头有两张一样的床，两张床中间放着一张孩子的小床。安托万不知道为什么，那两张床一样，想道：“这大概是丰塔南夫妇从前的卧室。”可是很奇怪，两张床好象都在用着，因为每张床边放着一个床头柜，上面摆着日常动用的东西。床的上面，墙板中间，挂着一幅雅克的肖像，真人那么大，仿佛雅克就在这里似的引人注目。这是一张现代派风格的油画，安托万第一次见到。

让—保罗蜷着身子睡着了，一只肩膀伸在长枕头底下，头发揉乱了，湿润的嘴唇半张着。另外一只手臂伸展着放在被子上，但并不从容自然，握着拳头，好象要打架一样。

安托万指着画像，打手势问她哪儿来的。

“油画是我从瑞士带回来的，”珍妮轻声说。她也端详一下画像，然后又看看孩子：“他们俩多么相象！”

“但愿您见过雅克在这个岁数的样子！”

“可是，”他心里想，“这并不是说他们俩在思想上也完全相似……这娃娃身上，有无数雅克所没有的成分！”他小声继续说完他的思想：

“真奇怪，是不是？无数的先人，无论是近的，远的，直接的，间接的，都跟这个小生命有关系！影响最深的是哪些人呢？这是

① 法国一镇名，以纺织印染业著名。

个谜……每个新生人都是从未有过的奇迹，每个生命也是旧因素的总和，然而却是全新的组合……”

孩子没有醒，拳头也没有松开，却忽然曲起胳膊放在眼上，好象藏起来不让人看似的。安托万和珍妮同时微笑起来。

两人默默地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也真奇怪，”他又想，“雅克身上所孕育的各种各样的生命的可能性中，只有这个组合，让一保罗这个组合，而不是别的，成了形，孕育成了生命……”

“可怜的但以理跟您那么激动地谈些什么？”珍妮稍稍压低了嗓音问他。

“谈战争……无论干什么，总离不开这个恼人的事。”

珍妮的面容严峻起来：

“跟他，这个题目我绝对不能再谈。”

“怎么？”

“他时常说出一些看法我都替他羞愧……是从民族主义报纸上学来的东西……这些货色，雅克是永远不能容忍别人在他面前说的！”

“她呢？她读什么报纸？”安托万想。“莫非为了纪念雅克，读《人道报》？”

珍妮突然走到他身边：

“发布动员令的那天晚上（我还记得那地方，就在议会门前，一个岗亭附近），雅克拉着我的胳膊对我说：‘珍妮，您知道，从今以后，应该按照赞成还是反对战争来划分人！’”

她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雅克的话还在她的耳边回响。接着，她压抑着一声叹息，转身坐在桃花心木写字台前，那写字台的柜门还开着。珍妮招手请安托万也坐下。

安托万仍然站着，仔细观察着画像。只画了四分之三的身

体。雅克坐着，无畏地扬着头，一只手握着拳放在大腿上。整个的姿态有些挑战意味，但很自然。雅克本来就喜欢这样坐着。暗红色的头发生硬地遮着额头。（安托万想：“将来，那孩子的头发也会颜色深起来的。”）眼睛深陷，大大的嘴巴旁边有愁苦的纹路。他伸着下巴，使得脸上有烦恼，甚至狂野的表情。背景还没有画完。

“这是六月十四日画好的，”珍妮解释说。“是一个姓帕特逊的英国人的作品，他现在好象正在布尔什维克队伍里战斗……范希德在他家找到了这幅画，在日内瓦送给了我。您知道，小范希德，白化病患者，是雅克的朋友……我大概在信上跟您谈过。”

她一一回忆着，开始叙述在瑞士的经历。（显然，她很高兴跟安托万谈谈这些她跟谁都不说的事。）范希德把她带到寰球旅舍，给她看了雅克的房间（“是间顶楼，在楼梯口上，没有窗户……”），还领他到朗多尔咖啡店去，到“支部”去，把她介绍给支部会议上还活下来的人……她在这些人中间找到了斯特发尼，饶勒斯在《人道报》社的助手（雅克在巴黎就向珍妮介绍过）。斯特发尼终于到达了瑞士，创办了一家报纸：《他们的伟大战争》。在这群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中间，他是最活跃的一个……“范希德还陪我到了巴塞尔……”她说，目光里流露着沉思。

她向写字台弯下腰，打开一个锁着的抽屉，象拿圣骨匣那样小心地拿出一包手稿，先在手裡捧了一会儿，才递给安托万。

安托万很惊奇，拿过那叠纸来翻弄着。这字迹……

你们现在却互相对抗，荷枪实弹，愚蠢地准备着一有命

令……

突然，他明白了。他手里拿的是雅克在死前写的最后几页字。纸揉皱了，满是涂改的地方，粘满了斑斑点点的油墨。正是雅克的笔迹，但是，由于心情激动，写得潦草，几乎辨识不出了，有时过分使劲，有时又抖动不停，象小孩写的。

“法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难道有权把你们从家里拉出来，强令你们离开工作，违反你们最明显的个人利益，违反你们的意志、信念，违反你们最合乎人情、最纯洁、最合理的本能而随意处置你们的生命？是谁给了他们掌握你们生死的可怕权力？是你们的无知！是你们的消极！”

安托万抬起眼睛。

“是宣言的草稿，”珍妮用激动的声音小声说。“布拉特纳在巴塞尔给我的……布拉特纳是个书商，负责印刷……他们保存了手稿，他们……”

“他们？”

“布拉特纳和一个年轻的德国人卡贝尔，卡贝尔认识雅克……是个医生，我生孩子的时候，他给了我宝贵的帮助……他们让我去看了雅克住的那间陋室，他就是在那儿写这个宣言的……他们把我带到一块高地上，他就是从那儿坐飞机起飞的……”在向安托万叙述的过程中，她仿佛又经历了一遍在瑞士那个边境城市中的那几天的生活，那里，到处是士兵，外国人，暗探……她仿佛又看到她试图向安托万描绘的莱茵河岸，还看到由军队把守的桥梁，斯坦夫太太的老房子，雅克住过的那间阁楼，向黑漆漆的仓库开着的那扇狭小的天窗……仿佛又看到她

跟范希德、布拉特纳和卡贝尔一起坐着安德烈耶夫的那辆摇摇晃晃的大车，就是拉着雅克去跟梅奈斯泰勒会面的那一辆，到高地去……她好象还能听到布拉特纳用喉音向她解释：“我们就从这里爬上坡……天已经黑了……我们就躺在这里，等着天亮……飞机就是从这个山坳里出现的……降落在这个地方……蒂博上了飞机……”

“在高地上等待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呢？”珍妮叹息着。“他们说他们离他们很远……一个人躺在远处……他大概已经预感到死亡。他最后的想法是什么呢？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安托万眼睛看着画像，听着那少妇讲话，同时也在思索着，想到那高地的早晨，来了一架不祥的飞机，他想着那荒谬的自我牺牲！他想着这个英雄主义和其他许多英雄主义悲剧性地毫无用处……几乎一切英雄主义都毫无用处。他回忆起几十个战争场面，非常崇高，但是毫无意义！“几乎是一向如此，”他想，“是一种错误的判断构成了这种狂热的英勇行为的基础：对某些观念盲目轻信，却不冷静地考虑一下为了这些东西是不是值得作出最后的牺牲……”他崇拜毅力和意志——甚至到了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他的本性厌恶英雄主义，四年的战争只是加强了这种厌恶。他丝毫也不想贬低弟弟的这一行动。雅克是为捍卫他的信念而死的，他贯彻始终，直到牺牲生命。这样的终结只能引起人们的尊敬。但是，每逢安托万想到雅克的“思想”，就总碰到这样一个根本的矛盾：他的弟弟既然以全部气质和智慧的能力，去仇恨暴力，甚至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去为反对暴力而斗争，去宣传两军联欢，阻止战争，这不恰恰证明了他的这种深刻仇恨吗？那么，他怎么会多年致力于社会革命呢？也就是说，支持最

坏的暴力，那种空谈家们所说的、理论化的、计算好的、不可调和的暴力！“雅克还不至于那么天真，”他想，“还不至于对人类的本性有那么多幻想，从而相信他所希望的彻底革命不经不公正的流血，不大规模地屠杀无数牺牲者就能成功！”

他的目光不再探究画像上那谜也似的面孔，转过来，落到珍妮的脸上。她仍在朴实地叙述，内心的激情改变了她的面容。

“归根到底，”他又想，“我没有做任何事，使我能够有权去评断那些出于信念而挺身完成最后的行动的人们……那些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也有勇气去尝试的人们。”

“有一件事最使我痛苦，”珍妮静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就是他不知道我快要生孩子了。”她一面说着，一面把手稿收起来，又放进抽屉里。她又静默了一会儿。接着，仿佛在自言自语。（因为她这样纯朴的信任，安托万对她很是感激。）她说：“您知道，孩子生在巴塞尔，我很高兴。他父亲最后几天就是在那儿过的，显然，也是在那儿经过了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

每当她说起雅克的时候，眼珠的颜色不觉变得更蓝，一抹红晕侵上她的额角，整个脸上，焕发出异乎寻常的激情，热烈，仿佛永远不能充分表达出来，但是很快消失了。“她的爱情永远刻印在她心中，”安托万想。他为此感到气恼，又为这气恼觉得惊异，不禁又想：“荒谬的爱情！在显然彼此并不般配两个人之间，爱情只不过是一个误会……一个显然本来不会持久的误会，现在，却在她对雅克的回忆中延续下去，渗透到她所说的关于他的每一句话中！”（他坚持这样一个想法：任何热烈的爱情其基础必定在于误会，在于慷慨的幻觉，在于错误的判断，也就是说，彼此的错误理解。没有这个，盲目的相爱就不可能了。）

“留给我的责任是沉重的，”珍妮说，“把让—保罗培养成雅

克希望他的儿子成为的那个样子。有时候，我都有点害怕……”她扬起头，眼睛里闪出自豪的光，仿佛在说：“不过，我对自己有信心。”而她却说：

“不过，我对这孩子有信心！”

看到她这样的丈夫气概，面对未来这样坚强，安托万很高兴。按照她某几封信的口气看，他本来以为她更为犹疑，更为脆弱，没有完全准备好承担她的任务。他欣喜地看到，她已经摆脱掉失望情绪的控制，并不象许多其他经受苦难的女性那样，讨好地把自己奉献给不幸去吞噬，以便在自己和世人的眼中把自己那被摧毁了的爱情抬到崇高地位。不！她经历了有益于身心的恢复过程，已经毅然决然地主宰着自己，独自掌握起生活的方向。安托万要告诉她，这样的态度多么使他钦佩：

“这样，您确实表现出了您有多么刚强的素质！”

她静静地听过后，只是说：

“我没有什么功劳……我觉得，对我大有助益的是，雅克和我，我们从来没有共同生活过。他的死一点不改变我日常生活的习惯……对，至少在最初，这对我很有助益……后来，有了孩子。早在他出世之前，他就是我的支柱。我的生活仍然有一个目标：把雅克留给我的孩子抚养成人……”

停了一会儿，她又继续说：

“这是件很难做的事……这孩子的性格又难以掌握！有时候，这小家伙叫我害怕……”她探询地、甚至猜疑地注视着安托万，说：“但以理当然跟您谈起了他？”

“让—保罗？没有，没有特别谈过。”

他马上觉察出兄妹二人对于孩子的性格看法并不一致，而这种分歧造成了他们之间小小的不和。

“但以理认为让一保罗对于不听话感到乐趣。这不公平，也是错误的。至少，情况不是这么简单……我曾经仔细考虑过。确实，这孩子出自本能，对什么都说：‘不！’但不是出自勉强，而是一种表示反对的需要。我的意思是说，肯定自己的一种需要，好象是需要向自己证明自己是存在的……这显然表现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内在力量，这不能够埋怨他……这是他身上的一种本能，就好象保存自己的那种本能一样……我通常不敢责罚他。”

安托万非常感兴趣地听着。他点头表示同意，鼓励珍妮再说下去。

“您明白我的意思？”她放心而又信赖地微笑一下，说。“您惯于跟小孩子交往，也许不觉得惊奇……我看到这样倔强的脾气，就觉得跟谜似的……是的，我看着他不听我的话，往往不知所措，又惊讶又害怕——那时，我几乎要说：是由于赞叹——就好象我看着他长大，发育起来，明白了事理一样……假如他一人独自在花园，摔倒了，他就哭；可是，如果有我们一个大人，我就很少看到他摔痛了哭的……我给他糖，看不出任何说得通的原因，他就是不要；可是他却回来偷偷地把糖盒子偷走。这并不是因为他馋：他甚至连盒子都不想打开，把它藏在椅子垫底下，或者埋到沙子里。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出自一个简单的愿望：要作出一个独立行动……如果我责骂他，他总一声不响，绷紧了全身的肌肉表示反抗，眼睛里变化着颜色，狠狠地盯着我，我就不敢继续责备他了……那眼神顽强不屈……可是却纯洁，孤独……这样的眼神把我压服了！大概雅克小时候的眼神就是这样……”

安托万微笑着说：

“也许您也一样，珍妮！”

对这个假设，她只是摆摆手，又继续说：

“应该说，虽然他对任何强制都反抗，相反，稍有一点温柔的表现，他就让步……在他赌气的时候，如果我能把他拉到怀里，那一切都解决了，他把脸贴在我的脖子上，亲我，笑起来，好象他身上的什么硬东西忽然软化，一下子消融了……好象是突然从魔法下解脱出来！”

“他对吉丝大概更不听话吧！”

“那不一样！”她用突然而来的生硬语气说。“他对吉阿姨，喜欢得要命，只要她在，别的都不管了！”

“她能让小孩听她的话吗？”

“比我和但以理还不如。让一保罗离不开她，可是，只是为了逼她满足他的各种任性的想法！他要她伺候的，都是他因为高傲而不向别人要求的事情，比如说替他解裤子，或者拿一件他够不着的东西。如果我不在，他从来不对她说谢谢！您听听他支使吉丝的口气！简直是……”她停了一会儿，才说完她的想法：“这样说对吉丝不好，可是我觉得这是真的：让一保罗简直象感觉到吉丝生来就是当奴隶的……”

这句话使安托万很惊奇，他用询问的眼光注意地看着珍妮，可是珍妮避开了。正好，这时午饭的钟声响了，她站起身来。

他们一起走到门口，珍妮好象还想说什么。她把手放在门锁上，又松开了，低声说：

“这样谈谈我觉得很舒服……我从瑞士回来以后，不能跟任何人谈到雅克……”

“为什么不跟吉丝谈谈呢？”安托万试探地问道。他想起那个姑娘对他说的知心话和她表示的遗憾。

珍妮垂下眼睛站在那里，肩膀靠在门框上，好象没有听见。

“跟吉丝谈谈？”她终于重复一句，好象声音传了好几秒钟，才传到她耳朵里似的。

“吉丝是唯一能了解您的人。她爱过雅克——她心中也有极大的痛苦……”

珍妮并没有抬起眼睛，摇了摇头。她好象想回避，不作任何解释，接着，她看着安托万，用意外的生硬的口气说：

“吉丝？她有她的念珠！这，占着她的手指头，这样可以不思想！”她又低下头去，停了一会儿，又说：“有时候，我倒羡慕她！”但是，那声调，有点喉咙里的声音，好象想笑又没有笑出来，清楚地表明她说的不是真话。她马上显得后悔她刚才说的话，于是又柔声说：“您知道，安托万，吉丝成了我真正的朋友。”她的声调是真诚的。“当我考虑我们前途的时候，吉丝在其中占着重要位置。当然，我希望她永远和我们在一起，这对我是一种安慰……”

安托万等着她说“但是”，果然，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她就说：

“但是，吉丝就是她这个样子，对不对？各人有各人的天性……吉丝有非常多的优点，吉丝也有她的缺点……”又犹豫了一下，她说：“比如说，吉丝不够坦率。”

“吉丝？她的目光那么正直！”

安托万首先表示不同意。他考虑了一下，才稍稍懂得了珍妮的意思。吉丝并不是想作假，只是有意藏起一些想法不肯告诉人。她不明确地说出自己的好恶，害怕作解释，善于隐瞒自己的仇恨，连对她最不喜欢的人也毫不勉强地表现出笑脸相迎，殷勤热情的样子。是胆怯？腼腆？还是一种掩饰？或者是黑种人本能的表里不一？而吉丝的血管里是有一点黑人的血液的，那

是长久遭受奴役的很多种族的一种自卫的本能。“生来就是当奴隶的……”

安托万马上更正说：

“对，对，我明白……”

“那么您就知道，尽管我们感情很深，平常也很亲密，可是……尽管如此……有些话我是不能跟她谈的……”她挺了挺身子：“绝对不能谈！”

她急忙推开门，好象表示谈话就此结束：

“去吃饭吧！”

九

餐桌放在室外，厨房的门廊下面。

午饭吃得很仓促。珍妮一点胃口都没有，安托万在饭前没有时间上药，咽东西困难。只有但以理一个人给克洛蒂尔德烧的小牛胸脆骨和青豌豆捧场。他静静地吃着，漠然冷淡，心不在焉。快吃完的时候，安托万提到吕梅尔和“在后方服役的人”，但以理忽然打破沉默，极力为那些“发战争财的”辩解。（“只有他们能够使事态的发展符合人的需要……”）他用嘲笑似的赞赏口气提出他从前的经理，路德维希森的飞跃发展作为例证，这个精明的“海盗”，有人说，在战争初期，逃到英国去了，靠几个伦敦金融界的银行家和英国政客作暗中的后台，创办了一个“碳氢燃料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SAC，把财产增加了好几十倍。

“对，以后，她会非常象她的母亲，”安托万心里想。看到四年来珍妮的外貌改变很大，他深有感触。生孩子，喂奶，使她的臀部、胸部发达起来，脖子下部也粗了。虽然发胖，却仍不失优

雅，而且弥补了在她的举止和头部的姿态中仍然保留着的清教徒式的生硬，缓和了那清秀面容中的稍嫌冷淡的表情。只有眼睛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仍旧有孤独苦恼的神情，流露着静默中的勇气。她小时候，她哥哥跟雅克一起逃走那次，安托万第一次看到她，这双眼睛就使他那么惊奇……他想到：“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她整个人仿佛更为从容自然……她对雅克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我真觉得奇怪……从前她是多么叫人厌恶啊！又胆怯又骄傲，形成使人不舒服的混合物！那么拘谨，冰冷，仿佛必须作出超人的努力才能向别人付托一点她的秘密，现在至少不再给人这种印象了……今天早上，她对我真是推心置腹……对，今天上午她对我非常好……唉！她永远不会象她母亲那样宽厚和蔼……不，在她高雅的态度中，将永远保持一种难以言状的成份，好象是说：‘我并不要求表现，我无意取悦于人，我行我素……’每个人的爱好，都是如此。她永远不是我喜欢的那种人……不过，没关系，她所赢得的已经很多了。”

两人说妥，吃完午饭之后，安托万陪珍妮到医院去，拜访丰塔南夫人。

但以理又躺在躺椅上喝咖啡，珍妮上楼去叫醒让—保罗，安托万利用这功夫回到房里，急忙做了一次吸气疗法。他怕这一天会太累。

珍妮通常是骑车上班的。她推着自行车，回来时好骑，跟安托万一起徒步穿过花园。

他们出了院子，走到大路上，安托万试探着说：“我觉得但以理变了许多。他真的不再工作了？”

“完全不工作了。”

口气里充满责备。整个上午，还有吃饭的时候，安托万注意到兄妹间有些不和的迹象。想起不久以前但以理对珍妮那样关切，他感到惊奇，不知道在这方面，但以理是不是也毫不介意。

两个人静静地走了几分钟。椴树上新生的树叶在地上投下缀着光斑的阴影。这些老树底下的空气郁闷潮湿，好象要下雨，虽然天空还十分明净。

“您闻到了吗？”安托万抬起头来问她。从一座花园的树篱上望去，一排丁香，鲜花怒放，香气扑鼻。

“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对医院出些力，”珍妮接着说，根本没有注意丁香花。“妈妈问过他好多次，他总是说：‘我装着个木头腿，干什么都不行了！’可是，这只是个借口……”她换过一只手去扶车把，好离安托万更近些。“真正的原因是，他从来不能对别人作点什么有用的事，现在比以前更严重了。”

“她说得不公平，”他想。“但以理看孩子，她应该感激他。”

珍妮停住嘴，过了一会儿，生硬地说：

“他从来没有一点社会意识。”

这个词儿很出人意料……“她的一切看法都是从雅克来的。”他满心不悦地想道。“她现在是按照雅克的观点来判断她哥哥。”

“您知道，”他悲伤地说，“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残废了的时候，他是应当得到同情的……”

珍妮想的只是但以理，她突然反驳说：

“他本来还会被打死哩！还有什么可抱怨的？他还活着，他！”

她完全没有意识到这话太残酷，接着又说：

“他的腿吗？只有一点点瘸……是什么使他不能帮妈妈管一

管医院的会计工作呢？除非他根本不想有益于集体……”

“又是从雅克那儿来的词，”安托万想。

“有什么妨碍他重新画画呢？……您看，有另外的原因。不是健康的问题，问题在于他的性格！”她激动得不知不觉加快了脚步。安托万喘起气来。珍妮发现了，才把脚步放慢。“但以理一向生活得太安逸……一切都应该为他！今天，使他痛苦的是他愚蠢的虚荣心。他从来不出花园，从来不到巴黎去。为什么？因为他羞于露面，他不甘心放弃他往日的‘成功’！不再过他从前的生活！漂亮小伙子的生活！战前那种放荡的、不道德的生活！”

“您太严格了，珍妮！”

她看看安托万，他在微笑。等他笑容收敛之后，她又用决断的口气说：

“我为孩子担忧！”

“为让—保罗？”

“对！雅克让我明白了好多事情……目前这样的环境，我觉得气闷——这已经不是我所需要的环境了！我不能听任让—保罗注定要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安托万连忙挺挺身子，好象没有听懂。

“我向您说这些是因为我信任您，”她说。“因为，以后，我还需要您出主意……我对妈妈有很深的感情。我佩服她的勇气、在生活中的尊严态度。她为我作的一切我永远忘不了……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已经没有一点共同思想！在任何问题上都不一致！……显然，我已经不是一九一四年那样了。妈妈，她也变了……她领导这个医院已经四年，四年当中，她组织工作，作出决定，不干别的，只是发命令，让别人尊重她，让别人服从

她……她尝到了权威的滋味。她……反正，她不是原来那样了，确实是这样！……”

安托万含含糊糊地摇摇头，不太相信。

“妈妈从前很宽容，”珍妮继续说。“尽管她以前虔信宗教，但从来不把她的看法强加于人。而今天呢！……您如果听听她怎么样对她那些病人宣传鼓动的！……总是最听话的人住院的时间最长……”

“您太严格了，”安托万又重复一句。“显然，不公平。”

“也许……对……我也许不该对您说这些……我不知道该怎样让您理解我……比方说，妈妈总说：‘我们的勇士！’‘德国鬼子！’……”

“我们大家都这样说！”

“不！方式不一样……四年以来，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所犯的罪行，妈妈都原谅，妈妈甚至还同意！妈妈认为只有协约国的事业才是唯一纯洁的、正确的！战争应该继续到德国被消灭为止！……而谁不象她这样想，谁就是坏的法国人……谁探求罪恶的真正原因，谁认为资本主义应该为这一切负责，谁就……”

安托万惊奇地听着。这些话揭示了珍妮的精神状态和世界观，揭示了在雅克身后的影响下她衡量事物的新尺度。这比丰塔南夫人性格上的改变更使安托万感兴趣。他甚至也想说：“我为孩子担忧！”因为，尽管他以为珍妮的变化还不太自然，相当肤浅，但他不安地想着，珍妮的这种变化也许会在让一保罗周围造成一种危险的气氛，无论如何，对于幼小心灵的成长来说，至少比但舅舅的游手好闲或者外祖母短视的沙文主义更为危险……

他们走到阳光照耀的交叉路口，从那里可以看到蒂博先生的别墅的入口。安托万不由得漫不经心地四处观看，仿佛这些地

方是他在遥远的过去，甚至是在前生见过似的……

其实，一切都依然如故：别墅周围那庄严的景物，仍是那条宽阔的大路，两旁各有一条便道；还是那小小的空场，中间有个圆形的水池，星期日可以喷水，四周是铺着草皮的花坛，花坛边上栽着黄杨树，有白色的栅栏；那边，在父亲的花园里，低垂的树枝的掩映下，有一道篱笆，吉丝小时候时常在这里等着他回来。这里的景物仿佛丝毫也没有受到战争的触动……

珍妮在空场前停住脚步：

“三年多来，妈妈每天都跟战争造成的痛苦接触……仿佛从事这种叫人恶心的职业，心肠也变硬了，再也不能为人们的痛苦打动了……”

“您是说护士的职业？”

“不是，”她生硬地说，“她这种职业，就是看护、治疗那些年轻人，其实，只不过是让他们再去送死！就象矛手的马被捅破了肚子，缝一缝，再赶到斗牛场去一样！”她低下头，忽然转身对着安托万，怀着话说过之后的胆怯问道，“我的话让您厌烦了吧？”

“没有！”

这声“没有”脱口而出，他自己都感到惊异，他也惊奇地发现，今天，他距离丰塔南夫人的那种爱国主义，比距离珍妮的谴责和愤慨要遥远的简直不可计算。接着，想到弟弟，他再次在心里说：“我比以往是多么更深刻地了解他了呀！”

他们走到栅栏门。

珍妮叹了口气，散步结束了，她觉得遗憾。她亲切地对安托万笑一笑：

“谢谢……多么好，凑巧，我们能够开诚布公地谈了谈……”

精工制作的别墅栅栏门开着（上面还有自命不凡的花体的姓氏缩写“奥一蒂”，虽然年深月久，镀金层却没有怎么脱落）。救护车的辙印深深留在小路上，再也看不到蒂博先生每天都叫人耙的沙子了。穿过树枝，可以看到阳光照着的房屋正面，窗户大多开着，都挂着红条纹的新窗帘，洋溢着欢快气氛。

他们走到以前的仓库门口，珍妮说：“这儿就是我的洗衣室，我走了。您穿过走廊，从右边进去，在办公室，您就能找到妈妈。”

珍妮走后，他一人休息了一会儿，喘喘气。他的视线所及，每丛灌木，每条小径的拐弯处，都突然重新亲切起来。传来一阵阵钢琴声，他仿佛立刻看到往日的情景：小吉丝高高坐在琴凳上，辫子拖在背后，在老小姐和节拍器严格节奏的双重监督下，结结巴巴地练习音阶……

穿过花坛，他看见别墅前面象赶集那么热闹：一些年轻人戴着军便帽，穿着灰色法兰绒衣服，在台阶上靠墙坐成一排，晒太阳聊天。还有一些，聚集在花园的桌子旁打牌，看报。有两个士兵，没有穿上衣，只穿着蓝军裤打着绑腿，在轧草坪上的草，安托万听到轧草机使人恼火的咔啦啦的响声。再过去一些，山毛榉下有六七个病人，抖动着身体，在玩古老的投片游戏^①，只听见圆片碰铜青蛙的声音。

看到走来一位陌生的医官，躺在台阶上的人赶紧站起来行军礼。安托万踏上台阶。走廊上全都安上了玻璃，变成了一个

① 用小圆片投掷铜青蛙，投入其口中的为优胜。

玻璃花房，暖和又不透风，象温室似的。由于身体条件不能出门的病人就在这里躺着。左面有架钢琴，正是吉丝小时候学琴的那架浅色核桃木旧乐器。一个士兵坐在键盘前，用未经训练的手指试弹《马德龙歌》^①的叠句。

钢琴声停下来，那士兵举手向经过的医官敬礼。安托万走进客厅。这时候，里面没有人，已经变成了旅馆的大厅模样，四张牌桌周围放着安乐椅和小椅子。

蒂博先生的书房门关着。图钉钉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秘书处”。他进去。最初，他谁也没有看到。房里的家具还都在：橡木大桌子，安乐椅，几个书架，都还庄严地摆在原来的位置上。房中间有一架折叠式的屏风，把屋子隔成两半。听到门响，一架打字机停下来，一个年轻的秘书从屏风上面探出头，刚打量一下来客，就高兴地喊了起来：

“大夫先生！”

安托万愣了一下，微笑了。说真的，他完全认不出这个向他走来的大孩子是谁。可是这一定是路路，韦尔诺耶街上那两个孤儿中的弟弟，就是 he 从前曾经给路臂上的脓肿动过手术的那个孩子。（战争开始，他离开巴黎的时候，曾把这两个孩子托付给克洛蒂尔德和阿德里安娜……他模模糊糊地想起，曾经得知，丰塔南夫人给他们两个在医院里找了差事。）

“你真长大了！今年多少岁？”安托万问。

“我该二〇年入伍，大夫先生。”

“你在这里干什么？”

“开始的时候我管邮件，现在我管文书。”

^①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流行的一支歌。

“你哥哥呢？”

“在香巴尼省……他受了伤，您知道吗？手上，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在菲斯姆附近……他是一九一六年入伍的……切掉了两个手指头……幸亏是左手……”

“他又回前线了？”

“嘿，他可会对付！他设法调到气象营……没有危险了。”路路又好奇又同情地看着安托万，终于轻声问道：“您，中了毒气？”

“是的，”安托万答应一声。看到一张钉着镀金钉子的石榴红丝绒靠椅，他回想起少年时代。他满脸疲乏地坐下来。

“卑鄙，毒气，”路路撅起嘴说。“我觉得不光明正大……不合法规……”

“丰塔南夫人不在吗？”安托万打断他的话。

“她上楼去了……我去告诉她……我们在等着新来的病人，到处都再增加床位。”

只剩下安托万一个人。一个人，又仿佛跟他父亲在一起。蒂博先生那坚强的个性仍然在这间房里，从每件东西上，从按照一定的用途放置这些物件的每个地方，都发出蒂博先生的气味：带着银质瓶盖的墨水壶，台灯，吸墨纸，笔尖擦，挂在墙上的气压计。他这个人是那样顽强，单单搬动一下家具，放上一架屏风是不能使他消失的：它已经在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独断独行的地方固执地生了根。安托万只要看一眼那仿橡木的大门，就仿佛听到又阴沉又猛烈的开合声，使人不能忘记。只要看一眼地毯上磨损的痕迹，就仿佛看到父亲穿着燕尾服，眯缝着眼睛，肥胖的两手在背后紧紧握着，迈着沉重的脚步，在书架和壁炉之间踱来踱去。只要看一下那复制的博纳^①画的《基督》，画像下面放

^① 博纳(1833—1922)，法国画家。

着一张空的安乐椅，皮面上烫成交错的阴文的姓氏缩写，仿佛立刻就看见魁伟的蒂博先生沉甸甸地坐在那里，拱着肩膀，向某个讨厌的客人抬起小胡子，未曾说话，先从眉棱之间取下夹鼻眼镜，揣到背心口袋里，动作稳重坚定，就象划十字一般。

门锁的响声使他站起身来，丰塔南夫人进来了。

她象护士一样穿着白大褂，只是在完全白了的头发上没有戴头巾。面孔苍白消瘦。“心脏病患者的脸色，”安托万下意识地想道。“……也许活不了多久了……”

丰塔南夫人握住他的两只手，请他坐下。她走过去坐在大桌子的另一边，那张皮面安乐椅上。显然，这就是这位“胡格诺派”女人通常坐的地方……（如果已故的蒂博先生复生！……）

她马上问安托万的健康情况。刚才等着的时候，安托万休息过来了。他微笑着说：

“如果还留在前线，早就报销了……幸亏我的身体底子好……”

他开始询问起医院的工作以及她这一向的生活情况。丰塔南夫人马上活跃起来：

“我没有什么功劳……我这一班子人员都非常好。一切归尼科尔指挥。您知道，那个孩子有文凭资历。她帮了我很大的忙……对，人员都非常好！都是住在本庄的年轻的太太小姐，于是我这儿的房间都留给病人住。护士们都自愿帮忙，不取报酬，所以虽然津贴很少，收支还能平衡。我得到了好多帮助！从第一天开始就有人帮忙！本地的人非常慷慨！您想想，我们的一切器材，床、脸盆、餐具、床上用品，都是邻居捐献的！您看，我们就要来一批病人……尼科尔和吉赛尔去想办法募捐床。我敢肯定，我们缺的，她们一定能搞到！”她抬起眼睛，得意的微笑里充满感

激，好象感谢上帝使世界上，特别是使拉菲特庄都住满了热心侠肠的人。

她详详细细说明别墅如何改建，还有今后的改建计划，好象从来没有想到过战争和她的医院生活都有一天会突然结束。

“去看看吧！”她欢欣地说。

果然，一切都变了。弹子房变成了护理室，配膳间成了诊疗室，洗澡间变成了包扎室。栽橘树的温室很暖和，改成了兵士们的病房，十二张病床摆着还很宽绰。

“上楼吧！”

这时候，各病房都没有人，实际上是一小间一小间的宿舍。十五个病人住在二楼，三楼是十个，顶楼上还有六七张后备的床，人员太挤的时候用。

安托万很好奇地想再看看他自己原来的房间，但是，那房子的门锁着，等着进行消毒，因为一个得了副伤寒的病人刚住过，今天早上被送到圣日耳曼医院去了。

丰塔南夫人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以企业首脑那种权威模样——打开房门，用通晓业务的眼光巡视一番，顺便看看盥洗室是否干净，暖气片热不热，甚至看看桌子上摊着的杂志或书是什么名字。她不时抬起手腕看看几点钟，象习惯性的毛病一样。

安托万跟在后面，微微有些气喘，又想起克洛蒂尔德的话：“如果已故的老爷……”

到了三楼，丰塔南夫人请他走进一间糊着花壁纸、窗子对着栗树梢的房间，他在门口站住，忽而想起：

“雅克的房间……”

丰塔南夫人惊奇地看着他，忽然，她的眼睛也噙满了泪。为

了掩饰，她过去关上窗户，然后，好象这意外的回忆使她想更亲密地谈一谈，

“现在，我领您到马房上面的房间去，我在那儿设立了我的‘指挥部’，我们在那里更可以好好谈谈。”

他们默默地下楼。为了绕过走廊，他们从便门走到花园里。有四个兵士在树荫里把几张铁床漆成白色。丰塔南夫人走过去：

“快点，孩子们……明天就得晾干……您，罗勃莱，快下来！”（有一个人爬到厨房的房檐上，在绑铁线莲的蔓茎。）“前天你还躺在床上，今天就爬梯子了？”那人留着胡子，一定是个本土保卫军士兵，他顺从地笑着下来了。他刚一沾地，丰塔南夫人就向他走去，解开他上衣的两个扣子，摸摸他的肋骨，说道：“当然了，绷带已经松开。到护理室去给他们看看吧！”又对安托万说：“这孩子动手术还不到三个星期哩！”

他们绕过草坪向原来的马房走去。一路上遇到的病人都向丰塔南夫人友好地转过脸来，象老百姓那样举起军便帽致敬。

“我的房间在上面，”她一面说着，一面推开了小楼的门。

一楼的马栏中间，放着几个工作台，地上撒着些木片铁屑。

“人们把这儿叫做‘零活作坊’，”她一面解释，一面走上盘旋的小楼梯。这楼梯一直通到马车夫从前的住房。“现在，一些零活再也不要到外面去做了。这些好孩子们把全部修理活都包了下来：黑白铁，木匠活，电工……”

她领着安托万走进顶楼的第一间房，她把这儿布置成小小的个人办公室。有两张原来在小花园里的靠椅，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文件和帐簿，一条旧席子斜着铺在地板上。安托万一进来，马上就认出了在桌子上的他的那盏灯，是个大的煤油灯，上面

还有绿色的硬纸板灯罩。以前，六月里炎热的夜晚，飞蛾闹哄哄的，全家都睡了，他在这灯底下多次准备过考试。墙壁新粉刷过，上面钉着几帧照片：热罗姆年轻的时候，腰杆挺直，手扶着一个软椅的椅背；但以理光着两条小腿，穿着英国水手衫；珍妮小时候，披散着头发，一只养驯了的鸽子落在她伸出的拳头上；另外一张，珍妮已是少妇，穿着丧服，在膝盖上抱着她的儿子。

一阵咳嗽，使安托万不等邀请就坐下来。当他抬起头时，他发现丰塔南夫人正注意地看着他，但她一点没有考虑到他的健康有什么问题。

“我要利用您光临的这段时间来补点衣服，”她俏皮地笑着说。“我从来没有时间缝一针。”她推开桌子上的黑皮《圣经》，放上针线筐，看了看表，然后坐下来。

“但以理跟您谈了谈吧？他让您看他的腿了吗？”她问着，压下一声叹息。（但以理从来没有让她看过那条锯断的腿。）

“没有。可是，他把他的痛苦都对我说了……我劝他作某些操练疗法。坚持锻炼还是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他知道，安上新的假腿以后，走路差不多再也没有困难了。”

丰塔南夫人好象没有听。她双手放在裙子的凹处，向着窗户抬起头，思索的目光望着郁郁葱葱的花园。

忽然，她转过头来说。

“他对您说过他受伤的那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了吗？”

“这里？……没有……”

“上帝慈悲，预先通知了我，”她郑重其事地解释：“就在但以理受伤的那个时刻，我从圣灵那里得到了警告。”她的手微微举起，停住口，显得有点慌乱。接着，好象背诵一页《圣经》一般，又仿佛有义务在人们面前证明一个奇迹，她用相当严肃的语气，故

意简单地说：“那天是星期四，天刚亮，我就醒了。我觉得上帝来到了我面前，我想祈祷，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从创办医院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不舒服，以后也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想打开窗户叫守夜的女护士，可是我站不稳。幸亏他们看见我没有按通常的时候下去，有一个女护士就跑来了。她发现我躺在床上不能动；我一起来就头晕，就又倒下去。我浑身无力，就好像浑身的血都从一个伤口里流光了。我不停地思念但以理，作祷告，但是整个上午我的情况越来越坏。珍妮把医生请来好几次，给我喝乙醚糖浆。我几乎说不出话来。最后，到了十一点半，第一遍午饭钟响过不久，我才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晕厥过去。不过立刻就醒过来，觉得好一些了。好得那样快，到了傍晚，就能起床，我下去到了管理处，签署文件和要发的信，这才算完了。”她语调很平稳，有些克制。过了一会儿，她才继续说：“我的朋友，就在那个星期四拂晓的时候，但以理的那个团接到进攻的命令。整个上午，亲爱的孩子打得很英勇，没有负伤。可是十一点半以后不久，一块弹片打断了他的大腿。正是十一点半以后不久……人们把他抬到急救站，又抬到战地医院，几个钟头以后，在那里做了截肢手术，才被救过来……”她看着安托万摇了摇头说：“自然，这一切都是我十天以后才知道的。”

安托万沉默着，他又能说什么呢？……这段叙述使他想起珍妮小时候得脑膜炎，格雷戈里牧师那“神奇”的治疗。他又想起菲利普大夫有时微笑着说的一句话：“人人都有跟自己相称的故事……”

丰塔南夫人静静地待了一会儿。她早已拿起了活计。缝补之前，她先从盒子里取出眼镜，朝珍妮和让-保罗的照片照了照，才戴上。

“您还没有告诉我，您觉得我们的小家伙怎么样？”

“好极了！”

“可不是吗？”她得意洋洋地说。“但以理每星期日把他给我送来，相隔的时间很长。每次我都觉得他长大了，更健壮了！……但以理抱怨说这孩子难带，不听话。可是，这娃娃有个性，有什么奇怪的？再说，男孩子得有毅力，有意志……您不会说我不对吧？”她开玩笑似的说。“我跟他见面的时间很少，我觉得难过。可是，我的病人比他更需要我……”好象水流转了个弯，又返回正路似的，她又谈起她的医院来。

安托万静静地听着，表示同意，不大想插嘴，怕引起咳嗽。她戴上眼镜，简直就是个老太太。安托万又想，“心脏病病人的脸色。”她在椅子上坐得很直，不慌不忙地缝着，姿势又亲切又庄重，同时说着医院的工作和她担负责任带来的各式各样的操心事。

“从某些方面说，不幸也是好事，”安托万想。“战争给这种类型、这样年岁的妇女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幸福，一种表现献身精神、参加公众活动的机会，也给她们在一种使她们在感激的气氛中负责管理，得到乐趣……”

丰塔南夫人好象猜到了他的想法，说道：

“唉！我不抱怨！不管有时候我的任务多么重，对我来说却是必要的：我觉得我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生活了。我现在需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她微笑起来：“您知道吗？将来，您该给您的病人开一个医院，我来给您管！”她又马上补充：“跟尼科尔和吉赛尔一起……也许还有珍妮……有什么不可以的？”

安托万也高兴地重复一句：

“当真，有什么不可以的？”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

“珍妮在生活中也需要有事情做。”她忽然叹了口气，并不想说清各种想法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可怜的雅克。我永远忘不了最后一次看见他……”

她停住嘴，又回想起动员的第二天，她从维也纳回到家里看到的情景。不过，她还能够驱散这些痛苦的回忆。同时，她用手理一下飘在额头的一绺白发。这时，她决心跟安托万谈谈她一直放在心上的几个问题：

“我们应该相信那至高无上的智慧，”她说。（她那说教式的声调听起来很可亲，仿佛在说：“不要打断我的话。”）“我们应该接受上帝的意志。您弟弟的死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出了她的判断：“这种爱情注定了要经受很大的痛苦。两个人都要经受……请原谅我对您这样说。”

“我的想法跟您一样，”安托万连忙说。“如果雅克还活着，他们两个的生活就是一个地狱。”

她满意地看看安托万，一再点头，表示同意，又继续缝补。

沉默了一会儿，她直截了当地说：

“如果我不承认这，这些……使我非常痛苦，我就是在说假话……那天，我知道了我的珍妮快生孩子……”

关于这事，他也时常想着她。正好这时，她正抬起眼睛来看他，他就微微眨眨眼睛，表示他在十分注意地听着她的话。

“唉！”她生怕安托万误会她的意思，赶紧又说，“倒不是因为……出生得不合法……不……不完全是为这个……我特别难堪的是，这件可怕的奇闻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活见证，一个持久的后果……我对您说话很不拘束，是不是？我当时想：‘珍妮的生活永远有了个累赘……这就是惩罚！好吧！……’”

可是，我的朋友，我错了，我的信仰不坚，圣灵的意图是莫测高深的，上帝指的道路世人不知，上帝的慈悲无极无限……我以为是折磨，是惩罚，却正是上帝的恩宠……是宽恕的表示……快乐的源泉……的确，上帝为什么要惩罚呢？他难道不比我们更清楚，恶魔在这次冲动中，并不起任何作用。两个孩子的心灵即使在错误中，也是纯净、贞洁的。”

“多么奇怪呀，”安托万想，“她的话本来应该让我厌烦不堪……可是不然，在她身上，不知有一种什么气质，使人非尊敬不可。不仅是尊敬，还有同情……也许是因为她善良？……总而言之，这种善良难能可贵：真诚而又自然……”

“珍妮有了很好的收获，”丰塔南夫人不停地穿针引线，用她唱歌般坚定的声音继续说。“现在，她内心深处有了一宗财宝，使她整个的生活高尚起来，那就是对毫无保留的牺牲的回忆，对美好的时刻的回忆，而且，极不寻常的是，这些回忆并没有任何玷污了的后果……”

“有一些人，”安托万想，“一下子就永远形成了一个自己满意的世界观……以后，就任其自然发展……他们的生活就象风平浪静的日子在河上泛舟，只要顺水飘流，一直到码头……”

“……她只剩下一个最高尚的任务：有个孩子要……”

“我倒觉得她完全变了，象换了一个人，”安托万坚决地打断她的话。“非常成熟……不，不是成熟……非常……”

丰塔南夫人把活计放在膝头上，摘下眼镜：

“我要告诉您一件事，我的朋友：我觉得珍妮幸福！……对……幸福，她从来没有这样幸福过，这是她可以得到的最大幸福……因为珍妮生来就不是能享有幸福的。她还年幼的时候，她内心中就深深地感到痛苦，谁都对她无能为力，痛苦在她

心中生了根。不仅如此，她还恨自己，对自己都爱不起来，不能爱她自己——上帝的造物。她的灵魂，唉，从来没有宗教倾向，她的灵魂一向象是一座改变了用途的庙堂……可是，您看，上帝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周围每天创造着多么大的奇迹！任何苦难都有它的报偿；任何混乱都趋向于普世的和谐……今天，上帝的恩惠降临了。我的直觉从不欺骗我——今天，我亲爱的孩子作为寡妇和母亲，却得到了人间的幸福所能达到的一切，她的天性所能实现的那种平衡和愉快……现在我觉得她……”

“姨妈！”有个人在花园里喊。

丰塔南夫人站起来：

“尼科尔回来了。”

那人又喊：“镇长来了，姨妈。他要跟您说话。”

丰塔南夫人已经走到门口。安托万听见她在楼梯上高兴地叫喊：

“你上来一下，亲爱的。你来陪一下……一个你认识的人！”

尼科尔推开门的时候，停住脚，愣住了。她打量着安托万，好象不敢相认。

安托万心里一惊，讷讷地问：

“您觉得我已经不象样子了，是吗？”

她脸红了，控制住窘态，笑起来。

“哪里……只是，我没有料到您会在这里。”

他们还没有见过面，因为尼科尔昨晚没有回家去吃晚饭，她不愿把副伤寒病人托付给夜班看护，自己一直守护着。

她倒象是更年轻了。甚至熬夜之后，她乳白色的、光泽的面容也没有改变，蓝眼睛仍象无与伦比的一汪清水。

安托万询问她丈夫的消息。战争期间，他曾见过埃凯两次。

“目前，他的流动外科医院在香槟前线，”她说，明亮的眼睛不停地四处观看，神情里既有少女的天真无邪，又有少妇的风流俏丽，谁也不能把这两种成份完全分开。“工作很忙……可是，他还能挤出时间来给杂志写稿……这个星期我还收到一篇文章要打字……论止血带的应用，或者是类似的题目……”

太阳的光芒照着罩衫底下显现的浑圆的肩膀，随着她的一举一动，在衣服的皱折上闪耀，把毛茸茸的、光裸的前臂抹上一层金色，她一笑，就露出了光亮的牙齿。安托万立刻想到：“那些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大概都会被她挑起情欲的。”

“很可惜昨晚我不能回去，”她又说。“晚上过得怎么样？但以理可爱吗？您让他听话了些吗？”

“当然，为什么这么说？”

“他那么阴沉忧郁……”

安托万同情地摇摇手：

“您知道，他很可怜！”

“必须把他从这种情绪中解脱出来，”她又说。“一定要让他再继续画画。”她的声调严肃，好象是认真讨论什么问题，她正是等着安托万来解决。“他在这里过的这种生活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他迟钝起来，会变成……”

安托万微笑着说：

“我还没有发现。”

“唉！不……您去问问珍妮……确实不能……我们一到家，他就上楼回他的房间——是孤僻还是赌气，谁也说不清——再不然，他留在我们身边，一句话也不说，于是，屋子里的气温就好

象突然降低了！……他在场，使大家都难受……我对您说，如果您能说服他，让他重新工作，回巴黎去，跟一些人来往，重新生活，那么您就对他功德无量了！”

安托万只是摇摇头，又轻轻重复了一句：

“他很可怜！”

一种本能的猜疑使他保持警戒。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到，促使这位少妇说这些话的，还有一些隐秘的思想，她没有说出来。

（这并不完全不对。自从去年冬天某个晚上以来，尼科尔对但以理有她自己的看法。那天，已经很晚了，珍妮和吉丝都上楼去睡了。尼科尔想把一些事做完，一个人跟表弟留在客厅的壁炉前。突然，但以理对她说：“等等，尼科尔，不要动！”他在放在那儿的一张广告单背面，用铅笔画了一个尼科尔的侧面像。她很乐意满足但以理这突如其来的兴致。但是，过了一会儿，仿佛受到一种模糊预感的警告，她猛地转过身来，发现但以理不再画了，只用眼睛看着她，那眼光令人憎恶，充满了情欲，有阴沉的狂热，有羞愧，也许还有仇恨……但以理马上低下头，把广告单使劲揉皱，扔进火里。然后，一声不出，离开了房间。尼科尔惊骇地想：“原来是这样！他还爱我！”她丝毫也没有忘记在那遥远的年代，她在巴黎住在姨妈家里的时候，少年的但以理象着了魔似的，在那套房间里到处撩拨她。这狂热而又徒劳的爱情，她以为早已消逝，不料在这老屋朝夕相处之中显然又苏醒过来……从这天起，尼科尔把一切都看清楚了，但以理的爱情是一切的根源，他抑郁寡欢，焦躁不安，总在赌气，不离开拉菲特庄一步，坚持这种闲散而贞洁的幽居生活，而这与他的习惯和气质那么不相容。）

“您要听听我的想法吗？”尼科尔问道。她没有想到这样坚持会引起安托万的猜疑。“但以理是可怜的，您说得对。可是，使他痛苦的不仅仅是他的残废。不是……女人总有这类直觉，您知道……他大概还有另外的痛苦……有一种内在的什么感情，煎熬着他……也许是不幸的爱情……毫无希望的热情……”

她忽然害怕泄露真情，脸微微红了。但是安托万并没有看她。他仿佛又看见但以理躺在梧桐树下，嚼着橡皮糖，目光茫然，两手枕在脑后。

“这也许可能，”他天真地说。

她放心了，笑起来：

“说来说去，您跟我一样，也记得但以理战前在巴黎过的那种生活！……”

她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楼梯口上响起姨妈的脚步声。

丰塔南夫人抱着一大堆信件来了：

“对不起，我又来了，马上就走……”她举一举刚接到的那叠信和公文。“我们每天都要打好几分登记表送给主管部门，忙坏了。处理下午的信件要用两小时，每天如此！”

“我要走了，”安托万站起来说。

“以后一定要来。您和我们待一些时候吗？”

“嘿，不……我明天就走。”

“明天？”尼科尔问。

“我得在星期五赶回穆斯吉埃去。”

三人一起走下摇摇晃晃的小楼梯。

丰塔南夫人又看看手腕上的表：

“无论如何，我要送您到门口……”

“我不送了，”尼科尔说。“晚上见。”

等到那少妇走远之后，丰塔南夫人并未停步，用慌乱的声音问：

“尼科尔跟您谈到但以理了，是吧？可怜的孩子……我每天都要想到他好几次。我为他祷告……他背负着的痛苦是那么沉重！”

“至少，您可以肯定他还要生活下去，夫人。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肯定必须付代价！”

她好象不想弄懂，她不是从这个角度看事情的。

他们静静地走了几步。她又说：

“整天一个人……一个人，残废着！一个人自怨自艾……对谁都不肯说……连我也不告诉！”

安托万在小路中间站住，用坦率的目光表示询问。

“我完全理解他的痛苦，这可怜的孩子，”丰塔南夫人又用刚才那种又确定又难过的声调说，“他天性热情，慷慨……仍然觉得自己有勇气，身体健壮！眼看着自己的祖国遭到入侵……受到威胁……却不能为国出力！”

“您以为是这样？”安托万冒昧地问。他万万料不到这样的解释，他掩饰不住他的怀疑了。

丰塔南夫人挺挺身，嘴上浮起诡秘而又有点自豪的笑容：

“但以理？很简单……唉！真是无法弥补……但以理不能履行他的职责，所以不能自慰。”因为安托万还没有完全被说服。她又严肃而且固执地说：

“喂，我对你说的都是事实。但以理怕到医院来，并不是象他说的那样，因为走路太累。不对。是因为要他在这些跟他同样年龄的年轻人、战士中间；他跟他们一样受了伤，但是他们以

后还可以再去战斗！这个他受不了！”

安托万什么也没有说。他们静静地走到栅栏门的附近，丰塔南夫人站了下来：

“上帝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她激动地看着安托万说。她两手握住他伸过来的手，握了一会儿：“祝您好运气，我的朋友！”

安托万穿过广场，心里想：“他们都把但以理说得象个谜。每个人都对我作出他自己的解释……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有点疲乏，但没有累得更厉害，他感到又惊奇又满意。他不慌不忙地走向丰塔南家的宅子。只有一个人，他觉得心情松快了。椴树遮荫的大道在他面前伸展开去，一直通到森林。四点钟的太阳已经偏低，从树干之间照过来，在地上投下一条条火红的日影。他不时想起南方尘土飞扬的公路，贪婪地吸着法兰西岛^①这微微发酸的，充满春天气息的清新空气。

不过，他的思绪是悲伤的。在拉菲特庄的这两天勾起了太多的回忆。访问蒂博别墅更使他想起已经物故的人。这些幽灵伴随着他，无法驱遣。他的青春，往日的健康……他的父亲，还有雅克……在这二十四小时之内，他觉得雅克跟他非常亲近。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痛切地感到雅克的去世使他失去了一个无

^① 法兰西岛，古法国的所在地，中心为巴黎，包括目前的埃纳省、瓦兹省和索姆地区。

可代替的亲人，他唯一的兄弟……不，雅克死后，他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明确地感到这个损失的不可弥补。他甚至责备自己，直到现在，才真正感到悲伤，赤裸裸的悲伤。这怎么可能呢？由于环境，战争……他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接到吕梅尔来信的那个时刻——接到这封信之后，再存在任何一点希望，那就是太荒谬了。他是一天晚上在凡尔登战地医院的院子里接到这信的，再过几个钟头，他的那个师就要转移到埃巴热防区去。他指望会有进一步消息。那天夜里，在出发的忙乱中，没有时间容他尽情悲伤。以后的两个星期他也没有特别悲痛。他们冒着雨在泥泞中不断转移，在沃埃伏尔平原小村庄的废墟上，很难进行医疗工作。筋疲力尽的生活容不得他为个人的事烦恼。以后，休息的时候，他再看那封信，给吕梅尔写回信，这时，他发觉自己对雅克的死已经习惯了，不太想了。然而今天，重新回到熟悉的家庭生活环境，事后的悼念之情却非常强烈，不可弥补的感觉异常剧烈地纠缠着他。即使现在，在这些大路上，每一件景物都引起他的回忆，一同玩耍的情景。虽然年龄不同，他和雅克曾一起跳过那一道道白栏杆；割草期以前，一起在那片五月的草地上打滚；一起用棍子搅动虫子窝，那些硬壳小虫麇集在长满苔藓的椴树根上。他们把那种虫子叫做“大兵”，因为它们的硬壳是茜红色的，还有一条古怪的黑带子。在象今天这样的一些下午，他们曾一起沿着那边的树栅和篱笆散步，沿途摘下大把的金雀花和丁香，一起骑车驶过这条路，车把上挂着游泳衣或者球拍。那边，洋槐树下的大门，使他想起他当年还是个孩子，到拉菲特庄来度假的时候，到一位中学老师家去复习功课。九月里的傍晚，为了不让他一个人走过花园回家，韦兹小姐和雅克时常到这个门前来等他。他仿佛又看到弟弟，还是个三岁的孩子，松开老小姐的

手，向他跑来，让他抱着，呀呀地对他说这一天做了什么事……

他走到丰塔南家的乡间老屋，还象在作梦一样。一推开小门，他就看见让—保罗在花园门口，突然松开但舅舅的手，向他跑来，棕红色的头发，动作十分轻快，他简直以为看见了雅克。他心里十分激动，但是不愿意都表现出来，只是把孩子搂在怀里，就象以前抱着弟弟一样，他把孩子举起来，想亲他。但是，让—保罗即使同意让人家爱抚，也不愿被人强迫，他挣扎着用力蹬腿，安托万又笑又喘，只好把他放下。

但以理两手揣在衣袋里，观看着这个场面。

“他很结实，这小家伙！”安托万说着，几乎象慈父般的自豪。“腰这样一扭，象刚拖出水的鱼儿！”

但以理也笑了。在他的微笑里，也有跟安托万同样的自豪。接着，他抬起手来指着天说：

“好天气，是吧？……夏天又开始了……”

安托万跟让—保罗闹过一阵之后，有些气喘，就在路边坐下来。

“您要在这儿待一会儿吗？”但以理问。“我已经站了好久，我要去伸伸我的一条腿……我把孩子交给您好吗？”

“好。”

但以理转身对孩子说：

“你过一会儿跟安托万伯伯一起回去。你会乖乖的吗？”

让—保罗低下头，没有回答。他偷偷地瞅了安托万一眼，又向走开去的但以理犹犹疑疑地望一下，好象想赶上去，但是，注意力被掉在他脚下的一只金龟子吸引去了，马上忘了但舅舅，他蹲下来，仔细看着那小虫儿。它挣扎半天，也没有爬起来。

“让他老实待着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显出管他的样子，”安

托万想。他想起弟弟这个年岁他哄弟弟玩的一件玩意儿。他捡起一块厚厚的松树皮，拿出小刀，什么话也不说，开始把木头雕成一条船。

让一保罗偷偷地看他，很快地凑过来了：

“刀子是谁的？”

“是我的……安托万伯伯是当兵的，他需要一把刀来切面包，切肉……”

显然，这个解释一点也不能使让一保罗感兴趣。

“你在干什么？”

“你看吧！……你没有看见？我在做一只小船。我给你做一只小船。你妈妈给你洗澡的时候，你就把船放在澡盆里，它就飘在水上，不会沉下去。”

让一保罗听着，前额皱起来，因为他在考虑，也因为他不太舒服：这微弱而沙哑的嗓音引起了他不愉快的感觉。

另外，他也好象没有听懂安托万的话。也许他从来没有见过船？……他大声叹口气，抓住一个显然不太精确的细节，更正道：

“我，我洗澡，不是妈妈，是但舅舅！”

接着，对安托万的艺术劳动全然不顾，转过身去，又去看金龟子。

安托万不再坚持，把船扔掉，刀子放在身旁。

过了一会儿，让一保罗又回来了。安托万试着再建立起感情。

“你今天干什么好玩的事了？你跟但舅舅在花园里散步了吗？”

孩子好象尽力地思索回忆，终于点点头。

“你乖吗？”

又点点头。但紧接着，他走到安托万跟前，犹豫了一会儿，郑重地说：

“我不敢肯定！”

安托万不由得笑了：

“怎么？你不敢肯定你是不是乖？”

“不，我乖！”让一保罗恼怒地喊，接着又古怪地顾忌起来，滑稽可笑地皱起鼻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又说一遍：“但是，我不敢肯定！”

他走到安托万身后，好象要走远似的，突然弯下身子，想偷偷地抓起放在地上的那把小刀。

“不行！别拿！”安托万训斥他，用手把刀子捂住。

孩子不让步，怒气冲冲地瞪了他一眼。

“不能玩这个，你要割破手的！”安托万向他解释。他把刀子合上，塞进口袋里。那孩子气哼哼地站着，挺神气地摆出一副挑战的架式。为了跟他和解，安托万和蔼地张开一只手伸过去。孩子蓝色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拉住伸过来的那只手，好象是要吻它，却用小牙咬了一口。

“哎呀……”安托万叫了一声。他又惊奇，又狼狈，甚至没有想到生气。他揉着被咬的手指说道：“让一保罗坏！让一保罗把安托万伯伯咬痛了。”

孩子好奇地看着他，问道：

“很痛？”

“很痛。”

“很痛，”让一保罗显然满意地重复一句，转过身，跳着跑开了。

这件事使安托万不知所措，“只是为了报复吗？不是……”

那么,是为什么呢?在这样的一个行动中,有很多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的禁令难以违犯,他无可奈何的感觉一下子达到不可忍受的极限……他扑到我手上来,也许并不完全是为了要咬痛我,要惩罚我。也许只是一种生理需要,不可抗拒地需要松弛一下神经……另外,要判断这样一个反应,必须首先能够衡量出贪求的程度,抓住这把小刀的欲望大概非常强烈,达到了成年人不能想象的程度!……”

他斜着眼睛一望,看到让—保罗仍在近旁,他正在十米以外的地方努力爬上一个土坡,任何别的人他都不管。

“这种怨恨的反应,雅克显然也干得出来,”安托万想。“但是,他会达到用牙咬的程度吗?”

他搜索记忆,想把这事弄明白,总想说明现在与过去一样,父亲和儿子一样。在让—保罗眼睛里看到的这萌芽状态的叛逆、怨愤、挑战、骄傲和孤僻的精神,这些他都很熟识,他曾千百次在弟弟眼睛里看见过。相似得惊人,他甚至进一步推论,认为这孩子桀骜不驯的态度下面,掩盖着同样的那些压抑着的美德:羞涩、纯洁和不为人理解的温情,那正是雅克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在激烈的行动下面掩盖着的。

他怕着了凉,正准备站起来,这时候,那个孩子作的奇特的杂技动作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想冲上去的那个坡大约有两米来高,左右两边坡度很缓,爬起来容易;正面很陡,孩子却偏选中了这面向上爬。安托万看他接连爬了好几次,爬到半坡,滑下来滚到地上。他倒不会摔痛,地上有一层松树针叶垫着。他好象一心想着他的游戏,旁若无人,只要达到既定的目标。每次尝试都更接近顶点,每次都从更高的地方摔下来。他揉揉膝盖,重新再爬。

“蒂博家的毅力，”安托万欣喜地想。“在我父亲身上，是权威，统治的嗜好……在雅克身上是狂热，叛逆……在我身上是顽强……而现在，这孩子血液中的力量，会表现为什么形式呢？”

让—保罗又重新发动攻击，那样顽强地猛冲上去，几乎爬到坡顶。但脚下的土松动了，他几乎又一次失去平衡，却一把抓住了一束草，身体支持住了，再使出了一把力，终于到了顶上。

“我敢打赌，他要回过头来看我是不是看见了，”安托万想。

他弄错了。那孩子背转身去并没有理他。孩子在坡顶待了一会儿，小腿儿站得稳稳当当。大概是心满意足了，他才安安静静地从一面缓坡上下来，对于大获成功的那个地方，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靠着一棵树，脱下一只凉鞋，把灌进去的小石子摇出来，又仔细把鞋穿上。他知道自己系不上鞋带，走到安托万身边，一句话也不说，把脚伸给他。安托万笑了，顺从地把鞋系好。

“现在，我们回家去吧，好吗？”

“不。”

“他说‘不’的样子很特别，”安托万想。“珍妮说得对，并不是他不愿干人家要他干的事，而是事先就想好，什么都要拒绝。稍稍损害一点他的独立性，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都一概拒绝。”

安托万站了起来：

“走吧！让—保罗，听话！但舅舅在等着我们。快来！”

“不。”

“你来给我带路！”为了避开困难，安托万说。（他觉得他这个家庭教师当得很笨。）“从哪条路走啊？从这条，还是从那条？”他想拉住孩子的手，但是那孩子执拗地把手臂盘在腰上，说，

“我，说了：不！”

“好，”安托万说。“你愿意一个人留在这里，那就留下吧！”他毫不犹豫地向着房子那边走去。穿过树干，可以看到粉红色的墙在夕阳里闪光。

他还没有走出三十步，就听见身后让—保罗快步跑来赶上他。他决定高高兴兴地拉住他，就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孩子却跑到了他前面，没有停步，一面傲慢地对他说：

“我回家！因为，我愿意！”

— 二 —

老宅里的晚饭通常很热闹，因为吉丝和尼科尔很健谈。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她们俩很高兴，也许也因为感觉到摆脱了丰塔南夫人那母性的谨慎的监视。晚饭席上，她们随便评论着当天发生的事情，交换对新住院病人的印象，象住校的女学生那样，起劲地诉说各自工作中发生的琐碎事。

安托万虽然今晚觉得很累，看到她们认真地用技术术语争论某些疗法，评价某些医生的能力，觉得很有趣。有好几次，她们要他来评断，安托万也就微笑着说出自己的意见。

珍妮照顾着在桌上一同吃饭的儿子，对谈话不太注意。至于但以理，他还象通常一样沉默（特别是妹妹和尼科尔在场的时候），不过，有好几次，他也对安托万说说话。

尼科尔带回来一张晚报，上面谈到对巴黎的远距离炮击。六区和七区有几座房子新近被击中。有五人死亡，其中有三个妇女和一个吃奶的孩子。婴儿的死亡使协约国舆论大哗，一致攻击条顿人的野蛮行径。

竟能发生这样的暴行，尼科尔义愤填膺。

“这些德国鬼子！”她叫道。“打起仗来简直象畜生！已经使用了火焰喷射器，窒息瓦斯，潜水艇！还要屠杀无辜的老百姓，太过分了，简直骇人听闻！他们一定丧尽了道德观念，丧尽了人的感情！”

“比起来把年轻的士兵送到第一线去遭到屠杀，难道能说屠杀无辜的老百姓更不人道，更不道德，更骇人听闻？”安托万阴沉地反驳。

尼科尔和吉丝惊愕地看着他。

但以理放下叉子，垂着眼睛，一声不响。

“注意……”安托万继续说。“让战争合乎规则，想限制它，组织它（正象人们所说的，让它讲人道！）声明：‘这是野蛮的，这是不道德的！’这就意味着，承认另外还有一种作战方法……一种完全文明的方法……完全合乎道德的方法……”

他停下来，寻找珍妮的眼光，但她正弯着身子喂儿子喝水。

“真正骇人听闻的，”安托万继续说，“难道在于：是这种杀人的方法还是那种杀人的方法更为残酷，是对这些人损害得厉害还是对那些人？……”

珍妮忽然停住手，猛地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差一点打翻。她咬着牙说：

“骇人听闻的是人民的消极被动！人民是多数，他们有力量！战争能不能打起来，取决于人民接受还是拒绝！他们还等什么呢？只要说一声：不要战争，那么他们一致要求的和平立刻就能成为现实！”

但以理抬起眼睛，用谜一样的目光匆匆瞥了妹妹一眼。

沉默了一会儿。

安托万从容地总结说：

“骇人听闻的不是这也不是那，骇人听闻的就是战争本身，仅此而已！”

几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敢再发言。

“人人都要求和平，难道这是真的吗？……”思索着珍妮的话，安托万心里想道。“和平受到了威胁，人们就要求和平；但是，一旦有了和平，人类互相不能容忍和残杀好斗的本性又使和平危如累卵……固然可以把战争的责任推到政府和政策的身上，但是，不要忘记，人类的本性，也有一份责任……作为和平的基础，有这样一个公论：即相信人类道德的进步。我也相信，更恰当地说，我从感情上需要有这个信念：我绝下不了决心认为人类的觉悟不可能无限臻于完美！我必须相信，人类有一天能在这个星球上建立起秩序和博爱……但为了实现这个革命，单靠某几个智者的意志或殉难是不够的，将需要若干世纪甚至几千年的进化。（怎么能够指望一个二十世纪的人当真有什么伟大之处呢？）那么，不管我怎样捶胸顿足，都完全无用，我必须生活在这个野兽般贪婪的现今社会中，这样，在那么遥远的未来，我也找不出任何东西给我以安慰……”

他发现大家还是不作声，气氛仍然沉闷，充满了雷电。他后悔引起了这场突然的暴风雨，想使谈话再活跃起来。

他转身对但以理说：

“说起来，你们的那个朋友，那个怪人……您知道的，那位牧师……他怎么样了？”

“格雷戈里牧师吗？”

只说出这个名字，就使大家的眼里都流露出调皮的笑意。

尼科尔说：“泰雷兹姨妈很惦念他。复活节以后，他进了阿

尔卡雄疗养院。”她那悲哀的声调与她愉快的面容很不协调。

“最近的消息说，他已经卧床不起了，”但以理又加一句。

珍妮说，战争刚开始，牧师就到前线去了。说完，谈话又沉寂下来。

安托万没话找话地问道：

“他从军了？”

“也就是说他想尽办法，非去不可！”但以理解释说。“他没有当上兵，因为岁数太大，健康不佳。于是，他就设法加入了一个美国的战地医疗队，在英国前线度过一九一七年整个的可怕的冬天……抬伤员……支气管炎接连发作……后来咯了血……强迫他才离开了前线，但是太晚了。”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一九一六年，他在休假，他到这里来过，”珍妮说。

尼科尔说得更仔细：

“他变得都叫人认不出来了……象个幽灵……蓄着托尔斯泰式的大长胡子……象童话里的巫师！”

“他还是不肯服药吗？是不是除了念咒之外，不肯用别的办法治病？”安托万嘲笑地问。

尼科尔笑了起来：

“是的，是的……关于这个，他对我们说了好多胡话。到这里来以前，他用小卡车装死人已经干了两年，他还若无其事地反反复复说：‘死亡是不存在的！’”

“尼科尔！”吉丝喊了一声。看见有人当着安托万的面拿牧师来取笑，她受不了。

“另外，‘死’这字他也从来不说，”尼科尔还是继续说下去。“他总是说：‘死亡的幻象’……”

但以理微笑着接下去：“在他给妈妈最后的一封信里，有这样的惊人之笔：‘我的生命马上要退隐到不可见的境界去了……’”

吉丝责备地望了安托万一眼：

“不要笑，安托万……虽然他很可笑，但他是个圣人……”

“有什么办法呢？他也许是个圣人，”安托万让步了。“可是，我总不由自主地想，落到他神圣的爪子里的可怜的英国伤兵真是倒霉透顶——我总觉得他大概是个危险的护士！”

饭后甜食早吃完了。

珍妮把让-保罗从椅子上抱下来，自己站起身。大家也都站起来，跟着她走到客厅。珍妮径自从客厅走过，没有留下来；今天时间晚了，她赶忙送孩子上床睡觉。

吉丝坐在离灯光很远的一张矮椅子上，织她在翻新的几双袜子。这时，但以理象住院以后要回兵站的伤兵，急于获得干粮一样，又从钢琴上拿起一本《周游世界》杂志，坐到圆桌后面的长沙发上。圆桌上点着屋里唯一的一盏煤油灯。安托万观察着这个年轻人。他在灯罩底下专心致志地翻阅着，就象个听话的孩子。安托万想：“他是故意装出来的呢，还是真对那些古老的插图感兴趣？”

他走到壁炉旁，尼科尔正跪在炉膛前点火。

“我真是好久没有看见木柴烧的火！”

“晚上还有些凉，”她说：“另外，烧个火也愉快些！”她微微起身：“我们就是在这里，在拉菲特庄第一次见面的。我还记得很清楚，您呢？”

“我也记得。”

的确，他想起那个遥远的夏天晚上，由于雅克坚持，他瞒着蒂博先生，答应陪弟弟到“胡格诺派”家里来，不料在这儿碰到了

外科医生费利克斯·埃凯，比他高几班的同学。珍妮和尼科尔在玫瑰花夹道的小径上，雅克还是个学生，刚考上高师，他自己也是个青年医生，只有丰塔南夫人客气地叫他“大夫”……大家都年轻，个个都对自己的年华，对生活满怀信心，对前途一无所知，完全没有预料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家正在给他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浩劫，一举扫荡了他们每个人的小计划，消灭了一些人的生命，改变了另一些人的生活，在每个不同的命运中，堆积起废墟、丧服。它还要让世界动乱多少年呢？

“当时，我刚订婚，”她又沉思着说。这个回忆似乎充满了伤感气味。“费利克斯把我领到他的汽车里……在深夜回家的时候，汽车在萨特鲁维尔抛了一次锚……”

但以理头也不抬，只抬起眼睑，迅速朝他们这边瞥了一眼，被安托万看见了。他是在听吗？这过去的回忆莫非引起了他的感慨、遗憾？或者，这些废话只不过使他厌烦？他又翻起书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压下一个哈欠，合上书，站起身，不慌不忙走过来道声晚安。

吉丝也放下她的毛线活计，

“您要上楼去了，但以理？”

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她那一圈圈的头发更象羊毛，肤色更黑，眼白更亮。炉子里的火苗照着她，在矮凳子上弯着身子的侧影使人想起她祖辈居住的非洲：那是一个土著女人在篝火前蹲着。

“您的灯大概还在配膳室，来吧，我给您点灯。”

他们一起走出客厅。安托万下意识地看着他们，后来，眼光又回到尼科尔身上。尼科尔站住，看着他。只剩了他们两人，她异样地微笑起来：

“但以理应该娶她，”她小声说。

“什么？”

“当然了！美满的一对，您不觉得吗？”

安托万没有料到会有这种想法，一时愣住了，瞪着眼睛，扬起眉毛。尼科尔笑了起来，从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很响亮。

“没有想到您惊讶到这个程度！”

她把一张椅子挪到火跟前，一条腿搭在膝盖上，随随便便的，带着点儿挑逗的味道，看着安托万，却一声不响。

安托万过来坐在她的旁边。

“您以为他们已经有什么事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赶忙接口说。“无论如何，但以理从来没有想到……”

“吉丝也没有，”安托万脱口而出。

“吉丝大概也没有，但是，看得出她对但以理感兴趣。总是她替但以理到城里去办事，给他买报纸，买口香糖……她对但以理照顾备至，但以理呢，就接受下来，还显然很高兴……也许您已经注意到了，但以理只是对吉丝一个人不发脾气！”

安托万不说话。吉丝结婚的假设，乍一听，他有些不高兴。他还没有完全忘却过去，没有忘记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吉丝在他的生活里所占的位置。但仔细一想，他也找不到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来反对。

尼科尔还在静静地笑着，嘴角两旁出现两个酒窝。这种愉快有点做作，不自然。安托万想：“莫非她爱她的表弟？”

“唉，大夫，您得承认，我的想法并不那么荒谬，”尼科尔坚持说。“吉丝会全心全意地爱他，一个象她那样的姑娘，正是在这种忠心之中才能有最好的机会给自己创造一个合适的生活……至

于但以理……”她慢慢地把头向后仰去，直到金黄色的发辫靠到椅背，湿润的嘴唇微微张开，安托万看到她的牙齿闪了一下光。她又垂下眼睑，睫毛之间故意地露出调皮神色：“您知道，但以理这种人总是准备让人爱的……”

隔着板墙，听到古旧的楼梯上轧轧的脚步声，她微微露出不耐烦的样子，随即以相当令人不安的狡狴迅速改变了话题，大声说：

“我昨天晚上看守着一个副伤寒病人，是个萨瓦省人……一八九二年入伍的一个老头儿……”珍妮走进来，身后跟着吉丝，她说得更起劲了：“他说胡话，说的是一种难懂的方言，可是不断叫妈妈！……声音象个孩子。真叫人伤心。”

安托万也及时接着她的话头，还愚蠢地感到得意：“哦！我也时常听到这种喊声。但是，您不要弄错了，这幸而只不过是下意识的呻吟，是一种不自觉的回想过去的习惯……我听见喊妈妈的那些垂死的病人中，我想只有极少数人确实想到了他们的母亲。”

珍妮抱着一包棕色的毛线要绕成线团：

“今天晚上谁帮我？”

“我很困，”尼科尔懒洋洋地微笑着说。她又看看钟：“已经九点四十了……”

“我来吧，”吉丝提议。

珍妮摇摇头：

“不，亲爱的，你也累了。上楼去休息吧！”

尼科尔吻过珍妮之后，走到安托万身边：

“对不起，我们每天早上七点钟去上班，我昨夜又没有合眼。”

吉丝也走过来。想到安托万明天就要走，这几天一直没有单独见过面，没有找到在巴黎那样亲密的机会，她很难过。她怕说出这遗憾就会哭出来，只是默默伸过额头给安托万亲吻一下。

“别了，小黑丫头，”安托万极其温柔地小声说。

她马上想到安托万猜到了她的想法，安托万也跟她一样，为这离别感到伤心。这样的确信一下子使她觉得离别不那么令人痛苦了。

她避开安托万的眼光，追上了尼科尔。

“怎么，她没有跟珍妮道晚安？”安托万发觉到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她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珍妮已经快步穿过客厅，在门口赶上了吉丝，把手搭在她的肩上：

“我怕没有给小东西盖够，你再把他的脚盖上点吧！”

“粉红毯子？”

“白的暖和些。”

两人分了手，没有互道晚安。

安托万仍然站着：

“您呢，珍妮，您不上楼了吗？不要为我留在这里。”

“我一点也不困，”她一面说，一面坐在尼科尔刚才坐过的安乐椅上。

“那么，一起来缠毛线吧。我来代替吉丝，给我线卷。”

“绝对不行！”

“为什么，就那么难吗？”

他把毛线拿过来，坐在矮凳子上。珍妮微笑着让步了。

弄错几回之后，安托万说：“看，现在行了！”

看到安托万这样朴实，这样亲热，她吃了一惊，又十分高兴。

长期以来把他看错了，她觉得羞愧。现在安托万不正是她最可靠的支柱吗？一阵咳嗽，安托万不得不停下来。珍妮想：“但愿他能痊愈！但愿他恢复往日的健康！”为了她的儿子，她需要安托万健康起来。

咳嗽减轻后，他又拿起毛线，直截了当地说：

“您知道吗，珍妮？看到您这样……我是说，这样好……这样平静，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珍妮垂着眼睛看线团，思索着重复一句：

“平静……”

确实，不管怎样，连她自己也觉得她的悲伤已浸沉在平息的气氛中，有时自己也感到奇怪。她想着安托万的话，把现在的情况和三年半以前她所经历的混乱，和难以忍受的空虚相比。她想起，战争开始的期间，她得不到一点雅克的消息，预感到不幸，衰弱和兴奋互相矛盾地发作。痛感自己的孤独，又受不了同别人在一起，逃开母亲，逃出家门，她仿佛在寻求一个总要逃开而她又缺少不得的东西，总是差一点就把它抓住。有时，一个又一个的下午，她在动员令以后变了样子的巴黎城里走来走去，不知疲倦地走遍雅克领她去过的地方——东站，圣樊尚德保罗小花园，新月街，交易所附近的小酒店，她曾时常在那里等着雅克，蒙特鲁日的小巷子，还有开群众大会的大厅，雅克有一天晚上曾在那里鼓动激奋的群众去反对战争……最后，力气耗尽，深夜回到家里。她呻吟着扑到床上，雅克曾在那儿把她抱在怀中。睡几个小时，一会儿又醒来，又开始伤心失望的一天……的确，比起那几个星期来，目前的生活确实很“平静”！这三年里，她周围的一切和她自己都发生了变化。一切，甚至她心里的雅克的形象也变了……多么奇怪，最狂热的爱情也禁不住时间的消磨！她

现在想起雅克，从来不想他今天可能的模样，甚至也不想他一九一四年七月的样子。不，现在她所回忆的，不是她所认识的那个狂热、多变的人，而是一个静止不动坐着的雅克，略带侧面的肖像，一只手放在大腿上，额头被画室的玻璃窗强烈地照亮，是她日日夜夜看到的，画像中的雅克。

突然，她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她想象雅克突然回来了，她所产生的感情，既是快乐，也是窘迫……不必自欺，如果把一九一四年的雅克突然送还给她，如果由于奇迹，他又出现在今天的珍妮面前，她至今以为一直虔诚地为他保留着的位置，却不能原封不动地交给他……

她抬起眼，苦恼地向安托万望了一下，安托万却没有看到。他在专心地用两只痉挛的手腕撑着毛线，有规律地左右摇摆，引着那线松开，眼睛不敢离开中了魔法似的那股毛线。他觉得有些好笑，两肘之间在抽筋。他抱怨地想，不该自告奋勇，总是举着手臂，越来越觉得气闷，又坐在这个矮凳子上，离火太近，上楼脱衣服的时候他恐怕要着凉……

珍妮本想跟他谈谈自己，谈谈雅克和孩子——就象今天上午在她房间里那样。那样难得坦率地跟他谈谈，她今天一整天都感到心情舒畅。可是，到了晚上，她又焦躁起来……没有交往的本领，注定了不能与别人相通正是她内心生活的悲剧！甚至在雅克身旁，她也不能无话不谈。雅克责备了她多少次，说她难以理解！这种回忆仍然使她痛苦，仍然萦绕在她脑际。以后，跟她儿子相处又会怎样呢？由于她含蓄拘谨，外表冷淡，不是已经不由自主地使儿子生气了吗？

座钟响了，他们同时抬起头，这才一同意识到沉默得太久了。

珍妮微笑着说：

“剩下的算了吧，绕完这一团，我要上楼了。”她加快动作，把已经开始的那一团缠好，解释说：“不然的话，我上去，吉丝都睡着了，她刚睡着就会被我吵醒……她需要休息……”

这时，安托万想起了两张一样的床，这才明白吉丝为什么没有对珍妮说晚安：她们住在一个房间里。她们两个人，在楼上，都睡在雅克的画像下面，孩子的小床放在中间……想起吉丝在蒂博先生住宅里度过的暗淡的童年，安托万不禁满心喜悦：“可怜的姑娘找到了家！”脑子里又闪过尼科尔·埃凯所说的话。“她会嫁给但以理吗？”不知为什么，他不太相信会有这样的可能。何况，吉丝不嫁人也会幸福。她跟着珍妮和让-保罗会得到生活的意义和乐趣，在她看来，这两个人身上保留着雅克的形象，她一定会向他们贡献出她那无处发泄的温情，象忠诚的狗那样的眷恋。她将会变成一位灰白头发，棕色皮肤，年迈而慈祥的“吉阿姨”……

线绕完了，珍妮站起来，把毛线团整理好，用灰把木柴盖好，又拿起桌子上的灯。

“给我拿着吧，”安托万建议，口气并不坚决。

他声音沙哑，呼吸急促。珍妮不想让他费力。

“谢谢您，我习惯了。我总是最后一个上楼。”

她走到门口，转过身，举起灯来，看看是不是都整理好了。她的眼光在这熟识的古老的客厅里巡视了一遍，然后，停到安托万身上。

“不能在这个地方培养孩子！”她用坚定的口吻说。“战争一结束，我就要改变我的生活，住到别处去！”

“别处？”

“我要离开这一切，”她还用刚才那样坚定而又沉思的语气说。“我要走。”

“上哪儿去呢？”他忽然想到一个假设，“到瑞士去？”

她看了安托万一会儿，才回答：

“不是，自然，我曾经想过瑞士。可是，自从十月革命以后，那里真正的人，雅克原来的朋友，都到俄国去了……我有时也曾经想到过到俄国去……可是不行！让—保罗最好还是接受法国的教育。我要留在法国。但是，我要离开妈妈，我要离开但以理。我要安排我自己的生活。也许到外省，跟吉丝一起找个地方定居下来。我们工作，我们一起教育这孩子，把他培养成象样的人，就象雅克所希望的那样。”

“珍妮，”安托万急忙说，“我很希望那个时候，我重操医生的旧业，能够负担起……”

她摇摇头，打断他的话：

“谢谢您，如果需要的话，我当然会接受您的帮助。但是，我首先要作一个独立谋生的女人，我愿意让—保罗的母亲是一个独立的女人，由于自己的劳动，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思想，有权利按照她以为正确的方式去行动……您不赞成吗？”

“赞成！”

她亲切地看他一眼，表示感谢。仿佛把要告诉他的话说完了，她打开门，在安托万前面走上楼梯。

她把安托万送进他的卧室，把客厅的灯放在那里，看看什么都不缺，然后，向他伸出手：

“我要向您坦白地说一件事，安托万。”

“说吧，”他表示鼓励地说。

“嗯……我对您的感情，并不是总……象今天这样……”

“我也一样，”安托万微笑着承认。

看见他的微笑，珍妮有点踌躇，要不要继续说下去。她的手仍然让安托万握着，郑重的目光直视着他，终于作了决定：

“但是现在，当我想到孩子的前途，我……您明白，想到您还在，想到雅克的孩子对于您并不是外人，这就增强了我的勇气……您应当给我出主意，安托万……应当使让—保罗有他父亲的一切优点，但是没有……”她不敢说完她的话，但是，马上挺了挺身（安托万感到她的小手在抖动），就好像骑手在障碍前鞭策那倔强的坐骑一样，她咽咽唾沫，又说：“我不是没有看到雅克的缺点，您知道……”她再次停住口，接着，好象不由自主地附带一句似的，眼睛望着远处又说：“但是，他一在眼前，我就把那些缺点忘了……”

她眨了眨眼，想接上思路，但是，失去了头绪，只问道：

“您午饭以后才动身，是吧？”她强笑了一下，又说：“那么，我们在上午还可以见面……”她抽出手，低声说一句：“好好休息。”接着，走开了，没有回头。

— 三 —

老仆用高兴的声调通报：“蒂博大夫。”

菲利普正在他的书房里，一面写信，一面等安托万。他赶紧站起来，用他那一跳一跳的笨拙的步伐走到安托万面前。安托万这时正站在门坎上。他先用象是从不断眨动的眼睑之间射出的炯炯目光打量他一番，然后才抓住他的两只手，摇摇头，嘲弄似的笑了笑，掩饰住他心中的激动。

“您很好，亲爱的，穿着天蓝色的衣服！身体怎么样？”

“他多么显老啊，”安托万想。

菲利普的肩膀拱得更厉害，两条腿上的瘦长身体显得比以前更不稳，乱蓬蓬的眉毛，山羊胡子全都白了；但是，他的举动、顾盼和笑容里，仍保留着活跃和朝气，甚至有使人困惑的调皮神色，在这老年人的脸上，仿佛放错了地方似的。

他穿着红色带黑条的军裤，上身穿着一件燕尾服，两幅后襟都打皱了。这种一样一半的服装正象征着他半军半民的职业。一九一四年末，他奉命主管一个负责改进军医工作的委员会。从此以后，他就认定自己的任务在于进行斗争，反对他觉得腐败之极的某个机构的种种恶习。他在医学界的声望足以使他破例保持独立性。他攻击官方的规定，揭发滥用职权的行为，还向当局发出警告。三年以来，虽然为时过晚，还是有了一些有益的改革，这多半是由于他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

菲利普一直抓着安托万的两只手，轻轻摇动着，同时用冒水泡似的咕嘟嘟的声音说：

“哎呀！……好哇！……多长的时间了！……您怎么样？”接着，他把安托万推到他的办公桌前：“我们有这么多的话要说，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了……”他让安托万坐在通常要病人坐的椅子上，自己没有坐到桌子后面，伸手拿过一把折叠椅，跨着坐在安托万身旁，仔细端详他。

“喂，亲爱的，说说您的情况吧！这毒气的事，现在怎么样了？”

安托万心慌了。在菲利普的脸上，这种职业性的郑重和注意，他曾见过不下一百次，然而，现在他是第一次来作他的病人。

“您觉得我不象样子了吧，教授？”

“瘦了一点……并不太使人惊奇！”

菲利普摘下夹鼻眼镜，擦拭一下，又仔细戴好，俯过身来，笑着说：

“好，请讲吧！”

“嗯，教授，我就是人们所尊称的毒气病人，这一点也不可笑。”

菲利普不耐烦地摇摇头。

“啧，啧，啧……从头开始说，您第一次受伤的情况怎样？留下后遗症了吗？”

“如果战争在去年夏天我遇到毒气以前结束，我就不会留下什么毛病了……况且，毒气吸入的不多，我本来不应该象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右肺本已穿孔，恢复不了正常的弹性，毒气造成的病变就加重了。”

菲利普咧了咧嘴。

“是的，”安托万思索着又说，“我受的伤很重，不能抱幻想……当然，我能好，但是，时间会很长。并且……”一阵咳嗽打断了他一会儿。“并且，很可能我今后会终身残废！”

“您跟我一起吃饭吧？”菲利普突然问。

“很乐意，教授。可是，我写信对您说过，我吃东西有节制……”

“德尼斯知道，他弄了牛奶来……那么，您如果在这儿吃饭，我们的时间就充裕了。您从头讲起吧。是怎么发生的？我还以为您有掩护哩。”

安托万愤然耸耸肩。

“真蠢！是去年十月底的事。那时候，我正安安静静地在埃佩尔奈，受命组织一个毒气伤员医疗站——这简直是命中注定的。那时，我们刚攻克马尔梅宗，帕尔尼，我正在达姆大路防区

工作。从几次手术中，我发现在送给我的中毒气的伤员中间，有很多护士和抬担架的人，我很奇怪，觉得这不正常。我心里纳闷：医疗站里防毒措施难道不充分，医护人员执行规章莫非不认真？我就很热心地活动起来。我有点认识军团的主治医生，他批准我去实地调查。走了这一趟回来，我跟傻瓜似的，就撞上了……我从前线往回走的时候，德国鬼子发动了毒气攻势。祸不单行，虽然是冬天，天气却又潮湿又暖和。您知道，由于酸性的作用，越潮湿，芥子气的毒性就越大。”

菲利普手肘拄着膝盖，手托住下巴，盯着安托万说：“继续说。”

“我赶紧去找我留在师部的汽车。我得绕过挤满了换防部队的交通壕，我以为抄了一条近路。天已经黑了，我在一条淹了水的战壕中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详细的就不对您说了……”

“您没有防毒面具？”

“当然有！可是，是借来的……我大概没有扣紧，再不然，就是戴得太晚了。我只有一个想法：找到汽车……到了师部，我跳进车里，我们赶快跑。我要是在师部医院停下来，立刻用碳酸氢盐漱口，那就好了……”

“对，显然是这样！”

“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料到我中了毒。只是一小时以后，才感到脖子和腋下有些刺痛……我们在深夜回到埃佩尔奈，我就马上用胶态银包扎，躺下。我总觉得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支气管系统受到的损害比我想象的严重得多……您看多么可笑：我去调查是不是遵守了规定的预防措施，可是我自己就没有能注意遵守！……”

“后来呢？”菲利普问，他想表示对这个问题，他并不完全是

外行：“第二天，出现眼睛的症状、消化系统的症状，等等……”

“两样都没有。第二天，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腋下有些轻度的红斑，皮肤有些异样，好象很轻微，没有水疱。不过，支气管上隐伏的病变很深，好几天以后才发现……您能够猜得到后果：喉炎和气管炎接连不断……急性支气管炎……有假膜……典型的后遗症，就这样，已经有六个月了……”

“声带呢？”

“情况可怜，您听到我的声音了。今天晚上，因为我整个白天尽心治疗，所以还说得出话。经常是完全失音。”

“是声带发炎？”

“不是。”

“神经性病变？”

“也不是。是室隔膜肿大重叠引起了失音。”

“显然，这样就阻碍了振动。他们给您吃马钱子碱了？”

“每天六至七毫克，但毫无改善。另外，我失眠很重。”

“您是什么时候到南方去的？”

“从年初。我从埃佩尔奈先被送到蒙莫里戎医院，然后，十二月底，又转到格拉斯附近的穆斯吉埃医院。肺部的病变当时好象正在愈合。但是，到了穆斯吉埃，发现肺硬化，呼吸困难很快严重起来。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体温突然升到三十九度五到四十度，然后，又突然降到三十七度五……二月间，我得了干性胸膜炎，还咯血。”

“您现在没有这种大幅度的体温波动了？”

“还有。”

“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感染。”

“潜伏性的感染？”

“或者是其他慢性感染，说不清。”

他们对视了一下，安托万的目光里流露出询问的神色。菲利普伸出手说：

“不对，不对，蒂博！如果您认为是这个原因，您的担心就错了。据我所知，在这种情况下，从来没有向肺结核发展的先例。这个问题您比我知道得清楚。一个中了芥子气的人，只有在吸入毒气之前就有结核症状才会向结核转化……可是，”他挺起身子说道，“幸亏您在呼吸系统方面，以前没有什么病！”

他满怀信心地微笑着。安托万静静地观察着他，忽然，他深情地看着他的这位老老师，也笑了，说道：

“对，我知道，这真是运气！”

“另外，”菲利普好象在自言自语，“我觉得，吸入了窒息性毒气以后经常出现肺水肿，吸入了芥子气却很少见。这也是件好事……芥子气产生的肺部后遗症较少，而且，我认为，一般来说，比其他的毒气产生的后果要轻，对不对？我最近在这家杂志上读到一篇很好的文章。”

“是阿夏尔写的吧？”安托万摇摇头说：“一般人认为芥子气与窒息性毒气不同，首先损害支气管，对肺泡损害不大，并且认为芥子气对气体交换影响不深。可是，我个人的体验和对其他病人的观察使我对这个论点表示怀疑。实际情况是，哎呀！吸入了芥子气的肺脏表现的一切继发症状，大多很难治，会转化成为慢性。我甚至观察到，中芥子毒气的人中间，有很多病例是肺泡间硬化，同时壁层硬化，终于将肺脏完全堵塞……”

静默了一会儿。

“心脏呢？”菲利普问。

“直到现在，还算可以，但是能支持到几时呢？几个月来心脏过度劳累，中了毒，只有心脏是维持的中心，要求它不衰竭那简直是发疯。我甚至怀疑毒性是不是已经开始损害肌纤维和神经核。这几个星期，我发现某些心血管的症候……”

“发现？怎么发现的？”

“我还没有做透视。给我看病的大夫听诊之后，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可是，是真的吗？……还有别的检查办法：研究脉搏和血压。在体温不超过三十八度五或是三十九度的时候，我在上个星期之前就发现心跳异常加速，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五之间。如果说这种心动过速与初期肺水肿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您说呢？”

菲利普避开这个问题：

“为什么您不经常使用拔火罐来减轻心脏的负担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稍稍放血……”

安托万好象没有听见，只是注意地看着他的老老师。菲利普微笑着，从背心里掏出一个双层壳的大金表，那是安托万早就熟悉的。他弯下腰，与其说是好奇，不如说是由于多年的癖好，他捏住安托万的手腕。

足足一分钟过去了，菲利普一动不动，眼睛盯住表针。突然，安托万一惊。这专注的、谜一样的脸使他清楚地想起久已忘却的一件事：一天早晨，在医院，他和菲利普初交的时候，从听诊室一起出来，菲利普刚诊断完一个病情特别复杂的病人，忽然拉住安托万的胳膊，对他饶有风趣又满怀信赖地说：“亲爱的，您看，一个医生遇到危急的病例，首先应该能够独自一人沉思默想。有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拿出计时表！一个医生应该在小口袋里装一个又大又漂亮的计时表，就象小茶托那

么大，令人起敬。有了这个，他就得救了。哪怕有病人的一家子焦急不安地向他围攻，哪怕是在街上面对一个被车轧伤的人，一大群人围着他，没完没了地提问题，如果他要考虑，如果他要别人让他安静，他只要象变魔术一样，公然拿出他的洋葱头，一按脉，马上鸦雀无声，等于只剩了他一人！只要他在那儿，埋头对着表面，他就可以象在自己的诊疗室一样，用手托着头，沉思默想，安安静静地决定取舍，作出诊断……相信我的老经验吧，亲爱的，赶快去买一个计时表！”

菲利普没有发现安托万的迷惘神情。他松开手腕，不慌不忙地直起身来：

“显然脉搏快，有一点颤动，但还算有规律。”

“是的，有些时候却相反，尤其是晚上，跳动微弱，无力，很难摸到。请您解释一下这种现象！另外，肺部症状加剧时，心跳就加快……一般是间歇性的。”

“您没有试验一下压迫眼部？”

“可以说，这个办法一点明显的缓和作用都没有。”

又沉默了一会儿。

“我已经是虚弱的肺病患者，”安托万强笑着说。“总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个虚弱的心脏病患者！”

菲利普一摆手，打断了他：

“哪儿会！高血压和心动过速时常只是一种普通的保护现象，蒂博。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您跟我知道得一样清楚，比如在极轻度脑栓塞的病例中，心脏就是用升高血压和加速心跳成功地与肺泡阻塞作斗争。罗杰证明过这一点，此后，又有许多人支持这看法。”

安托万什么也没有说，又一阵发作使他咳得弯下腰。

“怎样治疗的？”菲利普问，好象他对这个问题也不怎么重视。

安托万一能说话的时候，就疲乏地耸耸肩：

“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当然，只除了阿片制剂之外……用硫黄制剂，然后用砷化物……再用硫黄……再用砷……”

他的嗓音微弱沙哑，话说得断断续续。他又住了嘴。这么长的谈话把他累坏了。他把头向后仰，上身挺直了一会儿，脖子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当他再睁开眼时，他发现菲利普用非常慈祥的目光看着他。这善意的表情比不安的态度更使他心慌意乱。他结结巴巴地问：

“您大概没有想到我成了这个样子……”

“相反，”菲利普笑着打断他的话。“从您最后一封信来看，我没有料到您的情况还是这么好！”他忽然住了嘴，又说：“现在，我很想听听内脏的情况。”

安托万吃力地站起来，脱掉军服上衣。

“我们按规矩来，”菲利普愉快地说。“您躺上去。”

他指着一张蒙着白床单的大长椅，他就是让他的病人躺在这儿的。安托万躺了上去。菲利普跪下，静静地仔细听诊。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站起来。

“嗯……”他回避着安托万焦虑的眼光，但是没有显露出来。“很明显……有些扩散性的笛音……也许有一点浸润……右肺整个上部有一点充血……”他终于向安托万回过头来。“我没有告诉您什么新东西，是吗？”

“是的，”安托万说着，慢慢抬起身。

“当然，”菲利普用他那一跳一跳的步子走到书桌前，坐下来，下意识地从小口袋里掏出钢笔，好象要开方子似的。“毫无疑

问，是气肿。完全坦白地说，我想您长久以来粘膜可能比较敏感……”他抚弄着钢笔，扬起眉毛，用漫不经意的神气审视着桌上的东西。“可是，不过如此！”他说着，断然地把打开着的电话号码簿合上。

安托万走过来，把两只手按在桌子边上。菲利普又把钢笔帽套上，装到口袋里，抬起头，一字一顿地下结论：

“很讨厌，孩子，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

安托万沉默着挺起身子，向壁炉走去，照着镜子整领子。

门上谨慎地敲了两下。

“我们的晚饭准备好了，”菲利普用高高兴兴的声调说。

他仍然坐着，安托万回到他身边，又用两手扶着桌子。

“能作的我确实都作了，教授，”他用疲乏的声音低声说。“我坚持不懈地试验了已知的一切治疗手段。我从临床学的角度对自己进行观察，仿佛我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病人。从第一天起，我每天写病情纪录，不断进行病情分析，做透视。我一心一意照顾自己，不要有任何不谨慎，绝不错过一次治疗的机会……”他叹了一口气，“尽管如此，有的时候，很难不感到灰心丧气！”

“不对，既然您已经发现有好转！”

“可是，我正是不敢肯定发现了好转！”安托万说。他不假思索，出自本能地回答了这句，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喊了出来。他马上又觉到出乎意料的慌乱，仿佛他这样说，是泄露了他一向压在心里不敢表现出的隐秘。一层轻汗在他的上唇沁出来。

菲利普看出了他的慌乱吗？理解他心中的凄怆吗？是不是因为他一向善于控制自己，所以脸上还是那么平静，那么自信？不，看到他那么欢快地耸肩，听到他兴高采烈，略带嘲讽的尖锐声音，很难相信他骗人会骗到这种程度。

“您愿意看透我心底的想法吗，亲爱的？好吧，我在想，好转过这样缓慢倒是件好事！……”他细细品味着安托万的惊讶神情。“您听我说，我差不多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的以往的六个实习医生当中，有三个已经被打死，两个终身残废。我出于自私，承认，当我知道第六个还算安全，只不过必须在远离前线一千五百公里的阳光灿烂的南方再住几个月的时候，我不会不高兴！不管您怎么想，我丝毫也不指望您在战争这场恶梦结束之前会痊愈！如果您不在去年十月中了毒气的话，谁能说得准我们今天晚上能在一起吃饭呢？……”他轻快地站起身来：“就说到这里，吃饭去！”

“他说得有道理，”安托万想，他也感染到老朋友那有说服力的愉快心情。“不管怎样，我的身体底子好……”

一盘冒着热气的肉汤摆在饭厅的桌子上。（近几年来，菲利普晚饭只吃肉汤和糖煮水果。）

他让安托万坐在专为他准备的一瓶牛奶前面。

“您的牛奶德尼斯没有热，不过，现在还来得及……”

“不用了，我一向喝凉的，这就很好。”

“不要加糖？”

安托万又咳嗽起来，不能回答，只摇摇手。菲利普避开眼睛不看，他，下决心不去注意他咳嗽，也不谈他的健康，赶快把话题转到别处。他思索着用汤匙搅汤，等着这一阵发作过去。为了打破难堪的沉默，他用十分自然的声调说：

“我又在我们的卫生委员会上战斗了一整天……官方对于注射防伤寒疫苗的规定矛盾百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安托万笑一笑，喝了口牛奶润润嗓子，

“可是，教授，您这三年的工作很出色！”

“困难不少，我对您说！”他想找另外一个话题，找不到，只好又说：“困难不少！一九一五年，我负责组织卫生机构的时候，您想象不到遇到了多少问题！”

安托万心里想：“我当时的地位，正好了解这种情况！”但是，他要避开一切说话的机会，只是会心地微笑着听他讲。

“那时候，”菲利普接着说，“伤兵总是用普通车厢装着撤到后方，就是运部队或是送给养的车皮……只要不是拉牲口的就行！……我见过有些可怜的人在没有取暖设备的车厢里，一等就是二十四小时，因为人数不够，凑不成合乎规定的一列车……往往只有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由作善事的好太太们或是无照行医的老药剂师给他们好好歹歹包扎一下。列车终于开动之后，他们还得拖上两三天才能从稻草堆里爬出来……所以，每列车里，得破伤风的人不知道占多少百分比！然后，把伤兵往已经装得满满的医院里一塞，医院里要什么没有什么，防腐剂，敷布，当然，还有橡皮手套，都缺！”

“我见过离前线四五里的地方……”安托万费力地说，“流动外科医院……用旧锅在木柴烧的火上……煮镊子……”

“这还不算，万不得已的时候，还可以解释……人们都焦头烂额了……”菲利普冷笑起来：“供过于求……战争夸大了它破坏的程度，战争不按条令上的规定办事！……”他又恢复了严肃的声调，继续说：“亲爱的，不可原谅的是，动员医务人员的方式。军队从打仗的第一天起，手头就有大批预备役的人员。我头几次奉命去视察的时候，就发现好些有名的大夫，例如德契，哈鲁安，在战地医院当二等护士，医院却由二十八岁或三十岁的军医领导。领导大的外科医院的人什么都不懂，好象除了治个瘰疬之

外，什么手术都没有做过，这些人却决定而且做最大的手术，动不动就胡乱切胳膊锯腿，就是因为他们袖子上有四道杠，一点也听不进由老百姓入伍的大夫们的意见——尽管他们从前是大医院的外科大夫，可是现在是那些军医的下属！我和我的同事们费了几个月的功夫做到了一些最起码的改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修订了规章制度，把伤兵的分配都交给职业大夫去处理……废除了一些荒谬的规定，比方说，把伤兵运到离前线最近的医院，不管伤势严重、急迫到什么程度……通常，把颅骨受伤的人送到波尔多或者佩尔皮昂，半路上就得了坏疽或者破伤风，不到地方就完蛋了！十二个钟头以后才做穿颅术，可怜的人们只有十之八九得救！”

突然，他的愤慨平息了，他微笑起来：

“您知道，在我奔走的初期谁帮了我的忙？您要吃惊的。是您的一位女病人，亲爱的，您知道，我们曾在一起给一个小姑娘上了石膏，送到贝尔克去，就是她的母亲……”

“巴丹库尔夫人？”安托万嗫嚅道，有点发窘。

“对，为了她的事您在一九一四年还给我写过信，您记得吗？”

的确，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安托万接到西蒙的一张明信片，说玛丽小姐把小病人独自丢在贝尔克，自己回英国去了，他就要求菲利普照顾于盖特。菲利普特意跑了一趟，决定那个姑娘可以顺利恢复差不多正常的生活。

“我在这个时期遇见巴丹库尔夫人好几次。这个女人，整个巴黎上层人士她都认识！我要求部长接见，要求了六个星期，她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给我安排好了。就是走了她的门路，我才见到部长本人，谈得很随便，我拿出所有的文件材料，把心里的

话都说了，亲爱的，一直谈了近两个钟头。这可是决定性的拜访！”

安托万一声不响，注意地看着他的空杯子。显然这种注意没有任何理由。他发觉了。为了故作镇静，他就往杯子里倒了一点牛奶。

“您那位小病人出落成了个漂亮姑娘，”安托万没有问他于盖特的消息，菲利普觉得奇怪。“我一直给她看病……她每过三四个月就来找我一次……”

“他知道不知道我跟安娜的暧昧关系？”安托万心里想。他勉强问道：

“她住在都兰？”

“不，在凡尔赛，跟她继父在一起。巴丹库尔住在凡尔赛，为了离巴黎近一些。夏特诺大夫给他看病……这个可怜的巴丹库尔，真是倒霉鬼！”

“不！”安托万心里想。“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就不会说‘倒霉鬼’这样的话！”

“您知道他怎么受伤的吗？”

“不太清楚……是在休假的时候，对吗？”

“他在前线待了两年，没有擦破一点皮。后来，一天夜里，在圣朱当素塞，他刚去休假，火车停在调度站上，正停着，德国鬼子的飞机来轰炸车站了！他被抬出来的时候满面血污，一只眼睛瞎了，另一只也受到重伤……夏特诺一直给他治疗。他差不多全瞎了，您知道……”

安托万回忆起动员的前几天西蒙到大学街来拜访的时候，他那明亮、忠厚的眼光——由于这次拜访，他才下决心跟安娜断绝关系。

“巴丹库尔夫人是不是……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噪音听不大清，菲利普不得不俯过身来。

“她在美国！”

“哦？”

为什么这个消息好象使他放下了心？

菲利普静静地笑着。德尼斯在桌子上放下一碗煮樱桃。

“喂！……那个母亲……”菲利普又说，他给自己盛上樱桃，好让仆人可以走开。“好象是个奇怪的人物？”他举着勺子停下来：“您说是吗？”

“他知道吗？”安托万又自问。他终于含含糊糊地笑了一下。（在菲利普面前，他总会失掉自信，不知不觉地又变成了早已被老师吓坏了的年轻实习医生。）

“对，到美国去了！……我上次看到小姑娘，她对我说：‘妈妈大概会定居在纽约，她在那儿有许多朋友。’从得到的消息来看，她是被某个法国宣传机构派到美国去公干的，而她这次出差又恰好跟一个美国上尉回国碰在一起，这个上尉曾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担任过一个时期的职务……”

“不，”安托万想，“他肯定什么也不知道。”

菲利普吐掉几粒樱桃核，抹抹胡子，又说：

“至少，勒贝尔是这样说的。勒贝尔一直领导巴丹库尔在图尔附近她的地产上开办的一所医院。她现在继续给这医院可观的捐款……不过，勒贝尔的话并不可信：有人说，虽然他鬓角花白，他也是……巴丹库尔夫人的亲密合作者……所以，在打仗的第一个冬天，他才把一切丢开，钻到都兰去不出来……您不喝完这瓶牛奶？”

“已经喝了两杯，只能喝这么多，”安托万微笑着低声说。“我

真怕喝牛奶！”

菲利普不再坚持，笨拙地折好餐巾，站起来。

“回那边去吧！……”他亲热地挽起安托万的胳膊，领他向诊疗室走去，一面说道：“您看到中欧帝国强加给罗马尼亚的和平条件了？很有教育意义，对吗？他们得到石油供应了。嘿，他们还能坚持，有什么理由要和平呢？”

“美国部队进入了战斗！”

“呸……如果他们今年夏天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恐怕不可能，虽然他们很想再次发动攻势，进逼巴黎——到了明年，他们就会用俄国的物资和兵力来对付美国的物资和兵力……这又是一个实际上用之不竭的资源……这样，两个庞然大物角斗，几乎势均力敌，谁也不愿妥协，谁的力量也不足以压倒对方，您说怎么办呢？双方就必然会僵持，一直到彼此都筋疲力尽……”

“您对于威尔逊的见识不寄予任何希望？”

“威尔逊住在天狼星上……再说，目前，据我看，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不希望和平。我说的是领导人。在巴黎和在伦敦一样，人们坚持要胜利，任何和平的意愿都被看作卖国行为。白里安那样的人是被人怀疑的。威尔逊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受怀疑，马上也要成为嫌疑分子！”

“人们也许不得不缔结和平！”安托万说，他想起了吕梅尔的话。

“我不相信德国会强迫我们接受和平。不，我再说一遍，我认为对峙的力量大致势均力敌，除了双方都拖垮之外，我看不出有任何别的出路。”

他又坐在书桌后面的座位上。安托万累了，看到菲利普向

他作了个手势，就不等再邀请，顺从地躺到长椅上。

“我们也许还能活着看见战争结束……但是，我们肯定看不见的是和平。我的意思是说，在和平中欧洲建立起的均势。”他微微有点慌乱，赶紧补充说：“我刚才说‘我们’，虽然您年纪还轻。因为，照我看，要恢复这种均势，大概还要等好几代人！”他又停下来，偷偷地看看安托万，捋了一会儿胡子，悲哀地耸耸肩，又说：“和平中的均势，按照现在这种状况，难道能够想象吗？民主理想的翅膀太沉重了。桑巴说得对，民主政体本来就不是为战争准备的，一打仗，民主政体就会熔化，就象蜡在火里一样。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欧洲就越没有希望建立民主制度。我们不难想象将来由某个克列孟梭或是某个劳合·乔治之流建立专制统治。人民袖手旁观，他们对于戒严已经习惯了，他们甚至连人民享有主权的共和主义要求都会逐渐放弃。仅仅看一看法国目前的情况吧：控制食物分配；消费品定量配给；政府干预各个领域的活动，如工业，贸易，个人之间的契约。您看有多少规章延期执行，在思想界有新闻出版物的检查！这些东西，我们都当作一些特殊措施接受下来，以为从目前局势来看都是必要的，其实，这就是完全受奴役的先兆。枷锁一旦牢固，人们就再也摆脱不掉了！”

“您认识斯图德勒吗，外号叫做哈里发的……我的助手？”

“一个犹太人，长着亚述人的大胡子，占星术士的眼睛？”

“对……他受过伤，现在，在萨洛尼克前线的某个地方……他在那里有时给我写信，说一些他杜撰的预言式的理论……斯图德勒声称，战争必不可免地要导致革命。首先在战败国爆发，接着在战胜国。不管是突然爆发还是缓慢进行，反正到处都要发生革命……”

“对……”菲利普含混地答应一声。

“他还说，现代世界要灭亡，资本主义要崩溃！他也认为，战争要一直持续到欧洲精疲力竭，才会停止。但是，一切都被消灭，一切都被铲平之后，他预言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他预见，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废墟上，将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邦联，一个全球的大规模的集体生活的组织……”

他扯着嗓子说完这一段话，停了下来，又咳得弯下了腰。

菲利普一直看着他，却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他闪着愉快的眼光说。他一向惯于发挥想象力：“为什么不可以呢？一七八九年的绝对信仰，不管许多生物学上明显的差异，也许长久以来一直让我们相信着人从本性上说是平等的，人在法律面前应该是平等的，也许我们就在这种信仰的基础上活了一世纪；也许这种信仰已经到了失效的时候，必须让位给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更漂亮的废话……将出现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产生出各种思想和行动，人类在一定时期内，赖以为生，陶醉其中……一直到再次发生改变……”

他停了一会儿，让安托万咳嗽。

“这是有可能的，”他又用嘲弄的口气说，“我就让您的这位救世主似的朋友去幻想吧……我所见到的前景却更临近，并且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觉得各国政府并不打算放弃战争给予他们的绝对权力，因此我担心民主自由的时代将很久不会开始。我承认，这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相当麻烦的事。我们以前曾经坚决相信这些自由权利已经毫无问题获得了，永远不会再发生问题了。但是，不论什么事，一向是能够再成为问题的……有谁说得准这一切不是梦呢？十九世纪末就是把这些梦当成了持久不变的现实，因为当时的人有幸生活在一个不寻常的安定时期，不寻

常的幸福时期……”

他用很粗的鼻音旁若无人地说着，胳膊肘放在椅子的扶手上，长长的酒糟鼻子朝合起的双手垂下来，低头看着他那一会儿握在一起，一会儿又松开的手指头。

“我们曾经以为，人类已经成年，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明智，克制，容忍，终有可能主宰全世界……智慧和理性终将引导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有谁能说得准呢？也许在将来的历史学家来看，我们太天真，太无知，对于人类和人类创造文化的能力抱着使人怜悯的幻想？也许我们对人类的某些基本品质熟视无睹？例如，破坏的本能，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把辛辛苦苦建树的东西夷为平地，这也许就是基本法则中的一种，它限制着我们的建设能力，这是一种神秘的、令人失望的法则，而明智之士只能认识它，接受它？……我们距离您的那位哈里发的预言还很遥远，”他笑着下了结论。看到安托万咳嗽不止，他就说：“您要不要喝点什么？一口水，或是一匙可待因？不要？”

安托万摇摇手。过了两三分钟（这时菲利普在房里默默地踱来踱去），他才觉得好一些了。他挺挺上身，擦掉流在脸上的眼泪，强笑一下。他面容瘦削，脸涨得通红，额上沁出了汗。

“我要……走了……教授……”他说着，嗓子里象火烧似的。“对不起……”他又笑一笑，挣扎着站了起来。

“我的情况很不好，必须承认！”

菲利普好象没有听见。

“人们说这说那，预言如何如何……”他说，“我看不起您的那位哈里发，然而我却完全跟他一样！……这一切都荒唐可笑。四年来我们见到的事无不荒谬，从荒谬中作出的预言必定荒谬……可以批评现状，对。甚至，可以谴责现状，这，这并不荒

谬。但是，要预见未来发生的事！……我的孩子，您看，我们总是回到这个题目上来：我的意思是说唯一科学的态度……我们还是谦虚些吧，不如说是唯一合理的态度，不使人失望的态度，就是探索错误，而不是探索真理……承认错误是困难的，但也许能作到，仅此而已，仅仅能做到这一点！……其余的都是胡说八道！”

看到安托万站起来，并没有怎样注意听，他也站了起来：

“我什么时候再见到您？您什么时候走？”

“明天早上，八点钟。”

菲利普惊得一抖，但轻微得几乎觉察不出，过了几秒钟，他的嗓音恢复了镇定的声调：

“啊，啊……”

他跟着安托万走向前厅。

他看着这拱起的背脊，从军服领子上露出的干瘦的、青筋暴起的脖子。他害怕泄露出心中的感情，害怕保持沉默，害怕他自己的想法，又赶紧说：

“您对那家医院至少还满意吧？那里的人办事认真不？这种医院对您合适吗？”

安托万一边走一边回答：“在冬天里再好也没有，但是我怕那儿的夏天，甚至想让人把我送到别处去……我需要在乡下……空气流通的也方，又不太潮湿……也许有些松树林……到阿尔卡雄？太热了，阿尔卡雄……那么，到比利牛斯山的一个温泉疗养地去……科特莱？卢雄？……”

他已经走到前厅，举起手来正要摘下军帽，忽然回过头来，再问一声：“您的意见呢，教授？”突然，在这个共事十年，摸清了所有的微细表情的脸上，在那夹鼻眼镜后面不断眨动的灰色小

眼睛里，他看见了不由自主流露的真情：强烈的怜悯，好象判决词一样。这张脸，这双眼睛在说：“还有什么用？在那里或是在别处过夏天还有什么要紧？……你逃不过的！……你完了！”

“老天，”安托万想，这突然的打击使他慌乱了。“我也早就知道……完了！”

“对，科特莱，”菲利普又镇定下来，赶紧结结巴巴地说。“可是，为什么不干脆到都兰去呢，亲爱的？……都兰……或者安茹……”

安托万盯着地板，不敢再看菲利普的眼睛……教授的声音多么虚假！听起来让人难受！……

他用颤抖着手戴上帽子，低着头走到门口，心里只想一件事：赶快分手，让自己一个人体味忧虑不安的心情。

“都兰……或者安茹……”菲利普又没精打采地重复说。“我去打听一下……再给您写信……”

眼睛仍旧低着，帽檐遮住了脸上的变化，安托万机械地伸出手。老医生握住手，嘴唇中发出喃喃的声音。安托万抽出手，打开门，逃了出去。

菲利普俯在栏杆上，还颤声地说：“对……为什么不到安茹去呢？……”

一 四

外面，全城一片漆黑，路灯都戴着遮光布罩，在人行道上投下带蓝色的圆形灯光。行人很少。偶尔有一辆汽车不断按着喇叭，小心翼翼地驰过。

他踉踉跄跄走着，不知要到哪儿去。他穿过马尔泽尔布大

道，走到布瓦西当格拉街。他走着，对一切感到漠然，觉得脖子沉重，呼吸急促，脑子里异样地嗡嗡叫，空空的。他离铺面太近，有时候胳膊肘碰到墙上。他什么也不想，也不觉得痛。

走到爱丽舍田园大街的树下，穿过树干，在春天清新的夜光下，看到协和广场，虽然灯光暗淡，却还依稀可辨。汽车静静地闪过，好象长着发出磷光的眼睛的怪物，接着又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看到一条长椅，走了过去，还没有坐下来，先习惯地想：“不要着凉。”（但马上又想：“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在菲利普眼睛中看到的那闪电般的判决，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不仅在心头，连身体也感到了痛苦，就象一个巨大的、毁灭性的肿瘤，寄生人体，向四周扩大，不可思议地膨胀，好侵占全身。

他蜷起身子，脊梁紧紧顶着硬椅背，交叉起两条手臂，想抑制住进入他的肌肤、使他窒息的这种异样的感觉。他又回忆起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仿佛又看到教授骑在椅子上问他：“从头开始说，您第一次受伤的情况怎样？留下后遗症了吗？”他从容不迫地说起来。但是慢慢地，他觉得自己说的话不再完全是他想说的意思。于是，他又用客观而清醒的态度，从真实的角度来叙述他的病情。他描述接连不断的发作，病情暂时减轻的时间越来越短，每次复发都越来越重。这便是无情的真实情况。他很明显地说，病情在有规律地加剧，未曾间断，已无可救药。他觉得，每时每刻，在老朋友那变了样的脸上，洞察一切的焦虑表情越来越明显，无可逃避的诊断正在逐渐形成。额上出了汗，呼吸急促而又痛苦，他掏出手帕，擦一擦脸。

远处，传来一个拖得很长的声音，一种呼啸，突然打破了晚上的寂静，他却没有怎么注意。

他仿佛又看到听诊之后，他从长椅上吃力地抬起上身，摇摇

头，装出听天由命的样子说：“您看到了，教授，不能再存丝毫希望了！”菲利普低着头，没有说话。

他猛地从长椅上站起来，打消这使他感到窒息的焦虑情绪。这时，他站立起来，一动不动，脑海中忽然闪过一个使他得到宽慰的想法，好象从深渊中吹来一股清风：“我们当大夫的，我们总有一个办法……可以不等待……可以不再受罪。”

他两腿发软，又坐了下去。

两个人影，两个女人的身影，从树底下跑出来。几乎就在这时候，所有的警报器都同时尖声叫起来。广场周围不多的几点微弱灯光一下子都熄灭了。

“这下可好啦，”他想着，竖起了耳朵。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大地在震动。

在他身后，在小径上，有逃开去的脚步声，黑夜里传出乱七八糟的惊喊声，人们成群结队地奔跑，藏到黑暗里去。在加布里埃尔街，汽车全熄灭了灯，一辆接一辆按着喇叭驶过。一队警察从他身后用小跑步的步伐走过去。他仍然坐着，觉得肩膀沉重，睁着眼睛却什么都没有看见，与一切人间纷争完全脱离了干系。

几分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任何事。远处传来几下沉闷的爆炸声，接着是断断续续的炮声，这才使他惊醒过来。

“是瓦莱里安山阵地上的大炮吧？”他想。

他又想起了吕梅尔给他的指点：海军部的防空洞。

远处，大炮还在低沉地隆隆响着。他站起来，向广场走去，走到人行道边上。巴黎的上空，奇异的天空活跃起来。从四面八方的天际射出一道道光束，扫过夜空，乳白色的光柱一忽儿伸长，一忽儿交叉，好象仔细审视繁星的目光，唐突，迅速；有时又犹犹疑疑，又忽然停住，寻找一个可疑的目标，接着再滑开去，继

续搜索。

他不想走到马路上去。他还在原处不动，仰着头，一直到脖子发酸。他想：“躺在这儿吧……闭上眼睛……吃些催眠药……睡过去……”他始终没有动，难以形容的疲惫使他麻木了。“还是回家去吧，”他想。“但愿能找到一辆出租汽车！”但是，广场上空无一人，漆黑一片，非常空旷。在探照灯断断续续的光芒下，一明一暗的对比中，广场突然闪现出来，还有栏杆，白色的雕塑，方尖碑，喷泉以及一排排凄凉的高灯柱，都好像梦中的幻景，好象中了什么魔法化为石头的城，已经消失了的文明的遗迹，久已埋在沙里的死城。

他从麻木中挣扎出来，象梦游的人似的，一下子穿过这个大墓场，直向那座方尖碑走去，想斜插到土伊勒利公园的拐角，走到沿河大街。在这倾覆的天空底下，穿过这个荒凉的广场，他觉得路长得没有尽头。他迎面遇到一群比利时士兵，他们象溃逃似的乱跑。然后，是一对老夫妇，笨拙地手拉着手跑着，赶过了他，就象沉船的残片在黑夜里飘浮。那男的喊道：“您快来，到地铁躲一躲吧！”等他们走不见了，他才想到要回答一声。

无数看不见的马达在空中嗡嗡振响，汇合成一大片金属的震动声。东面和北面，炮声激烈，城防部队不停地射击，紧接着，更近一些地方的排炮也轰击起来了。探照灯的光柱在天上扫来扫去，使人看不到高射炮弹爆炸的火光。射击的间隙里，他突然听到一阵机关枪声。

“到罗亚尔桥去，”他下意识地想。

他到了沿河大街，沿着河边的短墙走。没有一辆车。没有一点光。没有一个行人。在发狂的天空底下，大地好象荒无人迹，只有波光粼粼的河水跟他作伴，河水宽阔而恬静，好象月光

下流过田野的小河。

他站了一会儿，想道：“我早就预料到了，我早就知道我完了……”他象自动木偶似的又走了起来。

嘈杂声越来越急促，已经分不出是什么声音了……然而，一下沉重的爆炸，压过了所有的响声，紧接着又是几下。“炸弹，”他想，“他们穿过了封锁线。”卢浮宫那个方向，很远的地方，在被烟火照红了的天空中，腾起几个烟柱。他转过身，在勒瓦鲁亚上空，也许是在布多，远远近近又有几处冒出失火的红光……“到处都烧起来了，”他想。这看不见、摸不清的危险，好象神的盲目的愤怒，在他头顶上盘旋，一种不自然的激情使他的血液沸腾，一种怨愤的狂热恢复了他的力量。他加紧脚步，走上桥去，到了塞纳河对岸的巴克街。街上漆黑。他碰着了一个垃圾箱，腰上一使劲，才没有失去平衡，却使支气管觉得好疼。他又走下人行道，由探照灯照亮的那一角天空给自己指引方向。身后传来轰隆轰隆的声音。他赶紧跳上人行道。两辆奇形怪状、亮光闪闪的铁皮车风驰电掣般开过去，没有开车灯，右面还跟着一辆插着小旗的汽车。

“是消防队，”他身旁有个人说。这个人紧缩在一个门洞里，每隔五分钟，就伸出脖子，探出脑袋，好象在看大雨下完没有。

安托万又往前走，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感到疲乏不堪。他步伐沉重地往前走，脑子里总带着那个思想，就象拉着驳船的纤夫一样。“我早就知道……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他感到悲哀，但没有一点惊讶。他好象被重担压弯了腰，而不是象受到突然的打击。这可怕的明确的思想在他身上找到了早已准备好的位置。他很久以来就有这隐秘的思想，不肯说破，潜伏在下意识之中，而菲利普的目光只不过揭露了这种思想，把这个想法挑明了。

在大学街的街角，离家只有几步路，他忽然觉得一阵恐怖：害怕在家里等待着他的孤独。他蓦地停住脚，几乎要逃走。他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望着被光柱扫过的天空，在记忆里搜寻在谁那儿他可以得到庇护，有谁能投给他同情的目光。

“一个人也没有……”他低声说。

他靠在墙上，待了好几分钟。这时，防空部队的射击，飞机的轰响，炸弹的爆炸，象铁锤一样敲打着他的脑袋。他考虑着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没有一个朋友！他以前一向显得善于交际，殷勤待人；他得到了所有的病人的喜爱，同事们对他都有好感，老师对他很信任，还有几个女人狂热地爱过他——但是，他竟然一个朋友都没有！而且从来也没有过！……只有雅克……“我还能使雅克成为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死了……”

突然他想起了拉歇尔。啊！今晚，如果能蜷伏在她怀里，和往日一样听着她那热烈的爱抚的声音低语：“我的宝贝……”那该是多么好哇！拉歇尔，她在哪儿？她怎么样了？她的项链，在楼上家里……他想抓住这往昔的残片，摩挲着很快就象肌肤一般温热的珠子，那串项链引人回忆的香气正象拉歇尔就在身边……

他挣扎着离开了墙壁，有点摇摇晃晃地走出几米，到了家门口。

一 五

书 信

拉菲特庄，1918年5月16日。

弹片把我的大腿炸碎，也使我成了没有性别的阉人。我不愿

亲口把这个秘密告诉您。您是医生，您也许已经猜到了？当我们谈到雅克的时候，我对您说我羡慕他的命运，您曾经异样地朝着我看。

请把这封信毁掉，我不愿意别人知道，我不愿意别人怜悯我。我保住了一条命，国家给我抚恤金，保证我无需任何人赡养。很多人还羡慕我哩。当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只要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不能死，但是，以后，如果有一天，我宁愿结束我的生命，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是因为什么。

握您的手。

但·丰·

拉菲特庄，5月23日。

亲爱的安托万：

这不是责备您，可是我们都有些不安，您答应给我们写信，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也许，长途旅行之后您比我们想象的更累？

我要告诉您，您来看望给我们带来了安慰，这是我无法尽述的，我甚至不愿让别人看出来。可是，自从您走后，我觉得更加孤独了。

致

亲切的问候

珍妮

拉菲特庄，1918年6月8日。

亲爱的安托万：

日月流逝，您离开庄里已经三个星期，音信杳然，我开始非

常不安，我只能认为您情况不好，才不写信。我恳切地要求您将实情告诉我。

小家伙得了扁桃体炎，发了几天高烧，现在好多了。可是，我仍旧不许他出房间，这使家里的生活安排麻烦了些。您想到没有？我们都觉得，卧床八天他长大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对吗？我也觉得，在这次小病当中他的智力有了发展。他想出一大堆故事，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书中的插图和但以理给他画的图画。不要笑话我，我只敢对您说这些，我觉得这孩子虽然才三岁，却异常善于观察，我确实相信他将来会非常聪明。

除此之外，这里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医院得到命令尽量将病人遣送走，腾出床位来。这样，只好把本来还有十几天休息的可怜的人送走。每天都有新来的伤员。妈妈已向邻居英国人借来他们那栋无人居住的栽着紫藤的小别墅，这样就能增添二十张、甚至更多的床位。尼科尔收到她丈夫的一封长信，他那流动战地医院已离开香槟地区，迁到贝尔福附近。他说在香槟地区损失惨重。仗打到几时呢？这场恶梦要到几时结束呢？庄里每天都去巴黎的人说，轰炸越来越残酷。

亲爱的安托万，即使您的病又严重复发，也要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不要再让我们这样犹豫不安了。

您的朋友

珍妮

格拉斯，1918年6月11日。

健康情况平平，目前并未特别恶化。几日后将给您写信。亲切问候。

蒂博

穆斯吉埃,1918年6月18日。

我终于下决心给您写信,亲爱的珍妮。我这次长途旅行使您为我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回来之后,情况相当严重,只好卧床不起,同时,体温忽升忽降,令人不安。经过重新治疗,精心护理,病情仿佛不再恶化。一个星期以来,我又起床了,渐渐恢复了以前的生活规律。

不过,这次复发并不是我不写信的原因。您要求我说出真实情况,真实情况是这样: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的病已无法医治,绝对无可救药,大概还要拖几个月。不管怎样治疗,我是不能痊愈了。

必须亲自经历过这样的事,才能了解。在这样的发现面前,一切支撑点都崩塌了。

原谅我毫不隐讳地向您说这话,对于一个自知将死的人,一切都无所谓,不相干了。以后再给您写信,今天只能写到这里。

亲切问候

安托万

我请求您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

穆斯吉埃,1918年6月22日。

不,亲爱的珍妮,事情并不象您想象的那样(或者装作想象的那样),我并不是在想象的恐惧中挣扎。我早该有勇气把详情告诉您。今天,我要竭力写得略长一些。

我面对着一个现实,确定不移的现实。它是在我离开您之后,在巴黎的最后一天,跟我以前的老师菲利普大夫谈话的时候出现的。也许是由于在他面前我突然有了心理上的两重性,我

第一次对我自己的病况作出了客观、清醒的判断，以一个医生的身分作出了诊断。真实的情况在刹那间向我显示了出来。

在旅途中，我有的是时间来反复思考。我随身带着从一开始就每天作的记录，这可以使我按照日期和每次发作的顺序了解病情持续不断的、规律性的恶化过程。我当时还带着去年冬天整理出的一份材料，其中包括自从使用毒气以来在专门杂志上发表的法文和英文的几乎是全部的临床观察和医疗报告。所有我已经了解的这一切，现在以一个新的角度向我展现出来，而且，一切都证实了我的判断。回到这里以后，我同给我看病的专科医生们讨论我的病情。我不再象以前那样，作为一个病人，相信自己正在复原，全部接受能够加强这信心的一切；而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武装起来的同行，别人再也不能用诚挚的谎言来欺骗我了。我很快就问得他们躲躲闪闪，大有深意地沉默不语，或者差不多承认了真情。

我现在的结论具有无可置疑的基础。鉴于六个月来中毒现象不断加深，恶性发作接连不断，我已经没有一点希望复原了——确实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甚至保持稳定，转成慢性，变成终身残废的希望也没有。不，我象斜坡上的一个球——注定要滚落到底下去，并且越滚越快。我怎么会受骗了这么长久的时间？作为一个医生，这是多么大的讽刺！我还不知道结束的日期，这要看将来的、不可避免的发作，发作的程度以及间歇期的长短。根据复发的偶然性和治疗所产生的暂时效果，我可以估计再拖两个月——最多一年就会死。大限无法逃避，而且为期不远。在某些情况下，会有您所说的“奇迹”，但在我身上，奇迹不会发生。科学的现状不容许我抱丝毫希望。请您相信，我这样说，并不是作为一个病人，抱怨最坏的情况来求得相反的慰藉，而是

作为一个掌握着丰富材料的临床医生，面对着一个确实归入不治者的病人。如果说，我这样泰然自若地说明这些，是因为……

6月23日——我再接着写我昨天开了头而又中断了的信。我还不能自持，不能强迫自己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我原来还要对您说些什么，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曾写到：泰然自若。在不可避免的结局面前的相对镇静——唉，非常不稳定的镇静，我能够保持它并不是没有经过可怕的内心斗争的。

有时接连几天，在失眠的漫漫长夜，我仿佛生活在深渊之底，受着地狱的熬煎。一想起来，我就不由得四体冰凉，浑身发抖，无法镇定下来，这是任何人也不能想象的。理智是怎样坚持过来的？通过什么样的神秘的道路才越过了极度的悲痛和厌恶，到达现在这样甘心认可的地步？我在这里不愿多作解释。大概是因为明显的事实对于讲求理性的头脑有一种无限的威力，还因为人性有无限伸展的适应能力，所以人才能够连这样的事也能处之泰然；还没有来得及生活，生命就要被剥夺，无限的抱负还没有实现一丝一毫，生命就要消失。不过，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这个变化的各个阶段是怎样的了。整个的过程持续了很久。极端的悲观失望和消沉沮丧交替发作，如果不是这样，我就无法支持它们了。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星期，在这个期间，只有身体上的疼痛和难受的治疗才能转移一下注意，不再去想真正的痛苦。虎钳慢慢松开了。任何苦行主义，任何英雄主义，一切都与这样的甘心顺从毫不相似。不如说感觉都已迟钝，对事物根本没有反应，开始处之漠然，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是进入麻木状态。我的理智没有起任何作用，意志也全然无用。只是最近几天，我才使用了我的意志，是为了设法使麻木状态延续下去。我竭力

逐渐地重新回到生活中来，重新建立与周围世界的联系。早晨起床后，我避开这张床，逃出房间，勉强自己去同别人一起用餐。今天，我看了一会儿同伴们打桥牌。今天晚上，我给您写信，还不算太困难，甚至还感到一种异样的、新的喜悦。我来到户外，在一排柏树的树荫下给您把这封信写完。在这排柏树后面，护士们正在举行星期日的球赛。我本来以为，离人这样近，我受不了这些吵闹声和笑声。但是，我想待下来，居然也就能待下来了。您看，一种新的平衡也许会建立起来。

不过，这样用力总是相当累人的。以后再给您写吧。只要我的思想还能关心别人，我想到的就是您和您的孩子。

安托万

穆斯吉埃，6月28日。

从今天早晨起，我又把您的信看了好几遍，亲爱的珍妮。您的信不但朴实，动人，而且正是我希望的那样，正如我希望于您的一样，正如我对您的推测一样。我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给您写信。这时候，一切治疗活动都已结束，值班的护士已查了房，这时候，在我面前的就只有失眠了——还有“幽灵”^①……因为您的缘故——我要写，我觉得我不再有勇气了。问题不在于勇气，我所需要的也不是勇气，我所需要的也许是您能在身旁，在这能持续几个月的亲密交谈中，我不感到那么孤独。请您相信，我是不希望这几个月的时间缩短的。我并不愿意不要病情缓和！我自己也感到惊奇。您想想，我完全有办法了结一切。不过，这些办法，我留到以后再用，现在还不用。我接受病情的缓解，我使劲抓住不放。奇怪，是不是？一个人既然强烈地热爱生命，就不会

^① 指干扰他心理安宁的各种情绪和幻觉。

轻易放弃它，必须相信这一点。既然感觉到生命在散失，放弃它就更不容易。受雷击的树，在以后接连的几个春天，树液还会向上输送，树根还没有最终死去。

不过，珍妮，在您写的那么美好的信中还缺一点东西：关于孩子的消息。您只在以前的一封信中提到过他一次。我接到那封信时，依旧处于孤独的心情当中，什么事都不愿做，我把信放了一天，也许时间更长，没有拆开。后来我终于读了那封信，一眼就看到了提到让—保罗的那几行，我第一次能够暂时抛开固定的想法，摆脱受迷惑的状态，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事情上，对外部世界又有了感觉。从此，我时常想到这孩子。在庄里，我曾见过他，抚摸过他，听见过他的笑声，我仿佛还能感觉到他的肌肉在我手指下颤动。我一想到他，就好象又看到了他。围绕着他，我有了一些具体的想法，关于未来的设想。一个不治的病人，一个暂时缓刑的死囚，居然还有兴致定什么计划，抱着什么希望！这个孩子，我想，他在生活着，开始走上人生的道路，他将有一个崭新的生活，这使我得到了原来不可企求的解脱。这也许是一个病人的胡思乱想吧！且由它去！我不象以前那样怕让自己变得温情了。（这无疑是病人的弱点！）我睡觉很少，而且我不愿再用安眠药，因为那样的话，不久就会用得太多了。

我继续循序渐进地努力重新适应。这是一种意志的锻炼，只有这个是对我有益的。我又开始看报了。战争，库尔曼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他说得很对：如果双方事先就认为对方的建议是个阴谋，是瓦解对方士气的攻势，那么和平就绝对不能实现。协约国的报刊又在蒙骗舆论。他的演说一点“侵略性”也没有，甚至是和解的，而且很有意思。

（我是想俏皮一些才这样写的。战争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

不去，我相信它会一直存在到我死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我要克制一些。)

不写了，这样闲扯对我很好，不久我还要给您这样写。我们相互了解得不多，珍妮，但您的信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温暖。我觉得世上除了您，再没有别的朋友了。

安托万

穆斯吉埃，6月30日。

我要让您吃惊了，亲爱的珍妮。您知道昨天下午我干什么了？我在算帐，翻阅文件契约，写业务往来的函件。很多天以来我就想到这件事了，迫不急待地想清理某些钱财问题。我要把身后的事安排妥帖，不久，我就会没有力量干这样的事了。那么，就利用一下这桩心事所激起的暂时兴致吧！

很抱歉，这封信用了这样的口气。我必须使让—保罗的监护人了解我的财产情况，因为，我所有的东西自然是要留给这个孩子的。

财产已经不多。父亲给我留下的证券，当然没有剩下什么。改建巴黎的房子，我花去了一大笔，又不慎把其余的都换成了俄国股票，我想这些都永远损失了。幸亏大学街的房产和拉菲特庄的别墅侥幸逃脱了灾难。

房产可以出租或是出售，所得款项可以勉强维持你们的生活，保证我们的孩子受到合适的教育。他将来不会有豪华的享受，这样更好，可是他也不会过穷苦拮据的生活。

至于庄上的那栋别墅，我劝您在战后把它卖掉。它还能吸引某个暴发户，这是它唯一的价值。从但以理对我所说的情况看，您母亲的房产都已抵押出去了。我觉得丰塔南夫人和您都

依恋那座老宅，那么，用出售蒂博别墅的所得使你们最终解除抵押不是正好吗？这样，您父母的产业自然就属于让-保罗了。我要去问一下公证人，用什么办法实现这个计划。

一旦我大致估算出能留下多少，我将确定一小笔年金的数额，我想赠给吉丝。而您，可怜的朋友，将由您经管这一切，一直到您的儿子成年。您会从我的公证人贝诺先生那里得到有益的建议，他是个过分慎重的人，有点过于拘泥，但很可靠。

我想告诉您的就是这些。写完之后，才觉得轻松。以后，到我可以告诉您最后的确实细节时，我再跟您谈这事。不过，我还有另外一个计划，几天以来我就不断想着它。这个计划只跟您一个人有关，然而对于任何人都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将来还是应该说一说，现在我还没有这个勇气。

我在油橄榄树荫下看报，过了两个小时。德军按兵不动，背后有什么阴谋？我们在蒙迪迪埃和瓦兹之间的抵抗似乎已经阻挡住他们的进攻。奥地利军也遭到了挫折，这会在他们国内引起尖锐的失望情绪。如果在夏季几个月内，美国部队投入战场之前，中欧强国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形势就会改观。我能活到那天看到吗？从个人看来，构成历史的事态发展缓慢得可怕，四年以来，有很多次，就是这件事让我发抖，因为，我没有多少时间好活了！……

然而，我还是应该承认，我相信暂时进入了一个好转的时期。莫非是新的血清起了作用？窒息的痛苦减轻了一些，也不那么经常持续发烧了。这是体力方面；至于“精神状态”——这是个神圣的词，最高统帅部就是用它来衡量即将送死的士兵们的迟钝程度的——我的精神状态也好些了。也许您通过这封信能够感觉得到？信很长，这无论如何证明我很乐意跟您谈谈，这

是我唯一的愉快。可是我必须就此搁笔，因为治疗的时间到了。

您的朋友

安

我跟以前一样自觉地接受治疗。怪事，是不是？医生对我的态度奇怪地发生了变化。这样，现在，虽然他也发现情况有了好转，但他不敢向我指出来，他总算不再对我说：“您自己看得很清楚嘛！”之类的话，却比以前更经常来看我，还给我送来报纸、唱片，又作出种种友好的表示。说这些，是为了回答您的问题。任何地方都不如这儿更适宜于我等待结局的到来。

（下夏朗德）鲁瓦扬，23医院

1918年6月29日。

大夫先生：

我于一九一六年秋天离开几内亚，到此地外科医院任护士，我收到了您上月的来信。我的确记得，象您信中提及的，曾经向您寄过一个包裹，但有些事已记不清楚，不能如您所请，告诉您确实情况。我并不认识托我向您寄东西的这位太太。她被送到医院时，得了很重的黄热病，不多几天就去世了，虽然朗斯洛大夫曾为她精心治疗。我想，这大概是一九一六年春天的事。我清楚地记得她是由一艘途经科纳克里的邮船上紧急抬下来的。她一直昏迷不语，清醒的时候不多。有一次我值夜班，她把那件东西和您的地址交给了我。总之，我可以肯定地说，她没有托我写信向您说什么。她大概是邮船中途靠岸时独自上船的，因为在她弥留的两三天里，没有一个人来看她。我估计她大概被安葬在欧洲人公墓里。医院的行政主任法布里先生，如果还在医院的

话，他可以查一下登记簿，大概会告诉您这位太太的姓名和逝世的日期。我很遗憾记不起别的事能告诉您。

大夫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吕西·博纳

我拆开信，再告诉您一件小事。我记得很清楚，这位太太还带着一条黑色的叭喇狗，叫做希尔或是希尔施。她每次清醒的时候都要这只狗，但是我们不能把狗留在楼里，因为有规定，而且这狗也异常凶猛。我的一位女护士同事，本想收留这狗，但招来了许多麻烦，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给狗吃了一只掺毒药的肉丸。

一 六

安托万的日记

七月

穆斯吉埃，1918年7月2日。

黑夜将尽，就在刚才，似睡非睡的片刻里，梦见了雅克。情节已经串连不起来了。好象是从前在大学街住宅底楼小居室里。我又回忆起我们在一起非常亲密生活的时期。在很多回忆中，我又记起了雅克从教养院出来的那天，我把他安顿在我的房里。是我要这样做的，为的是不让他受父亲的监督。可是，我又不自主地怀着些不光彩的敌意，一些从利己出发的遗憾。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对自己说：“就这样，我要他在这里，但不能打乱我的生活习惯，不能妨碍我工作，妨碍我到达目的。”到达目的！我整个的一生中，都有这个口头禅，“到达目的！”这是我的口号，唯

一的目标，奋斗了十五年……现在，今天早上，却到达了这张病床上，多么大的讽刺！……

这个本子。昨天我托医院里的总务到格拉斯的文具店给我买了这个本子。这也许是一个病人的孩子气。将来我就会知道了。给珍妮写信，我发现把心里想的写下来就会觉得轻松些。我从来不写日记，甚至十六岁时也没有写过，不象弗雷德、热尔普隆和很多别的人那样。现在，晚了点！我没有日记，不过，在我愿意的时候，记下来一些头脑里反复活动的思想。毫无疑问，这是有益于健康的。一个病人，一个失眠症患者，一切都在头脑里盘旋不去，写出来是一个解脱，况且，可以散散心，消磨时间。（消磨时间！不久以前，我还觉得时间不够！甚至在前线，甚至去年冬天刚入医院的时候，我还象以前一样，在一种压力下面生活，没有一个钟头无所事事，对于时间流逝没有概念，也意识不到此时此刻的时间。只是在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时候，我才觉得一小时一小时长得没有头。）

夜里还好。今天早上， $37^{\circ}7$ 。

晚上。

室息复发，体温 $38^{\circ}8$ 。肋间疼痛，我疑心威胁是在胸膜。

为了驱除“幽灵”，我把它们写在纸上。

一整天都在考虑财产继承的问题。要安排我的后事。（安排什么事总是使人操心！但是这一次，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他们，为孩子。）计算了又计算，算了十来次。卖掉庄里的别墅，将大学街的房子出租，卖掉实验室的设备，或者让某个化工企业承租。可以由斯图德勒经手。如果不行，就让他主持拆卸仪器，寻

找买主。

又想到斯图德勒，他战后就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了。

给他和儒斯兰留一句话，委托他们处理文件和实验记录。
(送交学院图书馆?)

7月3日。

吕卡给我看验血的结果，显然不好。巴尔多也不得不用他那拖长的声音承认：“不太妙！”以前，我的血多么好啊！第一次受伤以后，在圣迪齐耶疗养的时候，对我的身体多么自信！看到伤口愈合很快，我对自己的血质优良多么自豪！雅克也一样。都是蒂博家的血！

我向巴尔多提出胸膜并发症的问题，“只欠给您做个化脓性感染试验了……”这个善良的大高个儿耸耸肩膀，仔细端详着我，说了一句：“没有什么可怕的。”

蒂博家的血。让-保罗的血！我往日的优质的血，我们的血，现在就在这孩子的血管里奔流！

在战争期间，我没有一天愿意去死。我没有一次，哪怕是十秒钟，拿自己的性命去作牺牲。同样，现在我拒绝牺牲自己。我也再不抱任何幻想，我不能不确认我在等待着无可救药的结局，但是我不能同意，也不能象同谋一样甘心情愿去死！

午后。

我完全知道哪里有理性，智慧，哪里有尊严：那就在于能够如实观察世界以及世界不停的变化，而不是由自我的角度，从即将到来的死亡出发。我觉得我只是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被浪掷虚抛的尘埃。唉！比起在我死后继续生活的一切，我又

算得了什么呢？

微不足道，是的，我却一直把它看得那么重！

不过，还要试一试。

不要因为个人而使自己盲目。

7月4日。

今天早上，接到珍妮一封很好的信，谈到她儿子一些很动人的琐事。我不禁把这些段落念给古瓦朗听，他也十分喜欢他的两个孩子。应该让珍妮给让—保罗照一张照片。

我也应该下决心给她写那封信。这信很难写。我等着哪天晚上真正休息好了之后再写。

怎样的奇迹！——真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正当丰塔南家和蒂博家这两个世系都要绝后，不留下一点有价值的东西时，这个孩子出生了！他从母亲一方继承了一些什么呢？我希望都是最好的因素。有一点我已经确信无疑，那就是他有我们家的血液。坚毅，刚强，智慧。雅克的儿子。一个蒂博家的人。

一整天都在想这件事。生命的活力意外地爆发出来，正好从我们的老根上抽出了这个新枝……如果说这正有某种意义，说明了造物的某个意图，这大概不是毫无根据的想法吧？这也许是家传的傲气。可是，为什么不可说这孩子是应运而生的呢？这个家族在黑暗中奋斗，终于造出了一个完美的蒂博类型的人。大自然有一天应该创造出的这个天才，而我的父亲、弟弟和我只不过是他的毛坯。这种暴烈的性格，这种力量，在他以前就已经表现在我们身上了，这一次，为什么不可以在他身上充分发展，成为真正的创造力量呢？

午夜。

失眠，又有一些威胁要驱除。

一个半月了，我知道我已经无救以后，现在又过了七个星期。“我知道我已经无救”，这几个字，这几个我写的字，跟别的字一样，大家都自以为很明白，其实，除了注定要死的人以外，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了解它的含义……疾雷闪电般的变化，刹那间将生命化为乌有。

然而，一生总与死亡打交道的医生本来应该……与死亡？那是别人的死亡！我曾多次试图探索生理上不能接受死亡的原因。（这也许是由于我生命力的特殊气质。我是今天晚上才想到这点的。）

往日的生命力，——我在工作中的主动精神，永远能再接再厉的精力，——我认为这多半是由于我需要通过自己的创造使我生命延续下去，继续生存下去。本能地恐惧灭亡。（当然，这是相当普遍的心理，只不过程度各有不同。）在我身上，这是遗传的特征。我仔细地考虑过我的父亲。他总是想使他的名字流传下去：在慈善事业上留下名字，道德奖上留下名字，在克鲁伊的大广场上也留下名字。他愿意看到他的名字刻在教养院的门楣上（奥斯卡·蒂博创建），他这个希望实现了。他还要把他的名字（在户籍上是他个人唯一的标志）留给他所有的后代。狂热地想到处都有他名字的缩写图案，在他的花园的栅栏门上，餐具上，书籍的精装封面上，甚至连安乐椅的皮面上都有！……比本能的占有欲还要顽强（我以前以为，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无论如何要留下他的痕迹，绝对不愿意销声匿迹。（死后的存在，彼世，实际上不能满足他。）我也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企望。我也一样，我也暗中希望把我的名字留在可以使我生命延续下去的事

业上，留在一项发现中，等等。

人总也不能摆脱父亲的影响！

七个星期，五十个白昼，五十个黑夜，面对着这个确定不移的事实！没有片刻犹豫，怀疑，幻想。不过，尽管如此，我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困扰不休的思想也有暂歇的时刻。只是短暂的间歇，而不是遗忘，但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固定的念头退后了……我偶然也能生活一会儿——两三分钟，最多十五分钟或二十分钟。这样的时刻越来越频繁。这样的时候，确信马上要死的想法不占台前位置，而退居到隐伏地位。这样的时候，我忽然可以行动，专心地读书，写点东西，听人讲话，与人争论，也能够对同我的病情无关的事感兴趣，仿佛我已经摆脱了疾病的控制。不过，那纠缠不休的思想仍旧存在，我仍旧能感觉到，只不过它退到第二位，保留在那儿。（我甚至在睡着了的时候都感觉得到。）

7月6日，早晨。

从星期四以来，好些了。只要痛苦减轻，我就觉得一切都美好。今天早晨的报纸上，有一篇报道，谈到意大利军在皮亚韦河三角洲获得了胜利，这使我尝到久已忘却的快乐滋味。这是好迹象。

昨天我什么也没有写。我在户外发现把笔记本忘在屋子里了，又懒得再上楼，于是，整个下午惘然若失。我现在对这种消遣发生了兴趣。

今天，写日记的时间也很少，因为观察到很多现象要记在黑皮记事本上。我发现自从买了日记本，对医疗记事本有些忽视了，只满足于作些简略的记录。不过，还是应该更注意医疗日

志,要把它放在第一位。可以分成两部分,在日记本上记“幽灵”,在医疗日志上记健康的情况,体温,治疗,疗效,副作用,中毒的进程,同巴尔多和马泽的讨论等等。我并不夸大这种笔记的价值,不过我觉得,一个中了毒气的人同时又是医生,从得病的第一天起就每天作精确的记录,从科学的现状来说,可以说是一份完整的临床观察记载,它的用处是无可置疑的。特别是如果我一直坚持到底,价值会更大。巴尔多答应我将来发表在《医学简报》上。

昨天,胖子德拉埃走了。他获准出院去疗养。他自己以为已经完全治好,也许是真的,谁说得准呢?他上楼来向我道别。装作他时间来不及了,很忙的样子,可是装得很笨。他没有对我说“以后再见”诸如此类的话。正在收拾房间的约瑟大概发现了,门刚一关,他就赶紧说:“您看,有人还是治好了,医官先生!”

我刚才正要写:“如果我现在还活着,就是因为有这本笔记。”我一定要把自杀问题想清楚。我承认,归根到底,这个笔记本从来都只是一个借口。人总是给自己演喜剧啊!真是怪事。我很不愿意承认我从来也没有当真想结束这一切。从来没有想,甚至在最无法忍受的时刻。如果我一定要采取行动的话,那就是在巴黎,那天早上我买注射针剂的时候……就在上火车以前,我就仔细想过……从那天早晨起,我开始了记笔记这出喜剧,仿佛我在消逝之前还有最后一个义务需要履行,仿佛我有一项重要的事业要完成,仿佛我对这临床笔记的重视足以抵销和驱除死亡的诱惑。缺乏勇气吗?不是,确实不是!如果这种诱惑是真的,阻止住我的并不是恐惧。不,我缺乏的并不是勇气,而是

愿望。实际上，诱惑在我脑中只是一闪而过，每次，我都毫不费劲地把它驱散了。（假装着有一种内心的力量，有个借口就更方便；还要坚持写医疗笔记……）

然而，除非是暴死——不幸，这不太可能——否则，我知道我不希望任其自然地死去。我知道这个，我觉得我说这话是真心实意的，完全清醒的。那个时刻一定会到来，我敢肯定。我只要等着它来就是了。药品已经在那儿，举手之劳。（尽管如此，这想法正在平静下来。）

晚上。

午饭以前，在走廊下面，古瓦朗给我们拿来一份瑞士报纸，上面全文登载了威尔逊的最新演说。他高声念起来，很感动，我们大家也很感动。威尔逊的每次演说，都在欧洲吹过一阵清新空气，好象矿坑崩塌之后，送入了氧气，让那些惨遭掩埋的人不至于窒息，一直支持到被解救出来。

7月7日，早晨5点。

固定的想法，就象一堵墙，我撞上去。我爬起来，再向前冲，又撞上了，又跌倒了，于是再重新开始。一堵墙。有的时候，尽管我连一秒钟也不相信，我还试图告诉自己，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我并不是必死无疑。只是为了找个借口，再来做合乎逻辑的推理，然而这总是不可避免地又使我向墙上撞去。

午后，在户外。

重读威尔逊的演说。比他以前历次讲话口气确定得多。说明了对和平的设想，列举了“最终”解决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方

案内容广泛，令人振奋：一，取消可能引起新的战争的社会政治制度；二，改变国界，分配领土之前，先征求有关人民的意见；三，经所有国家同意，制定国际法典，各国都受这法律制约；四，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执行仲裁法庭职权，文明世界的一切国家毫无区别，一律派代表参加。

（我写这个，把这些记录下来，真高兴得象孩子一样。我觉得应该进一步支持，应该协助。）

这是这里一切人谈话的主题，每个人的脸上都燃起了希望。想到此时此刻欧洲、美洲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高兴，真是震动人心！这个演说响遍了每个宿营地，每条战壕！所有的人，四年以来在自相残杀，早就厌倦了！（在领导人的命令下，好几个世纪以来，就在自相残杀了……）大家早就等待着恢复理智的号召。那些负责人士听得见这呼声吗？但愿这一次，种子能在各处发芽！目标这样明确，这样明智，这样符合人类的命运，符合人类最深刻的本能！要实现这个宗旨可能出现无数的问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但是，怎么能再怀疑明天的世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走上这条道路，而不是其他道路呢？四年的战争除了毁坏和废墟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结果。最狂热梦想征服别国的冒险家也应该不得不承认，对于整个人类，对于每个国家，战争已经成为一种灾难，不可能有任何报偿。那么，怎么办？战争的荒谬在一切领域内都由经验得到了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政治家的观察、经济家的计算，人民群众本能的反对都取得了一致的结论，既然如此，要建立持久和平难道还会有什么障碍吗？

午饭后，窒息又发作。打了针，躺在油橄榄树下的长椅上。太累了，不能给珍妮写那封信，然而我却迫不及待地想写出来。

古瓦朗、巴尔多和马泽当着我的面争论起来。威尔逊的主导思想就是建立国际间的仲裁体制。这样做，任何人都不会吃亏，对于每个国家来说，什么都能得到。甚至还有一点，人们还估计不足，这种最高法院的作用，照顾各国的自尊和民族敏感，以往就是从这里产生了多次的战争。一国的人民，一个政府，甚至一个君主，无论多么敏感易怒，如果由国际法庭以各国集体利益的名义进行判决，要它顺从，这比让它在邻国的威胁或敌对联盟的压力下让步，它会觉得自尊和威信受到的损害要小一些。古瓦朗说，这个国际法庭应该在战争状态结束之后，进行清算之前就建成，这样，可以使和平条款不是在怒气冲冲的战争对手之间争论，而是在一个属于全世界的国际联盟内部心平气和地讨论，由这个组织自上而下进行仲裁，分清每一方的责任，作出大公无私的裁决。

国际联盟。——要使今后不可能再有战争，这是唯一的办法，万无一失的办法，因为，一旦一个国家受到另一国的进攻或威胁，所有的国家都会自动地起来反对侵略者，缚住它的手脚，强迫他接受公正的裁决！

还应该看得更远。这个国际联盟应该倡导一种国际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到普遍的，有组织合作，最终推广到全球，这就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决定性的阶段。

古瓦朗在这个问题上说出了很多正确的观点。我回忆起我一直对古瓦朗过于严苛。这位从前的高师学生总是装出什么都懂的样子，叫我不高兴。还有他那口气也讨厌，仿佛在亨利四世学校^①的讲坛上讲历史……不过，很对，他的确懂得许多东西。

^① 巴黎先贤祠附近一座有名的中学。

他密切注视时局的发展，每天都阅读九、十来份报纸，每星期收到一包报纸和瑞士杂志。总而言之，他的思想稳健。（我对思想稳健的人总是有些偏爱的。）象他那样，力求拉开一些距离，以历史家的眼光来评论当代事件，我很欣赏。瓦斯纳也来了。（巴尔多说：“在医院里，只有古瓦朗和瓦斯纳两个人的声带没有受什么损伤，他们就充分利用这一点！”）

一天都过得不错。我以为，既是因为打了针，也是因为威尔逊！

我还要补充一点：建立起一个国际联盟，就可以使某种全新的东西从这次战争的废墟中出现；出现一种世界意识，这样，人类就向公正和自由决定性地跃进了一步。

晚上 11 点。

翻阅报纸，废话连篇，平庸可厌。好象只有威尔逊是今天的唯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是民主的典范，民主的最崇高意义上的典范。比起他来，我们法国（还有英国）那些煽动家显得象是一些渺小的唯利是图的商人。所有的人或多或少都是帝国主义的传统的工具，他们却假惺惺地谴责对方的帝国主义的传统。

我对瓦斯纳和古瓦朗谈到美国和民主的问题。瓦斯纳曾在纽约生活过几年。美国稳定，安全。古瓦朗以预言家的激情兴奋地说二十一世纪欧洲将被黄种人侵入，白种人的前途只能局限于唯一的美洲大陆……

早晨两点。

失眠。稍稍打了个盹，梦见了斯图德勒。在巴黎，最里面的那间实验室。哈里发穿着工作服，头上戴着军帽，胡子剪得很短。我刚刚向他解释一件什么事，口气很激烈，大概说的是威尔逊和国际联盟……他扭过头来，用湿润的眼睛看看我，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马上就要咽气了。”

我还在想威尔逊。（但愿哈里发不要不高兴。）我觉得威尔逊是命中注定担任他现在这个角色的。要使这次战争的结束也是许多战争的结束，就必须由一个新人来缔造和平。必须是个局外人，能够不带怨恨的情绪，没有卷入这四年的动乱之中，不象欧洲那些领导人，只热中于压倒对手。威尔逊是大洋彼岸的人，代表着在和平与自由之中团结的那个国家，他有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作为后盾！每个明智的美国人显然在想：“既然我们能在我们的各个州之间建立一个巩固的、建设性的和平，并且保持了一世纪之久，欧洲合众国为什么不可能建立呢？”威尔逊延续了华盛顿等人的系统。（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演说中也隐约提到过。）这位华盛顿憎恨战争，然而，为了使他的国家摆脱战争，他也进行战争。据古瓦朗说，这位华盛顿内心中还有个想法，他想同时也使全世界获得自由。如果他真能够把彼此敌对的各个小国家组成一个广大的和平联邦，这个榜样对于旧大陆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旧大陆用一百多年的时间才会理解。）

我在写，时针在表盘上转动……威尔逊帮我吓走了“幽灵”！甚至对于一个“缓期的死囚”来说，这些也都是激动人心的问题。这是我从巴黎回来之后，头一次对前途发生了兴趣。世界的前途，一旦这次战争结束，就要开始了。如果即将实现的和平没有改造，重建，统一这毫无生气的欧洲，那么，一切都将白

费，而且，和平又能维持多久？对！如果国际政治仍以军事力量为主要工具；如果每个国家在边界线后面仍旧各行其是，肆意扩张；如果欧洲各国联邦不能通过自由贸易、取消关税壁垒等等，缔造一个和平的经济制度，象威尔逊所希望的那样；如果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时代还不能最终结束；如果各国人民不强迫政府终于一致服从权力为基础的世界秩序；那么，一切还会重演，流过的血就都白流了。

不过，还是大有希望！

（我这样写，仿佛我也“大有希望”……）

7月8日。

三十七岁。最后一个生日！……

我正等着正午的钟声。洗衣妇带着她的女儿从阳台下面走过，肩上扛着衣服包。那一天，我看着这个少妇，只见她步履沉重，腰部微微鼓出，髋部有些僵直，我颇为激动。是怀孕了。还不太显著。有三个半月，顶多四个月。令人心碎的激动，又恐怖，又怜悯，又羡慕，又伤心！对于一个再也没有前途的人，这种神秘的将来就摆在那里，仿佛触摸得到！这个胚胎，离生命还很远，整个未知的一生将摆在他的面前！而他的诞生是我的死亡阻挡不住的……

户外。

人人都想着威尔逊。桥牌也不打了。甚至军士的那个俱乐部也一样，他们争论了两个钟头，牌连动都没有动。

报纸上也是如此，登满了评论。巴尔多今天早上说，新闻检查机构听任读者在这和平的幻景面前去驰骋想象，这是饶有深

意的。《洛桑日报》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回忆起一月十七日威尔逊的咨文：《没有胜利的和平》以及《逐步限制各国军备，最后达到普遍裁军》。（一月十七日，我回忆起304号高地后面那变成了一片瓦砾的村庄，地窖里的军官食堂，跟帕杨和可怜的赛菲尔谈论裁军问题。）

被马泽打断了，他要给我验血。氯化物减少了，特别是磷酸酯减少得更多。

要有暴风雨，闷人。我勉强走到水车旁边，想听听水声。我越来越不能连续地读书看报，不能集中注意去了解别人的思想。对于我自己的思想，还可以。在这本子上写一写，是我的一种休息。这不会持续很久了，我要抓紧利用时间。

威尔逊一月十七日的演说的主旨是“裁军”。吃午饭时，人们纷纷谈论。大家都同意，只有雷蒙例外。今天大家常讲的事，两年以前说都不敢说，想也不敢想，那就是军队是耗尽整个民族元气的溃疡。（多么触目惊心的景象：“为人民服务”^①，每个受雇于炮弹工厂的工人都不再从事有益的生产，从而变成了一个靠集体养活的寄生虫。）一个国家，如果有三分之一的预算被军费吞掉，就不能再生存；或者是破产，或者是战争。目前这场大灾难就是四十年来有步骤地扩张军备的必然结果。没有普遍裁军，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这个真理已经说了一百次，但没有用，大家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在武装的和平的时期，各国政府都相信武力胜过权力，已经在你争我夺，竞相扩军，要使这些人互相了解，调转航向，放弃他们疯狂的策略意图，那真是妄想。但

① 原文为拉丁文 *ad usum populi*。

是，到了明天，到了和平时期，一切都会有变化，因为欧洲所有的国家都一无所有了，都要从零开始。战争将财富一扫而光，各国元气耗尽，倾家荡产，只好从新的基础开始。一个千载难逢的，史无前例的时刻即将来临，那时，普遍裁军就有可能了。威尔逊懂得这一点，他重新提出而又大力宣传的裁军主张不可能不受到全世界公众舆论热烈欢迎。这四年准备了道路，加强了各国人民对战争的出自本能的抵制，使大家强烈希望看到建立起国际间的道德规范以最终取代军事争夺，并且来解决各国人民之间的争端。

现在，绝大多数要求和平的人应该强迫极少数积极策划战争的人接受一个强大的、能够防止战争的组织。一个国际联盟，在必要时，可以使用国际警察，可以使用仲裁权力，就能够永远禁止使用武力。让各国政府把这个问题交付全民表决，表决的结果当然不会有疑问！

今天早晨，在饭桌上，自然只有雷蒙少校愤愤不平，把威尔逊称作：“鬼迷心窍的道学先生”，对“欧洲的现实”一无所知。完全是吕梅尔在马克西姆酒家的那种腔调。古瓦朗反驳得好：“如果即将实现的和平不是依据谋求公理的共同愿望而求得和解，以建立一个巩固的欧洲，那么，千百万可怜的人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得来的和平就只不过是增添了一份条约，是一种假和平。一旦战败国有机会报仇，就必定会把它一扫而光！”雷蒙又说：“大家都知道各种神圣同盟有什么价值，维持了多久！”这时，我插了一句，却招来一句俏皮话：“自然了，蒂博，您是太现实了，对于乌托邦的引诱也不能无动于衷。”（仔细想来，这话也许不傻，不象表面上那么荒谬。不过，是真是假还要经过考验。）

雨点开始滴落，但愿暴雨能使晚上凉快些。

7月9日，黎明。

夜里过得很不好。窒息。总共睡了不到两个钟头，中间醒来不知多少次！

想念拉歇尔。就是这样闷热的夜里，项链的香气更是浓烈袭人。她死得愚蠢，在医院的病床上。孤独一人。不过，人死的时候，总是孤独的。

忽然想起，就在今天早上，也象每天早上一样，也在这个时候，某些战壕里还有数十万可怜的人，正等待着进攻的信号。我不怕羞耻地尽力想在这里找点慰藉，但是没有找到。我更羡慕他们身体健康，能够去碰运气，所以也就不再怜惜他们还得跨过胸墙了……

我尝试着阅读吉卜林^①的作品，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词：青春的。我想起雅克……青春的……这个形容词对他合适极了！他始终是个少年。（请看字典上“少年”一词的特点。这些特点他都有：狂热，极端，羞涩，勇敢，腼腆，对于抽象的概念感兴趣，厌恶模棱两可，并且，由于对怀疑主义无能为力而有一种魅力……）

如果他活到成年，除了是个老少年之外，还能成为什么样子呢？

重读昨夜的笔记。雷蒙说：“乌托邦……”不。我对于虚幻的吸引力从来不相信，甚至极端不相信。不知是谁说过这样一句格言，我一直记得：“最错误的思想就是：愿意事物是什么样，就以为事物真的是什么样。”真的，我并不这样。威尔逊说：“我

^① 吉卜林(1865—1936)，英国诗人，小说家。

们所要求的，是使世界纯洁，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对此仍有怀疑：我对于人类可以臻于完美并没有那么多的幻想，所以并不希望靠着人类的安排世界会变得“纯洁”。但是，威尔逊又说：“对于各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来说，让世界变得安全可靠！”这时，我就愿意跟他走了。这里并没有什么虚幻的成分。社会已经迫使个人与个人之间不要自行报复，要把争端提交法院解决！那么，民族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为什么不能阻止各国政府驱使人民去自相残杀呢？战争，难道就象瘟疫一样，也是自然法则？人类整个的历史就是向破坏力进行胜利斗争的历史。欧洲各个主要国家已经逐渐学会缔造本民族的团结一致，为什么不把它扩大，实现整个欧洲大陆的团结一致呢？那将是新的时期，社会本能的新飞跃。“那么，爱国感情呢？”那位少校会问。促成战争的并不是爱国感情，这种自然本能，而是民族主义感情，这是一种后天的、人为的感情。对于土地、方言、传统的眷恋完全不能导致对邻人的强烈敌意：庇卡底或普罗旺斯，布列塔尼或萨瓦。在结成邦联的欧洲，爱国本能只能成为各地区的特性。

“幻想！”显然，他们都企图这样攻击威尔逊的理想。舆论界，甚至最倾向于美国方案的人都把他叫做“大幻想家”，“未来世界的预言家”，等等，真是使人恼火。完全不是这样！相反，深深打动我的是他的良知。他的思想很淳朴，既新颖而又古老，是历史上一切尝试和经验的必然结论。欧洲明天将走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或者是改组为联邦，或者是回到战争连续不断的制度，耗尽每个国家的财力。万一欧洲拒绝威尔逊所建议的依循理性的和平——只有这种和平才是唯一真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也就是彻底裁军的和平——欧洲很快就会发现（也许要花费多么大的代价？）自己又陷入了死胡同，必定还要互相屠杀。幸

好，这大概不会成为事实。

晚上。

难受的一天。又陷入绝望。只觉得落入了张大着口的陷阱……我本来很有能力，可以达到师友们所期望的“美好前程”。（难道是自傲吗？）突然，在战壕的拐角处，一阵毒气袭来……这个陷阱，命运张开的这个罗网！……

三点钟。——气喘得睡不着，只能坐着，靠着三个枕头才能呼吸。我点亮灯吸滴剂。我写下下面的话：

我以前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致（浪漫气味的词）坚持写日记。我觉得很遗憾。如果今天我能有以往的日记，拿在手里，白纸黑字，从十五岁起整个的过去都有，我就会更深切地感到我曾经生活过，我这一生就会具有体积、重量、轮廓，具有历史性的质量，就不会转瞬即逝，没有形体，象一个被遗忘的梦，再也抓不住什么的梦。（就会象病情的发展，纪录在、固定在体温纪录表上一样。）

我开始写这日记的时候，是为了驱除“幽灵”。我相信这一点。其实，还有很多模模糊糊的原因：消磨时间，自我安慰，同时也要从这个生命，这个即将消逝而我一向感到自豪的生命中抢救下来一点什么。抢救？为了谁呢？为了什么呢？真荒谬！既然我知道，将来我不会有时间，不会在事后再来看我自己写的东西。那么，到底是为了谁呢？为了那个孩子！对！就在刚才失眠的时候我明白了这一点。

这孩子美丽，健壮，他在茁壮成长。一切前途，我的前途，世界的前途，都在他身上！我见到他以后，我一直想他，可是他不

会想到我。一想到此，我就烦恼不堪。他将来是不会认识我的，对我会一无所知，我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不过几张相片，一点钱，一个名字：“安托万伯伯”，其余什么都没有。一想到这个，有时候，真难以忍受。如果在这缓刑的几个里，我有耐心逐日在本子上写点什么……也许，将来，小让—保罗，你能有好奇心，在这里面找寻我的足迹，一点痕迹，我最后的痕迹，一个即将弃世的人的足迹。那么，“安托万伯伯”对于你来说，就不仅仅是个名字，不仅是照片簿上的一张相片。我知道，从前的我和这个为病痛所吞噬的人之间，几乎完全不相同……然而，这总会有点用处，聊胜于无！我紧紧地抱着这个希望。

太疲劳了。发烧。值班的护士看见了我屋里的灯光。我让他再给我一个枕头。滴剂一点也不起作用。得请巴尔多给我点别的。

深夜，窗外透入蓝盈盈的光辉。是还有月亮，还是天已经亮了？……（有多少次，打了一个盹，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我打开灯看几点钟，总是泄气地在那嘲弄我的钟面上读到：十一点十分……一点二十……）

四点三十五。现在不是月亮了。是黎明前的微光。终于熬到了！

7月11日。

在这张床上，熬着说不清的痛苦，一天一天，又辛酸，又安静得惹人生气……

午饭吃完了。（在病人的小桌子上，一顿又一顿吃不完的饭，等待得让人心焦，仅有的一点胃口也消失了！……每隔十分

钟约瑟才在托盘里，用茶碟盛着端来一份饭……）从正午到三点，是安静的空闲时间，这时，好象白天向夜晚借来了寂静。间或听到邻居的咳嗽，我不用想，就知道是谁，好象是听到熟人说话的声音。

从三点开始，试体温，约瑟来，走廊里有脚步声，人在花园里喊叫，生活又开始了……

7月12日。

这两天过得悲惨。昨天，做了透视，支气管淋巴结更肿大了。我感觉得很清楚。

库尔曼在德国国会发表了那样温和的演说，不得不辞职。这表明德国方面思想状况仍很恶劣。另一方面，意大利军队在皮阿维河三角洲上的进展已经得到证实。

晚上。

虽然这一天并不象我担心的那么难受，但我一直躺在床上。接待了几个来看我的人，达罗，古瓦朗。早上，巴尔多把塞格尔请来，当他的面作了长时间的诊断。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令人不安的现象；没有严重恶化。我周围的人都乐意满怀希望。我再三叮咛自己，不要把他们的愿望当做现实，但是没有用，我自己仿佛也受到这一阵信心的浪潮的感染。显然，我们收复了失地：维莱科特雷，龙邦……第四军……（如果老实的泰里韦还在那儿的话，他大概有的忙了！）显然，奥地利打了败仗，败得很惨。还有，在东方，日本开辟了新战线。不过，消息经常灵通的古瓦朗却说，自从巴黎遭受轰炸以后，甚至在前方，士气也大受挫伤，兵士们不希望妻子儿女也象他们一样，受到威胁。古瓦朗收到了很

多信。人们已经支持不住了，不愿意再打下去。让战争停止吧！无论什么代价都行！……也许，由于美国人出力，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我看还有一个好处：如果我们的政府让美国人结束战争，那就不得不也让美国人缔造和平——美国式的和平，威尔逊式的和平，而不是我们的将军们所主张的和平。

如果明天继续好转，就给珍妮写信。

7月16日。

这几天很痛苦，没有力气，做什么都没有兴致。日记本就在手边，但一点也不想翻开它。每天晚上勉强鼓起勇气，在记事本上写健康小结。

从早上起，好象有好转。窒息的间隔长了，发作的时间短了，咳嗽也减轻，可以忍受了。莫非是因为从星期日起又用了砷化物的结果？复发又一次被控制住了？

可怜的谢莫里，比我更值得同情！已经出现败血症的现象，坏疽性支气管肺炎的病灶已经扩散。完了。

迪普莱，右腿化脓性静脉炎！……还有贝尔和戈温！

有些东西，在人心的隐蔽之处沉睡着！（例如，战争使我发现自己身上有不为人知的胚芽……甚至可能有仇恨、狂暴以至残忍……看不起弱者，还有恐惧，等等。是的，战争使我发现自己最卑劣的本能，人类中的最低层。我现在才可以了解人的一切弱点和罪恶，因为，在我自己身上发现了它们的萌芽，一闪之念。）

7月17日，晚上。

显然好得多，但能持续到几时呢？

我利用这段时间写了那封信。是今天下午写的，打了好几份草稿。很难找到恰如其分的调子。我本来想，先设法接近，准备些条件，但后来又决定只写一封信，写得长些，和盘托出。美好的希望。按照我自信对她的了解，最好是对她直截了当，谈入本题。我尽量把事情说成纯粹形式的问题，为孩子前途着想是必不可少的。

今天晚上邮差取信的班次已过，一直到明天早上我都可以把这封信再看一看，决定是不是寄出。

德国人在香槟地区展开进攻，大概在激烈争夺罗希。这不是在执行他们那有名的计划：打到马恩河，再向圣米耶尔推进，包围凡尔登，然后转向西方，向塞纳-马恩省前进。他们已经进逼到马恩河南北两岸了。多尔曼受到了威胁。（我仿佛又看到那城市，桥梁，教堂广场，大门对面的战地医院……）离战争结束的时候还遥遥无期！连一点初步迹象都看不到。往好的方面估计：1919年，美国人开始活动的一年，见习的一年；1920年，进行激烈的、决定性的战斗的一年；1921年，中欧国家投降、实现威尔逊的和平，军队复员的一年……

最后一次重读了我的信。口气我很满意，不可能有什么模棱两可的意思。论点有最充分的说服力。她不可能不明白，不可能不接受。

18日，早晨。

刚才看到塞格尔穿着衬裤，跟梯也尔先生没有丝毫共同之处！

下午，在花园里。

补记今天上午的事。

为了让总务的车捎上我这封信寄出，我今天起床比平常早。放下窗帘的时候，在二号楼的一扇半开的窗子里忽然瞥见了塞格尔，教授先生塞格尔。他正在漱洗，上身光着，衬裤贴在身上，（屁股又瘦又小，象一匹老单峰骆驼！）潮湿的平直的头发贴在头顶上……他正忙着刷牙。我已经习惯把他看作梯也尔先生，他在我面前总是这样，庄重严肃，拘泥虚礼，衣服裹紧腰身，顶发随风飘荡，下巴翘起，小小的身材尽量挺得笔直。所以最初我没有认出他来。我看他吐出一口带沫子的水，接着弯腰照镜子，把手伸到嘴里摘下满口假牙，担心似地端详一下，又象动物那样好奇地闻一闻。这时候，我连忙退到房子中间来，觉得很窘，又不知为什么很激动，突然对这个自命不凡的专横的人物——怎么说呢？产生了兄弟般的同情……

我不是第一次撞见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对塞格尔，也是对别人。我在这里已经有好几个月，跟医生、护士、病人混在一起。他们每个人的身影，他们的动作，他们的癖好，我全熟悉极了。我从远处就分得清是谁从安乐椅的靠背上伸出脖子，是谁从窗子里伸出手倒烟灰缸，在菜园的墙后是哪两个人在讲话，决无差错。但是，我的这种伙伴的情谊从来没有越过世俗的界限。即使在我和他们都心里没有拘束，乐于交际的时候，我也感到跟大家隔着一堵严严实实的墙，我是一群陌生人中间的一个陌生人。现在，这种孤独的感觉突然会消溶，变成了兄弟情谊，

甚至柔情，尽管我只是偶然撞见在寂寞深处中的他们里的一个，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多少次，我看见同楼的邻居做一个什么随便的动作（有时候是镜子里偶然照见的，有时候是因为门开了一条缝），而只有他确信没有人看见他，才会那么随便，例如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相片，偷偷地看一会儿，或者上床之前划个十字，或者，更少见的是想到了什么，精神恍惚地微笑起来。我只要一看见这些，就立刻发现他是我的邻人，是同类，是跟我一样的人，顷刻间，我就渴望着跟他做朋友！

然而，我没有跟别人“做朋友”的脾性，我没有朋友。从来没有过。（所以我那么羡慕雅克，他有好朋友。）

又有了写日记的乐趣。这几天我的确是好多了。

晚上。

今天早晨在饭桌上，大家都讲战争的回忆。（和平以后，战争故事就要取代打猎故事了。）达罗讲战争一开始在阿尔萨斯巡逻的事。一天晚上，他和几个人穿过一个撤空了的村庄，月亮底下，村子里静悄悄的。三个德国步兵躺在人行道上，枪放在身旁，睡着了，还打着鼾。他说：“从这么近的地方看来，他们不是德国鬼子，只不过是几个累坏了的家伙。我犹豫了一下，决定继续走路，好象没有看见他们。我身后的八个人也是这样。我们走过那睡觉的人十米远，一直没有回头。以后，我们都没有再提那天晚上好象串通一气干的事。”

7月20日。

昨天有个“委员会”来视察医院。来的都是区里的大人物。

从昨晚起，塞格尔、巴尔多和马泽就忙成一团，使人想起阴森森的兵营。在后方，并没有因为战争而有丝毫的改变。

“纪律”，“军队”，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然！……我想起布伦，还有另外几个军医。比起预备役医官，他们的医道并不高明，这大部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多年以来严格遵守等级制度，养成了服从的习惯，把诊断的自由和责任感限制在军阶的高低上。

军纪。我想起贡比涅兵站诊疗所的士官，那个凶恶的包利。他的长相象个开妓院的，眼睛总是充血。也许并不是个坏人。他每天晚上到水边捡大麻籽喂他的棕鸟……他是属于战前时期两次入伍的可憎可恶的兵油子一类。（为什么两次入伍呢？大概是因为，他发现只有当兵这个职业才能让他用恐怖手段来统治他的同类。）医官派他登记来看病的年轻士兵。从我的办公室，我就能听到病号敲他的房门。他总是这样大声问道：“嗯？妈的，你是真的还是他妈的装的？”我能想象那些新兵吓坏了的模样。“好啦，你要是他妈的装的，你就滚蛋！”新兵转身就走，什么也不问了！医官说包利是个很好的军士，“有了他，再也不会再有装病的啦。”

父亲常说：“军队是民族的大学校。”他曾经怂恿克鲁伊教养院的孩子到征兵站去报名。

21日，星期日。

这星期验血表明，尽管作了许多努力，脱磷和无机盐排出过多的情况还是在有规律地发展。

读到战报，消息很好，正向乌罗克南面挺进，向夏托蒂埃里挺进。正从埃纳河向马恩河运动。据说，福熙早就等待时机，要由防御转为进攻。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吗？

少校每天都忙着在地图上移动小旗。关于马尔维的“叛国罪”和特别最高法庭，大家满怀敌意地争论不休。一旦战况好转，政治就又占上风了。

22日，晚上。

凯拉泽的内弟今天来看他，这位客人是涅夫勒省的众议员，跟我们一起吃了午饭。我想大概是个激进社会党员。这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所有的政党都采取了战时与政府一致的态度，并且反复说着同样的陈词滥调。他的谈话平庸得令人生厌。不过，谈到了这件事：去年春天，奥地利政府通过波旁家族的西克斯特^①向法国政府转达和平建议。法国拒绝了。古瓦朗很生气。据说，最不肯让步的是老里博^②，他甚至使普恩加来和劳合·乔治都听了他的话。法国政界人士传言，拒绝的一个论据是共和国决不能审议由波旁家族一个成员传达的和平建议，拥护君主政体的宣传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这样对共和政体的前途有危险，特别在目前，将军们大权在握的时候……

真是不可思议！

7月23日。

昨天那个众议员，是现代狂热病的一个出色的典型。他从巴黎坐夜间的特快列车赶来，为的是节省十二小时。总不停地看表，眼睛烧得通红，有点醉醺醺似的，手碰着水瓶子都发抖。他的思想断断续续的，连不起来。

① 西克斯特，奥地利的亲王，奥王查理第一的亲戚，当时在比利时军队中当军官。

② 里博(1842—1929)，曾任法国财政部长、外交部长等职。

这种人把东跑西走当作活动，把支离破碎的活动当作工作，把语气傲慢当作合理推论，把武断专横的口吻当作权威和能力的表现。在谈话中，透露点内幕琐事，以为就是概括的见解。在政治上，决不宽宏大度，认为这样才是明智的现实主义。把体魄强壮当作勇敢过人，把大饱口福当作生活哲学。如此等等。

也许，他把我的沉默当作欣然同意？……

7月23日，晚上。

邮班到了。珍妮的回信。

我现在后悔没有先向她母亲说明，我当初是曾经想过的。珍妮拒绝了。信写得很有分寸，但态度坚决。她很尊严地要承担她行为的全部责任。她是自由抉择而委身的。雅克的孩子不应该有另外的父亲，即使只是法律意义上的父亲。雅克的女人不应该再嫁。她丝毫不必顾虑儿子将来怎样看待这件事，等等。

显然，我从现实出发的种种考虑没有打动她，她认为完全不必考虑，甚至没有价值。她并没有明说，但是重复了很多次“社会的习俗”，“过去的偏见”之类，口气显然非常蔑视。

自然，我还不放弃，更要继续进攻。既然“社会的习俗”毫无价值，那么为什么要反对它呢？这不是恰恰给了它本来没有的重要意义吗？我要特别坚持这一点：这事不只关系到她，更重要的是关系到让—保罗。那些仍然坚持认为私生孩子是不正当的人，已经没人相信，我同意这种看法荒谬。不过，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让她懂得这一点，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我的姓氏，让我认下这个孩子。我们的情况特殊：我马上就会死，这就把一切简单化了。

我要尽量今天就给她回信。

我也不该没有把事情怎么办向她详细说明。她大概以为非常麻烦。我得把所有的话都说得一清二楚，我要这样对她说：“您随便哪天晚上坐特快来，我在格拉斯接您。市政府的事我预先准备好，您到这里的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再乘车回巴黎，带着一份符合规定的身份证！”

24 日。

对昨天写的信很满意，幸亏没有拖到今天。今天情况不好，用了新方法治疗，很累。

我以为只要办一个民政手续，就可以确定不移地使小家伙不致遭到等待着他的种种麻烦，这种想法太糊涂。不过，说服珍妮还是可能的。

7 月 25 日。

看报纸。我军收复夏托蒂埃里。德国人是吃了败仗还是战略撤退？瑞士的新闻界认为福熙的反攻还没有开始。当前的目标只是阻止住德国人撤退。英国在前线按兵不动，使这个假设显得真实可信。

窒息又发作，更加频繁，真是恼人。体温升降不定。精神不好。

星期六，27 日。

夜里情况不好。信里带来了坏消息，珍妮仍旧固执己见。

下午。

打了针，缓解了两个小时。

珍妮的信。她不愿意了解，还在固执。在女人家的眼光看来，签个字这样的小事就成了背弃这样的大事了。（“如果我能征求雅克的意见，他一定会劝我不要向卑劣的偏见让步……我认为是背叛他，如果我……”等等。）

真气人。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争论上。她越是迟迟不肯同意，我就越是不能进行安排。（收集证件，安排在这里举行婚礼，公布结婚启事，等等。）

没有勇气，今天不能给她写信。我有决心从感情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要说明，如果我确信能够不让那孩子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我精神上就觉得得到安慰了。我甚至要渲染一下我是多么担心。我要恳求珍妮不要拒绝给我最后这一点愉快。等等。

28 日。

信写好，并发出。相当费力气。

7 月 29 日。

看报。全线进攻：从埃纳河直到韦勒河。马恩河已全无敌踪。弗雷斯纳，拉费尔森林，维尔纳夫和龙歇尔，罗米尼，还有维尔塔尔德诺瓦……

这些小地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在花园里。

我眼前看到的，在我周围，有很多花园，也象我们的花园一样，有修成球形的桔树，柠檬树，灰色的油橄榄树，树皮剥落的桉树，羽毛似的怪柳，还有那种大黄属的阔叶植物，从花盆上垂下来的一簇簇的玫瑰和天竺葵。五颜六色，发出彩虹的各种色调。

人们所看到的每一栋住宅，透过柏树的树篱，在太阳底下发出光辉，但是颜色各有不同：有白的，玫瑰红的，淡紫的，桔黄的。朱红色的瓦衬着蓝天。木头走廊聚成棕色，紫红色，暗绿色。右边最近的一栋，是赭石色的房子，窗板漆成青莲色；另外一座白得耀眼，百叶窗是鲜绿色的，紫色的浓荫遮着宽大的墙。

有这样一所房子，在里面安排幸福，在里面生活一辈子，该多么好啊……

黑黝黝的一排柏树中间，太阳照着电线杆上的磁瓶，在太阳底下发出反光，几乎使人难以忍受。

30日，晚上。

今天下了楼。两天不能下楼了。

我不知所措，目瞪口呆。我看着生活，看着别的人，仿佛自从我被排斥在未来以外之后，世界变得使人惊异，不可理解了。

前进好象已经停止。

而俄国(列宁的)向协约国宣战^①。

晚上。

回忆起，父亲死后，我把他的信纸拿到我的房里。三个月之后，我给教授写一封信，我翻着信纸，里面还有父亲一封信的开头：“星期一，亲爱的先生，我今天早上才收到……”突然看到这些字，好象用手触摸到死亡一样。他那细小工整的字体，这仍然活着的几个字，这永远中止了的努力！

① 这里指的是英法日美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苏俄奋起抵抗。

八月

1918年8月1日。

继续在向塔尔德诺瓦进攻。能坚持到胜利吗？要花费多么大的代价！在苏瓦松和兰斯之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巴尔多收到一封从索姆省来的信，说是英法联军在亚眠东面也组织了一次进攻。（亚眠，1914年的8月……到处是一片混乱！我利用这个时候，通过小吕奥从医院的药房为我们的急救站搞到了一批吗啡和可卡因！半个月之后，马恩河战役中，我就都用上了！）

众议院通过征召二〇年适龄入伍青年。该轮到路路了。可怜的孩子，他还舍不得离开丰塔南的医院哩。

8月2日。

克服珍妮的固执是毫无希望了。这一次，她拒绝得很干脆。信很短，充满感情，决心却不可动摇。算了吧。（一点点失败我都无法接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死了心。）她现在把这种拒绝当作原则问题，——而且，出乎意料！——竟是革命的原则问题……她毫无顾忌地索性写明：“让一保罗是个私生子，就让他当私生子吧。这种不合法的身分如果能早一些使雅克的孩子去反对社会的话，那就太好了。他的父亲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这样开始生活的！”（的确可能……也好！但愿雅克身上所有的叛逆精神在他死后获得胜利！）

3日，深夜。

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写，比白天更清醒，也不受别人打搅。

珍妮，实际上一直谨慎持重。我得承认，她这几封信是一个

整体，完全具有一贯性。不缺少崇高的力量，不由得使人尊重。

给让—保罗：

我的孩子，如果有一天你有兴趣读一读安托万伯伯写的信，你会钦佩你母亲的这几封信的。我知道，对于这场争论，你会毫无疑问地赞成你母亲。对，勇气和慷慨都在她那方面，不在我这方面。我只请求你了解我，请求你看到，在我的坚决的态度中，除了对资产阶级偏见抱着机会主义的、落后的顺从态度之外，还有另外的成分。你这一代人，恐怕在各个领域中都要遇到巨大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也许还是长期无法克服的。比起你们的困难，你的父亲和我所遇到的简直就不算什么。我的孩子，一想到这点，我就很难过。我那时已不在人世，不能帮助你进行斗争。所以，想到我无论如何还是为你作了一点事情，这对我将是一种安慰。如果我能给你一个合法的身份，把我的姓氏，也就是你父亲的姓氏留给你，我至少就清除了在你的人生道路上等待着你的一个障碍，这是我唯一能作的事；而这一点，我愿意相信，在你妈妈面前，我有点夸大了它的重要性。

8月4日。

看报纸。苏瓦松已收复。这地方是三月底被他们占领的。我们现在转向埃纳河和韦勒河，进逼到菲什姆。（菲什姆，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我在那里遇见了索代尔的哥哥，当时，他开赴前线，一去就没有回来。）

朗斯唐^①老头儿的讲话很明智。人们能听吗？从事情的目

^① 朗斯唐(1845—1927)，英国政界人士。

前发展来看，冬天以前也许能试探谈判。古瓦朗也这样看。但是，只要克列孟梭还没有打出美国人这最后一张牌，他就会一直装聋作哑。

俄国人那边大概也发生了一些事。协约国军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登陆，日本在海参崴登陆。但是，能够传出来的消息很少。俄国的混乱情况怎么能了解呢？

晚上。

塞格尔从马赛回来。参谋部的人传说，协约国军队反攻的第一阶段从十八日开始，现在正结束中。据说，目标可能已达到：从瓦兹省到默兹省的战线拉成了一条直线，消除了可以遭到突然袭击的突出部分。整个冬天都稳定在这条新的战线上吗？

8月5日。

是否应该为马泽的新镇痛剂的疗效向他祝贺呢？对于失眠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脉搏有规律了，神经官能症减轻，也不那么敏感了。头脑十倍清醒，精神十倍活跃。（好象如此。）总之，跟某些晚上相比，失眠的晚上倒几乎可以说可爱了。

这对写日记很有利！

约瑟去休假，吕多维克老头代替他。这老听差罗嗦得我头痛。他早上来收拾房间，我就逃出去。今天早上作灸疗，起床晚了些，只好听他摆布。说话已经让人心烦，再加上打呃，叫喊，等等，更是讨厌。因为他忽然想起要给他的地板打蜡。他撑着两把刷子，象跳快步舞似的，一面自己叨念着。

他对我说到他在萨瓦过的童年时代，总说：“那是个好时光，

医官先生！”（对，老吕多维克，现在，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每次都回忆起某一个过去的片段，哪怕那是生活艰难的一段，我也这样想：“那是个好时光！”）

就象克洛蒂尔德一样，他的语言很有趣，不过，却是另一种表达方式，土话少一些。他特别说到他的父亲是个“缝纫工”，也就是说，在成衣车间把裁剪工裁的一块块衣料拼凑起来的工人。“拼凑”，这个词儿真妙……该有多少人……（雅克）需要把他们学到的东西由一个“拼凑工”装配起来啊！

珍妮在最近一封信中谈到雅克，谈到他的“学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不精确的词了。我要极力避免在这个问题上跟她争论。她把雅克在她面前说过而她又多多少少记得的那些几乎是支离破碎的思想当作学说，我觉得这对于孩子的教育是相当危险的！

让—保罗，假如你有一天能看到我这里写的，你不要仓促下结论，说安托万伯伯认为你父亲的思想缺乏条理。我只是说，你父亲就象所有容易冲动的人一样，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对于大多数问题都有各种各样、时常彼此矛盾的看法，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于是，从那些具有明确方向的指导方针中，他就不能至少得出一个精确具体，牢固而又持久的肯定结论。他的性格也一样，是由一些杂乱的、对立的，而且彼此同样强硬的因素构成的，这成了他的可贵之处，然而，他很难对这些因素作出抉择，永远不能把它们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正因为这样，他一生中永远动荡不定，狂热而焦躁不安。

另一方面，也许，我们大家在不同程度上都跟他相似。我们，我指的是那些从来没有接受一种现成思想系统的人，这样的人没有在自己的发展过程的某一时刻接受一种确定的哲学，一

种宗教，一种稳固的、一经形成就永不受攻击、无可争论的纲领。我们注定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修正自己的立足点，不断地给自己又找到新的平衡。

8月6日，晚7时。

老吕多维克就用他给49号送进而又抽出体温计的那只大粗手，给55号和57号洗刷痰盂，又伸手到糖罐里去拿糖，给我的椶花茶加糖。我说一声：“谢谢，吕多维克……”

这一天马马虎虎。可是我已经没有权利挑剔了。

晚上打针，有所缓和。

夜。

痛苦稍轻，然而失眠。

昨天我给让—保罗写的那几段里，关于自己说得很不确切。你也许会认为我这一生总在寻求平衡。不对。也许是由于职业，我一向觉得泰然镇定，心神不宁的时候不常有。

说说我自己：

相当早的时候（我从事医学的头一年），我就没有接受任何宗教的或哲学的教条，我能够把自己的一切倾向融合在一起，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生活和思想的坚实的环境，给自己一种道德模式。这个环境有局限，但我并不以局限为苦，反而在其中深感清静。在给自己规定的限度之内过自得其乐的生活，这成了我工作必不可少的舒适的条件。这样，很早，我就很方便地使自己处于几个原则的中心。我姑且使用“原则”一词，因为找不到更合适的，其实这个词有点自命不凡，还带点勉强意味。这些原则适合我天性的需要，也适应我医生的生活。（大体上说，就是崇尚行

动的人的基本哲学,其基础在于对毅力的崇拜,意志的作用,等等。)

在战前期间,总之,完全如此。在战争期间,至少到我第一次受伤时,也的确是这样。那时候(在圣迪吉耶医院住院期间),我开始对我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提出疑问,而以前,这样的方式一直使我得到某种均衡,感到舒服和谐,能够发挥我的能力。

我累了,我不知道能不能再作这种分析。激情没有了。我真是自作自受。我越分析,越觉得我写的关于自己的这些都成问题了。

例如,我想到在我的生活中的最重要的某些行动。我发觉,我以最大自发性的所作的事情,恰恰是与那些了不起的“原则”明显矛盾的。在每个决定的时刻,我作出的决定都是我的“伦理观念”认为不对的,是一种比一切习惯、一切推理更强大的内心力量突然强使我作的决定。这样,我往往不能不对我的“伦理观念”,对我自己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忐忑不安地扪心自问:“我真是我自己想象的那种人吗?”(这种不安毕竟很快就会消失,并且不能妨碍我恢复往常的平衡。)

今天晚上在这里,孑然一人,事后思量,我相当清楚地发现,由于我这样的生活规律,由于我迁就顺从这种习惯,我并非有意,却人为地改变了自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假面具。戴上这种假面具,就逐渐改变了我的本性。在生活过程中(以后,我也没有闲功夫去钻牛角尖),我毫不费力地适应了这种制造出的性格。不过,在某些严重关头,我自发作出的决定当然还是原来真实个性的反映。那时,突然卸下了面具,我的本性露出了真实的本来面目。

(把这些看清楚,我觉得相当高兴。)

不过，我想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这使人想到，为了揭示人最深刻的本性，不应该在他习惯的行为中去搜寻，而应当分析他们那些出人意料做出来的，表面上难以理解，有时甚至骇人听闻的行为。就是这些行为泄露出了“真面目”。

所以我认为，雅克就跟我不一样。在他身上，大部分的时间里是深刻的本性（真面目）在指引着他生活的方向。所以，对他的生活旁观的人都觉得他脾气变化无常，反应难以捉摸，而且经常表面上前后矛盾。

窗外晨曦初透。又过了一夜——又少了一夜……我要尽量打个盹儿。（这一次，没有为彻夜不眠而特别遗憾。）

8月8日，户外。

在树荫下气温是 28° ，热得很，但不闷人，而且使人爽快。出色的天气。（还有一大部分人守在敌对着的北方，真不可理解！）

刚才在饭桌上，我听到他们谈论各人的前途。他们以为——或者假装以为——中了毒气的人并不是永远伤残。他们还以为可以从正好被动员令打断了生活的那一点再开始继续他们的生活。仿佛整个的世界一等到和平就可以原封不动地恢复往日的步伐。我恐怕他们将要大大失望！

但是，最使我惊奇的是他们谈到当老百姓时的工作的那种口气。他们从来也不认为当时是自己选定的、欢喜的、特别喜爱的职业。即使不象个苦役犯谈苦役，也象个中学生谈他的功课。可怜呀！再也没有比毫无坚定的志向而进入生活更糟糕的了。（如果不说怀着虚假的志向进入生活的话。）

给让—保罗：

我的孩子，要提防“虚假的志向”。大多数虚度一生，老年怨恨的人，原因正在于此。

我仿佛看到你成长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这特别是极端混乱的年龄。这时候，你的理性开始觉醒，开始幻想着理性自身的力量。这时候，也许你的心会大声提出要求，你难以克制它的冲动。在这个年龄，尽管你的头脑还很混乱，却为新近发现的广阔天地而陶醉，在众多的可能性面前犹豫不定。在这个年龄，一个人还很孱弱，却自以为是个强壮的男子汉，感觉到需要找到支持，找到方向，刚见到什么确定的信念，什么严格的规则，就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注意呀！在这个年龄，你自己料想不到，其实你的想象力最容易歪曲现实，甚至以假当真。你会说：“我知道”……“我感到”……“我肯定”……注意呀！一个十七岁的男孩往往很象一个相信乱转的罗盘的领航员。他坚信他的少年人的兴致是天生就有的，它应该当作他行动的指导，它向他指出了无可置疑的方向。他没有想到，自己往往是受了虚假的、随意决定的、一时的兴致所控制。他没有想到，他的爱好对他来说好象确实是属于他自己的，其实相反，完全是外来的，是他随便哪一天碰巧在书本或社会上拾取来的，如同什么伪装过的东西一样。

你该怎样抵御这些危险呢？我为你担心得发抖。你愿意听我的劝告吗？

我首先希望你不要过于急躁地拒绝你的老师、你周围的爱你的人对你的忠告。你觉得这些人不了解你，其实他们对你也许比你对你自己了解得还清楚。他们的警告你觉得厌烦吗？也许，如果你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些劝告还有道理……

但是，我特别要你当心你自己！你要时刻防备自己对自己

估计错误，为表面现象所欺。用你自己的力量来锻炼你的真诚，使它能洞察一切，而又可见功效。你要明白，要设法明白这样一件事：对于你这样环境里的孩子来说——我的意思是受过教育、经常阅读书籍、交往的都是有头脑、自由表达思想的人——某些事物和某些感情的概念先于亲身的体验。他们在思想上，通过想象，懂得了许许多多感觉，自己却一点也没有亲身的直接经验。他们对这一点并没有觉察：他们混淆了知和觉。别人感觉到的感情、需要，他们只是知道了，他们就以为自己也感觉到了……

你听我说。什么叫做志向？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十一二岁的时候，你也许觉得你的志向是当一个水手或者探险家，因为当时你非常喜爱冒险故事。现在，你有了足够的良知，就对那样的想法报之一笑了。到了十六七岁，你又可能犯类似的错误。你要小心，不要相信一时的倾向和爱好。不要因为你有机会在书本或生活中看到过诗人、干大事业的人或者是情人，你钦佩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自以为也是一个诗人、事业家或者是一场伟大的爱情的受害者。要耐心地寻求什么是你天性的本质，努力逐渐发现你真实的个性。不容易呀！很多人只是到了太晚的时候才做到这一点，又有很多人从来也没有做到。你要耐心，不必着急。要摸索很久才能有自知之明。但是，一旦发现了自己，就要把虚假的外衣赶快抛弃。要承认你的局限和缺陷，努力朝着真正的方向健康地、正常地发展，不要弄虚作假。因为，认识自己，如实看待自己，并不是放弃努力，放弃力求尽善尽美，完全相反，这样更有可能达到最高限度，因为这时候，你的发奋向上有了正确的方向，使你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获得成果。要努力扩大自己的疆界，然而，必须是天然的疆界，不过首先要了解这

些疆界是什么。那些终生一事无成的人，时常一开始就看错了自己的天性，走上了一条不该走的路，或者是方向虽然走对了，却未能，或是没有勇气坚持利用自己可能有的条件。

8月9日。

看报纸。劳合·乔治发表了乐观的演说。由于事业的需要显然夸大了乐观精神。尽管如此，最近二十天来法国战场的形势好得出人意料。（象吕梅尔在巴黎谈的那样。）庇卡底地区的攻势好象已于昨天开始。美国部队已经遥遥在望。据说，潘兴^①计划是让福熙把战线展开，肃清巴黎附近的敌人，然后，在英法军队收复原来阵地的时候，美军大规模向阿尔萨斯挺进，越过国界，打进德国本土。据说，到那时候，将使用某种毒气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种毒气只可以在敌国境内使用，因为它有毁灭一切的力量，使一切植物在好几年内不能生长，等等。（饭桌上，大家都很兴奋。这些可怜的、中了毒气的伤员，其中有许多人永远不能复原，想到这种新毒气，竟然欢喜若狂……）

达罗给我们念了一封他弟弟的信。他弟弟是驻美国部队的联络翻译官。他说，他厌恶美国人那种幼稚的自信心。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以为他们只要进攻，就能在短期内获得最后的胜利。他还说，所有的美国人都决心不让俘虏成为他们的累赘。他们恬不知耻地说，一群俘虏只要人数不满五百，干脆用机枪扫射掉。（这并不妨碍这些面露狞笑、眼神纯真的空想理论家们，好象一有机会就说他们是为公理和权利来战斗的。）

① 潘兴(1860—1948)，美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赴法作战的美军司令。

8月10日。

又对读书感到一些兴趣了。不太费劲就能集中精力，尤其是晚上。这时候，读完了署名为道森的一篇很好的文章(《伦敦医学杂志》)，内容是芥子气与其他毒气后遗症的比较。作者的观察在很多地方证实了我的见解。(并发性感染有可能转为慢性等等。)我很想给他写信，将我的医疗日志抄几页给他。但我又不愿意开始这种通信往来，因为我没有把握将来能继续下去。然而，这个月一日开始病况显然有所好转。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善，可是疼痛减轻了一些。只是暂时的缓和。与前几星期比较，痛苦几乎还可以受得住。要不是每天上午的治疗很累人，又时而窒息发作(尤其是傍晚日落的时候)，晚上又失眠……但只要我能看书，象最近的几晚，失眠就不太难受。多亏日记可以消磨时间。

午饭前，在窗前眺望。

一大片起伏的山峦，景色多么壮丽。几百条狭窄的梯田，一直猛升到山顶。碧绿的山坡上，被干硬的石头短墙密密地划出白垩色的平行线条。在山顶，一块裸露的岩石，象是灰色浮石的王冠，反射着淡紫和桔黄的光泽，显得那么柔和。在下面，很远的地方，正在耕地和岩石交界的地方，一座座房屋一层层地排在斜坡上的小村庄，好象在地褶上留着的一把闪闪发光的砂砾。这时，几朵云彩飘过，在这翠绿的田野上有几片大的暗影缓缓地移动。

我还能有几个星期能观赏这样的景色呢？

11日。

马泽就是圣迪齐埃地区德扎维尔那样的四道杠医官：他一旦“嗅出”哪个病人无可救药，就完全扔开不管了。他曾扬言：“一个好大夫应该有这种嗅觉：闻得出一个病人不再使人感兴趣的准确时刻。”

在马泽的眼里，我还是个使人感兴趣的病人吗？又能维持多久呢？

自从朗格鲁瓦有脓肿以后，马泽再也不去看他了。

索姆河攻势似乎很得手。英国人也不甘落后。桑代尔高原已收复，巴黎至亚眠一线已经清除了全部敌人。战役正在蒙迪迪埃进行。（蒙迪迪埃，拉西尼，勒松絮马茨，所有这些地名都使我回忆起一九一六年！……）

古瓦朗很乐观，说现在一切都大有希望。我也这样认为。（我想有很多人觉得惊异，特别是我们那些军事和民政的首脑。春天，他们还以为面临不可测的深渊，现在大概都神气活现了。但愿他们不要太得意。）

8月12日，晚上。

整个下午都在摘抄医疗日志，准备放在给道森的信里。

看报。英国人已经兵临佩龙城下。可怜的佩龙！还剩下了什么？（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一四年撤退时的情况。全城没有灯光，人们提着风灯在黑夜里逃命，骑兵在撤退，疲乏的人，跛腿的马……市政府的底楼摆满了担架，一直排到人行道上！）

13日，晚上。

今天呼吸困难，不过，还是抄完了我想寄给道森的摘录。

重读笔记本，我印象很好，甚至可以说印象极佳。病情的进展象图表一样清楚。这是一套重要的资料，也许是唯一的资料，说不定以后是权威性的，能够长期作为研究的基础。我应该克服要中断的念头，记的时间越长越好，把分析一直进行到底。至少，在我身后留下一个中毒气的人的完整病史，这是人们还尚未了解清楚的。

有些时候，这种想法支持着我。又有些时候，为了从中得到一点点安慰，我不得不可悲地白费劲……

凌晨一时。

模糊的回忆。（我渴望着中断正在进行的幻想，顺着联想的线索，向后回溯到起始点。）

今天晚上，吕多维克端着托盘进来，盐瓶的盖没有拧好，咣地一声掉在盘子上。

我当时没有太注意，但整个晚上，我治疗的时候，梳洗的时候，抄笔记的时候，都一直想到我的父亲。接连不断的往日回忆，想起了全家吃饭的情景，大学街宅子里静悄悄的晚餐，韦兹小姐的小手放在台布上，还有拉菲特庄别墅里星期日的午饭，窗子开着，花园里阳光灿烂……

为什么想起了这些？我现在知道了。因为瓶盖落在瓷盘上的声音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的夹鼻眼镜碰到盘子边的特别的声音。每逢开始吃饭的时候，父亲沉重地坐到位子上，用细链子吊住的夹鼻眼镜就会往盘子边上碰。

我一定要给让-保罗写下一些关于我父亲的情况。再也没有人能够对他说起他的祖父了。

他不怎么招人喜欢，甚至他的两个儿子也不爱他。他很难使人爱他。我以前对他的评论太严格，我评价得是否正确呢？今天，我觉得，他不为人所喜爱，只是由于某些精神力量，某些严谨的德行过分了，或者起了反作用。我不敢写他的一生使人不得不尊重，但是，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一生的确致力于作他所认为的好事。他性情古怪，大家都对他敬而远之，他的美德也吸引不了任何人。他行善积德的那种方式比最坏的劣行还使人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我觉得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因而他为他自己的孤独痛苦万分。

让—保罗，终有一日，我要努力对你说说你的蒂博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

8月14日，早晨。

还是吕多维克这个老唠叨鬼，用大胖手捋着胡子对我说：“医官先生，我告诉您，达罗中尉是装病。”

我当然不同意。吕多维克带着狡黠的神情说：“我说什么我自己知道。”他进一步说明：达罗住在侧楼时，吕多维克发现他在试体温时“弄虚作假”，每次塞进体温表之前，总要活动十多分钟，记到表格上也总要把体温记高几个十分之一度。

我不同意，然而……我不是也发现了一些很费解的事吗。比如在吸气治疗室，达罗接受治疗总是敷衍了事。巴尔多或马泽一转过身，他就把治疗时间缩短，一般总逃避单独治疗，等等。在治疗上这样马虎，对自己的健康却担心得很，这就更奇怪了。他时常向我问这问那，又说，他的健康“完全垮了”，等等。（达罗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气管炎严重，总不见好。）

傍晚，在菜园里。

我喜欢到这里来，一直走到长凳那里。在小径旁的柏树荫下。这里有芦苇编成的篱笆，一排排的花坛，水车响的声音。彼埃尔和樊尚拿着喷水壶走来走去。

脑子里不断想着吕多维克说的那些闲话。我问自己，即使达罗是在装病，这难道不好吗？

不那么简单。这要看对谁来说。吕多维克的两个儿子被打死了，对于他来说，这是恶劣，甚至是犯罪，是一种临阵脱逃的行为。他大概觉得达罗应该上军事法庭。在达罗的父亲看来，这肯定也是恶劣行为。（我可以说不认识他父亲，他父亲来看过儿子几次。是阿维尼翁地方的牧师，是个爱国的老清教徒，甚至鼓励最小的儿子入伍。）对，在达罗老头儿看来，当然这是恶劣行为。但是，对于别人来说呢？例如，对于巴尔多？他给达罗治了四个月的病，很喜欢他。即使巴尔多发现了点什么，是处分他呢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达罗自己来说，如果他真的有“弄虚作假”的过错，他自己觉得恶劣吗？

对于我呢？我自问。这恶劣吗？当然，我不能说干得好。对于躲到医院里，想方设法不肯治好病的逃兵，我从本能上感到厌恶。不过，我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这行为恶劣。

真是件怪事，值得把它说清楚一点。是好还是恶劣？

首先，我发现，不管他是不是犯了弄虚作假的罪，我觉得达罗是值得同情的。这个青年很敏感，会思考，很有教养，我觉得本质上是个正派人。即使他是个装病的逃兵，我也尊重他。他经常跟我推心置腹地谈话，说到他的父亲，谈到他的青年时代，谈到从性的观点看那骇人听闻的新教教育，也谈到他们夫妻的生活。特别是有一天，他谈到他跟他的妻子经过里昂，那天晚上，

正好颁布动员令。(他们夫妻从阿维尼翁来,在那里度的假。第二天清晨,达罗必须赶到他的后备团去报到。他们终于在一个很糟糕的旅店找到了一个房间。全城闹哄哄的,忙着准备打仗。他说话的那声调我还记得很清楚:“泰雷兹怕得直抖,咬住牙忍着不哭出来。我整夜缩在她怀里,哭得象个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她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不出话来。一整夜,炮兵辎重队从石子路上不断驶过,发出吓人的轰隆声。”)

也许,他今天是个装病的逃兵,但他决不是个懦夫。他当了四十个月的步兵,受过两次伤,记过三次功,最后,在上默兹中了毒气。战争开始时,他结婚才六个月,现在有一个孩子,一个身体很弱的妻子。没有任何财产,在马赛教书,收入微薄。他是今年二月中毒气的(轻度)。起初在特鲁瓦治疗,他的妻子也到了那里。他们又一起生活了足足一个月。我觉得这件小事有很重要的意义。以后,他被送到这里来,离战争很远。他又见到了蔚蓝的天空,灿烂的太阳,又有了度假似的生活……我很能想象得出他心中发生了什么变化!……如果他决心用一切方法来拖长他的肺病——而且,有谁说得准呢?和平也许不会那么远了——这位本质很好的新教徒是不会没有良心上的斗争的。即使他终于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性命,甚至不惜逃避治疗来加重病情,这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如何回答?

不,即使他打定这样的主意,我也不能收回我对他的尊重。

子夜。

失眠,失眠。在黑夜里,一小时又一小时不断地沉思……好象是一种自言自语的本能,它帮助我,只要稍有可能,就转移开

我的注意，不再去想那心中的“幽灵”。

达罗。不管怎么说，达罗这件事是严重的。我的意思是说，对我来说是严重的，从它对我引起的一些问题来说，是严重的。

还有一个次要的发现：我不再相信什么责任了。

我以前相信吗？相信的，在一个医生所能相信的限度之内是相信的。（对于我们来说，责任的限度决不是流行舆论所规定的那样——我还记得在韦尔纳伊我同那位法医，那位狙击营的助理军医争论过。我们这种人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的行动是由我们自己的情况和周围的环境决定的。要我们对继承性负责？对我们的教育负责？对已知的先例负责？对环境负责？显然，都不是。）

但是，我以往的行动却仿佛是我相信我负着绝对的责任。而且我以往对于是非善恶有强烈的感觉，这也许是由于基督教的教育？

（另外，还有这样的弱点：倾向于认为对所犯的错误相对来说不负责任，而作了好事，则想居功……）

这一切都很矛盾。

（给让—保罗：

不要过于害怕矛盾。矛盾使人不舒服，但有益于身心。总是在我的思想受不可解脱的矛盾束缚的那一刹那，我才觉得距离这个避而不见的真理最近。

如果我还能再活一次，我仍然愿意在怀疑中生活。）

生物学的观点。

在战争初期，我虽然愤怒万分，仍然抵制不住这样的倾向：

即用生物学的过于简单化的观点来看待道德和社会问题。(常有这样的考虑：“人，就是一种特殊的嗜血动物，等等。必须用坚固的社会组织把人的破坏力约束在一定的限度，再也不能指望有更好的办法了。”)我甚至在箱子里装着一本法布尔^①老人的著作，一直带到贡比涅才拿了出去。我愿意把人类和我自己都看作武装起来的巨大的昆虫，用于厮杀，攻守，征服，互相吞食……我满怀怒气地想道：“至少，让这场战争打开你的眼睛吧，傻瓜。让你如实地看待世界。宇宙，就是盲目的力量的总和，靠着摧毁抵抗力软弱的来保持平衡。自然就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一切生物，一切种族，从本能上互相对立，互相吞食。因而，没有善，也没有恶。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石貂、老鹰，都是如此。”

在躺满伤兵的战地医院的地下室里，怎么能够否认武力压倒权利呢？(我清清楚楚地回忆起许多事：在卡多的那天晚上，佩龙的进攻之后，南特勒奥顿战地救护站在凡尔登和卡洛纳之间的一堵短墙后面，有两个小步兵躺在谷仓里等死。)我还记得，有时候，看到这个动物世界，真是灰心丧气，看够了！

太短视了……我当时陷入了致命的悲观主义，这本来可以给我一个警告：这样会使我沉入深渊，在那里连呼吸都困难。

我要熄灯了，好稍稍打个盹。

1 时。

今夜不用想睡觉了。

那个好达罗(他自己不会料到)，使我十五个钟头以来一直

^① 法布尔(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

纠缠在“道德的问题”上，比我一生想的还要多！

从字面上说，这些问题我以往没有产生过。善，恶，这是常用的、方便的字眼，我过去跟大家一样使用，但并没有给它们以真正的含义。在我看来，这些概念没有任何迫切意义。传统的道德规范，我接受，但是是为了别人。我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来接受的，假如某个革命政权，胜利了，宣布这些规范作废，假如来征求我的意见，我也许会劝他们不要一下子颠覆这个社会基础。我觉得，这些规范完全是任意制定的，然而，对于别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无可否认，它们既方便又适用。至于我，在我与我自己的关系上，我对这些完全不考虑。

（不过，我也自问，尽管我没有空闲也没有那种心情，但是，如果我要建立我个人的生活规范，我将建立什么样的呢？我相信，我会采取某种弹性的方式，比如说：“凡增加我的生命，有利于我充分发展的都是善的；凡阻碍我实现生存的都是恶的。”那么，还需要确定我从“生命”和“实现生存”中所领会的是什么……我不再想这样做。）

说真的，那些目睹过我生活的人——如果有这种人的话，比如说雅克或菲利普，不大会发现，我在原则的问题上，差不多是给了自己完全的自由。因为，在我的行动中，尽管我完全未加注意，我也合乎人们一致所称的“道德”，“正派人的道德”。然而，曾有多次——没有夸大，十五年来也许有三四次，在我的私生活或职业生活的某些严重关头，我忽然意识到，我的解脱并不只是在理论上。在我一生中有三四次，我发觉我一下子就进入了平常我所接受的道德规范行不通的领域，这个领域甚至理性也无法进入，只有直觉和冲动在主宰那里的一切。这是一个通畅安宁的领域，一个高级混乱的领域。在那里，我感到出奇的孤独、有

力、自信。是的，自信，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突然无限地接近了……（这个句子很难接下去……）姑且说，接近了某个上帝，即纯粹的真理（大写的真理）。是的，据我所知，至少有三次，我故意地，坚决地触犯了人们普遍信奉的道德准则。我从来没有一点后悔。我今天想起来，也完全无所谓，没有一点丝毫的悔恨的影子。（另外，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过后悔的体验。无论我的思想或行动是什么样子，我从根本上说都接受，都认为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且合情合理。）

今天晚上，我觉得我的心情特别宜于写日记。头脑清醒。如果要我以明天一整天难受作为代价，那也只好由它去。

我又看了一遍自己所写的。思索着这一切以及相关的问题，思索了好一会儿。

我特别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是，在生活中，一般不允许自己明显地触犯公认的道德准则的那些人），是什么在约束着他们呢？因为他们中间，很少有人企图去作被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当然，我不是指那些信徒，那些有深刻的宗教信念或哲学信念，因而能够战胜恶魔引诱的人们。那么，其余的人呢，一切其余的人。是什么在约束着他们？是胆怯？是尊重世俗人情？是畏惧人言？害怕预审法官？害怕在他们私生活或公众生活中可能遭到后果？显然，这一切都在起作用。这些障碍强而有力，在很多“受到引诱的人”看来是不可逾越的。不过，这些只是物质方面的障碍。如果没有其他障碍，精神的障碍，那么人们就可以认为，个人尽管摆脱了宗教的桎梏，只是因为害怕警察或至少怕出丑才循规蹈矩的。因此，人们也可以认为，任何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假如受到了诱惑，然而环境隐

蔽，他确有把握不会受惩罚，那么，这个人一定会立刻接受引诱，去作坏事，而内心里还洋洋自得……这也就是说，不存在足以约束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道德”观念；对于不信从任何上天法规、任何宗教或哲学理想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任何有效的道德禁令。

这里要附注一下：这样说仿佛就同意了某些人的观点，认为道德的意识（我们大家自发地辨别是非，区分善恶的一种标准）就是继续存在于现代人心中的一种来源于宗教的顺从，长期为我们先人所接受，已经成为我们后来获得的性格。这，我乐于同意。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推理忘记了上帝只是人类的一个假说。因为，善恶的区分并不是人类所杜撰出的上帝能够强加给人的精神的，相反，是人把这种能力给予了上帝，并且使它成了一种神圣的戒律。假如说这种区别来源于宗教，那也就是说，人在某一天把这能力借给了上帝，因而也就是说，人类有这种能力，而且它深深地在我心中扎下根，以至于使人类觉得有必要给这种分辨能力一个至高的，绝对无可争辩的权威……

怎样解决呢？

4 时。

正在写附注，累得支持不住，一连睡了两个多小时。这是这个日记本的可贵效果，也要归功于我一时的哲学兴致……

我已经不知道原来想达到什么结论。“怎样解决呢？……”对，怎样解决？我刚才还觉得我已经有点看清楚了，但是，现在又找不到刚才的思路了。

道德意识及其起源问题。为什么不可说，是一种社会习惯的残余呢？（我也许是按我的用法杜撰出了一个烂熟的解释。这也无妨。对于我来说，它是新的。）

只要我不承认道德意识起源于某种上天戒律，我就更有理由认为它的起源在于人类的过去。它是一种在产生它的原因消灭之后还延续下来的一种习惯，由于遗传，同时也由于传统，固定在我们心中。是古代人类的群集为了组织集体生活、规定社会关系而必然积累的经验的残余。维持治安的规章的残余。能够认清这种道德意识，这种分辨善恶的能力，我觉得很吸引人，并且也觉得自尊心得到了满足。（这种区别在我们内心中先于我们就已经存在，从它给我们的命令来看，它往往是很荒谬的，然而，我们还是被迫地不断服从它；甚至，在理智犹豫回避的时候，区别善恶的能力还指引着我们的行为，使最聪明的人作出用理智来考察时不能认为是正确的行动。）我还倾向于认为，它就是人这种社会动物基本本能的残余。这种本能经历数千年，还在我们身上延续，由于有这种本能，人类社会才能日趋完善。

8月15日，在花园里。

美好的天气。晚祷的钟声。一切都有节日的气氛。天空，鲜花，在一片晴光中颤抖的地平线都咄咄逼人。难道能反对这美丽的世界，去破坏，去召唤灾祸！不，我只愿逃开，躲起来，只愿为了忍受痛苦而反省。

施巴市正在举行重大的军事会议，参加的人有德皇和军事将领。瑞士报纸用三行文字作了报道，法国报纸只字未提。也许这是个历史性的日期，小学生们今后在教科书上会学到，其后果将改变战争的进程……

古瓦朗说凯道赛的那些先生们中间，现在有许多人预料今年冬天会实现和平。

战报上没有什么重要新闻。大家都在等待，就象在闷热的

天气里等待暴雨一样。

晚上 10 时。

刚看过昨天晚上写的那些废话。乱涂了这么多页纸，我真是又惊奇又不快。我的局限性在这里表现得太多了……（另外，人类那些可怜的词汇，不论怎样，都是感情的词汇，不是逻辑的词汇！）

给让—保罗：

我的孩子，你不要根据病人的胡言乱语来评价安托万伯伯。在思想意识的迷宫里，安托万伯伯一向觉得很不自在：一迈步就迷路……当我在伟人路易学院准备哲学业士学位考试时（这是唯一一次我考了两回才被录取的考试），有时，一连几个钟头相当苦恼……就象一个笨汉要玩肥皂泡一样！……我发现，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仍旧没有改变这个气质。在抽象思维上完全无能的情况毫无改变，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将近午夜。

维尼^①的日记还不使我厌烦，不过，我的注意力常常不能集中，书从我手里掉下去。由于失眠而心烦意乱。我的思想在打圈子，想到死亡，生命的渺小，人的微末，想到人的思想刚一企图了解事物，马上就陷到谜中。总是碰到那个解不开的问题：“为的是什么？”

想到我每天过的日子，我为了病人牺牲了一切，我极端兢兢

① 维尼(1797—1863)，法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

业业地完成我的职责，那么，象我这样一个超脱了道德戒律的人，过这样堪称模范的生活为的是什么？

（我曾经发誓要避开这些需要别具天赋才可以探讨的问题。也许这就是最好的解脱办法吧？）

无私的感情，献身的精神，职业的自觉，等等，又为的是什么呢？

另外，受伤的母狮是为的什么情愿被杀也不离开它的小狮？含羞草折起叶子，白血球的阿米巴样运动，或者金属的氧化，又都是为了什么？

不为什么，这就是答案。提出这个问题，也就是假设事物都是有所为的，这就已经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圈套……不，应当承认可认识的事物的局限。（勒当泰克^①等等人就是如此。）最聪明的办法就是不要去问“为什么”，只要满足于“怎么样”。（只是回答事物是怎么样，就够忙了！）首先，不要那么天真地希望一切事物都可以解释，都合乎逻辑。那么，我也不要自己解释自己，仿佛我自己是始终如一的。（长久以来，我自以为始终如一，是蒂博家的傲气吗？不如说是安托万特有的自负……）

不过，在一切可能的态度中，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承认道德惯例，但不要为它所欺。人们可以爱秩序，要秩序，并不因而把它当作道德实体，同时也不忘记，这种秩序只不过是集体生活中的一种实际需要，是得到重要的社会福利的一种条件。（我写“秩序”，为的是避免“善”这个词。）

感觉到自己遵守秩序，完全不去理解自己所服从的法律——这始终是一个引起烦恼的课题！很久以来，我一直以为

^① 勒当泰克(1869—1917)，法国生物学家。

终有一天我会找到谜底。现在，我已注定对自己和对世界都没有什么了解就死去……

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可能会这样回答：“一切都是如此简单！……”但是，对我并非如此！

疲劳不堪，又不能入睡。这正是失眠对人的折磨：疲乏的身体急欲休息，思想却过度活跃，不允许睡眠来临。

一个小时，我睡在枕上辗转反侧，苦苦地思索：“我一生一向乐观，不应当死于怀疑和否定。”

我的乐观主义。我一生一向乐观。也许我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今天我看得非常明显。这种愉快的直觉，积极的自信，一直鼓舞着我，支持着我。我觉得，这种乐观精神来源于与科学的交往，而且每天不断地获得滋养。

科学并不单纯是认识，它是与宇宙相调谐的愿望——与它要探索其规律的宇宙相协调的愿望。（遵循这条道路的人必定达到奇妙的境界，比宗教的奇迹更加广阔，更加令人振奋！）通过科学，人们能深刻地感觉到与自然以及自然的奥秘保持接触，和谐一致。

这是一种宗教感情吗？这个词使人望而生畏，不过，毕竟……

仁爱、希望和信仰。韦卡尔神父有一天曾向我指出，我也在实行三超德^①。我不同意。我勉强可以承认仁爱和希望，但绝不承认信仰。不过，如果我今天要说明那支持了我十五年之久的持续的热情原由何在，如果我要解释我那坚强的自信的根源，我得到的答案也许会接近于信仰……信仰什么呢？那就是，相

① 天主教的三超德，是信、望、爱，即文中的信仰、希望、仁爱。

信生命形式有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肯定无穷无尽地增长,相信宇宙万物不断地向更高级发展……

这莫非就是不自觉的目的论者?这也无妨。无论如何,我不要其他什么“合目的性”。

8月16日。

发烧,呼吸困难,嘘声更强。很多次不得不吸氧气。我起了床,但是没有下楼。

古瓦朗带着报纸来看我。他还是相信今年冬天可能实现和平,巧妙而有力地在他的观点辩护。好奇的家伙。真想看着他说一些叫人放心的消息。他的两只小眼睛距离太近,总爱眨巴着,长长的鼻子,脸朝前撅着,象只猎兔犬,这使他总带着改不掉的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不断咳嗽,吐痰。他对我谈起他的职业来就象谈苦役似的。其实,在亨利四世学校教历史并不是毫无乐趣、枯燥无味的差使。他还谈到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他喜欢贬低别人,太爱批评别人,显得自己正确。有时我觉得他华而不实,也许是因为聪明过分了吧——那是一种沾沾自喜的聪明,对别人却漠不关心,缺乏宽宏大度的精神。除此以外,也时常表现得有些机智。

机智?有两种表现机智的方式:一种是所说的内容很机智(菲利普);另一种是说话的样子显得机智。古瓦朗那种机智是外表的,其实言之无物。他选用某些字眼,加强最后的音节,加上音调抑扬顿挫,手势很好笑,语言有时省略,有时晦涩,同时闪现出调皮的眼光,仿佛每句话里都大有深意。如果把菲利普的话复述一遍,仍然锋利机敏,一针见血。如果有人愿意把古瓦朗的话再说一遍,就索然无味了。

8月17日。

呼吸越来越困难。作了透视，荧光屏上显示，即使作深呼吸时，横膈膜的运动也几乎没有。巴尔多去休假三天。我只觉得病痛难受，难受，不可能想别的。

8月18日。

白天情况不好，晚上更糟。马泽在巴尔多不在的时候用了新疗法。

8月19日。

接受新疗法，疲倦不堪。

8月20日。

今天上午好得出奇。昨夜打了针，睡了将近五个小时！支气管炎明显地减轻。看了报。

晚上。

昏睡了一下午，发作好象被控制住了。马泽很高兴。

苦苦思念拉歇尔。这样沉溺于回忆，是否衰竭的征兆？我正常生活的时候，从来不回忆。过去的事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

给让-保罗：

道德。道德生活。每个人都必须发现自己的义务，确定义务的性质和界限。在不间断的试验和持续的探索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选择个人的态度。坚持不懈地约束自己。在相对和绝对，可能和期望之间航行，但是，不要忘掉真实，要听从深藏

在我们内心里的那种明智的声音。

要维护生命。不要怕错误。不要怕不断地否定自己。认识到错误，以便更进一步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义务。

（归根结底，人只对自己才有义务。）

8月21日，上午。

看报。英国人没有什么推进。我们虽然这儿那儿有些零星进展，但也没有推进。（我就象战报上说的一样，也写“零星进展”，但我看得很清楚，对于那些取得“进展”的人，这意味着什么，炮弹爆炸就象火山爆发一样，在交通壕里匍匐前进，挤满伤兵的救护站……）

我起床去治疗。过了一会儿，我试着下楼去吃午饭。

深夜，在灯下。

我本来希望睡一会儿（昨天晚上，体温差不多正常， $37^{\circ}8$ ）。但一整夜都失眠。每一分钟都很清醒，现在，天已破晓了。

然而，一夜温和宜人。

22日，早晨。

昨夜停电，我无法写日记。我多么想记下这个流星灿烂的、壮丽的夜晚。

很热，将近一时，我起来打开百叶窗。躺在床上，我看着这夏季美丽的夜空。它是那样的深邃。空中好象榴霰弹纷纷爆炸，一阵阵的火雨，流星向四面八方坠落。我想起索姆河的攻势，在马雷奥古的战壕里，一九一六年八月的那些夜晚，流星与英国人的曳光弹交织在一起，象仙国中的烟火。

我忽然想到：一个天文学家习惯于依靠想象认为生活在宇宙空间中，死的时候大概不象别人那么痛苦（我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切，我想了很久很久。仰望天空，这无边无际的天空，每逢我们的望远镜完善一步，它就好象又退后一步。只有这样的冥想才能使我稍得平静。在这个广漠无垠的空间，缓缓转动着无数与我们的太阳相似的恒星，在那里，我们觉得极大的太阳，我估计比我们的地球大几百万倍的太阳，真是微不足道，只是无数的其他单位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单位……

银河是星辰和太阳聚成的尘沙，围绕着它们，又有数十亿行星在转动，彼此相距以千万亿公里计。从那些星云中，将产生无数的未来的太阳！而根据天文学家的计算，这不可尽数的世界也微不足道，在无边无际的空间，只占极小的位置，在这广漠无垠的太空，人们推知处处留下条纹，处处抖动，处处有放射作用，处处有相互的引力作用，而人们对这些还一无所知。

只要写到这些，连想象力也动摇了。感到获得了慰藉的眩晕。今夜，我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能够怀着一种平静的、超脱的淡漠心情想到死亡。我摆脱了苦恼，与我那朝生暮死的躯体可以说不相干了。我只是无限小的，全然没有意义的物质微末……

我发誓每天晚上要观看天空，继续寻取这样宁静的心情。

而现在，天已亮。新的一天开始了。

午后，在花园里。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又打开日记本。我觉得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适应我的目的：使我摆脱心中的“幽灵”。

昨夜的沉思还萦绕在脑际。

人这个动物，彼此是密封的个体。我们也一样，彼此围绕着转动，并不相遇，也不融合。每人各自走各自的路。每人保持严密的孤独。每人有自己的皮囊，独自过完一生，然后消失掉。生生死死，循环不已。在世界上，每秒钟有一个人出生，每分钟诞生六十人，每小时有三千多个新生儿，同时也有这么多的人死去！每一年有三百万人将位置让给新的生命。真正能了解这个规律的人，依附并且实现这个规律的人，难道能象以前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为个人的命运喜怒哀乐？

6 时。

今天我觉得自己在天空翱翔，全身轻松得没有一点重量。一个还活着的物质微末，完全意识到自身的渺小。

在巴黎，泽林格有一天晚上把他的朋友让·罗斯唐^①带到我们家里。我回忆起那次激动人心的谈话。

人在这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所处的地位是奇特的。对于这一点，我现在跟听罗斯唐讲话时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听罗斯唐论述人的地位，他的声调确切清醒，有学者的审慎、精确，也有诗人的鲜明形象和激情。我现在接近死亡，这更使他的那些思想有了特殊的吸引力。我虔诚地玩味着那些话。莫非能在那里找到医治苦恼的良药？

我本能地拒绝形而上学的幻想。对于我来说，虚无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明显。我怀着恐惧，怀着本能的反感，日益接近虚无。然而，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它，一点也不想在荒谬的期望中找

^① 让·罗斯唐，生于 1894 年，法国生物学家。

个庇护之所。

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不过，这也是个奇迹！我仿佛从身外凝视着这个分子的奇妙的集合体，它在某一段时间之内，仍旧是我。我仿佛感觉到我生命深处的种种神秘的交流，三十多年来，它们在组成我的这几十几百亿细胞之间永不停息地进行着。这些神秘的化学反应，能量的转化，在我不知不觉的时候，在我的大脑皮层的细胞里完成了，把我变成一个此刻能够思维和写字的动物。我的思维，我的意志等等，所有这些我一向引以为傲的精神活动，只不过是独立于我之外的反射活动的组合，是一种不稳定的自然现象，只要细胞有几分钟的窒息，就会永远停止了……

晚上。

又躺下。心情平静。头脑清醒，甚至有些兴奋。

继续思索人，思索生命……想起有机体的世系，而我在其中成长，真是又惊奇又赞叹。我仿佛看到在我以前千百万世纪里生命发展的每一阶段。从最初时期起，有一天，在某个地方，在炎热的海底，或者在石灰质的地壳上，忽然发生了不可解释的，或许是偶然的化学作用，产生了第一批最初的原生质的表现，一直发展到这奇特的复杂的生物，有意识，能够构思出秩序、理性法则、正义……一直到笛卡儿，一直到威尔逊。

也许有其他形式的生命，本来可以造就出比人类高超得多的生物，却在宇宙的灾难中，还处于萌芽状态就被毁灭了，想起来令人震惊，但却是完全可信的。这有机体的链子（现代人是最后一环），居然年复一年展开，一直到现在，经过了地球千百次地质变动而没有被消灭掉，逃过了大自然的盲目浪费，这岂不是奇

迹？

而这个奇迹将继续发展到何时呢？我们这个人类在朝着什么不可避免的结局前进呢？人类也会象三叶虫、巨蝎以及为人所知生存过的许多种浮生生物和爬行动物一样，也将消灭吗？或者人类有可能经受各种打击，在地壳上维持生命，还要维持很长时期？那么，发展到何时呢？一直到太阳变冷，不再转动，不再给人热量，使人类再也不能维持生活？而人类在消灭之前，会完成些什么进步呢？想起这些，真令人头晕目眩。

什么进步？

我不能相信有一个宇宙计划，人在这个计划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我在大自然中碰到的荒谬和矛盾是太多了，所以我不能承认有先天的和谐。从来没有上帝来回答人类的呼吁和询问。人们以为的回答只不过是自己的回声。人的世界是封闭的，局限在自己身上。人类唯一能够实现的雄心就是治理这个有限的领域，以尽量满足自身的需要。这个有限的领域与渺小的人类相比，当然会显得广大无边，但与宇宙相比却极其微小。科学会满足于这个渺小吗？能够使人在意识到自己渺小的同时得到平衡和幸福吗？这不是不可能的。科学能够做的事还有很多。它能够让人类接受他天生的局限，明白人类诞生的偶然性，明白自己的渺小。科学能够以持续不断的方式使人类感受到我今晚体会的这种平静，能够以几乎是安宁的态度凝视就在等待着我的虚无，那一切都会在其中消失的虚无。

23 日。

睡的时间比平时稍长，也睡得比平时熟，一觉醒来，觉得休息得很好，简直有些舒服，喉头没有使我窒息的分泌物，呼吸也

没有破风箱的声音了。

我在陶醉的境界中睡了一觉。这种陶醉不存在任何希望，然而却甜美。今天早晨又要引起我痛苦的一切，我当时觉得都不值一提，无关紧要。虚无，即将到来的死亡，以一种特殊的确实性，排除了任何反抗，控制了我的全身。这不完全是听天由命的思想，不是，因为我感觉到通过病痛，通过死亡，成了整个宇宙的命运的一部分。

我多么希望恢复昨晚的平静心情！

吃午饭以前，在阳台底下闲谈，听留声机，看报纸。

战事正在努瓦荣附近，在瓦兹省和埃纳省之间的战线上进行。二十四小时之内推进了四公里。我军攻克拉西尼，英军收复阿尔贝和布莱絮索姆。（可怜的德拉古就是在那里的勃雷村本堂神父住宅后面的树荫下，莫名其妙地被流弹打死的。）

晚上。

又恢复了昨天的平静。今晚吃饭的时候，窒息忽然发作，时间很长，也很厉害。发作之后，体力大大减弱。

26日。

从昨天早晨起，胸骨后疼痛几乎持续不断，昨夜痛苦难忍，同时恶心欲呕。

27日。

晚上七点钟，喝了一点点牛奶。约瑟快来了，一直到明天早上才走。我在等他。我听着脚步声。有很多要紧的事要做：整

理床、枕头、蚊帐，准备药水、尿壶，调节好百叶窗，倒痰盂，把水杯、滴剂瓶、电灯开关、电铃按钮放在我的手头……“晚上好，医官先生。”“晚上好，约瑟。”等到八点半钟，海克托老爹来了，他是守夜的护士。他不说话，只把门推开一点，探进头来，好象是说：“我来了，我守夜，您不要害怕。”

然后，就是孤独，开始了漫漫的长夜。

午夜。

失掉了勇气，整个精神都混乱了。

将一切与我自己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一切与我的死亡联系起来。无论我想起过去的一个什么人，马上就想：“又是一个还不知道我已经完了的人。”或者：“这个人知道我死去，会说些什么呢？”

28日。

痛苦似有减轻。疼痛的消失也许象发作时一样突然吗？

透视的结果不好。从上次检查以来，纤维组织增生显著加速。特别是右肺。

8月29日。

痛苦略见减轻，过了糟糕的四天以后，已经精疲力竭。

战报：新攻势取得进展（在斯卡帕河和韦勒河之间）。英军向努瓦荣推进。巴波姆已在我们手中。

给让—保罗：

你将来会很骄傲，我们都有这个特点。骄傲吧。愿意骄傲就

骄傲吧。谦卑，是一种寄生的品德，它贬低人的价值。（另一方面，往往只不过是内心意识到了自己的无能。）不要自负，也不要谦虚。认识到自己强而有力才能真正强而有力。

舍弃自我，甘心屈从，向往着接受命令，以服从为荣，等等，也都是寄生的品德。是懦弱无能和无所作为的本原。也就是对自由的畏惧。必须选择那些有崇高价值的品德。最高的品德就是刚毅，只有刚毅才能造就伟大。

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孤独。

30日。

我军已过努瓦荣，可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听任新闻界反复宣传战争将近结束，这真叫人惊讶。美国还没有投入战斗，没有尝到军事胜利的快乐，也没有尝到以军事力量获得和平的快乐。威尔逊想从政治上打垮德国和奥地利，击破他们对俄国的监护。根据现在事态发展的速度，还是不可能希望这两个帝国在六个月之内会崩溃，在柏林、维也纳和彼得堡建立起巩固的、可以有效交往的共和政体。

从我的窗户看去，有六七条拉得很紧的电线，穿过一块方形的天空，就好象照相底版上的条纹一样。雷雨的日子，成串的细小水珠沿着电线滑动，彼此相隔几厘米，都向一个方向流去，接连不断，从不重合。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做别的事，看别的东西……

九月

9月1日，18时。

新的一月。我能活到月底吗？

我又开始下楼，到下面去吃午饭。

从七月份我不刮胡子以来，几乎没有机会照照洗脸盆上面的镜子。刚才在秘书处，忽然照了一下镜子，我几乎认不出这个胡须满面，奄奄一息的病人就是自己了。“有一点儿虚弱，”巴尔多承认。其实应该说“衰竭”！

不可能再拖几个星期了……

英军收复克梅尔山，我们正向诺尔运河进攻。敌军向利斯河^①退去。

1日，夜间。

拉歇尔。为什么想起拉歇尔？

拉歇尔。她红棕色的睫毛，眼睛周围金色的光芒，目光是那样成熟！她一只手捂住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她的愉快。她的手在抽搐，很沉重。她的手松开时，她的嘴，她全身的肌肉，也同时放松了……

9月2日。

起了一点风。我一直躲在屋里。我听见在头顶的阳台上，古瓦朗、瓦斯纳和军士在回忆他们的大学生活。（拉丁区，苏弗洛咖啡馆，瓦撒特咖啡馆，风笛伴奏的舞会，女人，等等。）我侧耳听了几分钟，然后上楼到大厅去，我觉得恼怒，烦躁，也有些慌乱。

^① 利斯河在法国和比利时边界上。

让一保罗，不要过于害怕浪费时间。

不，我不该对你说这。正相反，你要相信，人的一生短促得难以置信，你没有多少时间来实现你的理想。

然而，你的青春，还是得稍稍浪费一点，我的孩子。安托万伯伯快死的时候，因为从来没有浪费过他的青春，倒难以自慰了……

9月3日。

第一线曙光。

昨夜我梦到了你，让一保罗。你在这几的花园里，我紧紧地搂着你，觉得你结实健壮，象一棵茁壮成长的小树，什么也不能阻挡这股生长的力量。你完全是我几个星期以前抱在膝上的那个小孩，也是我当年那样的少年，又是我后来那样的医生。醒来之后，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将来也许会当医生？”

我的想象就围绕着这个驰骋起来。现在，我想把某些材料，几束札记留给你。这是十年来观察和研究的结果，还有草拟的计划。等你二十岁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就把它送给任何一位年轻的医生吧！

但我不愿意这么快就放弃我的理想。那位继承我的年轻医生，今天早上我看到的，我愿意看到的，就是你……

午间。

我也许不该放弃喉部发音练习，并且缩短呼吸锻炼的时间。半个月以来，病情加重，今天早上不得不进行一次直流电烙器治疗。

整个上午躺在床上。

看报。把《劳工日报》的最新消息读了又读。威尔逊的讲话朴实而又高尚，是良知的语言。他反复说，真正的和平绝不应该是重新改变欧洲的均势，要远远胜过这点。他说得很清楚：“这是一场获得自由的战争。”（就象美国的那次战争一样。）不要重蹈以往的覆辙，永远清算战前欧洲那种荒谬的状态：爱好和平的劳动人民由于军备而破产，在边境后面过着刺刀上膛的日子。要建立互相和解的各国的联盟。和平最终将把使美国强大的那种安全带给旧大陆。那是一种没有战胜者和受辱者的和平，不遗留复仇因素、不遗留任何有朝一日重新激起战争意识的因素的和平。

威尔逊指明了这种和平的首要条件：打倒独裁政府。这是最基本的目标。只要不根除日耳曼帝国主义，只要奥德集团不向民主方面转化，欧洲就不会有安全。只要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不予摧毁（的确是错误的，因为它违反了人类的总的利益）。例如，对帝国的狂热崇拜，无耻地鼓吹暴力，相信德国人比一切民族优越，有权统治其他民族。（这是德皇随从的救世主降临说，要使每个德国人都成为一个十字军武士，他的任务就是在全世界建立日耳曼民族的霸权。）只要这些不予摧毁，欧洲就不会有安全。

晚上。

古瓦朗和瓦斯纳晚饭以后来看望我，很高兴。一起谈到德国。古瓦朗认为这种不祥的暴力崇拜与其说是帝国制度的产物，不如说是种族的特性；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本能。我们还谈论到：德国毕竟不是普鲁士，等等。古瓦朗自己也

承认，在德国存在着组成一个和平自由的民族的一切必要因素。那么，什么时候这种日耳曼的救世主降临说会成为一种民族的本能呢？显然，专制制度起了鼓动的作用，发展了它，利用了它！要消灭这个作恶多端的德国，如果我们是战胜者的话，就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和平条约的性质，取决于我们对待战败国的态度。威尔逊要对德国人进行民主教育，使日耳曼的救世主降临说毫无作用。只要和平条约不给德国人任何报复的借口，就可以使这种救世主降临说失去锐气，或者转到其他方向。这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我充满希望。我认为，一九三〇年以后的德国，将成为一个淳朴的、勤劳的、和平的共和国，成为欧洲联邦的一个最牢固的保证，我相信这个想法不会错。

瓦斯纳回想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很对，为什么卡约签订的法德协定只是推迟了战争？因为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德国的政治制度。因为德国、奥地利、俄国的目的仍旧是这三国的皇帝、大臣和将军们要达到的目的。这些，威尔逊全都知道。如果不触动条顿人的普鲁士精神，不触动帝国制度的精神，不触动它的称霸野心，不触动它的泛日耳曼主义，那么，战胜德皇就毫无意义了。必须消灭内在的原因，才能使这种制度的精神永远不会复活。这样，一个持久的和平才可靠。

不要忘记，只是德皇的政府反对欧洲，破坏了海牙国际会议。（古瓦朗提供了细节：一致同意限制军备，已经达成了协议，本来可以产生不可估量的结果。但是，在签字的前一天，德国代表接到政府指令，拒绝签字。）正是这一天，德帝国扔掉了假面具。如果当时通过裁决原则，如果德国也象其他国家一样，同意限制军备，那么，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局势就会完全两样，战争或许能够避免。必须记住，只要在欧洲中部有泛日耳曼主义的扩

张制度，对七千万人民保持着绝对的权力，有步骤地鼓励民族傲慢情绪，欧洲就不可能有和平。

9月4日。

从今晨起，胸痛，痛点不固定，一阵接一阵，很难受。（另外，还有其他的不适。）

战报宣布又一次收复了佩龙。我记得八月以来，并没有宣布过佩龙又失守的消息。

接到菲利普的短信，巴黎传言福熙拟同时在三处发动进攻。第一路向圣康坦。第二路向埃纳河。第三路和美军一起，直指默兹。正象菲利普说的：“将来，还会有许多损失……”难道当真需要死这么多人，才能在威尔逊的原则上互相谅解吗？

晚上。

古瓦朗来看望我。他很愤慨，对我说，威尔逊的最新咨文在晚饭桌上引起了争论。差不多一致认为，在战后，国联应该首先是依靠稳定的制度，始终团结文明世界对付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个方式。古瓦朗认为，这种思想已经在所有法国官方人物（从普恩加来和克列孟梭算起）的脑袋里牢牢生了根。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的条件，欧洲就不能实现和平统一，这就是，把德国佬排除在联盟之外。德国是个可恶的种族，是未来战争的温床。只要欧洲还存在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德国，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因此，得把德国监督起来，防止它害人。”

真可怕。如果古瓦朗说的是真话，这就是对威尔逊思想的绝对背叛。借口欧洲的三分之一要对发生战争负责，永远不能信任他们，就首先把他们排除于一个普遍性的联盟之外，这实际

上就是把欧洲的司法组织扼杀在摇篮里，满足于国际联盟变成一幅讽刺画，承认梦想要在欧洲实现英法霸权，任意培植日后流血冲突的萌芽。

威尔逊极其明智，经验丰富，他决不会落入帝国主义者的这个圈套！

5日，星期二。

今天，连站都站不住。我真成了一具还能走动的尸体。下楼梯得花五分钟。

我给慢慢地，有规律地推向死亡。昨夜，又想起父亲弥留之际哼唱的那首儿歌，

快点去呀赴约会！

要把打算留给让一保罗的有关父亲的札记赶快写出来，不要再拖了。

在后方的宿营地，有多少次，能够安安静静地找到一张床，就觉得很幸福了。那时，我曾一连几个钟头躺着，想象着战后，天真地设想将要到来的时光，设想早就决定要过的生活，更为完美、更为勤勉、更为有用的生活……一切本来应该是如此美好！

但是，死亡，死亡，这个固执的想法，在我身上象是一个闯入者，一个陌生人，一个寄生者，一块溃疡。

如果我可能接受死亡的话，一切就会不一样了。但是，那样就必须求助于玄学，而这……

复归虚无竟能激起这样强烈的抗拒，真是怪事。我在想，如

果我相信真有地狱，如果我肯定会罚入地狱，那时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不相信那会比现在更坏。

9月5日，晚上。

少校让约瑟给我带来一本杂志，里面还夹着一个书签带。我翻开来，读道：“战争有各式各样的借口，但是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军队。取消了军队就取消了战争。但是如何取消军队呢？那就要取消专制制度。”这是从维克多·雨果的一篇演说词中摘引的^①。莱蒙在书页边上写道：“一八六九年和平大会”。还加了个感叹号。

谁愿意嘲笑就让谁嘲笑吧。难道因为早在五十年前就有人主张过取消专制制度，限制军备，就有理由悲观失望，认为人类不能终于摆脱谬误？

这几天里，痰比任何时候都多。碎屑物质增加了（脱落的粘膜和假膜）。

9月6日。

今天上午收到了鲁瓦太太的一封信。每年在她儿子去世的日子，她都给我写一封信。

（看到吕班，我常常想起小马尼埃尔·鲁瓦。）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会怎么想呢？我很能想象得出：他伤势很重，就象吕班一样，但是仍旧装做神气活现，迫不及待地要养好伤重返前线。

让—保罗，我在想，将来，到一九四〇年，你二十五岁的时

^① 1869年曾在洛桑召开和平大会，维克多·雨果是大会主席。

候，你会对战争有什么想法呢。那时，你一定生活在重建起来的、实现了和平的欧洲。你能想象什么叫做“民族主义”吗？你能理解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也象你这么大，也是二十五岁的前途远大的年轻人的那种神秘的英雄主义吗？他们就象亲爱的小马尼埃尔·鲁瓦那样，威风地开赴前线。你不要不公平，而要理解他们。不要低估这些年轻人的高尚情操，他们并不愿意死，但是，为了拯救在危难中的祖国，他们甘愿英勇地使生命遭受危险。他们并不都是头脑昏乱的疯子，有很多是象马尼埃尔·鲁瓦那样的人，是甘心情愿牺牲的，因为他们深信他们的牺牲肯定可以为子孙后代——其中也有你，争到美好的前途。对，有很多这样的人。我了解他们。安托万伯伯可以给他们作证。

读报。我军已越过索姆河，到达吉斯卡尔。苏瓦松以北也有进展。收复了库西。我们能够阻止德军在埃斯科河和圣刚丹运河后面立足吗？

7日，晚上。

给让—保罗：

我想到前途，想到你的前途。就是马尼埃尔·鲁瓦那些人所希望的那个“更为美好的”前途。更为美好吗？我为你这样希望。但是，我们留给你们的遗产却是一个混乱的世界。我很担心，当你进入生活的时候，局面是非常混乱。矛盾，不安，新旧力量之间的冲突。要呼吸这样醒戾的空气，非有强大的肺不可。当心！生活的乐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的。

一般来说，我不愿作任何预言。但是，要窥见明天的欧洲，只要考虑一下就够了。从经济上看，每个国家都将贫穷化，到

处，社会生活失去了平衡。从精神方面看，突然与过去决裂，旧的价值观念全都崩溃……因此，很可能发生大的混乱。将会是一个蜕变的时期，危机日益增长，狂热，痉挛，由冲动到衰落，最后又达到平衡，但不会马上恢复平衡。没有阵痛就不会有新生儿。

在那种情况下你会怎样呢，让—保罗？很难预料。人人都自以为掌握着真理，人人都要拿出来自己的灵丹妙药，历来如此。那么，也许会出现一个无政府的时期？古瓦朗是这样认为的，我并不同意。即使是无政府状态，也只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因为人类不会，也不可能走向无政府状态。这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就是如此。人类经过不可避免的动荡之后，只能走向组织化。（这次战争很可能就标志着决定性的一步，即使不走向博爱，至少走向互相谅解。建立威尔逊式的和平之后，欧洲的地平线会扩大起来，全人类团结一致，集体文明的理想一定会取代民族性的理想……）

无论如何，你将看到广泛的变动，是一种改造。我要说的就是，我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公众舆论，引导舆论的主导思想的影响会更增强，起决定性的作用。未来的时代也许具有从来没有的可塑性。个人会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有价值的人将比过去有更多的机会让别人听取其意见，接受其看法，有更多的可能献身于重建事业。

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发展你自己必须具备的个性。不要相信那些流行的理论。摆脱个性这个要求严格的负担很吸引人！卷入集体狂热的广阔运动中也很吸引人！信仰也很吸引人，因为这很方便，因为这最舒服！不过，你要学会抵制这样的吸引力！……这并不容易。路线越是错综复杂，人们为了不惜一切代

价摆脱纷扰，就越是乐于接受任何一个能够使他安心、能够引导他的现成学说。对于摆在面前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稍稍说得过去的答案都可以成为他的避风港，特别是他觉得大多数人都信奉这个学说的时候。这是最大的危险！要抵制住，不要接受那些口号！不要让自己加入什么党派！与其在精神上懒惰，图安逸，通过某些信徒而成为同党，倒不如因为得不到确定的答案而焦虑苦恼！独自在黑暗中摸索，这并不可笑；这样的害处反倒会少一些。最坏的是乖乖地附和邻人们鼓吹的那些谬论。要当心！在这个问题上，让你父亲的形象成为你的楷模！让他那孤独的生活，永不固定、永不安宁的思想成为你忠实于自己、严于律己、忠实于内在的力量以及尊严的榜样。

凌晨，失眠，失眠。

（只要向让—保罗说话，我就爱用“说教式”的口吻。应当抛弃“要当心”之类的字眼。）

要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只忘了一件事：没有告诉他方法。

方法？关于有价值的人，我只接触过一些医生。不过，我觉得一个有价值的人在事态发展面前，在社会生活的现实和意外情况面前的态度，应该与一个医生对待疾病的态度没有什么差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眼光的某种纯洁性。在医学中，现成的知识，书本上的东西，不足以解决每个特殊病例提出的新问题。任何疾病——同样，任何社会危机——都是第一次出现的病例，都没有一式一样的先例，都是一种例外的情况，都需要创造出新的疗法来治疗。要作一个有价值的人，必须有很多想象力……

星期日，9月8日，18时。

今天早晨醒来，咳出了一块大约十厘米的脱落物，我叫人去送给巴尔多检查。

重读昨夜写的日记。还能够对未来，对后世不时发生兴趣，我觉得惊奇。这只是由于让—保罗的缘故吗？

仔细想来，这种兴趣完全是自发的，我虽然不常说出来，却经常想。相反，我之所以惊奇，倒是竭力思考的结果，自省的结果。实际上，思考未来在我完全是经常的精神活动，而且极其自然……真是怪事！

午饭前。

我想起有一则新闻曾使菲利普很震动。（那是我们最早的一次职业以外的谈话，当时，我刚进他的医院。）那是有关一个死囚的事，这人由刽子手的助手揪着，已经被带到断头台铡刀面前，他挣扎起来，对检察官喊道：“不要忘记我的信！”（他在监狱里得知他的情妇欺骗了他，就在行刑的那天早上给法官写了一封信，坦白了一桩尚未受到制裁的罪行，其中那个女人是积极参与者。）

我们都不能理解。一直到最后一秒钟，还对尘世的事务这样耿耿于怀！菲利普认为，这证明大多数人几乎都不能真正“实现”非存在的境界。

现在，这个故事并不象当初那样使我觉得惊奇了。

9月9日。

嘴里有一股臭味。何必再加一种折磨呢？对于那种杂酚油的药水，我从来就没有抱任何希望，它使我想起来牙医；把胃口

都败坏了。

午后，在户外。

早晨，写着这个日期：九月九日，我忽然想起，今天是勒维尔战役的两周年。

晚上。

一整天，我都在回忆勒维尔战役。

天傍黑，我们到了村子。在教堂地下室里安下救护站。村子已成一片瓦砾。昨天，村子里落下了二百多发重磅炮弹。黑夜里，有几处升起照明弹。上校代行旅长职务，把指挥部设在一座只剩下三面墙的破房子里。75 炮在轰响，树林里设了炮位。池塘四周都是断垣残壁。一条红色的鸭绒压脚被，被弹片从中间划开。第二天我就是在这被子旁边受伤的。地面上瓦砾和干土被军车辗出了沟。从地下室被打碎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看到村后的山顶。从山顶上一瘸一拐走下来一批又一批的伤兵，身上满是尘土，脸上带着所有的伤兵们都有的那种温驯恍惚的神情。我看到这山顶，在熊熊大火的天空衬托中显现出来，山脊上支着有铁丝网的木桩，都象被狂风吹歪一般，向一边倾斜着。左面，有一座古老的风车，翼都断了，好象一件压碎了的玩具。（我竟对描写这些东西感兴趣，真是怪事。为什么要描写这些呢？为了不要忘记吗？要谁不忘记呢？要使让一保罗有一天早上能知道，安托万伯伯到过勒维尔……）地下室里天一黑就挤满了人。呻吟声，叫骂声，乱成一团。死人和不能运送的重伤员都扔在顶里面的稻草堆上。祭坛上点着一盏风灯。蜡烛插在瓶子里。拱顶上映出一圈古怪的人影。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张桌子，那是两个水

桶上面支起的几块木板，上面放着绷带纱布。我又看到了整个景象，仿佛那个时候我还有时间观察，以后好记住似的。当时我工作起来，真是如醉如痴，这是一种职业的乐趣，真是全力以赴。动作迅速，同时又最大限度地控制着自己。一切知觉象奇迹般的警醒，意志贯通了四肢，一直传导到指尖。也感觉到一种苦恼，同时，又象机械人似的无知无觉。支持着自己的是要达到的目的，要干的工作。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看，全心全意地工作。有条不紊，敏捷麻利，不慌不忙，一秒钟也不浪费，每个动作都是必要的，给伤口消毒，及时缝合一条血管，使骨折的部位暂时固定。然后，“下一个！”

我好象又模模糊糊地望见了那种挡雨披檐，车库，在那儿，他们把伤兵安置在担架上，放在小巷的另一边。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小巷，在那儿必须贴着墙走，因为有流弹。子弹吱吱响着从耳旁擦过，打得泥土墙哗啦啦直响！留着胡子的小个子少校眼里直冒怒火，一条胳膊吊着三角巾，另一只没有受伤的手直往太阳穴旁边挥动，好象轰苍蝇似的，“苍蝇真多，这儿苍蝇真多。”（我忽然想起那个花白胡子的老兵，他把我们一直送到龙贝雷高圣战地医院，他那副凄惨的模样，用巴黎郊区的口音叫一个伤兵从担架上下来：“下来吧，人家叫你哩！”）

一整夜，我们都在工作，根本没有想到迂回运动。黎明时分，来了一个联络官。村子遭到侧击，交通壕里已经很危险了，必须冒着机关枪扫射，穿过空场，到那唯一还可以通行的壕沟去。这时，我一点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会有危险。突然我倒了下来，正好看到那条红色的鸭绒压脚被，心里还清醒地想到：“肺部打穿……没有触及心脏……我会脱险的。”

（事情就出在这里……如果那天早上，我是腿上或胳膊上受

伤,就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后来,吸入的芥子气并不多,如果我的两肺未受伤,是不会有这样严重的后果的。)

9月10日。

从昨天开始,一直在回忆战争。

我要向让—保罗说说那些伤寒病人的情况。我在前线治疗这种病人的时间比其他同事们都长。那是一九一五年冬天,我一直在贡比涅团。这个团当时在诺尔省前线。但是,各营的军医有个轮换制度,每隔半个月左右,我们每人到六公里的后方去领导一个小收容所——是个有二十来张床位的医疗站。有一天晚上,我到那儿去了。有十八个病人躺在拱顶的地下室里,都在发烧,好几个竟达四十度!……我借着灯光检查了一下。毫无疑问,十八个都得了伤寒。按照规定,前线不许有伤寒病人。实际上,即使得了伤寒,也不许诊断为伤寒。当晚,我就给四道杠的医官打了电话。我报告说,这十八个人象是得了严重的肠胃病,很象是副伤寒(我还小心地避开伤寒病这个词)。我真诚地拒绝领导这个医疗站,因为如果这几个可怜的家伙不立即撤离,就一定会死在这个地窖里。第二天凌晨,他们派我坐车去见长官,我被召到师部去,我跟领导争了一通,一直到他们同意我马上撤离。但是从这天起,在我服役期间,就有了某种“档案记录”,就因为这个,我一直到受伤,始终未能晋升!

晚上。

我想到我与这里的其他人的关系。这里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使人想起前线的情况。不,跟前线完全不能相比。在这里,只是普通的伙伴关系,没有别的;而在前线,只要偶尔在一个灶

上吃顿饭，就成了兄弟。

我想起那些我认识的人。这些回忆是悲惨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改了样子，缺胳膊断腿，有的丧失了性命……卡尔里耶，布罗尔，朗贝尔和老实的达兰，还有瓦尔，莱斯纳，穆拉东，现在他们都在哪里呢？还有索纳，小诺卜，还有很多别的人呢？他们中间有几人能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未曾受伤呢？

今天，我想到战争的时候，感觉与通常不一样。但以理在庄里曾对我说过：“战争是一个人与人与人之间结成友谊的非同寻常的机会……”（是转瞬即逝的友谊，也是个可怕的机会！）不过，他说的还是有道理，有一种互相之间的怜悯、宽容和温情。在共同的恶运中，人人终于只剩下最简单的反应，大家的反应都一样。不管是不是军官，都受同样的奴役，都受同样的痛苦，都同样烦恼，同样恐惧，有同样的希望，踏着同样的泥泞，时常吃着同样的饭，看着同样的报纸。战场上比别处机谋、卑劣和恶意要少一些。互相之间需要支持。人们爱别人，帮助别人，是为了为人所爱，好接受别人的帮助。个人之间的对立很少，也没有嫉妒（在前线）。没有仇恨。（甚至对于对面的德国鬼子也没有仇恨，他们也是荒谬行为的牺牲品。）

还有一点：由于形势所迫，战争是一个沉思默想的时刻。无论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未受过教育的人都一样，在战争时期都可以进行单纯的、深刻的思考。大体上人人如此。也许是因为每天都濒临死亡，连最不善于思考的人也被迫沉思起来了。（我的这个本子就是一例……）在我的那个营的朋友们中间，没有一个我没有在某一天撞见他正在沉思的。这孤独的、自省的沉思，是人们养成的一种需要，然而，人人都掩藏起来。这是人们留给自己的唯一的角落。在被迫的违反人性的行为中，沉思是个人

最后的藏身之地。

对于那些死里逃生的人，这种沉思以后会留下什么结果呢？也许没有什么重大的结果。总之，是强烈的生存渴望；对于无谓牺牲，对于冠冕堂皇词句，对于英雄主义的厌恶？或者相反，是对于战场“道德”的留恋？

11 日。

前几天早上咳出的脱落物，经过组织学检验，不是假膜，而是一部分粘膜。

晚上。

其实，我思考生的时间并不少于思考死。我不断地回顾往昔，在那里搜寻，就象一个捡破烂的翻垃圾箱一样。我用小钩子钩过来一些碎屑残片，审视着，询问着，对着它们冥想不已。

一生，只有这么一点东西……（并不是我的生命缩短了，我才这样想的。整个的一生的确就是如此！）平庸之至！只是漫漫长夜中一道短暂的闪光，等等。能有几个人知道人们反复说的都是些陈词滥调呢？能有几人感到了其中的悲怆呢？

总是不能完全摆脱这个毫无用处的问题：“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自己，每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候，我总常常突然会问自己：“这又有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也没有。完全没有。人们很难接受这一点，因为十八个世纪以来，基督教已经深入骨髓。然而，越是深入思考，越是观察自己和自己的周围，就越容易发现这个明显的真理：“什么意思都没有。”无数生物，在地壳上形成，蠢动一会儿，然后腐烂，消失，把位置让给另外的无数生物。而明天，这些生物也

要纷纷解体。它们短暂的出现没有任何意义。生命没有意义。除了力求在这短促的逗留期间尽可能少遭不幸之外……什么都无关紧要……

领悟到这点，并不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令人失望，令人泄气。会觉得清除了，超脱了一切幻想，而某些人企图不惜一切代价使生命有意义，正是想用这些幻想来哄骗自己。清除了幻想之后，就会奇妙地感到恬静、力量和自由。如果能够善于掌握，这甚至会是一种相当令人振奋的想法……

我忽然想到二号楼底层那间游戏室，当年，我每天上午离开医院时都要穿过的。我仿佛又看见那里面满是爬来爬去的孩子，正在玩积木。有的孩子得了不治之症，有的残废，有的正在生病，有的正康复。有的发育迟缓，有的是半白痴，也有的非常聪明。总而言之，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是通过望远镜的大镜头一面看见的人类……很多孩子只是胡乱翻动面前的积木，把每一面颠来倒去。有的比较机伶，把颜色配搭起来，把木块排齐，组成几何图形。还有一些孩子更为大胆，搭起了小小的摇摇晃晃的建筑物。有时候，有个孩子专心致志，有发明的雄心，给自己规定了困难的任务，经过十来次的失败之后，终于搭成了一座桥，一个方尖纪念碑，一座高高的金字塔……到了游戏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就崩塌了，亚麻油毡上只剩下一堆堆散乱的积木，等着明天的游戏时间。

总而言之，这很象生活的缩影。我们每个人除了游戏之外，没有其他目的（无论给予自己多么动听的借口），按照自己的一时之兴，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把生活向他提供的种种条件集合起来，就象堆积当时他周围的五颜六色的积木那样。最有才能的就设法将他的生活搭成一个复杂的建筑物，一个真正的艺术品。为

了使游戏尽可能有趣，必须尽力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每个人采用自己的方式。每个人利用偶然向他提供的因素。这样，他的方尖纪念碑或者金字塔搭得成功与否当真非常重要吗？

同一夜。

我的孩子，昨晚写了那些话，我很后悔。你看到之后，会起反感，会说：“这是老头儿的思想，快死的人的思想……”显然，你说的对。我不知道正确的答案在哪儿。应该有别的、不那么消极的答案，来回答你也一定会提出的问题：“生活，工作，发挥最大的能力，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为了过去和将来。为了你的父亲和你的儿子，为了你自己——这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要保证世系延续……接过来，传下去——经过改善，加以丰富，传下去。

也许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理由？

9月12日，早晨。

我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能力平平，还可以与生活对我的要求保持和谐。才智寻常，记忆力和吸收能力一般。我的气质很平常，其余的都是伪装。

午后。

健康，幸福，都是遮眼罩。疾病才能使人清醒。（要深刻地了解自己 and 了解人类，最好的条件就是生过病，然后恢复健康。）我非常愿意这样说：“从来都健康的人必定是个傻瓜。”

我只是个平庸的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化，我的文化只是职

专业性的，局限于我的工作。大人物，真正的大人物不受他们的专业限制。伟大的医生，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数学家，伟大的政治家，并不仅仅是医生、哲学家等等。他们的大脑可以在其他领域自由活动，可以发展到他们的专门知识之外。

晚上。

关于我自己：

我只不过是个幸运儿。我选择了我最易成功的事业。（这也证明了我还有点实际的智力……）然而，是一种平凡的智力，相当平衡，刚够用来利用有利的条件。

我盲目骄傲地过了一生。

我以为我的一切都要归功于我的大脑，我的毅力。我以为是我自己创造了我的命运。我的成绩，我当之无愧。我以为我是第一流人物，因为我已经作到让不如我的人对我这样评价。其实都是伪装，我连菲利普都骗过了。

幻想，错觉，都是不长久的。显然是生活没有使我遭到重大的失望。

我本来也只能是个好医生——跟很多人一样。

9月13日。

今天早晨，咳出了粉红色的痰。十一点，躺在床上等着约瑟来拔火罐。

我的房间，就是一个小小的、丑恶的世界，其中的每个细枝末节我都了如指掌，熟悉到了厌恶的地步。每一颗钉子，每一颗钉子的痕迹，粉红墙上的每一道擦痕，我的眼睛都在上面看过千百次！还有那几个贴在镜子上面的舞女！（如果我叫人把她们撕

掉，我也许还会觉得缺些东西哩！)

躺在这张床上，一小时又一小时，日以继夜。我，这样活跃的人！

行动。我以前不仅是活跃。我以前曾狂热地、天真地崇拜行动。

(不要过于不公正地对待以往的活动，我的知识，都是行动教会我的。我亲身体验了真实。我在行动中得到了塑造。甚至，战争这个地狱，我之所以如此坚强地经受下来，就是因为它迫使我不断地行动。)

午后。

其实，我本来应该当外科医生。我是以外科医生的气质来从事医生工作的。要完全当个好医生，应该同时能是个善于沉思的人。

晚上。

我又回想起往日那些出色的活动。很有些严格。我现在觉察出其中有的成分——一个成分——是矫揉造作的。(面对自己时比面对别人更为严重，或至少一样严重。)

我的弱点在于，总是需要别人赞赏。(我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承认这一点，让一保罗！)

我多次发现，必定要有别人在场，我才能干得最起劲。感觉到有人在看我，评价我，欣赏我，才能刺激我发挥出我全部才能，激发我的勇气和决断精神。觉得自己强而有力，我的意志才不可抗拒地奋发起来。(例如：佩龙轰炸的时候，蒙米拉耶的战地医院——布吕雷树林里的袭击，等等。另外的例子：入伍以前，

在医院里，当着同事们的面，比我独自一人在诊疗室只对着病人，无疑诊断起来就更敏锐，治疗起来也更果敢。）

我今天意识到，真正的毅力并不表现在这里，真正的毅力不需要观众。而我的毅力却要别人在场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如果我一个人生活在鲁滨逊的荒岛上，我也许活不下去，只有星期五^①来了之后，我才能做出英勇行为……

晚上。

要发挥你的意志，让一保罗。只要你能有意志，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14日。

病又复发，除了别的不适之外，还加上胸部疼痛。原因不明的痉挛。胃里存不住任何东西。未能起床。

古瓦朗把他的报纸给我送来。在瑞士，人们在谈论奥匈方面所提的和平建议(?)以及德国暗中的革命运动(?)……由于威尔逊的咨文，在这些国家，莫非民主思想取得了进展？

美国军队向圣米耶尔方向推进的消息更加证实了。圣米耶尔也就是通往布列依和梅斯的路！而我军已进抵自称不可逾越的兴登堡防线。

9月16日。

稍有好转。不再恶心。这两天进食太少，身体非常虚弱。

① 《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人物，被鲁滨逊拯救的一个土人，成了鲁滨逊孤独生活中的伴侣。

克利孟梭答复了奥方透露的和平意图。傲慢无礼，骑兵军官的口吻。甚至更坏：泛日耳曼主义者的口吻。最近接连取得军事胜利的成效马上就表现出来了：一旦有一方认为占了优势，立刻就把它暗中的盘算暴露无遗，都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只要协约国军队的胜利不单单是美军得到的，威尔逊就要费尽力气与协约国政治家作斗争。协约国本来有机会堂堂正正地提出它们的要求，但是却要虚张声势，漫天要价，唯恐得不到按照规定在和平解决时能够向战败国榨取的全部东西。古瓦朗说：“稍获成功，协约国就忘乎所以了。”

17日。

他们打算怎么办，可以向我说明白。支气管肺炎不断复发，一直被他们看作肺部感染复发的一种形式。

18日。

巴尔多作了长时间的检查，接着，塞格尔来诊断。心脏右部机能明显衰退，呈现青紫色，血压过低。

几星期前我就预料会有这个结果。还是老一套：“肺部有病，保住心脏。”

男护士的特点：有紧急事叫他来，总是叫不来；他在这儿讨厌得叫人受不了的时候，却待在房里不走。

19日，夜间。

生生死死，永不间断的发展。等等。

今天下午，跟瓦斯纳一起研究香槟地区的战况地图。我忽然想起那白茫茫的原野（在夏龙东北的某个地方），我一九一七

年六月调换岗位，我们在那里休息吃饭。那里的土地被战争初期的炮火深深翻了起来，什么都不长了，甚至连一根狗牙根草都没有。然而，那正是春天，离前线已远，而周围地区都恢复了种植。离我们宿营的地方不远，在这一片白茫茫的荒原中间，有一小块绿洲。我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德国人的一个墓地。一座座坟墓都与地相平，湮没在深草之中。在那些年轻人的尸体上，长着茂盛的燕麦，野花。还有蝴蝶。

平凡之极。但今天回忆起来，比当时心情更为激动。整个晚上，我想着这个盲目的大自然，但又不能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

9月20日。

圣米耶尔前线的胜利。进攻兴登堡防线的胜利。意大利境内的胜利。在马其顿的胜利。处处都胜利。但是……

但是，付出了多么大的损失的代价？

这些还不算。我们一感到比对方强大时，协约国的舆论的口气立刻就变了，看到这些，怎能不叫人担心呢？巴尔富、克列孟梭和兰辛拒绝了奥地利的建议，毫不让步，这也就迫使比利时拒绝了德国的建议！

古瓦朗来访。不，我并不觉得战争会那么快结束。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并且使俄国这个泥足巨人站稳脚跟，还得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我们的胜利越大，我们就越不甘心建立和解的和平，唯一持久的和平。

跟古瓦朗争论进步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但也毫无用处。他说：“那么，您不相信会有进步？”

有，有，当然会大有进步！但是，在几千年以内，不用对人类抱任何希望……

21 日。

在楼下吃了午饭。

吕班，法贝尔，雷蒙，尽管意见各不相同，但都是狭隘的宗派主义分子。（瓦斯纳提到少校时说：“我很难相信大自然给了他一个大脑。如果发现他只有一条脊髓，我决不感到奇怪。”）

给让—保罗：

真理，只有暂时的。

（我还记得有一个时期，人们以为灭菌剂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杀死细菌。”可是经常发现杀死细菌的同时也把活的细胞杀死了。）

摸索，犹豫。对什么都不能绝对肯定。任何道路走到底都是死胡同。（在医学科学中，这种例子屡见不鲜。我见过不少人，有同样的能力，有同样的聪明，对真理也有同样的热情，对同样的现象进行研究，进行完全一样的临床观察，却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有时甚至截然相反。）

趁年轻的时候，医好绝对肯定的毛病。

22 日。

胸部疼得很是难受，在什么地方安顿下来，我就没有勇气再走动。巴尔多曾说，这种乙基对氨基苯甲酸软膏有神效。其实，一点效果都没有。

9月23日。

他们再也找不出什么地方给我进行灸疗了。我的上身象漏勺一样全是小孔了。

25日。

从昨天开始，体温又大幅度地升降不定。

不过，我还是试图下楼去，可是在楼梯口觉得一阵头昏，不得不回来又躺下。

这个房间，这粉红色的墙壁……我闭上眼，什么也不愿看见。

我想到战前，想到那时的生活，想到我的青春时代。我力量的真正泉源，是一种暗中的、永不变更的对未来的信心。甚至还不止是信心，而是一种确信。往日的一片光明变成了今日的一片黑暗，这就是每时每刻在折磨着我的痛苦。

恶心。新来了三个病人，诺泽和巴尔多被耽搁在楼下，是马泽今天下午到楼上来了两次。我再也受不了他那粗鲁的态度，殖民军老军人的嘴脸。再加上总有一股汗臭，我简直要吐了。

9月26日，星期四。

夜里情况很糟。听诊时，又发现了亚捻发音的新病灶。

晚上。

打针后，稍觉轻快。能轻快多久呢？

古瓦朗来了一小会儿。他使我感到厌烦。法美联合展开攻

势，英比联合在进攻。德国在各条战线上退却。巴尔干战线上，协约国军队也取得了胜利。保加利亚要求停战。古瓦朗说：“保加利亚一实现和平，就是预示战争的结束：女人一流出羊水，怀孕期就告终……”

在德国，发生了争吵。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参加政府的具体条件。德国首相在演说中隐约承认全国存在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

太好了。事态发展得如此之快，简直叫人有些惶恐。土耳其已被击溃，保加利亚和奥地利正准备投降。到处都取得了胜利。和平的力量象旋涡一样势不可当。叫人看得眼都花了。欧洲是不是成熟到了能够建立真正的和平呢？

在格拉斯大饭店，有个美国人拿出一千美元来赌一个路易，说战争会在圣诞节^①结束。

那些能活到庆祝圣诞节的人们真是幸福啊！

27日。

更加衰弱。窒息。从星期一起，完全失音。巴尔多带塞格尔来看病。作了长时间的检查，他不象平常那样冷淡了，是惊慌了吗？

晚上。

化验了痰，虽然打了有特效的血清，还是出现了肺炎双球菌，链球菌更是越来越多。这是一种特殊的中毒性感染。

明天上午作透视。

^① 原文为英文 Christmas。

28 日。

十分明显的全身感染症状。巴尔多和马泽一天上来好几次。巴尔多决定，X射线检查之后，马上作穿刺检查。

他担心什么呢？怕柔软组织的脓肿吗？

十月

10 月 6 日。

又过了一星期。

还很衰弱，不能写字。似睡非睡。又拿起这个小本子，觉得有点愉快。甚至，又看到了我的病房和那些舞女，也觉得高兴。

又一次逃脱了吗？

10 月 7 日。

这一个星期，没有摸过日记本。现在力气恢复了。体温终于降下来，早上正常，晚上是 $37^{\circ}9$ 或 38° 。

大家都以为我完了。后来却不然。

三十日星期一被抬到格拉斯的诊疗所。下午由米卡尔动了手术，手术时塞格尔和巴尔多都在场。右肺严重脓肿。幸亏面积不太大。手术五天后又把我送回穆斯吉埃了。

上月二十九日穿刺之后，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呢！我没有想到。（这的确是真的！）

10 月 8 日，星期二。

不象以前那么衰弱了。我本来觉得他们从死里把我拉回来，

对我实在是件憾事。其实不然，我怀着一种怯懦的愉快心情接受这又一次的间歇……

几天不看报，无法了解时局。我还不知道德国的内阁已经辞职。那边一定是发生了严重情况。瑞士报纸说巴登的马克斯被任命为首相，负责和平谈判。

10月9日。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甚至根本没有自杀的念头，只是回到这个房间之后才想到的。从诊断出脓肿到动手术这段时间，我只想一件事：赶快动手术，希望手术成功。

还有更丢脸的事呢：在格拉斯的那几天，我一直后悔把琥珀项链留在这里了。我甚至决定一回到这里就把这事告诉巴尔多，要他答应把项链放在我的棺材里！

我现在不知道我是否还要这样做。这不过是垂死的人的孩子气的想法。如果我向这种诱惑让步，孩子，不要那么快地对我下评语，不要轻视安托万伯伯。这串项链使我回忆起一段可怜的爱情，但是无论如何，这段可怜的爱情在我这可怜的一生中还是最美好的一部分。

10日。

米卡尔来复诊。

10月11日，星期五。

昨天，外科医生来，使我很累。他把一切细节都告诉我了：严重的脓肿，粘连，由非常强韧的纤维状组织隔开。脓液很稠，有粘性，发现肺部严重水肿。细菌检查：有链球菌增生。

米卡尔对我这个病例很感兴趣，因为这比较少见。一年间，在这里治疗的七十九个中芥子毒气的病人中，只有七个是单纯性脓肿，其中就有我一个。有四个手术成功了，另外三个……

幸而复合性脓肿更为少见。不能动手术。在七十九个中毒气的人中只有三例，这三人都死了。

我还算运气。(不知不觉写出了这句话。如果我有时间考虑，肯定是不不会写的。不过，既然写了，我就不再涂去。我大概还没有对生活完全淡漠，还不能把延长受苦的时间叫做“没有运气”……)

10月12日。

昨天下午又起床了。更见瘦削。从九月二十日以来，体重减轻了两公斤四百克。

心脏不断衰弱。每天服用两次洋地黄甙和茅膏菜制剂。出汗不已。又难受又衰弱，干咳和窒息同时发作。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这几天会诚心诚意地回答：“还不错……”

13日。

瑞士报纸报道了德国新内阁向威尔逊进行间接活动，谋求开始谈判的一些可信的细节。他们公开要求立即停战。这是可信的，因为德国的首相最近一次在国会的演说里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和平建议。德国，昨天还是那样的不可一世！

但愿协约国不要作得太过分！但愿他们不要抵制不住诱惑，希图胜利得过了分……到处已经表现出胜利的赛马的骑师那种威风！我敢说，吕梅尔自己就忘记了今年春天他还设想着更坏的情况，而今天，大概再也没有比他更不肯迁就的胜利者了。

法国报纸上经常出现“喜气洋洋”这个词，真使人反感。应该说“熬出了头”，而不是“喜气洋洋”！怎么可以这么快就把欧洲现在仍在承受的大量的痛苦统统忘掉呢？任何东西，甚至连结束战争在内，也不能消除目前的以及将来仍旧存在的痛苦。

10月14日，夜间。

又开始失眠。我突然发觉，我很惋惜犯病时那种似睡非睡的状态。现在，脑子空空，衰竭已极，总被“幽灵”纠缠着，尚存的意识只够感受到痛苦。

我本来想在这个本子里给让—保罗描绘一下我自己的形象。但是，刚开始写，就已经不能集中注意力，坚持不下去，无法工作。又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一切已经淡漠，这种淡漠蔓延开来，越来越大。

15日。

总反攻。到处传来捷报。各条战线同时获得胜利。仿佛是，自从谈到和平以来，协约国军队的统帅想一口吃个双份，以后再慢慢消受。谁落后谁就倒霉……

今天略好一些。很愿意写一点东西。

瓦斯纳来访，他的脸象菩萨似的，扁平，两眼的距离很宽，眼眶很浅，眼皮厚厚的，弯弯的，象肥厚的花瓣（木兰花或是山茶花）。大嘴巴，厚嘴唇，动作迟缓。脸相充满了智慧，看起来很舒服。有一种完全远东式的宿命的宁静。

他说，关于各国参谋部的想法，他了解一些最新情况。很令人不安。他们以为可以依靠美国的所谓用之不竭的“资源”，于

是，一切损失都在所不计了。而且在暗中抵制和平，拒绝停战。想入侵德国，在柏林签定和约……瓦斯纳说：“他们想的是胜利，而不是结束战争。”越来越公开地反对威尔逊，甚至宣称“十四点”只是威氏个人的观点，协约国从来没有正式认可云云。瓦斯纳对我说，自从七月取得最初几次军事胜利以来，报纸（经过新闻检查的）有时候还谈到“国联”，但是，再也不谈“欧洲合众国”了。

晚上。

瓦斯纳给我留下了几期《人道报》。现在，大家都赞赏美国总统的历次咨文，我国的社会主义者却摆出这么一副卑贱相^①，真使我惊异。完全是狭隘偏私的宗派分子口吻。从这些分子，从这些人物中间，不会产生任何伟大的东西。这些欧洲的社会主义政客，应当倒在旧世界的垃圾当中，跟其他的废物一起清除掉！

社会主义。民主。我在想，菲利普说的也许有道理，各战胜国的政府四年来已惯于专制，现在会不会放弃专制的习惯呢？以克列孟梭为代表的（共和）帝国主义在退出舞台之前大概要挣扎一番吧！也许，未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温床将首先在战败的德意志建立起来。因为它是战败国。

16日。

① 饶勒斯被暗杀以后，《人道报》由社会沙文主义者掌握，直到1920年图尔代表大会之后，《人道报》才成了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这个星期稍稍有些好转。

古瓦朗给我找到了二十七日咨文的全文。比起以前的，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内容，但是和平的宗旨说得很明确。“这场战争准备了一个新的秩序，云云。”只有各国人民的大团结，才是集体安全的保证。我是一个缓刑的死人，看到这些话在我身上起的反应。我就能想象到千万个战士、千万个妻子和母亲的感受。唤起这样的希望是不会徒劳的。现在，协约国的各国领导人是否真诚赞同威尔逊的原则已经无关紧要。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全民一致的压力将会如此强大，到了适当的时刻，欧洲的任何政客都无法躲避人人期待的和平。

我想到让一保罗。想到你，我的孩子。我感到无比宽慰。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你将看到这个世界巩固起来。你将为此贡献力量，要坚强有力，为了更好地贡献出你的力量！

17日，星期一。

威尔逊对德国的试探作了严厉的批驳。他明确要求，在任何谈判之前，首先要摧毁德意志帝国主义，清除军人集团，进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显然，这样就有可能推迟和平的到来。但是，这种毫不姑息的态度是绝对必要的。不能忽视根本的宗旨。问题不在于得到一个尚未成熟的停战或仅仅要德皇投降；问题在于进行普遍裁军，并且建立欧洲联邦。如果德奥两个帝国不消灭，这几个宗旨是不可能实现的。

古瓦朗很失望。我为威尔逊辩护，反驳古瓦朗和其他的人。威尔逊是一个英明的实干家，他知道感染病灶的所在，在包扎之前先要把脓肿清除干净。

说到脓肿，善心的大个子巴尔多解释芥子毒气只是引起脓

肿的偶然原因。其实，它是一种继发性的感染。细菌趁着毒气引起的充血性病变侵入肺体，引起了这种感染。

10月18日。

今天，很难克制我的疲劳。除了报纸之外，什么都不能看。

协约国报纸谈到我们“胜利”的那种口气，就象雨果的关于拿破仑的史诗……这场战争（任何战争都一样）一点英雄史诗的味道都没有。这场战争是野蛮的，是绝望的。它就象一场噩梦，结束的时候，惊恐不安，浑身冷汗。它能够激起的英雄行为终于都被淹没在恐怖之中了。那些英雄行为都是在战壕深处，在泥污和血泊中作出的，既有孤注一掷的勇气，也有把可厌的事干到底的憎恶。这场战争只能留下丑恶的回忆。军号齐鸣，向军旗致敬，也改变不了这场战争的性质。

21日。

两天来情况不好。昨天晚上，向气管内注射山捻油剂，但是喉部浸润和感觉过敏使操作很困难。三个人合作，才把事情做完。可怜的巴尔多直出大汗。我睡了三个小时，今天觉得轻松一些。

10月23日，星期三。

新的洋地黄甙制剂好象有一些疗效。

我发现，当我不完全失音的时候，我就经常口吃。以往，这是不常见的。这一向是意识混乱的一种征象。今天只不过是体力衰弱的一种表现。

看报。比利时的军队已打到奥斯坦德和布鲁日^①。英军打到里尔,杜埃,鲁贝,图尔昆^②。所向无敌。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换文却缓慢得令人失望。不过,威尔逊好象还是迫使德国答应了改革帝国宪法和建立普选制度作为先决条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接着,就要使德皇退位。是明天还是半年以后?报界强调德国内部的混乱。我们不要受骗。德国发生革命可以促使事态迅速发展,但是也可以使事情复杂化。因为威尔逊好象决定只跟十分稳固的德国政府打交道。

10月24日。

不,我不羡慕病人们通常的无知,以及他们天真的幻想。关于医生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死期将近,人们说了许多傻话。我反倒觉得正是这种清醒帮助我坚持下来,也许还能够帮我支持到最后一刻。知道,并不是不幸,而是一种力量。我知道。我知道这里面发生的一切事。我的病变,我看得见。我也感到兴趣。我一直注意着巴尔多所作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好奇心对我是个支持。

我真希望能更进一步分析这一切,然后,写信告诉菲利普。

24日,夜间。

这一天还可以。(我已经没有权利苛求了。)

又拿起本子,抵制“幽灵”。

早晨三点钟,很长时间睡不着,一直在想一个人的死亡会将

① 比利时的两个城市。

② 法国的四个城市。

一切都带入遗忘。我起初想起这个，就完全绝望了，仿佛这想法非常正确 其实不然，完全不正确。死亡只能将很少的，非常少的事带入虚无。

我耐心地极力搜索记忆。犯过的错误，不为人知的艳遇，稍稍问心有愧的琐事等等。对于每件事，我都自问：“这件事难道真的会跟我一起完全消失吗？除了在我身上以外，在别处真的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我苦苦地思索了近一个钟头，极力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找出一点什么，找出一个稍许特殊的行动，而我确信，这个行动除了在我的记忆中之外，在别的任何地方已经不留一点痕迹，没有任何延续，没有任何物质或精神的后果，在我死后，也没有任何思想的萌芽，可以在另一个人的记忆中萌发。但是，我回忆起来的每件事，都能找到一个人来作证，都有一个人知情或者甚至能够推测出原委。这个人也许现在还活着，而在我死后，总有一天，凭借模糊的记忆，他会……我在枕上翻来复去，为不可解释的惋惜和屈辱而痛苦。我想，如果我找不到这样的某件事，那么我的死就是一个笑话了。我甚至不能傲然地把仅仅属于我而不属于任何别人的东西带归虚无，从而得到一点安慰。

突然，我找到了！在拉埃内克医院，那个阿尔及利亚小姑娘！

我终于找到了这个回忆！我敢肯定，只有我还保留着这个记忆！我一旦不复存在，它就没有，没有任何痕迹，绝对没有任何痕迹还存留在世上！

凌晨，累得筋疲力尽，又不能入睡。只迷迷糊糊打了一会儿盹，马上又被一阵咳嗽惊醒。

一整夜，都纠缠在这个幽灵般的回忆中。我一方面想在这

个本子上写下我的忏悔，为了从虚无中抢救出这个很难说清楚的故事，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急切地渴望只由我自己保留着它，至少有这样一个秘密由我带着一起死亡。我无所适从。

不，我什么都不写。

10月25日，午间。

是精力衰竭，是纠缠不休的思绪，还是开始了说胡话？从昨夜开始，我只是从那个秘密的角度来想到死亡，我想到的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我的灭亡，而是想到拉埃内克的那段回忆将要消失。（约瑟来对我谈到和平，“医官先生，我们马上就要复员回家啦！”我回答道：“约瑟，我马上就要死啦。”但我内心的思想却是：“关于这个阿尔及利亚小姑娘的事，马上就一点痕迹也没有了。”）

就这样，我仿佛成了我命运的主宰。就这样，我胜过了死亡，因为这个秘密是否避免化为虚无，完全取决于我，取决于我是不是写出一段笔记，取决于我是不是把它告诉随便什么人。

午后。

我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古瓦朗。当然说得并不清楚，甚至没有提到那个阿尔及利亚小姑娘，甚至没有说埃拉内克医院的名字。正象那些心里憋着一桩秘密的孩子，对每个人都大声喊：“我知道一件事，但是我不说。”古瓦朗对着我看，有些不安，也有些惊恐。他显然在想我是不是疯了。我却感到——也许是最后一次吧，我的傲气得到极大的满足。

晚上。

试图翻阅报纸来使脑子休息。在德国也是如此，军人集团企图破坏和平。据说鲁登道夫带头发起了反对首相的运动，公开指控他想跟美国人谈判就是叛国。但是，和平的潮流锐不可挡，鲁登道夫自己倒不得不辞去统帅职务。这是好兆头。

古瓦朗来访。巴尔富发表了令人不安的谈话，英国的胃口给引起来了，如今想并吞德国的殖民地！古瓦朗对我提起，去年罗伯·塞西尔勋爵还在下议院宣称：“我们进入这次战争，没有一点帝国主义的征服意图。”（他们结束战争时跟进入战争时可不一样了……）

幸亏，还有威尔逊在。人民必须有自决权。我希望，他不要让战胜国瓜分黑人，象瓜分牲口似的！

古瓦朗和殖民地问题。他很明智地论证，协约国如果克制不住要瓜分德国的殖民地，那就会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是唯一的机会，可以大刀阔斧地重新解决整个殖民地问题。应该在国联的监督下，组织起来，大规模地共同开发全世界财富。这是和平的保障！

26 日。

病情突然严重。整天都感到窒息。

27 日。

我窒息的性质逐渐起了变化，痉挛性的。非常难受。喉头收缩，好象被一只手紧紧掐住。不但是窒息，而且有被勒住的感觉。

花了将近一个钟头在记事本上把病情恶化的进程记下来。（我不敢肯定还会有很长时间能够逐日记录。）

28 日。

小马里于斯上楼来给我送报纸。我感到惶恐。(他那光洁的面容,明亮的眼光,青春的气息……对他的健康状况漠不关心的美妙风度!)我现在只愿意看见老年人和病人。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一个被判死刑的人会向看守扑去,把他掐死,就是为了不愿意看到一个自由的、健康的人……

身体机构衰败得越来越快。除了智力活动之外,什么都不能做,就连智力活动,也……一定减弱了许多,而自己却没有察觉。

10 月 29 日。

如果在这样的自省中,我能回忆起我有过书上所说的那种“伟大”的爱情,我是不是就不象现在这样遗憾了呢?

我还在思念拉歇尔,经常想到她。但只是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作为一个病人才这样想的。我想,如果她在这儿,我能够死在她的怀里,该多么好。

在巴黎,我得到这串项链的时候,我是多么激动!然而,现在对她的这股激情也完结了。

我曾经“爱”过她吗?无论如何,我没有爱过别人,对别人不象爱她这样深沉,不象爱她这样炽热。但是,难道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吗?

晚上。

两天以来,洋地黄甙已经完全不起作用,巴尔多立即要回过头去试验注射樟脑油剂。

30 日。

几位医生来复诊。

我看着他们忙来忙去。生活还给他们留下了些什么呢？也许，享有特权的，倒是我。

厌倦。对我自己感到厌倦。厌倦——甚至想现在就结束！

我看得出，我使他们害怕。

最近几天我一定是模样大变了。病势发展很快。我的面容大概象窒息而死的人那样，一脸苦相……我知道，再也没有更难看的了。

10 月 31 日。

附近的指导神父想见见我。星期六他已经来过一次，但是当时我太难受。今天我让他上楼来。他的拜访使我很疲倦。他想问我一些问题：“您作为基督教徒的少年时代是怎样过的，等等。”我回答他说：“如果我生来需要了解真理，不可能有什么信仰，这不能怪我。”他建议给我拿来“圣书”。我对他说：“教会不谴责战争，还在等什么呢？你们法国和德国的主教都给军旗祝福，并且唱感恩赞美诗，为这一场大屠杀来感谢上帝，等等。”他的回答使我目瞪口呆：“正义的战争使基督徒解除了禁止杀人的戒律。”（多么正统。）

他满心愿意让谈话的气氛友好一些，但不知道该怎样对付我。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您看，一个象您这样有身分的人，总不能甘心象狗一样死去！”我对他说，“我就是象狗一样，没有宗教信仰，又有什么办法呢？”他已经走到了门口，又好奇地看了看我。（目光里有严厉、惊异和悲哀，我觉得，也有温情。）“您为什

么诽谤自己呢？我的孩子？”

我相信他大概不会再来了。

晚上。

如果可以使什么人高兴，我勉强可以同意他的意见。可是，我装出基督徒的模样去死，是为了谁呢？

奥地利向意大利要求停战。古瓦朗刚上楼来过。匈牙利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

难道终于有了和平吗？

十一月

1918年11月1日，早晨。

这是我死亡的月份。

已经没有任何希望，比受饥渴的煎熬还要痛苦。

尽管如此，生命仍在我身上跳动，强而有力。有时候，我忘却了一切。刹那间，我仿佛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跟大家现在一样。我甚至设想了一个计划。但是，突然，一阵冰凉的气息，我又明白了过来。

坏的征兆，马泽来得不勤了。当他来的时候，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很少谈我的病。

我会留恋马泽和他那苦役犯的狱卒一样的方脑袋吗？

晚上。

真奇怪，这间房门槛以外，有生命的宇宙仍在继续……我已经沉入怎样的孤寂之中，这是任何活人都不能了解的。

11月2日。

卧床不起。三天来，我只在床和靠椅这两米半的距离之内走动。

再也不能坐在窗户旁边了吗？再也不能坐在一扇窗户前了吗？再也看不到在傍晚的天空中几棵凄凉的柏树了吗？……再也看不到这座花园，任何别的花园了吗？

我在写：“再也看不到”。然而，这几个字里包含着的地狱，我只是间或在一刹那间才看得见。

晚上。

死神会怎样到来呢？多少个夜晚以来，这个问题每夜我不知道想过多少次？有那么多可能性……象小奈特哈尔一样，喉部痉挛，猝发而死？还是象西贝尔那样，逐渐死亡？或者象蒙维尔和布瓦莱一样，心脏衰弱，昏厥而死？

3日，早晨。

怎样死呢？最糟糕的就是象可怜的特鲁瓦亚那样，活活憋死。

这种死法太可怕。

我不希望这样死。

晚上。

今天晚上非常难受，我把巴尔多叫来两次。快到半夜他又

来了，把切开气管的手术盒放在我的桌子上。

有人说：“死并不算什么，怕的是受痛苦。”那么，既然我能够摆脱痛苦，为什么还继续忍受痛苦，继续等待呢？然而，我还在等待！

11月4日。

意大利与奥地利和匈牙利签署了停战协定。

指导神父还想来。（我拒绝了，推托说太疲倦。）这是个警告。必须作出决定的那一天临近了。

5日。

我们过去的所有希望，我们本来该有的所有愿望，我们没有完成的一切，都要你去实现，我的孩子。

11月6日。

古瓦朗来看我。等待着停战，各条战线上却仍在打。这是为什么呢？

完全失音，一句话也说不出。

7日。

声门几乎完全不能扩大。莫非是下部环状软骨麻痹？巴尔多的神色不可捉摸。

吗啡。

1918年11月8日。

德国的全权代表已越过我们战线，战争结束了。

到底活到了这一天。

11月9日。

病情恶化，体温又大幅度波动($37^{\circ}2-39^{\circ}9$)。又出现水肿性充血。并没有什么新的症状，但是，全身的病痛又复发了。

我要求作透视。(何必呢?)为了检查一下有没有新的可疑之点。我怕有新的脓肿。体温的波动肯定标志着深部的化脓。

10日。

右肺越来越痛，每天口服吗啡。有新的脓肿了吗？巴尔多觉得不可能。没有一点特征性症状。

痰反倒少了。

柏林发生革命。德皇出逃。在战壕里，到处燃起希望，得到解救了！而我……

11月11日。

整天非常难受，灼痛感难忍，还是在右肋的那几个部位。

为什么我没有趁着精力尚未耗损时早下决心呢？我还在等什么？每次我都想，“时间到了。”我……

(不，我还没有说，“已经到了。”我说的是，“已经接近了。”于是，我还等待着。)

12日。

巴尔多听到一种杂音，同时还有局部亚捻发音(?)。

中午。

透视结果，右上部一片阴影，没有明显的界限。横膈膜不动。透明度普遍降低。但是，没有可见的积水。如果是又一个脓肿的话，就会有完全不透光的可疑区域，界限分明，呈圆形。那么，这是什么呢？迹象还太模糊，不能贸然作穿刺。如果不是新的脓肿，又是什么呢？又是什么呢？

13日。

局部性肺炎突发，还是在那几个地方。感染肯定在蔓延。大量出汗，发臭。

晚上。

是小块脓肿？小块复合性脓肿？

巴尔多肯定也想到了。

那么，就无能为力了。脓肿已沉入柔软组织，不能进行任何手术，一直到窒息而死。

14日。

两肋都烧灼似的疼痛。左肺也化脓了。脓肿已经扩及两肺。

最后的机会，也许是使脓肿固定？

晚上。

消沉、冷漠的深渊。抽屉里，一封珍妮的来信，一封吉丝的来信。今天晚上，又接到珍妮的一封信。都没有拆开。让我孤零零一个人吧！我已经顾不得任何人了。

今夜，在很长的时间里，我重复着我第一次真正了解的这句话：我从深深的地狱向你呼唤①。

也许我不该这样畏惧。也许不象我想象的那么可怕。也许最痛苦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曾经有那么多次数向自己描绘死亡，现在却不能了。不过，一切都已准备好，都在那儿。

16 日。

固定脓肿无效，他们也许只是聊尽人事，或者作作样子？
两天以来，没有在医院记录本上写任何东西。太痛苦了。
想了却。很难再想，“明天，”再想，“今天晚上……”

17 日。

吗啡。孤独，静寂。每小时，我都进一步离开人世，也更加孤独。但是，我还在听着，什么也听不到。

痰块几乎也不可能排出来了。

死神会怎样到来呢？我真想保持清醒，一直到打那一针的时候还写笔记。

我不甘心接受死亡。只是淡漠，衰竭，使人不能反抗。我与不可避免的命运和解，任凭自己听从肉体痛苦的摆布。

和平。

了却吧！

18 日。

① 原文为拉丁文 De profundis clamavi。

两腿浮肿。重要的时刻，如果我愿意的话。一切都在那儿，
只要伸过手去，下定决心。

一整夜都在斗争。

重要的时刻。

1918年11月18日，星期一。

三十七岁又四个月零九天。

比人们所想象的简单得多。

让—保罗。

—完—

译 后 记

罗歇·马丁·杜·加尔(Roger Martin du Gard, 1881—1958)是二十世纪法国杰出的小说家。他出生于塞纳河畔纳依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一八九六年,随路易·麦勒里奥教师进修,接触到了俄国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的作品。在马丁·杜·加尔一生的创作里,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一八九九年他十八岁时,进入了宪章学院,受到规范的古典文籍教育,在他日后的创作中,对历史材料的运用,描写手法的准确细腻以及严格的科学性,应该说得益于在这所学院的学习。从一九〇六年起,他零星地写过一些小说习作,如《圣者的一生》(Une vie de Saint)、《我们之中的一位女性》(L'une de nous)以及《变》(Devenir)等,但是,有的并没有出版,有的只出版了一部分,却没有获得明显的成功。不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个时期是不可缺少的练习阶段。一九一〇年他开始写小说《让·巴鲁瓦》(Jean Barois),主题是一个出身于宗教家庭的知识分子在摆脱宗教思想时的艰苦历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给宗教以从未有过的冲击,怎样重新认识宗教,从而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对于法国这样一个有漫长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家,正是一个紧迫的主题。《让·巴鲁瓦》是作者从练习写作到走向成熟的一个过渡。

《蒂博一家》是一九二〇年开始酝酿构思的。一九二二年出版了第一、二部：《灰皮笔记本》和《教养院》；一九二三年出版第三部《美好的季节》；一九二八年出版第四、五部：《诊病》和《索莱丽娜》；一九二九年出版第六部《父亲的死》。

一九三一年马丁·杜·加尔遭到了严重的车祸，他在养伤休息的时期，重新考虑了《蒂博一家》后面部分的创作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风云多变的国际形势对他有所触动，他毅然推翻了以前的构思，扩大了小说所概括的范围，写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各阶层的动向以及国际的反战斗争，从而创作出了与历史紧密结合的新型的长河小说范本，这就是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蒂博一家》的第七部《一九一四年的夏天》。一九三七年马丁·杜·加尔因《蒂博一家》这部小说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金。最后一部分《尾声》是一九四〇年出版的。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马丁·杜·加尔诞生的一八八一年，法国用武力得到对突尼斯的保护权，这是法帝国主义向非洲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列宁说，帝国主义就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历史阶段，法国从一七八九年以来在政治上所标榜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已经完全暴露出它们的虚伪性。发生在一八九四年的德雷福斯事件对整个的社会思想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标榜公正的司法和行政机构实际上作的是迫害无辜的罪恶勾当。《蒂博一家》第四部《诊病》的第九章，用一个插曲从侧面写了这个激动过很多人的斗争。一个内心世界很丰富的德语教师，年轻时曾是坚定的德雷福斯派，被放逐到阿尔及利亚，这

种迫害给他的一生留下了抹不掉的痛苦痕迹。小说的第七部《一九一四年的夏天》里，菲利普大夫提到过他以往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重要转折：

“我这一生中，有三个阴暗的日子，第一个日子使我的少年时代发生了革命式的剧变；第二个日子搅乱了我的成年时代，而第三个无疑将毒化我的晚年……第一个日子，当时我还是个虔诚的外省少年，有一天夜里，我从头到尾阅读《四福音书》，发现那里面矛盾百出……第二个日子，就是了解到一个名叫埃斯泰尔哈吉的恶棍，制造了一个叫做‘清单’的肮脏东西，人们不判他有罪，却拚命折磨一位什么事都没有干的先生，只不过因为他是个犹太人^①……第三个日子，就是一个星期以前，报纸上刊登最后通牒那一天^②……”^③

这一段话的确说明了本世纪初法国的思想背景：宗教的衰落，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精神危机，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否定，对新道德标准的探索，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习俗与人类本性的种种矛盾，最后，还有使人类付出惨重代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争面前第二国际对和平事业的背叛以及人类对这次灾祸的反省。对于这个时代各种重大问题的探索是《蒂博一家》这部历史画卷式的巨著的主题。

表现作者思想线索的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蒂博兄弟，安托万和雅克。

① 指的就是德雷福斯。

② 指的是奥地利1914年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

③ 见本书第1597页。

蒂博兄弟对生活的态度反映了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探求，体现了《蒂博一家》的主要思想。兄弟二人相互对立的性格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某些特点。也许，作者把自己更多的特点给了哥哥安托万，弟弟雅克的模特儿是作者的好友，死在军事医院里的彼埃尔·马尔加里迪。这部书就是题赠给他的^①。

从小说所涉及的几个重要的革命理论问题来看，大体上可以说，雅克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饶勒斯的思想。雅克临死前在巴塞尔起草的宣言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看法。他分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说明帝国主义的各国政府完全不代表各国劳动者的利益，这都是正确的观点。雅克号召拒绝应征入伍，号召各国劳动者同时举行起义。这很象一九〇七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法国代表爱尔威提出的议案。就在这次的代表大会上，饶勒斯和瓦扬的提案中，也说到要用一切手段，直至群众性罢工来反对战争^②。

关于总罢工问题，一八九一年八月第二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曾有过争执，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荷兰代表纽文胡斯认为，不论发生什么样的战争，社会党人都应该号召工人举行国际性的总罢工。李卜克内西反对这个主张，他指出，一旦爆发战争，号召交战双方工人举行罢工是不可能的，反战的总罢工口号只不过是左的词句下的空话。历史的发展证明李卜克内西的论断是正确的。但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面前，无产阶级到底应该怎样行动呢？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作出一致的决议。在《一九一四年的夏天》的好几章里，作者形象

① 据《新法兰西杂志》1967年11月，雅克·德莱：《罗歇·马丁·杜·加尔与〈伪币制造者〉》。

② 见苏联科学院主编：《世界通史》第七卷下册，三联书店版667页。

地写出了第二国际的首脑人物背叛了争取和平的斗争，致使工人们不知如何行动的情况。

在如何面对战争的问题上，雅克与瑞士籍的革命者梅奈斯泰勒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梅奈斯泰勒主张以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的暴力代替反革命的暴力。他认为战争是革命者不可多得王牌，所以他并不那么认真地进行反战斗争。他跟雅克一起去散发传单，不过是因为他个人的爱情生活遭到挫折，他有意地用这个方法去自杀。而雅克却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战争的爆发。在他写的宣言里可以看到，雅克用他全部的热情、全部的注意进行反战，在这一点，与饶勒斯很相近。雅克最后的宣言与饶勒斯被暗杀前六天在里昂附近的威兹发表的演说调子是一致的^①。《饶勒斯传》的作者，沙尔·拉波波尔说：“饶勒斯反对战争，即使这场战争导致革命他也反对。他不赞成这种野蛮的赌博。”^②显然这正是雅克的思想。

关于暴力，关于暴力革命，从雅克与奥地利革命者米托尔格的辩论中可以看出，雅克原来不愿接受暴力，他幻想用一种纯洁的、尊重道德价值、尊重人的尊严的革命，来改变现实的社会。然而，到战争爆发的前夜，雅克对暴力的看法有所转变，越来越紧张的局势迫使他不得不接受暴力革命的理论，可是，他对革命的暴力还是怀着知识分子式的疑虑，对革命必将带来的混乱心怀恐惧。因此，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认识并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

不过，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艺术形象，雅克的价值并不完全在于他的思想什么地方与正确的革命理论相合，什么地方相

① 见沙尔·拉波波尔的《饶勒斯传》中译本第97页。

② 见《饶勒斯传》中译本第83页。

悖。雅克是这样一个典型，他代表背叛了资产阶级、而与无产阶级一起来探索人类前途的叛逆者。他的形象在艺术上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他的叛逆，他执着暴烈的性格与非常法国式的、知识分子型的细腻和精致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了本世纪初法国青年一代的真实面貌。他的结局使人同情，使人惋惜，更发人深思。他一生的探索，一直到绝望的献身，构成了悲剧的崇高境界。法国著名的存在主义作家加缪认为，雅克在法国文学中，是写得成功的叛逆者的早期代表人物^①。

雅克的哥哥安托万的生活也许不象雅克那样有戏剧性，但是，安托万身上集中了更多的矛盾，他的性格更加复杂，内容也更丰富。从这个观点来看，《蒂博一家》的深刻主题在安托万身上比在雅克身上表现得更有说服力，

安托万被征入伍以前，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有一切优越条件：家道殷实，身体健康，在职业活动中一帆风顺。雅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找不到生活的土壤，安托万却觉得社会条件对他非常合适，他觉得资本主义制度天长地久，万一他遇到什么不幸，那是因为这个世界出了什么毛病。他心安理得地利用这个社会给他提供的便利。雅克和安托万是两种类型：雅克一直到死是个青少年，他追求，他向往，他把铲除人世不公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然而安托万却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成年人的安宁：他能够在纷扰的问题面前保持自己的平衡。他热心于构筑自己的小天地，但是，历史的狂澜不给他保留这个小角落。即使在职业活动中，各方面的矛盾也逼着他去思考，去寻求自己的良心可以放稳的位置。他从医生的职业道德考虑到普遍

① 见加缪为罗歇·马丁·杜·加尔文集写的序言。

的道德准则，考虑到通常的道德准则与人类良心、人的本性的关系。这是二十世纪西欧一些作家时常论及的主题。

本世纪初宗教思想的崩溃通过安托万得到非常具体的反映。两兄弟的父亲老蒂博先生是思想极为褊狭的天主教徒，他的死象征着宗教思想在这个时代的衰落。老蒂博刚刚下葬，安托万就跟他父亲的神师韦卡尔神父作了一次尖锐的争辩，安托万批驳了宗教世界观的谬误。

在战争面前，兄弟二人的态度是完全对立的。雅克认为保卫祖国、爱国主义等口号都是帝国主义者蛊惑人心的谎言。安托万却是另一种态度。他厌恶战争，他对欧洲各国的外交阴谋和政治讹诈也完全不感兴趣，可是，他又认为，既然政府发布了动员令，公民就应当应征入伍，因为社会对个人提供了生活条件，个人对社会就负有义务。

安托万在战场上中了毒气，住院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个沾沾自喜的小大夫，他经历过战争的苦难，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对生，对死，对自己的生活，甚至对宇宙的奥秘都作了深刻的探讨。在他中毒的后期，两肺都已溃烂，没有任何痊愈的希望，他给自己打了一针吗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安托万的死跟他父亲的死是个对比。老蒂博先生的死真可以说是个闹剧：老头儿怕死，不相信自己必死无疑，却张张扬扬地跟大家诀别，心里却希望大家反驳他的话，增强他活命的信心。安托万的死是沉静的，是安宁的。因为他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他的精神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安托万批判了自己三十几年来建立在金钱上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获利者的态度。直到这时候，他才赞成弟弟对待遗产的方式。他对雅克对待战争的观点也开始

理解了，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了。

小说的最后几章是安托万的通信和日记，年轻的读者对于这一部分也许不会有耐心仔细阅读，然而，这却是全书中最深刻的一部分。在这里，安托万的形象得到了完成，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有了质的变化。他的沉思，他的情绪，他作的结论，都有鲜明的个性，十分生动。正是在这些沉思和探索之中，表现了作者本人对历史的思虑，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看法，当然，也暴露出作者在这类问题上的认识的局限性。

马丁·杜·加尔首先是法国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他也接受了欧洲各国，尤其是俄国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的影响。把《战争与和平》跟《蒂博一家》进行比较研究是饶有兴趣的。如果说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社会的镜子，那么，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则是法国社会的镜子。作者按照一位文献典籍学者的习惯，研究了当时的大量历史资料，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创造出了一个个典型人物，再现了当时的历史真实。

十九世纪逐渐发展起来的象征主义，到了二十世纪初，在音乐、绘画以及文学领域中，都已经蔚然成风。马丁·杜·加尔承继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时，他也用新的方式来挖掘他的主题。例如象征派的画家喜欢在不同的光线下画同一物体，不同光线下的教堂，不同光线下的草垛。他们研究的是光，是不同的光在物体上的反映。而在《蒂博一家》中，马丁·杜·加尔也喜欢以不同人的观点来写同一情节。雅克的小说《索莱丽娜》对他的家庭生活和爱情生活又作了一次概括，事件的剪裁和语言风格则完全是新的手法。

然而，这部小说的主要艺术成就，仍是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

法取得的，准确的心理描写，恰到好处的细节安插，都更有说服力地刻划出了人物的形象。例如雅克在临死前写反战宣言，要引用德皇的一句话，他还念念不忘地要去查对原文。这真是活脱脱地写出了个摆脱不开知识分子习气的革命者。

纵然《一九一四年的夏天》与前面的几部之间，在风格上有较大的不同，但是，由于人物性格的逻辑发展，情节的前后呼应，历史事件的顺序，整个小说仍然是个完美的整体。雅克的遗腹子让—保罗预示着未来，加上安托万在日记中对将来的预测和对让—保罗的叮嘱，更给作品带来一种无穷的余韵。

法国十九世纪大作家福楼拜说过：“杰作就象厚皮巨兽一样，整个的仪态是沉静安详的。”这是传统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之一，强调的是含蓄，是深刻，在沉静的外表底下，包含着逼人的威势。加缪曾经引用福楼拜的这句话来赞美马丁·杜·加尔的《蒂博一家》。在这整个仪态的沉静安详中，有史家的公允，哲学家的冷静，心理学家的细致，当然，还有艺术家从深厚的人道主义出发的良心。然而，也可以说，除了这些以外，还缺少一些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个革命家的信念和激情。无论是安托万还是安托万的老师菲利普大夫，对待革命和革命理论的态度是知识分子型的，显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怀疑，而这也正是作者本人的态度。雅克接受革命暴力学说时那种犹豫，那种痛苦，也写得很生动。显然，作者熟悉这样的感情。逐一阅读马丁·杜·加尔的重要作品，从《让·巴鲁瓦》到《蒂博一家》，以至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遗作《穆莫尔中校》，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马丁·杜·加尔的思想发展线索。马丁·杜·加尔是个人道主义者，他的人生观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从清醒的现实主义出发，他知道无

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了解无产阶级革命深刻的历史原因，然而，他不喜欢暴力，不喜欢暴力革命。同时，他又清楚地知道，不管他愿意不愿意，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他人生观里最深刻的矛盾。也就是这种矛盾，反映在安托万和雅克的冲突，以及他们各自的性格中。《一九一四年的夏天》第九章里，米托尔格批评雅克道：“你追求，你怀疑，你推理。对着你那些从早到晚自己不断制造出来的矛盾，一会儿把鼻子扭到左边，一会儿又扭到右边！你欣赏你自己的这份细致！……可是你没有信仰！……”^①如果去掉两个人吵架时的那种尖刻和恶意，这些话也可以用来批评作者。

我们指出作者在人生观中的局限以及作品某些方面的不足，目的是明确对作家要求的范围。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无法负担鼓吹革命或倡导某种革命理论的任务。正好象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他们都不是革命的代言人，但是，他们作品中的巨大认识价值及艺术力量得到了革命导师马克思及列宁的称赞。

从描写事件的广度及反映现实的深度来说，《蒂博一家》是本世纪的一部杰作。马丁·杜·加尔所写的历史事件不是宿命的，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势的必然发展结果。作品中人物的悲剧紧密地与历史相连，通过人物的个人悲剧深刻地揭示了当时人的冲突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基本问题，这就构成了诺贝尔文学奖金评奖委员会所评价的作品的艺术力量和真实性，使这部巨著有很强的

^① 见本书第 1080—1031 页。

认识价值。所以，《蒂博一家》是一部值得向中国读者推荐的佳作，是一部有积极作用的、重要的进步作品。

译文脱稿之后，曾蒙管震湖先生在百忙之中抽暇校阅一过，我们在这里衷心地表示感谢。翻译过程中，不少师长、同学、朋友给了我们许多鼓励和具体的帮助，我们都是永志不忘的。

王晓峰

1984年4月于北京



书 号: 10188·516

定 价: 3.15 元